

作者親歷根據筆記及權威資料記述
迄今無法企及的一次政治轉型探索

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
台前幕後

吳偉 著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请紫阳同志审批。

九月八日

关于十三大报告（征求意见稿）
讨论情况和进一步修改设想的报告

中央书记处：

从八月中旬到八月底，在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全体十三大代表、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各方面党内负责同志约五千人的范围内，认真讨论了十三大报告（征求意见稿）。主持讨论的各地、各单位党委，均已报来关于讨论情况的报告和修改本。现将讨论中提出的主要意见，以及我们经过研究后的进一步修改设想，综合报告如下：

（一）关于报告的总体结构和基本内容

在各地、各单位的讨论中，绝大多数同志认为，报告草稿实事求是地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性变化，总结了九年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根据和党的基本路线，正确地提出了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大家普遍赞同十三大报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论，以加快改革开放为主题和基调，

九月九日

~~讲稿（减去二页）~~

完全赞成 五.五

小平同志：根据您四月廿八日讲的精神，我准备在近期召集宣传、理论、新闻、党校等有关方面同志开个会。现将讲稿送上，请审阅指示。如原则同意，我再找一下尚昆、万里、启立同志酝酿一下，并提请书记处讨论，最后再开会布置。为避免引起新的不必要的振动，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四月廿八日同您谈过）暂时不讲，已从稿中删去。

可

敬礼

赵紫阳 五月八日

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五月四日稿）

今天开个会，部署一下舆论宣传工作。两个方面，一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深入，二是经济体制改革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久就要在十三大提出来，怎么做好这两个方面的舆论宣传工作？请中央宣传部主持，好好讨论一番。下面我先谈点意见。

一、如何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引向深入？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进行了四五个月了，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全党努力下，政治思想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已经扭转。概括地说，是大气候变了，局面已经控制住了。具体地讲，可以举出这么六条：（一）学潮已经平息，学生的情绪趋于稳定，（二）全社会继续保持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局面，（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失去了公开的市场，不要党的领导、不要社会主义那种乌七八糟的话不敢说了，也没有地方登了，（四）极少数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又屡教不改的人受到了应有的批评和处分，（五）个别领导同志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

趙紫陽和鄧小平在5•13講話稿上的批示。

会 议 通 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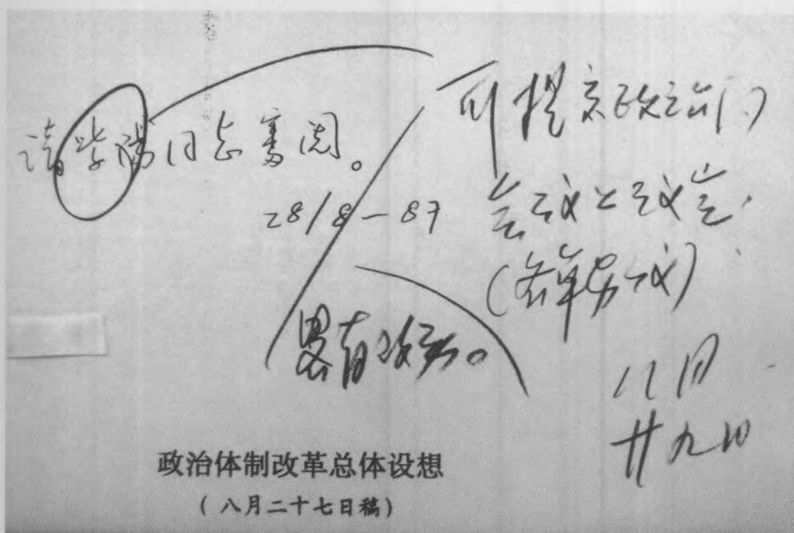
中共中央决定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三日（星期三）下午三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由赵紫阳同志作报告，请出席。

（凭此通知由中南海西门进入会场）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二日

趙紫陽 5·13 講話會議通知。



请紫阳同志審阅。

28/8-87

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

（八月二十七日稿）

趙紫陽在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稿上的批示。



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後趙紫陽率常委亮相。



趙紫陽與鄧小平。

1987 年 11 月 1 日晚鮑彤
與吳偉在天安門城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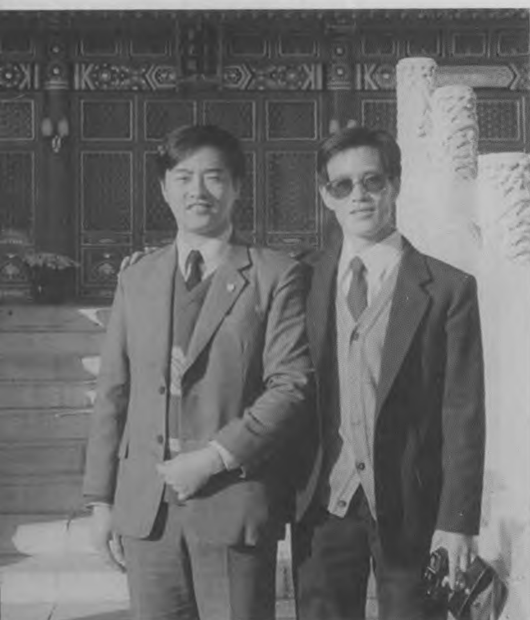




1987 年 10 月吳偉、朱厚澤、于光遠、陳一諮在十三大會場合影。



1987年11月中央政改辦全體人員在中南海紫光閣。



1987年11月作者與嚴家其。



1987年11月作者與陳一諮。



1987 年 11 月吳偉在中共十三大會場。



1987 年 11 月趙紫陽與政改辦人員在中南海紫光閣。


鮑彤、賀光輝合影。


1987 年春鮑彤與吳偉在玉泉山。


1988年4月鮑彤與作者在杭州。


1988年4月鮑彤與政改辦同事在杭州調研。



1988年夏中央政改研究室同事合影。



1988年春鮑彤帶政改辦人員在浙江調研。



1998年鮑彤與作者。



2006 年 11 月前中央政改辦人員為閻明復、鮑彤賀壽。



2006 年政改辦 20 年後部分人員合影。



2009 年 7 月鮑彤夫婦與吳國光、吳偉。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七日合影 于中南海紫光阁



1987 年趙紫陽與中央政改辦全體人員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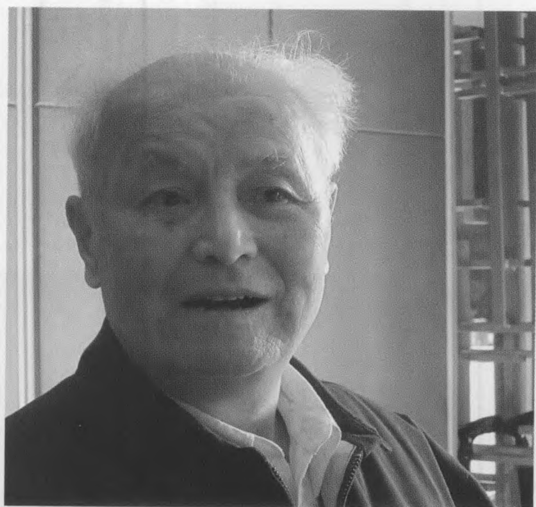
1987 年趙紫陽與十三大報告起草組合影。



1987 年鮑彤領導的中央政改辦和十三大報告起草組合影。



中央政改辦部分人員參加中共十三大。
(前左二陳一諮、前左三陳小魯、前左四吳偉)


李銳，2011 年。


朱厚澤，2008 年。


王忍之



1987 年 11 月 1 日十三屆一中全會後趙紫陽率常委會見記者。

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

台前幕後

吳偉 著

鮑彤 序

ON STAGE AND BACKSTAGE:
CHINA'S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1980s

BY WU WEI

FOREWORD BY BAO TONG

新世紀出版社
New Century Press

書名：　中國 80 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
作者：　吳偉
序：　鮑彤
封面設計：　Renee Chiang
出版社：　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
聯絡方式：　editors@newcenturymc.com
國際統一書號：　978-988-15571-1-7
定價：　港幣 148 圓

香港印刷，2013 年 2 月。

版權聲明
沒有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的書面同意，本書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在任何媒介中複製或傳播。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English Title: On Stage and Backstage: China's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1980s
Author: Wu Wei
Foreword: Bao Tong
Design, Layout & Production: Renee Chiang
Publisher: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editors@newcenturymc.com
ISBN: 978-988-15571-1-7
Price: HK $148

First printed in Hong Kong, February 2013.

Photos: Courtesy of the author.

Copyright ©2013 by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Hong Kong.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atsoever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目錄

序 ....鮑彤 1

引言 5

第一章 思想解放與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度的改革》.....................11
第二章「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搞不下去」...................41
第三章「政治體制改革要有一個藍圖」...74
第四章 在「反資產階自由化」的政治高壓下 101
第五章 發展黨內民主要從中央做起，從十三大做起 147
第六章 專題研討與中央研討小組的五次會議 173
第七章「總體設想」怎麼搞？ 217
第八章 十三大報告與中共十三大 249
第九章 中央政改研究室：要為政治體制改革破題 286
第十章 十三大後政治體制改革還做了什麼？ 323
第十一章「物價闖關」和治理整頓 363
第十二章 山雨欲來 394
第十三章 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平息學潮 437
第十四章 作一次最後的鬥爭 494
第十五章 被審查的日子 545
第十六章 中國的民主政治，從這裏起步 577

附錄一 政改研討小組辦公室、政改研究室研究人員名錄 615
附錄二 中共十三大報告起草組成員名錄 619
附錄三 趙紫陽談鄧小平歷史地位 621
附錄四 鮑彤在學潮和動亂期間言行的「交代」..............................624

序

鮑彤

中國1980年代那次政治改革，從1989年6月長安街上響起槍聲的那一刻開始，就已經死了。但是，20多年來，你到中國的任何一個歷史博物館裏，都找不到它的屍體。是當局，在扼殺了這次改革之後，又在一切官方資料中抹去了它的痕跡。

在1980年代的後半期，中共中央確實曾經進行過一次政治體制改革。這次改革的核心人物，它的方案設計者和改革實踐的組織者，是時任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

趙紫陽主持這場改革，是在沒有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受鄧小平的指令而倉促上陣的。但是，也正是由於趙紫陽的主持，才賦予這場改革以與鄧小平的設想全然不同的意義。在趙紫陽的主導下，這次原本以提高效率為目標的行政改革，演變成了使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向現代政黨轉型的一次勇敢的嘗試。儘管由於這次改革超出了鄧小平所能忍耐的限度，在鄧和黨內保守勢力的狙擊下失敗了，但是，它為中國的政治轉型和社會轉型，留下了寶貴的借鑒。

為了組織這次政治體制改革，1980年代的中央曾經建立過兩個機構。第一個機構，是1986年9月成立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組長是趙紫陽，成員有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彭沖。它的任務是為中共十三大提出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在它之下，設立了一個工作班子，叫做研討小組辦公室，由我和周傑、嚴家其、賀光輝負責。經過一年的研討，在十三大以前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它的主要內容寫入了十三大報告。十三大結束以後，這個研討小組就完成了歷史任務，它下邊的辦公室也就結束了工作。1997年，吳國光先生根據他的筆記和親歷，寫下了《趙紫陽與政治改革》一書，為這段歷史留下了足跡。

第二個機構，是 1987 年 12 月初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第十三屆中央政治局決定，研究室的職責是在中共中央領導下，「負責政治體制改革實施過程中的綜合研究和協調工作，同時承擔中央交辦的有關問題的研究和文件起草工作」。這個研究室由我、周傑、賀光輝負責。在成立後一年半多的時間裏，研究室為實施十三大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作了一些具體工作。

在 1989 年 6 月的那場鎮壓中，這個研究室被一個姓李的前國家主席宣佈為以趙紫陽為「總後台」的「小艦隊」；被另外一個姓李的前國務院總理宣佈為「動亂的黑手」，「在中國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總指揮部」。因此在那年 6 月 4 號以後，這個機構自然煙消雲散。曾經在這個機構中工作過的人們，大多受到了歧視和不公正的對待，無法繼續為政治改革盡力。

20 多年來，對這第二個機構和它的歷史，沒有任何記錄。現在，我過去的秘書吳偉先生根據他的工作筆記和回憶寫了這本書，開始填補空白。

從第一個研究機構（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立的時候開始，吳偉就是第一批七位研究人員之一，參加了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等文件的起草；後來，他繼續在第二個機構（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做研究工作，同時兼任我的秘書。作為那次政治改革的親歷者，他用自己的回憶錄，對那段時間的經歷，做一些追記和反思，我認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以為願意或需要瞭解那次政治體制改革的人提供一些材料，供他們研究，批評，參考。

本書的回憶和看法，出於吳偉先生個人的視角，這種視角，同任何其他人的視角，例如我的視角一樣，都不可能是全面的準確的，很可能有偏頗失當之處。這就需要瞭解當時情況的人加以糾正和補充。

當年一起工作的人，據我所知，只有一位周傑先生已經不在了。除此以外都還健在。大家對吳偉這本書的補充和糾正，肯定將具有同樣的參考價值。這也是我的希望。這樣，我們就有可能把這部分已經失落了多年的歷史資料搶救回來，比較完整地留給歷史。

當年，我們這些參加搞改革的人，知不知道在中國的條件下搞政治改革是有風險的？恐怕沒有人不知道。支持大家的，是一個信念，就是中國要搞改革，要搞政治改革，而且不是口頭上紙面上的改革，

凡是做得到的都開始著手做，至於一時做不到的事情，我們就把目標放在那裏，朝著這個方向前進。

在這本書中，讀者可以看到，趙紫陽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我鮑彤主持的辦公室，和後來的研究室，在它們存在的過程當中，一直在為政治改革努力，沒有什麼「陰謀策劃」，沒有做過違反黨章、國法的事情。當年，主持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三個人，我跟趙紫陽的關係大家都清楚，其實，周傑跟耀邦的關係[1]，賀光輝跟薄一波的關係[2]，高層人士沒有不清楚的。鄧小平清楚，那些姓李姓王的也無不清楚。由這樣三個人來組織研究和實施政治體制改革，能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全是透明的。什麼「小艦隊」，什麼「動亂總指揮部」，後來在「清查清理」中查了個徹頭徹尾徹裏徹外，最後查出什麼東西出來了？沒有。實際上，當時的中共中央用這三個人，就是想把三個人的意見，趙紫陽的意見，胡耀邦的意見，薄一波的意見合到一起，盡量減少改革的阻力。正因為這樣，我們所做的事情，沒有也不可能有什麼東西不可告人。在本書中，作者無保留地實錄了那段史實，甚至於把 1989 年 5 月我被捕前燒文件都如實寫進去了，還有什麼需要保留的？我為什麼要燒文件？不是文件裏邊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私密，而是怕株連無辜。根據我的微薄的政治經驗，多少年來，在中共黨內，凡是要打倒一個人，必然株連。凡是與被打倒的人有關的人，凡是參加過起草有關文件的人，都必然會荒唐地被追究罪責，逼供信。燒掉了，好，好得很，一切問題，由我鮑彤負責，乾乾淨淨，徹底了。

20 多年過去了。歷史，似乎回到了它的原點。進行一次真實而不是騙人的政治變革，完成中國向憲政民主轉型的任務，再次擺到了國人面前。當年，我們在趙紫陽的帶領下，為中國的政治改革做過一些工作。本書對這些工作做了一個大致的描述。應該說，這些工作其實

【1】 周傑（1927-2005），江蘇阜寧人。1944 年參加工作，同年加入中共。建國後曾任中央團校副教育長、人民出版社副社長等職。1979 年調中央辦公廳，先後任秘書局副局長、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室務委員、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曾長期在胡耀邦直接領導下工作。1986 年任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負責人之一，1987 年兼任正式設立的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1988 年 9 月兼全國人大副秘書長。2005 年因病逝世。

【2】 賀光輝（1929-）陝西清澗人。1942 年赴延安。1945 年加入中共。1955 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早年曾任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秘書。1983 年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1986 年任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負責人之一，1987 年兼任正式設立的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

只是一種預演，而且是被扼殺的預演。對它做得不足的地方，希望現在和以後的人超過它；錯誤的東西，希望後面的人批評它。如果其中介紹的情況對後來者多少有某種參考價值，我想，這本書就很值得出版了。

2012 年 10 月 19 日

引言

一

中國，當前正在面臨著向現代民主社會的轉型。如何完成這一轉型？一個選擇，歷史性的選擇，已經現實地擺在了當代中國每一個知識分子，每一個國民面前，同樣，也擺在了執政當局面前：是改良，還是革命？如果說一百多年前，這個有著幾千年歷史的老大帝國曾經面臨過一次這樣的選擇的話，那麼現在的中國，似乎是在重蹈覆轍。

我們去年剛剛紀念過辛亥革命百年，那場以共和憲政為目標的民主革命，並沒有完成中國大陸向現代民主社會的轉型。同樣，迄今為止的事實證明，半個多世紀以來，曾經以完成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革命」為己任，取得了政權的中國共產黨，也同樣沒有能完成這場社會變革。在這個有著長期封建傳統的國度裏，依靠一個按照列寧斯大林主義建立起來的組織嚴密、信仰高度統一的政黨，通過長期的武裝鬥爭而取得的政權，建立起的必然是一種以黨治國、高度集權的政治和經濟體制。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共產黨一黨執政的極權政治，和列寧斯大林主義傳統的意識形態控制，成為這個體制的基本特徵。

這種體制，給中國人帶來了幾十年的深重災難，直到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國推到了崩潰的邊緣。毛去世之後，在中共黨內的一些開明的、有遠見的領導人帶領下，開始了以瓦解計劃經濟為目標的經濟體制改革，使歷經劫難的中國開始走上市場經濟之路。就在中國人吃飽了肚子，呼喚著更多的經濟、政治、文化權利的時候，卻發現面前仍然阻擋著一座極權政治的大山。誠然，現實的中國，與百年前的中國相比，已經發生了滄桑巨變，但是，正是這種巨變，使中國比以往更加迫切地需要實現政治現代化，完成向現代民主社會的轉型。

為維持一黨統治，執政黨長期推行「經濟上放開、政治上收緊」的政策，經濟改革打開了市場經濟的魔盒，而政治改革的滯後，導致不受制約的權力與財富結合，形成了權貴利益集團的盤根錯節，權力尋租造成了嚴重的體制性腐敗，社會資源分配不公導致的社會兩極分化，群體性事件蜂起，加之當局錯誤的推行「維穩」政策，已經使中國到處佈滿了乾柴。

現在的歷史，已經進入到了21世紀。如果說20世紀是世界多數國家擺脫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世紀的話，21世紀就將是已經取得民族獨立的各國擺脫專制主義，走向民主的世紀。已經過去的10年，已經向人們證明了這一點，歷史還將繼續證明這一點。從上個世紀初開始至今，中國從封建專制向民主社會轉型已經走了100多年，經歷了兩次革命，但轉型的任務並沒有完成。看來，也許還可能發生第三次革命。當然，如果能通過政治和社會改良，完成前兩次革命沒完成的任務，推動和實現中國向民主社會轉型，當然是國家之大幸，民族之大幸，民眾之大幸。是主動改良，推動社會完成民主轉型，還是等待革命，已經不僅僅是理論上的推導，而是擺在中國民眾，特別是當政者面前的一道現實選擇課題。對於當政者說來，與其被動等待，不如主動改良。

二

主動進行政治改良，改變權力高度集中的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向民主政治轉型，這對於執政黨說來，並不是一個完全新鮮的事物。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黨內的有遠見的開明領導人曾經發動過一次政治改良，這就是1980年代由鄧小平提出、趙紫陽以中共中央名義主持的那場自上而下的政治體制改革。

1986年，經濟體制改革由農村進入城市，進入了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了經濟主體的多元化，經濟利益的多元化。但同時，改革也遇到了舊有的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的阻礙。以堅持「兩個基本點」而著稱的中共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開始大聲疾呼政治體制改革。經鄧小平提名，中共著名的改革派領導人趙紫陽主持了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其後的改革操作。正是由於趙紫陽的主導，使這場由鄧小平提出的原本以提高效率為目標的行政改革，

演變成了使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向現代政黨轉型、中國高度集權的政治制度向現代憲政民主轉型的一次勇敢的嘗試。

趙紫陽主持「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並授命鮑彤組建研討小組辦公室，開始了為期一年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工作。他們克服了重重困難，頂住了黨內左的勢力發起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干擾，於 1987 年 10 月的中共十三大上，通過了以「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此後，在已經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主持下，政治體制改革全面展開，並在許多方面取得了突破，直到 1989 年 6 月，因天安門廣場那場鎮壓而被迫中斷。

雖然這場步履維艱的改革，從研討到展開，也不過只進行了兩年半多的時間，而且最後仍然敗在了極權者鎮壓民主運動的槍口下，它的主持者趙紫陽也為此而失去自由近 16 年之久，但是它仍不失為中國政治和社會向憲政民主轉型的一次有益探索，它的目標、基本原則和許多做法，對於那些有創新思維和歷史責任感的中國人，特別是中共新生代的領導人們，不乏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它的許多經驗和教訓也值得當代中國人在社會的民主轉型過程中總結汲取。

轉眼 20 多年過去了，那場由中共中央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似乎沒有在歷史上留下多少痕跡。這一方面是中共當局全面背離十三大制定的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並進的路線、政策的結果。他們繼承了當時黨內保守派的衣缽，頑固堅持一黨統治，懼怕政治改革，在上個世紀 90 年代以來全面恢復了改革前的體制，甚至進一步退兩步，把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更加推到了極致。另一方面，當局害怕現在的人們瞭解那段政治改革的歷史，害怕人們瞭解他們的手上曾經沾染過那些要求民主自由的人們的鮮血，特別是害怕人們瞭解在 1989 年那場民主運動中，曾經有過一位中共黨的最高領導人因拒絕進行鎮壓而被罷黜的事實。因而，他們從公開的傳播媒介上抹去了那段歷史的幾乎全部相關信息，以至於使現在的年輕一代對 1980 年代發生過的那些事情幾近毫無所知。

本書，是作者以一個親歷者的身份，對那場由趙紫陽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所作的一個並不算完整的紀錄。書中，有我的經歷，我的思考，但更多的，是記錄了趙紫陽、鮑彤這些共產黨內的開明領導者，和那些曾經從事過這場改革的人們，對中國現行政治體制的認識、分

析、反思，和改革的所思所想。古人有云：「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鑒，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寫作本書的目的，就是試圖給歷史留下一面鏡子，向那些有志於改革現行體制，使中國真正走上民主憲政之路的人們提供參考。同時，也告訴現在一代年輕人，歷史，曾經這樣走過。

20 幾年來，我一直想把我的這段經歷寫出來。把它留給歷史，留給未來，是我們這些親歷者的責任。但是，囿於自己的能力，也受限於所處的環境和資料的短缺，一直讓我猶豫著，沒有動筆。直到今天，中國政治的現實讓我不得不坐在電腦前。也許，本書所能記錄下來的，還不及那次改革之萬一；也許，我的拙劣文筆還有許多的辭不達意，甚至有許多錯謬，但只要把它寫出來，送到讀者面前，我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三

寫作這本書，我的主要資料來源，是自己當年的工作筆記，和當年工作中留下的一些文稿資料。同時，還請教了當年的親歷者和知情人，參考了近年來陸續問世的相關著述。

在本書成稿過程中，我得到了我的老領導，原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鮑彤老先生的熱誠支持。鮑老作為趙紫陽的主要助手，在當年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和實施過程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來，我曾經先後數十次向鮑老請教，請他幫助我回憶一些事件的經過，傾聽他對一些事情的看法。他的支持和推動，對我寫作本書幫助極大。在本書即將成稿的時候，適逢鮑老的 80 大壽。我願將此書獻給他，感謝他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為中國民主憲政事業做出的巨大貢獻，祝他健康長壽。

當年那場由趙紫陽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已經過去了 20 多年。這期間，雖然官方封鎖了各種檔案文件和資料，但仍然有一些相關的書籍和文章、資料在不斷出版或發表。這其中出版較早的，就是吳國光先生依據他的工作筆記寫成的《趙紫陽與政治改革》【3】。國光曾經是中共黨報《人民日報》的著名評論員，我在中央政改辦工作期間的同事。

【3】 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台灣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1997 年 8 月出版。

和我一樣，他也用自己的筆，記錄下了當年政治體制改革研討那段歷史。在本書成稿，特別是前面幾章的寫作過程中，大量參考甚至摘錄了國光的此書。在此，也特向國光致以熱誠的謝意。

幸運的是，在本書開始寫作前不久，趙紫陽先生的回憶錄《改革歷程》[4]出版了，這對我瞭解當年政治體制改革的台前幕後，瞭解1989年的那場「風波」中趙紫陽的所思所想，進一步提供了詳實的資料。另外，宗鳳鳴先生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5]一書，也為我們瞭解趙紫陽晚年的思想變化提供了可靠的記錄，成為我案頭必備的參考書。為此，我要向紫陽，向不畏高壓，堅持記錄和出版這些重要歷史資料的人們獻上我的敬意。

要準確地描述已經過去了 20 多年那一段歷史，僅憑個人的記錄和記憶是不夠的。在本書寫作過程中，我訪問了許多位當年的親歷者和知情者，他們當中，有前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有時任趙紫陽秘書的李樹橋、李湘魯；有我當年的同事陳群林、陳小魯、唐欣、孫方明、顧雲昌、石肖巖、吳稼祥、白慧敏；也有我當年在政治體制改革中結識的朋友魯利玲、王彥君、李偉東，等等。他們為本書的寫作提供了多方面的幫助。在此，我也一併向他們致以衷心的感謝。

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我是在努力將本書當作學術著述來寫，力圖將它寫成一本信史。但它畢竟是從我個人的記錄和視角出發的，其中難免有許多疏漏和不準確之處。鮑彤老先生在本書的序言中提出，希望有更多的瞭解當年情況的朋友對本書的疏漏提出修正，我完全贊同他的看法。還原一段歷史，需要多方面的資料和多視角的印證才能準確反映其本來面目，特別在當前官方資料沒有開放的情況下更是這樣。為此，我非常歡迎讀者的質疑、批評和指正。

2012 年 12 月 28 日

【4】 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出版

【5】 宗鳳鳴：《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香港開放出版社 2007 年 1 月出版。

第一章

思想解放與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度的改革》

上個世紀 80 年代在中國發生的那場由鄧小平[6]發起，趙紫陽[7]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是中國共產黨執政 60 多年中一個難得的亮點。它是中國共產黨主動對自身執政體制的缺陷進行的一次，也是迄今為止中共執政史上出現過的唯一的一次大規模的政治體制改革。鄧小平當初發動這場改革的目的，當然不是自我否定，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拜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所賜，這次改革，發端於文革後的那場思想解放運動，是中共黨內外痛定思痛，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結果。

【6】　鄧小平（1904-1997），四川廣安人。所謂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1977-1987 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82-1987 年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1981 年至 1990 年擔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是當時在中國擁有最高權力的中共元老。鄧小平是經濟改革的發動者和強有力的支持者；在政治方面，他堅守一黨專制的底線，是改革年代歷次「反自由化」的發動者；從 1979 年鎮壓北京西單民主牆運動，到 1989 年的「六四」鎮壓，都是他親自作出的決策。鄧小平個人的傾向對毛澤東身後的中國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具有深遠影響。

【7】　趙紫陽（1919-2005），河南省滑縣人。1938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共建國後，曾任中共華南分局秘書長、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文革後歷任內蒙古、廣東、四川省委書記。1976 年開始在四川省調整經濟政策，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並主持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1979 年後歷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主持改革和建設。1984 年兼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將改革推進到社會各個領域。1986 年中央成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鄧小平提名趙紫陽為組長，主持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工作。1987 年 1 月胡耀邦被迫辭職後，趙紫陽任中共代理總書記，開始全面主持中共中央工作。10 月，在中共十三大上作《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闡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以建設民主政治為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總書記，並任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1989 年 5-6 月發生「天安門事件」。6 月，中共中央十三屆四中全會認為，「趙紫陽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對動亂的形成和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決定撤銷他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職務。1989 年 6 月至 2005 年，被軟禁於北京住所。2005 年 1 月 17 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 85 歲。

一、真理標準大討論與理論工作務虛會

1976年10月，經歷十年文革的劫難，已經瀕臨崩潰邊緣的中國，迎來了一次重大轉機。在文革中助紂為虐的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幫」【8】，被當時任黨中央主席的華國鋒【9】，和黨內以葉劍英【10】為首的一批元老聯手逮捕，「隔離審查」。雖然解決問題採用的手段是非規範、非制度化的類似「宮廷政變」方式，但它畢竟給已經走進文化大革命死胡同的這個國家、這個執政黨帶來了一線生機。

「四人幫」垮台之後的一、兩年內，中共的中央機構和國務院機構都進行了部分改組，但這種改組，只是為了因應人事的變化而調整的，比之文革中的體制，並沒有什麼大的變化。

1977年3月，在兩年前再次受到錯誤批判的胡耀邦【11】被恢復工作，擔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同年底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在他的努力下，一大批在文革中受到打壓迫害的老幹部得到了「平反」，陸續回到了領導崗位，他們和廣大黨員、民眾都迫切要求對建國以後的重大歷史問題，包括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錯誤、文化大

【8】「四人幫」指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黨內最忠實地貫徹毛澤東政治主張的勢力。其成員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其中江青為毛澤東之妻，其他三人均由毛澤東親自委以重任。毛澤東死後，1976年10月6日，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人通過中央警衛部隊逮捕了「四人幫」及其支持者。1981年，在實際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領導下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文化大革命定性為「由領導者（毛澤東）錯誤發動，被江青（四人幫）和林彪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一論斷為毛澤東開脫了親手發動以至始終領導文革的責任，使「四人幫」成為毛澤東的替罪羔羊。

【9】華國鋒（1921-2008）：山西交城人。1976年毛澤東死後與「四人幫」權力鬥爭的勝利者。1976-1980年，擔任中共中央主席、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軍委主席鄧小平成為「第二代核心」，華逐漸失去了一切權力。

【10】葉劍英（1897-1986）：廣東省梅縣人，中共元老。1978年3月當選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共第八、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十、十一屆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常委。1976年10月，主持了抓捕「四人幫」行動。1985年退休。1986年逝世，終年89歲。

【11】胡耀邦（1915-1989）：湖南瀏陽人。1980-1987年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胡耀邦發動了「真理標準大討論」，主持「平反冤假錯案」，開拓了改革開放的政治與社會環境。在鄧小平以及其他黨內元老的眼中，胡耀邦政治上對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人和事過於寬容。在失去元老支持後，胡實際上已經無法工作；1987年1月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發了幾乎有全體北京大學生參加，並且得到全國大學生和北京市民廣泛支持的大學潮，持續了整整50天，最後在6月4日遭受鄧小平調集的幾十萬軍隊血腥鎮壓。

革命產生的根源等一系列問題進行再認識，對黨的政治、經濟政策進行必要的調整，以徹底走出文革。當時掌握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華國鋒等人順應黨內外的呼聲，做了多方面的機構和政策調整，並在鄧小平等老幹部復出方面做了相當多的工作。但在當時條件下，進行根本性理論和政策調整的阻力極大。黨內高層仍然有人主張堅持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政策，並藉機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兩個凡是」。按照這一方針，非但毛澤東時期的錯誤不能糾正，連鄧小平等許多老幹部重新回到政壇也成為不可能【12】。

這樣一個錯誤方針理所當然地受到黨內外大多數人，特別是那些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而又重新回到領導崗位的黨內一大批老幹部的強烈反對。1977 年 4 月 10 日，已經得到「解放」但並沒有恢復工作的鄧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批評「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他強調，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5 月 3 日，華國鋒主持的中共中央轉發了鄧小平的信，肯定了他的意見。5 月 24 日，在同中央兩位有關負責人談話時，鄧小平再次強調，「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

經過黨內外許多人的共同努力，1977 年 7 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決議，恢復鄧小平原任的黨政軍領導職務。鄧小平在會上講話指出，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是毛澤東倡導的作風中的最根本的東西。此後，他開始著手推動科技和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

「四人幫」的垮台和「完整準確理解毛澤東思想」的提出，無疑是中共的廣大黨員幹部、中國的廣大民眾思想上獲得解放的前提。文革時期的政治高壓和對思想言論上的禁錮被衝破，各種對理論和現實問題的探討開始活躍起來。在時任中共中央黨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長胡耀邦關心和推動下，中央黨校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成了全國知名的思想解放的陣地。1978 年 5 月《理論動態》首發了〈實踐是檢驗

【12】 關於華國鋒主政期間的功過，中共官方和民間研究者前後有不同的說法和評價。特別是 2008 年 8 月華逝世以後，官方的說法有了變化。而民間研究者也提出了許多對過去官方說法的質疑。請參見韓鋼：〈還原華國鋒——關於華國鋒的若干史實〉，載《往事》第 74 期，2008 年 11 月 14 日。

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然後又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公開發表在《光明日報》上，從而引發了全黨和全國範圍的真理標準大討論。

這次討論，對廣大中國人，對中共的黨員幹部說來，確實可以稱得上是一次「思想大解放」。經過這次大討論，人們在幾十年來形成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毛澤東思想崇拜開始破除，對幾十年來黨所奉行的一系列理論政策也開始「撥亂反正」。人們開始認識到，任何「真理」都必須經過實踐的檢驗，任何政策都必須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凡是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不符合實際的理論、政策，都必須得到糾正。

經過半年多的大討論，中共的黨員幹部，特別是黨內高層的許多人思想、觀念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這種情況下，1978 年 11 月 10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緊接著，又召開了在中共歷史上有著重大影響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來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發端。

今天翻閱中央工作會議和其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文件，可以看到，在激烈爭論的基礎上，中央形成了對真理標準討論的肯定意見，提出了工作重點轉移，提出了對歷史上冤假錯案的平反，特別是給 1976 年 1 月天安門事件的平反，鄧小平也提出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但是，會議仍然提出要堅持傳統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反對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在政治上，也還沒有看到有任何從體制因素上總結文革產生的歷史教訓的說法，也沒有比較直接的談到體制問題，談到經濟、政治體制改革、「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改革」方面的問題。

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並沒有完全平息黨內的爭論，特別是在中央高層中思想理論上的爭論仍然很激烈。為了進一步搞清理論和政策上的一些重大問題，統一全黨思想，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不久，1979 年 1 月 18 日，中央召開了理論工作務虛會。這個會議，由胡耀邦等人主持，有中央和北京的理論宣傳單位的數百人參加，各省也派出了聯絡員，前後開了兩個多月，很多人把它看成是真理標準討論的第二階段。開會之初，胡耀邦就強調要解放思想。會議中，許多人的發言大膽衝破了禁區，提出了在當時看來使人震聾發聵的一些觀點，由於會議簡報發放範圍很廣泛，引起了黨內和社會上的較大震

動。後來在政治體制改革中成為趙紫陽助手的鮑彤[13]也參加了會議，並作了長篇發言《二十年間》[14]，對中共八大、1957 年反右、1959 年廬山批彭德懷、文化大革命等黨內重大歷史問題和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會上的一些討論開始涉及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問題。這其中，就有李洪林[15]關於「黨和國家領導人應該通過民主程序選舉產生，而不應由前任指定」的發言，和嚴家其關於「廢除黨的領導職務終身制」的發言。

時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黨史研究室主任的李洪林在本小組討論中第一個發言，他說：

>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當家作主的是人民。人民會通過社會主義民主的程序，選出國家的領導人，不應由前任領袖指定後任領袖。在黨內也是這樣。為什麼？決定誰當領袖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的事情，這是個集體，而不是個人。領袖本人能不能當領袖，都要由黨組織來決定，他本人沒有權力把領袖的地位交給別人。
>
> 那麼，由黨組織事先確定一個「接班人」，準備當下一任領袖行不行呢？不必，也不行。人是可以變化的，事情也是發展的。事先確定，不符合事物的發展規律，弊多利少。當然，在實踐中，黨的領導核心中，會有人表現出最卓越的才能，逐漸得到全黨的信任和擁護。那麼，何必確定什麼「接班人」？只要民主生活健全，誰是眾望所歸，很自然就會成為全黨所擁護的領袖。而且，關鍵還不是一個人，而是黨的領導集體。只要黨在實踐中形

【13】 鮑彤（1932-）：浙江海寧人，趙紫陽在政治體制改革中的主要助手，中國著名政治活動家。1949 年春在上海加入中共，7 月調入中共中央華東局組織部任幹事。1965 年任中央組織部研究室副主任。文革中被定為「走資派」下放到「五七幹校」。1978 年任國家科委辦公廳副主任、兼研究室副主任。自 1980 年 5 月起，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秘書；1984 年兼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1986 年 10 月兼任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主要負責人，後又兼任主中共十三大報告起草組主要負責人。1987 年中共十三大當選為中央委員，並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中央宣傳小組成員、中央黨建小組成員。1989 年「六四」事件中，鮑彤反對鄧小平、李鵬等用軍隊鎮壓學生，被誣為「壞人」非法關入秦城監獄。1992 年被判處有期徒刑 7 年。1996 年出獄後長期從事獨立寫作至今。

【14】 載理論工作務虛會第二組簡報，第 36 期，總第 152 期。

【15】 李洪林（1925-）：遼寧人。時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黨史研究室主任。後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副局長、局長。

成了堅強團結的領導集體，有一批優秀的領袖，那麼個別領袖的去留，根本影響不了局面的穩定。

相反，如果實行那種實際上是個人說了算的「接班人」制度，即領袖認為誰好就選誰當「接班人」，實踐已經證明是完全失敗的。請大家想想王洪文這個大流氓是怎樣當上「接班人」，這個問題也就清楚了。【16】

嚴家其【17】當時的身份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的助理研究員。他在2月初的一次討論的發言中說：

「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使我們認識到，單純在紙面上總結經驗是不夠的，必須用一整套制度來防止林彪、「四人幫」一類的再生，必須剷除林彪、「四人幫」一類產生的土壤。

我想從理論上來探討和論證一下，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作為執政黨（在我國是共產黨）的主席和政府首腦不得終身任職、應當有一定任期的問題。

在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共產黨是執政黨。如果只是政府首腦有一定的任期，而黨的主席在事實上仍是終身任職的話，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共和政體就不可能牢固地建立起來。在這方面，有很多歷史教訓。經常出現的情況是，從強調「集體領導」開始，以破壞「集體領導」、大搞個人專權告終。如果黨的主席事實上仍是終身制，總有一天，還會產生新的林彪、新的「四人幫」，他們還會煽起新的「造神運動」，還會再一次剝奪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還會再一次把國民經濟拖到崩潰的邊緣。到時候，就很難阻止以新形式出現「現代迷信」的瘟疫的流行了。為了同新的「四人幫」作鬥爭，人民將會再一次付出「五四運動」中血和淚的代價。

為了嚴格地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共和政體，首要的問題是，必須在我們的黨章和憲法中，分別對黨的主席、政府首腦任期作明確的規定（如4年或7年，4年連選可連任一次）。我非常願意看到這樣一天在我們社會主義中國到來，一位對社會主義事業有著卓著功勳的黨的主席在他4年任職期滿的一天，通過電視和廣

【16】 李洪林:《領袖與人民》,《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總字第90期,1979年1月26日。

【17】 嚴家其：中國著名政治學學者。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所長。1986年10月參加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工作，為四位負責人之一。1989年六四後被迫流亡美國。

播，向幾千萬中國共產黨黨員和幾萬萬中國人民發表他的「告別演說」。【18】

李洪林、嚴家其所講的這些問題，在現在看來是理所當然，但是在當時條件下講出來卻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風險。但是他們講了，而且講得很好。從現在查到的資料看，這是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由中央召開的會議上，第一次有人明確地涉及到了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改革的問題。

與此相關的，是鄧小平在理論工作務虛會期間，也明確地講到了要研究民主的發展史，要「把官吏從社會主人變成社會公僕」的問題。1979 年 1 月 27 日，胡耀邦向與會者傳達了鄧小平聽取理論工作務虛會討論情況彙報時的講話。鄧小平說：「十月革命後六十多年，民主沒有搞好。今年上半年要寫出一篇二、三萬字的大文章，五四發表，從世界歷史發展與人類社會的趨勢，講清楚民主的發生和發展。」鄧小平認為，「資產階級以民主起家，反對封建專制，他搞民主超過歷史上存在過的一切剝削階級。無產階級民主應當是民主發展的更高級階段，要超過資產階級民主。資產階級的好的東西要大大發揚。」他說，「要講講巴黎公社原則，一條選舉，一條工資制度。我不贊成只講這兩條。最主要的是把官吏從社會主人變成社會公僕。這兩條是派生的。如何把主人變成公僕？可能兩條，可能三條或更多。」鄧小平強調，「我們要人民當家作主。怎樣使人民感覺到自己是主人。資產階級有一套使自己成為主人的東西，選擇，立法，可以支配政府。我們需要想辦法使人民感覺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今天我講不清楚，組織二、三十人專門寫這篇文章。」【19】

上述這段談話，是現在能夠看到的鄧小平在粉碎「四人幫」以後最早談到要從制度上研究民主問題的一段談話。筆者查閱了 1979 年 5 月 4 日前後的《人民日報》，雖然並沒有發現鄧小平所說的那篇講民主的「大文章」，但鄧小平的這段話起碼可以表明，在理論工作務虛會那個時期，鄧小平對於資本主義民主的起源、發展和歷史地位，對於巴黎公社的選舉和「把主人變成公僕」的制度，對於俄國「十月革命後

【18】 嚴家其：〈必須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共和政體〉，《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總第 137 期，1979 年 2 月 5 日。

【19】 參見盛平主編：《胡耀邦思想年譜》上卷，香港泰德時代出版有限公司 2007 年 4 月第一版，第 306 頁。

六十多年，民主沒有搞好」的教訓，對於「我們需要想辦法使人民感覺到是自己國家的主人」等等這些問題，都是曾經有過明確認識的，這也是筆者迄今為止看到的鄧小平對於民主問題最清晰、最明確的一次講話。鄧小平之所以談這段話，可能與當時理論務虛會討論情況彙報的內容有關，也可能出於鄧小平對文革反思的結果。遺憾的是，鄧小平這次談話，並沒有收入《鄧小平文選》，也沒有在官方媒體上正式公開過。至於為什麼沒有公開，也許是他忘記了，也許是後來他的思想發生了變化。對此，筆者沒有查到資料，不便妄議。

1979 年初中共中央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是一次思想解放的「盛會」。會議的主要任務是在「兩個凡是」這個問題上分清是非。會議的第一階段，在胡耀邦等人的推動下，參會者解放思想，以實踐為標準，從多方面廣泛地討論了建國以來黨的思想理論路線方針，爭論也非常激烈。限於當時的條件，許多參會者思想中還有這樣那樣的局限，人們的認識還遠不及此後幾年那樣深刻，但是在批判性認識文革、指出毛澤東晚年錯誤和批判長期存在的「左」傾危害方面，在批判個人迷信、總結封建主義對黨的影響方面，在批評黨內、國內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方面，都打開了缺口，開了一個好頭。特別是一些參會者開始注意從黨和國家體制上研究和探討文革的成因，探討黨內民主生活遭到破壞的思想和理論根源，打響了對建國以來政治體制進行再認識的第一炮，這對於啟迪人們思想，促進理論界對於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缺陷和弊端進行研究，以至於引發人們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研究，確實具有重要意義。

二、西單民主牆和鄧小平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早在文革後期，社會上的許多人，特別是一些青年、知識分子當中，對於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對於「四人幫」的倒行逆施，已經開始有各種不滿在發酵。這種情緒直接釀成了 1976 年「四・五運動」的發生。1976 年 10 月的粉碎「四人幫」，對於中國人說來，確實是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它促使人們，特別是那些「四五運動」曾經的參加者們開始深入思考中國的過去和未來，開始尋找表達的機會。西單民主牆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當時，北京的西單地區還沒有像今天那樣高樓林立。就在西單路口的東北角有一段兩百多米的灰色磚牆，牆內是公交車站。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牆上出現了各種大小字報，開始被稱為「西單民主牆」。最初，它的主要內容大都是要求給 1976 年天安門事件平反，要求鄧小平出來主持工作及上訪群眾訴寫的冤案控訴。隨著批判「四人幫」的深入和黨內對於「兩個凡是」爭論的發生，它的內容開始轉向徹底平反一切冤假錯案，反對「兩個凡是」，批評當時的北京市委和中央主管意識形態的領導人和政策，主張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要求保障人權，實行民主與法治。參與西單民主牆活動的活躍人物，大都是 1976 年「四・五運動」的參與者，其中就有後來在 80 年代政治體制改革大潮中比較著名的在野派領軍人物陳子明、王軍濤等。

西單民主牆的言論，在一開始曾受到一些中央領導人的肯定和支持。1978 年 11 月 26 日，鄧小平在同日本客人的談話中講了 19 條，其中有一條講到，「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力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讓他們出氣，群眾的議論並非一切都是深思熟慮過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確，這並不可怕。」【20】這話等於間接承認了西單民主牆的合法性。葉劍英則說得更明確，12 月 13 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講話中說：「這次中央工作會議體現了我們黨內的民主，西單民主牆體現了社會上的民主，這些民主精神都要發揚。」【21】葉劍英的這段話，表明了西單民主牆與當時黨內爭論的相互呼應關係，說明這個時候中共官方對西單民主牆的態度是肯定的、積極的。

在今天我們研究西單民主牆和「北京之春」的相關資料的時候，也不難發現，1978 年底，1979 年初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許多發言與西單民主牆上的文字議論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由此可見，黨內黨外、會上會外是相通的，相互響應和促進的。特別是對中共執政體制、國家體制中一些弊端、成因等方面的許多觀點和分析，追根溯源，應該說西單民主牆功不可沒。

隨著形勢的發展，西單民主牆的內容和形式發生了變化，官方對其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民主牆的積極分子們開始不滿足於只貼貼

【20】 見《參考消息》，1978 年 11 月 27 日第 1 版。

【21】 葉向真：《葉劍英中央工作會議講話起草記》，載網刊《耀邦研究》第 15 期。

大字報，發表幾句民主、人權的講演了，他們開始成立組織，發行刊物，並且運動開始擴大到上海、天津、武漢、廣州、西安等城市。1978 年底，北京第一家民辦刊物《四五論壇》出版；次年初，任畹町等人在北京發起成立「中國人權同盟」，出版了《中國人權》雜誌；此後，魏京生主編的《探索》、周為民、王軍濤主編的《北京之春》等雜誌也陸續登場。

與此同時，上海也發生了讓當局不安的情況。在人民廣場上，大小字報貼滿了民眾開闢的「民主牆」，各種演說、辯論，乃至遊行經常持續到深夜，甚至通宵達旦。據事後有人回憶，上海的這種情況，持續了大約 100 天，前後有百萬人次參加。這其中，返城知青的抗議運動尤為引人注目。1978 年 12 月 10 日，數千知青上街遊行，高喊「要工作、要吃飯、要戶口」的口號到上海市委門口集會。上海當局第一次派出警察驅趕人群，並隨即開始對人民廣場上的異議運動進行干預，有人開始被捕。2 月 5 日，上海發生數萬知青遊行和「臥軌」事件，造成鐵路中斷 12 小時。這一事件的餘波，迅速向周邊和國內其他城市城市蔓延。【22】

按照親歷者陳子明的歸納，「民主牆和民刊所表達的意見，大體上可分五類：一是對民主理論的探討；二是對中共歷史功過的批評；三是對現行政策的批評；四是對政治人物的臧否；五是對個人和群體利益的要求。」【23】在這五類言論當中，第一類就是對民主理論的探討。其中涉及了西方民主政治中的絕大多數觀點，公民權利、民主憲政、司法獨立、言論自由，甚至多黨政治。應該說，民主牆以及民辦刊物上的這類探討，讓中國人在經受長期的封閉的毛式理論洗腦教育之後，為人們打開了一扇心靈上的窗子，使人們開始瞭解西方的民主政治，開始審視中國的政治體制，審視中國的政黨和國家體制，認識其中的弊端，從而萌生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走向民主政治的要求，具有重要啟迪意義，也在一定意義上，為若干年後執政黨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奠定了群眾基礎。

【22】 以上情況，參見《陳子明文集 4：民主運動在中國》第 262-317 頁，世界華文傳媒出版機構 2010 年 4 月版。

【23】 陳子明：《陳子明文集 4：民主運動在中國》第 268 頁，世界華文傳媒出版機構 2010 年 4 月版。

對當時的形勢，在高層有不同的判斷。1月3日，在由胡耀邦主持的中宣部例會上，胡喬木說：當前黨內外存在著「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觀點」的三股歪風，形勢比1957年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時還嚴重。胡耀邦不同意這個看法，他說：現在的形勢很好，不要對某些地方、環節發生誤解、錯覺、偏差。他還傳達了華國鋒的話：「無論如何不要反右派」。會後，胡耀邦又找胡喬木談了話，指出他的看法不正確，說有三股風是不合適的。【24】

但是，1979年3月，鄧小平、李先念、彭真【25】等領導人先後表態，認為不能允許這種混亂局面再繼續下去了。北京、上海警方開始行動，一些民主牆的活躍人物和民辦刊物的負責人相繼被捕。

社會上的民主牆運動開始進入低潮。體制內的「民主牆」——理論工作務虛會也開始出現轉折。有會議參加者後來回憶說，社會上和黨內有人直接說「農村出現包產到戶，以及民主牆的問題，都同三中全會宣傳民主、大講解放思想有關，同平反天安門事件有關」，北京街頭甚至出現了《必須批判胡耀邦的修正主義》的小字報，說「務虛會是胡鬧會」、「亂子是務虛會這幫秀才們鬧出來的」。在這種情況下，「某些對務虛會懷抱不滿的人，堅持『兩個凡是』的人，卻利用『民主牆』的問題做務虛會的文章，說兩者『互相串通』、『內外呼應』。還應指出，當時重新上台掌管意識形態領導權的人也在過分渲染當時的輿論局勢和鼓動反右，矛頭是對著務虛會的。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們的用心並沒有完全白費，在當時社會發生一些騷動的情況下，他們把矛頭引向務虛會的言論至少對某些領導人產生了一定的影響。」【26】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的第二階段上，做了他那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著名講話。在這個講話中，他一方面說，「思想理論問題的研究和討論，一定要堅決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一定要堅決執行不抓辮子、不戴帽子、

【24】 參見盛平主編：《胡耀邦思想年譜》上卷，香港泰德時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4月第一版，第282-283頁。

【25】 彭真（1902-1997）：山西曲沃人。中共元老。長期擔任政治局委員，書記處常務書記。文革前任北京市委書記，文革中被打成「反黨集團」。1979年復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83-1988年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26】 吳江：〈1979年理論工作務虛會追憶〉，載《炎黃春秋》2001年第11期。

不打棍子的『三不主義』的方針，一定要堅決執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方針。這些都是三中全會決定了的，現在重申一遍，不允許有絲毫動搖。」，但另一方面，他又給解放思想劃了一個框框，這就是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他說：「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央認為，今天必須反覆強調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因為某些人（哪怕只是極少數人）企圖動搖這些基本原則。這是決不許可的。」【27】

鄧小平在講話中，例舉了這一個時期來國內出現的所謂「少數人的鬧事現象」，並且說，「這些事件誠然是極少數，並且受到了絕大多數人的抵制，但是值得嚴重注意。第一，這些人一般都打著所謂民主的幌子，很容易淆惑視聽。第二，這些人利用林彪、『四人幫』時期遺留下來的一些社會問題，很容易蒙蔽一部分目前有困難而政府一時還不能完全予以解決的群眾。第三，這些人開始結成各種秘密的或者半公開的組織，一面在全國範圍內互相串聯，一面同台灣以及國外的政治力量相勾結。第四，這些人中還有一部分人同社會上的一些流氓組織以及『四人幫』的一些黨羽相勾結，以擴大他們的破壞活動的範圍。第五，這些人力圖利用我們某些同志的這樣或那樣的不慎重的言論，作為他們的借口或護身符。以上的情況說明，同這些人的鬥爭不是很簡單的、短時間就可以解決的問題。我們必須努力做好工作，把受他們蒙蔽的群眾（其中許多是天真的青年）同這些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分離開來，要按照法律，對這些反革命分子、壞分子進行嚴肅的處理。同時，我們也必須教育全黨同志務必注意提高警惕，照顧大局，在中央的領導下團結一致，既要繼續解放思想，堅決發揚民主，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又要努力克服一小部分群眾特別是一小部分青年中間的思想混亂。」【28】至此，理論務虛會從胡耀邦強調解放思想、發揚民主開始，以鄧小平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收場。

鄧小平的這個講話，是由中共黨內的「大筆桿子」胡喬木主持起草的，在「鄧小平思想」發展史上具有座標性意義，是他的「兩手論」思想格局的起點。在這裏，他一方面強調要「繼續解放思想，堅

【27】《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73頁。

【28】《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74-175頁。

決發揚民主，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另一方面，他又給「解放思想」定了調子，這就是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作為一個從文革所受的迫害中走過來的老共產黨人，在重新掌權以後，他可以同意你重新評價毛澤東，同意你否定文革，甚至同意你探討體制中的弊端，探討改革問題，但是他絕對不允許你否定社會主義，否定毛澤東思想，特別是否定共產黨的領導，那是因為，黨的領導是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黨的執政地位的全部根基所在。由此，後來到十三大被明確概括為「兩個基本點」的鄧小平思想格局的基本雛形，開始顯現。

1980 年 2 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向全國人大建議，取消憲法中公民「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的規定，所謂的非法刊物、非法組織等開始遭到遏制。1981 年 2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下發《關於處理非法刊物非法組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即 9 號文件)。此後，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各地創辦民刊的活躍分子有上千人被拘審、逮捕、判刑。大多數高校競選運動的參與者，則上了「新三種人」的內控名單。體制內的理論工作者，很多人被撤職、審查和清算。【29】至此，持續了近兩年時間的西單民主牆被徹底取締，民間的「北京之春」民主運動進入低潮。

三、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的台前幕後

1980 年 8 月，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了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這個講話，後來被中共尊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獻」，也被黨內外的主流研究者們奉為研究中國政治體制的經典。那麼，這個講話是在什麼背景下產生的？鄧小平此時作這個講話目的何在？為什麼鄧小平講了話以後，政治體制改革卻多年沒有下文？這些問題，需要仔細考證當時的歷史背景才能作出正確的回答。

【29】 參見陳子明：〈改革開放」三十年：從亢奮到疲頓〉，載《領導者》(雙月刊) 2008 年 4、6 月號，總第 21、22 期。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中國高層的政治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共黨內鄧小平、陳雲【30】、李先念【31】等元老派陸續復出，他們要返回權力核心，就必須清除已經掌握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以毛澤東生前確定的接班人華國鋒為首，包括汪東興【32】、吳德【33】在內的黨內勢力。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發展和黨內平反工作的展開，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元老派逐漸越來越多地掌握了中央的話語權，華國鋒的權力範圍不得不逐步退縮。另外，還有一件吸引世人眼球的事情，就是原任四川省委書記的趙紫陽、安徽省委書記的萬里【34】雙雙調入北京，1980 年 4 月，他們同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

幾年來，趙紫陽和萬里解放思想，在他們原任的四川和安徽兩省，不約而同地進行了打破原有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大鍋飯體制，順應廣大農民的要求，實行農村「包產到戶」的試驗，並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贏得了「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的美譽。由於他們為中國的農村改革摸到了第一塊「石頭」，在高層對「包產到戶」是姓「社」還是姓「資」經過一番激烈爭論之後，趙、萬二人得到了鄧小平和當時的中央多數領導人的肯定，被調入北京，擔任更高層的領導職務，甚至被委以主持下一步即將進行的經濟改革的重任，也就順理成章了。特別是趙紫陽，他自此進入中國最高決策層之後，先後在國務

【30】 陳雲（1905-1995）：江蘇青浦人。陳雲是當時地位和影響僅次於鄧小平的黨內元老。1978-1987 是中共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1987 年後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他主張實事求是，但不主張改革現行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過程當中，陳雲在經濟上接受「市場調節」但堅持計劃經濟，提出所謂「鳥籠經濟」理論，成為這一時期黨內反對經濟自由化市場化的代表人物。陳雲的經濟思想同他認為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信仰是吻合的。

【31】 李先念（1909-1992）：湖北黃安人。1954-1980 年任國務院副總理；文革前是陳雲的助手之一，文革中陳雲靠邊站，就由他繼續負責財政、貿易和經濟方面的工作。1977-1987 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 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88 年後任全國政協主席；是當時黨內有影響的元老之一。他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反對進行改革。1989 年「六四」事件中，他力主武力鎮壓學生和市民。

【32】 汪東興（1915-）：江西弋陽人。曾長期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被稱為毛澤東的「大內總管」。文革後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後擔任十二大選出的中顧委委員。

【33】 吳德（1913-1995）：河北豐潤人。文革中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市革委會主任，是製造 1976 年四五天安門事件的執行者。1980 年辭去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

【34】 萬里（1916-），山東東平人。1977 年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推行包產到戶政策取得極大成功。是改革開放的重要支持者和領導者。1980-1988 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農委主任。1988 年任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1993 年退休。

院總理和中央總書記的崗位上工作了九年的時間，主持了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對改革開放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工程師」。

正當中共全黨逐步統一思想，貫徹落實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各項決議的時候，正當以「包產到戶」為基本形式的農村改革開始逐步走向全國，並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的時候，1980 年 8 月 18 日至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了擴大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據會議公報說，是「討論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問題」。會議伊始，鄧小平就發表了長篇講話，題目就叫做《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

中共中央為什麼在這個時候開這樣一個會議？鄧小平為什麼在這個時候發表這樣一個講話？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內高層格局的變化，可以看到這樣幾點：第一，在思想理論上，經過真理標準大討論，和中央工作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理論工作務虛會等一系列會議，「兩個凡是」在黨內越來越沒有了市場，鄧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取代了「兩個凡是」，成為黨的指導思想的主流；第二，在組織格局上，經過「解放思想」和破除個人迷信的大討論，華國鋒作為「英明領袖」的光輝形象已經越來越黯淡，以他為首的「毛派」力量也在逐步退卻，失去一個又一個重要崗位。而鄧小平和在黨內已經重新站穩腳跟的元老們開始了自己的人事佈局，這其中，趙紫陽、萬里調京任國務院副總理，就是最明顯的標誌；第三，當年由於毛澤東的支持，華國鋒一人擔任了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三個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職務。隨著鄧小平和重返政壇的元老們在中央的政治砝碼越來越重，這種情況就顯然不能再繼續被他們所容忍了；第四，就在華國鋒等「毛派」力量逐漸失去其在中央的主導地位之後，原來的經濟政策面臨著調整。相應的，主持中央日常經濟工作的人事，主要是國務院方面的人事，也必然會面臨重大調整。

現在回過頭看，華國鋒不再擔任國務院總理職務，是鄧小平和中共黨內元老集團在組織上「解決華國鋒問題」整體佈局的第一步，也是關鍵的一步。為了在這個問題上得到全黨，特別是黨的高層的理解和支持，同時也為了給華國鋒等人施加一定的壓力，這個「中央政治

局擴大會議」和鄧小平這篇《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才會「應運而生」。

這篇講話的主要起草者，時任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的鄧力群[35]，在其回憶錄《十二個春秋》中對該篇講話的背景有過一大段回憶，他明確地說：「小平同志的這篇講話，其實質是針對華國鋒的，為華的下台做準備，尋找理論根據。我們當時沒領會到這點。從文字上看不出，他也沒和我們講。」「這篇講話當時是由華國鋒領導的政治局通過的。華國鋒看沒看出講話的實質，不得而知。其他人對此只是當做一種專論來對待，反應也不敏銳、不強烈，這裏的內容與現實有什麼關係？究竟要解決什麼大問題？好像沒有人發表這方面的意見。過了若干年，著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趙紫陽抓這件事，胡耀邦也抓這件事，才對這篇講話予以重視，成為他們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理論根據。」[36]

趙紫陽在他的回憶錄《改革歷程》中也曾經談到：「鄧的這篇講話還有以下的背景。當時正在著手解決華國鋒的問題。鄧小平和陳雲都認為華是貫徹三中全會的障礙，陳雲甚至認為華是造反派起家，不可信任。華的領導地位，鄧和陳都不能接受。當時華身兼黨主席、政府總理、中央軍委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因此鄧講話中所以反對權力過於集中，目的之一就是分散華的權力，首先要華把總理的位子讓出來。另外，當時正在起草總結文革教訓的文件，即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黨深感由於毛的專斷、家長制，把個人凌架於黨之上，以至釀成文化大革命這場大災難。而鄧在文革中又深受其害，對此有切膚之痛。因此當李維漢[37]提出要重視肅清封建思想殘餘的時候，鄧很快就接受了。」[38]

趙紫陽提到的「當李維漢提出要重視肅清封建思想殘餘的時候，鄧很快就接受了」的這次談話，是指1980年5月24日，黨內元老李維漢與鄧小平進行的一次長談。李向鄧小平談了肅清封建思想殘餘在

【35】 鄧力群（1915-）：湖南桂東人。文革前是《紅旗》雜誌副總編，1982年任中宣部部長及中央書記處書記；1987年中共十三大在中委選舉中落選，改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36】 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大風出版社2006的3月版，第183頁。

【37】 李維漢（1896-1984）：湖南長沙人。中共元老。1948-1964年長期擔任中央統戰部長；政務院秘書長。時任十二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

【38】 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72頁。

黨內的影響問題，鄧表示同意，並且說，他將在中央會議上認真談談這個問題。5月31日，鄧小平在同胡喬木【39】、鄧力群談話時，曾經提到了他同李維漢的這次談話，鄧小平說：前些日子，李維漢同志來找我，從「興無滅資」談起，談了兩個多小時。……我們的人民、我們的黨受封建主義的害很重，但是一直沒有把肅清封建主義的影響作為一個重要任務來對待。現在，黨內為什麼有人搞特權？這和封建主義影響分不開。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領袖終身制的問題，我們這代人活著的時候，非解決不可。黨內生活、社會生活都要肅清封建主義的影響。各種制度，都要從肅清封建主義影響的角度去考慮，逐步加以改革。【40】幾個月以後，鄧小平在他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篇講話中再次談到了他對封建主義殘餘在黨內影響的看法，不能不說與鄧同李維漢的這次談話有關。因此，我們也可以把鄧、李的這次談話看做是鄧小平作《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篇講話的另外一個背景。

關於這篇講話的起草過程，鄧力群回憶說，這個講話的「要點和問題都是小平同志自己提出的。起草工作由我主持。書記處研究室滕文生、鄭惠、衛建林參加。小平同志要我到他那裏，跟我講了這篇講話的一些要點，然後回來起草。反來覆去修改，確實用了心思。」「這篇講話稿搞到一定程度後，由喬木進行修改。喬木在修改前，找了很多部門談話。他的修改，不是從文字到文字，而是從內容上做了很好的補充、解釋。」【41】

鄧小平在這個講話中，開宗明義：「國務院領導成員的變動，將是五屆人大三次會議的主要議題之一。這次變動，包括華國鋒同志不兼任總理，由趙紫陽同志接替；李先念、陳雲、徐向前【42】、王震【43】同志

【39】 胡喬木（1912-1992）：江蘇省鹽城人。1941-1966年長期任毛澤東的秘書。1980年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1987-1992年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

【40】 鄧這次講話的其他內容分為兩篇收入了《鄧小平文選》第二卷，惟獨把上述談話內容被刪除。參見陳子明:〈「改革開放」三十年：從亢奮到疲頓〉，載《領導者》（雙月刊）2008年4、6月號，總第21、22期。

【41】 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大風出版社2006的3月版，第183頁。

【42】 徐向前（1901-1990）：中共元老，元帥。曾任中央軍委副主席；1978-1981年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

【43】 王震（1908-1993）：湖南省瀏陽人。1982年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1985年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1988-1993任國家副主席；是鄧小平主政時期的中共

和我不兼任副總理，由精力較強的同志擔任；王任重[44]同志因任黨內重要職務，也不再兼任副總理。陳永貴[45]同志請求解除他的副總理職務，中央決定同意。」他強調，中央作這樣考慮的原因是：(1) 權力不宜過分集中。(2) 兼職副職不宜過多。(3) 著手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4) 從長遠著想，解決好交接的問題。仔細琢磨鄧小平所講的這四條，可以明顯地感覺到其中隱含的針對華國鋒的意味。

緊接著，鄧小平把這幾個方面的問題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從總結歷史經驗的角度，對黨內存在的這些弊端作了剖析。他說，「黨和國家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中，還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礙甚至嚴重妨礙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如不認真改革，就很難適應現代化建設的迫切需要，我們就要嚴重地脫離廣大群眾。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幹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他認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麼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面，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視。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在講話

黨內有影響力的元老之一。1989 年「六四」事件中，王震主張武力鎮壓學生和市民。

【44】 王任重（1917-1992）：河北景縣人。1978 年後，歷任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農委主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財經委員會主任委員，第七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45】 陳永貴（1915-1986）：山西昔陽人，原為晉陽縣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在文革中大寨大隊被樹立為全國農業樣板，後於 1975 年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1983 年辭職。

的最後，他強調說：「現在提出改革並完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任務，以適應現代化建設的需要，時機和條件都已成熟。這個任務，我們這一代人也許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們有責任為它的完成奠定鞏固的基礎，確立正確的方向。我相信，這一點是一定可以做到的。」【46】

既然已經把五屆人大三次會議的這次人事調整，上升到了組織和人事制度問題的調整，上升到了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的高度，而且「時機和條件都已經成熟」，並且宣佈以後還要繼續改，深入改，那麼這就不僅僅是解決華國鋒個人兼職過多的問題了，華就算心有不滿，也只能違心地接受。

當然，鄧小平的這篇講話所講的五條弊端，即：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確實是抓住了中國共產黨執政體制中的要害問題。「醫生」給「病人」看了病，總還要給出藥方。鄧小平也針對這些弊端，給出了解決的藥方。他說，現在正在考慮逐步實施的還有如下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重大改革：(1) 中央將向五屆人大三次會議提出修改憲法的建議。(2) 中央已經設立了紀律檢查委員會，正在考慮再設一個顧問委員會，連同中央委員會，都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並明確規定各自的任務和權限。(3) 真正建立從國務院到地方各級政府從上到下的強有力的工作系統。(4) 有準備有步驟地改變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經理負責制，經過試點，逐步推廣，分別實行工廠管理委員會、公司董事會、經濟聯合體的聯合領導和監督下的廠長負責制、經理負責制。(5) 各企業事業單位普遍成立職工代表大會或職工代表會議。(6) 各級黨委要真正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47】

這就是鄧小平給出的「藥方」。這些措施屬不屬於「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似乎相距甚遠。但應該承認，這些措施與原體制比較，是改革，也是進步。特別是設立中紀委、中顧委，逐步解決領導職務終身制問題，在企業中改變黨委決策，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問題，建立企業職工代表大會問題，在那個年代能提出來，就已經是中共作為執政黨的一個進步，而且確立廠長經理負責制問題幾年後也成為趙紫陽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但是，這些「藥」顯然只能解決

【46】《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 327、333、342-343 頁。

【47】《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 327、339-341 頁。

皮毛問題，不可能從根本上治好鄧小平指出的那些弊病。對此，趙紫陽後來評價說，「對於小平講話的這些內容，很容易使人感到鄧是要按照政治現代化、民主化的方向，從根本上改變政治制度了。但實際上不是這麼一回事。鄧在批評了種種弊端之後所提出的改革措施中，並沒有超出具體的組織制度、工作制度、工作作風、工作方法的範圍，沒有觸及根本制度，仍然是一種行政改革的性質。」【48】這個評價是客觀的、符合事實的。

鄧小平的這篇講話，在其發表後至今的三十幾年中，人們從各個角度進行了研究和解讀，並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為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獻。但是很少有人指出，鄧小平當時作這一番講話，其目的，到少是主要目的，不是在於向全黨作政治體制改革的動員，而是在於解決當時中央的組織人事格局問題，在一定意義上說，是針對華國鋒，給華國鋒施加壓力的。

當然，如果我們在 30 多年後的今天，脫離講話時的歷史背景來看這篇講話，確實是中共建國以來，最高領導層對黨和國家體制上存在的弊端認識得最深刻的一次。雖然在現在看來，鄧小平指出的現行體制這五個方面的弊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等等，這些問題在一定層面上說也仍然是問題的表象。但是只要是公正、客觀地評價鄧小平這些論述，就應該承認，在經歷了文革的慘痛，經歷了黨和國家高層政治生活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之後，他痛定思痛，在總結文革的歷史經驗和分析封建主義遺毒對黨的影響的基礎上，看到並指出這些體制上的問題，已是實屬不易。雖然他給出的藥方還只能治標，不能治本，但 8・18 講話，已經達到了鄧小平政治思想的最高點。由於眼界和歷史的局限，也由於鄧小平的經歷、身份和政治角色的局限，決定了他沒有也不可能認識和指出，這些問題的根源，在於共產黨的一黨獨裁，在於中共執政的整個政治設計上就缺乏對執政黨和政府的制約和監督。當然，這一點也不能苛求於他。

【48】 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272 頁。

四、「8・18」講話的餘韻

鄧小平這篇《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即8・18講話經過媒體公開以後，在黨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也受到了知識界的普遍歡迎，理論界的許多知識分子十分雀躍。在此後的幾個月裏，各家報刊發表了大量談政治改革的文章，其中就有活躍於幾年後政治體制改革中的著名人物鮑彤、嚴家其、張顯揚、高放、吳大英、吳明瑜【49】等人的文章。其中的代表作，是1980年10月25日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廖蓋隆【50】在全國黨校系統中共黨史學術討論會上做的一個報告，這個報告傳到海外後，被稱為「中共『庚申改革』方案」。這個方案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縮為1,000人，分設兩院。區域院300人，由各地區選派代表組成，社會院700人，由社會各階層的代表組成。兩院共同立法，互相制約。人大要一年兩次召開會議。50～70人的常委會，應是精幹的，整年工作的。

二、實行黨政分開。一切政府職責範圍內的工作都由各級政府獨立議決和處理。改變工會、青年團、婦聯、科協、文聯等群眾團體由黨包辦代替的狀態，群眾團體要代表群眾利益，工會領導要由工人選出，建立獨立的代表農民利益的農會。

三、司法獨立。法院作出判決無須送黨委審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四、新聞獨立。除軍事機密外人民有權知道一切事情。允許和鼓勵新聞工作者獨立負責地報道新聞、刊登群眾來信和發表評論。

五、企業、事業管理體制改革。實行工廠管理委員會、公司董事會、經濟聯合體的經濟委員會領導和監督下的廠長負責制、經理負責制。黨委只管政治領導，而不擔任管理和日常行政工作。企事業單位要普遍建立獨立的職工代表大會制，並有權向上級建議不稱職的領導人及選舉基層領導人。

【49】張顯揚，著名政治學者，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研究員，1987年反自由化運動中被開除黨籍；高放，著名政治學家、國際共運史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吳大英，著名法學家，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後任法學所副所長、政治學所所長；吳明瑜，時任中國科學院研究室主任。後歷任國家科委副主任、國務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50】廖蓋隆（1918-2001）：廣東信宜人，中共老資格黨史專家。時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 六、黨的領導機構實行分權制衡制。全國黨代表大會實行常任制。黨中央設三個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原中央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三委員會互相監督和制約。在中執委下面設常委會處理日常工作，取消政治局。【51】

這個方案，在當時在黨內已經算是很大膽很前衛了，在一些方面，它主張的改革步伐之大，已經超出了幾年後趙紫陽主持制訂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水平，更遠遠超出了當時的中共領導人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水平。因此，在提出後，除了在海外引發一些反響之外，中央高層沒有作出任何反應，在中國國內甚至知者甚少。

可是，風畢竟刮起來了。按理說，鄧小平和中央已經明確，「現在提出改革並完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任務，以適應現代化建設的需要，時機和條件都已成熟」，那麼這次講話之後，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總該有所動作，但是很遺憾的是，除了進行了若干次人事調整，在後來 1982 年的十二大上設立了中顧委，為解決領導職務終身制問題做了一系列工作之外，其他方面的改革就再也沒有了下文。

為什麼會如此？我認為，一是當時華國鋒還在台上，鄧小平剛剛復出時間不長，還沒有成為事實上的一把手。他提出的特別要解決黨內的權力過分集中和個人崇拜問題，實際上第一位的目標，是要在組織上解決華國鋒的問題。第二，當時鄧小平雖然提出的對黨和國家領導制度要進行改革，但是怎麼改，他並沒有更深刻的研究和成型的想法，更進一步說，是還沒有足夠的思想和理論準備。第三，黨內剛剛復出的老同志在思想認識上也並沒有完全統一，沒有達成完全的共識。第四，當時中國的經濟改革還沒有開始，原有的計劃體制還在照樣運轉，陳雲等一些老人還在力圖把中國經濟拉回到 1950 年代的軌道上去，經濟體制的現實還沒有對政治體制改革提出客觀要求。在這種情況下，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也就是我們後來說的政治體制改革，還不可能很快提上黨的議事日程。

五、波蘭「團結工會」事件的影響

就在鄧小平的這篇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發表後不久，國際上發生了「波蘭團結工會事件」。這一事件，對於中國黨

【51】 廖蓋隆：〈中共「庚申改革」方案〉，載香港《七十年代》，1981 年第 3 期。

內由於鄧小平講話而引起的政治體制改革之議也產生了重要而微妙的影響。

1980年7月，波蘭發生了戰後規模最大、持續最久的罷工浪潮。蓋萊克總統被迫下台。9月22日，來自波蘭全國各地36個獨立自治工會的代表在格但斯克舉行第二次會晤，決定擺脫官辦工會，成立全國性的獨立自治工會，即團結工會。瓦文薩【52】當選為該工會全國委員會主席。團結工會實際為政治組織，其成員基本為產業工人，但領導層成分複雜。成立後反政府勢力逐漸佔了上風，以罷工和遊行示威為手段向政府施加壓力，向執政的波蘭統一工人黨(即共產黨)提出了挑戰，波蘭黨的領導地位開始動搖。這種狀況，直接影響了波蘭後來的發展道路，並對東歐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進程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波蘭團結工會事件」給中共黨內的保守派阻止政治體制改革找到了借口。波蘭團結工會成立後的第三天，1980年9月24日，號稱中共黨內理論權威的胡喬木就給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53】的胡耀邦寫了一封信，信中在建議中央要研究類似波蘭這樣的「一個共產黨執政國家的社會內部矛盾可能達到的激烈程度和爆發形式；社會主義制度所未能解決的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隔閡或對立，包括經濟糾葛和政治糾葛；工會之可以分為官方工會與獨立工會；宗教之可以成為嚴重政治問題」之外，強調，從波蘭事件中可以看到，「少數持不同政見者與心懷不滿的工人群眾相結合可能成為怎樣一股巨大力量，這一點對我們應是一個重大教訓」;「外來思想、經濟、政治、文化影響」對我們也是一大問題；對獨立工會問題，「我們如不從速解決也並非不能造成這種局勢，而且其他群眾組織也可出現類似情況」【54】。對此信，據吳江【55】說，胡耀邦「未予理睬」【56】，而宋木文【57】則說，胡

【52】 萊赫·瓦文薩（1943-）：波蘭政治活動家，團結工會領導人。1990-1995任波蘭總統。

【53】 當時中共中央主席為華國鋒，中央設總書記一職，由胡耀邦擔任，其職權類似中央秘書長。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修改了黨章，取消了中央主席一職，中央總書記才成為黨的第一領導人。

【54】《胡喬木書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

【55】 吳江：曾任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室主任、理論研究室主任。

【56】 吳江：〈留下一份重要的史料〉，載《文匯讀書週報》2010年5月7日。

【57】 宋木文（1929-）：曾任國家出版局局長、國家新聞出版署副署長、署長。

「批准在中央的一個內刊上刊載，讓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部門的領導同志閱研」【58】。

1980 年 10 月 9 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傳達討論了胡喬木《關於波蘭問題的信》，當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長的王任重說：「喬木同志建議討論波蘭事件的經驗教訓，以為波蘭的教訓很值得吸取。」「我們存在與波蘭相類似的問題，發展下去會造成同樣的後果。」「小平同志講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傳。」接著，中宣部又傳達了陳雲的指示：「一個宣傳方面，一個經濟方面，這兩個方面如果不注意，中國也會發生波蘭那樣的事件。」【59】

至於當時中央的主要領導人是如何看待波蘭事件和胡喬木這封信的，目前找不到準確的資料。但正是在這個背景下，鄧小平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被停止了宣傳。1980 年 12 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對於改革，特別是言猶在耳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也變了調子。陳雲在講話中強調，「我們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穩。因為我們的改革，問題複雜，不能要求過急……更重要的還是要從試點著手，隨時總結經驗，也就是要『摸著石頭過河』。」【60】鄧小平在這個會上作了題為《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的講話中，則對他剛剛講過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進行了修正，強調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指出「對於黨內外任何企圖削弱、擺脫、取消、反對黨的領導的傾向，必須進行批評教育以至必要的鬥爭」。對於「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他要求「方法要細密，步驟要穩妥。」「先要在少數單位進行試點。沒有制定和頒布完善的條例以前一切非試點的基層單位，一律實行原來的制度。」那麼什麼時候、如何「制定和頒布完善的條例」？鄧小平在後來的幾年裏，沒有再提起過。

陳子明在他的〈改革開放」三十年：從亢奮到疲頓〉一文中，把鄧小平的 8·18 講話和此後產生的一些影響，看做是 1980 年代鄧小平推動的兩次政治體制改革中的第一次，認為這次改革的結果是發動者

【58】 宋木文：〈胡耀邦處理胡喬木的一封信〉（原題：為吳江同志「重要的史料」做一點補正），載《共識網》2010 年 7 月 28 日。）

【59】 參見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修訂版，第 204 頁。

【60】 《陳雲文選》1956—1985，人民出版社，1986 年北京，第 248—251 頁。

鄧小平在黨內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不得不「黯然收兵」。[61]對這種看法，筆者並不贊成。我認為，鄧小平這個講話及其後來產生的一些餘韻，並不構成中共歷史上的一次政治體制改革，甚至也不能說其「胎死腹中」。因為前面講過，鄧的這個講話的主要目的在於從華國鋒手中奪權。他當時雖然對黨內封建主義的影響和一些制度上的弊端有比較明確的認識，但他並沒有作好發動一場「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思想準備和決心，而且對鄧小平來說，他也並沒有看到客觀上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要求。至於此後不久中共進行的破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的改革，是鄧小平看到了自然規律的客觀要求，不解決後繼有人的問題，共產黨的事業就不可能傳承下去，也並不是鄧小平自覺發動的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部分。

六、破除領導職務終身制與設立中顧委

作為一個社會組織，應該有正常的上下進退、新老交替的人事制度；特別是作為一個國家的執政黨，掌握國家公權力的政治集團，乃至一部國家公器，建立正常的退休制度，保證制度化的新老交替，都是政治制度中的題中應有之義。

遺憾的是，中共從它建立的那一天起，直到改革開放之初，還沒有建立起一套這樣的制度。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還無此先例。在「社會主義」各國，此前保加利亞的季米特洛夫，蘇聯的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越南的胡志明等領導人都是死於任上，中共的毛澤東也是如此；二是從戰火中走出來的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在此前年紀都不算大，還沒有感覺到進行新老交替的迫切性；三是靠武裝鬥爭奪取政權的共產黨人，絕大多數在內心裏有一種打江山坐江山的意識，特別是中共作為一個以農民和小知識分子為主體組成的「無產階級政黨」，又處在中國這樣一個有長期封建主義影響的國度中，「血酬定律」[62]或深或淺，對它的第一代領導人都會有相當程度的影響；第四，從 1949 年建國，到 1980 年代初，中共和他們所掌握的國家政權，一直都處在毛澤東至高無上的權威籠罩之下，黨和國家也一直處於政治動盪之中，黨沒有、也不可能考慮自身的制度

【61】 陳子明：《改革開放」三十年：從亢奮到疲頓》，載《領導者》（雙月刊）2008 年 4、6 月號，總第 21、22 期

【62】 參見吳思：《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上的生存遊戲》，語文出版社 2009 年 4 月版。

建設問題。即使有些思想敏銳的領導人想意識到了這一點，也沒有可能把它付諸實施。

比如，作為黨的副主席，黨內第二號人物的劉少奇，在中共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就提出過廢除終身制的問題。他說：「華盛頓在革命之後，作了 8 年總統，又退為平民。這件事對我們很有影響。華盛頓作過總統，他也是勞苦功高吧，比我們在座的同志怎麼樣？他作了 8 年的總統，又退為平民。這樣的辦法，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參考一下，也可以退為平民？資本主義國家中有些人當過部長，當過總理，結果又去當教員、當教授、當律師、當經理、當校長。……當然我們不一定完全照那樣辦，但恐怕有些東西，資產階級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參考。」劉少奇在這次講話中還說：「毛主席有一次講過，資產階級民主，特別是初期，有那麼一些辦法，比我們現在的辦法更進步一些。我們比那個時候不是更進步了，而是更退步了。」【63】認識雖然是認識到了，而且甚至毛澤東都認為是進步的，但是在那個時代，毛不發話，誰又敢越過毛澤東卻搞什麼「退休制度」？那不是找死嗎？不錯，毛澤東在 1950 年代曾經提出過「退二線」的問題，但你千萬別把它當真。把它當真了的劉少奇最後還不是倒了楣？

好在歷史發展到了 1980 年代。這個時候，「絕對權威」毛澤東不在了，處於權力核心的，是幾位被他迫害過，但又對他創下的事業無比忠心的毛的戰友。他們在痛定思痛之後，開始考慮這個問題了。

文革結束後，伴隨著撥亂反正和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工作的展開，建國以來因歷次運動遭受迫害的幹部紛紛得到平反，擔任了各級領導職務。由於從反右到文革結束持續了 20 年，原來的年輕人早已進入中年，中年也變成了老年。回到了政治舞台上，重新掌握了政治權力的這批老幹部，雖然他們已經陸續進入了老年，但權力對他們說來，仍然有著無比的誘惑力，讓他們退休回家養老，難度很大。

文革之後，執政黨面臨著十分紛雜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局面，不但是百廢待興，百事待舉，而且千頭萬緒，許多新生的事物又不斷地出現，需要大批年富力強的具有「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幹部走上領導崗位。但是現實是，一方面，幹部隊伍嚴重老化，力

【63】 轉引自劉崇文：〈胡耀邦和我談下台前後〉，載《炎黃春秋》2010 年第 3 期。

不從心；另一方面，因無位子，年輕幹部又上不來。這是個必須解決，而又十分棘手的問題。

前面提到，在民主牆運動中，在中央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都已經有人提出了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建立正常的退休制度問題。現實又迫切地提出了這個問題，而且當時黨內高層政治決策的主導者鄧小平、陳雲、李先念、胡耀邦等領導人對這個問題也開始形成共識，那麼，在中國的黨和國家領導體制中，廢除事實存在的領導職務終身也，建立正常的退休制度，也就有了變為現實的可能。

1982 年 1 月 13 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到，老同志讓路，讓中青年幹部上來接班，並且把它比喻為「一場革命」。他說，這場「革命」不搞，讓老人、病人擋住比較年輕、有幹勁、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個現代化沒有希望，甚至於要涉及到亡黨亡國的問題，可能要亡黨亡國。

1982 年 2 月 18 日，鄧小平在會見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時說：「幹部老化問題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了。」就在鄧小平說這個話的兩天以後，2 月 20 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建立老幹部退休制度的決定》。這個決定，是在胡耀邦親自指導下起草的。決定指出：建立老幹部離休退休和退居二線的制度，妥善解決新老幹部適當交替的問題，是一場幹部制度方面的深刻改革，是關係我們黨興旺發達，國家長治久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順利實現的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決策。《決定》規定：擔任中央、國家機關部長、副部長，一般不超過 65 歲，副職一般不超過 60 歲；擔任司局長一級的幹部一般不超過 60 歲。離休退休的老幹部政治待遇不變，生活待遇還要略為從優。4 月 10 日，國務院發佈《關於老幹部離職休養制度的幾項規定》，作為具體的配套政策措施，以確保中央制定的老幹部退休制度的決定得到順利的執行。自此，中國開始建立幹部退休制度，它的直接結果是，大批老幹部離退休，或者「退居二線」。此後，大批相對年輕的幹部迅速在中國政壇嶄露頭角。

建立制度，發個文件，相對容易。問題是怎樣平穩實現幹部新老交替這樣一個過渡。新上來的，要平穩地接班；下去的，要自願，要心情舒暢。整個新老交替要保證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穩定和正

常發展，這才是難度最大的一件事。對此，在鄧小平主導下的中央採取了三個方面的措施：

第一，通過十一屆六中全會，在解決思想路線問題的同時，最終完成華國鋒辭職程序，並推舉黨內相對年輕的人擔任黨的最高職務，為下一步解決黨內新老交替問題做出表率，奠定基礎。

1981 年 6 月 27 ～ 29 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公報說：全會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致同意華國鋒辭去黨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請求。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主席；趙紫陽、華國鋒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由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華國鋒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在會前醞釀華國鋒辭職後的接替人選時，黨內外絕大多數人都要求鄧小平出任黨中央主席，甚至連一些外國政要也通過各種渠道表達了這個願望。但是，鄧小平力排眾議，推薦相對年輕的胡耀邦擔任。據後來有人回憶，胡曾經多次謝絕擔任這個職務，但終在鄧小平的勸說下接受了。後來在中共十二大上，他再次當選為取消中央主席後的中央總書記。可在選舉總書記時，胡耀邦卻把自己的一票投給了趙紫陽，而且據說那時他就作好了十三大退下來的思想準備。

第二，在中央和省一級設立「顧問委員會」。

設「顧問」，是鄧小平的一個「發明」。早在 1975 年，他在擔任總參謀長，受命整頓軍隊的時候，就提出了在軍隊設「顧問組」的問題。後來隨著他再次被「打倒」，這個設想沒有能實施。這次，他又向中央建議：故技重施。在 1980 年 8 月 18 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就透露過，中央正在考慮設立一個顧問委員會，連同中央委員會，都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這樣，就可以讓大批原來在中央和國務院工作的老同志在退下來的情況下，充分利用他們的經驗，發揮他們的指導、監督和顧問作用。同時，也便於使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幹，逐步實現年輕化。但由於當時時機還不成熟，沒有立即實施。

1982 年 7 月 30 日，十一屆七中全會舉行前夕，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了即將向十二大提交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經過修改的新黨章草案規定：中央和省一級設顧問委員會，以發揮許多富

有政治經驗的老同志對黨的事業的參謀作用。鄧小平向全會解釋說：「鑒於我們黨的狀況，我們幹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幹，處理不能太急，太急了行不通。還有，我們多年來對中青年幹部的提拔就是少，這不沒有注意這方面的工作嘛。而且還得承認，確實是障礙重重，這個障礙有些是有意識的，有些是無意識的，兩種情況都有。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顧問委員會來過渡。顧問委員會，應該說是我們幹部領導職務從終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種過渡。我們有意識地採取這種辦法，使得過渡比較順利。也許經過三屆代表大會以後，顧問委員會就可以取消了。如果兩屆能夠實現，就要 10 年，那時我們在座的有幾個還在？要是兩屆的話，現在 60 歲的就是 70 歲，70 歲的就是 80 歲，80 歲的就是 90 歲。所以，顧問委員會是個過渡，這個過渡是必要的，我們選擇了史無前例的這種形式，切合我們黨的實際。但是在這個過渡階段，必須認真使幹部隊伍年輕化，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領導職務終身制的廢除創造條件。」【64】

9 月 6 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了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確了中顧委的組成原則和職能作用：黨的中央顧問委員會是中央委員會政治上的助手和參謀。會議在選出新的中委和中紀委委員的同時，選出了由 172 人組成的中央顧問委員會。鄧小平以中央常委身份，兼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會上，鄧小平再次說：中央顧問委員會是個新東西，是根據中國共產黨實際成立的，是解決我們這個老黨、老人實現新舊交替的一種組織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員會年輕化，同時讓老同志退出一線後繼續發揮一定的作用，顧問委員會就是這樣一個組織。

第三，在十二大後的高層運作中，在事實上劃分一線和二線，讓年富力強的胡耀邦和趙紫陽衝在日常工作第一線。

鄧小平意識到，在中央高層順利完成新老幹部交替，是從組織上保證政策的連續性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戰略措施，新老交替的關鍵是要給年輕幹部機會，讓他們經常處在日常工作的第一線，這樣，年輕幹部才能迅速成長起來。

為此，在十二屆中央常委會的實際運作中，出現了這樣一個格局，即胡耀邦管黨，管書記處；趙紫陽管政，政府的經濟工作，後來

【64】《鄧小平文選》第 2 卷，第 413-414 頁。

又成立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趙任組長；鄧小平、陳雲、李先念三位元老在後面坐陣，不管日常工作的局面[65]。按照後來曾經擔任過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的鮑彤的說法，那時候，十二屆中央的「五個常委，不是一個人有發言權，而是每個人都有發言權；也不是一個人說了算，而是必須五個人共同拍板。」他把這種局面稱為「群龍無首」，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好的格局」，「年輕力壯的實幹家和德高望重的元老擺在一起，使『總書記』重新恢復了共產國際當年的實況，不再是一言九鼎的領袖，真正成了經常的辦事人員，即趙紫陽所說的『大秘書長一個』。當時雖然也和毛澤東時期一樣，談不上什麼民主制度，但是確確實實形成了一個在相互制約中實現平衡的局面。胡耀邦和趙紫陽就是在這樣一種格局下面，共負重任，攜手工作的。」[66]

從中共十二大開始，中共為解決領導職務終身制問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如鄧小平所預想，中央顧問委員會經過兩屆代表大會，到十四大撤銷。過渡完成了，可又似乎沒有完成；制度也建立起來了。可又似乎沒有完全建立。你看，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宣佈鄧小平為最終決策人，1989 年的「四二六」社論、軍事鎮壓、趙紫陽失勢，1992 年的南巡講話，對「下一代」領導人的選擇，哪件事情裏面沒有那幾位宣稱自己已經「退休」的老人的影子？當然，這也許不完全是制度的問題，而有中國傳統封建文化的作用，也有長期威權政治的影響，更是中共自身傳統的革命黨體制的延續。直到目前，中共體制內的老人政治也沒有完全結束，已經「退下來的老同志」仍然在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在影響著中國的政治格局，這次中共十八大人事格局的遲遲難產，就是例證。中共原有的那套領導體制和人事制度，如果不進行改革，就必然會受到元老們的影響。這種「太上皇」政治，只要中共不完成向民選政治下的民主政黨、現代政黨蛻變，就必然會存在。這就不是僅僅建立一個退休制度所能解決得了的了。

【65】 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選舉當時共有 6 人，其中葉劍英因身體健康原因很少出面，1986 年 10 月去世。

【66】 鮑彤：《我看胡趙關係》，載《鮑彤文集》，新世紀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09 頁。

第二章

「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搞不下去」

1980 年代那次政治體制改革真正的動力和契機，來自從 1980 年代初開始的經濟體制改革。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從農村進入城市，衝垮了計劃經濟，呼喚著高度集中的政府管理體制進行放權和改革。鄧小平坐不住了，他也看到了，如果他想把經濟體制改革進行下去，政治體制改革不搞不行。

一、「八字方針」與趙紫陽「講北京話」

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國的國民經濟發展終於擺脫了政治動亂的長期困擾，迎來了轉機。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1979 年到 1984 年這六年裏，國家的經濟工作有兩條主線，一條，是農村推進「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另一條是在宏觀上貫徹「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

1977 年、1978 年兩年，國民經濟增長相對於前幾年說來，帶有恢復的性質，速度較快，助長了黨內一種盲目樂觀的情緒，導致了急於求成的「洋躍進」現象。對此，官方有人將責任歸咎於當時的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華國鋒，說法是：華國鋒提出了冒進的經濟發展指導思想和戰略，從而錯誤地引導了人們要求改變我國經濟長期停滯不前狀況的意願，使急於求成的思想再度支配了經濟工作，導致了這兩年在經濟方面的高指標、片面強調重工業的錯誤。後來韓鋼先生在〈還原華國鋒〉一文中認為，這種說法不符合實際。他說：「『洋躍進』，也不是華一個人的主張，高層都同意，鄧小平恐怕比華國鋒還要積極。無怪乎鄧後來不贊成批『洋躍進』。」「胡耀邦的評論比較公道：『經濟問題，我們也是有錯誤的，一個是高指標，一個是大轟大嗡，主要是 1978 年。我覺得，這個問題，國鋒同志是有一份責任的。但是，我的意見，當時指標是中央全會討論了的，大家都舉了手的，我也是有錯

誤的，因為當時我是中央委員之一，我也是吹過的。』『經濟上的嚴重失誤、嚴重錯誤，我的意見，不要把主要的賬算在國鋒同志身上』。經濟工作有沒有錯誤、有多大錯誤，見仁見智，盡可討論；不過，胡耀邦說『大家都舉了手』、責任不在華一個人，卻是不爭的事實。」[67]

由於宏觀經濟決策的失誤，使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狀況進一步加劇。經濟效益低下，產品質量不好，產品結構不合理，長線產品庫存積壓增多，城鎮大量人口待業，知青返城加速，就業壓力增大。這一系列問題成為當時國民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嚴重障礙，使經濟的高速度增長難以為繼。

1979 年 3 月 14 日，李先念、陳雲在就財經工作寫給中央的一封信，提出了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一) 前進的步子要穩，不要再折騰;(二) 從長期來看，國民經濟做到按比例發展就是最快的速度；(三)現在的國民經濟是沒有綜合平衡的，比例失調的情況相當嚴重；(四)要有兩三年的調整時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調情況大體上調整過來;(五) 鋼的指標必須可靠;(六) 借外債必須充分考慮還本付息能力，考慮國內投資能力。中央，也就是鄧小平接受了他們的建議。經過幾個月的醞釀、研究和討論，1979 年 4 月，在北京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正式確定了「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要求邊調整邊前進，在調整中改革，在調整中整頓，在調整中提高。

在這個八字方針中，調整是核心。這是陳雲提出的。調什麼？調已經出現的高指標，同時也要調不合理的國民經濟比例關係。這可以說是陳雲的老辦法了。當年，他在接過三年「大躍進」的爛攤子之後，就是靠著「調整」這個辦法，才使已經「村村著火，四處冒煙」的國民經濟在幾年內有了初步好轉。現在，也還是這招。可說來也讓人費解，「調整經濟結構」這六個字，從那個時候起到現在喊了三十多年，至今仍然在喊，仍然在調，可這經濟結構，卻始終沒有調整過來，也許其內容發生了一些變化，可到現在還是國民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根本性障礙。當然，這是題外話了。整頓，當然是鄧小平的絕招。1975 年鄧小平就是靠著這一招，才使難以為繼的國民經濟經濟有所好轉。今天重新提出來，目的仍然在於整頓企業領導班子，整頓經濟秩序。至

【67】 韓鋼：〈還原華國鋒——關於華國鋒的若干史實〉，載《往事》第 74 期，2008 年 11 月 14 日。

於提高，就是一句沒有什麼實質內容空話了。那麼「改革」呢？不錯，李先念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中，代表中央提出了改革經濟管理體制的問題。但是他說，關於改革的原則和方向，首要的一條是「在我們的整個國民經濟中，以計劃經濟為主，同時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這一原則，後來寫入一系列中央有關決議、報告中，也寫入了1982年憲法中。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這時所講的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改革」，與後來意義上所講的以發展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為目標的經濟體制改革有本質上的區別。總的看起來，這八字方針，仍然是計劃經濟下的老辦法，它的「主要任務是：堅決地、逐步地把各方面嚴重失調的比例關係基本上調整過來，使整個國民經濟真正納入有計劃、按比例健康發展的軌道」【68】。

那麼，在80年代初剛剛擔任國務院領導職務的趙紫陽是怎麼看改革的？當時到趙紫陽身邊擔任秘書不久的鮑彤後來回憶中說：「紫陽剛到北京的時候，也沒有打出改革的旗子來。為什麼？因為此時還談不上改革，當時中央的頭等大事就是經濟結構的調整。應該說，在這個問題上，紫陽和陳雲的意見是一致的，要調低計劃指標，應該留有餘地，要實事求是。反過來說，紫陽跟耀邦的意見是不一致的，跟小平沒有明確地說不一致，實際上也是不一致的。鄧小平認為，翻兩番是當務之急，耀邦完全贊同鄧小平這個意見。他們認為，經濟增長必須保證在7%-8%，翻兩番的目標才能實現。」這就是說，趙紫陽作為農村經濟改革的主要推動者，在他剛剛來到中央，「說起北京話」【69】的時候，一開始並沒有提出改革問題，而是支持實行「八字方針」的。一直到這一年12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趙紫陽提出了要「走一條經濟發展的新路子」的時候，趙才亮出了他自己的觀點。

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著重討論經濟形勢和經濟調整問題。會議期間，鄧小平、李先念、陳雲等對調整國民經濟都作了發言。趙紫陽在發言中，首先強調了為什麼要對國民經濟進行大的調整，說明了調整的必要性；進而提出了經濟調整的要

【68】李先念：《關於國民經濟調整問題——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79年4月5日，見《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彙編》（上）。

【69】陳雲語。見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大風出版社2006的3月版，第511頁。1980年底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和趙紫陽都講了話。陳雲聽了趙紫陽的發言以後說，現在開始，算是說「北京話」了，來到北京就要說「北京話」。

求和方案，強調要正確處理好調整與改革的關係。趙充分肯定了三中全會以來，對經濟體制做的一些初步的改革。他認為，實踐證明，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效果是好的，對搞活經濟，提高經濟效益起了積極的作用。現在經濟形勢之所以這麼好，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改革調動了人們的積極性。否則，就沒有今天這個局面，困難還會更大。

在此基礎上，趙紫陽提出，要「努力提高經濟效果，走出一條發展經濟的新路子」。這才是他自己的看法，他說：

> 我們應當尋找一條新的路子，不是靠多上基本建設，多鋪新攤子，大量增加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而是主要靠發揮現有企業的作用，進行合理的技術改造，降低消耗，提高質量，提高效率，來擴大社會生產。這條路子，速度可能不那麼高，但是經濟效益會好，社會財富會增加得多，人民得到的實惠也會多。只有走這條路子，才能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多、底子薄的國家，處理好積累和消費的關係，處理好發展生產建設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關係，從根本上解決財政經濟的困難，求得經濟的穩定增長。
>
> 我們要抓現有的三十多萬個企業，提高其經濟效果，把它們的潛力發揮出來。要做到這一點，空喊不行，必須在經濟發展的方針上來個轉變，在人們的思想觀念上來個轉變，而且要有一系列的具體工作、具體措施跟上來，包括企業的整頓、企業的改組、技術的改造、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經濟體制的改革。【70】

在講話中，趙紫陽講了幾個數字。建國以來，從 1949 年到 1952 年，是國民經濟的恢復時期，可以不算，那麼 1953 年應該算吧！跟 1953 年比，我們現在的工農業生產總值增加了幾十倍，我們的固定資產總值增加了幾十倍，那麼我們的人民生活呢？只增加了 1 倍，而且還是票面上的。27 年了，國家的經濟實力強大了，但人民的生活水平依然很低；工農業生產總值提高得很快，經濟效益卻是一塌糊塗！正是針對這種情況，趙紫陽提出，要走一條「新路子」。他的新路子，不是以速度為中心，不是以產值為中心，而是以經濟效益為中心，要走出一條新路子。老路是什麼？是毛澤東的路，或者說是列寧、斯大林的路，也是當時陳雲們堅持要走的路（當然，後面這句是不能講的）；趙紫陽的「新路子」就是指中國要經過改革所走的未來之路。

【70】 趙紫陽：《關於調整國民經濟的幾個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 年 8 月版，第 567-586 頁。

鮑彤認為，「趙紫陽『努力提高經濟效益，走出一條發展經濟的新路子』觀點的提出，才標誌著中國濟體制改革的正式起步。」筆者認為，鮑的這個說法有它的道理，應該引起重視。當然，這條路所包涵的內容，經濟體制改革所包涵的內容，此時整個中央高層，都還不是很明確。中國經濟改革的道路，不是哪個人在腦子裏事先就形成的，而是在實踐中摸索出來的。

1981 年 11 月五屆人大四次會議召開，趙紫陽在擔任總理之後，發表了他的第一個《政府工作報告》。在報告中，趙紫陽代表國務院總結了一年來經濟調整的成績，同時，認為由於調整任務比較艱巨，有必要再用 5 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繼續貫徹「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這樣才能打好基礎，更好地前進。不過，應該說明的是，這篇政府工作報告，是鄧力群組織人起草的，胡喬木對稿子作了修改。但據鄧回憶，起草「其間每個稿子都送給了趙紫陽。可以說，從頭至尾，一直到他講，他沒有在其中加任何一句話。」【71】這種情況確實有點反常。以趙作為中央常委、國務院總理的身份來說，對自己在全國人大上第一次亮相的政府工作報告起草過程不表示意見，也一字不改，但照講不誤，這種情況以往似乎很少見，也許有些內情不足與外人道。只是斯人已逝，個中緣由，後人也不便猜測了。

二、「改革，是改你們計委的」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是什麼？是改革傳統的計劃體制，建立起市場經濟體制。但是，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人們並不是一下子統一的，在 1980 年代前半期的經濟改革過程中，計劃和市場誰為主誰為輔，是計劃經濟還是商品經濟，始終是中央高層，也是理論家們爭論的核心問題。那時候，報紙上對這個問題展開了討論，當然官方主調仍然還是堅持「計劃為主，市場為輔」，堅持「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反對「商品經濟」。

「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是陳雲的基本思想。1982 年 1 月 26 日《人民日報》在一版報道了陳雲同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姚依林、國家計委副主任宋平【72】等人的談話，陳雲說，「我今天要

【71】 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大風出版社 2006 的 3 月版，第 203 頁。

【72】 宋平（1917-）：山東莒縣人。1981 年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後升主任，任國務委員；1987 年任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89 年「六四」事件

講的是怎樣堅持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問題。我們國家是計劃經濟，工業要以計劃經濟為主；農業實行生產責任制以後，仍要以計劃經濟為主。」那段時間，陳雲在不同場合，反覆多次地強調他的這一思想。陳是中國計劃經濟的老祖宗，在建國以後毛澤東瞎折騰的那些年，每當經濟局面遇到危機的時候，都是由陳雲出來收拾局面。在幾十年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陳雲逐步樹立了他在經濟領域的權威。特別是在粉碎「四人幫」以後的幾年，陳的經濟思想，已經在中國經濟理論界佔據了統治地位。

1982 年 9 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大再次肯定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主」的方針，當年 12 月召開的全國人大五屆五次會議上，「國家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國家通過經濟計劃的綜合平衡和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保證國民經濟按比例地協調發展」，被正式載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章總綱之中。

爭論並沒有因此而結束。改革，就是要改變既有的東西，突破原有體制的條條框框。當時已經擔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作為中國經濟的當家人，他考慮的，不是速度，不是 GDP 產值，而是效益；不是如何完善舊體制，而是如何改革，如何走出一條經濟發展的新路。當陳雲一再堅持以計劃經濟為主的時候，趙紫陽花費精力最多的是如何獲得陳雲的支持，讓商品經濟獲得生存的權利。但是，在當時情況下，陳雲的經濟思想在全黨是佔統治地位的，「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必須堅持「市場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已經載入了黨十二大報告和國家憲法，要改變，要獲得陳雲支持，談何容易？在這種情況下，趙紫陽採取了在具體問題上做文章的辦法，按照鮑彤的說法，叫做「跪著造反」。據鮑彤說，「『跪著造反』是德國女革命家盧森堡講的，很可能是她批評伯恩施坦或者考茨基的話。她說：你篡改了馬克思，想造反；但是你還離不開馬克思，還跪著。列寧引用她的形象語言，來奚落自己的政敵。其實，凡是相信馬克思、又要修正馬克思的人，都只能『跪著造反』。你不跪著，你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你不造反，你就不可能修正。」

以後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後，宋平升任政治局常委，同時進入政治局常委的還有江澤民和李瑞環，填補了趙紫陽、胡啟立的空缺。

陳雲在當時也是同意要搞活經濟的。但他認為，要搞活經濟，市場是要考慮的，價值規律是應該尊重的，但是它是為輔的。社會主義經濟要以計劃為主。趙紫陽就接過了這個說法，他說，陳雲同志講的非常好，我們國家是社會主義經濟，就是應該以計劃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紫陽說，市場調節為輔就是指那些對國計民生不起重要作用的小玩意。那麼大的企業怎麼辦呢？大企業也同樣受價值規律的支配。因此我們這個計劃，要分成指導性和指令性兩類。不僅要有指令性計劃，也要有指導性計劃。指令性、指導性都是計劃，不能說指令性是計劃，指導性就不是計劃。如果只有指令性計劃，沒有指導性計劃，經濟就管死了。從現實情況來說，目前恐怕指令性計劃太大了，現在要收起來一些，指導性計劃現在太少了，恐怕要擴大一些。陳雲一看，說得蠻對的，就同意了。後來趙紫陽又進一步說，看來，計劃跟價值規律都是覆蓋我們這個國家的整個經濟體的，這個說法陳雲也同意了。

1984 年，中央決定，在十二屆三中全會上要通過一個《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以此統一全黨思想。這一決定的起草過程，既是起草者內部爭論和統一思想的過程，也是胡耀邦，趙紫陽等黨內開明的改革者相互支持，攜手合作的過程。據參加起草這個決定的高尚全【73】和楊啟先【74】介紹，起草班子的成員一開始有袁木【75】、高尚全、桂世鏞【76】、王忍之【77】、楊啟先等。袁木負責，先寫提綱，討論了多次，總是跳不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圈子。有人認為要跳出這個圈子，必須在商品經濟問題上有所突破。但是，起草小組內對此的看法不一致，高尚全和王忍之曾為此爭得面紅耳赤。1984 年 7、

【73】 高尚全（1929-）：時任國家體改委副局長，1985 年後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1999 年起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

【74】 楊啟先（1927-）：時任國家體改委委員、綜合規劃局局長，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研討辦公室副主任。

【75】 袁木（1928-）：江蘇興化人。時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秘書長，1988 年任國務院研究室主任、國務院發言人，曾參加過中央和國務院許多文件的起草。1987 年參加鮑彤領導的中共十三大報告起草工作，為五位負責人之一。1989 年「六四」事件中，成為官方武力鎮壓的喉舌。

【76】 桂世鏞（1935-2003）：時任國家計委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後調任《人民日報》總編輯，參加鮑彤領導的中共十三大報告起草工作，為五位負責人之一。此後歷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國務院研究室主任。

【77】 王忍之（1933-）：江蘇無錫人，中共黨內保守派大將。1982 年任《紅旗》雜誌社副總編。1987-1992 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8月間，在胡耀邦的主持下，起草小組在北戴河對提綱討論了兩次。胡耀邦對提綱不滿意，說經濟問題要聽聽趙紫陽的意見，提出要寫進發展多種經濟成分。胡耀邦加強了起草小組，增加了林澗青【78】、林子力【79】、龔育之【80】、鄭必堅【81】等人，負責人由袁木改為林澗青。

起草組從北戴河回到北京玉泉山以後，胡耀邦和趙紫陽都分別上山主持過討論。談到計劃和市場的關係時，趙紫陽提出：我傾向於寫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此後，趙紫陽又召集起草小組在中南海討論了兩次。第二次討論除了起草小組成員以外，還請來了鄧力群。快散會時，趙紫陽問鄧力群：「老鄧，你怎麼看？」鄧力群回答說：「我1979年就贊成商品經濟。」【82】

為了把這個關鍵性問題盡早確定下來，1984年9月9日，趙紫陽給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鄧小平、李先念、陳雲寫了一封信，叫做《關於經濟體制改革中三個問題的請示》。在談到計劃體制時，趙紫陽說：「各項改革都牽涉到計劃體制，這是經濟體制的核心。關於這個問題，《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已有原則規定，現在需要進一步加以具體化。根據多年和這一段的實踐，反覆考慮，建議把我國的計劃體制概括為以下四層意思：(一)中國實行計劃經濟，不是市場經濟。(二)自發地盲目地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生產和交換，只限於小商品、三類農副產品和服務修理行業，它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輔助作用。(三)計劃經濟為主不等於指令性計劃為主。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都是計劃經濟的具體形式。我國幅員遼闊，現代化手段不發達，交通不便，信息不靈，編製包羅萬象的指令性計劃，不僅不可能，而且有害。在當前和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的方針應該是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擴大

【78】林澗青（1922-2008）：福建連江人。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副主任。

【79】林子力（1925-2005）：福建連江人，經濟學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室務委員、理論組組長。

【80】龔育之（1929-2007）：湖南湘潭人。時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1987年參加鮑彤領導的中共十三大報告起草工作，為五位負責人之一。後歷任中宣部副部長、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央黨史研究室常務副主任。

【81】鄭必堅（1932-）：四川富順人，1982-1987年任胡耀邦秘書，兼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室務委員。參加鮑彤領導的中共十三大報告起草工作，為五位負責人之一。歷任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總幹事、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宣部副部長、中央黨校副校長等職。

【82】參見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第二章，選路—中國向何處去，第163-164頁。

指導性計劃。(四)指導性計劃主要用經濟手段調節，指令性計劃也必須考慮經濟規律特別是價值規律的作用。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要通過價值規律來實現，要運用價值規律為計劃服務。『計劃第一，價值規律第二』，這一表述並不確切，今後不宜繼續沿用。應該如實地把兩者統一起來，而不要把它們割裂開來或對立起來。」

在這裏，趙紫陽對經濟體制改革概括了四句話：一是，「中國實行計劃經濟，不是市場經濟」；二是，市場調節「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輔助作用」。顯然，前面這兩句又是虛晃一槍，「跪著造反」，以便讓陳雲放心。接下來的第三句話，才是紫陽真正想說的：「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都是計劃經濟的具體形式。」「我們的方針應該是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擴大指導性計劃。」第四句話最為關鍵：「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實際上等於否定了第一條的大前提。時任國務院總理秘書的鮑彤評論說，趙紫陽講的「這四句話的潛在含義是，對陳雲來說，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沒有違反你提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對下面來說，我們沒有違反天經地義，我來給你們當保護傘，大膽放心地幹吧！」據鮑彤的回憶，這封信充分體現了趙紫陽政治智慧的信，是趙絞盡腦汁，自己一個字一個字親自寫的，沒有要秘書，或是其他任何人代筆。

他成功了！9月10日，鄧小平在這封信上批示：「我贊成。這個文件可印發三中全會，連同體制改革的決定，一併討論。」9月13日，陳雲覆信：「紫陽同志：你提出的三個問題【83】，都是當前我國經濟工作面臨的重要問題，也是對這幾年城市經濟改革經驗的總結，我完全同意。關於計劃體制的四層意思，合乎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9月15日，李先念覆信：「紫陽同志：你關於經濟體制改革中三個問題的意見很好，概括了這幾年改革的經驗，提出了今後改革的方向和原則，我都同意。」這樣，趙紫陽的主張在元老們那裏過關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提法和信中的四項內容全部順利地寫入了當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文件通過後，鄧小平說：「我的印象是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這次經濟體

【83】 趙紫陽在1984年9月9日的信中涉及的「三個問題」是，計劃體制問題，價格改革問題和國家領導經濟的職能問題。

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決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有些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我看清楚了。」[84]

在為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確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個目標的過程中，還有一件事情能說明趙紫陽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值得一述。據鮑彤後來說：1987 年底或 1988 年初，政治局開會，討論擴大對外開放事宜。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洪列席會議，他問趙紫陽：「商品經濟跟市場經濟到底有沒有區別？」趙紫陽明確回答說：「根本就是一回事！我們說它是商品經濟，是因為有人不同意講市場經濟，阻力太大，沒有承受能力。所以，我們改個名字，叫做商品經濟。實際上，我們所說的商品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凡是市場經濟所允許的，在我們這裏都允許。市場經濟國家所採取的方法和手段，我們這裏都可以試驗。」「期貨，股票市場都可以搞。」當時，對趙紫陽這個說法，包括李鵬[85]、姚依林[86]在內，沒有一個常委提出異議。當然，他們可能會有不同意見，但在會上不說。

1982 年 2 月，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22 次會議通過了趙紫陽代表國務院所作的《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問題的報告》，決定設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簡稱國家體改委）。5 月 4 日，國家體改委正式成立。趙紫陽以總理身份親自兼主任。當時，國務院剛剛完成一次大規模機構改革。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增設這樣一個由總理兼任主任的正部級機構？

經濟體制改革，歸根結底是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打破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二是打破原有的中央高度集權的條塊體制，目標是建立「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市場經濟模式。要實現這兩個「打破」，達到這樣一個目標，顯然不能完全依靠原有的政府

【84】 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 83、91 頁。

【85】 李鵬（1928-）：李碩勳之子。四川成都人。早年留學蘇聯，電力工程人員，文革後任水電部副部長。1983 年任國務院副總理；1985 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1987 年任政治局常委；1988-1998 年任國務院總理。李在政治上聽從黨內保守元老；經濟上聽從姚依林。1989 年「六四」事件期間，李鵬力主並促成了武力鎮壓。

【86】 姚依林（1917-1994）：安徽貴池人。文革前長期做貿易工作，是陳雲和李先念的部下。1979 年任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後兼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1987 年任政治局常委。1989 年「六四」事件中，姚依林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主張並促成了武力鎮壓學生。

機構。因為，長期的計劃體制，已經形成了一種固有的權力格局和利益格局，而這一格局的載體，就是原有的政府管理體制和機構。中國老百姓有一句俗話，叫作「自己的刀不能削自己的把」。靠舊有的機構，讓他們自己改自己，惰性、阻力和難度都很大。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外力推動。最可行的辦法，就是在舊體制外，創建一個新機構，使其擁有至高地位，既瞭解各部委和地方情況，又與它們沒有利益關係，既超越部門利益，又能協調各部門的改革和調整。另外，從實際情況看，中央和國務院也確實需要有一個機構進行改革的宏觀研究、總體設計和綜合協調。

是誰提出和決定設立國家體改委的？鮑彤對此有個回憶，他說，「國務院進行機構改革，最後要向人大常委會提交一個報告，這個報告是袁木起草的。袁木寫好後給我，我大概只動了幾個字，就交給了紫陽。紫陽親自加上了一句話：『提請批准設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由總理兼主任。』這是紫陽親筆加的。為什麼要紫陽親自加上呢？如果國務院早就討論了，那麼袁木起草時就會寫上了；如果在更高的層次上沒有討論過，紫陽決不會擅自決定成立這麼一個以他為主任的機構。因此，這起碼是鄧小平找幾個人，例如胡、趙、薄【87】，一起談定的。由常委會決定的可能性不大。因為那個時候，常委幾乎從來不開會。我估計，至少是鄧小平跟趙紫陽兩個人商量，鄧小平交代的，因此，這個決定只有紫陽知道，袁木起草文件時並不知道。」

正是在上述情況下，由趙紫陽總理兼主任的國家體改委應運而生。新成立的國家體改委由薄一波兼第一副主任，副主任有杜星垣【88】、安志文【89】、周太和【90】，和不久後加上的童大林【91】。1983年賀光

【87】 指薄一波。薄一波（1908-2007）：山西定襄人。1979-1982任國務院副總理。1982-1987年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當時主任是鄧小平），是當時黨內極具影響的元老之一。1986-1987年曾參加趙紫陽主持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一，為五位成員之一。

【88】 杜星垣（1914-2011）：福建霞浦人。曾任國務院秘書長、國家體改委副主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秘書長。

【89】 安志文（1919-）：陝西子洲人。曾任六機械工業部部長兼黨組書記、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兼黨組書記，是第十三屆中顧委委員。

【90】 周太和（1914-2010）：江蘇淮陰人。曾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

【91】 童大林（1919-2010）：福建廈門人。曾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黨組成員。

輝[92]、鮑彤，1985年高尚全被任命為副主任；1986年鮑彤被任命為國家體改委黨組副書記。

1984年之前，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主要是以農村為主線，以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形式進行。城市裏則開始了對企業簡政放權試點，尚未動搖以計劃為主導的整個經濟體制。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的通過，在實際上衝破了所謂計劃經濟的束縛，把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確定到建設商品經濟上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從農村進入城市，進入了經濟的各個領域，整個國家的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

在舊體制下，國家計委基本上就是一個「小國務院」，整個國民經濟資源的配置、資金的調配、產品的定價與分配，都須按照計委制訂的國家計劃進行。既然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就是改變原有的計劃體制，逐步建立起「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商品經濟新體制，那麼就必須解決計委這個計劃經濟的核心堡壘，同時實現整個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轉變。

據鮑彤回憶，有一次，趙紫陽請當時任政治局委員兼國家計委主任的姚依林到他家裏談天，在輕鬆的交談中，趙紫陽問：「經濟體制改革是改什麼的？」姚依林「啊——」了一聲。趙紫陽笑著，自己接著說：「經濟體制改革，是改你們計委的。」在這裏，趙紫陽態度十分明確，也十分尖銳地提出了他的看法，計劃經濟是改革的對象，繼續靠國家計委來組織國民經濟是不行的。[93]

胡耀邦的態度同樣也很明確。他也認為改革的關鍵是要解決計委的問題。楊繼繩[94]在他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一書中，曾經轉述了前中宣部長朱厚澤[95]談起的1986年的一件事。有一次在耀邦

【92】賀光輝（1929-）：陝西清澗人。1979-1983年任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秘書。1983-1993年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1986年10月參加鮑彤領導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工作，為四位負責人之一。1987年12月-1989年8月兼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

【93】參見鮑彤：〈咫尺天涯念紫陽〉，載《鮑彤文集》，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版，第186頁。

【94】楊繼繩：新華社高級記者、著名學者。著有《鄧小平時代》、《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墓碑》等。

【95】朱厚澤（1931-2010）：貴州織金人。1983年任中共貴州省委書記，1985年取代鄧力群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在他主持中宣部工作期間，因提出「寬鬆、寬

的專列上，聽到胡耀邦對田紀雲[96]說:「中央兩大綜合部門，黨中央這邊是中宣部，國務院那邊是國家計委。中宣部這邊問題解決了（指朱厚澤取代了鄧力群任中宣部長），你去跟紫陽同志說說，早下決心解決計委的問題。」當時主持國家計委的是姚依林和宋平。他們還是按老辦法工作，你放權他就收。姚依林還說自由化的根子在經濟工作中。胡耀邦對計委當然不滿意。楊繼繩評論說，「兩年以後我想起胡耀邦這次談話時想到：你想解決計委的問題沒有實現，你自己反而被計委的人給『解決』了。姚依林『自由化的根子在經濟工作中』的看法代表了保守力量的看法。所以，經濟改革上的爭論，背後是政治上的較量。但是，經濟有著自己的運行規律，一旦走上了市場化的道路，想走回頭路是很難的。」[97]

三、鄧小平坐不住了：「政治體制不改不行」

1985、1986 兩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商品經濟的發展，企業自主權的擴大，原有的以計委為中心的計劃經濟的政府管理體制就越來越不適應了，企業自主權的擴大需要政府簡政放權，轉變職能，實現「政府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目標模式，也要求政府在管理體制上進行相應的調整。而對計委的改革，對國家經濟部門的改革，整個政府機構的改革和政府職能的轉變，既是經濟體制改革問題，也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

在這種情況下，把經濟體制改革看作是他自己的「旗子」的鄧小平再也坐不住了。從 1980 年他作過《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之後，他就沒有再過多的關注政治體制改革，而著眼點更多的是放在經濟改革方面。這段時間在他的講話和談話中，很少再涉及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當改革到了 1986 年的時候，敏銳的鄧小平發現經濟改革遇到了障礙，這就是原有的高度集權的經濟管理體制和黨政機構，特別是國家計委、各工業部委，很多情況下是體改委在那裏搞放權，他們

容、寬厚」，被譽為「三寬」部長；1987 年初胡耀邦被迫辭職後，調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1988 年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

【96】 田紀雲（1929-）：山東肥城人。曾任四川省省財政局局長。1983-1993 年任國務院副總理、1985-1993 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1986-1987 年曾參加趙紫陽主持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一，為五位成員之一。

【97】 參見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修訂版，第 160 頁。

在那裏就搞收權；表面上說的是簡政放權，實際上卻是陽奉陰違。這種情況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視，他認為，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進行下去了，必須同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否則，經濟體制改革就難以為繼。

從 1986 年上半年開始，政治體制改革開始成為鄧小平講話和談話的焦點和中心問題。

3 月 28 日，鄧小平會見新西蘭總理朗伊，在介紹中國的改革情況時，他說，我們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是一個全面的改革，其中包括政治、社會、教育、科學等各個領域。如果改革成功，會帶來什麼效果呢？它會為中國今後幾十年的持續、穩定發展奠定基礎。

5 月 20 日，鄧小平會見澳大利亞總理霍克，在向客人介紹中國改革的現狀和設想時，他說：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不僅涉及經濟領域，也涉及文化、科技、教育領域，更重要的是還涉及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就要消除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官僚主義，還包括改革人事制度。【98】從現在能查到的資料看，這是時隔六年之後，他第一次重新揀起政治體制改革這個話題。

6 月 10 日，在聽取趙紫陽等幾位領導人關於經濟情況的彙報時，鄧小平說，現在看來，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適應形勢。改革，應該包括政治體制改革，而且應該把它作為改革向前推進的一個標誌。我們要精兵簡政，真正下放權力，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把人民群眾和基層組織的各級性調動起來。【99】

6 月 26 日，鄧小平在聽取喬石關於端正黨風的彙報之後說，今年一季度經濟增長率下降，有人為的因素。我們要下放企業權力，他們在那裏辦公司，要收權。這說明，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不行。一切改革的成效，取決於政治體制改革，各項改革都要人進行。從現在開始，政治體制改革要抓緊進行，到十三大之前，要搞出個東西來。【100】

6 月 28 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就法制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發表講話。他說：「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事情要人來做，你提倡放權，

【98】《鄧小平年譜（下）》，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 年 7 月版，第 1118 頁。
【99】《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 160 頁。
【100】吳稼祥《中南海日記》第一部分，第六節，「鄧小平下旨：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他那裏收權，你有什麼辦法？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101】

9 月 3 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時說，「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102】

據統計，1986 年內，鄧小平在他的講話和談話裏，近 20 次談到了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在各次談話中，他不但談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必、迫切性，而且還對政治體制改革該怎麼搞，包括哪些內容的談了許多看法。當然，這也就是等於給他所主張的政治體制改革劃了框框，定下了調子。

關於政治體制改革怎樣著手，他說：「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現在還在討論。這個問題太困難，每項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廣泛，很深刻，觸及許多人的利益，會遇到很多的障礙，需要審慎從事。我們首先要確定政治體制改革的範圍，弄清從哪裏著手。要先從一兩件事上著手，不能一下子大幹，那樣就亂了。國家這麼大，情況太複雜，改革不容易，因此決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較大以後再下決心。」

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他說，「政治體制改革包括什麼內容，應該議一下，理出個頭緒。我想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是調動群眾的積極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義。改革的內容，首先是黨政要分開，解決黨如何善於領導的問題。這是關鍵，要放在第一位。第二個內容是權力要下放，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同時地方各級也都有一個權力下放問題。第三個內容是精簡機構，這和權力下放有關。」

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他說，我們政治體制改革總的目標是三條：第一，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第二，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第三，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而調動人民積極性的最中心的環節，還是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產力

【101】《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64 頁。
【102】《鄧小平年譜（下）》，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 年 7 月版，第 1134 頁。

發展了，人民積極性調動起來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力量就增強了，社會主義制度就鞏固了。[103]

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日程和禁忌，鄧小平說，「改革總要有一個期限，不能太遲，明年黨的代表大會要有一個藍圖。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過去我們那種領導體制也有一些好處，決定問題快。如果過分強調搞互相制約的體制，可能也有問題。」[104]

仔細分析 1986 年鄧小平的這些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談話，可以發現，此時他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想法，與他 1980 年在反對封建主義影響的基礎上提出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已經有了重大差別。他雖然提到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但並不是以此為重心，而是行政改革為主線的。他為政治改革規定的內容，首先是黨政分開，第二，是權力下放，第三，是精簡機構，目標是提高效率。這些內容，是經濟體制改革提出的客觀要求，也確實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但只應該是其中的一部分，即行政體制改革那部分。關於發展社會主義民主，開放言論自由，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實行司法體制改革等諸多內容，鄧小平都沒有涉及。

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變化？回顧 1978 年思想解放運動以來黨內高層左、中、右各種政治觀點、傾向相互博弈的發展軌跡，分析以鄧小平對社會上民主憲政運動態度的變化過程，可以看到，當以鄧小平為首的元老派領導人剛剛被從文革中解放出來，還沒有在黨內取得穩固的主導地位的時候，他們需要發動群眾，需要在倫理道義上掌握主動，也需要有更多的講話機會。這個時候，他們需要講民主，講思想解放。但是當他們的政治主張逐漸在黨內佔據了主導地位，他們在中央高層的政治地位也逐漸穩固並掌握了最高權力之後，特別是當他們看到西單民主牆和北京之春運動的後果足以威脅到共產黨的統治，看到「波蘭團結工會事件」對波蘭、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各國共產黨的統治會造成什麼樣影響的時候，他們對在中國發展民主產生了一種懼怕心理，雖然作為共產黨，一貫是以民主為旗幟的，他們不可以放棄這個道義制高點。這樣，當迫於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鄧小平不得不再一次提出搞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他們不可能像當時蘇共領

【103】以上參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 176-178 頁。

【104】《鄧小平年譜（下）》，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 年 7 月版，第 1137-1138 頁。

導人戈爾巴喬夫[105]那樣，以民主和公開性作為改革的旗幟和基本訴求，而是要盡量避開「民主」這個政治敏感點，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盡可以限制在行政改革的範圍內，也即對他們，對黨的領導地位不至於產生威脅的範圍內。

與鄧小平強調政治體制改革相呼應，中央其他領導人也開始在許多場合談到政治體制改革。

7 月 16 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王兆國[106]在中央黨校畢業典禮上提出，「我們在搞好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必須針對某些政治體制進行相應的改革」。他強調，要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善、富有效率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

7 月 31 日，萬里在全國軟科學座談會上發表《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的講話，他指出，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在我國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這既有傳統價值觀方面的障礙，同時也從一個重要的側面反映了我國政治體制方面存在的問題。我國政治體制上的一個重要弊病，就是領導權力過分集中，決策制度不健全。「因此，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民主，真正實行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這一講話經鄧小平和陳雲同意，8 月 15 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在黨內外引起了廣泛的強烈反響。

此後不久，8 月 30 日，《人民日報》在一版頭條位置發表一篇評論員文章：〈政治問題可以討論〉。文中寫道，「在學術問題中，有的牽涉政治問題，有的包括政治問題，有的本身就是很現實的政治問題。」既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公民有言論、出版的自由等，這些在憲法中都有莊嚴的規定。對政治問題各抒己見，討論、爭鳴，正是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的神聖不可剝奪的權利。」「實現高度民主，是我們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的目標。按照這個目標的要求，僅僅允許群眾議政還是很不夠的，還應當積極鼓勵他們對政治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為他們發表意見提供機

【105】戈爾巴喬夫（1931-）：蘇聯政治家。1985-1991 年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他在職時期的政策導致了蘇聯的解體以及冷戰的結束。1990 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106】王兆國（1941-）：河北豐潤人。鄧小平親自選拔的「第三梯隊」幹部。1982 年任團中央第一書記，1984 年任中央辦公廳主任，1986 年任中央書記處書記。

會、創造條件。這是我們建設高度社會主義民主必須確立的一種新觀念。」

這篇文章發表以後，立即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很多人為它叫好，並積極投入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大討論中來。但是，也許這篇文章的內容並不符合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意圖，也許它觸動了當時中央某些領導人的神經。我在中央政改辦的同事、也是該文的執筆人、時任《人民日報》評論員的吳國光後來在他的《趙紫陽與政治改革》一書中談到了一個情況，他說，「此文發表後，《人民日報》受到高層領導人的批評，已經準備好的其他幾篇評論員文章因此沒有見報。」【107】至於這位「高層領導人」是誰，以什麼理由批評《人民日報》，並阻止了其後的系列文章發表，就不得而知了。

四、這次政治體制改革啟動時的國際「大氣候」

1989 年 6 月 9 日，在天安門的鎮壓結束之後，時任中央軍委主席的鄧小平在接見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講話時說了一段話，他說：「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108】套用這句話來理解 1980 年代中期中國進行的那場政治體制改革，同樣貼切。

1980 年代搞政治體制改革，「國際大氣候」是什麼？當然是 20 世紀 70、80 年代那場世界性的民主大潮，特別是 80 年代蘇聯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所進行的以民主化為目標的政治改革。

從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一股多黨制民主化潮流席捲全球。首先，是在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這三個專制國家建立起了民主的政治制度。緊接著，到 70 年代中期，拉美國家開始了反對軍人獨裁政權的民主運動。1978 年巴拿馬首先以和平方式還政於民，結束軍人統治。接著是海地、阿根廷、尼加拉瓜等國，在 10 年內拉美軍人獨裁政權相繼倒台；而且基本上都是以和平方式完成權力移交（當然但不排除有少量流血事件甚至小規模戰亂）。到 80 年代中期以後，亞洲各國也興起了政治民主化的浪潮。首先是南朝鮮，獨裁統治者樸正熙因內訌被殺

【107】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1997 年 8 月版，第 42 頁，註釋 8。

【108】《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 302 頁。

後，民主化運動開始興起。經過權斗煥，盧泰愚過渡，終於建立了多黨制度，以金大中為首的新民黨在大選中取得政權。在菲律賓，獨裁者馬科斯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暗殺了反對派領袖阿基諾，引發了人民起義，馬科斯獨裁政權跨台。在伊朗，以霍梅尼為首的反政府勢力發動起義，推翻了伊朗巴列維王朝的獨裁統治。在印度，尼赫魯家族的獨裁統治最終以一連串的暗殺而結束，並導致印度國大黨的一黨執政徹底終結。80 年代後期的非洲大陸也同樣興起了政治民主化潮流，剛果（金）反政府起義軍推翻了獨裁者蒙博托長達 30 年的獨裁統治；納米比亞白人種族主義政權被起義軍推翻；南非白人種族主義統治也徹底結束。

蘇聯和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改革，當時走的是另外一種路子。1945 年二戰結束以後，東歐各國在蘇聯的「援助」下，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制度」，蘇聯式的政治上的一黨專制、經濟上的高度集中計劃體制、意識形態上的極權控制成為東歐「社會主義」各國的共同特徵。在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冷戰中，東歐各國被迫與蘇聯長期保持一致，基本喪失了獨立自主的權利，成為冷戰的犧牲品。從 20 世紀的 50 到 80 年代，東歐各國出現了多次試圖擺脫蘇聯模式與蘇聯控制的改革，但除了南斯拉夫以外，其他各國的改革均成效不大。

進入 80 年代，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致使蘇聯東歐各國的經濟普遍下滑，由於片面追求高積累，導致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農產品價格大幅度上漲，經濟發展墜入停滯。與此同時，在高度集權的一黨專制政治制度下，各國普遍出現官僚主義惡性膨脹，執政黨走向高度獨裁，壓制不同政見，迫害異見人士，特權和腐敗現象愈演愈烈等嚴重問題。各國的執政黨的執政合法性逐步喪失，反對派和反對黨逐步滋生和擴大，並獲得了相當數量民眾的支持。

1985 年戈爾巴喬夫擔任蘇共總書記以後，面對「社會主義陣營」勢力的衰落和經濟力量的下滑，對東歐各國實行了在經濟上「甩包袱」的辦法，放鬆了對東歐國家的控制。同時，在政治上，在東歐各國也推行他的「新思維」，即民主社會主義化，致使東歐各國的民主化浪潮進一步發展，反對派異軍突起，多黨民主制度的萌芽開始形成。特別是在波蘭，雖然長期處於執政黨和政府的強力壓制之下，但團結工會

在瓦文薩等人的領導下，運動潮起潮落，最終發展成為有雄厚民眾基礎的強大的反對派。

與此同時，戈爾巴喬夫在蘇聯開展了大規模的改革。改革初期，戈爾巴喬夫確定以發展經濟和進行經濟改革為黨的工作重點。但由於對計劃經濟體制沒有從根本上被觸動，1986 年蘇共二十七大上制訂的「經濟發展加速戰略」收效甚微。戈爾巴喬夫認為，經濟改革推進不下去，是因為政治上的阻力過大。於是他提出了《改革與新思維》的一系列觀點，認為「社會主義民主是改革的靈魂」，主張以「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取代現行的「科學社會主義」，由此轉向政治改革，在國內提倡民主化和公開性原則，允許反對派勢力公開存在，推行政治的多元化和意識形態的多元化。

這時候的中蘇關係，中國和東歐「社會主義各國」的關係，處在一個十分微妙的時期。毛澤東時期的那種意識形態上的對立狀態，黨與黨之間的對立狀態已經大為緩和。國家關係已經基本恢復。中共與蘇共，與東歐其他各國執政黨的黨際關係雖然還沒有恢復，但已經在接觸之中。80 年代中期這個時候，中共已經轉而承認蘇共和東歐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工人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承認蘇聯和東歐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

在這種狀況下，1986 年年中，鄧小平重提政治體制改革。對此，陳子明曾經評論說：「當時，美國《時代》週刊把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選為封面人物，戈爾巴喬夫後來居上，鼓吹『新思維』和『公開性』，獲得世界輿論的好評，鄧小平有心要把他比下去，奪取世界『改革先生』的第一把交椅。」【109】是不是如此，筆者不敢下定論。但是，蘇聯、東歐國家進行政治改革的一些理論、做法，借此作為正面的經驗被介紹到中國來倒是真的。那段時間，蘇聯改革中的民主化和公開性原則，對中國理論界研討政治體制改革產生了重要影響。

說中國 1980 年代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在「國際大氣候」下發生的，實際上它也是這個民主化「大氣候」中的一個有重大影響的組成部分，而且是「社會主義各國」中發展較早、較快的一個部分。現在回頭來看，由於對文革的反思，和經濟體制改革進行的較早較快，較為成功，政治改革在中國的提出是順理成章的。直到 1989 年 6 月之前，

【109】陳子明：〈「改革開放」三十年：從亢奮到疲頓〉，載《共識網》，2010 年 1 月 20 日。

中國的政治改革進展還算是波瀾不驚，而且也為其他「社會主義各國」的民主化改革提供了自己的經驗。如果不是那場血腥的鎮壓中斷了正在進行的改革的話，也許中國能夠為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向民主社會和平轉型提供一個成功的範例，也說不定。遺憾的是，歷史，沒有「如果」。

五、「政治改革從竊竊私語推向前台」【110】

在中共傳統的政治體制下，有兩個部門在體制中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一是主管國家計劃的國家計委，它是計劃經濟的大本營，因此趙紫陽說經濟體制改革就改計委的；二是主管理論宣傳工作的中宣部，它是傳統「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大本營。自真理標準大討論以後的幾年來，中宣部始終在胡喬木、鄧力群等黨內左派勢力的控制下。他們利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理論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上的矛盾，以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為名，對於解放思想和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方面的研究設置了重重障礙，對於那些要求進行重大政治改革的異見人士進行打擊和迫害。要搞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必須有一個能夠自由討論的輿論環境。要造成這種環境，中宣部也是繞不過去的。為了解決這個左的堡壘，1985 年 8 月，胡耀邦調貴州省委書記朱厚澤接替鄧力群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

胡耀邦寄希望於朱厚澤，希望他在意識形態方面打開一個新局面。而當時在朱厚澤上面，有胡喬木在政治局主管意識形態，有鄧力群在書記處主管意識形態。就是在這種重壓之下，朱沒有讓對他抱以期望的人失望，他冒著來自頂頭上司的壓力和政治風險，以他的「三寬」原則【111】，很快在宣傳工作上打開了局面。

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要求政治體制改革盡快提上日程。鄧小平和黨內其他領導人對於政治體制改革一次次談話，宣傳輿論環境的寬鬆，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北京《經濟學週報》等國內媒體的積極加入和助陣，更加溫了這池春水。1986 年下半年，國內思想界再度活躍起來。

進入 7 月以後，一篇篇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文章在報刊上發表，各種各樣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會在全國各地召開。參加討論的許多人

【110】此為《世界經濟導報》1986 年 6 月 30 日第一版一篇關於政治體制改革文章的標題。
【111】即意識形態工作的「寬鬆、寬容、寬厚」三原則。

認為，我國政治體制的主要弊端，就是鄧小平指出的「權力過分集中」。其主要表現是：以黨治國，在國家體制上，以黨的職能代替國家政權職能；在經濟和社會管理上，以黨委、黨的基層組織代替行政首長負責制和廠長、經理負責制；在幹部人事管理上，以「黨管幹部」代替用人單位的具體管理；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法制建設方面，則表現為各級黨委對同級人大、司法機關直接干預。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任務，要實現政治體制由高度集權向相對分權轉變，關鍵要實現以黨治國向以法治國轉變。

這些文章和討論確實提出了許多有重要理論和實踐價值的見解，反映了社會上大多數人對政治體制改革的企盼，也為後來由趙紫陽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提供了思想理論上的準備。當然，討論中也還有另外一類聲音，或明或暗地批評「四項基本原則」，揭露社會上的陰暗面，批評共產黨的腐敗，主張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和文化理念，要求加快政治體制改革，要求加速民主化進程。這其中比較知名的，有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112】、著名作家劉賓雁【113】、上海老作家王若望【114】等人。於是，一些持傳統政治理念的人就出來批判他們的觀點，將這種觀點說成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雙方開展了觀點上的交鋒。筆者認為，這種狀況很正常，作為一場理論探討，左中右觀點都會有，也應該允許發表，允許討論。而此時高層裏那幾位左的「意識形態專家」們似乎也無暇顧及到這些爭論。1986年9月即將召開的十二屆六中全會要通過一個《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他們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同胡耀邦、陸定一、萬里等人爭論要不要寫「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上面。雖然最後鄧小平出來一錘定音，「反自由化要搞20年」，但卻沒有波及到當時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討論。儘管兩種觀點隔空交鋒較為激烈，但總的說，還沒有產生大的波浪，討論仍然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112】方勵之（1936-2011）：浙江杭州人。天體物理學教授，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第一副校長。1987年因同情學潮中大學生的民主訴求被撤職和開除黨籍。

【113】劉賓雁（1905-2005）：吉林長春人。《人民日報》名記者。其1979-1987年間揭露社會問題的報道和報告文學作品，使他成為1980年代在中國有很大的影響作家及記者。1989年以後作為持不同政見者流亡美國。

【114】王若望（1918-2001）：江蘇省武進人。曾任《文藝月報》副主編；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被平反，任《上海文學》副主編，中國作家協會理事。1989年「六四」事件中被捕入獄14個月。

在那幾個月裏，不但國內報刊的總編們膽子大起來了，發了許多過去不能發、也不敢發表的東西，而且港台和國外的報紙對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討論、評論也開始多了起來，而且大多是善意的、持肯定態度的。

6 月 2 日，美國《華語快報》：最近幾年，中共在人事行政方面進行了若干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具有重要而值得肯定的意義。

6 月 18 日，美國《北美日報》：中國正在進行政治改革，但步子邁得不大，問題很多，還有漫長的路要走。但我們持樂觀的態度。

7 月 18 日，美國《美洲華僑日報》：政治上進行改革，才能為經濟改革奠定基礎，經濟改革所取得的成果才能鞏固。政治改革實為一切改革的基石。要四化，如果沒有政治上的現代化不為功。

8 月 3 日，香港《亞洲週刊》：眼下，鄧小平顯然決定全力以赴地進行政治改革。目前正處於為重大的體制改革作輿論準備的階段。中國領導人必須採取一系列措施來實行真正的政治改革，但現在已邁出了至關重要的一步。鄧已經使他的改革運動具有完整的形式。現在它將從經濟和政治兩方面著手。一方面，經濟改革已為政治改革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政治改革會把經濟過渡推向新的高度。

9 月 1 日，日本《朝日新聞》：在爭取建設鄧小平主任提倡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與否是能否實現現代化的關鍵，這是不可忽視的現實。政治體制改革的進展狀況如何，無疑是當前觀察中國形勢的一個重要因素。

除了對於政治體制改革進行總體上的評論以外，境外媒體也發表了許多對中國政治改革內容方面的評述和建議。筆者找到一份當年 10 月由新華社提供的一篇題為〈外國人怎樣看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參。當然，當時採寫這篇綜述的新華社記者顯然是戴著有色眼鏡解讀外報這些評論的，不知道高層領導們看到這份內參會後有怎樣的反應。現將其主要內容引述如下：

近幾個月來，國外對我政治體制改革的反應增多，評論涉及這一改革的原因、目的、內容各方面，觀點可說是毀譽參半。現將各國報刊發表的一些主要看法歸納如下：

一、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是保證經濟改革繼續進行

一位西方外交官說：中國領導人知道，如果經濟改革要去的進一步發展，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眼下爭論的不是是否要進行改革，而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和範圍。法新社說：一些主要改革者「要求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實行黨政分家」，這一要求是建立在這樣一種看法的基礎上：如果負責推行政治經濟改革的各級領導人沒有一定的自主權，經濟改革就無法進行下去。美聯社說：中國開始對其「根深蒂固而有不靈活的政治體制改革進行重要改革，其目的是保證經濟改革繼續進行」。

二、猜測我經濟改革遇到阻力，因而提出政治體制改革

美國《洛杉磯時報》說:「討論政治體制改革和容忍不同意見，可能是鄧小平和支持他的人今年遇到的一種奇妙的局面。中國的經濟改革嘗試『已由於黨內的抵抗』等原因而放慢。日本報紙也認為，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是因為經濟體制改革」因受到政治習慣和文化傳統的阻礙而沒有取得明顯效果」。

一些駐京的西方外交官認為，中國最近提出改革政治體制，反映了「黨內有一種思想意識方面的危機」，「存在著新近恢復名譽的謀利動機和馬克思主義純潔性之間的衝突」。外電認為，經濟改革遇到的阻力「主要來自黨內那些既不願意放棄權力，又不願意放棄十幾年來一直採用四平八穩工作方法的官員」。

三、政治體制改革將改革黨的工作方法，發揚民主，保持黨的領導權

英國《經濟學家》認為，經濟改革要取得成功，中國必須找出一種「以權力限制權力」的辦法。改革者們的意願是「要建立一種檢查和平衡制度，以防止在鄧之後，過於熱情的支持者或頑固的反對派使改革偏離軌道」。「鄧小平想改革的工作方法，而不是使黨面臨一種選擇或者失敗的可能；改革意味著仔細挑選黨的幹部和給黨員以較大的自由批評這些幹部，它不允許外人對黨的權威進行挑戰；關於社會主義民主的討論，不意味著普通中國人有權發表反黨言論。」

一位駐京外交官說：中國的改革者們可以接受對策政策的一些批評，但不能接受對他們的權利的批評。共產黨想表明，沒有任何人能壟斷真理，事實上，它將繼續壟斷著政治真理。許多外交官認為，改革派正在試圖減少黨對日常政府和經濟事務的干預，而不是黨的最高領導權。

四、猜測我正在研究西方「多元化體質」的某些做法

英《經濟學家》說；「黨政分家使得任何人都更難掌握控制全國的絕對權力。人民的監督這一新詞含義深長。」「這表明鄧小平的支持者們對西方多元化體質中產生的牽制、平衡的做法產生了興趣。」北京的學者們正在研究西方的一些做法：政黨的作用、中央和地方分權、議會和司法部門分權等。

美國《洛杉磯時報》說：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中「提出在權利方面實行相互制約和平衡的主張，可能是希望削弱黨的下層幹部中企圖保持對經濟控制權的那些人的權利。」日《朝日新聞》說，政治機構的雙重領導體制，即黨和政府兩個領導組織並存的現狀，使兩個組織的職能分工和職責不明，它是產生人浮於事、辦事無效率和官僚主義等的根源。

英報認為，黨的權威取決於良好的經濟形勢，如經濟出現搖擺，政治試驗可能再次失控而遭到壓制，如經濟和政治改革取得成功。中國可能實行「較大程度的自由化。」

六、體制內與體制外

在1986年年中以後的幾個月裏，鄧小平所吹起的政治體制改革之風對體制內、體制外都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在體制內，胡耀邦主持的中央書記處開始有所行動。據吳稼祥[115]《中南海日記》記載，1986年5月3日上午，中央書記處開會時，議論了政治改革問題。這是筆者所查到的鄧小平再次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之後，中央高層較早的一次議論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會上，在幾位主要領導的講話中，都談到，要對進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有清醒

【115】吳稼祥（1955-），安徽銅陵人，知名學者。1986年3月由中宣部調入中央書記處辦公室，後擔任政治組副組長、組長。曾參加鮑彤主持的中共十三大報告起草工作。1989年因反對六四鎮壓憤而退黨，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出獄後赴美，2003年回國，成為自由學者和獨立撰稿人，著作頗豐。

的認識。胡耀邦說，沒有民主監督，就要腐敗。胡啟立[116]說，沒有政治上的民主，就沒有政治上的清廉。雖然當時中央的這些領導人們對「政治改革改什麼，怎麼改，也不清楚」，「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書記處決定要進行政治改革」。

5 月 14 日，胡啟立向中央書記處辦公室[117]談了他對談政治體制改革調研計劃的意見。他說，「題目太多太泛了些，怕抓不實。不是先有模式再改革，而是解決現實困難，現實問題，逐步摸索，逐步完善。計劃要有行動感，實踐感。要抓政府機構設置問題。戈爾巴喬夫砍掉了幾十個部，精簡掉十幾萬人下企業。我們行不行？指導思想要解決，光撤廟不行。當然還要抓黨的機構設置問題。黨管幹部，各部委管多少，管什麼，組織部門管多少？現在批幹部，都是閉著眼睛批，都不認識，仲勳（習仲勳[118]，當時的書記處書記分管幹部）不認識，組織部不認識，閉眼睛劃圈。我們要有省部級第三梯隊名單，要掌握一批人，要熟悉幹部。現在的幹部根本減不下來，精簡一次，增加一次。」吳稼祥在他的書中這樣評論說，「他談的不是什麼政治體制改革，頂多是幹部制度和機構改革。」[119]這種情況也很自然。鄧小平剛剛重提政治體制改革，中央處於一線的領導人，還大都摸不著頭腦，缺乏必要思想準備，不知道鄧小平到底是什麼意思，政治體制改革要改什麼，怎麼改。所以即使談到這個問題，也只能泛泛而已。

據吳稼祥記載，6 月 27 日，中央書記處書記、中辦主任王兆國向中央書記處辦公室負責人陳進玉傳達了鄧小平 26 日的一篇談話。這篇談話是在聽取喬石關於端正黨風的彙報之後說的。鄧小平指出，今年一季度經濟增長率下降，有人為的因素。我們要下放企業權力，他們在那裏辦公司，要收權。這說明，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不行。一切

【116】胡啟立（1929–）：陝西榆林人。1985-1987 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1987-1989 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89 年「六四」事件中胡啟立不支持武力鎮壓學生，因而被免去政治局常委職務，保留中央委員。

【117】中央書記處辦公室為中央書記處的辦事機構，後來改稱中央辦公廳辦公室，在胡耀邦辭職以後，又改稱中央辦公廳調研室。

【118】習仲勳（1913-2002）：陝西富平人。1956 年當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1959 年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1962 年後和文革中受政治迫害。1978 年後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1981 年被增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 年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1988 年當選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1993 年退休。

【119】以上見吳稼祥：《中南海日記》第一部分，第四節，「政治改革研討進入操作階段」。

改革的成效，取決於政治體制改革，各項改革都要人進行。從現在開始，政治體制改革要抓緊進行，到13大之前，要搞出個東西來。這段話，大概是鄧小平最早明確提出，在黨的十三大上要討論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鄧小平從1986年初以來，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感覺越來越迫切。在同新西蘭總理朗伊、希臘總理帕藩德裏歐和澳大利亞總理霍克三個外國領導人的三次談話中，都強調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6月10日，他召集紫陽等人彙報經濟情況，再一次明確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問題，認為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改革將無法進展。加上這一次，在短短半年時間內，已經5次提出了這個問題。而且一次比一次提得緊迫。【120】

7月17日中央辦公廳決定，由書記處辦公室成立一個「政治體制改革資料編輯組」，由書記處辦公室政法組負責人陳福今牽頭，吳稼祥實際負責，抽調6個人參加。資料分六個部分：黨政分工、幹部制度、法制、民主、機構和總論。選材範圍包括中央文件、領導人講話、調查報告、理論論著或文章、會議材料、內部情況反映和翻譯材料等等。資料對上述主題要從多方面論述或進行分析，比如歷史沿革、中外比較、現狀分析、以往改革的成敗及其原因分析、當前改革的設想（近期或中長期目標、條件和制約因素、實施方法和步驟，等等）。每個方面編一本，供中央領導參閱，約15萬字左右。

紅牆內開始有了動作，牆外更是熱火朝天。由於鄧小平公開講了要搞政治體制改革，當時的報紙、刊物這方面討論也比較放得開，比如當時的《世界經濟導報》連篇累牘進行了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的報道，在社會上也形成了這樣一個潮流，大家都在研究並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把政治體制改革提上日程的呼聲越來越高。

在寬鬆的政治氣氛下，國內理論界展開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大討論。據後來有人統計，在此半年內，僅在全國性報刊和理論刊物上發表的相關文章就達六百餘篇，召開的全國性的大型理論討論會達20多次。在媒體上發表文章，和參加各種討論會的人員包括了方方面面，有體制內的，也有體制外的；有來自大專院校、各級黨校的年輕的理論工作者、學生，也有資深的學者、專家；有來自黨政機關的官員，

【120】參見吳稼祥：《中南海日記》第一部分，第六節，「鄧小平下旨：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也有官辦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員；有從事文化啟蒙工作的文化人，也有因其政治主張而長期受到壓制甚至迫害的異見人士。僅就筆者現在還記得的，就可羅列出幾十個名字，比如：著名的法學家龔祥瑞；知名政治學者高放、趙寶煦、嚴家其、張顯揚；中央黨校的教授沈寶祥、杜光、崔佩亭、王貴秀、董新民、李思溫；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的楊百揆、陳兆鋼；中央機關的於浩成、崔武年、王彥君、米賀都；筆者的中央黨校研究生同學遲福林、王龍江、郭夏、李牧、韓康、李忠傑、馮侖、黃海、王仲田、王明珠、聶高民、李永春、羅健；幾位在讀的高校研究生榮劍、吳知論、王勤峰、徐秀義、甘藏春、沈榮華；還有當年參加過西單民主牆運動的資深民主「運動員」陳子明、王軍濤、李盛平、閔琦等。這些人當中，有幾位後來成了我在中央政改辦的同事；有幾位後來下海經商；也有些人進入、或者是離開了中央國家機關；還有些人在 1989 年的那場民主運動之後，吃了許多苦，但不知悔改，至今仍然活躍在中國民主事業的隊伍裏。

在筆者的筆記本中能查到的，1986 年筆者參加過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會有這樣幾次：

4 月 28 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舉辦的「政治體制改革座談會」，會期兩天，有在京的政治學、法學界 30 多人參加。與會人員在例舉了中國政治體制的多方面弊端之後，一致呼籲，盡快啟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

5 月 16 日至 17 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社會科學論壇和《政治學研究》編輯部共同發起召開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與發展」討論會。參加會議的共 80 多人，參會人員以青年理論工作者為主，著名學者李慎之、許崇德、龔祥瑞也參加了會議。多數與會者建議，應當把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研究工作盡快提到日程上來。他們認為，政治體制改革對全面改革能否成功關係極大。幾年來，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經濟體制改革中所面臨的一些障礙說明，如果只搞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不改革，那末經濟體制改革也難以深入發展，甚至會影響現有成果的鞏固。同時，還應看到，政治體制改革是一項艱巨而複雜的社會工程，需要深入實際進行調查，進行填密的科學探討和比較研究，做好思想的、理論的準備。

7月10日至12日，由中共中央黨校理論部政治體制改革研究組發起和組織的大型「政治體制改革理論研討會」在中央黨校舉行。這個會，是在1985年夏季中央黨校理論部200多位研究生進行中國政治體制大調查的基礎上進行的。中央和北京市黨政機關、理論界和中央黨校近200人參加了會議。會議上有人提出了一個「改革動力說」，認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直接動力，來自權力過分集中的政治體制與商品經濟發展的矛盾。而要解決這一矛盾，必須實現政治體制由高度集權向相對分權轉變，從以黨治國向以法治國轉變，黨的領導從直接領導向間接領導轉變。中宣部部長朱厚澤在會議結束時講話。這個會議，由於在名義上是由中央黨校主辦，規模較大，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重視，國內外的媒體也都對它進行了大量報道。

10月10日，中央黨校進修部、《理論動態》編輯部聯合召開「政治體制改革座談會」，山西省委副書記王建功、遼寧省委組織部長徐廷生、大連市委副書記於學祥等在中央黨校學習的一部分省、地級官員參加了這次座談會。會上，與會者集中分析了當前政治體制的弊端，強調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有幾位發言者特別提出了「領導幹部再認識」的問題，他們說，對我國政治體制的再認識，是一個自我認識的過程，也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它包括我們黨的自我認識，政府的自我認識，從上到下各級領導幹部的自我認識。只有在「再認識」的基礎上，才能形成廣泛的社會輿論，使正確的改革認識變為人們的自覺行動。

11月4日至6日，在鄧小平反覆多次發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的談話這樣一個背景下，由中央黨校政治體制改革研究組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社會室聯合舉辦的「鄧小平政治體制改革思想和三中全會以來改革實踐」專題研討會，在北京的解放軍國防大學舉行。這次會，通過對鄧小平政治體制改革的研究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實踐的總結，較為廣泛和深入地討論了政治體制改革中的一些重大問題。與會者對鄧小平政治體制改革思想的提出、形成過程和主要內容，提出了各種見解，探討了三中全會以後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的進展、經驗和不足，認為，八年來所進行的一些改革，不足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調查研究不充分；二是理論準備不足；三是方案設計不夠；四是立法保證不充分。與

會者大都認為，目前的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勢頭很好，希望中央抓緊制定改革總體方案，爭取在十三大以後全面實施。

從當時社會上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研究的總體情況看，無論體制內外，對加速政治體制改革的強烈要求是一致的，這一點，與鄧小平的主張並不矛盾。然而在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途徑、方式等方面，體制內外的一些人與鄧小平的主張，也就是與中共官方的調子當然也有許多不同。這種不一致，分歧的焦點就在於要不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於要不要改變共產黨一黨專政，建立多黨政治和西方式的議會民主政治上。在各種研討會上，或是在公開的討論文章和表態中，即便不贊成四項基本原則，但出於當時政治上的壓力和各種考慮，有許多人並沒有在討論中直接亮明這種觀點，說得大都比較隱晦；當然也有少部分人公開打出了多黨制、三權分立、議會民主的旗幟，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王若望、方勵之、劉賓雁等。但是，在當時比較寬鬆的政治氣氛下，這種與中共官方完全不同的對政治改革的看法，雖然引起了中共黨內一些敏感人士的擔心，但是還暫時沒有受到過分的抑制與打擊。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仍然在如火如荼地進行。

七、「中央黨校政治體制改革研究組」

在前面文中，提到了中央黨校幾次研討會的主辦者「中央黨校政治體制改革研究組」，筆者想重點說一說它的由來和活動情況。

1983—1986 年，我在中央黨校讀研究生。我上大學時學的是政治教育專業，畢業論文選的題目是《三權分立與「議行合一」》【121】，因此，到中央黨校以後，我一直在做中國政治體制方面的研究。我覺得，我學的是這個專業，就要用它為這個國家的政治民主化做點事情。那時候，中央黨校的研究生分成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中共黨史、黨的建設五個專業，83、84 兩個年級共 300 多名來自全國各地的研究生學員。由於這五個專業都與中國政治密切相關，加上中央黨校學員自身全部都是中共黨員的特點，所以黨校的研究生們大都對政治體制改革十分敏感和關注，許多人都在積極研究這方面的課題。

【121】見《中國社會科學・未定稿》1986 年第 1 期。考慮到原標題較為敏感，編者將其改名為〈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基本結構探討〉。

1984 年冬，我和遲福林、王龍江、郭夏等幾個在學生科研活動中比較活躍的同學組成了一個鬆散的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小組。在幾次校外活動中，與當時的國家體改委下屬的中國經濟體制研究所所長陳一諮【122】、聯絡室的張鋼【123】、社會室的王飛欣【124】等人陸續相識。此時，經濟體制改革與舊有的政治體制，特別是政府管理體制的矛盾已經顯露出來。體改所對我們在黨校研究生中組織政治體制改革的學術科研活動十分支持，表示願意資助我們搞一些課題。1985 年放暑假之前，我們考慮，要研究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就必須對現行體制的現狀有一個瞭解，就提出準備發動同學們利用中央黨校學員這個身份，放暑假回到家鄉各地，搞一次全國性的中國政治體制現狀大調查。這個想法得到了中央黨校理論部領導和體改所的支持。這樣，我們就分工由遲福林等人負責在同學們中發動和組織，我和王龍江等撰寫調查提綱和調查問卷。報名參加的有 200 多位同學，調查在全國 20 幾個省進行，同學們按照家鄉所在的省份劃分成小組，並指定了組長。在大家出發前，我們還分別組織了培訓。

8 月底，同學們帶著調查成果陸續返回了北京。大家反應，由於我們是帶著中央黨校的介紹信下去的，各省的各級黨政機關對我們的調查大多十分重視並給予了支持。在進行調查成果匯總基礎上，我們先是組織了四個調查報告起草組，按照「黨政關係」、「黨政機構和運行狀態」、「幹部制度」、「基層民主狀況」四個方面起草了調查的分報告，然後又由遲福林、吳偉、王龍江、聶高民等幾個人匯總，共同執筆起草了一個題為《關於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初步設想》的總的研究報告。

這份報告，從現行政治體制的弊端說起，分專題談了深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客觀基礎、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和中心環節、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政治體制改革的近期任務和基本對策、政治

【122】陳一諮，中國經濟、政治改革中的風雲人物。文革後期開始做中國農村問題調查。1980 年開始組建中國農村問題研究組。1984 年在鮑彤支持下組建隸屬於國家體改委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任所長，國家體改委委員。1986-1987 年在鮑彤主持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負責日常工作。1989 年六四後，因組織「三所一會」支持趙紫陽的主張、反對武力鎮壓學潮而受到通緝，被迫流亡美國。

【123】張鋼，曾任《經濟學週報》負責人，中國經濟學團體聯合會（簡稱經團聯）聯絡人。1984 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成立後，任聯絡室主任。

【124】王飛欣，時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社會室主任。

體制改革的原則和方針等六個方面。幾個分報告和總報告從形成到定稿，前後大約用了三、四個月的時間。1986 年春天，我們將四個分報告作為附件，連同總報告一起報送給了中央黨校和國家體改委。據說國家體改委對這個報告十分重視，並發表在了他們上送的內參上面。

我們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小組幾個人組織的這次全國政治體制大調查的成果，在中央黨校高層內部倒是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當時的中央黨校從上到下大都比較保守，一些人認為這個題目十分敏感，甚至有人放風說，這種活動有「資產階級自由化」之嫌。當時中央黨校的校委委員、副教育長史維國已經調來擔任理論部主任，他對我們的活動表示了支持和理解。就這樣，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小組堅持了下來。這次大調查，倒是在全國各地產生了或大或小的影響。中央黨校派了200 多人到全國各地搞政治體制調查，使許多地方領導都感到震動，他們在私下裏紛紛猜測中央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是不是要搞什麼大動作了。這種效果是我們在一開始沒有料想到的，可以說它等於是為即將開始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和後來由中共中央啟動政治體制改革作了一次前期的鋪墊。

此後，我們這個「中央黨校政治體制改革研究組」在中央國家機關和北京的理論界開始有了一些影響。在這次大調查的基礎上，我們又籌備了 1986 年 7 月在中央黨校召開的大型政治體制改革研討會。說來也好笑，這個研討會在召開的邀請函上並沒有亮出它的主辦單位，只是明確了開會的地點：中央黨校；會後的新聞報道中，也只是說「政治體制改革研討會在中央黨校召開」，卻沒有主語，誰召開的？不知道。這樣做，我們也是無奈之舉。會前，我們曾經向校方提出，可否以中央黨校的名義舉辦，可黨校有關領導死活不同意。我們理解，他們一方面是沒有得到上邊的指示，不敢做這種在國內外都會產生重大影響的動作；另方面也是擔心，這個題目十分敏感，搞不好會被戴上「資產階級自由化」自由化的帽子；還有一點，他們也是擔心怕我們鬧出什麼亂子，不希望承擔這個責任。但是從我們方面來說，這個會必須在中央黨校開，否則就不會有那麼大的號召力和影響力，我們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就不能最大化的實現。我們的這一想法，得到了由杜光老師擔任主任的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的大力支持。在他的幫助下，我們與校方達成的一致，就是不准用中央黨校的名義，但可以在

學員放暑假後使用校舍和會場。正好在6月的時候，鄧小平在見外賓時發表了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談話，這對我們正在緊張籌備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會，當然是一個巨大的利好，使我們進一步取得了校方的支持。我們又向中宣部部長朱厚澤發出邀請，請他到會講話。他爽快地答應了。朱的出席，使中央黨校的領導也不得不答應作為主人，陪同朱厚澤一起參加會議的閉幕。我們這樣做的目的，一方面當然是希望擴大影響，有盡可能多的在京各大單位、各大研究機構的學者專家到會，共同交流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看法；但另方面，也是希望能盡可能地擴大會議的影響，並借這次會議之機，推動一下政治體制改革，使之盡快啟動。會後，從各大媒體對會議的報道，和高層機關對會議的反映來看，我們的目的可以說完全達到了。

1986年10月，遲福林代表我們中央黨校政治體制改革研究組，在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的內部會議上，彙報了兩年來中央黨校研究生搞政治體制改革研究的情況。政改辦的內部刊物《內部資料》也刊發了幾個月前我們召開的那次研討會的紀要。此後，我和遲福林就離開了中央黨校，被調到剛剛成立的中央政改辦工作，開始參加了在趙紫陽、鮑彤直接領導下的官方正式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工作。中央黨校政治體制改革研究組，則繼續保留了下來，由中央黨校的幾位教授和同學主持，繼續活躍在中央黨校這塊陣地上。後來，他們在這個小組的基礎上，組建了中央黨校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專題組，正式承擔了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交辦的改革研討任務。這就是後話了。

第三章
「政治體制改革要有一個藍圖」

1986年9月，鄧小平提議，設計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第一個藍圖的工作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趙紫陽主持，由此開始了為期一年的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工作。按照吳國光博士在他的《趙紫陽與政治改革》一書中的劃分，整個研討工作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確定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涵義、目標、重點和基本原則，可稱為「總體研討階段」，大體上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第二階段是「專題研討階段」，是深入進行專題研討並形成決策的過程；第三階段，則側重廣泛徵求意見，形成政治決策，是「政治決策階段」【125】。筆者原則同意這種劃分。當然，這中間還有1986年底到1987年5月的那場來勢洶洶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干擾，也佔去了相當的時間和精力。從本章開始，筆者將把這幾個階段的研討過程逐一展開，加以回顧和介紹。

一、開場的鑼鼓：「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及其辦公室的成立

早在1986年6月10日，鄧小平在聽取經濟情況的彙報時，就要求中央書記處「考慮一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允許用年把時間搞調查研究，把問題理一理，把主意拿好，然後再下手」。【126】此後，由胡耀邦主持的中央書記處，動員中央書記處辦公室的力量，開始收集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的資料，研究這方面的問題。

【125】參見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97年8月版，第48頁。
【126】《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64頁。

6月26日，鄧小平在聽取喬石【127】關於端正黨風的彙報之後再次提出，從現在開始，政治體制改革要抓緊進行，到13大之前，要搞出個東西來。【128】

9月13日上午，鄧小平聽取趙紫陽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彙報當前經濟情況和明年改革方案時，就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再次講了幾點意見。他說，政治體制改革，首先是黨政分開；其次是權力要下放，解決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第三是精簡機構；第四是提高效率。趙紫陽插話說，社會上也有人主張加強權力機關，解決權力機關與黨委和政府的關係。也許是鄧小平對加強權力機關非常敏感，他立即說，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過去我們那種領導體制也有好處，決定問題快，如果過分強調搞互相制約的體制，可能也有問題。趙紫陽又說，從最近材料看有三種主張：一是主張搞多黨制，改變一黨執政；二是主張首先解決權力機關與黨和政府的關係問題；三是主張首先解決黨政分開的問題。鄧小平說，由那就由紫陽同志主持議一下。

這就是說，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趙紫陽主持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工作，是鄧小平親自決定的。趙紫陽的秘書李樹橋【129】後來對筆者說：「要趙紫陽主持政治體制改革這個事，是鄧小平個人安排的，根本沒有通過中央常委會、政治局會什麼，什麼會議也沒有，就是大家都明白，小平說的就算。」

鄧小平這個決定出乎大多數人的意料。按理說，政治體制改革是一項涉及黨和國家政治制度和體制的全局性大事，應該由黨中央的總書記胡耀邦直接主持，而且胡所主持的中央書記處已經對這項工作有所準備。可耐人尋味的是，鄧小平這次卻沒有按常理出牌，反而把它交給了國務院總理，當時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的趙紫陽。李樹橋曾經問過趙，為什麼要趙來搞這個研討小組？趙紫陽的回答是：「小平同志讓我做，我就做唄。」

【127】喬石（1924-）：浙江定海人。1985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政法委員會書記。1986年，兼任國務院副總理。1987年任十三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1989年「六四」事件中態度中立。

【128】吳稼祥《中南海日記》第一部分，第六節，「鄧小平下旨：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129】李樹橋（1944-）：河南內黃人。曾在《紅旗》雜誌工作多年。1986-1989年任趙紫陽秘書。

鄧小平為什麼會作出這樣一個決定？當時和後來有人曾作出過各種解讀，但沒有任何資料可以佐證。但是，人們從這種安排中，已經不難解讀出，即將召開的黨的十三大上中央人事安排可能發生的重大變化。

1986年9月18日，趙紫陽召集中央政治體制研討小組的幾位成員開會，研究如何開始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工作。這個會，宣告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設計工作在趙紫陽的主持下，正式啟動。時任總理辦公室負責人。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的鮑彤列席了這次會議。會後，趙紫陽給鄧小平和中央常委寫了一封信，信的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成立中央政治體制研討小組，成員為5人，趙紫陽、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等4人；另外加上彭沖【130】，因為彭沖是主持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的副委員長。

第二，這個小組定名為「研討小組」，是因為它不是權力機構。研討小組的職責是：為政治體制改革探討思路和設計藍圖，提供中央政治局常委決策。要在明年10月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前，把有關政治改革的頭緒理清楚。在這之前，研討小組應當向政治局常委作幾次階段性的彙報。

第三，在小組下設辦公室，人員力求精幹。辦公室應當組織一批人認真地閱讀材料，自己也應該認真閱讀材料，並選擇其中最重要的材料向小組推薦。應當有計劃地召開一系列座談會，自己也要座談，並把議論的主要內容向研討小組報告。

第四，辦公室由鮑彤、嚴家其、賀光輝負責。負責人以後還可以增加，但不超過7人。授權辦公室挑選10到20名有研究能力者組成工作班子。將來確定專題之後，再組織專題研究班子。

第五，辦公室成立之後，即應緊張工作。在最初的1個月內，要搜集國內外關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各種議論，提出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涵義和重點的基本看法。研究的著眼點應是：一、有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二、有利於加快我國的現代化建設。

這封信，是趙紫陽在會後委託鮑彤起草的。據鮑彤回憶，趙紫陽當時還和他說：「原來這個小組的名字叫『中央政治體制改革領導小組』，是我建議還是叫『研討小組』好。我們這個小組只研討，不決

【130】彭沖（1915-2010）：福建漳州人。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策。」名為「研討小組」，這在中共歷史上好像從來沒有過。記得筆者當時也曾為此問過鮑彤，他解釋說，政治體制改革這樣的大事，決策是中央政治局、中央全會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事情。研討小組的工作就是提供資料，起草文件，供中央決策，當然只能叫「研討小組」，不能叫「領導小組」。而且，小組的名字前面，不冠以「中共中央」四個字，而只稱為「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以表示研討的範圍，不僅限於黨內，而且包括黨外。

鮑彤在接受了主持研討小組辦公室（簡稱中央政改辦）的任務以後，立即開始了辦公室的組建。10 月 4 日，他召集辦公室的其他三位負責人周傑【131】（前信發出後，由鮑彤建議增加）、嚴家其、賀光輝，以及被調來主持辦公室日常工作的陳一諮、陳福今【132】開了一個辦公會，研究了各方面的具體工作，並商定，每個人都可以向辦公室推薦研究人員。鮑說他只推薦一個，就是人民日報的評論員吳國光。陳一諮則推薦了當時在中央黨校讀研究生的遲福林和已經畢業的我。直到今天，我一直很感謝陳一諮的推薦，他使我在中央政改辦一開始組建的時候，就有幸參加入了這個團隊，參與了這次在中國改革史上產生重大影響的政改方案研討工作。它或許影響了我的一生，使我後來受了許多磨難，但我至今不悔。

10 月 6 日下午，研討小組的成員胡啟立、田紀雲在中南海聽取了鮑彤所作的研討小組辦公室籌備工作的彙報，並對辦公室的工作方式和研究進度提出了明確的要求。辦公室的幾位負責人周傑、嚴家其、賀光輝和陳一諮等出席。

10 月 7 日，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召開了組建後的第一次全體人員的會議。除了幾位負責人外，有借調到位的 6 名研究人員參加。我也是由這次會開始，加入了這個團隊，也第一次見到了名聞已久的鮑彤。

【131】周傑（1929-2005）：江蘇阜寧人。1979 年調入中共中央辦公廳，1983 年任中辦副主任，曾長期在胡耀邦身邊工作。1986 年 10 月作為四位負責人之一，參加鮑彤主持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工作。1987 年 12 月兼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1988 年 9 月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

【132】陳福今（1941-）：雲南石屏人。1986-1990 年任中央辦公廳調研室副主任。1986 年 10 月經胡啟立推薦，參加鮑彤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參與主持日常工作。1993 年任中辦副主任。1999 年任國家行政學院黨委書記、常務副院長。是中共第十六屆中央委員。

在這次會上，鮑彤首先宣佈了研討小組辦公室正式成立。在介紹了研討小組的組成和任務之後，他說，紫陽前幾天在研討小組成立的會上說，「這件大事解決了，可以去見馬克思了」，可見他對這件工作的重視程度。今天宣佈辦公室成立，要立即展開工作。這個辦公室，從現在開始到明年十三大，生命大概只有短短的一年時間，我們要拿出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意見，起草出文件，並經中央政治局、中央全會通過，提供給十三大，時間緊迫。我們這個辦公室是為研討小組服務的，工作是搜集資料、閱讀材料，議論問題，組織各種座談會。至少每個月要向研討小組提出一次報告。

鮑彤還說：我們的研究可以無禁區，討論中大家怎麼想的就可以怎麼說，沒有任何打棍子扣帽子這些東西，但是宣傳有紀律。政治問題很敏感，國內外、黨內外都很關注。研討小組的成立並沒有佈告周知，也沒有宣傳、擴散這方面問題的任務。因此我們要強調保密紀律。紫陽講了要「滴水不漏」，因為我們現在是中央正式的研究政治體制改革的班子，如果中央還沒有決策就洩露出去，會造成黨內社會上的混亂。誰洩露出去誰就要負責任。

中央政改辦的工作地點，設在了北京地安門西大街38號，中央辦公廳招待所【133】。剛開始時，研究人員只有孫方明、吳國光、遲福林、吳偉、呂長春、李丹鋼、周大力等7個人【134】。另有陳一諮、陳福今負責日常組織工作，起著秘書長角色的，老鮑合稱他們為「二陳」。從這個集體成立那天開始，鮑彤就給大家立下了規矩，部長級的領導也好，普通辦事員也罷，相互之間不必稱呼職務，可只稱姓氏，年紀大的就尊個「老」字。對他，大家稱為「老鮑」即可。這樣，一下子就拉近了大家之間的感情和距離。在開會討論時，也沒有了上下級之感，可以放開了爭論。政改辦的良好風氣，就是由此而來的。

成立的會開完以後，全體研究人員馬上都集中到了中辦招待所，每人一個房間，開始了第一階段的工作。

關於中央政改辦的內部分工、運行方式和各自承擔的主要工作，在10月13日的辦公室全體人員會議上作了進一步的明確。此後每週

【133】現金台飯店舊址。

【134】後來陸續增加到近30人。這些研究人員的個人情況，請見本書附錄，不再單獨加注。

二、五下午為辦公室例會時間，除了極特殊情況外，雷打不動。按照紫陽和研討小組其他領導的意見，政改辦的主要職責是：溝通情況，收集信息；組織調研和協調研究；進行總體設計；處理中央領導同志交辦的事務。按照上述職責的需要，幾位領導決定，全室人員劃分成聯絡、信息、秘書和行政等四個組。指定我和吳國光為秘書組，負責秘書、綜合工作，擔任綜合性的文字起草和處理，簡報的編發；李丹鋼和遲福林為聯絡組，負責對外聯絡、組織調研和掌握動態；呂長春和周大力組成信息組，負責建立信息渠道，收集書面資料和分析整理。一個多月後，各專題研討小組成立，辦公室的人員也逐漸多了起來，這時辦公室又根據需要，及時調整了內設機構和人員分配。

根據會議討論的意見，主要是老鮑和辦公室其他領導的意見，中央政改辦對外和對內編發兩種內部刊物。一種是對上的，叫《研討情況》，由老鮑親自簽發，到研討結束時，共編發了80期。發送的範圍，開始時是送研討小組的五位領導同志，並發室內研究人員。後來大概是根據紫陽的意見，加送全體中央政治局常委。1986年12月各專題研討小組成立後，從第24期開始，又將發送範圍進一步擴大到「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國務院、中顧委、人大常委會有關領導同志」。另一種是內部資料性的，名字就叫作《內部資料》，由「二陳」簽發，前後共編發92期。一開始是僅發給本室研究人員，後來擴大到中央常委秘書、研討小組同志秘書，和各專題研討小組辦公室。發給秘書的目的，就是請他們斟酌，如果認為有必要，可送領導同志一閱。

在政改辦剛剛成立的時候，兩手空空，急需收集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的各種資料。為解決這個問題，辦公室開了兩次會進行專門研究。最後確定了這樣幾條。一是向向中央和國家機關的研究機構求援。比如全國人大、政協的辦公廳、研究室，中組部、統戰部、中聯部的研究室，中央黨校的圖書館。特別是中央辦公廳辦公室，後來給了我們很大支持。前幾個月耀邦要他們著手研究政治體制改革，已經收集了大量資料，我們採取了「拿來主義」。在這裏，大家不約而同地避開了中宣部、書記處研究室，現在想來，大概是心照不宣吧；二是向各新聞媒體求援。比如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等黨報的內參、世界經濟導報，經濟學週報、人民大學的報刊複印資料等等；三是請中辦出面，向一些駐外使館和港澳工委發電報，請他們協助收

集海外對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的反應，以及各國政治體制的資料，包括蘇聯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也包括歐美和日本等西方發達國家。另外，政改辦還希望大家推薦在資料收集和管理方面有專長的同志，準備設立專門的資料室，為研究工作提供資料上的保證。

二、連續的座談會：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

政改辦第一階段的工作，按照老鮑在政改辦成立會上所說，就是「集中力量，收集和研究國內外各種議論，提出對政治體制改革涵義、重點的初步看法。這個看法，不是根據我們腦子裏的東西提出來的，而是要在閱讀大量材料基礎上，經過消化和研究提出來的。研究的著眼點，是有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有利於我們的現代化建設。」這就是說，我們的工作，不能從腦子裏已有的東西出發，而是要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而在當時條件下，既不能在媒體上公開徵集，又不能在太大範圍內公開收集，那麼，聽取意見的最好方法，除了收集各方面的文章、資料外，就是開座談會了。座談會的具體開法，老鮑的意見是：「理論工作者的會要開，但更多的要找一些搞實際工作的同志座談。要針對不同對像出不同的題目。讓大家擺一擺不利於長治久安、不利於現代化建設的因素，從弊端談起，講一講政治體制改革的涵義和重點。這樣讓大家有話可講。開座談會，辦公室全體研究人員沒有特殊情況，一律參加。」

從10月10開始，政改辦連續密集地召開各種座談會。據筆者的記錄，在第一階段研討的一個月時間裏，以政治體制改革的涵義、範圍、重點為題，由中央政改辦主辦的各個方面的座談會共8次，共11個半天，到會並作發言的各方面人士有近百人次。另外，還派出有關人員參加了外單位的幾次座談會。

這些座談會的大體情況如下：

10月10日上午，請中央黨校出面組織的進修部教師和學員座談會。鮑彤主持，中央黨校副校長陳維仁、副秘書長史維國、理論動態沈寶祥，學員山西省委副書記王建功、重慶副市長於霰夫、廣州市副市長劉念祖、雲南省委副書記朱志輝等參加座談。

10月11日，中央黨校政治體制改革研究組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在國防大學聯合召開政治體制改革座談會。政改辦全體研究人員參會。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中央黨校等單位的

知名學者高放、龔祥瑞、李景鵬、金春明、沈寶祥、黃達強、李思溫、周逸、崔沛亭、董新民等作了發言。

10月16日下午，全國總工會座談會。周傑主持。全總有關領導及研究室負責人參會發言。

10月17日下午，中共黨史專家座談會。周傑主持，鮑彤參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廖蓋隆，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逄先知，黨史專家王洪模、何進修，解放軍總參二部官員陳曉魯等作了發言。

10月18日上午，新聞界座談會。鮑彤主持。《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紅旗》雜誌、新華社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負責人李慎之、吳元富、楊逢春、朱承修、楊尚德、陶愷發言。

10月21日，國務院有關部門座談會。鮑彤主持。國家計委秘書長馬李勝、國家經委副主任盛樹仁、國務院經濟發展研究中心黨委書記吳凱泰、國家科委副主任吳明瑜，以及勞動人事部一位處長到會發言。

10月23日上午，與聯合國官員默罕默德·法齊博士座談。本室陳福今等五人參加。

10月23日下午，中央黨校進修班黨員座談會。由周傑主持，鮑彤參會。正在中央黨校學習的河南省委副書記劉正威、遼寧省副省長聞世震，及上海市委常委孫貴璋、湖南省副省長俞海潮、貴州省副省長劉玉林等參會並發言。

10月25－26日兩天，各省市負責人座談會。研討小組成員胡啟立到會聽取發言並講了話。會議由鮑彤主持，周傑參會。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遼寧省長李長春、山西省委副書記王建功、廣州市委書記許世傑、重慶市委書記廖伯康、哈爾濱市長邵奇惠、江蘇省委組織部長顧浩、國務院副秘書長白美清等到會並發言。

10月28日上午，中共中央各工作部門座談會。周傑主持。中組部副秘書長鄭科揚、中宣部副局級調研員陸慶賢、中央統戰部研究所副所長賈鋌、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室務委員蘇沛、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劉堪參加會議並發了言。

10月30日下午，司法部門座談會。會議由鮑彤、周傑主持。中央政法委研究室副主任黃傑、公安部副部長俞雷、司法部辦公

廳主任李必達、民政部幹部處處長林平、高法刑二廳廳長孫琬鍾、高檢人事二廳兩位副廳長出席會議並發言。

11 月 1 日、3 日，駐外大使座談會。會議由鮑彤主持。幾位前任和現任駐外大使、駐聯合國大使肖向前、陳肇源、楊導正、王浩、陳魯直、淩青等出席並發言。

此外，辦公室還準備了蘇聯東歐問題座談會、幹部人事問題座談會等。因 11 月 4 日接趙紫陽辦公室通知，7 日研討小組將召開會議，聽取辦公室的第一次工作彙報，所以後面的座談會只好推遲。

從上面簡單羅列的這些座談會的情況中可以看到，聽取意見的面十分廣泛，有理論工作者，也有實際工作者；有中共中央各機關、國務院各綜合經濟部門的領導和工作人員，也有各省市的地方大員；有搞經濟工作的，也有搞黨務工作、黨史研究的；有國內的，也有外交界的，甚至是國外的；有司法界的，也有新聞界的，還有人民團體——全國總工會的。來自這樣多方面的與會人員，從各自的角度，結合自己的工作，或深或淺，談了對中國政治體制中的各種弊端的看法，同時發表了對政治體制改革涵義、目標和重點的意見。在一些會上，一些出席者還對黨政分開、機構改革、權力下放、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等問題談了自己的觀點。這些意見，應該說，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吳國光在他的書中記述說：「每次座談會之後，政改辦都整理出相關的材料，上送中央研討小組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用周傑的話來說，這是『給領導下點毛毛雨』，讓他們逐漸瞭解社會各界對於改革的看法，熟悉有關政治改革的設想。鮑彤、周傑在親自主持座談會的時候，往往也把每次座談會的『點睛』內容提出，讓政改辦秘書組（後來是綜合組）形成文件上報。比如說，在舉行了三次座談會之後，政改辦於 10 月 21 日下午的例會上，專門由秘書組吳偉、吳國光對已經舉行的座談會內容作出綜合評介，進一步形成如何改革的看法。」【135】正是通過這種不斷開會、不斷整理、不斷上報、不斷點評、不斷歸納的方式，政治體制改革的涵義、目標和重點，在我們的腦子裏開始逐漸清晰起來。

【135】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1997 年 8 月版，第 72 頁。

三、政改辦例會：沒有框框的討論與爭論

在這段時間裏，政改辦除了召開各種討論會以外，堅持在每週的二、五下午召開內部例會。這種例會，實際上就是內部討論會。大家通過參加各種座談會，查閱各種資料，瞭解到了各方面的聲音，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初步看法，這就需要有一個消化過程，整理過程，深化過程，也需要有一個統一意見的過程，內部討論的目的就在於此。所以這種例會，全體研究人員無特殊情況都必須參加。會議一般由二陳主持，鮑彤、周傑、嚴家其幾乎每次都到會，賀光輝也參加了大部分例會。每次例會都事先確定一到兩個主題，到會人員以座談的形式發表意見。討論沒有什麼框框，允許自由發表意見，也不分上下級，可以插話、爭論，有時候甚至會發生小小的辨論。這個時候，沒有職務高低之分，每個人都有發表意見的機會。

在研討之初，由於大家都來自不同的單位、原來從事不同的工作，對於當時國內外已經和正在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討論情況並不是都很瞭解。所以，10 月 10 日，在政改辦舉行的第一次例會上，由來自中央黨校的遲福林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的嚴家其，分別對當前國內政治體制改革研究的總體情況做了介紹，以便大家對社會各界已經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各種觀點從宏觀上有個大體的把握。

遲福林首先介紹了中央黨校政治體制改革研究組的工作。這個小組基本是由研究生自發組織的，一年多來主要做了三個方面的工作：一是收集基礎資料，包括黨的領導人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有關言論、理論界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觀點、蘇聯東歐國家政治改革的主要做法和經驗、西方國家對中國政治改革的議論和西方政治制度的基礎資料等等。二是進行社會調查，摸清中國政治體制的現狀。三是做專題性研究，主要有七年來改革實踐的總結、黨政分開、行政改革、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等。接著，他從六個方面介紹了當前理論界的觀點和動態。

在嚴家其介紹了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的研究情況，並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涵義、目標和重點」這個問題發表了他的一些看法之後，鮑彤也談了他的意見。這是他第一次在室裏的例會上亮出自己的觀點。不知道別人當時的感覺如何，反正我是感到耳目一新。

針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涵義」這個題目，鮑彤說，我國政治體制改革要解決的一個根本問題，是實現從革命體制到建設體制的轉變。建國三十七年來，這個轉變並沒有完成。五四年的憲法，五六年的黨章黨綱，八大決議，都沒有預料到幾年後發生文革，那幾年那麼好的形勢，一下子就不行了，為什麼？就是沒有看到，也沒有實現從革命體制向建設體制的轉變。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黨的工作重心轉移，但也沒有提出這個轉變。革命體制最根本的特徵是什麼？是高度集中，是群眾運動。我們現在所有的體制都帶有十分濃厚的這種色彩。現在必須實現從武裝鬥爭、群眾運動的體制轉到正常的建設體制上來。

在這段發言中，有幾句話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鮑彤說，過去在革命時期，那樣做有歷史的必然性，現在要改變也有其必然性。現在有人說，希特勒是極權主義，國民黨是集權主義，而我們共產黨是全能主義。現在，我們這種全能的無所不包的體制是應該改變了。要轉變到正常的工作秩序、生產秩序、社會秩序上來，使社會的每個細胞都能發揮它的功能。在這個意義上，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對我們的政治體制自我重新認識。黨要重新認識，政府也是這樣。

在此後的幾次例會上，大家仍然是重點圍繞「政治體制改革的涵義、目標和重點」這個問題進行討論。關於涵義，大家的認識逐漸集中到老鮑提出的「從革命體制向建設體制轉變」這個提法上來。討論中，還有同志提出了黨要「實現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問題，也引起了大家的共鳴。經過討論，這「兩個轉變」基本上成了大家的共識。關於目標，嚴家其提出，政治體制改革要有一個遠期目標，就是實現民主化。近期目標，應該是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對這個說法，大家比較贊同，又在討論中做了補充，形成了「遠期目標是高度民主、法制完備；近期目標是提高效率，走向制度化」的意見。至於主要內容，大家比較一致的是黨政分開，機構改革，幹部制度改革；有的人提出要從黨內民主著手，重點是黨內生活民主化、制度化；也有人說，應該貫徹落實憲法，實行司法獨立，搞新聞自由，保障公民權利，等等。

隨著討論的深入，討論的議題逐步集中到黨政分開上來。這也並不奇怪。鄧小平說，黨政分開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對這個說法，無論是在座談會上聽到的意見，研究看到的資料，還是大家自己

研究的結論，大家都是有共識的。無論說到哪個方面的問題，幾乎都可以同黨的領導體制掛上勾，都需要首先解決黨的領導體制問題。所以，黨政分開，成了後來幾次例會的主題。

當時，無論是在理論界的討論中，還是在中央高層的講話中，對黨政關係問題，大體上有兩種提法，一是「黨政分開」，二是「黨政分工」。鄧小平在他的講話中都是持前一種提法，他說：「改革的內容，首先是黨政要分開，解決黨如何善於領導的問題。」【136】。但是有的領導人則持後一種提法。根據吳國光的記述，「明確表示不同意『黨政分開』說法的中央領導人，當時有中央書記處書記、黨內著名的理論家鄧力群。在討論有關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時，鄧力群反對使用『黨政分開』，而主張用『黨政分工』的說法。」【137】後來，中央書記處書記王兆國在中央黨校講話時，也是使用「黨政分工」的提法。

對這個提法問題，在政改辦內部的討論中也是有爭論的。有人覺得，黨政之間，要明確劃分權力，以提「分工」為好，分工不分家嘛。但多數人不同意這種看法，依據是，政黨與政權組織，二者性質不同，承擔的職能也不同。「分工」的說法會混淆這二者之間的質的區別，不利於理順黨與政府、與其他社會組織的關係，還是用「黨政分開」的說法更好。經過幾次爭論，大家的意見趨於統一，還是提「黨政分開」。

那麼，實行了黨政分開會不會削弱黨的領導作用？分開以後，黨的作用怎麼體現？怎麼樣才能做到黨政分開？對這些問題大家也在幾次例會上集中進行了討論。比如，陳一諮說，黨政分開，是要用規範化、程序化、制度化來理順黨政關係。黨、政府、各種社會組織各司其職，黨不再管那些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集中精力管大政方針。這樣做，不會削弱黨的領導，而只會使黨管得更好。嚴家其說，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黨政分開，是指職責分開。黨行使權力和國家行使權力的方式不同。國家權力是由全體國民授權，是通過法律、法定程序，以強制力來保證實施。而黨作為社會組織，它的決策如果不通過法定程序，就對國家政權沒有約束力和強制力。遲福林提出，黨政分開，要做到職能、機構、幹部三分開。我在會上的意見

【136】《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 177 頁。

【137】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1997 年 8 月版，第 122 頁。

是，黨政之間，應該在機構職能上分開，但在人事上卻不一定是截然分開的。西方國家政黨的黨魁通過選舉上台，擔任政府首腦，他這在人事上就是合一的，但並不是以黨代政，不是執政黨直接給政府下命令，而是在政府內部，直接領導政府。這裏的關鍵是要通過必須的法定程序。

政改辦的另一位負責人，中辦副主任周傑在 11 月 1 日的內部討論會上，也發表了他對黨政分開的看法。他說，黨政分開這個命題我贊成，最好再加上一句，黨政分開是職能分開。國家政權與執政黨不是一回事，二者的職能、職責、職權都不同。執政黨掌握國家政權，但其本身不是國家政權。所以才有可能分開，也必須分開。他認為，「黨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這個概括好，但需要具體化。這個說法有兩個涵義，一是你共產黨搞了憲法，自己不執行怎麼行？二是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在全國範圍內都有效，黨的文件也不能與之發生牴觸。要接受文革的教訓，黨不能超越於憲法和法律之上。

四、鮑彤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精闢見解

鮑彤是研討小組辦公室工作的主要組織者，也是這個辦公室的靈魂。他長期工作在中央最高層領導人身邊，對現行體制的瞭解可以說比我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要透徹，都要深刻得多。他參加過許多重要文件的研究和起草，經驗豐富，思想敏銳，眼界十分開闊。在研討的第一階段，他幾乎參加了所有的座談會和政改辦內部例會。在每次會上，他總是以其睿智的語言和順手拈來的事例典故，或是引領話題，或是插話補充大家的看法，或者在會議結束時，畫龍點睛，對大家的看法作出小結。他的發言，經常會有一些奇思妙想，給大家以重要啟發，以耳目一新的感覺，所以，大家都很愛聽他的發言。

那時候，政改辦全體研究人員都集中吃住在中辦招待所。晚上，老鮑經常把大家聚到一起，搞漫談式的沙龍。記得 10 月 16 日晚上的沙龍上，老鮑又開侃。那天他談的是對我們這個體制的再認識。

他說，過去戰爭年代，我們只有一個中心——黨，把其他組織看成是這個中心聯繫群眾的紐帶，工作靠的是群眾運動。現在我們成了執政黨，掌握了國家政權，就要把戰爭體制、運動體制轉變成正常體制。現在我們要的是穩定，是在穩定中的發展。可這個現行體制，它

本身就是一個不穩定因素，怎麼可能保證社會的穩定、發展的穩定？搞什麼都是「大搞群眾運動」，用運動的方式、打仗的方式搞建設，這樣不行。在現代社會裏，每一種社會組織都有自己的功能，可我們經常是不去用這些組織，非要自己把它們的事都包攬起來，另搞一套。這些年來，我們是在按照自己的模式去構造一切社會組織，使各種社會組織退化成了一種單細胞動物，從上到下都一個模式，而不是要各種社會組織各有特點，各司其職。其實，社會組織功能的分化本是社會進步的標誌之一。1980 年我剛剛到紫陽這裏來的時候，紫陽問我，政治中最重要的是什麼？我說是秩序。在政治這架機器當中，各種社會組織都有自己的位置，承擔一定的功能，運行中必須遵從一定的秩序。這本是常識，而在中國，現在卻成了需要啟蒙的東西。我看，中國最需要的就是常識，改革就是回歸常識。

10 月 17 日，在向中央研討小組成員胡啟立彙報研討情況時，鮑彤還談到了政治體制改革要反映社會上不同集團各自利益的問題。他說，現在，經濟管理幹部關心的是政治改革怎樣推動經濟改革；機構改革試點城市關心機構改革；專業管理部門的幹部擔心今後的出路；黨外人士關心的是如何參政；學術界關心民主、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基層百姓是反對特權和希望政府廉潔。不同的利益集團從不同的角度來關心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是政治體制改革怎樣才能夠使不同集團各得其利益，使不同社會組織的職能得到發揮，使他們各得其所。

10 月 24 日，在政改辦的內部討論會上，鮑彤對這段時間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涵義、目標和重點的研討作了個小結，他總共講了 10 點意見。在談了對現行體制的再認識、政治體制改革要實現從革命向建設體制轉變之後，他談到了改革的目標問題。他說，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要提出兩個，一個是長期的，一個是近期的。近期改革的目標是有限的，是與初級階段相適應的；長遠目標，高度民主不能丟。列寧說，社會主義民主是比資本主義民主高千萬倍的民主。但是應該承認，我們現在決不是高度民主，連初級民主都沒有建立起來。要退到底。承認沒有高度民主，現在要搞初級民主。政治改革的近期目標，就是制度化，通過對黨的領導制度和政府管理體制的改革，來調整各種社會組織之間的關係，發揮其各自的功能。以黨內民主起步，從黨內民主到社會民主。從健全國家法制入手，來建立各個領域的運行制

度，通過制度化來建立當前階段的正常秩序。改革的每一步都要有利於建立秩序，提高效率。

在發言中，鮑彤對政治體制改革的重點內容作了逐條的闡述，其中在講到政府方面的改革時，有一段話讓我印象十分深刻。他說：在政治體制改革中，黨的問題最重要，人大的問題最敏感，政府的問題最複雜。這些問題既涉及到權力的劃分，也涉及到很多觀念的變化。要理清思想上的許多界限，要研究幹部群眾都會有哪些糊塗觀念。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要考慮到我們提出的改革的措施與黨章、憲法是不是有矛盾，在哪些地方有矛盾，要盡早提出來。我們現在的黨章有一個缺點，就是沒有明確規定黨怎樣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要在修改黨章時考慮這個問題。

鮑彤對黨政分開這個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也十分重視。幾乎在研討第一階段的每次座談會和內部例會上，他幾乎總要涉及到這個問題。10 月 30 日的例會，重點討論黨政關係問題。鮑彤在大家的發言之後，發表了他的看法。這個發言，可以說是對大家近來討論的一個總結，同時也是他自己對黨政分開的認識，特別是為什麼要搞黨政分開這個問題的一個集中總結，我覺得，講得十分精彩。由於講話較長，這裏只能摘錄其中的一部分。

(一) 關於黨政分開的涵義。我也贊成「黨政分開」這個提法，因為黨和國家機關的性質和功能都不同，應該區分開來。「黨政分開」的基本涵義，是把黨的領導職能與國家機關治理國家的職能（特別是政府的管理職能）分開，以理順黨和國家立法、行政、司法機關的關係，特別是黨和政府的關係，使之制度化、規範化。

(二) 黨政分開，利弊如何？大家講了許多利，可否概括為這樣幾條：(1) 有利於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領導威信；(2) 有利於國家機關建立正常的指揮系統和提高效率；(3) 有利於以此為契機，推動整個政治體制改革，達到我們的近期目標：理順黨和其他社會組織的相互關係，建立黨和其他社會主義組織內部的必要民主生活，使兩者制度化。

弊，恐怕主要是不方便，麻煩，費時。但我看，領導這麼一個複雜的社會，事必躬親，恐怕管不好。在這個問題上，麻煩一點，搞點「繁瑣哲學」，我看是值得的。機器總比斧頭繁瑣得多，但能按一定程序運轉，效率高得多。還有什麼弊？如果就是這一

條，那就是利大弊小。這一條弊，還可以轉化為利，是我們的黨更加謹慎地按照民主程序和科學方法來決定問題，更加嚴格地要求黨員，更加注意不要使自己脫離群眾。前幾天我講過，要提高黨的威信，應該是「兩少一好」，兩好是主意出的好，黨員的模範作用好，一少是黨直接管的事情要少一點。我同意同志們的意見，再加上一好，就是黨同民主黨派、非黨同志團結好，變成三好一少，黨的威信高。

(三)利弊問題，可以再加深一層，想一想有沒有危險？想得嚴重一點：有沒有失去領導地位的可能？說得平穩一點：會不會削弱黨的領導？

我認為，削弱黨的領導現象，實際上已經發生了。但不是由於黨政分開，而是由於黨政不分。黨委書記直接干預某項目的人、財、物，把自己降到了計委或經委工作人員的地位。黨委書記辦案，降到了法院審判員的地位。所以小平同志說要改善黨的領導，才能更好地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

現在和將來能夠從根本上動搖我們黨的地位的因素，不可能產生在黨外，只可能產生在黨內。就是說，在黨已經執政並成為無可匹敵的政治力量以後，如果黨內有腐化、官僚化的因素，如果聽其蔓延滋長，那才是最可怕的危險。文化大革命亂了十年，黨的主席可以任意處置國家主席，是黨外人士搞的嗎？不是，完全是我們內部出了問題。產生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根源，就是黨政不分，黨的權力化、行政化。黨內以權謀私的不正之風，究其根源，也無不與黨的行政化、權力化有關。怎樣才能防止黨腐化、官僚化呢？最好的辦法之一正是黨政分開，以免使黨陷入權力化、行政化的泥坑。這一點，小平同志早在1941年〈反對以黨治國〉一文中就講得非常透徹。他說，我們反對國民黨以黨治國，我們尤其反對國民黨這種流毒反映到共產黨內來。他說，以黨治國雖然省事、方便，但它是麻痺黨、腐蝕黨、使黨脫離群眾的「最好」手段。的確，黨政分開是黨在執政以後最好的防腐劑。

講到這裏，需要把「黨政分開」的依據搞清楚。我認為，「黨政分開」的基本依據就是「黨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具體來說，就是（1）黨的決議要通過法律程序，才能成為國家生活的大政方針；(2) 黨要支持各種社會組織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範圍內

進行充分獨立的活動；(3) 一切黨組織、黨員的活動都必須既符合黨章，又符合憲法和法律。

「黨的領導」這個概念也需要搞清楚。實現了大政方針的主張，就是起了領導作用。比方說，黨在政法方面的大政方針是什麼？照我看，最重要的是健全法制，法院獨立審判，公檢法相互制約，大家依法辦事，使之制度化、規範化，等等。至少這一個案件、那一個案件怎麼辦，我看除了審判「四人幫」這種特殊情況以外，大概百分之九十九算不了什麼大政方針。公檢法的負責同志都是共產黨員，黨委責成他們嚴守法制、依法辦案就是了。曾經有一種迷信，以為黨委書記辦案，就能加強黨的領導，就能辦的比公檢法好。今天上午，政法委、法院、檢察院、司法部的同志一致反映，從上百萬個案件的複查結果來看，什麼時候「左」的指導思想盛行，強調黨委書記辦案，冤假錯案比例就大；什麼時候強調公檢法互相制約，黨委書記超脫一些，冤假錯案比例就大幅度下降。可見，黨委書記辦案，實際是大事沒有抓，小事又抓錯了，根本不是什麼加強黨的領導。權力集中，責任集中，挨罵也集中，不利於實現黨的領導，提高黨的威信。

(四) 黨政分開的難點何在？一是虛的方面，涉及一系列流行觀念和傳統習慣，這些都非改不可。改，也會引起一些震動，但這是在基本隊伍內的震動，比之在廣大群眾中的震動，可控性要強得多。二是實的方面，難點恐怕不在於設不設「對口書記」、「對口部」，而在於實現黨對幹部工作的科學領導，實行廠長負責制的焦點在於「廠長組閣」。如果副廠長由市委組織部管，處長由區委組織部管，科長由工廠黨委組織部管，廠長是無法行使職權的。改革現行的幹部管理體制，有利於把出主意和用幹部結合起來，把工作之責和用人之責結合起來並推動整個用人體制的改革。在改革實施過程中，這恐怕是個難點。在研究實施步驟時，對於怎樣使國家機關特別是政府既管工作又管用人的制度，要充分加以考慮。

(五) 綜上所述：黨政分開利大於弊；黨政分開有利於實現黨的領導；黨政分開透明度大，同劃分中央、地方權限和政企分開相比，容易看得清楚，引起的震動也比較容易控制；黨政分開條件日趨成熟。

黨政關係的問題，可以說是我們國家領導體制中的最根本的問題。因此，我完全贊成小平同志的意見：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首先是黨政分開。抓住了這個關鍵，可以一環一環地把整個政治體制改革推開，最後把各種組織的關係理順，使之制度化，正常運轉。人們會高興地說，黨都在改革了，咱們大家都應該好好改。

鮑彤的這個發言，還談到了實行黨政分開的有利條件、黨政分開的具體內容、具體步驟、組織專題研討等問題。會後經過整理，刊載在了政改辦上送給研討小組各位成員的內參《研討情況》上。後來對黨政分開的專題研討，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五、趙紫陽主持的研討小組第一次會議

在 11 月 4 日的政改辦全體研究人員的會議上，鮑彤通知大家，三天後，紫陽和研討小組將召開第一次正式會議，聽取辦公室的工作彙報。秘書組要根據這段時間來討論的情況，匯總整理一個向研討小組的彙報提綱。老鮑和周傑等專門召集秘書組開了個會，分別談了起草提綱的大體思路。吳國光、孫方明和我幾個人立即忙碌起來，分頭執筆起草，然後匯總、討論、修改。看大體上差不多了，就交給老鮑審改。這樣反覆了幾次，直到彙報前一天的夜裏，在中辦印刷廠裏，老鮑還帶著我們幾個人反覆修改、校對，字斟句酌，直到凌晨才最後改定。印好的稿子一大早就由中辦秘書局文電處送到了研討小組幾位領導人的辦公室。

1986 年 11 月 7 日上午、8 日下午，在中南海北區的國務院第二會議室，趙紫陽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的第一次會議，聽取研討小組辦公室的工作彙報。到此時，辦公室運行整整一個月。參加會議的除了紫陽外，還有研討小組的其他幾位成員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彭沖；研討小組辦公室的鮑彤、周傑、嚴家其、賀光輝、陳一諮、陳福今、李丹鋼、呂長春、孫方明、周大力、陳曉魯、吳國光、遲福林、吳偉等 16 人。

會議正式開始前，趙紫陽要鮑彤先介紹一下參會的辦公室人員，並說，「好嘛，辦公室還是年輕人多嘛。」紫陽和研討小組的其他成員邊聽老鮑的介紹，還不時作出評論，甚至開個小玩笑。這樣，很快就

使我們這些很少接觸這種場合的年輕人大大減輕了拘束和緊張，氣氛逐漸活躍起來。

研討小組的這次會議，我認為是在那一年裏研討小組七次會議中，涉及面最廣、內容最豐富、影響也最大的一次，不僅原則上確定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涵義、目標和重點，而且也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幾項重點內容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原則，對下一步開展的專題研討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關於這次會議的詳細情況，吳國光在他的《趙紫陽與政治改革》一書中作了詳細的記錄。本書參照他的記載，結合我自己的記錄，整理了如下的會議主要發言。

會議的主要形式是夾敘夾議，紫陽和研討小組的其他幾位成員一邊聽取鮑彤的彙報，一邊插話、議論，間或提出一些問題，由鮑彤或是辦公室其他人員作出回答，每一個參會人員也都可以適時插話。鮑彤代表辦公室的彙報共分七個部分，一是關於辦公室的工作概況；二是各方面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初步反應；三是對現行政治體制弊端的認識；四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涵義；五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點；六是其他幾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七是設立專題小組的初步意見。會議的討論是按照鮑彤彙報的順序展開的，研討小組成員的發言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要有一個總的概括

在鮑彤彙報政治體制改革的涵義，講到要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和現代化建設時，趙紫陽說：「現在國外都關心小平同志，就說明我們的長治久安還沒有制度保證，這樣不行。」

當鮑彤在彙報中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長遠目標是民主化，近期目標是「制度化」時，趙紫陽問到：什麼樣的制度化？只說制度化，缺少一個前提。這時，胡啟立提出，經濟改革提出的目標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一句話就清楚了，政治體制改革能不能找到這樣一句話？在鮑彤介紹了有關「制度化」的四條內容後，紫陽說，你們講了四個方面的制度化，但還是缺少一個總的概括。只說走向制度化，還沒有涉及實質問題。分權就是實質問題。近期目標，是要解決黨與各種社會組織的關係，包括黨與政府、黨與人大、黨與別的社會組織、還有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係。由人治到法治，這樣講是可以的。遠期目標有內容，如高度民主、法制完備等；對近期目標的概括還沒有。近期

目標中究竟是要改什麼東西？解決什麼問題？能不能用「理順什麼關係」並走向制度化？鮑彤表示，這個問題，辦公室回去要認真研究。

趙紫陽在議論中還談到，討論政治體制改革問題，要從中國實際出發，也要認真研究國外的經驗，把幾種主要類型國家的做法搞清楚，包括一些細節，哪些與我們的情況接近，看看哪些做法我們可以借鑑。

（二）黨政分開，是解決共產黨如何執政的問題

在討論黨政分開時，趙紫陽、薄一波等都首先強調，政治體制改革要解決的問題，不是共產黨是否執政，而是怎樣執政，怎麼領導，如何改善黨的領導。這是一個大前提。

在聽了鮑彤對於黨政分開問題的彙報後，趙紫陽說，用「黨政分開」似比「黨政分工」更準確一些。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以黨代政，黨政不分。黨與政是不同的職責、不同的功能。我們的情況，用「黨政分開」很準確。黨政分開的涵義，就是「黨不直接發號施令，不直接處理政務」。他強調，這是一篇大文章，在社會主義國家還沒有先例。從原則上說，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管大問題。那麼，什麼叫政治領導？什麼是大問題？都要很好研究。

薄一波說，我們的機構為什麼這麼大，辦事效率這麼低，官僚主義這麼嚴重？根源主要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近期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邊區搞了「三三制」。進城以後，也還有那麼多民主人士當副總理，當部長的嘛。當年小平就說過，黨委書記最好當「甩手掌櫃」。

在鮑彤談到黨政分開要考慮各級黨委的區別時，趙紫陽說，在中央、地方、基層三個層次上，黨委的作用是不同的，不能一概而論。他認為，黨中央要討論大政方針，並通過在政權機關工作的黨員來實現黨的領導，黨起監督作用。既然組成了政府，黨就不要去代替它。黨應該管組成政府的那些領導人，不勝任可以重新提名，建議調動他，撤換他，但屬於政府的事就不要再包辦代替。我們現在下面黨政不分、權力過分集中於黨委的情況比中央還嚴重。國民黨的以黨治國，還沒有社會主義國家的黨政不分厲害。國民黨的中常委並不討論這麼多事情，地方黨部也不搞「一元化領導」，管事更少。薄一波插話說，他們的分散主義因此很嚴重。紫陽說，這一點我們黨有特點，

有條條塊塊。現在把企業的問題解決了，將來地方黨委的問題也要解決。然後，他又強調了一句：反對封建割據，軍令政令統一。

當鮑彤談到，為了實行黨政分開，建議取消政府中的黨組時，趙紫陽回憶說，黨組這個東西，有個演變過程。建國初期，政府裏有民主人士，各部門就搞了黨組。後來國務院搞了總黨組，毛主席還發了脾氣。黨組後來變成了一種待遇，也有些搞集體領導的意思。改革中要取消黨組，這個問題比較容易解決。

對於鮑彤提到要考慮削減基層黨組織的機構時，趙紫陽說，匈牙利的企業裏，黨組織機構就非常小。他們有個口號，叫做「黨務工作社會化」。而我們呢，叫做機關化、行政化。薄一波補充說，毛主席曾經講過，黨的機關要用黨費來開銷，人員不能太多。現在不但共產黨，連民主黨派也都吃的都是國家飯。這樣下去不行。

（三）發展民主，要從黨內做起，黨內要從中央做起

當鮑彤彙報到發展民主的一些設想時，趙紫陽說，講社會民主，重點是黨內民主；講黨內民主，重點是中央一級。中央的民主健全了，可以影響全黨；黨內民主健全了，可以帶動全國。我們要形成一種風氣，建立制度、程序，要黨中央帶頭，由上而下。

趙紫陽特別強調，黨內民主，重點是解決黨的中央組織的內部關係、議事規則、工作程序、生活準則和黨內監督問題，同時也要研究黨的地方組織、基層組織的有關問題。沒有一整套制度和程序，民主就沒有保障。把這些方面的制度健全起來，對於國家的長治久安，不重犯文革的錯誤，極為重要。

趙紫陽說，黨內民主的重點，是解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中央委員會、書記處等之間的關係。要依法辦事，按黨章辦事。我們現在往往過分強調了核心，變成了政治局領導中央委員會，常委領導政治局、書記處。缺了另外一方面，就是政治局要置於中央委員會的監督之下，常委要置於政治局的監督之下。這要立規矩，還要成為習慣。現在這種制度，不出事還好，但很難保證不出事。中國人背後計較，當面客客氣氣的。中國政治不可測。胡啟立補充說，中國是先君子，後小人，外國人是倒過來。如何保證文革不重演？紫陽講的這一條最關鍵。文革當中很多老帥不同意毛澤東的做法，但卻沒有辦法通過某種合法程序來召開會議解決問題。

接著，胡啟立說了一段很特別的話，似乎是對此後幾年黨內高層發生的兩個總書記先後下台的事情有先見之明，讓我至今印象深刻。他說，如果不建立必要制度，在兩次代表大會之間的五年中，政治局委員、常委之間如果「哥倆好」沒事，如果出現分歧，訴諸什麼程序，靠什麼解決？必須要有制度保證。田紀雲補充說，講才幹，講能力，沒有人能比得過毛主席。他犯了那麼大的錯誤，那麼多人都看到不對，卻沒有辦法制約。趙紫陽接著說，主要是這個問題。看來靠認識不行，自己是不能約束自己的。

(四)必須改變「黨管幹部」原則，逐步建立文官制度

當鮑彤彙報到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問題時，趙紫陽說，社會主義各國，除了南斯拉夫外，都是「黨管幹部」。現在，我們的「黨管幹部』，就是黨任免幹部，組織部任免幹部。而組織部又不管具體的事情，管事的不管人，管人的不管事。在政治體制改革中，幹部管理體制也要改革。實際上，黨管幹部工作，不一定要直接管每一個幹部，任用、任免全由黨管。以後如果黨委要設組織部，就是不能搞人事任免。這時周傑插話說，一條是管幹部政策，再一條是是研究幹部隊伍和幹部規劃。趙接著說，黨管幹部工作的宏觀，不具體任命幹部。幹部規劃，也包括交流、培養，以及屬於幹部紀律方面的工作，由組織部管。外國是分文官和政治家，文官是由政府管的，政治家是黨管的。你們要研究，是否借鑒一下國外的文官制度？我看要借鑒一下。我們中國歷史上，幹部制度也是有一些規矩的，也可以借鑒。

趙紫陽繼續發揮說，看來，非搞文官制度不可，當然不一定叫文官制度。現在我們的「幹部」這個概念，包括的範圍過於龐雜，教師、醫生、法官、運動員都叫幹部，這個辦法不行。你們可以先熟悉一下幾個國家的情況，比較一下看哪些和我們的情況接近。還有步驟的問題，即如何逐步地向這個制度過渡。改變黨統管幹部，要有新的制度，否則亂子不小。要搞專題，由組織部牽頭去搞，但要納入政治體制改革研討之中。

胡啟立接著說，封建社會是科舉制，對封建社會的穩定有很大作用。資本主義是選舉加文官制度，穩定，也比較公平。紫陽插話說，機會均等。胡啟立繼續說，我們搞第三梯隊是應急措施，人治因素太

大，也沒有把選擇幹部的權力交給群眾。新的幹部制度不建立，妨礙長治久安。

趙紫陽強調，總之，幹部制度是個重要問題，政治體制改革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是另外一回事。現在是要放進來，作為一個重要題目、大題目進行研究。

（五）人大要改革，與政府之間也要相互制約

在鮑彤彙報到人大改革要加強對政府的監督時，趙紫陽說，有關人大的好多問題，要很好地研究一下。現在人大的作用確實發揮不夠。憲法規定，人大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其實權力還不如國外的立法機關。作為立法機關，可以與行政機關相互制約。如果像我們這樣的機關，政府的行政權就不完整。最高權力機關的權力也不能是無限的，不受任何約束的，這個問題不能迴避，要有個相互制約的關係。人大應該審查、監督政府、法院和檢查院的工作，但不要具體干預。人大的提案如何產生和處理，也值得研究。又比如，政府各部門的負責人在總理、省長、市長提名後，人大如何審查？如果不審查，似乎成了「橡皮圖章」，如果審查，人大要不要成立「組織部」？田紀雲插話說，在幹部問題上，國務院也是「橡皮圖章」，在提名時無法向人大做具體說明。趙紫陽接著說，這些關係都要理順，都要有個說法。

這裏，鮑彤插話說，「三權分立」的思想不能簡單否定。紫陽回答說，要從實際出發。「三權分立」不能搞，但人大的作用必須進一步發揮。怎樣發揮，要研究。西方國家制度中那些有益的東西，可以吸收到我們的制度中來。立法加最高權力機關，世界上其他國家沒有這種體制。要真正成為最高權力機關，黨的主要領導人要到議會裏面去，這就不是「橡皮圖章」了。但黨的領導人一部分進政府，一部分進議會，黨委就沒有日常工作了，現在馬上這樣搞恐怕也行不通。還有人大代表和常委會成員的數量、構成和產生辦法，也要研究。所有這些問題，都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來討論。

（六）趙紫陽的小結：基本同意彙報的意見

在鮑彤的彙報結束之後，趙紫陽對會議的討論作了小結。他說，基本上同意彙報的意見。近期改革從哪裏開始？要以解決黨政關係和黨內民主為重點。黨政關係中，主要是黨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同時也要解決黨與人大的關係、人大與政府的關係。在黨與政府關係上，要

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在黨與人大關係上，要解決人大如何進一步發揮作用的問題。我們這次改革，終究是要解決黨的權力過於集中的問題，防止黨的權力過於集中於少數人、個別人、一個人。以黨代政，這就勢必使各種社會組織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

趙紫陽說，在研究中應當明確的，一是基本目標、基本模式，二是過渡措施。目標模式能否選擇恰當，是很重要的問題。此後，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如何過渡。否則，目標是空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相當明確，但是如何達彼岸，路子並不十分清楚。政治體制改革也是這樣。所謂過渡，就是首先搞什麼，先達到哪一步，步子怎麼走，還有配套的問題。不能一個方面孤軍深入，要有個配套。還有承受能力，這是個適應程度、適應能力的問題。過渡措施的問題，並不比目標設計簡單。當然，可以在實踐中不斷補充修正。

趙紫陽還指出，黨政分開這個題目中包括三個問題：黨和政府、黨和人大、人大和政府。這是最大的題目。黨的作用有個中央、地方、基層的分層。中國省市一級黨委不能像過去的國民黨黨部一樣，也不能像現在一樣，黨政不分，權力比中央還厲害。另外，現在的題目中有關人大的份量不夠。政治體制改革中，人大問題不作為一個重點提出來不行。人大的問題不能迴避。問題究竟在哪裏？改什麼？要研究。還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等問題，關鍵是言論與出版。這要放在社會主義民主專題中研究。

在會議結束前，薄一波對鮑彤和辦公室的研究人員們說，你們要放開手想問題。趙紫陽說，研討小組，研討小組，就是研究和討論嘛。薄一波接著說，你們想到什麼問題都可以講。彭沖表示贊成，他說，你們有豁免權。

六、趙紫陽給中央常委的信：專題研討全面展開

在中央研討小組第一次會議上，趙紫陽和研討其他成員都提出，要研究一下，找到一句話來概括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11月8日上午，利用兩天會議的間隙，辦公室立即開了全體研究人員會議，研究這個問題。會上，出現了幾種提法。吳國光是這樣歸納這些提法的：「大家試圖提出各種各樣的說法進行這一概括。嚴家其建議用『科學化、法制化的國家行政管理』這句話。遲福林說，可以考慮用『共產黨統一

領導下的分權制』。孫方明的說法是：『通過制度化的方式，形成我國政治生活現代化的基本格局。』李丹鋼強調：『建立適應商品經濟的組織結構，走向制度化。』吳偉提出：『理順黨和國家政權關係，實現社會組織功能分化，完成革命體制向建設體制的轉變。』鮑彤的歸納是：『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理順各種社會組織關係，走向制度化』。周傑認為，『實質內容是黨政分開與權力下放，核心是解決權力過份集中，中心是改善黨的領導』。」【138】

這次討論並沒有下結論，鮑彤要大家回去再思考一下。在後來的一個月裏又進行過幾次討論。在一次討論中，鮑彤建議，把「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作為對政治體制改革總的概括，與經濟體制改革的「建設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相對應。這個說法得到了辦公室絕大多數研究人員的贊同。鮑彤把辦公室的這個共識向趙紫陽作了彙報，趙也表示同意。這句話，後來寫入了中共十三大報告中。

研討小組第一次會議結束後，趙紫陽委託鮑彤和辦公室執筆，起草研討小組給中央常委的報告。這個報告，可以說是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工作的第一個成果，也是下一步研討工作的「總綱」，能不能得到中央常委，特別是鄧小平、陳雲、李先念三位老人的支持，就看這第一炮了。所以，鮑彤和周傑都十分重視，專門召集我們幾個執筆人開了會，談了他們對起草工作的意見。第一稿由我和孫方明、李丹鋼分工起草，然後由國光統稿，交辦公室研究人員討論，然後再修改。反覆幾次後，老鮑親自動筆作了最後的潤色。

11月18日，這份報告經趙紫陽審閱同意後，以研討小組五個人的名義，報送中央常委。報告就政治體制改革的涵義和目標，談了以下看法：「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好的，但在領導體制上存在一些重大缺陷。它適應於武裝鬥爭和群眾運動，不適應於經濟、政治、文化多方建設的需要；適應於實現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不適應於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因此，我國當前的政治體制改革有兩層涵義，一是使政治體制適應於和平建設的需要；二是使政治體制適應於發展商品經濟的需要。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長遠目標是建設高度民主、法制完備、富有效率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這是需要長期努力才能實現的。近期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總要求，可以考慮概括為一句話：改革領導體

【138】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97年8月版，第168頁。

制，調整各種社會組織的關係和職能，使之走向制度化。內容主要包括:(1)通過黨政分開，使黨和國家機關的相互關係制度化，各司其職，增強活力；(2)通過發揚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並使之制度化，調動基層和群眾的積極性;(3)通過權力下放、機構改革、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行政法規，使政企關係和機關工作制度化，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接著，報告從黨政分開、黨內民主、權力下放和機構改革、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發揮人大和政協的作用、健全法制等幾個方面闡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內容和重點。

在報告的最後「如何過渡」部分中，研討小組提出了下一步工作的安排，準備成立幾個專題小組，各自提出自己的方案。明年三月前，將分別聽取各專題研討小組的彙報。四、五月間，有可能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初步設想。

從 1986 年 11 月底到 12 月底，根據趙紫陽的計劃和研討小組給常委的報告，在中央五人研討小組下面，先後成立了八個專題研討小組。黨政分開專題組由溫家寶【139】牽頭，陳俊生【140】、王漢斌【141】等參加；黨內民主與黨的組織專題組由周傑負責；權力下放與機構改革專題組由賀光輝牽頭，王書明【142】等參加；幹部和人事制度改革專題組由曹志【143】負責;社會主義民主專題組由胡繩【144】牽頭，有林【145】、李定【146】參加;社會主義法制專題組由佘孟孝【147】負責;改革的理論和基本原則專題組由廖蓋隆負責。此外，還設立了一個中央黨校組，由副

【139】溫家寶（1942-）：天津市人。1986-1992 年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2003 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

【140】陳俊生（1927-2002）：黑龍江樺南人。1978 年起先後擔任黑龍江省委常委、秘書長，省委書記。1984 年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1985 年起任國務院秘書長，1988 年任國務委員；1998 年任政協副主席。

【141】王漢斌（1925-）：福建惠安人。時任全國人大秘書長。1988 年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是中共第十四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142】王書明，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

【143】曹志（1928-）：山東安丘人。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1998 年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144】胡繩（1918-2000）：江蘇蘇州人，中共黨內著名理論家。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1993 年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145】有林，黑龍江時呼蘭人。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1988 年 7 月《求是》雜誌創刊後，任該刊總編輯。

【146】李定，雲南施甸人。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

【147】佘孟孝，時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

校長陳維仁和校委副秘書長史維國負責。黨校這個組與各專題組是平行的，在黨校組底下又分了七八個專題小組。各個專題研討小組基本是按照中央研討小組的形式設立和運作的，小組裏邊有幾位負責人，然後下邊也成立一個主要由研究人員組成的辦公室，承擔具體研究工作。中央政改辦被各專題組稱為總辦公室，負責與專題組聯絡、協調和綜合。

1986 年 12 月 10 日上午，在中南海南區的 152 會議室，中央政治局委員、研討小組成員胡啟立召集各專題小組負責人、總辦公室的負責人和部分研究人員開會，研究和部署了下一階段的專題研討工作。他在講話中說：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工作是一項極為嚴肅的政治任務。這是在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的直接領導下，由紫陽同志親自抓的課題，涉及到國家的長治久安。在某種意義上，政治體制改革比經濟體制改革更深刻、更複雜，也更艱巨，觸動面絕不比經濟改革小，大家不可掉以輕心。胡啟立在講話中，從五個方面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專題研討進行了動員，並且對各專題組的工作進度提出了要求。

各個專題研討小組的成立，標誌著第一階段的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工作基本告一段落。12 月 2 日，刊有「研討小組領導同志在聽取辦公室彙報時的談話要點」的《研討情況》第 24 期印發至各專題研討小組，以為下一階段的專題研討工作提供指導；同時，《研討情況》也增發至「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國務院、中顧委、人大常委會有關領導同志」，開始向整個中央領導層「下」政治體制改革的「毛毛雨」。

第四章

在「反資產階自由化」的政治高壓下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中共歷史上以改革開放而著稱的大會。就在大會舉行前不到一年的 1986 年底，正當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正在向深入發展，政治體制改革藍圖的設計工作，也在趙紫陽主持下緊鑼密鼓地進行的時候，風雲驟起。一場學潮引發了黨內的巨大震盪，黨內保守勢力趁機發動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被迫辭職。一霎間反「自由化」的陰雲籠罩全國。如此下去，十個月後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三大，將會成為一個反「自由化」的大會，中國的改革開放有可能出現嚴重倒退甚至夭折，這是黨內外一切擁護改革的人們所不願看到的。

這場巨變是怎樣發生的？鄧小平在這個時候為什麼要支持「反自由化」？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如何面對這種巨大的壓力？代理總書記趙紫陽為扭轉反「自由化」所造成的不利局面，為十三大的召開創造一個改革開放的政治環境做了哪些努力？本章將對這些問題，作一簡要地回顧。

一、風雲變幻：「反自由化」與胡耀邦辭職

1986 年下半年，鄧小平多次重提政治體制改革的談話，國內掀起的政治體制改革研究熱潮，加上在寬鬆的政治環境下的大量的有關政改的宣傳，極大地激發了知識界和青年學生的政治熱情。他們擁護政治改革，支持發展民主，並且希望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推動這場改革。1986 年是基層選舉年。許多學生要求舉行自由選舉，並自薦參加競選。但是選舉中的諸多限制，和根本違反普選原則的一些做法，引起了他們的極大不滿和憤慨。12 月初，學潮因此而開始從安徽爆發，很快就漫延到上海、杭州、南京、成都、西安、天津、長沙等大城市。為了防範學潮漫延到北京，北京市委加班加點，起草了一份對遊行示

威做出種種限制的《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若干暫行規定》，於 12 月 26 日由北京市人大會常委會通過，從而加劇了北京各大專院校學生的不滿。12 月底，大規模的學生遊行終於在北京爆發。與 1985 年那次以「反日」為特點的學潮有顯著不同的是，這次學潮中各地學生提出的口號，集中於發展社會民主，保障人權和公民權利、開放言論自由等政治改革方面。其中，也有不少人把矛頭直接指向四項基本原則，指向一黨專制。

在這次學潮初起時，12 月 8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主持書記處會議，對當時形勢做了三點估計。第一，全國當前政治經濟形勢是好的，是建國以來最好的時期之一。第二，目前在學生當中出了一些問題，但是不影響全局形勢。對出現的問題要做具體分析，其中確實有學校管理不善的問題，也說明民主生活方面有問題。要改革，要改善，但不要大驚小怪。要民主是個世界潮流，包括台灣也正在出現這方面的變化。第三，要善於引導，學會引導，不要壓，不要一下子頂回去，也不要放任自流，推波助瀾。

趙紫陽也在這個會上發了言。他在談完經濟形勢以後，談到了大專院校學生鬧事問題。他認為學生提出的好意見要採納。隨著形勢發展，中國的民主勢必擴大，這類事件估計今後還會有。我們不能禁錮，搞得鴉雀無聲，像東邊鄰居【148】那樣，那很危險。不禁錮，就有提高本領的問題。會上，趙紫陽還介紹了已經開始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的情況。

萬里在會上也談到，民主是世界性潮流，確實是這樣的。台灣也開放了黨禁，取消了戒嚴法。菲律賓、南朝鮮民主的發展，對國內也會有影響。這就需要我們有相當的本領，我們確實缺乏這個本領。怎樣與社會對話，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戈爾巴喬夫講公開性，我們要與社會對話。第一，不要出大亂子；第二，不要希望沒有這些事情；第三，要學會與社會對話。【149】

12 月中旬以後，學潮並沒有如中央書記處希望的那樣，慢慢平息下來，反而有繼續漫延的趨勢。12 月 24 日下午，中央三直機關【150】

【148】指朝鮮。

【149】參見吳稼祥《中南海日記》第四部分，第十五節，「十五、山雨欲來：學潮雲湧，耀邦失寵」。

【150】指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中央國家直屬機關、中央軍委直屬機關。

黨委召開聯合會議，通報「學生鬧事」的情況。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151】在會上介紹了學潮發生的過程、規模後說，此次學生鬧事的特點，一是借民主自由和反官僚主義作文章；二是出現串聯；三是出現少數違反憲法的口號。他特別強調，「今年是第一次直接攻擊了鄧小平同志。」接著，他分析了出現學潮的原因，認為，學生鬧事的後台，有三個東西，一是西方輿論，二是港台輿論，三是我們內部搞自由化的人。他說，有一個要不要改革的問題，還有一個怎麼改革的問題。在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中，都有人要搞西方模式，對改革的干擾很大。從事改革的同志，也有不清楚的認識。

在這個會上，胡啟立傳達了 22 日上午中央書記處開會研究學潮問題的意見。他說，書記處對形勢的基本估計是，不會發生大的動亂。鬧事的，只是少數搞自由化的人，少數「四人幫」的殘渣餘孽。現在沒有動亂的基礎，首先中央是團結的。書記處的結論是，不能掉以輕心，要慎重對待。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家教委主任的李鵬也講了話。他說，重點是北京，北京鬧不起來，全國就亂不起來。要爭取大多數人，孤立與暴露壞人。明年還會有這樣的事情，要積累經驗來進行這場鬥爭。

面對社會上聲勢越來越大的學潮，主持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簡稱中央政改辦）工作的鮑彤和政改辦的研究人員們都憂心忡忡，擔心會不會由此引起局勢變化，特別是高層的政治格局的變化，以至影響正在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工作發生變化。筆者當時也在政改辦工作。身處中央高層機關，一方面通過不同渠道能夠瞭解一些高層動態，另方面也有著特殊的政治敏感。作為政改辦的領導者，鮑彤可能比我們普通研究人員瞭解更多，擔心也更多。為了緩和學潮，讓學生和青年能夠冷靜下來，認真思考，他決定以個人名義寫一篇文章，題目叫做〈社會主義的幼駒與資本主義的老馬及其他〉。在他寫作過程中，筆者就看到了稿子。鮑彤確實是文字「大家」，文章通篇沒有口號式的語言，不是板起面孔，以大道理去教訓人，而是以平等商量的口吻，循循善誘，入情入理，文筆生動，不落俗套。文章幾天以後發表在 1987 年 1 月 5 日的《人民日報》上，引起了廣泛的好評。

【151】何東昌（1923-）：浙江諸暨人。1978 年任清華大學副校長；時任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1989 年「六四」事件中對促成武力鎮壓學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趙紫陽在後來幾次會議上都表揚了這篇文章，說它是近來少見的能讓人讀得進去的好文章之一。

12 月 26 日下午，中央政改辦召開全體會議，傳達了兩天前中央三直機關常委聯合會議上胡啟立、李鵬、何東昌等的講話，並介紹了學潮的最新情況。之後，辦公室研究人員圍繞學潮問題開始了內部討論。討論由鮑彤主持，並且一直延續到第二天凌晨。

大家的討論，緊密集中在鮑彤提出的「圍繞學潮，聯繫政治體制改革」這個題目上，幾乎所有的人都發了言。大家的認識基本一致，認為，不應該過分強調學潮中個別壞人的作用，這個問題宣傳過多，會引起學生的反感，和一些人對政改的疑問；也不應因學生提問題的方式不對，就抹殺其中合理的成分。改革中存在一些問題沒有理順，基本目標還沒有解決，學生著急可以理解，不應該完全歸結為壞人搗亂，歸結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不要把學潮看成是不正常的東西，共產黨是搞學生運動起家的，不能怕學生運動。學生大部分是愛國的，應該肯定。但是應該看到他們不瞭解情況又有急於求成的思想，應該研究學生當中有哪些要求是值得思考的，合理的，堅定我們改革的信心。這麼大的一場社會變革，引起一定的社會震盪是不可避免的，封建主義傳統這種影響，在實現民主化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政治體制改革我們黨雖然提出來了，但從宣傳輿論引導上還不夠，本來可以抓住民主自由這面旗幟，把它作為一個漸進的過程講清楚，我們不去講，使一些人憑空想像，胃口就會吊得很高。

在大家發言結束後，鮑彤發表了他的看法，一口氣講了 16 點，大意如下：

(1) 對學生事件要做冷靜的質和量的分析，中央書記處對學生事件的分析是恰當的，處理方針也是正確的。這次，是在沒有思想準備的情況下發生的中等程度的社會震盪，不必驚慌。

(2) 這次事件，對我們研討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很有啟發。必須正視政治體制改革中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設計方案不能輕率，給社會造成過高期望值。必須堅定改革，因勢利導。改革是減少此類震盪的根本條件。

(3) 堅定的推進改革，是大的決策，不要因一時一事而改變。政治體制改革是中央根據長遠的全面的利益做的決策，不應該受到學潮這種偶然事變的干擾。

(4) 所謂堅定的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是要通過改革從根本上創造一種安定團結的機制，通過多種矛盾的相互制約，來達到安定團結。

(5) 要使不好的事情轉化為好的事情，消除它的負面作用，加強它對改革的推動作用。如果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達到這個目的，就背離了它的出發點。

(6) 對青年學生要有個基本的估計，他們不是異己分子，不應該怕他們。應該保護他們的民主意識，使之成為政治體制改革的推動力量，引導他們朝正確的方向發展。

(7) 也不能否認學生中有盲目性，這不可避免，正像我們黨在工作中也有盲目性一樣。學生會從中得到教訓，會懂得搞運動無助於民主政治建設。建設民主政治要以安定團結為前提，以長治久安為目標。自由和民主都是有規範的，他們要有社會責任感。

(8) 學潮中有一種人值得注意，就是愛出風頭，危言聳聽，好出奇談怪論的人。這種人不一定是別有用心的，而是愛出風頭。應該有一種機制，使少見多怪變成見怪不怪，我很贊成社會應該有個排氣閥，有個正常狀態下的防震機制，這也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我們不一定能改變這些人的思想，但可以得到教訓，找到一種機制。

(9) 現在的中央領導比毛主席要高明，能注意到劃清合法和非法的界限。合法的東西，儘管你不喜歡但也要學會容忍，對非法的要給予法律制裁，這是個了不起的進步。

(10) 通過這次依法處理學潮，會推動我們健全法制和依法辦事。

(11) 在領導方法上，地方和基層組織也有進步，過去是站在學生和群眾的對立面，現在一些地方第一是表示不贊成，第二是可以參加進去，在內部做工作，這證明還是有效的。

(12) 這次學潮，對克服官僚主義也有好處，至少對官僚主義有所震動，使他們有所顧忌。

(13) 當然學潮的處理當中也有缺點，就是我們的工作還跟不上，黨、團的基層組織都相當脫離群眾。黨、團組織如果不脫

產，可能會更好些。如果因為這次學潮，就增加多少脫產政工幹部，必然會適得其反。新時期思想工作要有新方式，新內容。要有治國安民的新措施，要考慮怎樣才能使黨組織既加強了對群眾的引導，又不站在群眾的對立面，這個問題值得深思。

(14) 我們的新聞界嚴重的不適應，在這方面，共產黨不如國民黨，國民黨並不封鎖消息。在這個問題上，慎重是對的，但要想點新辦法，各大城市的黨委應該認真考慮這個問題，恐怕還是要報道，可以在本市報道，不一定全都由新華社通稿。到底是諱莫如深好，還是公開各種意見讓大家思考好？封鎖不住又不採取對策，這不高明。

(15) 應該有一種根本的引導。同志們提出的可否把政治體制改革大體上已經確定了的東西，通過一定渠道發佈一下，當然這要由中央拍板。但一個根本的引導可以做，比如對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教育宣傳。如何說清楚我們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這就是一篇大文章。不要把社會主義說得十分完美，當然也不是一無是處。

(16) 對於群眾鬧事，要有一個長期的精神準備。但是我們要有信心，我們會更成熟，群眾也會從事件中吸取教訓，更重要的是，領導要吸取教訓。我們不怕出這種事，怕的是學不會吸取教訓，如果吸取了教訓，那麼我們就成熟了。

政改辦這次會議的意見，會後由綜合組整理上報給了趙紫陽和中央研討小組。但是，也許政改方案設計者們的這次努力，注定要勞而無功了。

學潮的進一步發展，加劇了黨內一些元老和「理論家」們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胡耀邦的不滿，他們認為胡耀邦對學生手軟。12月27日，鄧力群、王震、胡喬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152】、楊尚昆【153】

【152】余秋里（1914-1999）：江西吉安人。1964-1980年任國家計委革委會副主任、主任；1975年任國務院副總理，1982-1987年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153】楊尚昆（1907-1998）：四川潼南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中央革命根據地反「圍剿」和長征。曾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央辦公廳主任。新中國成立後，歷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十二屆、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88年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89年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參與指揮1989年的北京「平暴」。1992年退休。1998年9月1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2歲。

七人一起到鄧小平家裏，分析了學潮的嚴重性和危險性，一致認為這是胡耀邦的姑息和領導無力的結果。認為胡耀邦應對當前的局勢負責。

12 月 30 日，鄧小平在家中召集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等談話。他態度嚴厲地說：「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裏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這也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應該說，從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論戰線上是軟弱的，喪失了陣地，對於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個放任的態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壞人猖狂得狠。」鄧小平點名批判了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說要堅決把這些人開除出黨。接著，鄧又說：「這些人之所以這麼猖狂，傳說是因為黨中央裏面有個保護層。」這實際上就是不點名地批到了胡耀邦。鄧小平提出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是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還強調，「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154】

鄧小平還特別對政治體制改革講了一大段看法。他說，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民主，不能搞三權分立。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發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亂不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否定黨的領導，十億人民沒有凝聚的中心，黨也就喪失了戰鬥力。那樣的黨連個群眾團體都不如，怎麼領導人民搞建設？鄧小平對政治體制改革說的這段話，從表面上看，是對學潮講的，這些話也都是他的一貫思想，但是在這個時候講出來，就不能不含有警示的意味。實際上，他也是在給主持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工作的趙紫陽敲警鐘。【155】

鄧小平和老人集團對胡耀邦的不信任，由來已久。據楊繼繩在他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一書中披露，趙紫陽在一次談話中談到，他認為胡下台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兩個問題：一是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堅決；二是胡耀邦對香港《百姓》雜誌主編陸鏗的談話【156】。

【154】參見鄧力群：《十二個春秋》。

【155】以上鄧小平談話，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94-195 頁。

【156】參見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修訂版，第 283 頁。

第一個問題，鄧小平認為，如果將來老人不在，由胡耀邦主持工作，中國自由化肯定要氾濫。他曾經讓胡啟立和喬石兩次傳話給胡，批評他對自由化太軟弱，對有些人不處理，說，「對自由化採取這樣放任軟弱的態度，是作為總書記的根本弱點。」「現在外面有人說耀邦是黨內的開明派，打著他的旗子反對我們。」「耀邦不講反自由化，為什麼不講？」

引發鄧小平不再信任胡耀邦的第二件事，是胡耀邦 1985 年 5 月同香港《百姓》雜誌主編陸鏗【157】的談話。鄧對這件事看得很重。這次訪談長達兩小時。在陸的提問下，胡耀邦談了一些在改革中改革派和保守派鬥爭的情況。陸鏗回去後發表了長達兩萬字的《胡耀邦訪問記》，讚揚胡耀邦，批評保守勢力，從而在中央高層，引起了軒然大波。鄧小平對楊尚昆說：「陸鏗打著奉承耀邦的幌子來反對我們！」「這幾年我如果有什麼錯誤的話，就是看錯了胡耀邦這個人！」從這時起，鄧小平對胡耀邦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開始想把他換下來。【158】

當然，坊間還有一種說法，說是胡耀邦下台的直接原因，是他同意十三大後鄧小平退休。這種說法流傳的版本很多。但趙紫陽認為，胡耀邦下台和是否贊成鄧退休沒有關係，他在接受楊繼繩採訪時說：「這不是小平讓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鄧沒有這麼狹隘，他還是偉大的嘛！」【159】筆者認為，趙紫陽這個話雖有一定道理，但是「鄧沒有這麼狹隘」，未必其他老人們也那麼「偉大」。胡耀邦一句同意鄧小平退休，幾乎得罪了幾乎所有的黨內元老。因為一旦鄧小平退下來了，所有的老人難免都要退下來。老人們剛剛平反和重返工作崗位沒有幾年，屁股還沒坐熱呢。從維護自己的利益出發，他們也不能讓鄧小平退休。胡耀邦同意鄧小平退休，就等於觸犯了一批老人們的利益，站在了他們的對立面。【160】

【157】陸鏗（1919-2008），雲南昆明人。著名報人，時任香港《百姓》雜誌社長，《百姓》1985 年 6 月出版的陸鏗《胡耀邦訪問記》引起鄧小平對胡耀邦的猜忌與不滿。

【158】參見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修訂版，第 283-284 頁。

【159】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修訂版，第 286 頁。

【160】還有一種說法，說趙紫陽在胡耀邦下台的問題上起到了「落井下石」的作用。對這種說法，筆者認為根本不是事實。但限於本文篇幅，就不在此問題上多著筆墨。有對此問題感興趣的讀者，請參見鮑彤：〈我看胡趙關係〉；楊繼繩：三

鄧小平和老人集團原來考慮到十三大讓胡「自然」退下來，平穩過渡。但學潮的出現和發展，讓他們不得不「提前解決胡耀邦問題」。在受到「反自由化不力」嚴厲指責後，胡耀邦「想到學潮將被鎮壓，一大批知識分子和好幹部將受到牽累，他徹夜難眠」【161】。經過反覆思考1月2日，胡寫了一封信給鄧小平，提出辭去總書記職務。4日，鄧小平1月6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談了話。此後，鄧小平建議舉行一次「解決胡耀邦同志問題的黨內生活會議」，對胡的錯誤進行批評，也要他在這個會議上做出自我批評。1月10日至15日，生活會由薄一波主持，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會議集中批評了胡耀邦的所謂「六點錯誤」，特別是胡「只反左不反右」的問題。胡耀邦違心作了題為《我的檢討》的發言。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作出四項決定：一，接受胡耀邦辭去總書職務；二，一致推選趙紫陽代理總書記；三，保留胡耀邦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的職務；四，以上決定提請下一次黨的中央全會通過。據當晚在中央電視台播出的會議公報說，胡耀邦「在擔任黨中央總書記期間，違反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在重大的政治原則上有失誤」。

1987年的1月，風雲突變。一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隨著胡耀邦的中箭落馬，迅速席捲全國。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遭遇了一個特別寒冷的冬天。

二、鄧小平的「左右互搏」

1986年12月27日，趙紫陽在聽取六屆人大五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起草彙報時，談到，社會主義社會實際上存在各種利益集團。改革，就是要調整各個利益集團的利益關係，使之更有利於社會發展和長治久安。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思想。

那麼，中國最大的利益集團是什麼？就是中國共產黨本身。它的最根本的利益，就是要保證它對中國政治權力的壟斷。如果事實不是如此，如果真的像它自己所宣稱的那樣，黨是中國最廣大民眾的利益的代表，黨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那麼它就不會如此堅持一黨獨佔政

訪趙紫陽，見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附錄，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0年12月修訂版，第528-557頁。

【161】盛平主編：《胡耀邦思想年譜》，香港泰德時代出版公司2007年版，（下卷），第1298頁。

治權力，而會把選擇執政黨的權利交還給民眾。也正因為如此，鄧小平才一再強調，四項基本原則中，最根本的一條，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無論任何人背離、反對或是企圖改變中共的一黨集權的政治體制，鄧小平都不會容忍，而不惜使用任何手段進行打壓。胡耀邦是中共中央總書記，但是鄧小平和老人集團一旦發現，或者認為胡所執行的政策會動搖黨的領導地位，威脅到這個國家的根本制度時，也會毫不猶豫地把他搞下台，雖然胡是他們政治上的恩人，在幾年前曾經為他們平反，使他們能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幾年後趙紫陽總書記的被罷黜同樣證明了這一點。

從鄧小平的思想脈絡中我們可以看到，鄧小平從來都主張要有兩手，「兩手都要硬」。所謂鄧小平理論，總結起來無非就是兩句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從 1979 年 3 月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上發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講話那一刻開始，這一格局就已經奠定了。鄧小平本人曾多次講過，四項基本原則是毛澤東的老東西，不是他的新東西。他之所以重新強調老東西，是為了尋求與毛澤東時代對接，為共產黨延續執政的合法性基礎。只有改革開放才是他的新東西，是他的旗幟。這裏，蘊含著鄧小平的兩條政治底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核心是強調黨的領導，他絕不容許在他手中葬送共產黨的政權；堅持改革開放，他需要靠改革開放來挽救黨，挽救這個國家。這兩條底線，都是為了同一個政治目的，即鞏固黨在中國的統治地位。每當他感到改革開放威脅到黨的領導地位時，他就會出來大講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每當他認為改革開放遇到障礙時，他就要出來大聲疾呼「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鄧小平的這兩條政治底線，後來經過趙紫陽和鮑彤的加工概括，成為十三大提出的「黨的基本路線」中的「兩個基本點」。

但是，鄧小平也認識到，黨的領導要堅持，但黨的領導體制，這個國家的經濟、政治體制也必須改革。文革的教訓已經證明，舊有的領導觀念、領導方式、領導體制都不能再繼續進行下去了，堅持下去，只能再次將中國引向災難。改革，是鄧小平，也是這個黨唯一的選擇。這也正是他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的初衷。改革的目的，不是為了從根本上否定這個制度，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為了改善這個制度，改善黨的領導，改善的目的，仍然在於加強。為

此，他一再強調，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這個「自我完善」，就是在黨的領導下，在原有制度框架內，對經濟、政治體制進行一場改良。正是在以上認識的基礎上，形成了鄧小平思想的「兩個基本點」。

「兩個基本點」，實質上，是當年晚清洋務派代表人物張之洞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現代翻版。張之洞認為，「中學」必須堅持，這是不能動搖的；而「西學」也必須引進，為我所用，這二者並不矛盾。只有這兩方面都照顧到了，老佛爺的領導才能堅持，大清的一統天下也才能不改變顏色。研究鄧小平的思想，可以發現，鄧小平同樣認為，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這兩方面都必須堅持，而且是可以兼容的。他要用四項基本原則來規範改革開放，同時用改革開放來保證他的四項基本原則能夠堅持下去。違反了二者的任何一點，都不符合鄧小平思想，都不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是，事實上，在這「兩個基本點」的執行過程中，二者往往會發生劇烈的衝突。從1980年改革開放以後，這種衝突就伴隨著全部的改革歷程，直到1987年初這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發生。

「兩個基本點」之間的衝突，反應到黨內，就產生了人們常說的「改革派」與「保守派」之爭。「改革派」是黨內的開明派，大多是處在第一線，而又相對年輕的黨的領導者，他們並不一定是主張否定黨的領導，但他們有強烈的改革意識，他們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往往觸及，或者是被「保守派」認為是觸及了四項原則的底線；而「保守派」則是代表了傳統理論和觀念的政治集團，他們大都是黨內的「理論家」或是元老，掌握著意識形態的控制權。他們也不一定是完全反對改革，但是每當「改革派」提出或者推行一項重大的改革政策時，他們所處的政治派別和政治觀念就要求他們出來質疑或是提出不同的意見。每當黨內和社會上出現一些被他們認為是威脅到了黨的領導地位的「雜音」時，他們就會不遺餘力地進行反擊。

楊繼繩在他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一書中，對中共黨內高層這種矛盾心態，和左右相互矛盾的政策的產生根源，有過一段分析，我基本是贊同的。他說：「學潮，實際是政治風潮。每一次政治風潮，的確有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現行的政治制度的力量起作用。現行制度有問題，有人反對是很自然的事。對共產黨的領導和政治制

度中的問題，群眾中有不滿情緒。這種不滿情緒的積累，加上西方意識形態的作用，是政治風潮一浪高過一浪的重要原因。但是，對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現行政治制度，群眾中有幾種不同的態度，一是想從根本上否定，一是希望加速改革。開始，前一種態度是少數，隨著腐敗日益嚴重，政治制度中的弊端日益顯露，而政治體制改革又停滯不前，很多寄希望於改革的人失去了信心，逐漸變成前一種態度。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來看，他們不是不知道現行政治制度中的大多數缺陷，他們也想通過改革逐步解決這個問題。但是，面對社會上的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潛在力量，怕改革步子太大會喪失共產黨的領導權。所以，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言論一激烈，政治體制改革就停頓。但是，要從根本上穩定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又必須改革。因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言論壓下去以後，就要著手政治體制改革。而一提政治體制改革，『資產階級自由化』又要乘機抬頭。從根本上說，政治體制改革最終要廢除『一黨專政』。否定共產黨領導(即『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邏輯結果。所以，『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項基本原則』一次又一次地衝突。」【162】

而認為「兩個基本點」相互間並不矛盾的鄧小平，作為這場改革的發起人和掌舵人，在「改革派」的「保守派」之間，往往就扮演了一個「裁判」的角色。因此，他不得不根據改革和形勢發展的需要，一會兒強調這個「基本點」，一會強調那個「基本點」。每當改革開放遇到阻礙甚至停滯時，他就出來大聲疾呼「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每當他認為改革開放過了界，超出了他劃的框框，他就出來滅火，支持反對「自由化」，從而形成了改革年代中共政策的搖擺性和政治鬥爭的週期性。對此，鄧力群在他的《十二個春秋》中有一段話，他說，每逢雙年，自由化氾濫；每逢單年，左派反擊。應該說，這種說法是接近實際的，在1989年以前，大體如此【163】。對這種執政黨在政策上的週期性的左右搖擺，我稱之為鄧小平的「左右互搏」【164】。

【162】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0年12月修訂版，第297頁。

【163】參見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0年12月修訂版，第9頁。

【164】「左右互搏」是金庸先生在他的武俠小說《射鵰英雄傳》和《神雕俠侶》中，描寫的一種高深武功，同一個人的左右手可以分別使用不同套路的功法，左右兩手也可以相互搏擊。

但是，鄧小平對「左右互搏」的雙方，並不是完全公允的，對他說來，「兩個基本點」當中，四項基本原則，特別是黨的領導地位是不可動搖的。但在經濟改革上，他卻是不懼怕借鑒吸收西方的管理經驗和科學技術，認為可以為我所用。就在12月19日，社會上的學潮已經達到相當規模，整個中央高層都在為此惴惴不安的時候，鄧小平在聽取紫陽等人對1986年的經濟工作的彙報時插話說，我們堅持改革和開放的調子沒有變。他說，債券等經營方式既可以為資本主義所用，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所用，都是發展生產力的，誰用的好就為誰服務，在這方面，還要解放思想，打破框框。但在政治改革上，他則將其嚴格限定在行政改革的框架內，一再強調要有利於加強黨的領導，強調不能搞「全盤西化」。

三、鮑彤要政改辦與鄧小平「對表」:「我們這裏沒有『自由化』」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雖然從不諱言他主張對黨和國家領導制度進行改革，但他所主張的改革不過是一場以提高政府效率為目的的行政改革。鄧小平從沒放棄他對西方國家多黨制和三權分立、議會制的否定性看法。差不多每次講到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他都要說上一段絕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的話。他所反對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首先就是指這個。1986年前後，黨內外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雖然搞政治體制改革是出自鄧小平本人的主張，但是鄧的本意是要改善這個制度，為正在進行的經濟改革掃除障礙，而不是從根本上改變這個制度。一些人在政治體制改革內容中加進的在中國實行多黨制、三權分立的內容，直接超越了鄧小平的政治底線，與鄧的本意相違，就不能不引起鄧小平的警覺。1986年底這場學潮的興起，讓鄧小平感到了社會上反對派勢力巨大的、現實的威脅，使他認為必須對這種「自由化」的企圖進行反擊，加上黨內反對改革，特別是反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勢力趁機煽風點火，添油加醋，以及黨內老人們對胡耀邦「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長期不滿，這些因素的匯合，導致了1986年底反自由化運動的發生。

這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地震，很快就波及到了正在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的研討和設計工作。中央政改辦的這些年輕人，大都和我一樣，來自中央機關或各個研究單位。他們之中，或是參加

了近年來的政治體制改革研究，並在政改研究中有過一定的影響；或是在中央黨政機關的工作中，積累了較豐富的實際工作經驗，並因而被選調來參加政改研討。他們對於能夠有機會參加中央的這次政治體制改革研討，都十分珍惜，都有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從內心說，他們對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都十分反感，擔心反「自由化」會衝擊到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另外，在政改辦內部，在各個專題研討小組，也有一些人產生了疑問：政治體制改革是不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政改研討中有沒有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在此情況下，鮑彤認為，政改辦需要同鄧小平「對對表」了。

在 1 月 9 日下午政改辦的例會上，鮑彤談到了「對表」問題。在此三天前，1 月 6 日，中共中央發出 1 號文件，轉發了 1986 年 12 月 30 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等人的談話，這個文件已經在政改辦傳達。大家都能預感到，鄧小平這個講話傳達下去以後，全國勢必開始一次大規模的反「自由化」。但對於中央高層內部正在「批評」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堅決的情況，還沒有向下傳達，大家瞭解不多。老鮑處在他那個位置上，自然比我們知道的多得多，在這次例會上，他又不好講得太明確，只好含糊地說，過幾天要過一次組織生活，學習中央有關學生事件的文件和講話，和中央對對表。另外，本周討論工作的時候，要學習一次小平同志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著作和講話，目的是對前一段時間的工作進行檢討。

鮑彤說，檢討是個中性詞，有反思、總結、回顧的意思。為什麼提出這個問題？是不是我們的工作有了什麼大錯誤？或者情況有什麼大的變化？都不是。原因很簡單，一是要回顧一下我們的工作，二是瞭解一下各組的情況。一年的時間已經過去三分之一，我們現在需要檢討一下，前一段的研討工作是不是符合小平同志的思想，從總體上來說是不是能夠站得住腳。下次彙報的時間還沒有定，我們等通知。下一步的工作怎麼辦？如果研討小組安排彙報，就搞提綱。不然就按原計劃，研究黨內民主、人大制度。中間空閒，反思成立以來的工作。也要翻過去的材料，但不要涉及各專題組的工作，完全是自我回顧。我們現在仍然要全力以赴，潛心改革，要沒有任何疑義的搞下去。

在這裏，老鮑要求政改辦組織工作人員認真學習鄧的談話，並結合各自的工作情況，對政治體制改革研討進行一次「深入檢討」。據我

的理解，「對表」也好，「檢討」也罷，其主要目的，不是為了找出研討中有沒有不符合鄧小平看法的觀點，而是為了堅定大家繼續把這項工作進行到底的信心，同時也讓大家看到政治體制改革的艱巨性和複雜性。

要「對表」，先得有「表」。鮑彤要政改辦組織幾個人，火速編了一本《鄧小平同志談政治體制改革》，大約兩萬字的樣子，後來刊發在《研討情況》第40期上。這樣做的目的，當然是在為政改研討工作尋找「合法」依據，一方面，讓能看到這份材料的中央高層主要領導明白，政治體制改革是鄧的主張，不是趙紫陽和鮑彤的「自作主張」；另一方面，要用鄧小平的話，證明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方向是對頭的，以此屏蔽可能出現的對政改研討工作搞「自由化」的指責。

1987年1月13日下午，中央政改辦舉行了主題為「近三個月來的工作檢討會」。這個時候，對中央高層正在進行的「批評」胡耀邦的情況，辦公室的許多人已經有所瞭解，心情很沉重，會上的氣氛也比較壓抑。會議由陳一諮主持。

綜合組的孫方明首先發表了看法，他認為，我們搞的向研討小組的彙報提綱、代研討小組草擬的給中央常委的報告，都得到了中央領導的圈閱和肯定，第二次彙報【165】也正在進行中。因此，對前一段的工作應該充分肯定，沒有什麼自由化問題。下階段的工作要保持正常氣氛。不然研討工作就無法進行。

陳福今談了三點，一是第一階段的思路、辦法是按照研討小組的部署進行工作的，符合鄧小平思想；二是改革研討的前提是要解放思想，爭鳴是正常的，只有提出問題才能解決問題；三是從這兩次彙報情況看，研討工作是有成果的。如果說工作中有不足的話，也與自由化無關。

陳小魯認為，現在的背景氣氛，與剛剛開始研討時反差較大。我們搞出來的文件，不僅現在站得住，我看十年以後也站得住。我們不能當罪人。這時鮑彤插話說，有兩種情況下的罪人，一是提了錯誤的意見，二是該提的意見沒有提出來。

【165】1987年1月4日和2月4日兩個下午，根據鮑彤的建議，趙紫陽主持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聽取了辦公室的第二次工作匯報，匯報的主題是黨政分開和黨內民主，其中包括了十三大的改革等方面的內容。會議的具體情況，參見本書第五章〈發展黨內民主要從中央做起，從十三大做起〉。

吳偉則強調，改革不能和自由化掛起來。只有改革，才能更好地堅持四項原則。鮑彤又插話說，一個不等式，改革不等於自由化。我認為咱們辦公室沒有自由化。

吳國光說，總的方向是對頭的，有兩個關係處理得很好，一是既要看到弊病，又要完善這個體制；二是既要改善黨的領導，又要堅持黨的領導。堅定信心非常必要。他建議在研討中要注意分析各種利益集團的參與態度和要求。

會上，其他同志也相繼發言，均表達了對前一段研討工作的肯定。在大家討論之後，鮑彤對前段時間的工作作了總結。他說：

有兩種總結，一種是散攤子前的總結，一種是工作高潮中的總結。我們的總結是後一種，以後的工作，會更緊張。

對前三個月的工作怎麼看？我同意剛才所有的發言。從目前的水平來看，我們三個月來的研討是站得住腳的。但我也有擔心，十年、二十年以後再來看，會怎麼樣？我不敢說。一是出了餿主意，那就是罪人；二是該提的問題沒有提，也是罪人。這是一個壓力，應該保持這個壓力，可以使我們的研討健康發展。之所以說我們的工作站得住腳，集中到一點，就是本室工作沒有自由化傾向。什麼是自由化？是反四項原則，反對黨的領導。我們作為個人，作為集體，都沒有自由化問題。如果有，那首先是我。我姓鮑，入鮑魚之肆不聞其臭。我們沒有光在口頭上堅持黨的領導，幾個月來我們一直在研究如何改善黨的領導、更好地實現黨的領導的辦法。我們沒有滿足於空喊社會主義口號，而是在研究如何建設更有活力、更有創造性的社會主義。這就是幾個月來我們全部的工作。研討過程中似乎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東西，這新東西就是改革。

在研討小組成立的會上【166】，當時我當記錄，紫陽有一句話，後來沒有寫到給中央常委的信裏。紫陽講，改革有三種，一種是現有體制很好，小修小補；一種是不好，要根本顛覆；還有一種是要做相當大的改變。我們現在搞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哪一種？這個可以研究。我看，是最後一種，是要做相當大的改變。（賀光輝插話：假如說有什麼不足的話，就是我們沒有把我們體制中的好東西歸納出來。）我們能提出新東西，說明我們不糊塗，是按照研討

【166】指 1986 年 9 月 18 日，趙紫陽召集中央政治體制研討小組的幾位成員開會，研究如何開始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工作。

小組的要求工作的，是要改革的。如果研討小組的同志們要我們研究改革，而我們研究的結果是不改革，這當然也是一種答覆。但是，小平同志是不會說滿意的，研討小組的同志們也不會滿意的。小平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已經幾年了，為什麼還會有人還會覺得新鮮呢？這是因為小平提出的構想還沒有變成現實，還沒有被黨內相當多的同志所認識。現在有人說我們步子大，這不足為奇，因為這些人不熟悉小平的思想。我們閱讀材料提出的問題，到目前還沒有超出小平當年八一八講話的水平，遠遠沒超出。要說不夠，我看是我們思想解放不夠，不是過頭了。我們要繼續發揚解放思想這個建室以來的傳統。

我們在研究中，每提出一個問題，都要反覆問是否會削弱黨的領導，實際不實際，可行不可行。要求每一個同志都講得那麼完善，那麼全面，這不可能，也不應該這樣要求，只能是在研討小組的領導下，大家討論問題，互相瀰補不足，形成現有條件下的可行方案。你就是讓毛老人家來發言，也不可能沒有局限性，我們就更是這樣。我們有我們的歷史局面性。在我們辦公室的討論中，幾乎在每一個問題上都有不同意見，目標是一致的，但是每個人看問題的側重點有所不同。提出問題可能不全面，但討論的著眼點都是長治久安和加快現代化建設。有不同意見，是不同利益集團的代表，我們這裏也反映不同利益集團的意見。

我們的兩個刊物【167】很重要，通過它們不僅向研討小組反映我們的研究情況，而且也向中央的許多領導同志下點「毛毛雨」。對社會上，要到適當時機。到了春天就可以下了，春雨連綿。可以建議在３月的政府工作報告時下一點。到了８月，可以下更大一點。

下一步，大家要多讀些書，多去參加專題組的一些活動。關於開展社會調查研究的問題，一是贊成多瞭解些社會動向，但是要注意不要誘發什麼問題。專門調研可以放後一點。座談會還要開。我們的觀點、設想要整理一下，找些同志來座談，把我們的方案大體上托出來，聽聽反應。我們也要總結清理一下自己的思路，每個專題有幾條，然後再聽聽意見。前一段是從群眾中來，以後逐漸搞到群眾中去。

【167】指中央政改辦編發的《研討情況》和《內部資料》。

要說有缺點，我們研討工作的缺點是，所有同志都在思想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倉促上馬、投入工作的，不夠適應。我們前段時間做了些工作，是研討小組抓得緊。下步再深入，也許就會遇到許多問題。瞭解情況的基本方法還是座談會，走出去瞭解，還是要依靠各專題組。估計下段工作會很緊張，又要提高質量。沒別的辦法，要靠大家的士氣。

四、趙紫陽為盡量縮小反「自由化」的範圍而努力

1987年初這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浪潮來勢洶洶。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元旦社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搞好改革開放的根本保證》，指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要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全年的工作基調。中央在「處理胡耀邦問題」的同時，1月28日，宣佈免去主張「寬鬆、寬容、寬厚」的中宣部長朱厚澤的職務，鄧力群帶領新任部長王忍之到中宣部接管。1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1號文件，轉發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等人的談話。這個講話傳達下去以後，各級黨組織立即在全國「運動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聲勢之浩大，為幾年來所未有。對那些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頭面人物」也紛紛做出了組織處理，王若望、方勵之、劉賓雁被開除黨籍，某些學潮的組織者也被「專政」。加上當時各高等院校開始放假，持續了一個多月的各地學潮逐漸開始平息。

從「反自由化」一開始，作為代理總書記的趙紫陽就非常憂心運動衝擊正在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衝擊經濟運行，衝擊教育、科技、文化、農村等各個領域。在當時條件下，僅靠他個人的力量，無力扭轉局面。但是，他還是利用各種機會，做出使「反自由化」運動降溫的努力。趙紫陽後來回憶說，「那時我的主要精力，主要心思，幾乎是用在如何防止這場反自由化的鬥爭擴大化；控制、限制左的勢力借反自由化來反對改革開放，以左反所謂的右，也就是反對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168】

在1月15日到19日舉行的全國省長會議上，他講話的第四個方面，就談到了「反自由化」的政策問題。他說，三中全會的基本點有兩個，一個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個是改革、開放、搞活。二者是

【168】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05頁。

統一的，缺一不可。四項原則必須堅持，但沒有改革開放也就沒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反自由化、堅持四項原則，不會，也不能影響改革、開放、搞活，不能影響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這是趙紫陽在他的講話上第一次提到「兩個基本點」的說法。他還提出了「四個不變」：全面改革的方針不變；對外開放的方針不變；現行的城鄉經濟政策不變；尊重知識尊重人材及充分發揮知識分子作用的方針不變。他強調，對「自由化」要旗幟鮮明地反對，但必須十分注意政策。不得層層點名，不得層層抓代理人，抓「小方勵之」。不要重犯反「精神污染」時的錯誤，一是擴大化，二是全盤否定。這次僅限於思想政治戰線，對經濟理論不要批，農村也不搞反「自由化」。

1 月 28 日是農曆除夕。這天上午，趙紫陽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集了一個國務院各部門負責人會議。這次會，中央政改辦沒有派人參加。據吳稼祥的記載，在會上，趙紫陽發表了一個多小時的講話，其中除了談到經濟工作以外，主要是談了關於當前反「自由化」的政策問題，目的是消除人們對當前形勢的憂慮。一是絕不重複過去「左」的錯誤。他特別提到清除「精神污染」的兩個教訓，即擴大化的錯誤和中途夭折。二是要盡量縮小反「自由化」的範圍，嚴格限於黨內，不涉及黨外民主人士和黨外知識分子；嚴格限於思想政治領域，不涉及經濟和改革，不涉及農村，不涉及文學藝術的表現形式和技巧，不涉及生活方式；在思想理論戰線，點名批評就那麼的就那麼幾個人，不能隨便點名，點名要經中央批准。

在會上，趙紫陽對思想理論隊伍提出一個估計，可稱之為「三少兩多」：熱衷於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以改變社會制度、改變四項基本原則為己任的人是極少數；堅持反對三中全會改革開放政策，竭力擁護過去極「左」路線，看不見改革開放成就，要尋找機會再幹「左」的一套的人也越來越少；精通馬克思主義，自覺站在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上，能解決當前現實問題的人也不多。比較多的是兩種人，思想活躍，想套用外國的東西是一種人，有馬克思主義書本知識，思想不夠活躍是另一種人。這兩種人對實際都瞭解不多。這兩種人要團結起來，同舟共濟，消除隔閡。

趙紫陽還明確表示了對當前報刊反自由化宣傳的不滿，說文章質量不高，內容千篇一律。技術不要重複引進，報紙文章也不要重複

發表。只有陳俊生和鮑彤的兩篇文章【169】反映還不錯。紫陽在另外的場合還說，報紙發反自由化的文章過於集中，報紙頭版都被佔了。還說，有些人對改革就是沒有興趣。趙的這些話，都是有所指的，其鋒芒所向，無非是胡喬木、鄧力群等幾個極力想把反「自由化」擴大的左派們【170】。

同日，中共中央在趙紫陽的主持下，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並於當天發出了《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即中發1987年4號文件)，對「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作出了政策上的規定，強調：「這場鬥爭嚴格限於黨內，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領域進行，著重解決根本政治原則和政治方向問題，即主要是反對企圖擺脫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道路的錯誤思潮。不要聯繫經濟改革的政策、農村政策、科學技術研究、文學藝術風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民日常生活。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具有特定的含義。黨和社會上存在的其它消極、腐敗現象，是什麼問題就解決什麼問題，不要同資產階級自由化掛鉤。」趙紫陽主張發這個文件的目的，是力圖阻止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向全局擴展。

次日，1月29日，趙紫陽在春節團拜會【171】上發表講話，再次強調要堅持三中全會路線的兩個基本點。他說，兩個基本點互相聯繫，二者缺一不可。改革、開放、搞活，講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是鄧小平同志。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講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也是鄧小平同志。他是在深入研究中國實際的過程中提出這兩個基本點的。我們大家都應當好好學習小平同志關於這兩個方面的論述。這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真諦，是三中全會以來路線的基本內容。

在這個講話中，趙紫陽宣佈，反「自由化」不搞政治運動。嚴格限於中國共產黨內，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領域中進行。農村不搞。企業和機關是進行正面教育。即使在政治思想領域內，實質上也是進行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則的教育。他認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會不會影

【169】指陳俊生發表在1987年1月12日《人民日報》上的〈在改革、開放中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鮑彤發表在1987年1月5日《人民日報》上的文章：〈社會主義的幼駒與資本主義的老馬及其他〉。

【170】參見吳稼祥《中南海日記》第五部分，第二十一節，「趙紫陽與鄧力群矛盾加深」。

【171】團拜會是中共中央國務院舉行的例行春節集會。

響當前的改革和建設，城鄉內外各項政策不變。全面改革不變，對外開放不變，對內搞活經濟不變，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政策也不變，不僅不變，而且要努力做得更好。

趙紫陽在回憶錄中，對他當時為什麼要不斷地為反「自由化」劃框框有一個說明。他說：「1987 年中央領導班子改組、耀邦辭職以後，面臨著一個聲勢浩大的反自由化運動。在這種情況下，不反是不可能的。當時有一種很大的力量，要乘反自由化來大肆批判三中全會的路線，要否定改革開放政策。而我如何頂住這股勢力，如何把反自由化控制起來，不使擴大化，不涉及經濟領域；盡量縮小範圍，盡量減少一些思想混亂，這是一個方面。再一個方面就是對人的處理的問題。要不要處理人、傷害人。如何少處理人，不過多傷害人，這也是我當時面對最頭痛的問題。」【172】

趙紫陽在此前的六、七年裏，一直是做總理，主管經濟方面的工作。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他對於政治。理論方面的事情，大都不是很感興趣。他說：

> 在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間，我主要忙於經濟和外交方面的事，對理論和意識形態方面的事很少參與，老實說我也沒有這方面的興趣。而且當時我對耀邦不大聽鄧小平的招呼也不以為然，認為對大局不利，對耀邦本人也不好。所以在耀邦和胡喬木、鄧力群爭論中，我處在比較超脫一些的地位。胡喬木、鄧力群也沒有把我當作對手看待。儘管那個時期他們反對精神污染，併力圖擴大到經濟領域，我一直是反對的。在經濟領域我一直主張解放思想，大膽探索，去掉框框。但在文化等方面，我過問較少，與胡喬木、鄧力群沒有正面衝突。但耀邦辭職，我主持中央工作以後，局面很快就發生了變化。因為我要將反自由化降溫，進行得和緩一些，少傷些人，要極力保護改革開放。而胡喬木、鄧力群想要乘機大幹一場。這樣我和他們的正面衝突就難以避免，很快他們就把我作為主要對手。【173】

2 月 5 日，鄧小平找中央五人小組【174】趙紫陽、萬里、楊尚昆、薄一波、胡啟立談話，充分肯定了趙紫陽在春節團拜會上的講話，說

【172】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212 頁。

【173】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220~221 頁。

【174】1987 年 1 月初，按照鄧小平的意見，中央成立了一個「找耀邦談話小組」由趙紫陽、萬里、胡啟立、薄一波、楊尚昆組成。胡耀邦辭職以後，鄧小平說，「這

這個講話講得很好，你們要支持紫陽的工作；你們這個小組要工作到十三大；當前的改革開放，不是搞急了，而是搞穩了。

但是，自恃有人撐腰的胡喬木、鄧力群等人根本沒有把中共中央代理總書記的話放在眼裏，更沒有把中央4號文件放在眼裏。對於鄧小平的要支持趙紫陽工作的話，他們也置若罔聞。新任中宣部部長王忍之趙對趙紫陽在春節團拜會上的講話和中央4號文件公開表示了不滿，他說，這些講話都是折衷調和的東西，按照這樣搞下去，反「自由化」鬥爭又會中途夭折。在胡喬木、鄧力群等人的縱容下，全國主管宣傳理論工作的中宣部組織了一大批「左派」人士，掌控媒體，撰寫文章，發表講話，開討論會，辦培訓班，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力圖把反「自由化」擴展到各個領域。對這種情況，趙紫陽在他的回憶中也曾經談到，他說，「鄧力群、胡喬木、王忍之所代表的一批思想僵化、教條主義者的勢力，對我主持下的反自由化部署十分不滿，多方製造輿論施加壓力，力圖突破、改變中央對反自由化的基本部署。」【175】事實正是如此。在此後的幾個月時間裏，他們發明了各種各樣的說法，併力圖使之擴散，極大地影響了思想理論界，也搞亂了人們的思想，使黨的改革開放政策的貫徹，和社會各個領域的正常運行，受到了嚴重干擾。

1987年初，就在中央政改辦的辦公地點的樓下——中辦廠橋招待所的二層（政改辦駐三層），進駐了一個新成立的「寫作班子」，據說是鄧力群要求中宣部組織的「反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中央寫作組」。這個班子，後來被知情者稱為「廠橋大批判組」，由中宣部理論局長盧之超【176】負責，其中有許多「反自由化」的「知名人士」。這些人住進來以後，和政改辦的人在同一個食堂吃飯，雖然不同桌；上下樓也經常相遇，但卻從沒有交流。也不知道是政改辦的人怕他們被他們說成是「自由化」，還是他們怕和政改辦沾了邊，就有了「自由化」嫌疑，反正是老死不相往來，讓人感覺他們和政改辦儼然是屬於兩個

個小組要工作到十三大。」從此稱為「中央五人小組」，大體上行使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職權。這個小組，一直工作到了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選舉出新一屆政治局為止。應該說，這種做法是明顯違反黨章規定的。

【175】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08頁。

【176】盧之超（1933-）：江蘇寶應人。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政治組組長、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局長。

敵對的營壘。外面來的朋友聽說這個情況，開玩笑的說，你們這是「兩個基本點」對起來了啊。確實，這種情景就像兩軍對壘，成了「兩個基本點」相互關係的絕妙寫照。

關於鄧力群組織的這個「寫作班子」的情況，趙紫陽在他的回憶中也說到了。他說，這些人「用文革中搞大批判的辦法，收集他們認為犯有自由化錯誤的人的文章、講話，摘錄所謂錯誤觀點，整理編印成冊，攻擊一點，不及其餘。印成的材料發給有關單位的寫作班子，按摘錄的材料寫批判文章，連篇累牘地在報上發表。完全是文革大批判那一套，斷章取義，無限上綱，獨斷專橫。這種文章不僅不起教育作用，反而引起人們反感。我在書記處會上批評了鄧力群並讓他們停止這種做法。接著在省、市宣傳部長會上借肯定陳俊生、鮑彤的文章，是說理的，反映好，指出現在報刊發表的反自由化文章，不是擺事實說道理，簡單生硬，只靠扣帽子壓人。今後發表批判文章，應注意效果，是否有說服力，人們能否看得下去。由於鄧力群的那個寫作班子搞的那些東西不受歡迎，他們又長期習慣於文革大批判那一套，寫不出讓讀者喜歡看的文章，一些報刊也不願發表他們寫的文章。這樣一來，批判自由化的文章就越來越少了。」【177】

胡耀邦辭職以後，鄧小平曾點名提出要處理一批人。胡喬木、鄧力群、王忍之等人和中紀委藉機提出了一批擬處理的「自由化的頭面人物」的名單。1987 年 7 月底，在北戴河辦公期間，中央書記處討論了一個他們提出開除黨籍的 10 個人的名單。名單上的第一個人是張顯揚。討論時，主持會的趙紫陽問，大家有什麼意見沒有啊？沒有一個人說話，這樣就等於通過了。討論的第二個人是蘇紹智【178】。罪名之一是他「不承認馬列主義是科學的科學」。列席會議的鮑彤插了一句：「恩格斯也不承認有科學的科學。」趙紫陽問列席的中宣部長王忍之：經典作家對「科學的科學」是什麼態度？王忍之支支吾吾。胡喬木、鄧力群這兩位「理論家」也都不說話。趙紫陽說：「既然還沒有弄清楚就不要輕易做決定。我看你們先把事情弄清楚了，以後再來討論這些問題吧，今天就不討論了，不要鬧出笑話來。」趙紫陽這樣一說，就等於把

【177】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215 頁。

【178】蘇紹智（1923-）：北京市人。政治理論家；1982-1987 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在 1987 年因「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被批判。

這個名單掛起來了。大概是由於不太甘心吧，這時，喬木說了句話，那麼吳祖光【179】不處分就勸退吧，反正他也不受組織紀律的約束。趙紫陽說，誰去勸啊？退黨是自願的。胡喬木說，那就我去吧。鮑彤後來回憶說，他曾經看到過吳祖光的一個回憶，是這樣說的：我家住的樓層很高，有一天胡喬木氣喘吁吁從樓下爬上來，說是要勸我退黨，我看喬木同志年紀這麼大了，還爬了這麼多層高樓來勸我退，也很辛苦，我說好吧那麼就退吧，就退掉了。所以那次會議只處理了兩個人，一個是第一個張顯揚，一個是最後的吳祖光。其他的人就者這樣都保下來了。

上面提到的中宣部提出開除黨籍的 10 個人名單中，有一個是原《科技日報》副總編孫長江【180】。後來有人把孫的材料報到了曾長期主管科技工作的聶榮臻【181】那裏。聶帥作了個批示，大意說，孫長江同志是個很好的同志，他怎麼會是自由化分子？對這樣的同志處理要慎重。趙紫陽看到這個批示後，在材料上批道，同意，就按照聶帥意見辦。對其他人也按照同樣原則辦。後來中央再也沒有討論過這個問題。

趙紫陽在回憶錄中還談到，耀邦下來以後，有些老人提出所謂「團派」問題，說耀邦重用「團派」的人。趙紫陽認為，認為如果這樣提出問題事情就大了，牽連太大，極易引起幹部中的波動。在反自由化中，如何在組織上少作變動，對穩定局勢很重要。在四號文件及趙紫陽的多次講話中，一再講到這次反自由化，決不搞上掛下聯，決不能像文革那樣以人劃線。因此，趙紫陽向鄧小平提出，這次反自由化，幹部變動應盡量少，能不動的就不動，即使需要動而能不馬上動的，也盡量放到以後逐漸變動，以減少震動。鄧同意了趙紫陽的意見。

趙紫陽在回憶中舉了若干人的例子，他說：「王蒙【182】是胡耀邦提議任文化部長的。鄧力群的人早就把他看成是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自

【179】吳祖光（1917-2003）：江蘇常州人。著名劇作家、導演。寫有《風雪夜歸人》、《武則天》、《鳳求凰》、《三打陶三春》以及《闖江湖》等劇目。

【180】孫長江（1934-）：1980 年代初曾任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參與了《光明日報》1978 年 5 月 11 日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修改，也是《解放軍報》同一主題的重要社論的作者。後調任《科技日報》副總編。

【181】聶榮臻（1899-1992）：四川江津人。元帥。曾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科委主任；長期掌管中國的國防科學工業。

【182】王蒙（1934-）：河北南皮人。文學家。曾任《人民文學》主編、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員。1986-1989 年任文化部長。

然要把他搞下去。所以耀邦一辭職，反自由化一開始，這個問題很快就提出來了。我堅決不同意。我對鄧力群、王忍之說，王蒙不能動。還有《人民日報》社長錢李仁【183】，也是青年團出身。他在《人民日報》比較開明，鄧力群也要乘機把他換掉，我也沒有同意。薄一波還向我說過，山東省委書記梁步庭【184】，是耀邦的人，同耀邦關係密切。說山東是個大省，要換。我也借些理由沒同意動。自然，一個人不動也是不行的。像中宣部長朱厚澤，牽連較大，不得不動。還有組織部的尉健行【185】、公安部的阮崇武【186】。組織部也好，公安部也好，這些都是老人極為重視，必須由他們熟悉的人掌握才放心的敏感部門。耀邦在任時，他們在公安部、組織部，並不是幾位老人完全信任的。耀邦一辭職，對這兩個人的議論就多起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不能不作調整。當時我盡可能地給他們做了適當的工作安排。」【187】

趙紫陽這種不因人劃線，在黨內政治鬥爭中盡量保護幹部、防止引起大的震動的作法，引起了那些企圖在耀邦辭職後徹底搞掉「團派」的政治老人們的不滿。傳說陳雲有過這樣的話：這回「青紅幫」變成「青紫幫」了【188】。

五、鄧小平說，「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講得好！」

在反「自由化」的巨大政治氣壓力之下，趙紫陽既要保護自己，爭取鄧小平的支持，又要反左，要盡可能保證改革開放的正常進行，靠的是什麼？只能靠「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據筆者查到的資料，趙紫陽是在 1987 年 1 月 15 日的全國省長會議上，第一次談到了「兩個基本點」的說法。他說，三中全會的基本點有兩個，一個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個是改革、開放、搞活。二者是統一的，缺一不可。此後，他在 1 月 30 日春節團拜會上的講

【183】錢李仁（1924-）：浙江嘉興人。1983 年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1985-1989 年任人民日報社社長。

【184】梁步庭（1921-）：山東微山人。曾任中共青海省委書記。1983-1988 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

【185】尉健行（1931-）：浙江新昌人。1985-1987 年任中央組織部部長；1987-1992 年任監察部部長、黨組書記。

【186】阮崇武（1933-）：河北懷安人。1985 年任公安部部長。1987 年任國家科委副主任。1989 年 7 月任勞動部部長。

【187】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215-217 頁。

【188】「青」指青年團，「紅」指新上來的青年幹部，「紫」指趙紫陽。

話，再次闡述了這個觀點。後來在中央政改辦的一次會議上，陳小魯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要有一條基本路線。鮑彤接受了這個意見，對「兩個基本點」的說法進行了完善，加上了「一個中心」的表述，成為對三中全會路線的完整概括。趙紫陽後來回憶說，「這種口語化的概括，鄧小平看了非常讚賞，多次說『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講得好。」【189】

趙紫陽後來在他的回憶中還說：「我在團拜會講那些話的用意，是因為開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有人擔心會不會改變三中全會的路線。為了解除這個顧慮，我講三中全會路線本來就包括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這兩個方面。沒有想到我在團拜會上關於兩個基本點的講話，很快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對，遭到一些思想僵化的人，某些比較保守的理論家的反對。他們說，不能把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作為兩個基本點並提。四項基本原則是綱，改革開放是目，是一個政策、一個方法。」【190】趙紫陽這裏說到的「綱目論」，是3月間中宣部理論局長盧之超佈置中央黨校開的一個座談會上有人提出來的。後來鄧力群在他的回憶錄《十二個春秋》中做了辯解，說這個會不是他讓佈置的，因此，「趙紫陽是在與風車作戰」【191】。其實，問題的關鍵不在於這個會是不是他佈置的，而在於趙紫陽批這個「綱目論」有沒有道理，他鄧力群對這個「綱目論」是持什麼態度。這個說法，嚴重貶低了改革開放在三中全會路線中的地位，背離了鄧小平的主張，而且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是一些人攻擊改革開放的武器和理論依據。

在這一階段，中央政改辦的研討工作在鮑彤的領導下，仍舊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但是，趙紫陽在反「自由化」問題上的與胡喬木、鄧力群的這種針鋒相對，也直接波及到了政改辦的工作。

反「自由化」運動一開始，作為中央政改辦四位負責人之一的嚴家其就成了鄧力群一夥追查的重點對象。胡喬木和鄧力群都曾經親自向趙紫陽提出要求，讓嚴家其離開中央政改辦。據鮑彤回憶說，「當初嚴家其到政改辦工作還是胡喬木推薦的。政改辦成立的時候，紫陽還沒有找我談，就先找了胡喬木說，小平要我成立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研

【189】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31頁。
【190】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30-231頁。
【191】鄧力群：《十二個春秋》，「1987年的風浪」第四節，「趙紫陽"5•13"講話前後」。

討小組，下面要設一個辦公室，請你推薦個人，推薦個學者。胡喬木就推薦了嚴家其。嚴家其就這樣成了中央政改辦的負責人之一。」可現在，胡喬木又出爾反爾，趙紫陽沒有理他們。鮑彤還為此寫了一個報告給紫陽，說嚴家其同志是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這段時間在我們這裏工作，工作很好，很起作用，有人說他是自由化，不存在這種情況。這個報告送給趙紫陽以後，紫陽批給了胡喬木、鄧力群。後來，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又打電話給嚴家其，要他回社科院參加反自由化「學習」，又被鮑彤所拒絕。

另外，當時在政治體制改革理論與原則專題組任負責人的廖蓋隆、參加這個組工作的原中宣部理論局局長理夫【192】，都是上了反「自由化」黑名單的人，胡喬木、鄧力群也幾次想讓他們「回原單位參加『反自由化學習』」，都因鮑彤的反對而沒有得逞。這段時間，鄧力群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的部下，大整各種人黑材料，向老人們遞送。在這場攻勢中，陳雲掛帥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全力支持，副書記王鶴壽【193】在中央生活會上公開說，要開除嚴家其的黨籍，看趙紫陽如何應付。

3 月 10 日上午，中央召開有鄧小平、陳雲、李先念、趙紫陽等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由薄一波彙報十三大人事安排情況，鄧力群彙報反自由化鬥爭情況。鄧力群說，現在 70%以上的人對反自由化是抵制的，要經過三、四年的艱苦鬥爭才能進入正軌。會議決定還要點名批評思想界 12 個人。鄧力群提到正在鮑彤主持的中央政改辦班子裏擔任負責人之一的嚴家其，說他搞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是當著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幾位老人的面告狀，如果讓他們搬倒了嚴家其，那麼將對趙紫陽本人，對他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工作將會產生嚴重危害。趙紫陽當即說，「嚴家其沒有問題，他反自由化很積極。」這次會議，仍為中央常委的胡耀邦沒有出席，鄧小平也沒有講話。【194】

鄧力群坐不住了，他開始直接向鮑彤發動攻擊。大概是在 1987 年 5、6 月份的時候，他批轉給趙紫陽一封信，信是鄧力群的部下梅行

【192】理夫，1985-1987 年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局長。反自由化運動開始以後，被當作「自由化分子」而被迫退休。已去世。

【193】王鶴壽（1909-1999）：河北唐縣人。時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書記（第一書記由陳雲兼）。

【194】參見吳稼祥《中南海日記》第五部分，第二十二節，「鄧小平與陳雲短兵相接」。

寫的，揭發趙紫陽的秘書鮑彤有政治問題，說主持的中央政改辦主持日常工作的陳一諮接受了美國「索羅斯基金會」的資助，而索羅斯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有聯繫。索羅斯到中國來，鮑彤會見了他。這封信，趙紫陽批給了鮑彤。鮑彤為此又給趙紫陽寫了個報告，報告說，索羅斯訪華時提出要見我。我為瞭解他的背景情況，特意發了個電報給我國駐美國大使館，詢問索羅斯的情況，以及他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關係。大使館回電說沒有什麼關係，索羅斯對中國很友好，並建議我見一見他。在這個情況下我會見了索羅斯。趙紫陽把鮑彤的這個報告又批轉給了胡喬木和鄧力群，並批給中央五人小組其他領導、中央書記處成員閱知。

從表面上看，左派們的進攻是針著對鮑彤、嚴家其、廖蓋隆、理夫等人的，實際上，是想從他們身上打開一個缺口，以證明趙紫陽重用「自由化」分子，進而證明趙紫陽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是在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以離間和削弱鄧小平對趙紫陽的信任，徹底搬掉趙紫陽這個他們反「自由化」的最大障礙。他們已經搬掉了胡耀邦，再搬倒了趙紫陽，政治體制改革就可能無疾而終，鄧力群大有可能在十三大上登上總書記的寶座，或許，這才是他們的最終目標。

針對趙紫陽的部下們的攻擊未見成效，鄧力群抓住機會，開始直接向趙紫陽發動進攻。3月15日，中宣部召開的全國宣傳部長座談會結束時，趙紫陽到會講話。當趙紫陽說到「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氾濫的情況已經開始扭轉」時，鄧力群突然插話說，「有人認為，說自由化的受到了批判，幹自由化的沒有問題。」吳稼祥在他的日記中評論說，這顯然是在向趙紫陽公開挑釁，潛台詞是你趙紫陽是幹自由化的，是公開要和趙紫陽爭奪總書記的位子。同時也暴露了鄧力群們反「自由化」的真正目的，是要幹倒所謂幹「自由化」的。趙紫陽早就知道他們的手法，所以一直強調反「自由化」只限於政治思想領域，不涉及經濟領域。這時，趙紫陽朝鄧力群轉過臉去，微笑著反問道：「老鄧，你的意思是不是認為現在搞的承包、租賃和股份制都是搞資本主義？」這一問，問到了鄧力群的底牌，但他根本不敢把自己在私下嘀咕的想法公開表明出來，因此無言以對。【195】

【195】以上兩次會議情況，參見吳稼祥《中南海日記》第五部分，第二十四節，「鄧力群向趙紫陽挑釁」。

鄧力群等這股靠反「自由化」才能吃飯的力量，與趙紫陽控制反自由化運動的努力，展開了一場政治博弈。他們不甘心受到趙紫陽和中央「4號文件」所劃定的範圍的限制，千方百計地打破要打破這個框框。4月6日到12日，以《紅旗》雜誌文藝部、《光明日報》文藝部、《文藝理論與批判》三家報刊的名義，在河北省涿州召開了一個「組稿會議」。實際上，這個會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直接支持下召開的，參加會議的共有120多人，其內容也遠遠超出了「組稿」的範圍。在會上定了一批文藝大批判的題目。當時文藝界對這個會議議論紛紛，傳說這次會上準備批判100多個人。並且組織了包括政治、經濟、哲學、史學、文學、藝術、教育等在內的若干個「大批判組」。趙紫陽得知涿州會議的情況以後，擔心會超出「4號文件」的範圍，派人調走了這次會議的全部錄音帶和會議簡報。

當聽到中宣部長王忍之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提出要進行「第二次撥亂反正」，趙紫陽十分氣憤，嚴厲地批評了王忍之，說，「你撥誰的亂？反誰的正？」趙還說：「我知道，這話不是出自於你。」王忍之急忙說：「是我說的。是我偶爾失言。」（實際上，「第二次撥亂反正」是鄧力群說的）趙還批評他：「聽到小平說『主要是反左』，你們宣傳部如喪考妣，這是什麼精神狀態？」【196】

六、趙紫陽的「5·13講話」

1987年3、4月份，鄧力群一夥左派們越來越變本加厲，他們進攻的矛頭直接指向了趙紫陽，在各種會議和各種場合大批「幹『自由化』的」，這些言論簡直就是文革中說「走資派還在走」的翻版。對當時國內反「自由化」的這種局勢，鮑彤和中央政改辦研究人員們的心情十分焦慮。

4月25日晚上，鮑彤組織中央政改辦對當時改革開放和反「自由化」的形勢進行了一次內部討論。在這次會上，許多人發言，認為情況不能再繼續這樣下去了，應該進行必要的反擊。如果這種局面不能得到盡快扭轉，不但經濟體制改革進行不下去，而且即將出台的政治體制改革也很可能夭折。特別是五個月後即將召開的黨的十三大，很可能開成反「自由化」的大會，改革開放將難以為繼。

【196】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0年12月修訂版，第303頁。

會上，大家紛紛列舉了反「自由化」以來出現的奇談怪論，比如，有人說，這次反「自由化」是「第二次『撥亂反正』」；有人說，提「兩個基本點」不準確，四項基本原則是綱，改革開放是目，二者不能並列；有人說，經濟上的自由化是政治自由化的基礎，不反經濟自由化，政治上的自由化也反不了；有人說，中央規定不批經濟上的自由化，不等於經濟領域沒有自由化；有人說，三中全會以來的實踐證明，必須堅持以計劃經濟為主，不然不能堅持社會主義；還有人說，實行廠長負責制是不要黨的領導，是「自由化」的具體表現，等等。這些言論都直接背離了黨的三中全會路線，有些話甚至直接批到了鄧小平頭上。還不僅如此，甚至連為文革翻案的主張都出來了，什麼「自由化就在黨內，說明有走資派，毛主席的話沒有錯」等。說這些話的人，絕大多數都是黨的中高級宣傳理論幹部，如中宣部長王忍之、中宣部理論局長盧之超等。

聽到這些明顯背離三中全會路線，背離鄧小平「兩個基本點」的主張和言論，特別是中央宣傳部門的領導也加入其中，違背中央精神違反黨的原則，散佈這種錯誤言論，鮑彤和大家都感到形勢嚴峻。當晚，鮑彤根據這次會議情況起草了一份報告。鮑彤後來回憶說，這個報告的內容，「主要是講：有人似乎把四項原則與改革開放對立起來。反自由化的態勢對當前改革有影響，對十三大政治體制改革出台不利。建議抓一抓改革的輿論，在宣傳上，改革與反自由化並重是必要的。同時，建議在 7 月 1 日重新發表小平同志 1980 年的「8•18」講話，這是我們整個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有了鄧小平的這篇文章，就什麼話都不用說了，我們就是落實鄧小平思想。而且，這不僅僅是他個人的話，是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這是經過中央認可的，同意的。」

4 月 27 日晚，鮑彤將這個報告送給了趙紫陽。

28 日上午，趙紫陽來到鄧小平家。關於這次會見，趙紫陽在他的回憶錄中是這樣記載的，「我與鄧小平作了一次長談。向他彙報了幾個月反自由化鬥爭之後，大氣候已經起了變化，自由化言論佔領輿論陣地的情況也基本改變過來了。而在一些人中間，以左反對改革開放、借反自由化來否定改革開放的論調仍然甚囂塵上。這種氣氛與把十三大開成改革開放大會的要求極不協調，必須從現在起著重宣傳改革開

放這一面，為十三大的勝利召開作好輿論準備。我的意見得到鄧的贊同。他要我好好準備，最近就這個問題講一次話。」趙紫陽還建議，7月1日重新發表1980年鄧小平所作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篇講話。【197】趙在彙報中還談到了鮑彤報告中所反映的那些情況，這讓鄧很吃驚。鄧小平說，贊成「兩個基本點」的說法。去年的事情【198】不應該影響改革開放。暫時收一下是必要的，但改革要堅持，要加快。鄧還交代說，十三大報告的稿子很重要，有個東西就先拿來，我們也出出主意。鄧小平還表示，同意七一重新發表他的「8•18」講話。

28日中午，趙紫陽辦公室打來電話，要鮑彤盡快去一下。近一個小時後，鮑彤回到辦公室，立即召集周傑、陳一諮、陳福今、吳國光、吳偉、黃海、張偉等人開會。會上，鮑彤先向大家介紹了趙紫陽和鄧小平見面的情況，說，我們要為紫陽準備這個講話，5月2、3號拿出來。請幾位同志先拿出一個初稿。當時進行了分工，由吳偉、張偉、黃海各寫一部分，吳國光統稿。

然後，鮑彤向大家轉達了趙紫陽對起草這個稿子的意見。紫陽說：五一後要找宣傳、理論部門、黨校方面的人開個會，講一次話。首先書記處要議一下。講兩點，一是講反「自由化」，二是講改革的宣傳工作。反「自由化」，要講大氣候已經變了，局面已經控制住，但真正深入下去還要做許多深入艱苦的工作。昨天書記處開會，就曾經說到，要堅持正面教育，要深入到人們腦子裏面去，真正起作用，有效果。講話一定要兩面寫。反「自由化」要寫得充分，不能輕描淡寫。一是正面教育如何深入，二是對犯過「自由化」錯誤的同志抱什麼態度。要講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承認錯誤改正就好。對整個反「自由化」的形勢要有個分析、估計。講清下一步怎麼深入，對犯錯誤的同志怎麼辦。要給政策，要開生活會，耐心幫助，講明這是黨的信任，不要頂牛。

在講到改革開放時，趙紫陽說，講改革開放的輿論宣傳，要能站得住。對這方面的錯誤觀點可以歸納一下，這種觀點不是不允許講，但它證明背離三中全會路線的觀點仍然存在，因此有宣傳改革的

【197】趙紫陽：《改革歷程》，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版，第217頁。

【198】這裏應該是指胡耀邦辭職這件事。也許，在鄧小平的概念裏，胡的下台是去年年底那幾天就已經確定事情。

必要。對一般的錯誤觀點，可以說得和緩一些，對黨校出現的錯誤觀點【199】，要說得嚴肅些。要讓大家看清世界大勢，哪個社會主義國家不在批評僵化教條？我們有些同志思想卻沒有進步。

在轉達完趙紫陽的意見之後，鮑彤提出了一些具體要求。他說，要收集一些材料，做些歸納。哪些該講，那些不該講，哪些講了有意義，哪些講了沒意義。該講的一定要講，可講可不講的就不講。材料要確實，口氣要緩和。要講清，上半年的波折，不應該影響改革開放，還要加快步伐。要站得住，通得過，要全面，有水平。

鮑彤知道，我們這些參與起草的年輕人都是不贊成反「自由化」的，所以，他特別強調，反「自由化」的意義一定要講充分，這是一個大前提。要充分估計到，如果反「自由化」搞不下去，黨的領導層就無法下台階。犯錯誤的同志要合作，對自己的錯誤有個態度。要講清，不要看小道理，有委屈，要從大局看問題。要把反「自由化」的長期性講充分。對於怎樣加快改革的步伐，怎樣進行改革的輿論宣傳，也要講點事實，說點道理。為什麼我們的政策是「兩個基本點」？文革前也叫「社會主義」，三中全會卻提出了「中國特色」，特色就是改革開放。對前一個問題要嚴厲些，後一個問題可以和緩些。在現在的形勢下，能提出改革的輿論宣傳就是勝利。最後可以歸結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一定不能搞；改革開放一定要堅持，要加快步伐。

初稿很快就寫出來了，又由陳群林進行了潤色，磨掉了稜角，大家又討論修改了一次，然後就交給了鮑彤。鮑彤在上面進行了多處修改，又加入了一些很關鍵的話。我記得很清楚，其中有一段話很尖銳，「現行政策的穩定是經濟局勢穩定的前提，不允許把人心搞亂。試問，如果把現行政策說成是自由化，人心惶惶，生產不搞了，生意不做了，砍樹的砍樹，殺豬的殺豬，誰負這個責任？」這段話，就是鮑彤親自加上去的。

5月3日，這個稿子報給了趙紫陽。次日，趙紫陽看了以後，又送中央五人小組楊尚昆、薄一波、萬里、胡啟立閱，同時也送給了鄧力群，均未表示不同意見。趙紫陽在稿子的首頁上給鄧小平寫了一個簡短的報告。報告說，小平同志：根據您四月二十八日講的精神，我準

【199】指1987年3月在中央黨校開的一次座談會，有人在會上提出「『四項基本原則』是綱，『改革開放』是目」的《綱目論》，對中央「兩個基本點」表示了許多不同的意見。

備在近期召集宣傳、理論、新聞、黨校等有關方面同志開個會。現將講稿送上，請審閱指示。如原則同意，我再找一波、尚昆、萬里、啟立同志醞釀一下，並提請書記處討論，最後再開會佈置。5月5日，鄧小平在這個稿子上批示「完全贊成」。

然後，趙紫陽又召開了書記處會議，討論這個講話稿子，力爭在講話之前化解掉可能出現的分歧。幾位與會的中央書記處書記都認為這個講話很重要，決定把原來打算只在宣傳、理論、新聞和黨校幹部會上講的範圍，擴大到全體在京黨政軍群部級以上領導幹部，並且在會後要下發文件，擴大傳達到全黨。

5月13日下午三時，這個「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幹部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以上系統在京各單位，和中央、國家機關部委部以上領導幹部共1,000多人參加了會議。筆者也有幸參加了這個會議。會議由萬里主持。趙紫陽在會上發表了講話。

在這篇講話中，趙紫陽對當時有人提出要打破四號文件的「框框」，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擴大到經濟領域的主張進行了嚴肅的批評。他說：

> 這種意見對不對？不對。中央在四號文件中明確規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有明確的範圍，不要聯繫經濟改革的政策，農村政策，以及其他等等。所以要這樣規定，一是因為現行政策是中央制定的，不存在什麼自由化不自由化的問題；二是因為現行政策的穩定是經濟局勢穩定的前提，不允許把人心搞亂。試問，如果把現行政策說成是自由化，人心惶惶，生產不搞了，生意不做了，砍樹的砍樹，殺豬的殺豬，誰負這個責任？所以，所謂打破四號文件『框框』的論調，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言論，政治上是錯誤的，組織上也是違反紀律的。這種論調，同我們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宗旨沒有共同之點。

這個講話中還有一段講到在改革開放中必須反對僵化的觀點非常精彩，值得引在這裏。趙紫陽說：「改革已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潮流，不改革沒有出路。四個堅持是我們的基本原則，改革、開放、搞活是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方針、總政策。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搞活就搞不下去；不改革、開放、搞活，四項基本原則也堅持不好。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必然會滑入資產階級自由

化，這個道理比較好懂。其實，不改革，也必然會助長資產階級自由化。因為只有改革，才能發揮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大大發展生產力，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充分顯現出來，使社會主義真正具有吸引力。如果不改革，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限制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搞得社會主義沒有多少吸引力，豈不是給資產階級自由化幫了大忙？所以，兩個基本點是統一的，既不應拿這個來排斥那個，也不應拿那個來排斥這個。二者之間的關係，是唇齒相依的關係，不是互相排斥的關係。兩個基本點統一起來，才是三中全會以來路線的完整內容，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才是有生命力的、有血有肉的、實踐中的科學社會主義。」【200】

這是一篇十分精彩的講話，它在理論上、實踐上給了左派們想用反「自由化」阻擋改革開放的企圖以致命一擊，在後來被人們稱為趙紫陽「5·13 講話」。主持會議的萬里在趙紫陽講話結束以後說，今天紫陽同志的這個報告非常重要，非常及時。它不僅是對宣傳、理論、新聞、黨校的同志們講的，而是對全黨講的。今天各部門都來了，各地各部門所有的領導幹部都要結合自己的情況進行貫徹，中央還要專門發文件。

趙紫陽「5·13 講話」精神迅速被傳達了下去，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來了個「急剎車」，改革開放再次成為輿論宣傳的主流。很快，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工作也開始提上了日程。

5 月 23 日，政改辦舉行專門會議，討論趙紫陽的「5·13 講話」。會上，鮑彤作了一個長篇發言，談趙紫陽「5·13 講話」的意義。大意如下：

紫陽的「5·13 講話」對黨的各方面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它的主要內容，就是講兩個基本點是唇齒相依，不是互相排斥的。那麼用什麼辦法，採取什麼措施才能避免片面性？紫陽在會上講，理論隊伍中有五種同志，一種是既堅持四項原則，又堅持改革開放的同志，這是理論隊伍的骨幹、核心。二是搞「自由化」，三是搞僵化的，這是兩個極端。第四、第五種是多數，是在這兩個方面有缺點的同志。不能排斥這兩部分同志，要團結兩個多數。紫陽在除夕上午國務院的部長會上講，後來在春節團拜會上

【200】趙紫陽：《在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單行本，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7 月版。

又講，強調團結，團結的基礎是三中全會路線，第一種同志是團結的核心。

大多數有左或右錯誤觀點的同志是什麼原因犯錯誤？根本問題就是過於簡單化，貼標籤，動不動就是什麼「分子」，這不對。之所以犯錯誤，大量的不是什麼「階級根源」，不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與無產階級作對，也不是有多少封建餘孽，企圖以四項原則為口號。實事求是地估計，大部分人是對共產黨有感情，真心的。年輕的同志是在黨的關懷下長大的。他們最根本的問題是脫離實際，是認識上的問題。這樣，紫陽在講話中開出的「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研究中國實際問題」的藥方是有用的。有的人左得可愛，有左傾幼稚病，有的人右得可愛，有右傾幼稚病，大家都希望中國發達，找到解決中國問題的藥方。

在許多情況下，有一種怪現象，兩個基本點，總有人自覺不自覺地把它分開。難道改革不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不是要以黨的領導為基本保證？改革就是社會主義的完善，是幹社會主義，改革就是要有黨的領導為前提，這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是一回事嗎？我們講兩個基本點，是為了防止兩種傾向，但兩個基本點是一條路線。紫陽看到兩種偏向，講兩個基本點是為了使大家注意防止兩種錯誤傾向。四項原則，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而改革開放有新意義，是我們三中全會以來提出來的。改革開放的提出，標誌著社會主義是有生命的、發展的，不是僵化的。如果不承認改革開放，那社會主義就是僵化的。如果不是旗幟鮮明地提出改革開放，那三中全會路線的新意義在什麼地方？不講兩個基本點，就不能完全理解三中全會路線。把商品經濟理想化與把計劃經濟理想化一樣，把民主理想化與把黨的領導理想化一樣，都是幼稚的。如果不能正確的解決這樣兩種人的關係，就有可能導致黨的分裂。各種犯錯誤的同志大多數是認識根源，不是階級根源。階級根源不是說沒有，而是說不是主要的。

我們應該承認，四人幫是我們黨歷史上的污點。去年冬天的事情是三中全會後發生的，這時黨的佔主導地位的路線是正確的，和四人幫不能相提並論，怎麼能說是以又一次撥亂反正呢？研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可以得出三條結論：一是在初級階段，自由化問題不可能不表現出來，因為你不可能封住人家的嘴巴。在社會主義優越性還沒有充分表現出來之前，自由化思想不

可能完全消滅。如果認為在生產力趕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前，企圖用強制的辦法、行政命令的辦法，可以強制人們不懷疑社會主義優越性，這是不可能的。第二個結論，消滅不可能，但我們完全可能縮小這種「懷疑論」的市場，這就是要搞改革開放。第三個結論，「資產階級自由化」氾濫的現象是完全可能而且應該避免的。氾濫可能在小範圍，這是「小氣候」，沒什麼了不起。要造成一種「大氣候」，我們黨有這個資格、能力的本錢。不能用第一個結論否定第二、第三個結論。

過去教育中，有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說教太多。這就向我們提出一個問題，怎樣改善、提高思想教育的水平。我們有些同志，總覺得自己懂得的，別人也應該懂。用左批右的，實際上是在幫右的忙，正像不搞改革是幫自由化的忙一樣。所以兩個基本點要並重，我們同志的頭腦中應該時刻注意，這是一條路線。我們搞改革，希望搞四項原則的人不忘改革。都是黨內同志，由於不同角度，有不同觀點，脫離了實際，從而犯錯誤。批評別人片面性，不見得自己就沒有片面性。往往注意了別人的片面性，忘了自己的片面性。在今天的情況下，我們同志要非常謹慎，姑且不說我們自己也有片面性。本辦公室研究問題從來不是鐵板一塊，這很好，內部有制約和調節，外部也應該這樣。這是講根源、團結、防止片面性。

紫陽的講話為我們開拓了非常廣闊的理論探討的餘地。黨的歷史上曾經有過非常活躍的時期，延安時期的理論風氣很放得開。要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有新發展、新貢獻，就要創造第二次延安時期。三中全會的思想路線是實事求是，這是小平同志一直在謀求的黨內政治生活的空氣，有了這個，黨就有救，否則就沒救了。什麼時候能把白貓、黑貓理論作為黨的指導思想，我們黨就有救了。什麼時候我們黨的標籤太多，黨就跑不動。去掉標籤，即去掉包袱。紫陽提出，不能離開生產力發展，研究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這就是小平思想的精髓。50年前的抗日戰爭，如果言必稱希臘，那就一定會輸。言必稱希臘，我理解就是言必稱蘇聯，言必稱共產國際，言必稱莫斯科，言必稱斯大林。那個標籤就太多，這是無產階級，那不是馬克思主義，按克勞塞維茨打仗就是資產階級？十年內戰貼上標籤，就打不勝。抗日戰爭要是也背上標籤，那也打不勝。黑貓白貓就能打勝。所以，當時把教

係主義當成第一大敵，所以，中國革命才能勝利。1942年延安發動了一個思想啟蒙運動，揭蓋子，去掉白內障，陽光一片。最重要的是，離開了生產力發展，孤立的研究生產關係，那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孤立地研究馬克思的這句話、那句話，那也不是馬克思主義。把最大多數人的利益放在一邊，孤立地研究標籤，這是極端錯誤的。現在群眾的最大利益是要求擺脫貧困，值此不顧去研究標籤，肯定不是馬克思主義。

如果十三大報告中能說，凡是現階段有利於發展生產力的措施我們一概不排斥，就是把白貓、黑貓理論載入了黨的綱領了，就樹立起一面旗幟。不要把計劃經濟、市場經濟都理想化。市場是客觀的，計劃是主觀見之於客觀的。市場本身不能理想化，何況中國市場經濟還沒有發達！計劃也不能理想化，何況中國是這麼大，情況是這麼複雜。要把十億人用一個計劃統起來，那可能嗎？計劃的錯誤，是有計劃的錯誤。而這種錯誤一犯就是全局性的。有這種認識能說是思想解放無邊嗎？不是。有利於生產力發展，這就是條件、根據、邊界條件。邊界條件就是有利於發展我國生產力，有利於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凡是符合這兩條的，就可以；不符合的，再好的藥方也沒有用。這就是邊界與根據，邊界條件很重要，離開了生產力發展來研究生產關係，就叫沒有邊界，不顧條件。對症下藥，就是邊界。有利於發展生產力，在這個範圍內去研究，考慮一種措施在什麼範圍內、程度上起作用，相互制約如何，就是合理的。這樣就能使我們的方案的可行性、說服力強一點，執行起來好一點。

一人在岸、一人在水，在水的不好去團結在岸的，兩個人都在岸上就要團結；有利於發展生產力的就搞，這是膽大，也是膽小，勇氣在此，謹慎亦在此。中央現在有三個寫作班子，我們、二樓、玉泉山【201】，團結起來一條路線、兩個基本點。

七、「要為十三大創造一個改革開放的大環境」

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辭職後，鄧小平提議由趙紫陽代理總書記，這表示了鄧小平心目中，十三大上總書記這個職務，非趙莫屬。但是，當時中共內部的政治格局中，還有另外一派與鄧小平格格不入的政治力量，這就是以陳雲為首的保守派。鄧陳矛盾由來已久，雖然鄧

【201】二樓，指當時與中央政改辦同駐中辦招待所的中宣組織的反「自由化」寫作班子；玉泉山，指當時駐玉泉山的由鮑彤主持的中共十三大報告起草組。

小平在黨內的政治較量中佔了上風，但是陳派仍然有著巨大影響，在胡耀邦辭職以後，他們屬意的總書記是鄧力群。那段時間，政治老人王震就利用他的身份四處活動，到處打招呼，拉贊助，提出要鄧力群在十三大上做總書記。甚至當著趙紫陽的面，他就直接說，你最好不要當總書記。趙紫陽回憶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力群每有困難或不便講的話，常常讓王震出來。大約在 1987 年夏季，葉選寧打電話給我，說王震想找我談一次話，於是我就去了王家。王震勸我說，你不要接任總書記，國務院的工作很多，離不開你，書記處的事不多，可讓姚依林去搞就行了。談話時葉選寧在場。我當時因為也不想任總書記，所以就請王震去說服鄧小平。後來有人告訴我，王震實際上在積極活動，想要推鄧力群當總書記。所以許多人擔心，要我無論如何不要把位子讓給鄧力群，這就引起了我的警惕。」【202】

1995 年，趙紫陽接受楊繼繩採訪時說：我確實不願當總書記。我願意在總理崗位上把經濟改革搞下去。但是，當時讓我代理總書記我沒有堅持自己的意見。在那種形勢下，只有我能代。我代的效果可能要好一些。如果耀邦下台以後排山倒海地反自由化，就了不得。我代總書記，首要任務是少傷一些人，把運動控制住，把反自由化調整到改革開放。那個時期我多次講過不當總書記。現在我想，讓別人搞就沒有十三大這個結果，肯定不如我。」【203】

趙紫陽這話說得不錯。當胡喬木、鄧力群發動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鋪天蓋地的襲來的時候，能成為改革開放中流砥柱的，只有趙紫陽了。自從 1987 年 1 月擔任了代理總書記以後，他就抓住一切機會，利用所能利用的各種場合，給這場反「自由化」劃框框。也正是因為如此，他迅速取代了胡耀邦，成為了胡喬木、鄧力群等一干左派們的新的政治對手。在左派們的瘋狂打壓面前，雖然趙紫陽獨木難支，不得不暫時退卻，在一些場合也講一些反「自由化」的話，但是他講的目的，在於限制。1987 年的「5・13」講話，就是他這種「跪著造反」的典型範例。

【202】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224-225 頁。
【203】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修訂版，第 302 頁。

在當時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種政治高壓下，前面已經拿下了一位總書記，趙紫陽為什麼還能如此大膽，敢於頂著這場政治風暴，公開地和左派們寸土必爭？我認為，這一方面是來自他對改革開放的堅定決心，另方面，也來自他對鄧小平立場和態度的準確理解和把握。本文前面已經談到過鄧小平對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缺一不可的基本觀點。趙紫陽正是準確地把握了鄧小平的這一思想，他才在反「自由化」的大潮中得到鄧小平的支持，敢於頂風大講改革開放，敢於用改革開放來限制反「自由化」。

從鄧小平方面說來，他之所以要支持趙紫陽限制反「自由化」，原因也同樣是如此。在趙紫陽發表「5・13」講話的20多年後，鮑彤在回憶到這個講話時，就鄧小平為什麼要支持趙紫陽阻擊反「自由化」，有過一段分析，我認為是符合當時情況的。他說：「就鄧小平的腦子裏面的想法來說，老百姓死路一條就是共產黨死路一條。老百姓死路一條當然是很嚴重的問題，但是對鄧小平來說最嚴重的問題、最根本的問題、最使他思想上震動的問題是共產黨會死路一條。碰到兩個問題衝突的時候他最堅持什麼？他最後要堅持的是四項基本原則。但是當四項基本原則要把改革搞掉的時候，他又認為不行了，還是要搞改革。這個裏面我們可以看出鄧小平是真正要搞『兩個基本點』的。他為什麼同意紫陽作5・13講話？那是因為鄧小平看到，耀邦下台後再繼續搞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改革開放就搞不下去了。所以他同意紫陽說的，現在大氣候變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如果再繼續反下去，那就要影響你的另一個基本點改革開放了。9月份就要開始十三大，當時已經是5月份，離9月份只有四個月了，再搞下去三大還能開成一個什麼會？那不成了反自由化的大會了？共產黨歷來的說法，是要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可反自由化能開成『團結、勝利的大會』？所以當紫陽提出，要把十三大開成一個改革開放的大會，鄧小平立刻就同意了，這才有了紫陽在『5・13』那扭轉乾坤的一舉。」

在趙紫陽「5・13」講話前後，中央高層在所謂兩個基本點的問題是依然存在各種爭論。比如5月4日上午，中央書記處舉行會議，討論加強高校政治思想工作問題。在教委準備的文件中只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講改革開放。薄一波提出，還要講堅持改革開放，搞活，要培養掌握兩個基本點的人。趙紫陽支持這個意見，他說，現在就是

要在開放的條件下做思想工作，過去是溫室，現在是開放，教育出來的人，如果只能在封閉的條件下、在溫室裏解決問題，那是不行的，要培養學生有識別與免疫的能力。另外，教委的文件還強調，要在高等學校中加強黨的領導。趙紫陽說，作為方向，還是要實行校長負責制，確切的說，要教育家治校，要提出社會主義教育家的概念，要像社會主義企業家一樣，教育家治校，實行全面領導，包括思想工作。

5月18日上午，中央書記處舉行會議，研究薄一波在26日全國整黨會議上講話稿。這個講話稿引用了鄧小平的一段談話，說整黨中要反右。趙紫陽批評說，引小平的話要引全義，小平同志還講了反左嘛。報告後面還引用趙紫陽的話說，四項基本原則是中國各項政策的基礎，趙紫陽澄清說，我沒有講過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內外各項政策的基礎。小平同志講這個話也是在講到四項基本原則時講的，小平同志也主張，改革是我們各項政策的基礎，要說基礎，兩個基本點都是基礎。現在確實有人貶低改革、開了會，說兩個基本點有綱有目。趙紫陽強調，兩個基本點不能說一個是基礎，一個是政策。

報告中講到，要培養骨幹，建立一支理論隊伍，對此，趙紫陽說，我們要用三中全會路線來衡量人，政治路線決定組織路線，組織路線服務於政治路線，要根據兩個基本點工作，選拔幹部、紀律檢查都要掌握兩個基本點，黨的建設要掌握黨的路線。

報告提出，幹部選拔有三條標準，忠誠黨的信心政策，文革中沒有問題，作風公道正派，趙紫陽則提出，要有政績的原則，革命化就是實行三中全會路線，政績就是執行三中全會路線有沒有成績，沒有政績，靠它沒飯吃，要選拔執行三中全會路線有成績的，有了成績，群眾才承認。後來，鮑彤把這些思想總結為選擇幹部的三條原則，即公開原則、民主原則、政績原則。

1987年下半年的6－9月，在中央高層，有關十三大的籌備、十三大報告和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的徵求意見和修改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由於趙紫陽作了「5·13」講話，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風潮得到了扼制，整個黨內和社會上的輿論環境也開始向改革開放方面扭轉。7月1日，鄧小平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重新發表，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工作開始在新聞媒體上有計劃地進行，各種關於

經濟、政治改革的宣傳文章逐步多了起來。從表面上看，一個有利於十三大召開的改革開放的政治環境正在形成。

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黨內的左派勢力們並沒有因為十三大的臨近，而放棄他們企圖用反「自由化」阻止改革的腳步、阻止政治體制改革方案通過的努力。趙紫陽在他的《改革歷程》中回憶過一件事情。1987 年夏天的一天，鄧小平辦公室主任王瑞林給趙紫陽轉來一封北京市副市長王大明【204】的信，反映中宣部的一些局長得知鄧小平講，今後主要是反左，情緒很不正常，說了不少出格的話，什麼「要堅持頂住呀！」,「現在勝負未分呀！」等等。趙紫陽明白，反「自由化」這件事情並沒有完。這些左派們還不甘心，他們並沒有接受中央關於反「自由化」開始轉入正面教育的決定，而是在窺探時機，時刻準備掀起更大的風浪。7 月 11 日，趙紫陽找來中宣部部長王忍之、常務副部長王維澄【205】，根據這封信嚴厲地批評了他們。趙紫陽說，中宣部的精神狀態不好，聽到鄧小平講反左是主要的，就覺得大勢不好，如喪考妣。你們這種狀態如何能正確宣傳貫徹三中全會的路線呢？趙紫陽要他們切實負責轉變中宣部這種立場。但他倆當場毫無悔改表示，只推說他們完全不知道此事。【206】

趙紫陽知道，中宣部狀態的根子，不在於兩個部長，而在於主管中宣部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力群。當時距離十三大的召開只有三個月左右的時間。趙紫陽認為，要為十三大創造一個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保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政治體制改革等一系列新的理論、政策在大會上得到順利通過，就必須扭轉目前改革開放輿論宣傳方面的不力局面，解決黨的主管宣傳理論工作部門與中央唱對台戲、打橫炮、使反勁的問題。而要做到這一點，只有從解決高層人事上入手。為此，在那幾個月裏，在鄧小平的支持下，趙紫陽做了三件事：

第一，改變鄧力群主持思想戰線工作的地位，由胡啟立接管。

鄧力群實際上是思想理論宣傳戰線保守勢力的總司令。趙紫陽認為，如果讓鄧力群繼續主持理論工作，中國不會有有利於改革開放的

【204】王大明（1929-）：曾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後任北京市市長、政協北京市第八屆委員會主席。

【205】王維澄（1929-）：浙江桐廬人。1987 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1998 年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

【206】參見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209 頁。

理論發展。要改變當時宣傳輿論方面的不利局面，必須果斷地改變鄧力群在書記處中分管理論宣傳工作的分工。

早在 1987 年 3 月間，趙紫陽就曾向小平提議，調天津李瑞環到中宣部協助鄧力群主持意識形態的工作，得到鄧的同意。趙紫陽的目的是「摻沙子」，理由是，主管意識形態方面增加一個人，就會聽到不同的意見。兩個人管可以有不同的聲音，下面情況可以反映上來，不會像完全由一個人管那樣，下面意見反映不上來，我們的意見也貫徹不下去。但是事情到了陳雲那裏，陳表示不同意，認為宣傳工作還是由鄧力群一人管為好，否定了趙的意見。

隨著十三大的臨近，趙紫陽覺得這個問題非解決不可，他認為，改革開放迫切需要新的理論觀點來指導，來闡述；理論研究應該緊密配合改革開放的實踐。如果繼續由鄧力群主管理論，不僅不能發展理論，只能成為理論發展的束縛。所以趙紫陽正式向鄧小平建議，十三大鄧力群可以進政治局，給他一個說話、發表見解的地方，但不進書記處，不再負責思想戰線方面的工作。這件事正醞釀的時候，黨內的老同志李銳【207】給趙紫陽寫了一封信，反映鄧力群在延安時期生活作風和道德方面的問題，認為像他這樣品質不好而又保守僵化的人，不應當負責宣傳工作和意識形態方面的領導工作。李銳還附上了當年楊尚昆主持黨小組會批評鄧力群時的原始記錄。李銳親自把這封信送給鮑彤轉給了趙紫陽。李銳在信中還說，「最近聽說，還有人在活動他進政治局當總書記，這就更加令人擔憂無已，寢食不安。我一直認為，鄧力群是中央改革開放方針的反對派，十三大後，決不能讓他留在中央領導班子之內。這樣可以使黨在前進的道路上除掉一塊絆腳石，去掉一個隱患。」趙紫陽把這封信轉給了鄧小平。鄧閱後劃了個圈，批了三條：一、舊事不重提；二、不再主管思想宣傳；三、可做政治局（候補）【208】。胡啟立後來向李銳傳達鄧小平這個批示，但只傳達了前兩條。

阻擋鄧力群當總書記的當然不僅僅是李銳這封信。鄧小平對鄧力群一直印象不佳，他擔心鄧力群當總書記後，否定改革開放。恐怕這

【207】李銳（1917-）：時任中顧委委員。1958 年任水利部副部長，兼毛澤東秘書。1959 年廬山會議被開除黨籍，「文革」期間被關押。1979 年平反任水利電力部副部長。1982-1984 年任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局長、常務副部長。是改革開放的積極的支持者。

【208】意即可在十三大上讓鄧力群做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也是鄧小平不讓鄧力群當總書記的一個重要原因。鄧小平在李銳信上的批示被送給了陳雲、李先念傳閱。陳雲和李先念對鄧小平的做法都有所保留，在批語中都說鄧力群的好話，李先念說，「鄧力群是個好同志，還要很好地發揮他的作用」。但他們也不便正面反對鄧小平不要鄧力群繼續主管宣傳工作的批示，所以這件事就算是在老人們那裏通過了。【209】

後來鮑彤對這件事情有過一段回憶，他說，1987 年 7 月 7 日鄧小平會見中央五人小組之後，「啟立找我說：『小平同志說，鄧力群的形象太壞。』這大概是小平的原話。啟立告訴我：『小平說，以後宣傳工作，不要鄧力群管了，由啟立管。』他說：『我一個人怎麼管啊？我要成立個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於是，胡啟立就提了個名單，他說：『我要找兩個人幫忙，一個是鮑彤，一個是陳俊生，這兩個人是幫得上忙的。』這樣，就成立了一個中央宣傳思想理論工作領導小組。」

9 月 14 日，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趙紫陽宣佈，由胡啟立主管意識形態，成立中央宣傳理論工作領導小組，由胡啟立任組長，成員有鮑彤、陳俊生、王忍之、溫家寶、錢李仁等。十三大後，這個小組又增加了一個副組長，中央書記處書記芮杏文。

第二，撤消鄧力群任主任的中央書記處研究室。

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是鄧力群控制的左傾思想筆桿子大本營，聚集了一批反對改革開放的秀才，他們是鄧力群手下左派勢力的中堅力量。

早在 1985 年底，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的時候，由於鄧力群對改革開放的對立態度，中央書記處就曾經以調整工作分工的名義，決定鄧力群只分管意識形態，不再兼任書記處研究室主任的職務，這個職務交由王兆國擔任，並就此電報的形式向各省市發了通知。哪知道會後鄧力群向陳雲彙報發牢騷，陳雲震怒，給胡耀邦打電話說，「這事不能這麼幹吧！」結果，書記處的決定被推翻，通知收回，鄧力群仍任原職。

一年多前胡耀邦沒有做成的事情，趙紫陽這次還要做。趙紫陽認為，鄧力群不再主管思想理論工作以後，由他任主任的書記處研究

【209】參見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221-222 頁；

室也應該撤銷。樹雖未倒，猢猻先散，這樣可以使其徹底失去控制思想理論界的組織基礎。為此，趙紫陽向鄧小平提出了撤銷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的建議，理由是十三大後中央書記處不再起決策作用，而是成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的辦事機構，其下面不宜再設一個政策研究部門。鄧小平表示支持。

1987 年 7 月 7 日，鄧小平在家裏召見中央五人小組，正式宣佈了鄧力群不主管理論宣傳工作的決定。趙紫陽建議，由胡啟立主管意識形態方面工作，大家也表示同意。會議還決定，交接工作立即開始，由薄一波找鄧力群談話。同時這個會上還確定，由鄧力群兼主任的書記處研究室解散。因為這個研究室在鄧力群主持下，長期以來製造懷疑改革開放的輿論並散佈這種情緒。鄧小平在會上還說，十三大還要鄧力群擔任政治局委員。

書記處研究室撤銷後，在當時的中組部長宋平的幫助下，鄧力群對研究室的骨幹都一一做了妥善安置，其中一個主要的去向，就是中組部新成立的黨建研究所。按照鄧力群的說法，書記處研究室的撤銷幫了他的忙。1989 年之後，從研究室出去的人，擔任副部長級以上職務的有十幾個。如果一直在研究室，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210】

第三，撤銷《紅旗》雜誌。

《紅旗》雜誌，同樣是左派勢力的大本營。當年在真理標準討論中，所有中央媒體都參加了討論，唯有《紅旗》雜誌總編輯熊復【211】按照汪東興的意見，按兵不動。後來鄧小平批評說，不捲入就是捲入，意指《紅旗》站到了「兩個凡是」一邊。熊復由此檢討，被胡耀邦保護過關。但在此後的改革開放中，熊復和他的《紅旗》始終不改其左的面目，在反「自由化」是更是一馬爭先。《紅旗》雜誌的撤銷，筆者沒有查到中央的具體決策過程。據趙紫陽在回憶錄中說，是他向鄧小平提出撤銷《紅旗》雜誌的建議的，鄧表示支持。

《紅旗》的撤銷，沒有像書記處研究室那樣立竿見影，而是採取了分幾步走的方式，前後經歷了近一年的時間。1987 年 8 月 17 日，中央書記處會議通過了「中央組織部關於〈紅旗〉雜誌社領導班子調整

【210】參見鄧力群：《十二個春秋》，「1987 年的風浪」第五部分「趙紫陽撤銷書記處研究室」。

【211】熊復（1915-1995）：四川鄰水人。曾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新華社社長；1978-1988 年任《紅旗》雜誌總編輯。

的請示」，宣佈《紅旗》總編輯熊復辭職，一副總編和一顧問同時被免職，雜誌社的工作暫由副總編輯蘇星[212]主持。

12 月 23 日，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開會討論《紅旗》雜誌問題。會上胡啟立傳達了 12 月 16 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央機構改革小組關於中央、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中有關《紅旗》的決定：撤銷紅旗雜誌社，由中央黨校主辦一個黨內的理論刊物，由中央書記處組織實施。1 9 88 年 1 月 5 日，由中央辦公廳起草的《關於撤銷紅旗雜誌社由中央黨校主辦一個黨的理論刊物的實施方案》，以高揚[213]、周傑和蘇星的名義報中央書記處。12 日經書記處辦公會議討論同意並經政治局常委審閱同意。

這期間，胡啟立到雜誌社講了一次話，他說，從中央來說，繼續辦中央一級權威性的理論刊物，而且叫《紅旗》，值得研究。刊物代表中央的聲音，有權威性，人家就不大好討論，很難發表不同意見，有顧慮。放在中央黨校，作為重要理論陣地，更便於理論探討。」

1988 年 5 月 30 日，中央發出《中共中央委託中央黨校創辦〈求是〉和撤銷〈紅旗〉雜誌社的決定》，1988 年 6 月 16 日，《紅旗》出版了最後一期；7 月 1 日，掛在中央黨校名下的《求是》創刊，鄧小平題寫了刊名。

後來有人說，《求是》雜誌前身是創刊於 1958 年的《紅旗》，這是沒有根據的。雖然兩個單位人員未變、都在一個地方辦公，但是 1988 年《紅旗》明確宣佈停刊後，《求是》才宣佈創刊的，不存在前者改名為後者的歷史事實。[214]

1987 年 10 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成功舉行。中共十三大前黨內這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博弈，從十三大最終開成了一個改革開放的大會、政治體制改革終於提上全黨日程這個結果看，是趙紫陽取得了上風。而他的政治對手鄧力群則在大會的中委選

【212】蘇星（1926-2008）：山東萊陽人，經濟學家。文革後歷任《紅旗》雜誌經濟組組長、副總編輯、代理總編輯。1988 年後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兼《求是》雜誌總編輯。

【213】高揚（1909-）：曾經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書記。1987-1989 年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中顧委委員。

【214】參見蘇星：《紅旗》停刊與《求是》創刊，載《百年潮》，2002 年第 8 期。

舉中落選，不但失去了進入政治局的資格，而且在中顧委常委選舉中再度落選，從此一蹶不振。

當然，沒有鄧小平的支持，趙紫陽是完全無法取勝的。他勝就勝在了他掌握了鄧小平「兩個基本點」的精髓。雖然在 20 個月以後，他在處理學潮問題上仍然不免與鄧小平攤牌，成為黨內保守勢力的又一個犧牲品，但是趙紫陽在 1987 年一力扭轉反「自由化」的狂瀾，為黨的十三大開成一個改革開放的大會所做出的種種艱苦努力，仍然不失為中共黨的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不應當為歲月所磨滅。

第五章

發展黨內民主要從中央做起，從十三大做起

外面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氣候」，並沒有能改變中央政改辦的「小氣候」，沒有能阻擋住趙紫陽、鮑彤們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研討的腳步。在那段政治高壓下的日子裏，各專題研討小組的研討工作全面展開。政改辦則重點研究了黨政分開、社會民主、黨內民主，和十三大的改革問題。中央研討小組召開了第二次會議，聽取中央政改辦關於黨內民主和十三大的改革問題的彙報，並發表了大量意見。本章將重點把這些情況介紹給讀者。

一、鮑彤再論黨政分開

隨著各專題組的研討工作相繼展開，政改辦也調整了內設部門和人員分工，加強了聯絡組的工作，每個專題研討小組都設有專門的聯絡人員，採用「若即若離」的方式，與專題組保持聯繫，掌握動態。綜合組和秘書組正式分開，但我和吳國光仍然跨組，在參加綜合工作的同時，也兼顧秘書組兩個內部刊物的編發工作。同時，政改辦資料室也正式設立，由行政組代管。在隨後的研討工作中，根據工作的需要，政改辦又曾數次調整了內設機構和人員配置。

從 1987 年初開始，我被安排正式擔任鮑彤的秘書工作，這也是陳一諮向老鮑推薦的。為此，老鮑和陳一諮都和我談了話，提出了要求和注意事項。鮑彤此時的正式職務，仍然是國務院總理辦公室負責人，兼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但此前他還沒有配秘書。老鮑對我說，我這裏的工作不多。你除了在我這裏工作以外，還仍然是研究人員，綜合組、秘書組的工作也要兼顧。說實話，到政改辦的這段時間來，老鮑給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他思想敏銳，經驗豐富，做事嚴謹，平易近人，能到他身邊工作，肯定可以學到更多的東西，能更

快地鍛煉自己，提高自己。因此，肩上的工作擔子雖然重了，但我心裏是高興的。

在研討小組第一次會議之後的幾周內，政改辦研究工作的重點，仍然是以黨政分開問題為主，兼顧其他。由本室主辦的座談會也繼續在一個接一個地進行。

11 月 25 日，是中組部人員座談會。到會的有中組部部長尉健行、副部長曹志、副秘書長鄭克揚、研究室主任劉俊林等。鮑彤主持了座談。會上先由劉俊林談了中組部對我國現行的幹部人事制度弊端的認識，是「體制單一，關係不順，渠道不通，職責不明，缺少法制」。接著，他介紹了中組部的改革設想，一是改革幹部管理體制，變集中統一管理為分類分組管理；二是改革統包統分的辦法；三是對任用形式進行改革；四是在幹部的識別、選拔、任用中加強民主監督。會上，尉健行透露，明年 1 月將召開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研究和貫徹上述設想。在座談結束時，鮑彤介紹了政改辦在向研討小組彙報中，涉及幹部體制改革的四方面內容，並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我看，幹部管理要適應今後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的體制。幹部管理不分開，黨政分不開，政企也分不開。這是一篇大文章，有好多問題都需要研究。

11 月 28 日、12 月 5 日下午和 6 日上午，政改辦兩次舉行原任省委書記座談會。到會的有原河北省委第一書記高揚、原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傑、原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安平生、原貴州省委第一書記池必卿、原內蒙古自治區委第一書記周惠、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王懷安等。鮑彤、周傑分別主持了這兩次座談，並介紹了目前正在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情況。到會的這幾位都是剛剛退休的共產黨的「封疆大吏」，他們在發言中，談了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看法，認識各不相同，多數人表示支持，但也有人提出了「一輩子社會主義白幹了？」的疑問。

12 月 7 日上午，在中南海南區 152 棟的大會議室，黨政分開專題組召開大中城市書記、市長座談會。參加座談的有南京、武漢、江門、丹東、蘭州、常州、瀋陽、青島等城市的書記或市長。該專題研討小組負責人溫家寶、陳俊生、王漢斌及辦公室人員，中央政改辦李丹鋼、遲福林、吳偉等也參加了會議。陳俊生主持座談。在發言中，許多人都談到了黨政不分帶來的多方面問題，建議中央下決心解決。

丹東市長鄭平提出問題：人大是最高權力機關，黨中央是最高決策機關，這個矛盾怎麼解決？他建議，中央政治局成員都應該到人大，政府去任職，把權力和決策統一起來。

與此同時，政改辦也多次召開內部例會，討論黨政分開。

在 12 月 12 日的例會上，李丹鋼談到，現在黨政分開已經看得比較清楚的，主要有十個問題，即：黨組問題、對口部門問題、書記分管問題、政法委問題、宣傳部統戰部分管政府部門問題、分管常委問題、財經外事領導小組問題、黨中央的臨時機構問題、政府機構中的機關黨委問題。但也還有幾個看不清楚的問題，如黨管幹部問題，中央、地方、基層黨組織各自的職能問題，黨與各民主黨派、群眾團體的關係定位問題，等等。孫方明在會上提出，看黨政是否分開的標準，一是黨對國家事務不直接做出決定；二是黨的決定只對黨員和黨的組織有約束力；三是沒擔任國家機關職務的黨員不是國家公職人員；四是黨的機構不是行政機構。

在 12 月 3 日的例會上，高山提出，我們搞黨政分開的目標，應該與西方不同。小平提出的黨政分開，是著眼於效率。而在民主政治條件下，黨政分開是解決黨的執政方式問題。我們現在搞黨政分開，受制於三個條件：黨的性質，是無產階級政黨；我們的目標是要發展民主政治；在中國的現實條件下進行。有這三個約束條件，真正做到黨政分開難度極大。可以考慮，先解決黨與社會組織的關係問題，這是黨政分開的基礎；把國家政權中的決策機構與執行機構分開，重點解決黨與執行機構的關係問題，保證執行機構的獨立依法活動，這也是小平提出的解決效率問題；最後，把黨內決策與國家決策區分開來，做到黨內決策程序化、黨向人大提案程序化、黨向人大推薦幹部程序化。

12 月 16 日下午，政改辦再次舉行例會，討論黨政分開問題。在大家發言之後，鮑彤再次就這個問題進行了重點發言，他一共談了六點意見：

> 第一，黨政分開問題上，小平同志關心的是能做點什麼事情，哪些事情可以先做。我看已經提出的都可以做，如不設分管書記、常委，好處是避免政府分割；黨委不設對口部，好處是減少層次；不設黨組，好處是各部工作直接向行政首長負責。這三個東

西實際上是配套的。第四件可做的，是有些實際上是對著政府有關部門的黨委機構，比如宣傳部、組織部，這也可以改。五是黨的紀委與法院、檢查院、政府的監察工作也可以分開。第六個，也是黨政分開的一個重要內容，即黨與行政分開，特別是企業，相應的是黨的基層組織的精簡，不設專職機構、不設或是少設專職人員。這六件事中央地方和基層組織現在都可以做。

第二，為什麼要這麼做？好處有這麼幾條，也可以說是黨政分開的宗旨和目的。一是對黨本身大有好處，可以使黨非行政化、非權力化，避免黨本身的官僚化，減少黨本身的事務，縮小黨直接干預的範圍，集中力量做好黨應做的工作。二是有利於形成政權的工作系統，大大提高政府與行政的工作效率，小平多次講黨不應有特權，高於一切之上，意思是說黨存在著與黨的性質不相稱的權力。1942 年他就提醒說，這是一種危險。當初的預見，現在已經有大量事實可以證明。黨的權力化對黨沒有什麼好處，反而破壞黨與群眾的聯繫，敗壞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使黨患上腐敗的可怕疾病。我們黨確實幹預了相當多不應由黨做的工作，影響了行政權的統一和效率的提高。多一個層次，就多一回扯皮，不從制度上解決不行。第三個好處，黨政分開可以使黨更好地支持人民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對提高人民積極性大有好處。黨政分開後，政府、人大、政協渠道暢通，人民參與的渠道會更暢通。黨不包辦國家事務，那麼人民群眾就有積極性。第四個好處，小平講要使社會更有活力，是講要更有效率地處理問題。如果總受到黨的機關干預，則不可能有靈活反應。黨的組織是集體領導，行政工作要求個人負責，這二者扯到一起，責任不清，效率就提不高。所以說，我們搞黨政分開，原則是清楚的，一是黨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二是黨不是行政組織，有這兩句話就夠了。

我個人認為，沒有比黨政分開更好的提法。如果說職責分開，那就意味著是不是還有什麼問題分不開。黨政性質、組織、結構、功能、工作方法都不同，更確切的講應該是黨政權力分開。但這個提法很容易被人挑撥利用，所以還是模糊一點，提黨政分開。這樣也很明確，是性質、組織、功能、工作方法分開。至於會不會被人誤會成黨的領袖不能擔任政府職務呢？全世界都沒有這個問題，不必擔心。現在一個口號提出後，有兩個字變化

就會有軒然大波。小平講了分工[215]以後，陝西省委就開常委會討論為什麼變了。目標也不能分開。政府與執政黨是統一的，是一致的。領導人、目標這兩個都是分不開的，此外還有什麼分不開的呢？除此之外都可以分開。當然，也可以反過來說，叫「克服黨政不分」。這個問題還要再討論，給研討小組一個回答。東歐國家也提出了類似的口號，沒有引起什麼問題。

第三，前面所提的事情，能不能做得到？黨和政府的工作，都要有相當大大變化，機構要變，人員也要調整，各級黨委的工作內容、方法都會有變化，黨委怎麼抓政府、抓基層，也會有變化。中央變了，地方也要變。這些變化如果在承受能力之內，就可以幹。

我們能否設想，搞政治體制改革首先是黨的自身、是黨的中央的改革？中央能做到什麼程度？現在有財經小組、外事小組、政法委，雖沒有設專職對口書記，但也有分工。中央在解決這個問題上基礎好，可以先動手。

工廠按三個條例和補充通知[216]去搞就可以了，相應的提出黨的工作社會化、基層企業原則上不設黨的專職幹部和專職機構。天津提出 200 人以下的不設以，也有的地方提出 500 或 1,000 人以下不設以，我看都可以，由各省自己考慮。我們原則上提出目標，除了特大企業以外都可以不設，由各省自定，在十五大或十六大前實現。中央一級，建議要抓緊一些，十三大前後要有個變化。中央可自定，各省也可以自定。全黨統一規定不合適，否則就是中央侵犯了地方黨委的職權。中央表個態來提倡，中央和基層變了，省、市、縣中間層不變也得變。但是不規定期限由他慢慢去辦，緩緩而行，感受不到壓力。農村基層怎麼分開還要考慮。村裏就那麼三五個能人，其中優秀的極少，是不是可以考慮

【215】鄧小平在個別講話中，也曾經使用過「黨政分工」這個提法。

【216】1986 年 9 月 15 日，為改革企業領導體制，中央發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頒發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三個條例的通知》，明確「企業實行生產經營和行政管理工作廠長負責制」。三個條例指《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廠長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基層組織工作條例》和《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條例》。1986 年 11 月 11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再次發出《關於認真貫徹執行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三個條例的補充通知》，進一步規範了企業中的黨政關係，明確了企業黨委的職能。「從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到廠長負責制的轉變，是企業領導體制的重大改革。」

放得更後。鄉鎮企業中黨企、政企要分開，這個要辦，不然對發展不利。

這麼幾條大體可以分步實行，時間可以拉長，但是兩頭要抓緊。現在中央常委已經同意從中央開始，所以才問現在能幹點什麼。要設想的細一些，地方企業只要提出原則就可以了，不必太細。政府工作也要大轉變，政法文教沒有人分管，要給省市市委一點時間，把分管書記轉到政府方面來。中央政法委還設不設，可以再考慮。（賀光輝插話：我傾向於不設。）中委中做政法工作的搞個小組，研究問題，有必要。省、市、縣級，不必要。（賀光輝再插話說，如果政府部門分工明確，真正實行行政首長負責，那麼分管副總理、副省長，我看似乎也沒有必要。外國就是一個人。）我們整個多了一個層次，我看可以不設。日本歷史上只有一次設過副首相。如果現在的人大常委是人大代表，副委員長是常委，人數能達到這個規模，那就好了。我們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人數和人家的內閣全體會議差不多。我們的內閣會議 80 多人，中委再加一些人，就可以是黨代會。人數太多無法理清實際責任。（周傑插話：我們的中央全會也很難起到決策作用，人太多。代表大會實際上是個履行手續的會。黨代會兩大任務，一是學習，二是舉手，橡皮圖章。）

第四，改革，更深刻的是觀念問題。有一個根本觀念要研究，即黨的領導。這在許多同志來說是個看不清楚的概念。英國劍橋辭典對領導的解釋是指路，走在前頭，發命令。中國的實際情況下，領導地位、領導作用與領導權力是不同的，現在要強調的是黨的領導作用，淡化領導地位與領導權力。這就是小平講的，黨組織不應高於政權或其他社會組織。黨要有自我限制。人大與政府的權力，是憲法規定的，黨不能行使。權力問題要從人民共和國的體制考慮，這不是削弱黨的領導，而是實現黨的綱領。人民民主專政是黨的綱領，權力是來自人民而不是來自黨，這是一個根本問題。淡化黨的權力這個概念，有利於加強黨和人民的關係，防止腐化。黨內同志要明確，黨沒有特權。黨的領導地位也要淡化，不要天天放在嘴巴上，領導誰？領導人民嗎？你一講領導，就有一個被領導的問題，誰是被領導？人大、政府、人民就成了被領導，黨就成了高於一切的了。黨內要由自己提出這個問題。只有加強黨的群眾工作，提高黨的領導水平，才能實

現領導作用。「加強」作用會讓人產生「灌輸」的錯覺，既然要做群眾工作，更重要的是反映群眾願望和利益，提出好的主張。《共產黨宣言》中講到，共產黨代表運動的未來。這就是說，黨要看到人民的根本利益，長遠和全面的利益。我國現在已經出現了多種利益集團。黨的主張，要能夠協調各種利益集團的關係和利益。

黨委機關，可以設辦公廳、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研究室。研究室就是提出主張，搞調研的。黨著重提出主張，但在國家事務上是提出建議，黨應該提出指導性原則。我贊成孫方明昨天提的關於黨政分開標準的四點看法，建議歸納時寫入。

第五，我們有個歷史情況：國家是黨的兒子，美國的《聯邦黨人文集》中講到，美國人是革命之子，美國這個國家，是革命形成的。我們國家也是革命的產物。講黨政分開時，要說清分開的理由，但不要說這個制度如何不好。我們這個制度是自己造成的，帶著黨的基因形成的。沒有政府的時候，黨一切都管了，有了政府，卻還是實行「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辦中有決，不離原則」等等 32 個字的方針。這個方針概括了我們現行的這個體制。現在看，黨只能管戰略方針、指導原則，人大制定法律，政策和施政方針留給政府去管，應該留點彈性，不然就沒有活力，沒有積極性。應該允許人大對黨的意見作某種程度的修改，大的原則沒有離開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可以。至於具體事情上，根本不需要那麼大的強制性。如果黨做了決議，人大中的黨員就要執行，在人大就不能修改，就要通過。老百姓就會說，這是黨主，不是民主。為什麼黨外的意見不可以吸收呢？黨不是萬能的，黨員也是人，黨組織也是人的組織，不是神。原則與方向應該是有彈性的，只不過大的方面不離開它，允許有差別、有變化。黨內運用組織措施，要極其慎重，特別是對人大與政府修改了黨的意見時，通常應該表示支持和歡迎。黨有了政權，應該支持政府、人大、人民團體、企業等來行使各自的基本權利。

第六，有個最大的體制問題還看不清楚，省委書記、省長一身兼，並不意味著黨政合一，也可以是黨政分開，以什麼身份做什麼工作。問題是黨的機關不要具體干涉政府機關工作，不要以黨的書記身份發表對政府工作的意見。

這個問題是中央一級的人事安排的最大的體制問題。（周傑插話說，關鍵是總書記是不是兼總理。兼了就牽扯到和人大、政府

的關係問題。）這個問題恐怕迴避不了。還要再討論一下，講出利弊，有個說法。

二、閻明復[217]建議：要制定政黨法

1986年12月下旬以後，政改辦把研究工作的重點轉移到了黨內民主上。與此相聯繫的社會民主問題，也成為政改辦研究的重點之一。

12月17日下午，受室裏指派，我和徐沖兩個人前去中共中央統戰部，聽取他們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意見和建議。閻明復部長帶領統戰部的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長、黨派局局長，親自接待了我們，與我們一起座談了三個小時。當晚，我和徐衝向老鮑彙報了統戰部之行的情況，吳國光也一起聽了彙報。

在統戰部這個「溝通會」上，閻明復首先提出一個重要問題。他說，從一國兩制的前景看，香港回歸後，將有代表參加人大；如果台灣也統一了，國民黨也要參加政權機構。這樣，在我們的政權中，除了共產黨和八個民主黨派以外，將會出現一個名符其實的反對黨。將來人大、政協的政治環境會發生一個重大變化，這就是有反對黨出現。1946年的國民參政會，我黨是少數，一部分友黨支持我們。將來，我黨是多數，八個民主黨派還會不會支持我們，是否會被國民黨爭取？這個問題十分重要。所以，從現在起就要考慮民主黨派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包括其自身建設都需要研究。

閻明復說，現在民主黨派沒有黨綱。在人大中民主黨派所佔的比例、要不要成立黨團都要研究。現在黨派是代表地方、個人參加會議，將來要代表本黨派。我們現在是黨禁，只承認八個黨派，反對組新黨，對這個問題也要研究。應該考慮制定政黨法來規範。我國的民主黨派是先天不足，沒有黨綱，更像政治團體。後天又失調，由我們黨包辦代替。耀邦同志曾經提出，一定要想辦法解決民主黨派的經濟獨立問題。目前我們正在搞這方面的試點。

閻明復講的第二個問題是政治體制改革中怎麼進一步搞好黨派工作。他說，從我們的角度看，統戰工作主要就是八個民主黨派的問題。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在我黨能承受的範圍內，加強民主黨派的

【217】閻明復（1931-）：1985-1990年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因在「六四」事件中不支持武力鎮壓被撤銷書記處書記職務。六四後任民政部副部長。

參政、議政、監督三方面的工作。參政的形式，是通過各級人大、各級政府。我們現在省一級還可以，在四、五個省市有民主黨派的副省長。但是他們不是作為黨派代表參政的，而是作為非黨人大代表參政的。從議政角度說，現在通過人大、政協進行，情況還可以。監督方面，國務院最近成立監察部，我們準備建議安排一、二名民主黨派人員擔任副部長，以提高民主形象，也有利於行政監督機制的完善。我們現在的監督是自我監督，如果能充分利用起現在的體系，如政協的各個工作委員會，人大的各個委員會，監察部等形式，就可以很好的發揮作用。

在談到政協問題時，閻明復說，政協的問題比較多。從五屆政協以來，政協從政治協商的場所變成了幹休所，安排老幹部的場所。開會分組討論會，是按照黨派系統開，簡報也沒有人看。現在全國各級政協有委員 38 萬人，工作人員 6 萬人。憲法中沒有對政協的地位、作用做出明確具體的規定，這樣下去不行。（在向鮑彤彙報時，我評論說，在這個意義上，政協也是「非法組織」。）閻明復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中，政協工作方面，應考慮明確和解決三個問題，一是政協的性質、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到底是什麼？二是政協的運行方式也要制度化和法律化；三是政協的組成方式也要有明確說法。政協要不要設名譽職務，這類委員佔多大比例，應該有個大體的原則。

那麼明年換屆能幹點什麼？閻明復說，我們考慮，一是盡可能減少政協委員中榮譽職務的比例，更多吸收有議政能力的人參加政協；二是制定和通過政協的議事規則；三是加強政協提案的法律約束力；四是加強政協的監督作用。如果這幾條原則大體能確定，從現在起就要做工作。如果想做的事太大太多，怕實現不了。

老鮑在聽我們彙報的過程中，後來結束時，表示了這樣幾個意見，一是反對在縣一級搞政協。縣級政協實際上養的都是共產黨的老幹部；二是政治體制改革要研究允許不允許民主黨派有自己的黨綱；三是統戰部可否考慮，就哪幾個必須進行改革的問題自行向中央提出報告。從他們那個角度提出，可能會更順一些。

12 月 24 日下午，中央統戰部和中央政改辦還聯合召開了一次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座談會。邀請了民盟中央副主席錢偉長、民盟中央執行局副主任羅涵先、民盟中央常委千家駒、民革中央副主席賈

亦斌、民建中央委員吳大琨、農工民主黨中央執行局副主任章師明、九三學社中央執行委員趙偉之、九三學社中央候補執行委員金開誠、無黨派人士程思遠等到會，聽他們談了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想法，和對多黨合作問題的改革思路。在發言中，幾乎每個民主黨派人士都涉及到了一個要求，這就是，民主黨派要成為真正的政黨，要有自己的黨綱，有自己的言論機構。著名的無黨派人士程思遠在會上甚至明確提出了「依據憲法，任何政黨都要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黨指揮一切、領導一切』這個說法是違憲的！」

此後幾個月裏，政改辦又陸續召開了以下幾方面的座談會：

2月11日的工會系統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有全總副主席陳秉全、全總工運研究所所長黎征，及國防工會、機械工會、鐵路工會等行業工會的負責人。鮑彤主持了會議。會上，陳秉全說，論工會的實際作用，我國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倒數第二，朝鮮是倒數第一。這與歷史上多次批工團主義有關，與歷史上強調工會要在政治、思想、組織、業務上接受黨的絕對領導、工會「要做黨的馴服的小毛驢」有關。現在不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而一切領導工人階級。鮑彤認為，工會不改革，可能要出大問題。

3月11日的團中央座談會。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劉延東、劉奇葆，部門負責人徐永光、袁純清等參加了這次會議。鮑彤主持了座談會，並與他們就共青團系統的改革問題交換了意見。團中央的同志認為，共青團目前嚴重脫離青年群眾，行政化傾向相當嚴重。而黨與團關係問題，是其中的關鍵問題。

4月8日新聞自由問題的小範圍座談會。這次會，邀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經濟日報等單位的負責人和學者到會，政改辦只有少數人參加。嚴家其主持了座談。會上，由新聞法專家介紹了對新聞實行法律控制和隨意控制的這兩種方法，提出中國應該搞法律控制，否則隨意性太大。建議，要建立多層次的報業結構，以黨報為中心，以機關報為主體，但要允許民間辦報。保障新聞自由，要制定新聞法，不能搞「輿論一律」。要通過新聞監督，化大震為小震。

4月14日的《新聞出版法》起草情況座談會。出席會議的有全國人大法工委、國家新聞出版署、中宣部出版局、國務院法制局等單位

的負責人。鮑彤主持了座談會，並傳達了趙紫陽關於制定新聞出版法的意見。據參會人員介紹，1985 年 3 月 11 日胡耀邦主持的中央書記處就提出制定出版法，成立了小組。到 1986 年 9 月，已根據胡喬木、鄧力群的意見，寫出了第三稿。起草中遇到的主要問題，是怎麼看憲法規定的出版自由問題。而新聞法則更早，在 1984 年就由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在起草了。現在工作已經移交給國家新聞出版署。根據書記處的意見，已經把這兩個法律合併，搞一個新聞出版法，由胡喬木在抓。

4 月 18 日的《結社法》起草情況座談會。到會的有全國人大法工委、國務院法制局、國家科委綜合局、公安部一局、民政部民政司、國家教委辦公廳立法處等單位的負責人。賀光輝主持了會議。這次座談情況較為簡單，對於是否要制定結社法、允不允許自由結社等問題，各單位意見並不完全一致。如民政部認為很有必要制定結社法，但其他部門沒有直接表態。

至此，政改辦在成立以來的半年裏，已經陸續召開了 27 次座談會。

三、發展黨內民主須從改革組織制度入手：向研討小組的第二次彙報

第一次向研討小組彙報之後，政改辦研究工作的另一個重心，是黨內民主問題。這裏面有兩個原因，一是在研討中，大家都感到，政治體制改革中的許多重大問題都涉及到中共中央高層領導體制的改革。這方面不有所動作，其他改革很難展開和深入；二是中共十三大召開在即，黨的改革如果不借此時機啟動，那也許一等又要五年。

1986 年 12 月 27 日上午，政改辦召集例會，主題是：黨內民主和黨內高層的制度改革問題。會上，陳小魯、黃海在前幾天辦公室對這方面研究的基礎上，就黨內民主的涵義、黨員權利、黨內選舉制度、黨的中央、地方、基層組織的層次及其相互關係、黨的代表大會的組織方式及年會制、黨內報告工作制度、黨內監督的組織和工作制度、黨務活動公開、黨章修改等多方面問題，作了主題發言。他們在發言中，對大家討論中提出的意見作了綜合和歸納，並談了他們自己的一些看法。

12月28日晚，鮑彤在325小會議室，召集孫方明、吳國光、吳偉、黃海幾個人開了個緊急會。鮑彤說，紫陽確定一月初聽一次黨內民主問題的彙報。現在專題組的研究剛剛展開，還不成熟。我們辦公室要研究一下，有幾個什麼急迫的問題需要彙報。現在看來，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從硬件上動手不可，不然光搞軟件，一遇到舊的組織機構就會碰回來。他先談了幾點看法，然後要綜合組幾位同志先考慮一下，準備起草一個彙報提綱。

次日上午，全室研究人員再次召開緊急會議。鮑彤在會上，向大家通報說，紫陽昨天上午講到，元旦以後，要把十三大、七屆人大與改革有關的問題彙報一次。這次彙報是我提出來的。這兩個大會很快就要開了，不預做準備不行。今天我們就研究一下，有哪些問題特別急迫，目的還是從實際出發，有可能而又必須解決的問題先提出來，不要考慮與現行規定衝突不衝突。思想上不通我們可以做思想工作，但組織上的不行，要做調整。軟件硬件都有，關鍵還是硬件。接著，鮑彤再次談了他昨晚談到的一些看法，並組織大家進行了討論。陳一諮、陳群林、黃海等發了言。

在這兩次「緊急會議」上，鮑彤對這次向研討小組彙報的內容，主要談了這樣幾點看法：

（一）政治體制改革，關鍵在硬件。如黨政分開，是權力、職能、機構、方法上的分開，但關鍵是組織機構的分開。僅僅提出職能分開，無助於問題的解決；權力分開的提法太敏感，也不確切。組織機構十分重要，實際上是一切成規的固定化，是載體。硬件問題不解決，軟件問題也解決不了。

（二）黨政分開，關鍵在各級黨委。中央的先不說，省以下各級的常委會可以考慮取消，發揮全委會的作用；只設一到兩名副書記、十幾、二十名委員，兩、三個月開一次會。這樣，它就不會成為一個權力中心。市長、副市長可以多開會，具體事務放在政府。全委會的書記不由中央和上級提名，由全委會選舉，報上級備案。書記只管黨務和召集會議。市、地、州、縣可以立即取消常委會，省一級涉及幹部調整，可以考慮有個過渡。委員會的提名方式比較複雜，可以研究一下南斯拉夫的代表團制。人大也有這個問題。

（三）黨代會可考慮實行年會制、常任制，一年開一、兩次會。代表人數應該減少，合理的人數是五、六百人。紫陽說，如果條件不成熟，暫時不搞，到十四大再考慮。但我想中委人數減少是可以做的。

（四）選舉問題。民主這個題目，已經說了幾十年，還是解決不了，必須從制度著手解決。這其中主要的一條就是選舉。解決了這個問題，民主、監督就都好解決了。一個省的省委委員不能自己選出書記，還要上級來提名，那我們這個黨的水平也就太可卑了。省委書記選的准不准並不涉及全局，只是地方性問題，可以設想，五年解決到縣一級，十年解決到省。這樣，黨內民主監督問題就能得到有效解決。

（五）從目前情況看，黨政不分最嚴重的是紀檢委。怎麼改？有人建議搞一個與中委平行的紀委，能不能起到監督作用？要研究。也可能是又要安置一批同級領導幹部。

（六）中委人數到底設多少好？你們找點資料，看看中委人數、黨代會代表人數，歷史上的七大、八大各是多少。十三大的代表名額現在已經分下去了，改不改？怎麼改？要研究。這些問題既是黨政分開的問題，也是黨內民主、機構、幹部制度等多方面改革的問題。

（七）現在已經出台、還將繼續出台的涉及政治體制改革的措施，與改革的總體方向是否一致？我們也要有原則性意見。

12 月 29 日下午，綜合組開會，形成了彙報提綱的初稿。晚上政改辦再次召集會議，對這個初稿進行了研究。許多同志認為這個稿子有些面面俱到。鮑彤說，這個提綱是有用的，將來可以用，要在這次彙報上用還不行，條件不具備。我看這次彙報，重點是解決地方黨組織的形式問題，和選舉問題。如市縣級可不可以不設常委，代表大會人數是否可以減少，這些都關乎黨政分開的組織形式。關於黨內民主，實行真正的民主選舉是首要的。沒有民主選舉，再講多少民主也是空的。基層組織明年自己選怎麼樣？縣一級五年以後可不可實行民主選舉？蘇聯東歐也總是黨政分不開，為什麼？因為不僅僅是職能問題，相當複雜的是組織形式問題。他特別強調說：組織形式不解決，黨政分不開；選舉問題不解決，黨內無民主。

會上，也有不同意見。賀光輝就提出，按照鮑彤的改法，那「省委就不處在領導地位了」。鮑彤反駁說，「不對，是省委書記不直接領導省政府了，省委還是領導的，因為政府領導人是省委委員，是共產黨員。」賀光輝又針對選舉提出問題：「基層選舉如果選出了方勵之這樣的人怎麼辦？」鮑彤回答說：「方勵之如果不夠黨員條件，可以開除他。如果夠資格，那就不能剝奪他的被選舉權！」鮑彤強調，社會上不同的利益反映到黨內來，黨內也會有不同利益，必然會表現出來。說是全黨一致，全國人民一致，實際上是有不同利益的。要承認這種不同，通過制度的方式讓它表現出來。

1987 年 1 月 4 日下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在國務院第二會議室舉行了第二次會議，聽取辦公室有關黨內民主問題的彙報。到會的除了趙紫陽等研討小組的五位領導人外，還特邀了鄧力群、高揚二人參加。幹部制度改革專題組負責人曹志，和其他各專題小組的負責人也參加了會議。

會上，鮑彤代表政改辦作彙報。趙紫陽和與會的其他人員圍繞這個彙報，集中議了這樣幾個問題：

（一）可不可以取消省以下各級黨委的常委會？

當鮑彤談到建議取消省以下各級黨委的常委會時，趙紫陽問：我們現在有沒有專職常委？（曹志答：很少，全國只有幾個。）哦，那麼涉及幹部安置的人就不多了。在市一級日常矛盾少一點，交通也方便，開全委會比較容易，省裏要經常開全委會怕是不行，像新疆，南疆、北疆那麼遠，日常工作就難處理，不好辦。如果全委會不常開會，就不光是日常工作的問題，比如幹部問題，就是大事。市裏可以搞的簡單一些，現在常委經常開會，也沒有那麼多大事可議，就議很多具體事。這是一個方面。但還有另一方面，就是如果沒有常委會，權力就集中到書記手中了，這好像也不行。鄧力群說，可以搞個十幾個人。趙紫陽說，全委會要真正發揮作用，人數要少。我們現在許多時候不是工作需要，而是為了搞待遇，書記比常委高，常委比委員高，拿工資也不一樣。

趙紫陽考慮了一下，說，我看市裏肯定可以取消常委，縣裏也可以，省裏還是需要研究。市、縣搞那麼多層次幹什麼？鄧力群插話說，解放初期縣裏一般沒有常委。薄一波說，歷史上的情況要考察

一下，解放前、進城後怎麼樣。過去省市也只有一個書記、一個副書記，後來省裏也成立書記處，加上宣傳部、組織部，進城以後又有統戰部。黨政真正要分開的話，就不能搞的人太多了，人越多越辦不了事，一個和尚有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你們的想法很大膽。趙紫陽接著說，擴大委員的人數，本來是為了擴大民主、發揚民主，可是實際上人一多，反而無法發揚民主，不好議事了，後來就變成了安排。現在好一些了，我在四川時，書記比常委多，最厲害的是 6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前，黨委第一書記、第二書記、書記、候補書記非常多。

薄一波提出，是層次多了好工作，還是層次少了好工作？地委是不是一級？縣裏主要由他來管，這個問題要解決。許多地方沒有條件，不能夠搞市轄縣，地委一級的職權就相當大。趙紫陽說，地委實際上是一級。為什麼地委有八九個委員，不設常委就可以辦事，市一級就不可以這麼辦？一搞市管縣，地變成市了就要設人大、政協等，還要設常委。既然地委可以不設常委，市裏就一定要設？為什麼不能只設七、八個委員？田紀雲提出，關鍵是省市委管不管幹部，管幹部就要經常開會研究，那就不能總開全委會。鮑彤說，監督幹部要靠別的辦法。

（二）贊成取消黨組。

鮑彤在彙報中談到建議取消黨組。薄一波說，不設黨組我贊成。黨外人士可不可以當省長？包括中央部長，多一點不可以？誰說不是共產黨員就不能當官？（鮑彤插話：我完全同意。毛當主席時，有十一個正副部長、兩個副主席是民主黨派。但不能勉強。）現在共產黨把官位都佔了，又要搞點民主，就搞比例，搞了些勞動模範、少數民族等等。現在有一個危險性，找個傳達室收發員、打字員也都要是黨員，官就更不用說了。我對這一點很害怕，中南海裏到處都是共產黨員，這裏能找到幾個非黨員？服務員也是黨員。黨政分開以後，共產黨的領導應該在哪一個方面表現？要講明確。只有黨員才能做官，就是黨的領導？那是黨員專政！而我們不能是共產黨員專政，我們是無產階級專政。

（三）舊的選舉方式是對群眾的愚弄，一定要改革。

鮑彤的彙報特別強調了選舉改革問題，並就此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包括實行差額選舉，取消代表比例，改革提名制度等等。這時趙

紫陽強調，選舉制度，一個是基層選舉，一個是全國選舉。基層選舉確實值得注意，不僅是縣級選舉，也包括學校。選民一定要認識你，否則不如不選。省一級，可以通過代表會選舉，基層可以直接選舉。要解決代表性問題，例如一個機關裏有三千人，一定要要求選一個女藏胞，這又何必選呢？指派、特邀就是了嘛。指定選舉，搞到基層不行。鄧力群也說，中科院搞差額選舉，在所裏實行非常好，在院裏就很難搞得好。因為所裏的人都相互熟悉。趙紫陽說，代表比例這個問題很大。你要選舉，又搞個比例，我們也會反感。你要搞比例，可以在選舉之外另特邀一些代表。如果每個單位都搞得那麼細，比例規定的過死，怎麼選舉？是個嘲弄嘛。現在學生鬧事，當然是自由化氾濫，受西方民主影響，但是我們的選舉辦法也實在太出格了，學生第一次行使當家作主權利，就做不了主，這不行，要改革。陳雲同志講，至少要給個籠子，在籠子內可以自由嘛。根據中國的情況，當然不能完全靠老百姓選，不然只是形式上的民主。可以規定一下，多少是要選舉的，多少是特邀的，也可以用團體內選舉的辦法。選舉也搞指令性計劃，流弊太大，引起反感。（胡繩插話，那是攤派下去的。）

趙紫陽說，這次十三大的選舉也要改革，不能再搞比例，那是與群眾的民主願望完全背道而馳的，是對他們的愚弄。薄一波強調，紫陽是實事求是的。不要有條條框框，要適合我們的發展階段，按實際情況辦。

這時，有人提到代表中的年齡構成。趙紫陽說，年齡問題比較好辦。當然，代表的組成不要缺了某個方面，不能一點代表性也沒有了。這時，胡啟立舉了安徽一家食品廠的例子來批評比例代表制，說，那個廠子只有400多人，被要求選兩個少數民族人士當人民代表，全廠只有4個回族人是少數民族，這4個人的表現恰恰又都不太好，廠長只好站在票箱前喊，凡是投漢族票的無效，結果一半人棄權。趙紫陽評論說，出發點是好的，辦法很笨，效果不好。胡啟立則說，這個問題不過關，明年會出大事情的。

趙紫陽問王漢斌，這一次的基層選舉怎麼樣？王回答說，沒有規定比例。趙紫陽點頭說，這次提前彙報，就是考慮到十三大的問題。代表的名額已經分下去了，回頭看看還有什麼問題，能不能改進一下。接著，趙紫陽又補充說，選什麼人上面不知道也不行，候選名單

還要上報，只是推薦候選名單，但最後一定要服從選舉結果，服從選舉人意志，不能再用任何辦法強姦選舉人的意志。選舉前報名單，然後承認選舉結果，中間不得再搞什麼辦法限制，不能說不按名單選舉就無效。胡啟立說，這是指導性計劃，不是指令性的。薄一波說，紫陽講得對，要給個籠子，給一定自由。但我看不一定做得到。開大會是不認識的多，往往不認識的人得票多，認識的得票少。現在有的差幾百票，表現民意已經很大了。我主張，報還是要報，一點不體現上級意圖也不行。趙紫陽也說，候選名單是少數人提的，上面不知道一下不行，但最後要服從選舉結果。

趙紫陽提出，另一個問題是差額選舉，怎麼報批好？實行到什麼層次？這時，胡啟立建議，報批的名單就是差額行不行？鮑彤馬上贊成，說是個好辦法，辦得成，行得通。籠子和鳥一般大沒法飛，是等額選舉，籠子比鳥大一些，是差額選舉。（曹志插話：兩種辦法，一是預選，一是差額。大家都願意實行預選。）趙紫陽也贊成差額報批，說，可能是個好辦法，群眾可以在十五個人當中選十個。現在搞民意測驗，就是要看看人們喜歡哪一個。既然這樣，為什麼不可以通過選舉來尊重民意？可能有些結果不那麼理想，也可能更理想。其實，哪個同志都是好同志，為什麼一定要選這個不要選那個？選擇範圍大一點也是可以的。有些事上級不一定看得那麼準，籠子大一點好，選舉的機會均等，選誰是誰，並不是哪個人是陪榜的，都有機會。這樣更可能實現領導和群眾相結合。

趙紫陽又進一步闡述他對差額選舉的想法，說，省長提名副省長，乾脆提兩個候選，由人大代表表決，你可以選擇嘛。這不影響黨的領導。這個辦法可以考慮，又是差額選舉，又是事先經過領導批准的。然後趙紫陽強調，我們現在的選舉一定要改革，不然會出大問題的。當然一下子搞那麼民主也不可能，還有，文化交通等環境的限制。但是一點不改進，選舉變成指定，還不如不選。你要讓他選，又不讓他作主，不行。改革的好處很多。

（四）總理或省長提名組閣人選，人大只能否決一次，要有個相互制約。

趙紫陽從選舉又談到了人大決定政府人選問題。他說，總理組閣的提名問題，是人大問題。將來可以規定，人大對總理或省長提名的

政府組成人員，只能否決一次，不能兩次。總理任命部長，要通過人大，省長提名班子，也是一樣。你不同意一個，第二個就得通過。總之要有個相互制約的辦法。人大作為最高權力機關，其權力也是要有制約的。

（五）十三大中央領導機構的改革也要研究。

趙紫陽提出，有一個問題，涉及到十三大，你們彙報提綱裏也沒有講。我考慮無論如何今後要發揮中央全委會的作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書記處和常委之間，今後要更好地發揮中央全會的作用。圍繞發揮全會作用，全會的組成在十三大要不要有所改革？這個問題政治局要討論，政體改辦也可以議論一下，提一些辦法和建議，比如中委的人數是多一些好還是少一點好。還有，現在的組成格局，有沒有需要改進的地方，這不光是個年齡結構問題，還有你們的提綱中講的代表問題，委員、候補委員的問題。

對於紫陽提出的問題，鮑彤建議說，中央候補委員不需要那麼多，中央委員 100 人，候補委員 20 人。要改變一個觀念，省、部領導不一定要進中委、候補中委。趙紫陽贊成並舉例說，八大之後江西的楊尚奎同志，一直不是中委，當時的解釋就是說，省委第一書記不一定是中委。這要變成習慣。不過趙紫陽又說，這個問題可以議。但十三大變動太大不一定有利。這次又要更新、又要削減，等於現在的中央委員只保留七八十人。

（六）全國人大要加強常委會的作用。

對於政改辦建議的削減委員和代表人數，趙紫陽評論說，中國的人大現在只能開群眾大會，就是改到 1500 人也不能半年開會，半年休會。有那麼個大會堂，幹什麼用啊。王漢斌插話說，當初確定人大代表名額時，就是根據大會堂的座位來定的，坐滿第一層。趙紫陽說，人大的改革時間比較充裕一些。薄一波說，我們不得不這樣辦。要把一些人拿下來，要做許多工作。一些不合理的東西，考慮到實際情況還很合理，要慢慢來。趙紫陽繼續說，我的意見是要把常委會建設好，擴大，不再安排榮譽性職務，可以在實際上真正起到人大的作用。另外，每年再開三千人大會，體現人民大團結。後者是形式的，再加上前者，不是形式的，不是更好嗎。你想要三千人一下子全沒有了，恐怕不行。常委中要真正增加一部分能議事的人，提高素質，這

是真正的議事機關。說人大是橡皮圖章，就是人大常委會的橡皮圖章，而不是黨中央、國務院的橡皮圖章。他還說，好事多磨，這次人大在破產法和礦產法的事上，就不是橡皮圖章，這一是使法律更完善了，二則國內外的觀感也很好。民主就是麻煩，可能是毛主席講的。

會議進行了三個多小時，還有些內容沒有來得及彙報。趙紫陽宣佈休會，「先到這兒，找時間再議。」趙紫陽又對鮑彤和政改辦的研究人員們說：「你們可以找幾個同志，集中議一下十三大的問題。」

四、「集中議一下十三大問題」

次日，即 1 月 5 日上午，政改辦即按照趙紫陽的要求，開會討論關於十三大的改革問題。老鮑的意見是抓緊時間，因為不知道紫陽和研討小組下次何時開會，應該盡量提前準備，以免措手不及。老鮑還交待與會人員：這次討論的問題，事關中央最高層的改革，只向研討小組彙報，不向專題小組通報，也不向其他任何領導彙報。綜合組要在室內討論的基礎上，起草一份「補充彙報提綱」。

這次會上，大家在發言中，提出了需要列入彙報提綱的九個方面問題：即代表問題、中央委員會問題、顧委問題、政治局問題、常委問題、書記處問題、紀律問題、市管縣與地委問題、總的問題。至於不同機構的人數、提名與選舉辦法、十三大的程序等問題，都歸入上述問題。然後，老鮑決定把這些問題分成三攤，將現有人員分成三組，下午分頭研究，由這三個組分別拿出意見。綜合組孫方明、吳國光、吳偉分別參加各組討論，然後進行匯總，並起草「補充彙報提綱」。

當晚，政改辦再次開會，各組拿出了初步意見，在會上作了彙報。

關於中央領導機構，重點提出了書記處的改革問題。李丹鋼在彙報中說，現在的中央高層，實際上是五層機構，中委、政治局、常委、書記處、總書記。運行中實際上有兩個代替：政治局代替了中央委員會，書記處又代替了政治局，這不規範，也不利於長治久安。書記處會議實際上成了常委會議，議論的問題很廣泛，擔負了相當多的日常決策。書記處成員中，有四人是政治局委員，並兼任副總理。改革的建議有兩條，或是在現有的基礎上，把書記處變成政治局和常委會的辦事機構；或是回到八大體制，取消書記處，設中央秘書長和

副秘書長，具體工作由中央辦公廳和中央各部去做。對這兩條改革建議，經過大家討論，最後決定彙報時拿出來的方案是前者，建議：十三大的書記處回到 1943 年的黨章，成為中央的辦事機構，成員人數減少，書記、總書記都不兼任政府職務，由政治局提名，中央全會決定任命，不經選舉產生。到十四大時，再根據情況，取消書記處。而政治局的人數要增加，實現年輕化，每屆至少應更換四分之一以上。中委的產生，應該實行差額選舉，不搞預選。提名辦法，大體上由現任中委數人聯合提名即可。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的人事變動，及中央機構變動，都應該通過中央委員會。有三分之一中委提出要求，即應召開中央全會。同時，要制訂中央高層的工作條例，將各中央機構的職權與關係、運行方式制度化。

關於紀檢委問題，高山代表小組作了彙報，認為，紀委的改革，有三個方案，一是實行 1949 年時的體制，降格為部；一是改設監察委員會；另外也有人建議，在中委內部，推選一部分中委，成立常設的專門委員會。無論採用哪一種，其職能都要改，履行黨內紀律檢查的職責。至於現在的政府機關各部、群眾團體內設立的紀檢組都應取消。當時，國務院各部委設立的紀檢組有 71 個，佔全部司局級機構的 7.8%。鮑彤的意見是，一是成立監察部，二是加強機關黨委的職能，可以解決政府機關內部的黨的紀律檢查問題。對中紀委問題，大家一致的意見是，建議十三大上大壓縮委員名額，精簡其機構，會後要將其職能集中到黨的紀律檢查工作上來。

至於顧委問題，高山說，十三大是新老交替的大會，既要妥善安排老同志，又要有利於新班子工作，建議對中顧委委員資格作明確的限定。經過議論，大家統一的意見是：堅持鄧小平 1982 年講過的，設顧委是過渡形式，經過 10 到 15 年取消的方針。十三大從中委退下來的老同志較多，統統安排到中顧委也不可能，因此，可以考慮實行兩條規定，（1）從年齡上加以限制，即除中顧委主任、副主任人選外，超過 75 歲的一律不再進入；（2）資歷上加以限制，即只有擔任過黨和國家領導人，或 1942 年以前入黨並擔任過省委書記或部長職務的同志，才能進入中顧委。省級顧委也應該參照上述精神作出相應規定。市以下顧委，應該考慮十三大後全部撤銷。

關於十三大的代表「比例」問題，大家的意見是，考慮到十三大代表名額已經下達，似不宜變動，但各選舉單位尚未召開黨代表大會或代表會議，建議盡快擬定一個選舉規則下發，著重考慮：(1) 除自治區和享受自治區待遇的省選出少數民族代表的比例應具體落實外，一律不再「戴帽」下達到選舉單位；(2) 實行差額報批，差額選舉。

十三大的中委選舉方式，會上有三種意見。(1) 由大會主席團與各代表團協商提出差額候選人，經主席團通過，實行差額選舉；(2) 實行差額的條件尚不具備，仍實行等額選舉；(3) 考慮到差額選舉對健全黨內民主好處甚多，十三大就應有所改革，建議各代表團預選本團中委候選人時實行差額，但在大會選舉中實行等額選舉。

另外，這次會還議到了十三大恢復代表常任制問題、組織大會發言問題、修改黨章問題等等。

1 月 6 日上午、1 月 7 日下午，政改辦又開了兩次會議，繼續討論了十三大的改革問題。經過數次討論、修改，十三大改革問題的「補充彙報提綱」基本成型。就在這個提綱還未及定稿的時候，耀邦辭職的消息傳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風潮很快就波及到了政改辦。大家不得不拿出一部分精力，傳達，討論有關文件，進行工作檢討。此後，又很快到了春節放假。當大家的心思重新回到十三大的改革問題上來的時候，時間已經到了 2 月初。

2 月 4 日下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第二次會議的後半段，在中南海繼續舉行。參加的人員同上次，沒有變化。在彙報完上次的提綱之後，鮑彤接著又彙報了關於十三大上的幾項改革設想和建議。趙紫陽和其他與會人員還是在彙報過程中開始議論，大體上議了以下問題：

(一) 中央書記處要成為政治局及其常委的日常辦事機構

在鮑彤彙報到有關中央書記處的問題時，趙紫陽說，現在書記處實際上是決策機關。黨章講是的處理日常工作的機關。將來，大問題留在政治局定，至少一個月開一次政治局會。現在的書記處就可能成為管理日常黨務工作的機關，是政治局的日常辦事機構了。這是個設想。各方面的主要領導同志都參加到政治局裏，不一定在書記處。書記處的工作也不兼政府工作。一個政治局會議，一個常委會議，定大事，書記處管日常黨務、意識形態、思想工作，政治局委員參加書

記處的就可以大大減少，書記處的人數也可以大大減少。中央全會閉幕期間，代表全會、執行全會決定的是政治局及其常委，政治局會議就不必那麼多人，列席的也不必那麼多。趙紫陽還說，可以考慮書記處設兩三人或者三四人，或者設秘書長、副秘書長。實際上等於這麼一個關係，書記處對常委負責，常委對政治局負責，政治局對全會負責。現在最常務的權力機關是書記處，恐怕這得改。薄一波說，不改不順，非改不可。這個問題討論到最後，趙紫陽一錘定音：可以向政治局建議，書記處按黨章規定辦。薄一波同意，說，必須按黨章，書記處不取消，但要改。

（二）要體現中央全會的領導作用

在鮑彤談到理順全會、政治局、常委、書記處的關係時，趙紫陽說，要體現全會的領導作用，包括每一個中委的作用，現在我們這點體現不出來。現在是開工作會議多，很難體現全會閉幕期間，政治局及其常委會對全會負責的精神。趙紫陽又說，中央全會也有個很大的矛盾，十三大委員要減少很多，也有相當難度，不好辦。人多了開會就很難，如果一年開兩次全會就好一些，政治局和常委要向全會做工作報告，報告代行全會權力，你代了些什麼。將來走上正軌，一年開兩次會，人多了就不方便。但人能少得了嗎？這是個實際問題，候補委員要大量減少，我贊成。候補就是等著補嘛。薄一波說，十三大就要把關係理順，很不容易。現在與十一大、十二大的時候不同，人都老了，這一次要換。要使國際上看我們是真正廢除終身制。要退，或者半退，但有個問題是老的新的接不上，新人要選得准，中委太少了不行。趙紫陽說，中央委員能減到 150 人，減下四分之一就是很大的進步了，候補中委最高 50 個，正式加候補 200 人左右，可以考慮這個方案。可以早一點提出來，先提到一波同志那裏，再提到政治局議一議。

（三）鄧小平的意見：中央委員會必須年輕化

談到黨的領導機關年輕化問題時，薄一波還轉達了鄧小平的意見：今天小平同志講，上頭的幾個大機構還可以照顧一下【218】，中委不能照顧，非選好不行。必須有 50 歲的、40 歲，甚至更小一點的。40 至 50 歲之間的更多一些。50 歲以上的，要退 50% 以上。補上的，必

【218】似指政治局、書記處。

須是年輕的。這時候鮑彤例舉了中共七大時中央委員的年齡數字。趙紫陽說，那個時候要選 60 歲以上的還找不著呢。

（四）十三大不搞常任制

在鮑彤彙報到代表大會常任制時，趙紫陽問，代表常任制的作用有沒有那麼大？鄧力群表示，我贊成常任制，但是不一定每年開會。也不一定提常任制。薄一波則說，到 21 世紀這麼搞我贊成，但十三大、十四大恐怕還不行。趙紫陽說，要搞常任制，還有代表平時活動、待遇等問題，常任代表實際上也很難發揮作用。薄一波說，代表在五年之間，需要更換的很多，還是兩次大會之間開一次代表會議為好，人也很重要。過渡時期你瞅不准，現在 45 歲的人，97 年就要拿上來擔負責任。這一次要集中力量解決人的問題。不能讓國際上說，換了總書記，還是保守派搞了改革派。他提議，是不是 89 年再開一次會。趙紫陽說，這事可以提一個建議出來。

（五）中紀委的職責範圍要搞清楚

關於紀律檢查委員會，趙紫陽說，可以肯定，不能搞一個與中央平行的機關。薄一波說，搞一個平行的不得了，它可能和你對立起來。趙紫陽質疑，中紀委委員起什麼作用，討論案子嗎？薄一波也說，如果真正上了軌道，有兩高、監察部、審計署，紀委的職責究竟是幹什麼？趙紫陽強調，首先不是人數的問題，首先是在黨政分開與法治的新情況下，中紀委的工作範圍是什麼，程序是什麼？人數在薄老那裏研究了，七八十個也可以，主要問題是職責範圍，黨的紀檢部門與兩院、監察部門等要分開。要研究工作範圍和機構設置的問題，還有工作程序。趙紫陽問，現在每個部都有紀檢組，怎麼辦？（鄧力群插話：絕大多數人主張取消。）

（六）要改革中委候選人的提名方式

鮑彤重點彙報了中委選舉問題。當談到差額候選人提名方式時，趙紫陽說，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就是在籠子裏有選擇餘地。當談到中央領導的提名方式時，趙紫陽說，我有一個根本的想法，既不劃分選區，又不搞競選，那為什麼要把中央領導人分到下面去提候選人呢？乾脆由上屆中委提出候選名單不就行了嗎？比如把我分到四川，我又不到那裏競選，這有什麼意義？乾脆不下分，選舉的時候提出來就可以了。除了各個地方提出候選人之外，中央也提一個候選人名

單。現在這種分下去的方式，是文革中搞的，就成為指令性的，造成不民主的印象，有名無實，不實事求是。如果搞競選，那乾脆劃分選區。趙紫陽建議，可以規定，上屆中委和候補中委名正言順是下屆的當然代表，大家不反感。我們搞這些東西，形式上是民主的，實質上反倒很不民主。把這個問題要講清楚，擺到明處。上屆中委是下屆當然代表，誰也不會感到不民主。他提議，連人帶名額收回來，中央做個決定，要有個中央文件在七中全會上通過。他強調，凡是需要保證的，就用別的辦法保證。選舉的就要真正體現選舉人的意志，不要混在一起。現在這種選舉，大家都明白是形式，青年人不滿意就鬧事。趙紫陽最後歸納大家意見說，中委選舉，在中央工作的同志，由主席團提出候選人，本團提出的中委候選人則只限制在本團工作的人。加在一起，成為整個候選人名單。這一次十三大只解決這個問題，不解決上屆中委是不是當然代表的問題，將來可以研究。上面的候選人盡量不要往下分，這可以作為一條原則。

（七）要扎扎實實擴大社會主義民主

這天的會議除了十三大的議題，趙紫陽還特別談到了擴大社會民主的問題。他提出，究竟能扎扎實實的幹點什麼事，來擴大社會主義民主？還有一個提法，蘇聯東歐把群眾參加管理叫自治，我們提社會主義民主。是不是也用「自治」這個詞？要研究。在這個問題上也要有兩手。一手是自由化不能搞，兩黨制不能搞，民主搞成無政府主義也不行。另一手，我們要積極擴大社會主義民主，人民要求民主是一個潮流，我們要在盡可能的條件下給以滿足。這方面究竟能夠做些什麼事？改進選舉制度是一個，這是個大事。春節團拜會上我要專門表個態。戈爾巴喬夫這次專門提了基層競選問題。我們總的指導思想是基層民主非擴大不可。當然要有區別，農村的條件差一些，機關學校、科研單位、工廠等就要搞。基層黑暗的事情多一些。我們要有兩手，否則基層一些幹部就要壓制民主，好像所有正當要求都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問題要早點議一議，不久就要提出這個問題。一方面要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方面就要積極擴大民主，不然就把人民全得罪了，好像只有搞「自由化」的人才是維護民主似的。將來在十三大報告中，要有相當的篇幅來講社會主義民主的條件，怎麼搞，在哪些方面要做些什麼事。

（八）工會要代表工人說話

趙紫陽提出，與此有聯繫的，是工會問題要好好研究。工廠裏，政治工作靠黨委一個渠道不行，工會也要發揮作用。我們講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理順黨同其他組織的關係，工會是很重要一個方面。我們的工會是官辦的，與黨完全一個聲音，黨包攬了工會工作，黨群關係好的時候，工會可有可無。如果黨群關係發生了問題，工會的渠道作用就沒有了。波蘭的教訓值得注意，官辦工會垮了，全部陣地就都讓給了團結工會。波蘭後來的一手比較高明，一方面取締團結工會，另方面搞新工會，新工會現在吸收了三分之一的工人，能代表工人利益，工人的意見他能反映。黨的領導，既是本單位的黨，又不是本單位的黨，工會不能總和本單位的黨一致。批判工團主義使我們失去了一個聯繫群眾的紐帶，工會成了黨的工作部門，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還有學校的學生會問題也是這樣。黨包攬一切看起來好辦事，實際上辦不到，也對黨不利。黨政工團各司其職，大方向上一致，相互之間有點矛盾，我看好。有許多利益要協調，絕對一致，群眾有意見。完全沒有一點矛盾，不一定是好事。只是大方向一致，如果絕對一致就沒有紐帶了。趙紫陽強調，工會怎麼搞，是個很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要把黨政工會關係協調好，特別是在廠長負責制、多種經營模式的條件下，工會作用怎麼樣，工人的利益誰來代表，工會的作用如何已發揮？有沒有監督廠長的作用？要研究。

（九）要把基層民主建設提到日程上來

趙紫陽進一步闡述了基層民主的重要性，他說，原來考慮，民主首先是黨內民主，對基層民主認識不夠。建設社會主義高度民主是個大目標，要把基層民主，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問題，特別是在城市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鮑彤插話：一頭一腳，一個是黨內，一個是基層。）薄一波說，我贊成。我們黨在基層，不大注意維護工人的利益，脫離了群眾。農村的生產搞的還好一點，群眾還算擁護我們。我同意紫陽的意見，在工廠裏工會就是要維護工人利益，就是要為工人說點話。學校裏學生會要代表學生利益，只講官話不行。作為共產黨員就是要按照黨的政策，站到學生、工人方面講話。這時鄧力群說，要查一查那些年李立三、賴若愚的講話。

趙紫陽又說，現在基層裏確實矛盾很多。現在人民對我們黨的意見這麼多，一是「自由化」的影響，另外基層確實有一些很不像話的事受不到監督，自己監督自己是很困難的。應該研究，哪些廠長的決定，工會可以監督。工會不能罷免廠長，但是可以提出不信任，對黨委書記也可以提出不信任，至少會引起上級注意，廠長會有所收斂。過去是黨委最高，無人監督。現在是廠長負責，也有這個問題，人民受壓抑。過去注意的主要目標是敵人，現在主要是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問題。許多事處理不公，人民不滿意，還沒個說話的地方。光搞上訪不行，要從組織制度上解決，也許受批判的工團主義正是我們現在要恢復的東西。

最後，趙紫陽還補上一句：反「自由化」，有一個問題，我們不是從此不講民主、不講自由了。這點要說清楚。薄一波補充說，兩方面都要講清楚。

這次會後，趙紫陽委託鮑彤和辦公室起草了《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向常委的第二次報告》。報告從七個方面，彙報了關於十三大準備工作中迫切需要解決和明確的問題。其中的主要內容，前面均已涉及，這裏就不再贅述。2月13日，報告稿經過趙紫陽審閱後，以研討小組五位成員的名義，報送給了鄧小平、李先念、陳雲、胡耀邦【219】等中央常委。這裏需要說明的是，研討小組第一次、第二次會議給中央常委的這兩個報告，均屬政治體制改革研討的階段性意見，和此後的研討小組五次會議的紀要一樣，都是報請中央常委「閱知」的，目的在於請常委及時瞭解研討的動態，類似於「下毛毛雨」。如果閱者有什麼想法意見，當然可以做在文件上直接批示。否則，就是劃個圈，表示「知道了」而已，無須等待他們的批准或是表示意見。

【219】胡耀邦在辭去總書記職務後，直到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召開這段時間，名義上仍然是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

第六章

專題研討與中央研討小組的五次會議

研討小組第一次會議以後，各個專題研討小組陸續建立，並迅速開始工作，標誌著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工作進入第二階段。中央政改辦和各專題組保持了經常性的聯絡、協調和互動。就在那段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最高潮的日子裏，專題小組的研討報告陸續成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從 1987 年 2 月中旬的第三次會議開始，在此後四個多月的時間裏連續五次舉行會議，聽取專題小組的彙報，對各個專題報告發表了意見，為已經開始起草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本章將集中對這五次會議情況進行介紹。

一、共產黨必須搞民主，這是終究要解決的問題：趙紫陽如是說

黨政分開專題，是政治體制改革研討中的「重中之重」，這一點，僅從黨政分開專題組的三位負責人的配置上就可看得出來。按照研討小組的建議，黨政分開專題組，由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國務院秘書長陳俊生、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王漢斌等中央三大機關的秘書長負責，溫家寶牽頭，這在所有專題組的負責人中職務也是最高的。12 月 4 日，黨政分開專題組正式成立，其辦公室的研究人員，初期由中辦、國辦、全國人大辦公廳各抽調二人，中組部一人參加。並抽調了若干省級幹部加入。隨後，研討工作正式展開。和中央政改辦一樣，他們的研討工作也採取收集閱讀資料、開座談會、內部研討等方式進行。因為中央研討小組將他們的彙報排在了最前面，所以，他們的工作也抓得最緊。中央政改辦派出了李丹鋼、遲福林兩人擔任黨政分開專題組的聯絡員，參與他們的一些活動，保持與專題組的經常性聯繫。

1986年12月9日下午，中央政改辦以「各專題研討小組工作情況介紹」為題，舉行了例會，由黨政分開專題的聯繫人李丹鋼、遲福林介紹了該專題的進展情況，並轉達了專題組提出的若干問題。12月12日下午、13日上午，政改辦舉行專題例會，根據專題組提出的問題，再次討論了黨政分開問題。李丹鋼在會上做了主題發言。12月16日下午，政改辦再次舉行例會，討論黨政分開問題。在大家發言之後，鮑彤再次就這個問題進行了重點發言，就黨政分開問題，總結了六點意見。【220】經過這幾次討論，黨政分開這個問題，思路基本上清楚了。

在專題研討小組的努力，和中央政改辦的協助下，黨政分開專題研討小組的研討報告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裏就基本成型。1987年2月14日上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舉行了第三次會議，聽取黨政分開專題組的彙報。彙報仍然在中南海北區國務院第二會議室進行，出席的人員有趙紫陽和研討小組的其他三位同志，彭沖缺席。特邀胡喬木、鄧力群、高揚列席。黨政分開專題組溫家寶、陳俊生、王漢斌及辦公室部分研究人員、其他專題小組負責人、中央政改辦大多數研究人員也參加了會議。

彙報由黨政分開專題研討小組負責人溫家寶進行。彙報一開始，他就開宗明義，強調：專題研討的指導思想，一是鄧小平所說的加強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因此要實行黨政分開；二是趙紫陽所說的要劃分職責；三是兩個有利於，既有利於長治久安，有利於現代化建設。研討當中注意了兩點，一是有關理論問題；二是辦哪些實事。

根據溫家寶在彙報的進度和內容，趙紫陽和研討小組的同志不斷插話，發表意見。

（一）選舉要真正尊重選舉人的意志，靠社會監督和民主監督解決對官員的監督問題。

當溫家寶談到黨與人大關係的時候，趙紫陽以福建省龍巖市的選舉問題為例發表了大段的意見。趙紫陽介紹這個例子說，龍巖市連續三屆由上級黨委提出的市長候選人，人大都沒有通過。第一屆是從外邊派來的，來了四天就選，結果沒選上，當選的是當地的法院院長，他當選不久就被調走。第二次上邊派來的候選人仍然沒有當選，原來的一個副市長當選了，後來又被調任地委統戰部副部長，第三次又是

【220】見本書第五章，第一節，〈鮑彤再論黨政分開〉。

類似情況。趙紫陽評論說，這裏表面上看倒是尊重選舉，可是你有選的權力，我有調的權力。這樣的隨便調人參加選舉，選舉很難進行，又不競選，不認識的人很難投這一票。又讓人家選舉，又讓人家只能選一個不認識的人，這不是嘲笑嗎？趙紫陽認為，我看二者必居其一，要選舉就不能總搞幹部交流。交流、迴避是封建社會的辦法。現在是 80 年代了，為了解決裙帶關係又用交流的辦法，從表面上看這是個辦法，但終究不是科學的辦法、長期實行下去的辦法。這是經驗的辦法，還是從舊倉庫裏拿出來的辦法？

趙紫陽強調，最根本的還是要靠群眾的民主監督。本地人就不能監督了嗎？調了地方也還會搞裙帶關係。葉帥談到當年到廣東的時候，有人說廣東人有所謂「五同」【221】關係。現在看，要解決裙帶關係，最根本的還是要靠加強社會監督和民主監督，這些不搞起來，其他辦法都不行，整風也整不好。沒有自下而上的監督不行，社會監督與民主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趙紫陽又說，劉賓雁是有問題，但是他也揭露了基層的許多矛盾。我們也得有個辦法，沒有監督和法律保障不行。戈爾巴喬夫也在搞改革，有三個可能，一個可能是為爭取人心並不真搞，第二個可能是亂搞下台，而第三個可能則是會搞出點名堂來。對他們這次全會【222】不可輕視，我建議書記處開兩天會研究一下，他們重視我們，我們也要重視他們。借鑒一下有好處。

後來，趙紫陽再一次提起龍巖的例子，他說，代表自己選出來三屆市長執政都不錯，相當有政績。黨員不選黨委提名的候選人，這合不合乎黨章暫且不說，我們要冷靜理智的分析一下教訓是什麼？政改辦研究研究看，能給我們改革一些什麼啟發？

【221】所謂「五同」，即指「同宗、同鄉、同學、同事、同庚」五方面的關係。

【222】指蘇共 1987 年 1 月召開的中央全會。戈爾巴喬夫在會上作了《關於改革和黨的幹部政策的報告》，認為「民主的實質就是勞動者掌權」;「一月全會的主要思想就是發展民主」;「只有通過民主和借助民主，改革才有可能實現」; 不擴大民主、推進民主，改革就會「受挫」、「夭折」。因而，他提出了一個以發展民主、完善監督、選舉制為主要內容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

（二）共產黨必須搞民主，這是一個我們終究要解決的問題，一百年也要回答。

趙紫陽說，今年的科大事件【223】選舉是導火線。幾個大學的選民對選舉投票的興趣還沒有菲律賓的選民興趣大。我們的真民主搞得很假，人家的假民主搞得很真。假民主搞得很民主，真民主搞得不民主，學生在選票上選希特勒，亂選一氣。因此趙紫陽強調，人民中間，特別是有知識有文化的人越來越多，他們不是簡單的要求有飯吃就行，還要求當主人翁參加國家大事，對此應當能滿足的就要滿足。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感覺到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民主，這終究是一個我們要解決的問題，一百年也要回答。人類社會的民主應該是越來越發展，一些條件不具備我們可以說清楚，但絕不能讓人感覺到共產黨害怕民主，不敢講民主。

（三）人大主任副主任、省長副省長放手選舉有什麼不可以?

在溫家寶彙報到「黨對人大的領導，應通過人大中的黨組織和黨員活動來實現」時，趙紫陽問，幹部問題你們有什麼看法？這是人大改革中一個很迫切的問題。黨委決定提名，但通不過，一些老幹部在那裏當對立面，於是就搞預選。可是大家都學乖了，預選的時候通過了，正式選舉的時候就不投贊成票。為此，趙紫陽說，我建議從省一級起，選舉就搞差額，人大主任副主任、省長副省長放手選舉有什麼不可以？沒什麼了不起，我們考察過的幹部，倪獻策這種人不也是有的嗎？誰也不敢完全保險。另一個，省長提名組閣時，我看可以提名三次，可以三個人都是批准的候選人，放手選去，省長、市長、書記都可以是這個辦法。要真正搞點民主，不搞點民主不行，我看沒有危險。三個人你都考察過了，三種類型，讓代表公決去嘛，從全國的總體上看無礙大局。全國工作主要是看政策正確不正確，具體誰幹沒有什麼大區別。要相信我們的同志，這樣群眾就不會有意見了。至於省長提名組閣，不能由著人大選，幾個人中選一個，既然相信他有做省長的能力，就要相信他去組班子，否則一個班子的成員相互連話都不說，你讓他怎麼幹？我看可以允許他提三次，一次兩次通不過，第三

【223】1986 年底，安徽的中國科技大學學生因不滿基層選舉違背民主原則，不能真正行使選舉人權利而罷課和遊行。後引發全國性學潮，中共開始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

次當然通過。（鮑彤插話，第三個也不能一定通過，也可以第三個不通過，省長就辭職。）什麼都要制度化，最後我們要搞細則，都是原則的話不行。這樣的細則非執行不可，打官司也清楚。

（四）要解決人大代表中的共產黨員可不可以按照個人意志投票的問題。

趙紫陽在談到人大黨團的作用時說，人代會開會時，黨員代表在人代會中占壓倒多數，現在是62%，而覆蓋面是85 － 90%，因此人大問題實質上是共產黨內的問題。共產黨執政組成了政府，議會黨團的責任就是保證通過政府的議案。資本主義國家也是這樣。那麼在人大中的共產黨員可不可以行使他的權利，按個人意志投票，投反對票？我們是在人數上是壓倒多數，如果完全按照黨的意見辦事，人代會則毫無民主可言，這不行。但也要注意到另外一個方面的情況。現在有些地方把黨團變成了一個反對黨，你政府想幹的事情我就反對，搞成勢不兩立，怎麼辦？下面已經有這個苗頭，比如深圳就有這個可能。

趙紫陽認為，解決這個問題，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要規定哪些議案可以隨便投票，按自己的意志選舉，哪些必須服從黨的意志。我們想要人大不是橡皮圖章，就要解決這個問題。討論人大能不能發揮作用的問題馬上就碰到這個問題。最近戈爾巴喬夫也提出了蘇維埃改革的問題，我們也碰到了。特別是在基層市縣應該有個說法，有些新意，否則沒有改革，說來說去只有原則不行，得有具體辦法。

然後趙紫陽又談到人大代表的議政能力問題，認為什麼是議政能力要加以解釋，標準是什麼？人大代表中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都要有一些，我國工人那麼多，農民那麼多，沒有人代表他們說話不行。

（五）雖然不搞三權分立，但人大和政府要有相互制約。

在溫家寶彙報到「我們不能照搬資本主義國家的三權鼎立」的時候，趙紫陽說，話不能這麼講，但問題實際上是這樣的。人大當然要監督政府，但是政府也要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受法律的保護，不能損害，各有各的權。不是說你是最高權力機關，就能侵犯政府的權力。我們現在一方面說人大是橡皮圖章，要改變，但另一方面又有些在人大工作的同志，對什麼是權力機關的理解又不一定對，並不是你大，就什麼事都得到你這討論。趙紫陽在會上做了一個動作比喻這種不正確的理解，他說，我是最高權力我就把你茶杯拿走，看是

你大還是我大？我大，那就得拿走。這種理解不對。趙紫陽說，我們人大是最高權力機關，不像美國國會是立法機關，他是司法行政三權分立，可以互相牽制，總統的決定兩院可以否決，國會的議案總統也可以否決。也有的國家有別的辦法，比如解散國會，辛亥革命後國會制也是這樣的。我們從蘇聯搬來了一元化，最高權力機關。現在真正要人大起作用的時候就有了問題，界限必須要劃清楚。在人大工作的同志首先要弄清楚。人大主要是法律監督，彭真同志講主要是憲法法律監督，這講的很好，不是日常事事干預的監督，不能干預日常事務。有些議案政府提到人大，是不是必須要通過，這要搞清楚，不然會有麻煩。

（六）工會要代表工人利益，起到民主監督作用。

溫家寶在彙報中提出，實行黨政分開要正確處理黨和群眾團體的關係，這時趙紫陽說，特別是工會。他要求政改辦清理一下有關工團主義的問題，又問鄧力群可不可以主持這方面的研究，鄧力群搖頭。又轉而問高揚有沒有興趣，高陽也說沒有。這時胡喬木插話說還有婦女團體等等許多不同利益需要協調，黨在其中起什麼作用？要搞清楚。比如說婦聯要求男女平等，沒有組織的群體也有獨立的利益要求。

趙紫陽說，理順群眾組織的關係問題有兩個方面，一是比如工會要代表工人的具體利益。說總體利益一致，但工人也有具體利益，是總體利益的一部分。只考慮總體利益，不一定具體利益都能夠協調處理的很好。城市裏邊大量的具體體制改革要靠工人，工會既要積極支持改革，又要積極維護工人的利益，包括其長遠利益及眼前利益。他強調，工會是辦工人事情的組織，工人的事情一定要由工會辦。再一個，工會有監督幹部的作用。不是說職代會、工會是權力機關，但是它可以監督廠長，提出批評意見，其不接受可以向上報告。他說，基層的毛病暴露一下也有好處。小膿包不出膿就要彙集起來，沒有小亂就會有大亂，要有安全閥分散一下。現在看起來是一個聲音，領導認為天下太平，其實壓制了許多矛盾，有人搞自由化一煽動就可以煽動起很多群眾。這當然要堅決反對。但另一方面，基層黑暗的勢力相當多，不講道理的事很多，群眾有話無處說，說了也解決不了問題。要解決根本還要靠基層監督，基層民主，包括剛才講的選舉。

趙紫陽進一步指出，我們搞黨政分開、理順關係，最終都是要搞民主化，總的目標是民主化。一方面四個堅持要旗幟鮮明，一方面要創造一種每個單位、每個人都有其尊嚴的環境，有氣也有地方去講，講不正確的也可以講。基層工會對廠長不能撤職，但是可以投不信任票，一個機關對領導全體投不信任票，那就非改組不可。出了不信任票的事情可能有三件是派性也會有七件不是，那也好。三件是派性的東西，一檢查也可以發現，可以進一步解決。（高陽插話說，派性還不一定有 30%。）

趙紫陽認為，每個單位裏不正之風、黑暗現象、拉拉扯扯是直接壓制人民積極性的最主要的東西，自由化風是一個，單位不正之風是一個。對工資、獎金分配不公、拉拉扯扯，壓制人民的積極性問題，從根本上說要搞直接民主，當然還要逐步實行。要理一下思想，定幾條制度。十三大報告要講這個問題，中國的民主化怎麼搞，要比蘇聯搞得具體，他們的名詞很多，不知道是怎麼搞。當然講講也不容易。

趙紫陽接著說，我們黨的領導太絕對化。全國是黨執政，這沒有問題。但每一個單位都是大大小小的黨委書記執政，是絕對權威，一個單位一個太上皇，書記專政。這種情況不行。對了，我這個話不要傳出去。趙紫陽又說，工會直屬本單位黨委領導這不行。工會有工會的系統，本單位工會不是絕對受廠黨委領導。如果那樣工會就不可能發表不同意見了。不是要搞工會黨，但既然工會是一個社會組織，既然它有它的上下聯繫，就不能受方塊黨【224】的直接領導。其他組織當然也很重要，但特別是工會。工會的工作如果做不好，不把工人團結在自己周圍，一旦發生矛盾沒有第二個紐帶，就是波蘭的結果。（鮑彤插話，簡單介紹了 1951 年時批立三路線的情況，說我們的工會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會作用差，比東歐國家的也差。）趙紫陽說，這個非改不可。

在溫家寶彙報之後，中央黨校副校長陳維仁也就黨政分開問題彙報了黨校的研究成果。彙報結束之後，趙紫陽說，溫家寶的這個彙報如果大體上還可以得話，那麼要搞點實施的措施，光這個還是空的。他說黨政分開上頭要分，基層要分，中間可以晚一些。他再次叮囑，不要公開宣傳，這些問題很敏感，一發文章國內國外都要議論，參加

【224】指本單位的黨組織。

研討工作的同志第一不得向外洩露，第二不得寫文章，不要造輿論。開會發表意見，開完就完了。從提出初步設想到定下來，再加上確定實施步驟、實施細則的時間會很長。沒有細則光講原則就亂套了。我們搞的是研討小組，是研究和討論。傳輸的信息如果不準確，群眾以為會那樣，結果沒有那樣會失望的。薄一波最後也強調，無論如何不能造輿論，不能洩密，會寫文章的同志不能寫文章，國內國外都不能發。要定一條紀律。政治體制改革的藍圖基本上要在十三大拿出來，不能在十三大前就洩露出去。

這次會議，是討論黨政分開的專題彙報，但趙紫陽和研討小組其他領導人在會議中所議論的問題，卻大都與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問題有關。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因為在研討小組前面兩次會議中，黨政分開問題已經得到了較為充分的討論，中央研討小組的意見已經大都反映在專題組的研討報告中了；二是因為黨政分開專題組的這個彙報，主要問題都已經講得很清楚，得到了趙紫陽和研討小組的基本認可。會後，對這次會議的情況，沒有再和前兩次一樣以中央研討小組名義，向常委報告，而是由中央政改辦整理了一個「研討小組第三次會議紀要」，發在了《研討情況》第 52 期上。

二、黨內民主中央要帶頭

黨內民主專題，全稱是「黨內民主和黨的組織專題」。要搞好這個專題的研究，需要有一個熟悉黨內高層情況，黨務工作經驗豐富，而又富有改革意識的人來主持。在研討小組第一次會議上，趙紫陽點名由中央政改辦的負責人之一，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周傑擔任這個專題研討小組的負責人。11 月 25 日，小組辦公室正式開張，初期有人員 8 人。小組以對外委託課題、對內開座談會、收集資料、閱讀文件等方式進行了積極的工作。中央政改辦派出的專題小組聯絡員陳曉魯、黃海也經常參加他們的活動。

1986 年 12 月 9 日下午，中央政改辦舉行的以「各專題研討小組工作情況介紹」為題的例會上，黨內民主專題的聯繫人陳曉魯、黃海介紹了該專題的進展情況。

1987 年 2 月 6 日下午，中央政改辦舉行「黨內民主專題彙報會」，政改辦和專題小組辦公室的全體研究人員到會。會上，周傑將專題

小組成立後兩個多月來的工作情況作了介紹，並重點講解了專題組已經形成的彙報提綱初稿，向政改辦的研究人員們徵求意見。就在前不久，中央研討小組問題舉行的第二次會議上，趙紫陽和其他領導同志已經重點就黨內民主、十三大的改革等方面的問題發表了大量的意見。這些意見，專題小組的提綱大都已經吸收了進來。在周傑介紹提綱稿，及大家發表了意見之後，鮑彤對這個提綱也談了自己的看法。

鮑彤談了六點意見：第一，對黨的最高領導人也應該建立監督制度。應該規定，不能模範地執行民主集中制的人不能擔任黨的書記，缺乏公道、正派、守紀律品德的人不能擔任書記。應該對黨的高級領導人建立起監督制度。現在的稿子中缺少一個對這個問題的歸納，如果中央領導同志同意，應該考慮建立哪些制度，建議這些制度由誰來搞。第二，中央委員會的作用。小平同志十分重視中委的組成。全會一年開一次，恐怕不行。中委應該懂得如何監督，如何集中全黨的意志，如何處理全黨全國最重要的問題。第三，保障黨員的民主權利問題。是否可以考慮單獨作為一個專題。我贊成八大黨章中的提法，剝奪黨員權利就是違反黨章。要建立暢通的黨員反映意見的渠道。基層黨代會應該討論本地區群眾的要求、情緒、意見。這種會議同工作會議不同，不是上下級關係，而應該是民主的，黨委要聽黨代會代表的。第四，幹部的民主管理問題，還不大明確，應該具體化。第一步是不是先做到真正的民主選舉。監督怎麼搞，也要有點具體辦法。第五，要有明確的具體步驟。不要從黨章修改不修改的角度來考慮，而要按照迫切性和條件成熟程度來考慮。中央、基層，一頭一腳，還有幹部調整等等。第六，要著眼於全黨積極性的發揮。最終可否講要形成一個「團結民主」的局面，或是「團結和諧」的局面。紫陽曾經問我，哪種概括更好，我向他提了「民主團結穩定和諧」八個字。

1987 年 3 月 28 日下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第四次會議在中南海國務院第二會議室舉行，聽取黨內民主專題研討小組彙報，並討論相關問題。出席會議的人有中央研討小組趙紫陽、胡啟立、彭沖等三人，田紀雲缺席，薄一波請假。會議特邀胡喬木、高揚等二人參加。黨內民主專題小組周傑、王清林、徐瑞新、王志元等 9 人。其他專題研討小組溫家寶、陳俊生、賀光輝、曹志、胡繩、有林、廖蓋隆等 7 人。中央政改辦鮑彤等 23 人。

（一）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個說法不妥當。

周傑在會上就黨內民主的專題研討做了彙報，在彙報到黨內民主也要抓兩頭時，趙紫陽說，黨政分開現在是講抓兩頭，這個是有道理的。民主是不是也是這樣？中間可以緩一點，根據是什麼？中央和基層民主問題抓兩頭，理由如何？民主問題我們說過中央和基層嗎？胡喬木說關鍵是中央，中央搞好了基層就好辦了，這個問題可以再議一下。

趙紫陽接著說，還有一個問題，前一段有同志不太贊成民主集中制這個說法，是什麼意見？毛主席說過的民主集中制，民主是手段，集中是目的，這要斟酌。和我們現在說的民主是不是一樣？民主也有集中嘛。胡喬木回答，有同志說民主中就已經有少數服從多數的意思，但它不能成為一個組織原則。趙紫陽似乎對這個回答不滿意。再問了一句，有的同志不贊成提民主集中制意思是什麼呢？鮑彤回答說，就是說民主本身就有了集中的意思不必再提集中。趙紫陽說，資產階級民主也是少數服從多數嘛。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個說法似乎不妥當，是不是還要這樣提？好像事先劃了這麼一個框框，是不是不用這個意思，可以再研究一下。從過去的理解，是上面先定了，然後再通過一下民主形式。這也是個問題。這裏，鮑彤作了個說明，他說，辦公室研究過這個問題，認為在目前情況下以保留民主集中制的兩個提法為好，即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

（二）要加強全委會作用，限制書記個人權力，但取消市縣級黨委常委現在時機還不成熟。

當周傑彙報中建議撤銷市縣一級黨委常委會時，趙紫陽問，說全會是決策機構，全會閉會期間會不會書記一個人說了算？當然這說的是地方黨委。鮑彤回答說，所以考慮到加強配套，一是取消常委一級，二是減少全委人數，三是加強議事制度。趙紫陽說你一個月開一次會也是加強了書記的作用，全會要增加次數。高揚補充說，全委會開的少會出現個人說了算。不一定是第一把手說了算，一兩個書記就搞壞了。趙紫陽接著說，有些事不能一下子理清，全委會閉幕期間還是要有個集體領導機構，但注意不要影響全會的決策作用，否則就變成加強書記的作用了。從實際出發，一是要加強全委會，二是要限制書記個人權力，三是加強常委作用。第一步這樣可能好一些，不然全

委會不能經常開，勢必造成書記說了算。高揚插話說，我個人看書記可以減少，一正一副或者兩副就可以，這樣碰頭會就可以減少。趙紫陽說，可以不搞副書記，省裏大事提到常委會議定，要加強常委會和全委會的作用，取消常委現在看時機不成熟，嚴格來說只能減少一個層次。這就是書記碰頭會。

趙紫陽還建議省長、市長不要當黨委副書記，黨委的副書記是專職協助書記搞日常黨的工作。要形成這樣一種體制，常委會決策、集體領導集體決策，黨的日常工作書記來管，政府日常工作省長來管。關於撤銷常委會，上次議的時候認為可以，現在看來實際上可能不可行。

（三）紀檢工作也不能以黨代政，黨紀監督要把界限劃清楚。

當周傑彙報到關於紀委問題時，趙紫陽問，不正之風屬於黨紀還是屬於政紀呢？黨紀由黨管，政紀由政府管，這個問題怎麼分才好？以權謀私是黨紀管還是政紀管？一個區長以權謀私是監察部門處理還是紀委處理？他說，尚昆同志曾經提過多次，什麼是黨風，黨風不正指的是什麼？趙紫陽認為，我們基本上是以黨紀代替了政紀。高揚插話說，我們是黨專政，不犯黨紀，犯了別的沒大事。趙紫陽說，也有些事違反了法紀，但是不犯黨紀，如走火打死個人。他認為應當先搞法紀政紀問題，再從黨紀上考慮。鮑彤補充說，應該是法、政、黨這樣的順序處理為好。這就理順了。

趙紫陽又問，什麼是黨的紀律？鮑彤回答違反黨章與黨的決議。趙紫陽說，黨的紀律是不執政時期傳下來的。有些在黨執政之後可以不歸入黨紀，純粹的黨紀就是黨綱、黨章、黨的決議。什麼樣的情況做黨紀處理？標準主要是黨章，黨的決議。鮑彤補充說，侵犯黨員民主權利也是這樣。高揚說，彙報中說反對思想僵化，這大可斟酌，思想僵化界限可不好劃。什麼是思想僵化？有些人把堅持四項原則看作僵化。作為黨紀監督要把界限劃清楚。

（四）要組織幾個人專門議一下黨章修改問題。

彙報在最後提出了修改黨章的問題，趙紫陽問，如果不改黨章，但就具體一個問題通過一個文件可不可以呢？是帶有補充性質的。有些內容寫到十三大報告中也不好寫，報告中只能講原則，不好講的很具體，有些又非改不可。要組織幾個人專門研究一下這個問題，專門

議一下怎麼辦。是改黨章，還是另外做規定。有明顯改變要做新的規定，一類是與黨章相矛盾的，一類是原黨章中沒有的要寫一下，將來一塊修改黨章。還有一個基層組織監督保障作用的問題。搜集一下有多少涉及黨章，有多少不涉及黨章的問題可以一塊考慮。還有哪些事務要由中央常委決策，這個問題也沒有定，也不好在報告中涉及。

趙紫陽建議，是否由中辦牽頭中組部參加，和政改辦一起搞一個東西。胡啟立說，還是由政改辦搞一下吧。趙紫陽仍然說，還是中辦中組部來搞，中辦牽頭組織幾個人，人事一個組，政治報告一個組，這個問題一個組研究。中辦牽頭搞個小組做這個準備，算十三大籌備工作的一項。然後他問胡啟立行不行？胡啟立說可以。趙紫陽又問中央辦公廳正副主任溫家寶和周傑，二人點頭同意。趙紫陽補充說，這裏面還有一個追認的問題，過去的問題也要有一個交代。胡啟立說，要推到十四大再改的事情，在現在也要有一個交代。趙紫陽接著說，要註明有三類問題，一是需要修改的，第二是新定的，三是已經改了的需要追認的，特別是第一和第三方面的問題。

（五）要嚴格區分高層領導個人意見與代表組織的意見。個人意見不是指示，不一定要照辦。

在研討報告彙報完之後，周傑就他們代行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工作規則》，接著做了彙報。在談到規定四分之一的中央委員提議即必須召開中央全會時，趙紫陽對此提出疑問，四分之一有什麼根據？溫家寶補充說，這是六屆六中全會規定我們沿用的。紫陽說，你們說有四分之一的中委要求開我們就得開，那麼有四分之三不贊成，開不開呀？他建議，過半數就可以了，有嚴重情況應該另有規定。

趙紫陽說，政治局委員只有在分管範圍內的臨機處置權。除此之外，要嚴格區分個人意見與代表組織的意見。個人意見不是指示，是建議。現在是一提建議下面就要辦，這要區分清楚是個人建議還是組織建議，個人建議不必事事照辦。胡啟立也說，要想辦法解決中央的同志下去之後能夠瞭解真實情況的問題，而不是前呼後擁發指示，不能一說話就是指示，要解決這個問題。高揚抱怨說，耀邦到河北就是這樣，很多指示。趙紫陽說，地方黨組織也有難題，如果你不傳達，也許有人就會說，你怎麼扣壓總書記的指示？

（六）政治局、常委、書記處之間關係必須要有個規則。

在彙報到有關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的規定時，趙紫陽說，能不能區分一下，哪些事情常委會可以決定，哪些則要報告政治局，如果事事都要報告政治局就要討論兩次。實質性的問題是常委會處理什麼問題？他建議說，能不能這樣劃分，常委決定日常問題，政治局決定重大問題。現在書記處處理的事情就是常委的事情，延安時代書記就是常委，書記是政治局的核心，現在有個大界限，書記處是政治局的辦事機構，常委會是處理日常工作的重大問題，而政治局是重大方針、重大決策。胡喬木認為，沒有必須劃清這個界限。趙紫陽說，不劃完全沒有可以遵循的恐怕不行，要完全劃清也難辦。我們現在有些同志沒規定要求有，有了又覺得很難辦，我看還是得有個規定。不適合可以調整，我們搞制度化，沒有程序怎麼制度化？我們的法律規定許多都是原則，恐怕還是要有具體規定。多年來黨內不願意搞具體規定，延安時代就有規定。當然沒有完全按規定辦，1957 年以後就什麼也沒有了。

胡喬木仍然堅持說規定是沒有用的，趙紫陽說得有個規定，胡喬木說許多人是習慣法，美國的副總統有沒有權就是習慣，搞規定沒有意思。這時候，鮑彤插話說，大的界限還是要有個規定，重大問題經過政治局，而政治局授權常委，就日常重大的問題由常委會討論。

趙紫陽給他與胡喬木之間的這場爭論作了個結論，他說，美國總統也要受一些法律制約，總的講是互相制約。任何條文中都有個制約的問題。我們常常批評繁文縟節，但這些東西完全沒有也可能出問題，也可能發生很大的問題。我們還是要做些規定，但不能完全靠這個東西，人的作用和法制也得相結合。有了好的規定也不能完全解決問題但是要有個起碼的規定。這裏有法制和人治的問題，先有法，人再去發揮作用。

趙紫陽接著問，日常工作有沒有一個決策的問題？鮑彤回答，毛主席說辦也有決。趙紫陽接著說，政治局不能講閉會期間，隨時可以開會還閉什麼會？常委決定問題有些需要通報政治局，有些需要提交政治局，有些可以不報，不用政治局閉會期間這個詞。高揚補充說，常委需要緊急處置一些重大問題。紫陽表示同意，說，可以加上。比如突發的外交事件，你開政治局會來不及，需要緊急處置。日常的工

作決策和緊急處置的一些重大問題，常委可以決斷，事後要報告政治局。常委會是三種內容，一是自己可以定的事情，一種是定了之後要告訴政治局一下的，一種是定了之後要報告政治局批准。

胡喬木說政治局每週開會，趙紫陽說，不大可能，常委要每週開會，是第一線。政治局會議至少每月一次，也可能半個月一次，全會半年一次。常委會叫每週例會。書記處不開會，不實行集體領導，而是首長負責，分工辦事。常委是第一線，書記處不開會不發文件。鮑彤說，這個大格局定了就好辦了。

趙紫陽說，這基本上等於延安時代和建國初期的建制，總書記等於當時的秘書長，常委則等於當時的書記。在政府工作的人員基本上不當黨中央書記，書記中有政治局成員但不多。書記處為常委服務辦事，這樣較大的變動是書記處。喬木說這是黨政分開，不然分不開。趙紫陽說，思想政治工作、黨的工作、政府工作都要分開。

趙紫陽最後說，重大的問題在於理順的關係，而不是工作規則。這點修改黨章也要講。書記處、政治局、常委都是什麼性質？這不僅僅是工作規則問題，而且屬於改善黨的領導的問題。可以寫入十三大那個報告當中，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大改革。關係、性質是重大問題。一經確立就不能再變。有些屬於規則的問題，比如會議、紀律、日程等等，這些東西可以再考慮，精簡一些。大的問題你們提出來，搞個暫行工作規則。

散會前，趙紫陽還交代鮑彤，社會民主問題還要搞一搞，找的時間談一談，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等等怎麼搞？

三、機構改革的條件基本成熟

按照鄧小平的看法，機構改革和權力下放，是這次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如果僅從機構的調整、中央、地方權力的劃分角度看，這些改革應該屬於行政改革的範疇。但是如果把它放在理順黨、政、各種組織之間的關係，並使之制度化的大背景下看，把它列為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之一，也是合理的，符合當時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發展客觀要求。

按照中央研討小組第一次會議的決定，機構改革專題研討小組由中央政改辦負責人之一，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賀光輝負

責。1986年11月下旬，專題小組辦公室成立，初期有研究人員8人，從國務院辦公廳、國家體改委等單位選調，後來增加到15人左右。開始工作以後，他們從調研入手，在開始運行的一個月裏，就密集舉行了八次座談會，聽取各方面的意見，重點研究了建國以來歷次機構改革的經驗教訓，並提出了這次機構改革的重點，是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轉變政府職能。中央政改辦派出李鐵林、高山、周大力為該專題的聯絡員，參與他們的一些活動，以掌握情況，協調關係。

12月9日，中央政改辦舉行了以「各專題研討小組工作情況介紹」為題的例會，機構改革專題組的聯繫人李鐵林介紹了該專題的進展情況，和工作中的重點和難點。李鐵林說，從歷史上幾次機構改革的經驗來看，機構改革最複雜，最敏感，因為直接涉及到部門和個人的權力、利益。歷次機構改革不成功，使這次機構改革信譽不高，信心不足，改革的重點部門缺少動力和積極性。從目前情況看，城市工業管理體制的改革和調整是個重點，也是難點，它有賴於市場機制的建立和完善。

1987年2月27日下午，中央政改辦舉行例會，聽取機構改革專題組的研討彙報。鮑彤主持了會議。賀光輝代表專題組，介紹了他們形成的專題研討報告初稿的情況。他們認為，機構改革的目標，就是理順關係，轉變職能，下放權力，精簡機構，形成科學的管理體制。改革的關鍵，是轉變職能。政府對經濟的管理要從直接管理為主，轉變為間接管理為主。要強化宏觀管理職能，淡化微觀管理職能。他們認為，實現這一目標，大體上需要10年左右的時間，並提出了三步走的大體方案，和七屆人大以前可以進行的幾項改革意見。

在討論中，高山、嚴家其、周傑等人就這個初步方案發表了意見。陳一諮在發言中特別強調，機構改革要實行增新削舊，逐步過渡的方針，也許不能一步到位，必須有一個職能替代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要加強行政立法、經濟立法工作。鮑彤在發言中說，我贊成增新削舊，逐步過渡。哪些在七屆人大前可以幹，哪些在其後可以幹，要開出個單子。越早越主動。機構改革是「減強」，看準了就辦，由量變到質變。不一定都要放到第二步，這樣可以有吸引力，增強幹部的安全感。對這個方案，研討小組可能會提出兩個問題，一是會不會影響

目前的正常工作；二是會不會造成動盪感。如果這兩個問題解決了，那就可以下決心幹。

1987 年 4 月 16 日下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在國務院第二會議室舉行第五次會議，聽取機構改革專題研討小組的彙報。出席會議人員，有中央研討小組趙紫陽、胡啟立、薄一波、田紀雲、彭沖等五人；特邀鄧力群和高揚二人；機構改革專題研討小組賀光輝、王書明、張壽、李鐵林等 15 人；其他各專題小組負責人及辦公室人員 11 人；中央政改辦鮑彤、周傑等 20 人。

機構改革專題研討小組的負責人，國家體改委副主任賀光輝首先做了彙報。在彙報過程中像往次會議一樣，趙紫陽等領導人隨時插話。

（一）趙紫陽談機構增加的三條原因。

開始彙報不久，在談到中央黨政機關和人員狀況時，趙紫陽說，生產力越發達，從事直接生產的人就會越少，不是「生之者寡、食之者眾」，而是「生之者」的效率提高了。我們的教育、科學、衛生事業不發達，行政人員多，黨政人員多，這也是處長、局長專政。

在談到改革所謂對口機構的時候，薄一波說，對口機構也不是下面願意搞的，是上面要你搞，你想要錢要物，你就得設。薄一波又說，要統計一下共產黨吃國家飯的有多少人，民主黨派吃國家飯的有多少人。原來考慮過共產黨的機關如中組部、中宣部都用黨費開支，以後搞了供給制，民主黨派也算進來，就都吃國家飯了。後來黨的幹部也去要和政府的什麼長相當。工會 50 年代的錢就花不了，後來又搞了一個體育館。鮑彤插話說，和蘇聯、南斯拉夫比，我們黨員中的脫產幹部是他們的 5 至 10 倍。編製部門根本卡不住。

趙紫陽說，我們現在什麼都算幹部，教師、運動員。將來要區分一下，統計一定要分類。不然該少的多了，該多的少了。他強調說，問題不一定是多了，關鍵是結構不合理。白領工人在資本主義國家算不算幹部？我們都算，這不合理。薄一波說，咱們的政府搞這麼大，一層又一層，這不是從近來開始的，早就開始了。本來一正一副就解決了，後來辦事人員素質下降，一兩個辦不了事就增加，人員一多辦事也就麻煩了，一個人頂不了一個人。質量下降，於是數量增多。

趙紫陽分析說，機構多有三個原因，第一個是體制上的，如黨政不分、政企不分，社會主義國家都有這個問題。二是因人設事，這個

更難解決，幹部那麼多又要有個安排，許多局、處所以成立就是因為有幹部要當局長當處長。第三個原因是新舊體制交替，舊的不能撤，新的又要建立，有的說是公司，實際上又不是公司。兩種體制並存，不是一天能轉過來的。專業管理部門沒有能減少，新的綜合部門又要加，如審計署、監察部、新聞署。

薄一波說，贊成紫陽提的這三條。新舊交替時，舊的撤不掉，新的又要建起來。這種情況要多長時間？不知道。第二條是有這個問題，因人設事例子太多，我們這些人老了就要搞個顧委。還有的是老同志要給點事，還有的搞了許多公司。

（二）趙紫陽說，臨時機構大量存在的根本原因是部門分工太細，結合部太多。要是我就搞幾個大部，就可以不要臨時機構。

鮑彤這時插話說，我們還有個毛病，不善於使用固有機構，喜歡搞臨時機構。趙紫陽不同意這個看法，他說，什麼事老說解決卻老解決不了，就有個必然性。這是個體制問題。為什麼要搞非常設機構？因為原來的部門分的太細，許多部門都有自己的利益，都各從自己的角度看問題，事情搞不起來，就只好搞新的綜合。臨時機構問題要研究。不要一說精簡就撤臨時機構，否則這邊撤那邊建。我們的小組多了，包括我們這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小組。這個事本來也可以靠嚴家其的那個所【225】來搞嘛。我們的臨時機構，在沒有改革之前，我看還是提高效率的一種辦法。它之所以在目前情況下能存在，恐怕還是有必要。

趙紫陽認為，臨時機構問題的癥結在於部門分的太細，部際關係太多，結合部太多，結果部門之間扯皮又不能都拿到國務院會議上來。這是根本原因。他說，所有的臨時機構的任務都是協調，是要解決矛盾，很難起到咨詢作用。要是我就搞幾個大部，就可以不要臨時機構。根本辦法是減少部，企業下放之後經濟管理部門完全可以減少，減部可以搞得快一些，其中主要是人員安置問題。

薄一波贊成這個看法，認為要把舊框框取消，不需要現在這麼多部，可以考慮大大減少。

趙紫陽繼續發揮說，在機構改革之前，臨時機構是一大進步，有些問題無法解決、協調，成立個臨時機構，就解決了。你說撤，下

【225】指嚴家其為所長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

個決心，這個星期就撤了，下個星期又設了。他面向鮑彤說，要注意一個問題，機構改革不要從臨時機構上著眼，我們的機構問題不是臨時機構，它不產生官僚主義，而能提高工作效率，是現行體制下逼出來的辦法。矛盾無法解決就搞了這個，部門之間扯皮，各有自己的立場，必須有一個人把幾個頭拉到一塊。臨時機構的實質是更有說服力的人裁決部門之間矛盾。要裁決，就要有幾個人收集材料，有個辦公室。這種部際協調，就是將來改革後，也會存在。我們的一些臨時機構，與其說是組織機構，不如說是工作方法。外國政府有一些中心，任務也是協調。

（三）總理府問題，要好好研究，利弊何在，搞不好官僚機構沒少，那邊倒又加了很多。

賀光輝在彙報中談到了設總理府的建議。趙紫陽說，兩次彙報都提了這個意見。要不要搞總理府？這個問題要好好研究。開始聽起來很有道理，但要研究，資本主義國家為什麼要搞這個？它有許多矛盾，比如外事，總理府中的外事班子與外交部就有矛盾，此強彼弱。外國搞這個是必須，還有黨派政治的原因。執政黨組閣，有些部門不是同一個黨掌握的，就在總理府設一個相同的班子。這個情況，資本主義國家多數都有。美國的特點是白宮一個班子、對政府一個部，矛盾很大。裏根用的就是他加州的班子。這有點像我們的黨政部門對應。蘇聯在改革中，增加了部長會議內部的辦事機構，要研究一下，好處在什麼地方，壞處在什麼地方，搞起來是不是就是個參謀機構。現在黨這邊要撤對口部門，是不是還要搞成總理府一個局對一個對口的國務院的部？

趙紫陽說，你們搞總理府，目的之一是代替臨時機構，就要實體化。其實，解決臨時機構的根本問題是減少部。要減少部，根本問題是權力下放，不直接管企業。減少部太慢，就成為撤銷臨時機構的阻力。比如機械委，下決心辦就辦了。現在減少部，不太好辦，根本原因不是經濟改革扯後腿，而是人的問題。總理府問題，要好好研究，利弊何在，搞不好一個官僚機構沒少，那邊倒又加了很多。

趙紫陽認為，將來倒是可以考慮設總理助理。總理助理級別可大可小，可以是局級，也可以副部級、部級。這是培養人才的辦法。

（四）重大決策要發揮部委的作用，由主管部委、調研機構提出方案，然後提到國務院常務會議。

趙紫陽說，要研究一下，是不是這樣，在決策程序中部的作用不要削弱，不然會引起很多問題。比如外交決策首先要靠外交部。國務院內部不要搞太多的決策機構。就是設總理府也不要搞太多決策，可以搞些參謀機構。重大決策由主管部委、咨詢機構提出方案，最好有一個想法，然後提到國務院常務會議。如果總理主要靠總理府決策，而部門主要是執行，這恐怕不行。國務院增加一些參謀調研機構是有必要的，但是分工不要太細，形式靈活一些。小組的劃分可以變動，不要成為固定的局，不然將來又要相互打架。計委就是個例子，綜合局是小計委，各專業局就是各個部。國務院各部和計委的關係，反映到計委內部，就是專業局和綜合局的關係。這也與投資體制有關，有部門利益的問題。

（五）中國的區劃太大，搞成100個中央直屬單位可能效果更好。

趙紫陽發表意見時，還談到了行政區劃問題，這是彙報提綱中沒有提及的。趙紫陽說中國的區劃太大，搞成100個中央直屬單位可能效果更好，取消中間一層省轄市和縣，中央轄省和市。羅馬尼亞就是中央和縣兩級，趙紫陽補充說這個變動很大，區劃問題是一篇大文章，中央多了幾個單位，開會找個大地方就是了。中央直管的單位可大可小，有的可以很小。【226】

（六）田紀雲的意見：步子太拖拉不行。

在賀光輝的結束彙報以後，列席會議的高揚說，提一個問題，要加強稅務部門，把國家稅務局變成國務院直屬局。這幾年稅務部門沒加強，少收不少。田紀雲說，是財政部不願意。接著田紀雲對整個彙報發表了意見。他說，機構改革的時間拖得太長了些。下屆政府沒個新樣子，人民要失望。他強調下屆政府應該有個新模型。趙紫陽贊成田紀雲的這個看法，他說，下屆人大要提出機構改革總體方案，然後過個一、兩年中央再調整。越拖越積重難返，越拖越難改。

田紀雲說，機構改革必須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改不可能，試點也不行。趙紫陽說，自下而上步履艱難，自上而下勢如破竹。田紀

【226】後來中央政改辦形成本次會議紀要稿的時候，趙紫陽把其中講到行政區劃這條劃掉了，並且批示：這個問題先不提，趙注。

雲繼續說，把咨詢與執行截然分開恐怕不行，各部委既是執行，也是咨詢部門，提供方案。現在國務院的班子主要是三種人，一種是秘書班子，一種是服務人員管吃喝拉撒睡，還有就是調研人員。將來要加強一下調研，可以聘助理，也可以聘顧問。趙紫陽插話說，聘助理可以，顧問的問題是不做事，我們要找做事的。田紀雲接著說，不能把總理府搞得很大。要加大部的職能，加大綜合性。專業部應該盡量合併精簡，協調、監督、綜合部門要加強。臨時機構要區別一下，完成任務的要撤銷，有的就是個會議性的。新舊體制交替中要想一刀切的砍掉臨時機構不可能。總的意見，步子太拖拉不行。

（七）人員出路問題是個很大的難題。

高揚談到了人員出路的問題，他認為，該精簡的和該加強的看清楚了，人員就可以動了。趙紫陽說，現在一是人多的部門凝聚力較強，有好處，都不願意去清水衙門像法院等等；二是工作人員對原單位有很大的人身依附關係，有關係網，部裏願意放的人又不適合新的工作，新機構也不願意要別的機構的人，他需要的就從社會上調，多的人就走不出去。這是個很大的難題。他強調，設計合理的機構並不是很大的問題，關鍵是人員去向和培訓。這個問題不解決，就只能從社會上招。財政部要增編，就不要別的部委的人。

（八）趙紫陽小結：中央國家機關改革大的條件已經成熟，再拖不利。

趙紫陽對討論作了小結。他說：彙報總的思路是好的。中央國家機關的改革大的條件已經成熟，再拖不利，七屆人大以後就可以動。過去條件不具備，現在經濟體制已經有了較大變化，企業下放了，剩下的是政企分不分。如果明年投資體制一改，大的企業集團又由計委單列，剩下的就找市場了，可以不管。總的講，中央政府就可以不再承擔管企業的職能。這就為國家機關實行政企分開創造了條件。要設的設，要並的並，通過這個改革可以鞏固和推進經濟改革。經濟上沒一定條件搞上層不行。經濟創造起碼的條件，然後上層建築走一步反過來促進經濟。如果經濟上有了一定條件再不上，很多改革就搞不下去了。所以，國家機關的改革也會給經濟改革創造條件。我們要把基本模式搞出來，有些一下子搞不清楚的問題，就先把職能放到計委，把專業部超脫出來，大大精簡，大膽精簡。

趙紫陽提出，要先搞中央，搞國家機關，省市可以晚一點，我同意。地方上的政企關係一下子還分不清，可以緩一步。中央搞了有利於省市的改革。趙紫陽說，按這個設計要搞配套方案，比如人員設置的問題等。不要慢慢來，你看我我看你，這樣不行。要集中在一年或一年多的時間搞好，你們先搞方案。田紀雲補充說，至少在下屆政府之前要有個方案。

趙紫陽對總理府問題做了結論，他說，對總理府的設置要持慎重態度，開始的時候我比較欣賞這個想法，後來想想，可能增加很多扯皮。國務院要充實加強調研機構，既不要搞過去的歸口，也不要把決策地位提得很高。

這時彭沖提出，中央財經小組和計委是不是重複，計委搞計劃，中央又搞財經小組，是不是因人設事？我們總是拆了機器用零件。趙紫陽回答說，現在還不能撤。計委不是過去的財經委。計經委的問題現在一下子還不能分得那麼清楚。黨政分開之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可以撤，國務院常務會議完全可以解決問題。

由此，趙紫陽又提出一個問題，他說，部的管理要大一些，協會相對要細一點，要避免官僚化、行政化。要把協會的設置、職能搞清楚。要有個設計。要把現在的協會整頓一下。在部合併的同時要考慮協會、學會的問題，很重要，是行業協調，是企業同國家協調的重要渠道。鄧力群插話說，學會不能搞太多，太多沒法管。趙紫陽說，學會是搞研究的，協會是企業與政府對話。學會不能搞得太細，協會則不能搞得太粗。許多幹部要轉到協會去，但要統一考慮幹部的安排問題，協會不能搞成為二線機構，不能成為養老院。學會要在學術上有發言權的人來搞。

趙紫陽最後說，從中國實際來看，思想工作這部分放到政府來管很難。我做總理，明確兩條，一是不管政法，二是不管思想。政法大部分可以轉到公檢法方面，但思想工作大都屬於日常事務。這個問題怎麼搞好，要研究。這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特點。當然有些行政事務政府要管。鮑彤插話說，是不是分一下？一部分是意識形態問題，一部分是相關的行政問題。趙紫陽說，思想上的事，涉及黨委職能，關鍵時刻要有人管。

四、實行國家公務員制度是一項重大改革

幹部人事制度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中難度較大的一個問題。說其難，是因為它不但要解決高度集中的幹部管理體制問題，更重要的，是首先要解決長期以來一直被黨的組織部門奉為經典的「黨管幹部」原則的問題。這既是黨政分開中的一個難點，也是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前提。

「黨管幹部」原則，是長期以來共產黨組織人事制度的基本原則。政治體制改革中的幹部人事制度改革，首先就是要改變傳統的對「黨管幹部」的解釋，改變由黨組織集中統一管理所有幹部的大一統體制。更進一步說，是要在共產黨執政條件下，改變由黨的組織部門大權獨攬，統一掌管黨政幹部的考察、任命大權的問題。因此，這項改革勢必觸及到長期主管這項工作的中共中央組織部權力和利益。要改變他們已經根深蒂固的「黨管幹部」的指導思想、長期形成的保守的慣性、惰性、自成體系自我封閉的工作方式和觀念，難度極大。

由趙紫陽主持的 1986 年 11 月 7 日召開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第一次會議，對「黨管幹部」問題進行了討論，明確了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兩個最基本的原則問題，一是必須改變對「黨管幹部」的錯誤理解，黨管幹部是管宏觀，不再具體任命幹部；二是建立分類管理體制，特別是要盡快建立文官制度。這兩條原則的明確，對後來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研討工作產生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在確定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專題組的承擔單位和負責人問題上，中央研討小組並沒有像其成立其他小組時那樣，把研討任務交給一個超脫於具體工作的綜合部門來承擔，而直接將任務交給了中組部。這也是一種無奈的辦法，因為在當時的中國，組織人事的全部大權都壟斷在中組部手中，幹部人事制度的任何改革和調整，都無法繞開中組部。而且中組部在中央各部中的地位、對中央的影響都是老大。如果幹部人事制度改革不通過中組部而另搞一個班子，那以後可能會有許多皮要扯。也許正是基於這種考慮，1986 年 11 月，中央研討小組決定，由中組部副部長曹志負責組建和主持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專題組的工作。中央政改辦派出了顧雲昌、張偉擔任專題組聯絡員。

1987 年 2 月 26 日上午，中央政改辦舉行例會，由顧雲昌、張偉介紹了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專題組的研討情況和進度。在政改辦的研究

人員發表了意見之後，鮑彤也談了他的看法。他說，我覺得，現在還沒有到談建立幹部工作體系的時候。我們現在還處於分析認識階段。現行幹部體制到底是個什麼情況，不僅要從改革幹部制度著眼，更要從整個政治體制改革的著眼點來分析。小平講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三個目標，活力、效率、積極性，從幹部制度角度看應該怎麼改？第二個層次，要從我們研討的各個角度去研究幹部制度改革。幹部制度的改革涉及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各個方面，應該從黨政分開、黨內民主、機構改革、民主和法制建設等角度來考慮幹部制度改革，來進行分析，然後看幹部制度改革的方向是不是正確。要研究著眼於黨政分開怎麼改，著眼於政企分開、打破大鍋飯體制怎麼改，著眼於精簡機構該怎麼改。分析了這些問題以後再提出的問題，那就可行、可靠得多。總之，要先看清楚幹部制度改革與各項改革的關係，把起步點搞清楚，把朝什麼方向走明確下來。

3 月 3 日上午，幹部制度改革專題組派人來到中央政改辦，作了關於專題組研究情況的介紹。中組部研究室主任劉俊林一開始就介紹說，中組部搞幹部制度改革的研究已經有幾年時間了。去年 7 月底，按照胡啟立的指示，成立了幹部制度改革小組，現在又成立了專題組。意思是說，中組部對幹部制度改革已經有過多年的研究和考慮。接著，他介紹了專題組對現行幹部制度弊端的認識，對改革的看法和實施意見。他談完以後，政改辦的研究人員對專題組的思路和觀點發表了看法，有好幾位同志明確提出了要搞清「黨管幹部」涵義，進一步明確幹部制度改革的指導思想問題。鮑彤因故沒有參加這次會議。

3 月 20 日下午，政改辦再次開會，討論幹部制度改革問題。在聯絡員顧雲昌介紹了專題組研討的情況之後，鮑彤發表了意見，他說：什麼叫做「中國特色的文官制度」？這是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關鍵問題。現在我們不是討論組織部門的工作和業務，而是在研究為了長治久安和現代化建設，幹部制度改革應當考慮些什麼問題。提高工作效率、實現長治久安要有什麼樣的人事制度？過去沒有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黨政不分、政企不分。現在是在改革的大前提下考慮幹部制度問題。接著，他又談了對國家公務人員的概念和分類、進入國家機關的資格審查、如何實現平穩過渡、建立國家人事部和國家行政學院等問題的看法。最後，他還是強調，研討要明確方向，至於組織部門的

業務建設，政治體制改革可不涉及。賀光輝補充說，幹部制度改革，核心是什麼問題？要把這個問題突出出來。

3 月 24 日下午政改辦例會，再一次討論幹部制度改革問題。陳一諮作了重點發言。他強調說，幹部制度改革要從我們的國家系統如何穩定、協調地運轉這個角度來考慮。進入文官系統的人和一般社會就業不一樣的，這個不一樣就在於文官要依法辦事。因此，重點要研究黨、政、社會組織各自的人事管理的改革與調整的原則，即效率，穩定、和諧運轉。在提出一系列需要研究的問題之後，陳一諮又說，現在我們研究幹部問題，還處於初級階段。要拿出文官制度的一整套合理方案，說明為什麼它可以解決現在的弊端，使人們能夠接受，為我所用，去說服、促進觀念的改變。它的說服力要在於此。專題組現在搞出的這個材料，只是一個我國幹部制度改革方向的報告，還太空，只是一個輪廓。鮑彤接著談了他的意見。他說，共產黨在取得國家政權以後，要不要組織一個高效率的國家機關？問題的根本在這裏。在現行體制下，各種關係就從來沒有理順過。現在要從根本上考慮問題。西方文官制度是資產階級組織其國家機關的辦法，我們是不是可以借鑒？我們在有兩個特點，一個是社會文化水平較低，能不能實行？二是現行國家政體下，要建立文官制度能否完全封閉，搞出一個比較穩定的圈子？這主要是黨政、政企關係問題。我們一直在說方向問題，這個方向就是我們用什麼指導思想來組織有效率的、穩定的國家機構。

3 月 26 日，幹部人事專題組再次派人來政改辦彙報他們的專題研討結果。聽了他們的彙報，政改辦多數人的感覺就是，這仍然是一個中組部研究幹部制度建設的工作報告，而不是與整個政治體制改革相呼應的專題研討報告，其中基本沒有涉及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問題。鮑彤在評論這個彙報時說，關鍵是沒有把代表國家機關、行使國家權力的這一部分人劃分出來。這涉及到一個基本建設的問題，就是共產黨如何建設自己的國家機關。條件不能說不具備，建國已經 40 年了。過去分不開是因為黨政不分，現在應該可以分開了。鮑彤說，在國家管理問題上，西方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共性的。西方的這套文官制度有其合理之處。一是進入要有資格，二是陞遷要有經歷，三是整個文官制度都依法運行。我們國家機關的人事制度要是具備了這

三點，就能走上依法辦事的道路。政企分開以後，管理企業和管理國家機關是兩門學問。處理國家公務的人要經過專門訓練。我們也有與西方的不同之處，一是黨管幹部有交叉，二是國營企業的幹部與黨政機關幹部有交叉，三是選任與委任界限不清楚，法律任命與政治任命也沒有區分。這些問題經過認真研究是可以解決的。當然，一開始不一定都能搞清楚，也不必都想搞清楚，深入進去了，慢慢就會想清楚。最後，他對自己的思路作了個小結，他說，我同意叫國家公務員制度。起步的工作要有三個要素，一是有部法律，二是有個國家人事部，三是要有國家行政學院。

在專題組研討工作開始後的近半年時間裏，中央政改辦和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專題組之間經過了反覆的交流、協調和磨合，直到 5 月中旬，這個專題的研討報告方才最後定稿。

1987 年 5 月 20 日下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舉行第六次會議，聽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專題研討小組的彙報。彙報仍在中南海國務院第二會議室舉行，參加的人員有中央研討小組趙紫陽、胡啟立、田紀雲、彭沖四人，薄一波請假；特邀鄧力群、高揚二人；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專題研討小組曹志、劉俊林等 10 人，其他專題小組 11 人；中央政改辦鮑彤、嚴家其等 25 人。

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專題研討小組負責人曹志做了彙報。在彙報過程中，趙紫陽和中央研討小組成員有過以下幾次插話：

在曹志彙報到第十二條，建立合理的工資保障制度的時候，趙紫陽說，插一句話。外國公務員與黨派的關係是怎麼樣的？鮑彤回答說，中立。趙紫陽又問，在履行職務的時候保持中立，外交官呢？鮑彤說，外交官也這樣。

在彙報到第十八條，國家權力機關、審判、檢查機關的人員管理時，胡啟立問，人大的公務員不歸入公務人員範圍？鮑彤回答說，考慮到國家人事部管不到這裏，所以採用狹義的國家公務員概念。

彙報到第二十一條，要建立健全社會的人力資源調節機制時，趙紫陽說，形成勞務市場是個好辦法，北京是這麼搞的情況不錯。

當曹志彙報到第二十二條，實行幹部分類後，應適當調整中央和省級幹部管理權限時，趙紫陽說，黨委管理人大幹部，是不是指選舉產生的？要明確寫出來，即由權力機關選舉和決定任命的幹部，

外國叫閣員。現在的國務院組成人員不能算到全體正部長。全體會議從來不議事，人太多了，一坐滿滿的。參加常務會議的可以算內閣成員。這也是政治體制改革中需要明確的。這涉及修改國務院組織法、憲法。將來部門少了也許可以把全部部長加入內閣，能達到三四十個部門就可以。在談到改革後黨委和組織部門在幹部問題上的管理職能時，趙紫陽說，高揚同志那裏的意見是規劃、培訓，管宏觀政策【227】。

曹志彙報結束以後，各位領導人開始議論。綜合起來，主要談了以下問題：

（一）選舉產生的政務官要實行任期制，非選舉產生事務官要講穩定，實行嚴格的退休制度。

在談到我國公務員制度的分類時，趙紫陽建議說，我們可以這麼分，選舉的和任命的是一種，另一種是非經選舉和任命的。這就產生一個問題，退休制度問題。選舉產生的實行任期制，很有好處。非選舉產生的文官講穩定，實行嚴格的退休制度。外國的政治家沒有退休制，而公務員有。我們通通有退休制，這對改變終身制有作用。今後怎麼辦？選舉的要有任期，但還要不要有退休制度？要研究這個問題。文官要穩定，要嚴格實行退休制。這要有嚴格的一套，是職業化的，到了年齡要退休。另外選舉產生和政治任命的要實行任期制，部長等等都是任期制。選舉的就要有任期，任期制就是有任屆不能連任。這可以解決終身制的問題，但是不等於退休了。任期完了還可以做別的，比如國務委員或副總理任期滿了可以當省長或者部長，中間也可以休息一段。隔了一屆又選上了也還可以幹，有些人本來是選舉產生的，到屆之後如果有資格還可以去當公務員，公務員也可以當政務官。

高揚插話說，有個觀念要改變，不然當了大官就不能當小官。趙紫陽說，社會主義國家現在都這樣。他又接著剛才的話題說，這是一個大問題，選舉產生的要不要實行嚴格的任期制？這與退休制是什麼關係？你們要研究。

在會議結束前，趙紫陽的話頭又回到任期制與退休制的問題上來，問這個事怎麼辦？只搞任期制不搞退休制可能也不行。曹志建議可以實行退休制內的任期制，胡啟立建議不同職業的退休年齡不要一

【227】指中央黨校專題組的意見。此時，高揚已經調任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

刀切。趙紫陽接著談到清朝的人事制度，說科舉制就是文官制度，打了天下就要搞科舉，從戰事體制轉到建設體制。

（二）我國實行的叫國家公務員制度。公務員就是指不經國家權力機關選舉產生和決定任命的，執行國家公務的人員。

趙紫陽又問曹志，在討論的過程中有沒有不同意見，認為中國不能搞公務員制度？有什麼比較難解決的問題？曹志沒有回答第一個問題，而是說比較難解決的問題是分類，公務員劃出之後剩下的分類。趙紫陽又問，今後是不是除了行政學院畢業和文官考試及格的都不能進入國家機關？曹志說是的。趙紫陽說，那麼大學生也要經過考試或進行政學院，這有利於選舉、穩定。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標準，過去是沒有這個標準的。胡啟立補充說，有了這個標準，就沒有人在這個問題上再說黨風不正，再說高幹子女走後門了。趙紫陽強調說，走後門違法！得有個平等公開的機會，否則不得其門而入。胡啟立也說，群眾對不正之風不滿，但是沒有說上大學問題的，因為有考試。趙紫陽則說，考試舞弊也是一個問題，魯迅的爺爺就是因為這個入獄的。他又說，現在軍隊和以前不一樣了，不進軍官學院就不能當幹部，所以人家也不願意當兵了。趙紫陽再問，東歐國家有搞文官制度的吧？曹志回答說蘇聯搞了。趙紫陽評論說，換湯不換藥。曹志補充說還有波蘭和東德。趙紫陽說，東歐蘇聯可能比我們好一點，參照一下怎麼樣？劉俊林回答說，我們更先進。趙紫陽說，我們按這個辦法，比他們西化。

鮑彤接著趙紫陽的話頭說，把黨派色彩去掉以後，這個辦法可以用。它既不姓社，也不姓資，我們完全可以用。這是一個基本建設，實行起來有幾個難點。一個是黨政機關幹部之間能不能交流，看起來不能封閉要有交流，應該有辦法。再一個，更複雜的是國營企事業單位的領導人與國家機關幹部之間的交流怎麼辦？我看要經過考試才能進入國家機關。趙紫陽說，我們不叫「文官」，叫「國家公務員」，我國實行的叫國家公務員制度。公務員就是指不經國家權力機關選舉產生和決定任命的、執行國家公務的人員，不包括工勤人員。過去我們分工不發達，簡單的講吃皇糧脫產的就叫幹部，不脫產的叫群眾。部隊的叫指揮員與戰鬥員，合稱指戰員。解放後概念不夠用了，就這麼

套，結果教員、醫生、運動員、警察都叫幹部。鮑彤插話說，和尚道士都有處級的，趙紫陽說真有這樣的。

（三）過渡辦法：新進來的人要經過考試；老的經過依法審查，合格的轉入公務員系統。

趙紫陽問，現在的問題是什麼？我們現有的這部分人，怎麼轉入國家公務員系統？國家機關原來的這麼多人怎麼辦？台灣的辦法是依法銓敘合格後任用。我們也要有個辦法。要從這個辦法公佈開始，新進來的人實行新辦法，新進來的要考；老的經過依法審查，合格的轉進去。有的也可以經過考試取得資格。原有的年紀大的逐步退休，新進來的依法辦事，取得資格。可不可以這樣？要首先在政府系統搞起來，政府要實現精簡、效率、廉潔。

胡啟立說，國家行政學院決定將來的公務員質量，這個我們要辦好。田紀雲也談了他參觀日本的行政學院的見聞，趙紫陽說，日本是很嚴格的，大學畢業後最優等的學生經過考試或是推薦才能進入行政學院。

討論中曹志問，可不可以把人民大學改為國家行政學院？鄧力群認為人大有馬列主義的傳統，完全搞成行政學院不妥，原來曾經設想加一個學政行院在裏頭。趙紫陽說，可以在人大下面搞幾個學院，其中有一個行政學院。力群的意見可以研究。法國有這種情況。鄧力群建議行政學院要直屬國務院。陳一諮建議把中央黨校改為國家行政學院，但沒有得到採納。

（四）公務員隊伍的工資，在人員減下來以後，可以考慮提高，但還有一個橫比的問題。

趙紫陽又問，為什麼那些優秀的人願意到政府來？他自答：是有穩定的收入。企業待遇不是更高嗎？曹志和鮑彤都回答，政府職位穩定，是個鐵飯碗。趙紫陽說，這樣的話就有問題了。大家都穩定，誰願意到要求更高的政府來？我們目前是企業收入高於機關，這種情況看來變不了。政府工作人員的待遇不能太高，企業要高於機關，當然說企業待遇高是說平均水平，具體要看不同企業的經營狀況。但是，機關人員的素質要求比企業高，待遇又沒有那麼高誰幹？胡啟立插話說，名聲好。鮑彤也插話說，彙報的第 12 條談到了這個問題，這關係

到能不能吸收精英從事國家管理。鄧力群也插話說，還有是高於教師還是低於教師的問題，還有與科研人員相比的問題等等。

趙紫陽又說，國外的情況還是企業最高，但是企業有風險。社會主義國家當官的工資雖然不高，可是來路多，生活水平比教授高多了，蘇聯部長以上就有特需商店。對於這個問題，趙紫陽最後說，工資問題另議吧。人員減下來以後，工資可以考慮提高，但還有一個橫比的問題。胡啟立說，還是有吸引力，因為當部長有好處。趙紫陽說，將來就不能走後門了，大家都笑了。

趙紫陽接著說，以權謀私不行，籠統的批關係學也不行，關係還是有的。恆安石【228】為什麼不當大使以後，要到中國當導遊呢？卡特還寫信向我們推薦產品。他們本身就是廣告。看《戰爭風雲》裏邊那個關係學厲害著呢。關鍵是要合法利用關係。我們有人把資本主義國家說成是什麼關係也沒有，這不對。

（五）趙紫陽談幹部制度大格局：黨要管幹部的總政策、規劃，即宏觀問題。選舉產生和權力機關任命的幹部由黨統一管，各類幹部由各部門管，各系統建立各系統的人事制度。

在議論了清朝的科舉和人事之後，趙紫陽對國家公務員制度問題做了個小結，他說，看來，人事部就真是個吏部了。大的幹部由黨統一管，各類幹部由各部門管，各系統建立各系統的幹部制度，這是一個大槓槓。再一個槓槓就是區分兩層幹部，選舉的和權力機關任命的一層，公務員一層。法院、檢查院、人大的幹部也是公務人員，但和政府公務員不是一碼事，不一起管。各系統都有兩層，選舉的實行任期制，公務員實行考試和退休，黨只管重要幹部，就是管負責決策的那些幹部，通過正當法律手續推薦和任職。黨要管幹部的總政策、規劃等等，即宏觀問題。各級黨的組織部就管這個。工資要由國家勞動人事部門統一管，編製也要統一管。分工、層次大體上就是這樣，是中國特色。

（六）黨務公開、政務公開、財務公開，一定要盡量擴大透明度，盡量公開。

討論中談到了黨的問題，高揚就接過這個話頭，提出，黨費增加一點，國家再補貼一點，這樣黨的經費就可以自己出，否則說不過

【228】恆安石，1981 年至 1985 年任美國駐中國大使。

去。趙紫陽對此說法未置可否，但他強調說，絕不能走各級黨委自己辦企業搞公司這條路，否則其流弊比現在這樣吃國家的還要大，特殊化、以權謀私會更厲害。鄧力群問到現在全黨黨費有多少，曹智回答說全年一個億，上交中央三百萬。分管國家財政的副總理田紀雲評論說，一個億，一個警衛局就用了。趙紫陽則轉移話題說，上次薄老提出過這個問題，看來不行。黨費開支將來要在全黨代表大會上報告，至少是書面報告。這也是黨務公開的一個內容。黨費收入更要有監督。高揚繼續說，現在是用黨費給幹部發書。田紀雲補充說，也有的地方發年貨。趙紫陽繼續強調，黨費收入你支出要有報告，黨的財務要報告，工會財務也要報告，現在有報告嗎？曹志說有。趙紫陽說，有還不錯。

趙紫陽進一步強調說，黨務公開、政務公開、財務公開，當然不一定用公開這個說法，但是一定要盡量擴大透明度，盡量公開。黨務向黨員公開，政務向人民公開。

（七）社會協商對話要有渠道，有組織形式，要制度化、法律化、經常化。重大問題，要通過協商對話來解決。

趙紫陽說，還有一條是對話。對話波蘭搞的很不錯。這是個很好的辦法，很多重大問題可以與社會組織對話。我們除了政協，還應有更多的渠道進行協商。要有代表農民、工人、知識分子、科技人員同政府對話的渠道。對話雖然麻煩些，但是搞通了就能取得群眾的支持，平時麻煩一些不至於出了事不可收拾，不然就會有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形式出來。對話要有渠道、組織形式，要制度化、法律化、經常化。重大問題，要通過協商對話來解決。

趙紫陽說，過去我們有這些東西，但都官僚化、行政化了【229】。他舉例說，體改委在北大搞改革咨詢，沒有想到那麼多人有興趣，回答了兩千人的問題，對學生的教育也很大。看來，搞個「社會問事處」很有必要。現在是涉及政治、社會問題沒地方問。在這種情況下和人民溝通，協商對話就很重要。一個是基層民主，包括選舉，一個是社會協商對話，這兩點都很重要。胡啟立也贊同說，學生的位置發生了變化，過去是旁觀者、評論員，現在是參與者。

【229】意指黨聯繫群眾的紐帶，如工會、青年團、婦聯等。

胡啟立談到，昨天在青年思想教育中心參加會議，聽到劉吉等講思想工作，感到效果很好。趙紫陽說，我們是不是應該有個機構為這些人服務，增加他的輻射能力，總之減少一點行政辦法，光靠行政渠道不行，要開闢一些社會對話渠道。社會上湧現出來的社會活動家、大家信賴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就是一個渠道。我們要對他們加以支持，協助他們做民間的政治工作。這就是一種群眾工作的方法，把積極分子、活動分子團結在黨的周圍，黨通過他們聯繫群眾、教育群眾，是個好辦法。趙紫陽感慨地說，我們執政以後，什麼都變成官方的，行政化了，開大會，傳達文件，散會，僅靠這些不行。

（八）黨內的文件制度要改革，盡可能利用宣傳工具，盡可能公開化。

討論中，大家議論到行政級別問題，說現狀中的有一個問題，是按照級別發放文件，不夠級別的看不到相應的文件。鮑彤介紹了蘇聯發放文件的一些情況。趙紫陽指出，問題是黨內文件太多，而立法不健全。這點上我們比蘇聯落後，蘇聯一搞什麼東西先搞法，我們則是先發黨內文件。趙紫陽說，應當把黨內文件降低到最少的程度。不保密的可以通過其他宣傳渠道，政府通告、條例、報紙和刊物等等。我們多年的習慣是先黨內後黨外，很少利用輿論工具。上次耀邦同志這件事下邊有意見，說為什麼不先開個黨內會議？很多東西本來不該保密，也發個保密文件。首先是觀念要改變，我們在革命年代形成的、戰時的、地下黨的、封閉的，處在帝國主義包圍封鎖下的做法和觀念要改。現在不是要開放嗎？對外開放、對內開放都是要開放，開放就是公開。我們好多大企業換人也是黨委發文件。整個文件制度，恐怕是公開性太少，文件發的範圍很窄，往往是國外先知道了，才轉到國內。要從根本上研究一下這個問題，盡可能通過一些公開的渠道，通過報紙、公告、發言人等形式。趙紫陽感歎說，指令性計劃能管到的還是三、六、九級，管不到的地方就有了自由。鮑彤建議說，黨內文件也可以爭取在黨報黨刊上刊登。這件事可否請中辦、國辦研究一下？

五、建設民主政治要有領導有步驟地進行

社會主義民主專題，是所有七個專題中涉及部門最多、內容最豐富也最複雜，甚至可以說是敏感的一個專題。它不僅涵蓋了人大、政協、民主黨派、工青婦等人民團體的改革，而且涉及到如何實現基層民主和群眾自治、保障公民的言論、出版、結社等各項法定權利等多項內容。中央研討小組的第一次會議決定，社會主義民主專題組，由人大、政協、中共中央統戰部等多個部門的領導人組成，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有林和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230】負責。經過一段時間的協商，1986 年 12 月 26 日，專題組正式成開始運作，胡繩在全體人員會上講了話。中央政改辦派出王紹賢、王春生作為聯絡員，後來又增加陳曉魯、徐沖等多人，參與該專題組的一些活動，保持與專題組的經常性的交流和溝通。

在專題組進行社會主義民主專題研討的同時，從 1986 年 11 月開始，中央政改辦內部也就這方面的問題召開了多次座談會、內部例會、小範圍研討會。在筆者的記錄中可以查到的，就有 11 月 19 日、20 日兩次例會，研究社會主義民主專題的內容和範圍、12 月 24 日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座談會、1987年2月11日工會座談會、2月20日、24 日、3 月 3 日三次內部例會討論基層民主問題，3 月 11 日的團中央座談會，以及 4 月中旬的新聞、出版、結社法座談會等。

2 月 12 日，社會主義民主專題組由有林帶隊來到中央政改辦，彙報專題研討情況。有林介紹了一個多月來工作的進展，並介紹了他們對於專題彙報提綱的大體思路，和遇到的多方面的問題。有林說，由於專題涉及面較寬，準備搞一個總體的報告，和幾個分報告作為附件，具體的如人大、政協、黨派、人民團體等的改革描述措施問題，在各個分報告中體現。鮑彤表示同意這個思路，並對人民代表大會的改革問題談了多方面的看法。最後，他還提出，民主黨派在人大和常委會中是否可以設立黨團，要進行研究，拿出個意見。

由於社會主義民主專題內容的複雜性，專題研討工作進行了半年的時間。在這期間，中央研討小組陸續召開了五次會議（第二至第六次）。趙紫陽和研討小組的領導人在這幾次會議上的議論，許多都涉及

【230】中央研討小組第一次會議原定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李定作為社會主義民主專題組負責人之一，後改為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

到了社會主義民主專題的內容，，如人大問題、選舉問題、工會問題、基層民主問題、社會協商對話問題等等，這也為專題研討報告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到 5 月下旬，研討報告基本定稿。

1987 年 5 月 28 日下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舉行了第七次會議，聽取了社會主義民主專題研討小組的報告。這次會議改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出席這次會議的人員包括中央研討小組成員趙紫陽、胡啟立、薄一波、田紀雲、彭沖；特邀鄧力群、高陽二人。社會主義民主專題研討小組胡繩、有林、閻明復等七人，其他專題研討小組溫家寶、陳俊生、周傑、賀光輝、曹志、佘孟孝、廖蓋隆、史維國等八人；中央政改辦鮑彤、嚴家其、陳一諮等 19 人。

彙報開始，胡繩先講了幾句話，然後由有林彙報主要內容。

（一）要討論出一個辦法，既要保證黨在人大中的執政地位，又要保障人大中的黨員代表按照自己的意志表達意見的權利。

當彙報到第二部分第三點時「要明確人大行使的重大事項決定權」時，趙紫陽提了一個問題，他說，現在一些重大立法是政府提出人大通過，這裏的重大原則問題，是由政府報中央，還是由人大報中央？有林回答說，是起草單位報。趙紫陽接著問，如果起草單位報中央後，重大原則問題已經由中央同意，人大在通過的時候提出需要修改涉及到重大原則問題的時候怎麼辦？有林回答說再報。趙紫陽說，最近發生過這樣的事，《企業法》中涉及到企業黨委作用問題，這是重大原則問題，人大有人提出了修改，這種情況以後還會發生。過去沒這個問題，人大真正成為權力機關後，可能就會有原則性意見。

在有林彙報到第二部分第七條，「保障人大代表的民主權利」時，趙紫陽說，這是很重要的問題。前面講了原則問題報黨委批准，批准以後還只是議案，人大還有通過不通過的問題。這種情況怎麼辦？人大既不能完全是形式，又不能人大與政府或者人大與黨委扯皮很多。黨委確定的原則決定，通過什麼辦法保證在人大通過？哪類問題黨員代表可以自由發表意見？哪類問題黨委決定後黨員代表必須投贊成票？這個問題不解決，兩種情況都可能發生。一種是共產黨員不得投反對票，這樣人大中可能就沒有投反對票了；另一種是在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情況下，如果允許黨員在投票時可以隨便，就會有執政黨提出來的一些議案比在資本主義國家通過還要難。這個問題還是有個明確

的說法比較好。必要時黨委可以通知，人大中的黨員不得投反對票。趙紫陽說，我們投反對票的常常是黨員，特別是在人事問題上，黨委會上沒解決就拿到人大來。如果允許任何問題黨員代表都不受黨的約束，那麼就可能出現許多扯皮。沒有黨內約束，投票就沒有保證，而一定讓黨員投贊成票又沒有民主了。這時胡繩插話說，人大常委要設黨組，哪些問題，由黨組決定必須投贊成票。趙紫陽強調，總之必須保留人大代表和常委中的黨員按照自己的意志活動自由投票，否則就沒有意思了。另一方面也必須有按黨的意志投票的情況，完全不約束不行，沒有約束也不行，兩個方面都要有。

（二）把直選範圍擴大到市和直轄市，這個想法很大膽，目前條件可能還不具備，搞直選必須競選。

當有林彙報到第六部分第二條，「健全和完善基層選舉制度」時，趙紫陽說，這次北京市海澱區的選舉不錯，學生的要求並不太高。方勵之在國外說，合肥學生鬧事的直接原因就是選舉問題，這可能是事實。這次海澱區有 90% 的投票率，黨員候選人得票的比例很高。學生說沒想到共產黨動真格的搞民主了，很滿意。這對我們可以有點啟發。

趙紫陽說，把直選範圍擴大到市和直轄市，這個想法很大膽，我看目前條件可能還不具備，搞直選必須競選。市一級代表直選，劃分選區、劃分名額、直接選舉市人大代表，人大常委與市長由人代會選舉，這樣問題可能不大。當彙報說到全國人大常委會現在近 80% 是兼職時，趙紫陽說，將來人大常委是不是不兼職了，專職很重要，否則看材料研究問題都沒有時間。

（三）中央黨校的建議：縣一級的人大實行議行合一的制度，人大的常設機構同時是政府。趙紫陽說，這倒是個好辦法。

有林彙報完以後，中央黨校副教育長史維國談了一個看法，他建議在縣一級的人大實行議行合一的制度。胡啟立表示這是個新鮮事。趙紫陽說，人大總是有的，就是人大的常設機構同時是政府委員會，下面設職能機構，但這就不能實行行政首長負責制了。遲福林補充介紹了一些想法，趙紫陽說，這倒是個很好的辦法，可以作為意見提出來。縣裏搞人大、政府扯皮太多。胡啟立插話說，縣裏現在有五套班子，已經弄的焦頭爛額。趙紫陽說，這有個安排人的問題，高陽說縣人大實際是安排老幹部的地方。趙紫陽接著評論說，我看這是個好辦

法，可以作為意見提出來再醞釀一下。既有利於民主，又有利於提高效率，人大選出一個執行委員會，既執政，又是人大的常設機構，又是政府，下設職能部門，縣長就是委員會主任。人大大事由委員會討論，定下之後由縣長和職能部門執行。彭沖插話說，那就不再是縣長負責制了，趙紫陽說是的，這是個民主形式，縣人大不立法只監督，結果是與縣政府扯皮。實際上變成人事關係，看縣長與人大主任的關係是好是壞。趙紫陽強調，將來過渡到縣長直接選舉，城市的區這麼搞也是可以的。這涉及修改憲法問題。

這時，有林說，79 年以前我們就是這個做法。1979 年取消了，他介紹了一下當年縣級改設人大常委的理由。趙紫陽說，可以研究。胡啟立說，這是個新路子，既不是三權分立又能夠發揚民主提高效率。不過田紀雲提出異議說，下面的事情往往很急，不搞縣長負責制，可能不行。趙紫陽說委員會當然不能天天開，一禮拜一次大事通過一下，緊急的事情還是要縣長處理。

趙紫陽強調，縣裏搞兩套班子既是形式，扯皮的事又不少，將來人大發揮了作用，縣一級的麻煩事會不少。彭沖補充說，目前縣裏扯皮的事主要是人大任免和辦案子。

鮑彤解釋說，實際上我們有這樣的經驗，文革以前省一級也是這麼做的。如果委員會搞的小一點可以很有效率，許多東歐國家也都是這樣的。監督的職能可以放到人代會，人民代表對常設機構的監督，同時也是對政府的監督。可以通過法律把首長的臨時處置權規定下來。真正有阻力的是要裁掉一個機構，幹部怎麼安排，而不在於經驗方法，也不在於效率能不能提高。他認為有利於提高效率精簡機構發揚民主。趙紫陽贊成鮑彤的說法，他說，縣級政府委員會對人代會負責，由人代會選舉產生同時又是執行機構。問題是委員會搞多少人？

民主專題組的周紹錚插話說，這樣做涉及相當大一批幹部的安排問題。薄一波說，是不是做官 50 年，年紀大了一定要安排？不是有退休制度嗎？這樣的年紀大的人，就是資本主義國家也要讓他退下來。比如顧委，我想要盡快取消，有了這個機構大家就要往裏擠。趙紫陽說，搞地改市大家都有積極性，從兩套班子一下變成五套班子，就是為了安排幹部，當然都願意搞。

（四）我們過去在根據地時選舉是差額的，是真民主，進城以後反而不民主了。

接著薄一波提出一個問題，搞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的三權分立不同，這在理論與實際中怎麼表現？我們是共產黨領導，怎麼在這一條不變的前提下，把各方面統一起來？這是我們與資本主義不同的。他說彙報提綱裏沒有講到專政，專政也是民主，保證民主。趙紫陽補充說，那不是一回事，對人民內部講民主，對敵人是專政。專政是民主的保障，但不是民主。鄧力群則說，多數人的專政就是民主。

薄一波繼續說，我們的人大制度是定了的，不能改。1949 年的政府委員會是政協選的。那裏政協是權力機構，政府有重要問題，要送政協討論。毛主席去蘇聯，斯大林建議搞人大，搞憲法，不然會有人說不民主，實際上還是共產黨領導，成熟了的東西就應該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大家一起遵守。現在要考慮怎麼順當一些，用民主就順當。進城時討論，工會中的黨員是工會立場，還是黨的立場。討論了半天，也沒解決什麼問題。這些都與黨內民主的問題分不開。人代會開會前把黨員都叫到一塊，就什麼問題都得通過，這不行。另方面，各舒己見，暢所欲言，沒個黨員立場也不行。企業法討論時的那個情況，要避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但經濟發展不平衡，人民的文化水平也不平衡，我在解放區搞選舉是靠擱豆子。現在選的什麼人，不知道。

趙紫陽說，我們過去在根據地時也沒有選幾個人就設幾個候選人的，那時候是差額，是真民主，進城以後反而不民主了。解放後到 1960 年的時候選舉生產隊長還是這個樣子，五個候選人背向大家，一個人背後放一個碗，選舉人每個碗都放一下，實際上只放一個豆子。

（五）我們不搞三權分立。要在保證黨的領導的同時，又要發揮人大最高權力的作用，和實現行政機關的高效率，怎麼搞，要研究。

之前，就在研討小組開這次會議的當天上午，鄧小平對於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報告的初稿提出了一些意見，批評說，你們是不是搞了一點三權分立，並告誡不要遷就民主化思潮。因此，研討小組這次彙報結束前，趙紫陽說，要回下頭看看這一段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情況。最近小平講了一個意思，也是小平的一貫思想，說無論如何不能搞西方的三權分立，那是幾個政府，耽誤事，要注意不要受它的影響。小

平著重講了，我們的行政機構要保證效率，這是我們的優勢不能丟，定下來就幹，不要互相牽制的很厲害。行政機構要有很高的效能，這就涉及到立法、行政、黨委，主要是黨的領導、立法機關、行政機關的關係，怎麼搞得好一些？中國究竟怎麼搞？原來的搞法行不行？人大行使憲法，但確實是個橡皮圖章，這怕不行。黨的領導、最高權力機關、行政機關關係怎麼處理？要有個籠子。形式上沒問題，橡皮圖章也合法，也是最高權力機關。但又要改變最高立法機關流於形式的做法，又要考慮到黨的領導立法與行政之間不能牽扯太多，不然不好辦。過去權力機關職權不具體，雖然有規定，但是難以執行。現在要改變這個狀況，怎麼改？說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這話很空，而權力機關的權力很具體，這樣不行吧？如果權力機關的權力很具體，如何保證行政機關高效率這方面沒規定，也不行。人大是形式不行，把權力機關的權力明確了具體了，牽制太多，還是不行。

趙紫陽繼續說，小平多次講，民主和法制要相結合。法制是民主的制度化。另方面，法律對施行民主也有所制約。這兩個方面都要講得很具體。如果一方面很具體，另一方面不具體，只能導致無政府主義。專政問題也是個法制問題。

趙紫陽認為，目前的現狀不改變不行，步子走的太大也不行，各方面跟不上，有個適應問題。要使民主化進程健康發展，一開始就不能出問題，不然出了問題就要退回來。比如，工會作用是個大問題。平時沒什麼事，工會與黨政唱一個調，工人不把工會當成自己的組織，而是當成官辦的，御用的，出了事工會的話他也不會聽。當年批判工團主義是不對的，我們缺的正是這個，缺的是工會代表工人利益。但是要改革，這一步就要考慮怎麼走，工會強了，與工廠行政的矛盾就突出出來了。黨和各個社會組織的關係也有這個問題。

（六）三權立不能搞，但權力機關和行政機關之間，沒有個相互制約也不行。

彙報提綱最後一段「充分發揮輿論在民主建設中的作用」中講到了新聞改革問題，趙紫陽認為方向是對的，但他認為還要考慮可能會出什麼問題，如何防止出現這些問題？這個問題，不僅今天有，整個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都會有，如何保證國家在安定團結情況下，有領導有步驟、有秩序地在落後情況下起步？在各方面條件允許的情況

下實際能夠做到什麼程度？一個是方向，一個是在一定時間內能做到什麼程度，要有一個配套的東西。比如人大，作為最高權力機關一旦真正發生了作用，將來又有什麼問題？我們要體現人大的權力機關作用，現在能做到什麼程度？他認為，即使是對於最高權力機關，也有個制約的問題，比如美國國會通過的東西總統可以否決，另外有些國家可以解散議會。

趙紫陽認為，將來幹部任免和財政問題會成為人大與黨委矛盾的兩個焦點。幹部問題究竟應該怎麼規定？既然已經選了省長，由省長提出政府組成人員，你如果老是否決它，又要他工作又否決他的人權這個怎麼辦？有人說不會出事情，我看不一定，文革以來就有所謂你的幹部我的幹部，目前的趨勢會越發展越厲害。沒個互相制約的東西，不行。財政，也是個問題，僅僅人大通過了就可以制約政府，可缺少另一方面能行嗎？有些問題是很多複雜因素造成的。比如發票子，人大決定發多少就發多少恐怕不行，政府也決定不了，這是經濟運行決定的。中國的經濟狀況誰能看得那麼準？財政預算比較簡單，關鍵是開支。如果權力機關只討論政府提出的議案當然可以，但由權力機關直接提出預算案就有問題了。假如由人民代表提出增加教育經費 20 億，那你就得告訴我從哪裏開支。立法機關也不能侵犯行政機關的權力。沒個互相制約的辦法不行。改革當中對這些問題都要考慮，不能一個方面走的快，而另一個方面跟不上。

但另一方面，趙紫陽也指出，搞得很煩瑣也不行。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對付國會要占很大的精力，我們不能這麼搞，在內部消耗很大的精力和時間。趙紫陽說，這些問題都要反過頭來考慮一下，我們沿著哪個方向搞，搞到什麼程度。一方面搞了，另外搞什麼配套，我說這麼個思路。

（七）搞輿論一律，什麼也不能講，這不行。放開，行不行？有個承受能力的問題。

趙紫陽說，報刊也有這個問題。搞輿論一律，什麼也不能講，這不行。放開，行不行？比如批評一點了名，又不能申訴，也不能打官司，報紙講什麼就是什麼？這也不行。報紙開展批評，批評錯了怎麼辦？報紙監督，過去是強調喉舌功能，傳播黨的聲音、反映人民意願，如果主要是監督職能佔很大篇幅，都是講陰暗面，還有個承受

能力的問題。我們沒有民間報紙。如果現在有一張民間報紙專講反面意見，肯定銷路最大。這時，薄一波插了一句話，美國說趙總理支持《世界經濟導報》，不知道支持了沒有？趙紫陽說，沒有。彭沖跟上一句，那個報紙問題多得很。

（八）薄一波說，黨政分開要在加強行政效率、減少機構、層次、人員上下功夫之外，其他方面要在黨的統一領導之下，盡可能少扯皮。

薄一波接著說，中國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處於這個階段，說不民主，早就很民主了。說民主，無產階級專政不能丟，對那些犯罪團伙要堅決打擊。薄一波又說，現在我國官僚主義已經到了發展極點，很要命，世界上哪一個國家也不如我們的官僚主義。黨政分開要在加強行政效率、減少機構、層次、人員上下功夫之外，其他方面要在黨的統一領導之下，盡可能搞的簡單點。特徵是黨領導，人大、政府都在黨領導之下，不管是人大還是政府盡量少扯皮。說大問題，什麼是大問題？這就是！縣裏搞五套機構，可笑！現在要少扯皮，機構重迭，一大堆問題在人大討論，國務院不知道討論了多少次，一提到他那兒就出麻煩了，比如三峽問題。反對者是黨內的人，抓住一個問題反對我們的人，現在多得很。黨外的人不敢，有黨內的人支持，他就敢了。現在問題多，處在過渡時期。

（九）我們必須與代表不同利益的人協商與對話，將來大型對話一年幾次。與現有組織的對話，並不能解決問題。

在這次會上，趙紫陽再次提出了社會協商對話問題。他說，社會民主主要是兩個問題，一個是基層民主，一個是社會協商對話。政協是個很重要的協商形式，但是只靠政協不行，工會是重要的渠道，但是工會本身有個改革過程。現在政府與工會對話，工人不承認。理順黨與工會關係，工會本身的改革都要有個過程。解決了這些，政治協商的問題是不是就解決了？不一定。我們必須與代表不同利益的人協商與對話，不然不行。這些東西比較重要，將來大型對話一年幾次，可以由基層組織臨時選代表。一些與現有組織的對話，並不一定能解決問題。這是多年形成的。

（十）重大事情黨決定，政府要確定施政方法，又要向人大負責。三者關係很難理清。這是個麻煩問題。趙紫陽如是說。

趙紫陽回到他前面說的主題上來，他說，總之政治體制改革如果把政府的工作搞得很困難，不應該是改革的目的。人大既是最高權力機關，又在黨的領導之下，政府也在黨的領導之下。黨政分開之後，情況可能有所不同。總之，理順關係，發揮權力機關、行政機關的作用，權力機關也要考慮讓行政機關有效地工作。

胡啟立接著說，將來不可能完全求同，大趨勢是幾套班子相互制約，不可能完全是一個聲音，求異思維會發展。搞政治體制改革方案必須考慮這個問題。民主與效率既一致，也有矛盾。調動了積極性會有效率，可是民主與效率還是有矛盾。我們要從中國國情出發。亞洲發展快的那幾個國家，都不那麼民主，台灣、南朝鮮、新加坡都是這樣。這個問題怎麼處理？民主和效率的矛盾，確實是個很大的問題。胡啟立談到，美國人分析，中國投資條件最好的地方是天津，因為天津開發區的領導人是黨政合一的。你們彙報的第六頁說黨政分開，人事可以合一，這很有意思，是個思路，解釋解釋。

民主專題組的王曉東對這個做了解釋問題，他說，黨政分開強調的是職能分開，而不是人事問題。胡啟立接著說，要分得開，就得有許多具體的規定，這些條文細了就有打不完的官司，有很大內耗，各方面關係非常複雜。陳一諮插話說，人事合一可以避免出現兩個決策中心。鮑彤則說，我的觀點不一樣，決策機構人員可以當國家領導人，但是黨的辦事機構成員不行，主要是中央。趙紫陽繼續說，在整個體制中，各級人大問題很複雜，社會呼聲又很高，一講民主就要擴大人大權力，這很艱難，很複雜。我國是黨領導下的人大與政府，政府大事黨要管，具體事情政府管。所以黨要管的事，大體上就是人大要管的。如果在黨管的事之外，人大還要管更多，政府職權勢必受到影響。中國的權力機關怎麼體現？在理論與實際上都有一個怎麼搞的問題。黨政分開，黨不是不管了，重大事情黨決定，政府要確定施政方法，又要向人大負責。如果要理順，在充分發揮人大作用的情況下，三者關係很難理清。一開始研討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我就覺得這是個麻煩問題。

在會議結束前，趙紫陽再次強調，最複雜的是人大問題，要理清，要有個說法。人大從來是權力機關，一講發揮其作用，就涉及人大與黨委的關係，與政府的關係問題。究竟如何，在中國搞到什麼程度，很值得認真研究。世界上還沒有先例，沒有一個黨領導下的最高權力機關。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搞法與我們過去一樣，資本主義國家不一樣。如果按照資本主義國家的搞法也簡單，執政黨在議會佔多數，通過就是了。當然它有反對黨，我們沒有反對黨，但是不是就可以完全按照個人意願投票？黨員進了人大，如果就是個人身份沒有黨員身份，黨還派你進人大幹什麼？用資本主義的辦法不行，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辦法也不行，要搞個新辦法，那就是要考慮實際情況。黨的領導是通過黨員把黨的意志變成法律，這沒問題，但沒有改革以前也是這樣啊。這話沒錯，所有的黨員都投贊成票就是了嘛，可人大那也就沒有什麼意思了。如果離開黨員身份只以人民代表的身份投票，那又可能亂套了。看來，人大制度要有大的改革，很困難，難以行得通。

最後，趙紫陽說，在整個體制中克服官僚主義，要作為政治體制改革中的一個大問題，政治體制改革要有利於減少和克服官僚主義。他交代說，我看這個問題政改辦要好好討論一下，反覆議一議。

六、中央研討小組沒有聽取彙報的專題研討

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第一次會議確定，成立七個專題研討小組，同時考慮到中央黨校的理論研究隊伍較強，決定由中央黨校組織一個與其他小組並行的同時研究七個專題的小組。從 1986 年 11 月月到 1987 年 5 月，中央研討小組一共召開了七次會議，聽取了五個專題組的彙報，此後，就再也沒有召開過聽取彙報的會議。這就是說，還有兩個專題小組的研討報告沒有當面向中央研討小組彙報。他們的報告，都通過書面的形式，報送給了中央研討小組成員及中央政改辦。另外，中央黨校專題組的七個報告，除了在研討小組第三次會議上進行了現場彙報以外，因會議時間的關係，以後各次彙報也都改為書面形式。

以書面形式向中央研討小組所作的這些報告的內容。研討小組的成員們也都是瞭解的，在幾次研討小組的會議上，趙紫陽和其他領導

都不止一次地提到了他們的觀點。應該說，這幾個研討報告，對於整個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對於總體方案的形成，也都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了保證本書的客觀性和完整性，筆者認為有必要在這裏，對他們的研究情況和報告內容作一簡單的介紹。

政治體制改革基本原則專題組，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廖蓋隆負責，其成員也主要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人員組成。中央政改辦派出了張占斌為專題組聯絡員。廖蓋隆是黨內著名的黨史專家，同時也是政治體制改革的「老資格」，他是中共黨內最早呼籲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部長級幹部之一。早在 1980 年 10 月，他在全國黨校系統中共黨史學術討論會上就提出了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後來在海外被稱為「中共『庚申改革』方案」【231】，提出了黨政分開、黨內民主、改進人大體制、司法獨立、新聞自由、企業廠長負責制等許多後來政治體制改革方案中的重大問題。正因為如此，趙紫陽指定由他來負責政治體制改革基本原則專題，應該說是適逢其人的。

政治體制改革基本原則專題的研討報告，於 1987 年 5 月 20 日最後定稿。由於研究時間比較充裕，而且在這期間中央研討小組已經開過六次會議，研討小組的成員們對政治體制改革發表了大量意見，許多難題已經有了較為明確的結論，特別是在對原有體制的認識、對改革涵義、目標和重點的概括，對改革各項基本原則的確定，都已經有了成熟的說法和概括。這些東西都被改革專題組的研討報告納入其中。當然，這個報告也有其特點，就是它特別強調了發展人民民主問題，將「加強對國家機關的社會監督，實行國家權力的合理配置和互相制約」、「發揮社會的自我管理功能，實行廣泛的人民自治」、「保障和擴大人民民主權利，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等問題，列入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基本原則的範疇。在政治體制改革的長遠目標方面，它也作出了完整的概括，「高度民主、法制完備、充滿活力、富有效率」這十六個字，與中央政改辦形成的看法也完全一致。

社會主義法制專題研討小組的負責人，是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佘孟孝。該專題組的組成人員，大多來自中央政法委，也有部分來自全國人大和高檢、高法。中央政改辦派出徐沖、沈榮華擔任專題組聯絡員。法制專題組在整個研討過程中，相對與中央政改辦交流較少，政

【231】具體內容見本書第二章第三節。

改辦自身研討這個專題的次數也不多。之所以會如此，我想，大概與這個問題的敏感程度有關。

社會主義法制專題組的承擔單位，與中組部承擔幹部改革專題相類似，都是由此項工作的中央機構直接承擔的。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是中共負責政法工作的最高機構，在幾十年的運行中，它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的觀念、運行系統、工作方式和方法。要對政法方面進行任何改革，都不可能繞開中央政法委。而且，在中央政改辦的多數人看來，也許中央政法委本身就是黨政不分的載體，是這次改革的對象。

而正是由於中央政法委直接承擔了這個專題的研討，所以，它的研討報告改變了「社會主義法制專題」這個題目，稱為「關於政法領導體制改革的研討報告」。這個報告形成的最後日期是 1987 年 7 月 25 日。這個時候，中央研討小組的七次會議已經開過兩個月，整個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設計工作已經接近尾聲，「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已經改過了幾稿。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形成的這個專題研討報告，應該說，在許多方面還是反映了中央研討小組和中央政改辦的看法，與總體設想做了對接的。

在黨政分開方面，報告承認，黨對政法工作管得過多過於具體，替代了人大、政府的部分職能，存在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現象；承認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的現象仍然存在；也認為政法各部門之間關係還沒有完全理順，不僅在分工上有一些交叉，而且法定的互相配合和互相制約的機制尚不完善。報告認為，政法體制的改革，一方面黨要從各個方面支持和保證政法各部門依法行使自己的職權，支持和保證人大及其常委會依法加強對法院、檢查院的監督，支持和保證政府依法加強對公安、國家安全、司法行政部門的領導和管理。另一方面，要保證法院、檢查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檢查權，保證政法各部門依法行使自己的職權。為此，黨要改善對政法工作的領導，建議除了極少量重大案件之外，不提請黨委討論；建議取消地、縣兩級政法委。中央和省級政法委要適應黨政分開的要求，成為加強黨對政法工作的理論、方針、政策研究和有關全局性問題進行調研的「精幹的參謀、助手班子」；建議理順政法部門與黨紀部門、政府監察部門的關係，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報告認為，政

法領導體制改革，可以先從黨政分開這個關鍵問題入手，帶動其他方面的改革；先從中央政法部門做起，帶動地方各級政法部門的改革。

中央黨校專題組，由胡耀邦的前任秘書、中央黨校副校長陳維仁，和中央黨校校委委員、副教務長史維國負責。小組七個專題的研究隊伍，由中央黨校積極從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和活動的教師、及已經畢業的81、83級研究生、少量在校研究生，共30多人組成。他們中有許多是我的老師和同學，更有當初和我在讀研期間共同搞政改調研的夥伴。在研討過程中，我和遲福林都是來自於中央黨校，與他們比較熟悉，也算是這個專題組的聯絡員吧。

中央黨校的許多老師和研究生近年來一直積極從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在理論研究和資料方面有較強的基礎，而且思想觀念相對放得開。特別是黨校專題組成立以後，他們的熱情十分高漲，利用黨校這塊特殊陣地，和黨內各級領導幹部相對集中、黨內文件資料豐富的優勢，召開各種研討會、座談會，開始了積極的研討工作。在1987年前幾個月，他們頂住了校內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壓力，七個專題的研討報告陸續完成。

中央黨校專題組的七份研討報告，雖然大部分沒有能當面向中央研討小組彙報，但都以書面形式報送給了研討小組各位領導。在幾次會議上，他們提出的觀點和建議，都得到了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視和好評。比如，「在縣一級的人大實行議行合一的制度」的建議，「改革後黨委和組織部門在幹部問題上的管理職能是規劃、培訓，管宏觀政策」的意見，在政治體制改革研討中都有很大影響。

第七章

「總體設想」怎麼搞？

就在各專題組陸續開始工作的同時，中央政改辦也開始著手考慮政治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的設計問題。在經過反覆討論之後，確定搞成兩個側重點不同的文件，一是報送中央全會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二是在十三大報告中寫入「政治體制改革」和「黨的建設」兩個部分，前者側重操作，後者側重說理。在鄧小平提出的「不能搞三權分立」、「保證行政效率」、「不能遷就民主化的情緒」框框的壓力下，起草者們為了充分反映整個研討的成果，平衡處理民主與效率的矛盾，用了將近半年的時間，絞盡腦汁，對寫入文件的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重點、實施步驟，和具體的文字結構、角度、措辭進行了反覆權衡和修改。這個文件，後來在中共十二屆七中全會上得到「原則」通過。本章就是對這個過程的大體記述。

一、綜合組「掛牌」：總體設計開張

經過 1986 年 11 月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第一次會議，和後來一段時間的研討，政治體制改革的涵義、目標和重點大體上有了一個明確的說法。鮑彤考慮，研討工作任務很重，時間也很緊，必須從進入研討的第二階段開始，就對將來的總體報告要搞出一個什麼樣的東西，有一個大體的思路。為此，政改辦調整和加強了綜合組的人員，調孫方明過來負責綜合組的工作。鮑彤還要求綜合組的人員在平時腦子裏就要始終裝著這個問題，可以找時間採取「掛牌」的方式，請對此問題有興趣的研究人員來共同討論。

1986 年 12 月 11 日晚上，綜合組首次「掛牌」，討論總體思路的框架。這是政改辦從成立以來第一次開始正式的研究總體思路的框架問題。這天晚上參加討論的有鮑彤、陳一諮、陳福今、孫方明、吳偉、高山、顧雲昌、徐沖、張占斌、陳曉魯和沈榮華。討論由綜合組負責

人孫方明主持並首先發言。他說，3、4 月份前後寫給政治局常委的總體報告，是不是可以寫實為主。至於將來提交七中全會討論的文件，則重點要說理。梳理一下，可不可以有這樣幾層：一個是緊迫性和長期性；二是目標和重點；三是七個方面的內容；四是步驟和具體任務。高山說，寫給政治局討論的東西要實，綱目清楚。

鮑彤是個寫文件的高手，他在發言中說，給高層領導寫建議和給全黨寫文件，二者是有區別的。起草黨的文件，有一個統一認識的問題；給領導的建議，領導大都已經知道的，或者是領導佈置的題目，就不必談什麼意義。這兩種寫法不一樣。給領導的報告，每次要有發展、要有側重，還要考慮到如何轉變為給全黨的文件的問題。我們現在是討論透一個問題，給中央寫一個報告【232】，最後把幾個報告統在一起。但是要同步考慮，如何寫向全黨的總的說明文件。

鮑彤說，總體思路和具體的改革實施方案也不同。具體實施過程中，方案是非考慮不可的，但是在現階段不是我們的重點。指導具體的改革工作將來是書記處、國務院的事，要靠一系例文件來指導，這是根據總的原則、方針來起草的。這些改革進程中的具體指導文件不應該是出自於我們辦公室。我們要考慮的，恐怕是一個思路性的東西。

鮑彤進一步說，在專題研討臨近結束時，我們就要考慮搞一個全盤托出的東西，和一個給下面徵求意見的東西。要考慮到將來改頭換面的問題，從現在起就要把我們研究的論據、思路、存疑的問題都提出來，留給深入討論和將來起草文件時使用。專題小組彙報以後，每個專題向常委的報告，要由我們辦公室起草，搞的東西要盡可能的充實一些。應當承認，有些我們還不能自圓其說，但是，提法要盡量準確。各專題小組不要在虛的問題上花太多的精力，要比辦公室的第一次彙報有進展。我的理解，小平現在的考慮是，要急於拿出幾項現實的東西，能幹點什麼，怎麼幹。

對於社會政治生活民主化，鮑彤認為，這個問題必須講，但能提到一個什麼樣的高度、什麼樣的程度，恐怕要適度、要穩健。政改的基本原則，應該放在建設與改革的報告當中，政治改革的目標、社會主義民主是什麼。黨內民主問題要放在政治報告中黨的部分中去

【232】指每次中央研討小組聽取匯報之後，中央政改辦都要代研討小組給中央常委起草一個報告。從研討小組第三次會議以後的歷次會議，改成整理出會議紀要上報。

說[233]。黨以自身的改革來領導政治體制改革，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形成過程和商品經濟發展過程是一致的。

這次會之後，很快發生了大規模的學潮。隨之而來的是胡耀邦辭職、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衝擊。政改辦要應付來自左的方面設置的重重羈絆，進行「對表」，另方面還要準備向研討小組的第二次彙報，同時繼續推進專題研討工作，此後相當一段時間裏沒有再就總體報告的起草開過專門的會議。但是，就我們綜合組說來，這根「弦」始終還是繃在腦子裏。

時間到了 1987 年的 3 月。這個時候，黨內和社會上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正是高潮，本來應該是初春的天氣卻正在經歷著一場「倒春寒」。但是在中央政改辦的「小氣候」裏，卻依舊是改革開放的春天。此時，中央研討小組已經陸續召開了多次會議，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一些基本設想和具體措施開始逐步清晰起來。早在 2 月份，鄧小平又再一次叮囑趙紫陽，十三大上要拿出政治體制改革的設想。隨著研討進程的深入，動筆起草綜合報告的條件基本具備了。

3 月 7 日上午，綜合組開會，再次研究了綜合報告的提綱。在此後的幾天裏，大體上形成了一個寫作大綱。3 月 21 日上午，綜合組再次研究了這個綜合報告大綱。陳群林在會上說，對正在進行的研討工作要有一個大體的估計。他說，現在的研討成果有幾種情況，一是已經研究了但研討小組還沒有定論的；二是已經正在組織實施的；三是基本還沒有開始的。現在還有幾個專題組的彙報紫陽他們還沒有聽，更沒有表示意見。對這些問題，應該怎麼處理？怎麼反映到報告裏，得研究一下。這次會議確定，要按照已經商定的大綱，開始動筆。當時這個提綱的內容包括十個部分：第一，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第二，改革的目標和原則；第三，黨政分開；第四，人民代表大會的改革；第五，政府改革，主要是機構改革；第六，司法制度改革；第七，公務員制度；第八，建設社會主義民主；第九，法制化；第十，黨本身的改革。分工是，其中一、二、三、十等部分由孫方明執筆，四、六、八、九部分由吳國光執筆，五、七部分由吳偉執筆。

【233】1986 年 12 月初，按照鄧小平的意見，中央書記處決定，次年召開的中共十三大上要有兩個報告，一是由胡耀邦作政治報告，二是由趙紫陽作「建設與改革」的報告。

4月7日下午，中央政改辦召開例會，討論由綜合組起草出來的綜合報告初稿。鮑彤在會上對這個稿子發表了意見，他認為這個寫法比較適於向中央常委報告。但要向全黨作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說明，則需要按照另外的結構來組織。他說，一種是經濟改革決定的寫法，高屋建瓴，重點在說理，這是給全黨看的。另外一種是簡單寫法，給中央高層領導看的，一講要幹什麼，二講怎麼幹。我們這個文件，我考慮可以分為三個部分：要幹什麼？比如黨政分開等等；具體做哪幾件具體的事情？一、二、三。前面再加一個說明。有一些規章則作為附件。他評論說，現在這個稿子，第四個部分寫得好。你們要以第四部分為標準，再搞出一個稿來。現在研討中只有六、八部分還沒有搞清楚【234】，別的都可以寫了。

就在這一時期前後，重新組織起草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的工作，也提上了中央高層領導的工作日程。鄧小平決定，由中央代理總書記趙紫陽主持這件工作，將原來考慮的兩個報告合為一個。趙紫陽對原來由耀邦組織的報告起草班子做了些調整，確定由鮑彤在主持中央政改辦工作的同時，主持十三大報告的起草，起草組人員也有增加。經起草小組研究，確定十三大報告中要有兩個部分集中講政治體制改革，即報告中專門講政治體制改革的第五部分，和講黨的建設的第六部分。這兩個部分都由中央政改辦承擔。這樣，政改辦派出陳群林、吳國光加入了十三大報告起草組的工作。政治體制改革綜合報告由綜合組孫方明負責，吳國光、吳偉仍然參與綜合報告的起草任務。

4月3日下午，政改辦召開例會，討論十三大報告中政治體制改革部分該怎麼寫。鮑彤對會議作了一個小結性發言，一共講了五條。他說，我贊同剛才發言同志的意見，第一，對於現狀，可以講點描繪。現狀講清了，堅持什麼改革什麼，怎麼搞就清楚了。第二，堅持什麼？三條，一是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共和國根本制度；二是已經建立的人民自己的國家機器；三是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作用。這裏邊第一個，人民共和國就是我們找到了一種治理國家的形式，它可以使人民能夠充分表達意見，管理國家。它的具體形式是

【234】指法制部分和社會主義民主建設部分，這些方面的內容，當時研討小組還沒有專門聽取匯報。

需要探索的，這是一個漫長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過程。二是我們建立了這個國家機器，但是並不是我們一建立了它，它就能正常運轉。怎麼分工、制約、發揮出效率，也是需要探索的；三是黨的領導作用問題。黨執政，處在領導地位，但並不等於黨如何領導的問題就解決了。這就是說，建立了但遠還不是自然完善的，它本身就是一個發展過程。這樣講，就能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點講清楚了。任何國家都有這麼一個過程。

鮑彤的第三個問題講到中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他說，中國現在的政治體制，特別是領導體制，是從人民戰爭走過來的，在那個年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並且適應了產品經濟。毛主席當初提不出我們現在說的兩個轉變，是他沒有必要提，因為那個時候是搞階級鬥爭，是搞產品經濟的。現在我們不搞階級鬥爭，也不搞產品經濟了，那就必然有個對原有體制進行改革的問題。經濟體制改革有了明確的目標，那麼政治體制呢？舊體制集中的體現在權力過分集中，人治因素太大，對於長治久安、國家機器的協調運轉是不利的。第四，報告中對現行體制的弊端只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小平同志在 8·18 講話中講得明確講到的，權力過分集中。就講這一句話。要表明我們研討的指導理論是小平 1980 年的講話。第五，要把政治體制改革的長期性、複雜性提到前面來。長遠目標不必發揮，不和高級階段聯繫起來，近期目標要著重講制度化。在講兩個轉變時講制度化，在近期目標時也講。以這個話為起點，把制度化作為民主政治建設的必由之路，鮮明的提出來。最後當然要講，一是加強黨的領導，二是黨委帶頭。

4 月 15 日下午，改辦開會繼續討論十三大報告第五、六部分的稿子。吳國光作為政改辦派出參加十三大報告組政治改革部分的執筆人，在會上介紹了他對起草黨的建設部分的思路。他說，在十三大報告中應該明確提出，黨的建設理論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有一個大的發展。這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實現從革命黨向建設黨的轉變，向執政黨的轉變。這裏面包括的內容有三方面，一是從非法鬥爭、武裝鬥爭到黨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的轉變；二是從搞階級鬥爭、領導群眾運動到協調社會各方利益、支持人民當家作主的轉變；三是從奪取政權的任務到集中力量領導現代化建設的轉變。要實現這些轉變，就必須對黨的自身進行改革，改革的關鍵是改變過去長期形成的黨政

不分的領導體制，實行黨政分開，黨對國家的領導要體現為政治領導。黨的力量在於聯繫群眾，如果黨失去了與群眾的聯繫，黨自身就會成為一個利益集團。黨的活力在於民主，離開了黨內民主，黨就會變成少數人實現自己政治目的的工具。

4 月 20 日晚上，政改辦臨時開了個小型討論會，有綜合組和其他組的幾個同事參加。在大家討論了鮑彤出的題目，「群眾對於政治體制改革有些什麼要求」之後，鮑彤又談到了十三大報告和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起草進度問題。他說，今天下午，小魯、占斌找我談民主組彙報問題，我說民主組的問題要拉一個單子。紫陽同志 6 月出國回來以後要安排三次彙報，6 月下旬拿出總體方案來。6 月底、7 月要初向中央常委彙報，修改後到一定範圍內徵求意見。七中全會可能在 9 月開，要討論十三大報告的稿子。政治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的討論，更要提前一些。

此後，4 月的 23 日、28 日，5 月的 3 日、4 日、8 日，中央政改辦連續進行了多次內部討論，研究、調整、修改政治體制改革的綜合報告、十三大報告第五、六部分的稿子。此前，政治體制改革綜合文件的標題一直都比較含混，有時稱為「綜合報告」，有時稱為「總體設想」。在這幾次會上，經過爭論，大家對這個文件的題目最後取得了比較一致的意見，同意暫定名為《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

同時，大家還重點討論了如何調整和劃分這兩個文件的角度和側重點，並對這兩個稿子的體例問題形成了比較一致的看法。多數人認為，這兩個文件，講的是同一件事情，但提供給的對象不同，用途不同，側重點也要有所不同。提供給中央七中全會討論的改革總體設想，實際上是一個改革的總體方案。虛的東西，要有，但不是重點，重點應該是政治體制改革要幹點什麼，怎麼幹，步驟是什麼。而十三大報告的兩個部分，是報告給黨的代表大會、給全黨、全國人民看的，要更側重於說理，要講清楚改什麼，為什麼要改。但也有部分人認為，總體報告首先是要在政治局會上討論通過的，寫實的東西多了，太具體就可能出現不同意見，甚至發生爭論。這樣做，不利於政改方案的最後通過。

到 1987 年 4 月下旬和 5 月上旬，上述由政改辦負責起草的兩個文件，正式的送審初稿都已完成。鮑彤向趙紫陽彙報了這兩個文件的

起草情況和討論中的一些想法。趙紫陽同意了政改辦的意見。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作為一個在黨的七中全會上討論和通過的文件，講到改革的具體措施和步驟較多，將來應該在內部掌握和擇機出台，不作公開發表；而十三大報告講政治體制改革的兩個部分，則側重務虛，講改革的必要性和原則較多，將來要讓全黨、全國都知道，都明白。鮑彤說，這叫一件事情兩種表達方式，一種是內部表達，一種是公開表達。

緊接著，這兩個文件的初稿分別進入了不同的送審和修改程序。總體設想稿，報送給了趙紫陽和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的各位領導審閱。然後根據各位領導的意見，政改辦綜合組將進行再修改。而十三大報告的兩個部分，則需要同十三大報告組起草的報告其他部分整合，然後才能送中央五人小組和常委審閱。這件工作，到 5 月中旬也基本完成。

十三大報告初稿完成以後，首先送趙紫陽審閱。趙紫陽認為，稿子總的結構還可以。他對闡述初級階段理論部分比較滿意，認為有新觀點；而對黨的部分不滿意，但認為不是寫作的問題；對於經濟改革部分也不滿意，認為沒有講清楚。對政治體制改革部分，趙紫陽的初步意見是，政改部分多了，長了一些，可能是因為內容比較多。鮑彤解釋說，是考慮到領導不熟悉，所以多寫了具體的做法。將來中央領導看過了，就可以去一些乾貨，加一些虛的。

二、鄧小平說,「你們是不是也搬了點三權分立?」

趙紫陽在看了十三大報告初稿以後，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說明了報告的起草情況，同時送上了十三大報告的初稿。鄧小平看了報告初稿後，5 月 27 日上午請趙紫陽到他家中談了一次話。

在談到十三大報告稿時，鄧小平先是從總體上評價這個稿子說，寫得太粗了，太不活潑、不動人，語言多了，反而說不清楚。關於報告的內容，鄧小平說，我對內容沒多少意見。要說有些意見，是對政治體制改革這部分。我們不照搬三權分立，你們也沒有寫要三權分立；但是是不是也搬了一點？主要問題是要使行政機構能夠有效地工作，不能過多干擾行政機構的工作。決定了就辦，這是我們的優勢，這個優勢不能丟。不能放棄專政，不能遷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緒。

鄧小平說，我們要搞一個什麼樣的體制？要搞一個增強行政效能的體制，機構要精簡。我過去講過三條【235】，仍然是必要的。民主還是個手段，講民主必須要和法制聯繫起來講，把法制搞起來，才能有穩定的社會環境。我們的行政機構應該很有效能。這個報告語言沉悶，包括初級階段部分。要使人能從報告中看出中國還要繼續改革，這個報告就成功了。

最後，鄧小平強調，左和右，仍應以克服左為主，因為左的積習很深，很難改。至於右的問題，一發現就去解決就是了。經常妨礙我們的是左，反左糾左應該是我們的主要精神。

就在鄧小平對十三大報告政治體制改革部分提出批評當天，5 月 27 日晚，鮑彤就召集中央政改辦全體人員，傳達了鄧小平的意見。同時，鮑彤還傳達了鄧小平在 5 月 22 日會見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時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一段談話。鄧小平說，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凡是影響穩定、正常秩序的東西都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口號應該是效率、穩定，而不是民主。鮑彤說，我們理解，民主不要提得太多。民主是手段，我們不搞三權分立，不要牽制太多，不遷就民主化的情緒。搞民主要和法制相結合。要特別強調效率，主要問題是保證行政機構有效能的運轉。

5 月 28 日上午，是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的第七次會議，聽取社會主義民主專題組的彙報。會上，趙紫陽與研討小組的其他領導人對鄧小平 27 日關於政治體制改革要體現效能、穩定的意見，也進行了議論。趙紫陽指示政改辦散會以後回顧一下前段時間的工作，研究如何貫徹鄧小平的意見，要「反覆議」。

5 月 29 日，中央五人小組舉行會議，第一次討論了十三大報告的初稿。會上，趙紫陽認為報告初稿提煉得還不夠，道理講得不很透。對於第五部分，政治體制改革部分，要大改，他認為現在太多、太實、太長，應該主要講方向、講道理，統一一下思想，講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只能一定怎麼搞，不能怎麼搞，不搞西方式民主，社會主義民主問題要講加強擴大社會對話，協商渠道制度化。趙紫陽提

【235】指鄧小平為政治體制改革規定的三條內容：首先是黨政要分開，解決黨如何善於領導的問題。這是關鍵，要放在第一位。第二個內容是權力要下放，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同時地方各級也都有一個權力下放的問題。第三個內容是精簡機構，這和權力下放有關。參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 177 頁。

出，可不可以設想為十三大再搞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的文件，而報告中只講方向和道理，統一思想，既不要期望過高，又要扎扎實實地搞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

關於黨的建設部分，趙紫陽請高陽在中央黨校搞一個小組平行作業，研究解決腐敗等問題的具體措施。趙紫陽說，列寧當時是搞清黨，我們不能這麼搞，那麼黨建應該怎麼搞？他還建議把黨內民主放到黨的建設部分中來講。

三、效率與民主應該怎麼擺：政改辦的討論

鄧小平的「是不是了搬了點三權分立」的說法，對正在起草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和十三大報告說來，是一種含蓄的批評。這對於文件的起草者們說來，構成了一種巨大壓力。在當時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環境下，這種批評無疑包含著政治上的風險。但是，起草者們所要考慮的，主要的還不是這個，而是怎麼樣才能既讓鄧小平滿意，同時也處理好效率與民主的關係，怎麼樣在讓政治老人們能夠接受的前提下，在這場政治體制改革當中體現出發展民主政治這個大的主題。

中央政改辦於 29 日舉行全體會議，討論鄧小平的意見。會議由鮑彤主持。開會伊始，鮑彤就說，要認真討論一下小平同志指示，回顧一下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接著，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我們如何估計前段時間的工作？哪些需要肯定？哪些需要完善？哪些需要重新考慮？今後 20 天我們要做哪些工作？下一步研討中要提哪些基本精神？對鄧小平的意見應該怎樣認識？這些問題我們今天都要討論一下。鮑彤說，6 月下旬前，十三大報告要有第二稿，6 月下旬紫陽訪歐回來，我們對他走前提出的研討回顧這個題目要有個回答；6 月底、7 月初要向中央報告政治體制改革半年來的研討，要將結果發到黨內一定範圍內徵求意見。鮑彤說，我不傾向於另外搞一個文件，就在十三大報告中講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是在立論上，效率與民主的關係怎麼擺？一個是近期的，一個是長期的。實行黨政分開，進行機構改革和幹部制度改革，都要同時著眼於保證效率。

嚴家其認為，提高效能要在四方面下功夫，一是黨政分開，目的在於提高政府效率；二是解決人大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三是實行機構

改革，加快行政立法，四是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他認為，政改辦對第二個問題討論得較少，黨政分開可以考慮幾種模式，比如可以是黨的主要領導人出任總理，也可以是黨的主要領導人兼任國家主席，但國家主席要有實權。

陳小魯認為，我們在研討和十三大報告起草當中，沒有受三權分立的影響。主要的問題是在表達和結構方面沒有突出講效率，而整個思路其實是對的，措施和內容都是有根據的。

陳福今說，不搬三權分立，這從一開始我們的指導思想上就是明確的，現在報告這個稿子中也沒有，是不是在某些表述上沒有注意？

陳群林說，我們在十三大報告中確實沒有講三權分立，但不能把政治體制改革考慮得那麼理想，那麼純。有許多條件的限制和約束，畢竟我們現在還是初級階段。他認為，近期目標是個關鍵問題，應該有所變動。怎樣確立這個目標，直接關係到方案的設計。

陳一諮認為，我理解，小平不是說我們在指導思想和行文上的照搬，而是指沒有突出效率問題。要有效率，就要有一個相對獨立運轉的政府系統。

鮑彤在大家發言之後，比較全面地談了他的看法。他一共講了九點。鮑彤說：

（一）小平說，不搞三權分立，你們也沒寫，我看這是鼓勵；是不是也搬了一點？這是提醒我們注意。我理解，小平講的，就是不搞扯皮體制、無助於提高政府效率的體制，這種體制看起來很熱鬧，但不是當務之急。

（二）小平還講，不要遷就民主化的情緒，這也是提醒，指的是不要把民主問題看得太天真、太理想化，認為一下子就可以搞到什麼程度，能解決多大問題。

（三）如果是指這兩點，要以此來考慮半年來的工作，是表達問題，還是個思路問題？這兩個問題分不開。我們在研究每一個具體問題時，是掌握了效率這個尺寸的，兩個有利於、從實際出發、效率、活力、積極性、克服官僚主義，我們是注意了這些方面的。但這是在談到具體問題時考慮的。我們對國家狀況缺乏宏觀的分析，這就使思路問題產生一個後果，即形不成完整的體系，在表達上使人感到我們是從概念出發，從而產生錯覺。

（四）這個十三大報告的起草稿起了它應有的作用，就是把我們的思路、要解決的問題和盤托出了，讓領導審閱了，這個目的就達到了，引出了領導的重要指示，這對我們繼續研討和起草報告都非常重要。好處是看得清楚了，意見也可能很尖銳，但能讓我們找到問題所在。我們思路的弱點，與辦公室領導在後期沒有反覆提出認識總的國情，沒有反覆要求大家從總的方面研究問題，掉到具體問題裏面去了有關，這個責任在我。

（五）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到底要改成個什麼樣的體制？解決什麼問題？要從實際存在的問題出發，要從解決這些問題的具體環節、條件出發。我們遇到一個兩難的選擇，即效率與民主這對矛盾怎麼處理？全世界都認為，這二者之間有矛盾的一面，也有統一的一面，恰當處理好難度很大。第二個難題是民主與穩定，如何找到適當的結合點？政治體制改革，就是集中要把這兩個問題處理好。穩定才有效率。近期應該著重解決效率與穩定問題。民主是長遠的、總體的，效率是近期的、主要的。我認為，近期應該從提高效率、保證穩定著眼，把兩個著眼點具體化。從長遠講，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的目標，這沒有問題。小平講長遠時，是把民主作為目的地；他在講穩定、講發展時，民主才是手段。但是，我們如果把民主理想化，看得太天真，認為在短期內就能解決大問題，那是不行的。有什麼病就要吃什麼藥。小平這次提醒我們，很重要。

我們近期主要解決社會穩定和提高工作效率問題，這是近期目標，是長治久安與加快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化。長遠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這是不成問題的。民主既是目標，又是手段。我們近期著重解決最迫切的問題，即效能與穩定。建設民主政治要以不影響社會穩定，而且要能加強安定團結為邊界條件，不能給社會穩定帶來消極因素。

（六）現有我們各種社會組織中，最重要的有兩個，一是黨，二是政府。黨要提高效率，就要提高對重大問題的決策效率，政府要提高日常決策與執行的效率，這兩點都是覆蓋全社會的。我們提出的關於黨政分開的建議，是有利於提高這兩個效率的，這裏不存在黨與政府之間扯皮的問題，也不存在削弱黨的領導的問題。小平講效率、活力、積極性、反對官僚主義，也是經濟體制改革要達到的目的。要解決經濟中的問題，必須解決黨與政府的

問題。小平從去年6月份以來多次講改革，就是從推動經濟改革角度來講的。

講效率，最重大的，是黨的重大問題決策的效率。我們現在要理順黨與政府的關係，講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實行黨政分開，這對黨、對政府都有好處。由此看，黨政分開的各項建議，都是有利於提高黨和政府的效率的，包括取消分管書記、取消黨組，包括理順書記處、常委、政治局的關係，包括基層黨的工作重點是保證監督。這是個有效率的體系，不是個扯皮的體系，也不削弱黨對政府的領導。要加強政府效能就是要削弱黨的「領導」，這個理念，非常必要。

關於黨內民主問題，我們已經搞得非常具體化了。我們恢復了六屆六中全會時的傳統，黨內民主不但可以保證效率，而且可以保證黨的決策的正確性。我們比六中全會有補充，特別是明確提出了對最高領導人的監督，這是黨內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

我們彙報了機構改革問題，最直接體現了效率和精簡。我們提出的從職能入手解決機構問題，實現預算約束和法律約束，表明這不是搞扯皮體制。實行國家公務員制度，保證行政幹部素質，除此以外，沒有別的辦法，這也是不成問題的。

民主問題怎麼搞？我的腦子裏還不是很清楚。現在理解，紫陽講黨內民主，是從帶頭的意義上講的；講著重研究人大問題目的是不妨礙行政效率，從最高權力機關的權力不是無限的，不能侵犯行政機關的權力角度來講的。人大、政府向黨負責，政府又要向人大負責，這是個什麼關係？紫陽講這個問題重要，是講其難度很大，要找出一個說法，並不是講它是當務之急。昨晚我開始悟到這一點。基層民主是重要的，它直接牽涉人民的積極性，牽涉社會的穩定，對效率有非常大的影響，因此也是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還沒有拿出像樣的東西來。

昨天的彙報，要解決的是對人大問題有個說法，對基層民主有個辦法。基層民主，社會對話，搞得最好的是波蘭。從中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進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要搞扎扎實實的東西。開大會當然好，但只是個櫥窗。最切實的不是形式主義的民主，是在基層，這是我們的弱點。在研究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時，眼睛不要只盯在上面的櫥窗上，而是要解決基層的實際問題。上面搞得再熱鬧，群眾有什麼親切感？群眾不是個提高地位

的問題，而是要代表他們利益的問題。下一步著重要研究的是這個。

（七）我們到底要搞成個什麼東西？我們彙報的東西，搞兩個層次。一是紫陽回來，要彙報5月28號交給我們的回顧任務。哪些問題我們站得住，哪些方面是好的，哪些方面現在看有問題，需要調整或者緩行。再就是向政治局的彙報，向中央的報告，中央向十三大的報告，也要從中國國情出發來寫，為什麼是這樣選擇而不是那樣選擇，強調當前的目標是提高效率，外部條件是黨政分開，內部條件是機構改革和實行公務員制度，都是直接與效能相聯繫的。人大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也要有個說法。從長期看，人大問題是個長遠的民主政治建設問題。近期應該把重點放在基層民主上，這也有利於效能、穩定。同時，帶頭的是個黨內民主，可以對社會民主的發展起個帶頭作用。如果我們這樣把整個思考過程端出來，就會讓人有個耳目一新的感覺。

（八）紫陽講，如果一個方面有具體規定，很具體，另外一個方面沒有具體規定，就會讓人感到不具體，就可能偏到一頭。如果我們從人大監督方面講得很具體，但人大不能侵犯政府權力方面講得很少，那就可能產生問題。紫陽昨天在研討小組第七次會議上提出了這個問題，哪幾條上要注意這兩個方面，要列一個單子，看看有無不足，並且提出意見。

（九）從報告表達的意義上來說，我們要搞出一個更高、落腳點更好、更易於為黨內做實際工作的同志理解的文件來。

6月1日上午，政改辦再次舉行全體會議，繼續討論鄧小平和趙紫陽的指示精神。來自於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組的黃海，首先向大家介紹了鄧小平的有關論述。然後大家發表看法。陳小魯說，十三大報告不講民主恐怕不行。陳一諮認為，我們現在的體制是決策前缺少民主，決策後缺少效率。周傑則說，建立高效能的政府體制，現在體現在標題上，而沒有體現在整個思路上。孫方明說，沒有民主，民主就是目標，有了民主，民主就是手段。

6月2日上午，中央政改辦繼續舉行全體會議，討論如何修改十三大報告第五部分。鮑彤繼續發揮了他的想法，他說，第五部分總的看不錯。內容不怎麼樣是因為沒有講道理，道理講好了就可以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必從抽像的角度去講，而是從各個角度，寫黨政

分開、機構改革、建立公務員制度等等的必要性。道理結合具體事情講這會好得多。政治體制改革是抽像概念，是抽像的總概念，圍繞這個講不清楚。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概念現在也說不清楚，如果說就是建立在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基礎上的，由人民行使權利的政治，等於同意反覆，沒有必要下一個定義，不是資本主義、不是獨裁政治就行了。

在討論中，有些研究人員主張不去區分長遠目標和近期目標，鮑彤表示不贊成，他說，為了不吊高民主的胃口，目標分層表述很有必要，也是為了不至於使人民失望，這是一個政治問題。現行體制的弊端要講，但是要講得巧妙一些，改哪幾條就講哪幾條，不一定集中講。一些話小平可以這麼講，我們就不能這麼講，比如說講黨政分開，就講在我們的體制下，黨包攬的事情太多，影響到政府效率和人民的積極性；講機構改革，就講政府直接管企業，自己的事辦不好，還影響企業的積極性。要明確而不平淡、鮮明而不刺激的講。

關於近期改革目標，他主張就寫小平的三句話，增加活力、提高效率、發揮人民的積極性，不必深究這三者的內在關係，這三個東西歸根到底是一個東西。官僚主義阻礙提高效率、壓制活力，挫傷人民的積極性。要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點，突出說明民主與穩定、民主與效率之間的關係。從政改的有限條件，講到近期目標是有限目標，沿著穩定、效率的方向展開，抓住幾個環節，即黨政分開等環節，既可解決效率，又可以解決民主問題。抓住這些環節，就抓住了方向不可逆轉。現在的體制就是黨領導一切的體制，這次撤銷地方黨委常委的問題沒有解決，但我們解決了分管部、分管書記、分管常委的問題，就等於取消了黨委權力膨脹的載體。載體去掉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鮑彤進一步說，不是黨的辦事機關代替政府來工作，而是共產黨員在政府中工作，這就是黨政分開。黨政分開要說現行體制有什麼弊端，要用什麼方法解決，改了以後會形成什麼樣的形勢和局面。要讓黨代會代表得出結論，必須要這麼幹，目前也只能這麼幹，過高的和過低的要求都可以被克服。講清了之後，就不會有失望與過高的期望。要寫清楚，不搞三權分立，就是不搞扯皮體制；不遷就民主化的情緒，就是不搞形式主義，而是扎扎實實地搞能調動人民積極性的東西。

6月4日，政改辦領導人與綜合組成員再一次討論十三大報告第五部分的修改。鮑彤對綜合組成員說，要回顧一下九個月來，稱得上研討結論的有幾條，報告就要把這幾條反映出來，重點要轉成講道理，有別於過去的稿子那樣講改革的內容。對於現行體制弊病的分析，不在開頭講，而是從解放生產力講起，講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一樣，也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都應該是解放生產力的體制。三中全會時就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小平講了話，但當時還來不及實行，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去年6月，小平再一次提出了這個問題，中央做了研究，現在向大會報告。

鮑彤強調，長遠目標與近期目標分開，這是研討的重要成果，只講長遠，不講近期，則胃口吊得過高；只講近期，不講長遠，則令人失望。實現長遠目標需要幾十年上百年的努力，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建設，要逐漸積累。近期要確定一個既符合長遠方向，又切實可行的目標，集中到一點，就是建立有行政效能的體制。現在最大的任務是搞好現代化建設，要穩定、要效率，保證發展生產力，保證長治久安，要反對官僚主義。從根本上說，民主政治離不開現代化建設，現代化建設搞好了，民主就會更多一些。

對政治體制改革措施的寫法，鮑彤也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解決穩定和效率問題，關鍵是解決黨政關係，否則其他關係解決不了。現行體制其實就是黨政不分的體制，所以現階段政治改革的首要關鍵是黨政分開，主要內容或重點就是提高政府與企業的效率，提高人民積極性。對黨政分開要講清弊端，講清必要性，講清怎麼做。黨政不分開，削弱了黨的領導，政府沒效率，各種關係理不順。要裁減黨的機構，黨在中央，地方和基層等三層有不同的職能。黨實行政治領導。改變領導方式，這不是削弱黨的領導，而是適應現代化的要求。實行了黨政分開，才有可能提高政府效率。為此，還要精簡機構，實行政企分開之後，政府機構要符合新經濟體制的需要，專業部門要裁併，否則政府管得太多，企業就沒活力。政府的宏觀管理職能要加強，因此綜合部門要加強。改革之後，人員素質怎麼提高？就是建立公務員制度，這樣幹部人事制度就走上法制的軌道。

鮑彤認為，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發展的方向，問題在於怎麼起步。民主的目標是人民當家作主，不像資本主義那樣花花哨哨。目

前我們雖然受到文化等多種條件的限制，但是保護公民權利、實現基層參與、實行群眾監督這些方面是可以做到的，有利於提高基層群眾的積極性。要講選舉、講人大、講絕不允許侵犯公民權利。黨和政府怎麼與群眾加強聯繫？可以通過協商對話這個渠道，把這個重要性說清楚。協商對話具體怎麼做不去規定，由群眾來的創造，現在已經有了各種渠道。要充分發揮各種社會組織的作用，政協、群眾團體都要代表群眾的利益，這樣來講群眾團體的自治問題。同時要開闢新的對話渠道，成為活躍社會生活的重要方式。鮑彤還說，司法的問題可以放在黨政分開部分中講，立法要保障改革，立法主要的內容是把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固定下來，立法為改革服務。一旦固定下來，黨的組織和政府都要照此辦理，理順之後，即走上制度化。最後要特別強調指出，這是一個自我完善的過程。過去的體制基本是好的，但是沿襲了戰爭年代的體制，不適應現代化的建設，系統提出改革和根本解決問題的時候到了。要通過長期的改革過程，從根本上解決權力集中和人治的弊端。進行改革的時候要配套，不至於注意了一個方面，而忽略了另一個方面。

四、「鄧小平就是中國最大的實際」

在6月1日上午，中央政改辦再次討論鄧小平對十三大報告稿政治體制改革部分提出的意見的時候，黃海說了一句後來成為政改研討中最經典的話，他說，我們總是說要從中國實際出發。什麼是中國實際？小平同志的話就是最大的實際。這句話引起了大家的共鳴和思考。

政治體制改革一定要搞，只要能搞下去，哪怕只向前走了一小步，也會是我們國家民主政治建設前進了一大步。這既是我們的任務，也是我們的信念。那麼怎麼搞？鮑彤在政改辦剛剛成立時，曾經對研究人員們說過：政治體制改革，「第一，方向要正確；第二，建議要可行。」所謂方向正確，就是必須在黨的領導下進行，以改善黨的領導為目標，不能動搖黨的領導地位；所謂建議可行，就是要注意黨內外的對政治體制改革的不同要求，注意各方面的承受能力。

承受能力是指什麼？

一是黨自身的承受力。中國現行政治體制最核心的主體，是執政黨——中國共產黨。這個黨、這個政權是從幾十年的政治、軍事鬥

爭的風雨中走過來的，它有幾千萬黨員、幾百萬幹部，它的體制、觀念、組織形式、工作方式早已經成為一種巨大的歷史慣性。現在共產黨已經成為執政黨，主要任務已經不再是階級鬥爭、奪取政權，就要對這種適應階級鬥爭、軍事鬥爭的政治體制進行改革，就必須改變原有的體制、觀念、組織形式、工作方式，使之適應執政與和平建設的需要，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其中，觀念的改變尤為重要，也尤為艱難。

二是黨的幹部，特別是黨的中高級領導幹部的承受力。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有幾百萬在國家各個領域，掌握著從中央到地方的各方面權力的幹部。幾十年的「一元化領導」，已經形成了一個相對固定的權力格局和利益格局。政治體制改革是權力再調整，也是政治利益再分配的過程。這裏面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權力和利益，黨的部門和政府部門的權力和利益，黨政部門與民主黨派、社會團體間的權力和利益等，都要進行再分配、再調整。在這個過程中，勢必會觸及一部分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的利益，觸及一些部門、團體的利益。他們會不會接受和配合這種調整，他們從心理、觀念上會不會支持這種調整，這是開展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要考慮的因素。

三是中央高層，特別是老一代領導人的承受力。1980 年代中期，鄧小平、陳雲、李先念、鄧穎超、彭真等黨的第一代領導人都還健在，還有一些主張積極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高層「理論權威」們也都在，而且有相當影響。黨內的中、高級領導層中對政治體制要不要改，改什麼，怎麼改，都有相當大的意見分歧。講政治體制改革的承受能力，在相當程度上是黨內高層，特別是老一代領導人能不能接受、能接受到什麼程度的問題。

四是鄧小平的承受力。改革開放以後，鄧小平在全黨逐漸樹立起了領導權威。這個權威在當時，雖然還沒有達到後來 1990 年代所說的那種「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一言九鼎的程度，雖然他形式上不是黨的第一領導人，但在事實上他已經成為黨的最高決策者。雖然他在許多時候還要受到來自陳雲方面的壓力，和左的陣營的影響，但不得不承認，鄧小平是黨內老人們事實上的核心，這在當時已經成為國內外、黨內外公認的一個事實。所以，要考慮所謂承受能力，首先要考慮的就是鄧小平的承受能力。他能承受，政治體制改革才有可能在黨

的代表大會上提出來，被全黨所接受；他不能承受，就談不上被全黨所接受。當然，這並不是說，鄧能接受的東西，黨內其他高層，其他老同志就都能想得通，能贊成，而是說鄧小平接受了的，其他人就不會提出大的反對意見。

以上講承受力的四個方面，在政治體制改革研討階段，鄧小平的承受力是關鍵。

鄧小平這次對於十三大報告政治體制改革部分的意見，概括起來，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目標是提高效率，無論是活力、積極性、反對官僚主義，還是黨政分開，機構改革，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甚至是基層的民主政治建設，都要圍繞著效率這個主題。至於民主，那不是這次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他明確地說，不能遷就民主化的情緒，凡是影響穩定、正常秩序的東西都不搞。鄧小平的這些看法，對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的起草者們說來，形成了巨大的壓力。

當時由趙紫陽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設計，不但要承受來自黨內老人集團的重大壓力，同時要面對著另外一方面的壓力，這就是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廣大民眾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要求和企盼。從當時的情況看，知識分子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側重於反對一黨集權，主張黨政分開，實現民主監督、權力制約、言論自由；而基層民眾則側重於反對腐敗、反對以權謀私，要求保障自己的合法權益。政治體制改革方案同樣也必須反映這方面的要求，否則知識分子和廣大民眾就會對政治體制改革失望，對這個黨失望。因此，趙紫陽、鮑彤，包括政改辦的研究人員們認為，民主這面旗幟，共產黨不能丟。趙紫陽在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第三次會議上明確主張：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卻感覺到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民主，這終究是一個我們要解決的問題，一百年也要回答。人類社會的民主應該是越來越發展，一些條件不具備我們可以對人民說清楚，但絕不能讓人感覺到共產黨害怕民主，不敢講民主。這就是說，報告的起草者們認為，民主，在政治體制改革方案中必須有所反映。

應該說，近年來我們在討論中經常提到的民主憲政、言論自由、公民權利、黨派政治等問題，在當時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研討過程中都討論到了。但是在納入方案時，就要有取有捨。鮑彤和政改辦的研究人員們在這個時候，對於鄧小平要的效率，與黨內外對於民主的要

求這個矛盾，已經看得很清楚，而且也確實面臨著兩難的選擇。在這種兩難的選擇中，政改方案的研討者們不得不首先選擇服從於鄧小平這個「中國最大的實際」。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要拿出來，要在中央常委、政治局、中央全會、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首先就需要鄧小平通過。鄧那裏通過了，這個方案就能得到多數老人、多數中委的支持，就能拿上代表大會，就可能被黨代會、被全黨所接受。對於鄧小平們不能接受的東西，就不要提，否則方案就通不過、搞不成。

這次政治體制改革，或許只能使中國的民主政治向前走一小步，但只要這個步子邁出去了，這一小步就可能會成為中國向民主社會轉型的一大步，就有可能像經濟體制改革一樣，造成一種難以逆轉的趨勢。如果我們把現在要做的而且能做的提出來，鄧小平們現在不能接受的，或是將來才有條件做的先不去講，可能留到十年後再講再做，十年後和現在的政治環境就可能完全不同了。自然規律是任何人都難以抗拒的。黨內的這些老人們，總有一天要退出歷史舞台。飯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現在走出這第一步，幾年後下次黨代會上再走下一步可能就會阻力小很多，而再下一步可能就更好走一些。再說，鄧小平們這一代有著絕對政治權威的黨內元老退出政治舞台以後，中國的權威政治必然會呈現遞減趨勢，逐步走向常人政治。為了維持黨的執政地位、黨的穩定、國家的穩定，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也許就會成為黨的新一代領導者們無論主動或被動，但又不得不作出的選擇。如果我們現在不是這樣想問題，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讓鄧小平和當時中央的這些老人們，讓黨內的高層幹部不能接受，方案在中央政治局、中央全會，在黨代會上通過不了，那就等於這次政治體制改革流產，想再發動第二次是極其困難的。

理清楚了這個關係，政治體制改革這個方案怎麼搞，就比較好研究了。這就是要抓住鄧小平的思想脈絡，研究他說過的話，用他的說法開路；同時把民眾反映最迫切而現實又能做得到的東西加進去。按照鮑彤後來的說法，這叫「跪著造反」。1987 年 1 月 9 日，鮑彤在政改辦的例會上強調說：「我們大家都要好好學習小平同志的思想，要把小平的主張搞得非常熟悉，熟悉到提到一個問題就能想起小平同志講過的相關觀點。我們越熟悉，以後走過的彎路就會越少。」事實也是

如此。幾十年來，鄧小平在「改變黨凌駕於一切組織之上」的狀況、實行黨政分開、黨組織要聯繫群眾、群眾團體要代表群眾利益、實行企業廠長經理負責制等許多問題上，都有不少符合民主政治方向的說法。這些問題，廣大民眾和改革實踐也都有迫切的要求。我們就把這些東西找出來，研究它，並加以闡發、細化。鄧小平講過的這個事情要落實，那個事情也要落實，要落實就要有具體化的組織措施，最後就形成了一個方案。在起草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過程中，有一些比較尖銳的問題，怎麼辦？辦法是，只要原則對頭，話不必說得那麼尖銳，把它磨光，使它具有彈性，留有餘地。這些，我認為，就是後來趙紫陽、研討小組及辦公室處理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決定各種具體的改革措施在方案中取捨的不成文的、不能公開講的基本原則。

那麼，具體說到方案上，改什麼，怎麼改，就要有個取捨，有個折衷和平衡，既要在一定程度上反應民眾對政治改革的要求，又要讓鄧小平和老人集團能夠接受。不反應民眾的要求，這場改革就失去了民眾基礎和進步意義；如果鄧小平和老人集團不能接受，超過了他們的承受底線，那政治體制改革就是一個泡影。所以，6 月 14 日，鮑彤在談到十三大報告第五部分修改稿時說，要考慮兩個問題，一個是小平同志看了是否滿意，一個是我們的研討內容，是不是寫進去了。正是出於這種考慮，在方案的具體寫法方面，經過鮑彤和政改辦的研究人員們反覆討論，確定，一是在總體目標的表述上，來處理民主與效率的矛盾。長遠目標，高度民主；近期目標，講效率、活力、積極性；二是在具體內容的各方面，都要體現效率這個主題。黨政分開，機構改革、國家公務員制度、基層民主、法制建設，都照講不誤，但是都要盡可能歸結到提高效率上；三是民主問題所涉及的各項內容的處理，都要從理順關係、明確職能，發揮各種組織作用角度去講，落腳點是緩和協調各類社會矛盾、減少扯皮，化解社會不穩定因素。這樣一來，效率，這個鄧小平最關心的主題突出了，解決黨權過分集中的問題涵蓋其中了，社會和基層民主這個民眾和知識分子最迫切要求的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反映。

在後來的文件修改過程中，趙紫陽又多次發表了意見。雖然鄧小平的批評對他這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的組長說來，也同樣、甚至可能有著比政改辦研究人員們更加巨大的壓力，但趙紫陽並沒有

屈從，去一味強調效率，放棄發展民主。他多次說，政治體制改革要講清道理、講清為什麼一定要改，為什麼只能有先有後的改，為什麼這樣搞，為什麼搞這個不搞那個，為什麼先搞這個後搞那個。基層民主還是要提，不發揚民主是不行的，但是要有步驟。基層自治這個口號恐怕也還是要提。對於民主與法制關係要講清楚，最後落到法制上。人大問題在於立法，要把法制部分帶進去。我們與資本主義民主主要劃清兩條界限，一是不搞扯皮體制，一是不搞形式主義。

趙紫陽同意鮑彤的建議，十三大上不再搞那個說明文件，只搞一個十三大報告。但在此前向中央報告的時候，則要搞出兩個文件，即十三大報告和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

1987 年 7 月底，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草稿，經趙紫陽報送給鄧小平審閱。鄧看後親自告訴趙紫陽:「同意這個總體設想」，但同時點了一句,「決不能搞西方三權分立、輪流坐莊那一套」。趙紫陽立即在方案上加了一句,「決不照搬西方的三權分立和多黨輪流執政」。不加這句話，鄧小平不放心；沒有鄧小平的支持，整個政治改革方案就會夭折。加了這句話，文件就順利通過了。趙紫陽不在乎咬文嚼字，紙上的矛盾應該由社會實踐去解決。因此，鄧小平繼續信任趙紫陽，趙繼續得到鄧的支持。

8 月下旬，由中央政改辦修改出來的《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8 月 27 日稿)》報送給趙紫陽和中央研討小組。27 日，趙紫陽看後在稿子上批示：略有改動。可提交政治局會議上議定。趙紫陽在這個稿子上作了三處修改，都是有關黨政分開的。遺憾的是，趙紫陽修改的具體內容，已經回憶不起來了。吳國光在他的《趙紫陽與政治改革》書中說，本來他存有總體設想和十三大報告的歷次修改稿，包括趙紫陽作出三處修改的稿本，但是這些材料在 89 年抄家中失去。和他一樣，本來我也留存有這兩個文件修改中的各個稿本，但後來在 1989 年 5 月 28 日全部被收走。20 多年的時光逝去，現在根本回憶不出當時趙所作的文字修改了。

按照中央研討小組的設想，這次政治體制改革，是由黨發起和領導的，其目的當然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自我改良，是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自我完善。因此，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實施中，必須把握這樣幾個原則：一是保證國家的安定團結；二是興利除弊，發揚優勢；三是要

有領導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四是不搞一刀切；五是上下結合，黨作表率，中央帶頭。研討小組認為，遵循這些原則，就能保證政治體制改革有條不紊地發展。

關於改革的大體進程，研討小組認為，政治體制改革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實施各項改革，需要有先有後，有主有次。設想十三大後開始佈局，黨政分開、黨的制度建設、機構改革和建立協商對話制度，抓得緊，通過三至五年可以有一個基本格局。其他各項改革都應抓緊做好各方面的準備工作，擇機出台，逐步實施，但不可能很快達到預期目標，必須有個過程，才能逐步走上軌道，配起套來。趙紫陽的考慮是，經過十五年到二十年，三到四屆黨代會的不間斷改革，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就會大前進一步。這就是說，已經提出的目標和改革內容都是有限的，三、五年的時間也只能完成一個基本格局。要實現改革的長遠目標，需要後人沿著民主政治的方向，進行長期艱苦的努力。這就是趙紫陽的漸進式政治體制改革思想。他可以說是漸進式改革之路的發明人。

上述關於政治體制改革中需要把握的原則和對於進程的設想，主要精神都寫入了《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和中共十三大報告當中。

五、政治體制改革可以下點毛毛雨了

1986 年 6 月鄧小平公開呼籲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以後的半年多時間裏，政治環境比較寬鬆，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研究、建議、呼籲成為一種社會大潮。在各媒體上，特別是一些半官方、非官方的媒體上，如《世界經濟導報》、《經濟學週報》、《社會報》等報紙都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研究和動態作了大量的報道。1987 年初以後，政治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整個社會進入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高壓時期。政治體制改革變成了洪水猛獸，成了一些戴著政治有色眼鏡的人警惕和批判的對象，媒體上的政治體制改革宣傳和研究也隨之進入低潮。但是，在理論界，在知識分子中，在黨內外，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從來就沒有平息過。

1986 年 10 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及其辦公室成立，由中共中央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工作正式開始。從那時起，紅牆內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就規定了嚴格的「政治紀律」：保密。從趙紫陽、

薄一波及其他研討小組成員，到中央政改辦負責人鮑彤、周傑、賀光輝，都不厭其煩地在大會小會上反覆強調保密紀律。後來建立的各個專題組也同樣把保密作為一條政治紀律。

之所以研討小組上上下下如此嚴格強調保密，其原因也可以理解。政治體制改革涉及黨、政及各種社會組織方方面面的結構、權力和利益調整，涉及幾千萬黨員、幾百萬幹部的認識、觀念和工作方式方法的轉變，也涉及廣大民眾和知識分子對民主的要求和期盼能否得到滿足、在什麼程度上得到滿足。作為執政黨研究和設計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的班子，在研究中涉及到各種意見、觀點及對策措施，在沒有由中央正式決策之前都是未定的，都在不斷變化、取捨之中。如果不慎洩露出去，之後又發生變化，在黨內和社會上就有可能引起震動，甚至引起軒然大波，直接影響國內政治的穩定。此間研究的東西，已經不是個人的學術研究，而是未來的執政黨和國家的政策走向。在未有決策之前，參加研討的人確實不宜進行公開和宣傳。

在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工作開始以後差不多半年的時間裏，中央政改辦的一些研究人員曾經有幾次提出建議，逐步開始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1986 年 12 月的學潮中，許多學生打出了政治改革的旗幟，要求進行民主選舉、保障公民權利、實行言論自由等方面進行改革。當時在政改辦的討論中，就有人提出，是不是適當進行一些政治體制改革宣傳，將我們正在研討政治體制改革的情況讓群眾知道；後來在多次由黨政各界人員參加的座談會上，也有人提出，你們關門搞方案不行，應該適時進行宣傳。但是，考慮到當時研討工作開始不久，政治體制改革改什麼、怎麼改還並是不十分明確；而且當時黨內左派們發起的反「自由化」運動也開始不久，在這種政治大環境下，宣傳政治體制改革也並不是很適合的時機。因此，趙紫陽、鮑彤和政改辦的多數人都不贊成，而且也沒有可能立即開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

到了 1987 年的 4、5 月間，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工作已經比較深入，中央研討小組已經召開了多次會議，改革的目標、重點和許多具體措施大體明朗化了。這就為適當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提供了基本條件。特別是在此時，距離黨的十三大的召開的時間已不足半年，進行了幾個月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宣傳已經使改革輿論被完全壓制。如果此時再不在黨內外、特別是在高層幹部當中對政治體制改革

進行適當的宣傳，讓黨內外瞭解我們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瞭解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可行性，造成一種支持改革的大環境，那麼政治體制改革方案在黨的十三大上能否獲得大多數代表的支持，能否得到全黨的支持和順利通過，都會成為問題。因此，無論是從時間的緊迫性，還是從造成改革開放的輿論環境考慮，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都有必要提上中央研討小組和政改辦的日程了。

1987 年 4 月 11 日，胡啟立在中央黨校研討小組發的簡報上看到，有好幾個省的副省長在座談會上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應該下點毛毛雨了。他隨即打電話給鮑彤，建議在適當的時機、用適當的形式開始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胡啟立說，該下點毛毛雨了，不然弄不好，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在十三大上可能通不過。目前情況下缺乏必要的思想基礎，幹部、黨員、群眾的認識需要統一到改革上面來。要統一認識，看看我們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適時地提出這個問題。

13 日晚，中央政改辦召集全體會議，討論如何落實胡啟立的這個想法。鮑彤主持了這個會議並首先發言，他表示贊成胡啟立的意見，認為搞政治體制改革全黨需要有一定的認識基礎，要有思想準備，以免認識不一致，將來方案通不過。他舉例說，這次全國人大審議企業法，中央提出在國營企業全面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許多人大代表反對，一定要在企業實行「黨的領導」，結果擱置了。這就是缺乏認識基礎。

政改辦工作人員全都贊成胡啟立和鮑彤的意見。黃海反映，修改黨章小組在研討過程中，找了經委和民政部等座談，發現大家在許多問題上認識不一致。現在應以宣傳小平的書為主，可是中宣部佈置先學反「自由化」的書，先不學鄧小平的書。他說阻力不光是認識不清，還有利益問題，現在只有小平、紫陽兩個人講政治體制改革。

孫方明說，一是要在全黨範圍內進行宣傳，可以考慮搞一個宣傳材料。二是選擇一定時機，組織各省委和已經選出的黨代會代表學習小平 1980 年的講話，同時我們可以組織若干人下去，以個人身份作一說明。現在最迫切的，是如何提高黨代會的 2000 個代表的認識。適當時候，可以把十三大報告徵求意見的範圍擴大到全體十三大代表。

陳曉魯認為，政治體制改革最大的阻力是來自黨內，黨的幹部層，特別是改革當中將要涉及到的人。我們主要的工作對象是這一批

人。贊成把鄧小平《論政治體制改革》的材料發下去，也可以把中央研討小組第一次會議給中央常委的報告發到中央委員一級。

陳福今說，贊成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宣傳。可以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書來統一全黨思想。我們的研討文件，可以用來在較高層次上統一思想。公開宣傳，可不可以搞幾篇社論和宣傳文章？另外，蘇聯東歐國家政治改革的情況也可以發一下，借鑒和促進。

周大力認為，宣傳的晚了點，如果早一些情況可能會好些。現在搞有難度，如果太虛了，大家不知其然，如果太實了，方案還沒出來。下面現在思想比較混亂，感到經濟體制改革搞不下去了，政治改革更甭提了，弄得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堅持改革相對立，稍一動就被說成是「自由化」。

嚴家其說，政治改革要有氣氛，否則就進行不下去。宣傳是造成氣氛的前提。他主張，發大塊文章，對於社會生活中的弊病多做分析，講清楚什麼叫理順關係，什麼叫制度化。鮑彤則說，我主張寫小文章，大文章誰看呢？

張偉強調，要重新把政治體制改革的旗子樹起來，鼓起大家的信心，他反映，上海一些幹部聽到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想法時說，許多不是批判了嗎？一些人認為，是國務院在領導政治改革，搞黨政分開，是要爭權，他認為，在反對「自由化」運動中，許多本來已經弄清楚的東西又混亂了。

鮑彤在會議最後談了幾點意見。他說：

（一）在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提高認識，進行必要的思想準備，奠定改革的思想基礎非常重要。一則，這是非常敏感的問題，改革與傳統觀念有非常大的變動，這一段有人批自由化批到了政治體制改革頭上，甚至批到了小平頭上，可見承受能力不強；二則，小平已經講了、定了，要把政治體制改革作為十三大的重要內容，如果十三大提出來，而黨員幹部中沒有思想準備，弄起一場爭論，極為不利，國際、國內影響不好。

（二）進行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重要的是選擇時機，不可能過早，不應該過晚，兩個條件決定了不可能過早，一是現在正在反「自由化」，提出這個問題會不會沖淡反自由化，破壞中央的部署？二是我們自己的準備工作到了什麼程度，現在能夠拿出

來方案嗎? 但是也不能夠過晚，十三大是十月份開，最少要提前兩個月，考慮在七月的北戴河討論，最晚在8月就應該用很大力量做宣傳工作。兩個月時間很短，要集中力量進行宣傳教育。

（三）目前的重要問題，是我們要抓緊工作，把方案搞出來，爭取考慮周到，避免返工。在常委、政治局通過。拿出方案之後，在政治局討論之前或者之後，在十三大代表範圍內徵求意見是必要的。

（四）關於政治改革的宣傳工作，非做不可，遲早要做，問題是，時機要適當，內容要合適。他認為，總的宣傳方針是，方案在黨內，道理要面對群眾講，不僅要爭取領導層，而且要爭取群眾，細節在黨內，道理在群眾。

（五）中心應該是宣傳小平同志的政治改革思想。要準備搞三個東西：一個是草擬一個通知，重新發表鄧小平1980年的講話；二是搞個宣傳提綱；三是編輯《鄧小平論政治體制改革》，公開出版。爭取在十三大前兩個半月前出來。建議七一重新發表小平8·18講話，同時發一篇社論。

（六）我們內部在推敲方案的同時，要準備20-30篇文章，小文章，有份量，兩三千字，主題明確，內容深入淺出，道理要講透，文風也要改一改。在這一段時間要搞出來，為了能更好掌握分寸，這些文章由我們自己包干。爭取一周兩篇。文章的題目，比如建設體制的轉變，從適應產品經濟到適應商品經濟，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理順關係，黨政分開是關鍵，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領導，政企分開，制度化的重要性，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要有領導、有步驟的進行，開闢對話渠道，有選擇餘地的選舉，工會應該代表工人利益，聯繫群眾是基層黨組織的首要職責，公民權利與法制，盡早制定新聞法、出版法、結社法，群眾團體的改革等等。公開宣傳要以小平同志的思想為核心。建議七一重新發表小平講話。

（七）希望黨校配合工作。8月以後，各級黨校要開課，講政治體制改革。如有可能，中央黨校從現在開始就開講。

最後，鮑彤還提到，今天上午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五一節口號，薄一波提出，把「堅持改革開放搞活」這一條提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的自由化」之前，這是唯一的一處改動。

5月13日，趙紫陽在中南海懷仁堂作了著名的「5・13講話」。此後，整個國內的政治氣候再次發生了重大變化。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被果斷剎車，改革開放的輿論環境開始逐步恢復。就在這種背景下，5月14日，陳一諮召集政改辦各組負責人開會，研究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問題。在會上，確定了六個大方面的選題，即鄧小平的政治體制改革思想；實行黨政分開，改善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民主政治；改革政府機構，提高行政效率；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走向制度化。全室研究人員【236】按照這六個方面自行選擇撰寫文章的題目，自報公議，由黃海負責統一協調。要求在6月份內拿出稿子，排定公開發表的方案。

經鄧小平同意，當時《人民日報》準備在7月1日重新發表鄧小平1980年8月18日談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與此同時，人民日報配發社論，闡述鄧小平的思想，由此開始把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工作提上日程。作為《人民日報》評論員的吳國光負責起草這篇社論。

6月20日，鮑彤看了社論的第一稿後，與吳國光談了他的看法。他主張以強調制度改革為主要內容。鮑彤說，小平很有豐富的思想，集中到一點，就是從制度上解決問題。社論就以根本問題是領導制度問題為題，談政治體制是國家制度建設的根本。鮑彤說，小平在8・18講話中抓住了關鍵、抓住了中心，即制度問題更根本、更長遠，現在進行以領導體制改革為中心的政治改革，如果把制度問題解決好了，就可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有了希望。【237】

1987年7月1日，《人民日報》及其他各大報刊重新發表了鄧小平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篇講話。這次發表時，還恢復了第一次公開發表時刪掉的關於「廠長負責制」的一大段內容。

配合這篇講話的重新發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分別發表了社論《把政治體制改革提到日程上來》、《指導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鮑彤在審閱和修改《人民日報》社論稿時，加入了「鄧小平的這篇講話，是指導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這樣的說

【236】此時中央政改辦的研究人員總數已經有約30人。

【237】參見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97年8月版，第434-435頁。

法。這個說法是趙紫陽在「5・13 講話」中第一次提出來的。鮑彤在社論中再次進行了強調。把鄧小平的這篇講話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有助於統一全黨思想，為全黨和全國民眾認識和理解和接受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權威性的依據。

六、「總體設想」在十二屆七中全會上通過了沒有?

1987 年 8 月中旬，中央書記處討論十三大報告第三稿的會上，趙紫陽提出，近期要在全黨範圍內找 100 個人，坐下來修改十三大報告，我們稱之為「百人座談會」。會議期間的 8 月 25 日下午，中央政改辦專門邀請了參會的地方和企業幹部開了一次政治體制改革座談會。會議在中南海 152 會議室舉行，由鮑彤主持。

在這個會議上，鮑彤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做了說明。他說，報告裏，政治體制改革是新內容，小平講了，幹起來難度很大。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商品經濟一樣，作為基本概念是提出來了，但調子不敢唱得很高，因為，高度民主不是近期所能達到的。很難設想，初級階段能有高度民主。社會主義現代化越發展，民主就越發展。而且民主與穩定、民主與效率有一定的矛盾，按照小平同志講的，現在是以活力、效率、積極性作為改革的主要目標，與經濟改革同步，與民主發展相配合，逐步完善起來。

對於政治體制改革的首要關鍵問題，鮑彤說，省市一級的領導體制問題，研究中沒有得出定論，不敢寫。現在考慮，可以強調下放權力給城市，給企業，著重提出中心城市的地位、作用問題。但具體的，要隨著改革進程逐步明朗化、規範化。強調大城市、大企業的作用很有必要。說黨政分開是首要關鍵，因為小平同志所講的切中要害，過去黨的一元化領導的體制，是由於各種原因形成的。這方面的弊病講得少，沒有展開分析，是要避免算老賬。實際上黨的領導體制問題不解決，政治體制改革就無法出台，無法實施。現在這樣寫，有利於把全黨的注意力集中，解決這個問題。

鮑彤說，有一點要說明。黨的作用和黨委作用，黨的領導和黨委領導，是不是一回事？不是。黨是一個整體，這就是說並不是每級黨委、每個黨委書記都應該是領導。如果層層講領導，就形不成統一領導。十二大講黨的領導是思想政治組織領導，這個提法較之文革時期

的一元化領導是進步了，但這三個領導的說法在老祖宗那裏查不到出處。思想領導對黨員還可以，但對群眾你就不能強迫。政治領導最初是列寧講的，後來小平也講。政治領導，應該集中於中央。當然省一級也有具體情況，怎麼做還要研究。

關於黨組的問題，鮑彤說，國務院沒有黨組，國務院也照樣貫徹黨的領導。取消對口常委、對口部，取消黨組，總的來說，有利於政權機關的統一領導。人大中設黨組有必要，這是世界各國的慣例。他強調，在整個政治體制改革中，黨要帶頭，黨中央要帶頭。各地方，省、市、縣、鄉，不一定統一步子。方向一致，動作可以有先後。

關於地方黨政分開之後的黨政幹部如何配置，鮑彤說，研討中有三種意見，一種認為黨委和政府職務分開，由不同的人擔任。第二種是主張兼任，但把重點放到政府職務，設副書記專管黨務。第三種看法是主張黨委書記去兼人大的領導職務。這些都是沒有定論的，各地在實踐中可以探索。

鮑彤說，地方黨委的職能問題，可以再研究一下。不是講地方黨委不領導，但若干年後可不可以變成監督保證？我看可以研究。就是領導，也不能像中央那樣管全面。而工廠黨委的職能則已經明確下來，就是不負領導責任。針對座談發言中有人提出的「現在把企業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明確下來有風險」的意見，鮑彤說，不錯，明確下來有風險，但不明確下來也有風險。他說，鄧小平 1980 年就講了這個想法，當年講話發表的時候沒有公佈這一點，今年重新發表的時候加上去了。現在如果再不明確，那要拖到什麼時候？當然，做起來可以逐步推進。教育、科學體制改革的決定裏邊都提到了校長、所長負責制，現在也沒有推行。什麼時候幹，可以看承受能力。但不能總是處在含糊、可變狀態吧，總有一天要做的。為了避免波動，要相應調整幹部。

最後，鮑彤說，黨政分開在十三大後中央要做，機構改革七屆人大會後中央也要做。地方有個創造條件的問題，但也要沿著這個方向走。下邊能夠幹的下邊就要幹，這對於增強基層活力有利。這兩方面的工作爭取奠定一個大格局，其他方面工作的完善需要很長的時間，現在是開個頭。美國文官制度搞了七、八十年，我們有 20 年能搞成就

不錯了。要奠定大格局，造成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在活力、效率、積極性的基礎上，推動民主的發展。現在只是明確個方向。

1987 年 9 月 19 日上午，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討論了中央政改辦起草的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在一個半月之前的 7 月底，趙紫陽已經將這個文件稿報送給鄧小平審閱過。鄧看後親自告訴趙紫陽：「同意這個總體設想」。此後，中央政改辦又根據鄧小平和中央其他領導的意見，對這個文件做了個別修改。

這次政治局會議討論的相當充分，會開到 12 點一刻。趙紫陽在會議結束時說，以往的會議還沒有過這樣的情景。討論情況，總的說是基本順利。幾位政治局委員和列席的領導對於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作了一番總的評價。薄一波認為比較適當，也相當高，但是寫上的都是能執行的，看來是可以的。他說黨政分開要堅定不移。要逐步分開，但也不能絕對化。不搞一元化也不搞兩元化，政府的事黨就不直接管了。選拔幹部光講年富力強不行，還要加一條，要有理想，能擁護黨的三中全會路線。他說，小平最近講，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表達的很好。

彭真說，贊成這個文件，黨政工作必須分開，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變。從戰爭時期到建國初期，我們就是黨政不分。國務院發文要中央批，這是戰爭環境的產物，現在必須改。現在有政權機關，社會組織，再管多了就是種了人家的地。非黨政分開不可。聽說有些黨委書記思想牴觸。我看今後黨的工作多得很，工人階級先鋒隊，忠實代表，領導核心，內政外交，作用一點不低。現在問題是包辦代替，並沒有真正成為核心。有一種錯誤觀念，似乎批了條子才算是有權。黨政分開不是要削弱黨的領導，而是不要包辦代替。誰做好上面寫的這幾條，我給他作揖。應當認識到，現在的方向是對的，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變。

習仲勳說，黨政分開是歷史轉折，不分開什麼事情也做不成。萬里強調，書記應該是團結的核心，地方黨委不強，什麼事也辦不成，趙紫陽解釋，現在強調分開，準備用相當長的時間來實現，加強與分開兩個方面，現在要強調分開，「一把手」的說法以後也不再提。列席會議的中紀委常務書記王鶴壽卻認為，現在文件中對加強黨的領導強調不夠。楊尚昆建議，黨章中不要寫紀委監督同級黨委。

對於文件中提到的延長法官任期，與加強司法獨立性問題，薄一波說，法官、檢察官的地位要提高，不能成為黨委的附屬物。彭真強調，上下級法院不是領導與被領導關係。喬石說，法院院長、檢察長現在都是安排性職務，這不行。要配備強有力的幹部。王震提出，現在社會秩序很差，要加強法制教育、公民有守法的義務。

關於機構改革問題，趙紫陽說，十三大後馬上要動手，七屆人大的部門設置以及部長任命就要按這個來。富餘人員的處理可以稍微放後一點。胡啟立說，機構改革震動很大，中央與省要分個先後，不要一起動，免得影響工作。彭真建議，十三大報告中，不要講機構精簡，精簡這個說法信譽不好，每次精簡都不成功。

楊尚昆強調，政治體制改革要堅定不移的搞，但不要用公開化這個詞，免得被認為是從蘇聯學來的。他建議用開放、開放程度等詞。趙紫陽解釋說，也不用政治開放這個詞，免得有負作用，以為是開放黨禁。開放就是透明度大一點。

這次政治局會議決定，原則通過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決定將其提交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討論。9 月 27 日，鄧小平在總體設想稿上批示:「完全贊成」。

1987 年 10 月 14 日，中共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舉行預備會議，會期 5 天，主要日程是分組討論十三大報告稿和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兩個文件。14 日下午，趙紫陽在小組召集人會議上作了題為《關於黨政分開》的講話，並對《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作了說明。趙紫陽的講話指出，從 50 年代後期起，一直是強調黨委對企、事業單位的一元化領導，甚至把是否承認這種體製作為擁護還是反對黨的領導的標誌之一。每搞一次運動，這種體制就強化一次，以致使黨委包攬了許多行政事務，並且相應地建立了相當龐大的辦事機構，配備了許多脫產幹部。從一元化領導到黨政分開，這個彎子是拐得相當大的。對此，必須有足夠的估計和充分的思想準備。講話強調，現在提出的黨政分開，這是我們黨的領導體制的一大改革。講話還對黨政分開的好處和意義作了說明。

會議從 18 日下午開始，分組討論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據作為工作人員參加小組討論的政改辦同事回來反映，討論總體設想的氣

氛讓人能感覺到與討論報告稿時有明顯不同。大家嚴肅冷靜，氣氛凝重，比討論報告稿時要明顯謹慎許多。

討論總體設想總共只有一天時間。但會後根據中委們在討論中提出的意見，總體設想共修改了25處，主要有，在開始部分加講一段政改的意義；近期目標，加一句逐步完善的意思；黨政分開的原則部分有個別修改；撤銷黨組問題上，提出公、檢、法可暫時保留一段時間；黨的建設方面，十三大實行常任制條件還不具備，可分步實行，代表人數問題可以不講；人事制度改革方面，退休制度改革方面有修改；社會主義民主部分的標題，改成「社會主義民主的若干制度」，並加入人大工作監督的內容；允許組織新黨的口子不能開，刪除；政治體制改革原則部分，建議增加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黨作表率、管住幹部、強調紀律等幾條。

10月20日，中共十二屆七中全會正式舉行。會議公報在提到十三大報告和黨章修正案時說：「全會討論並通過了中央委員會向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討論並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案》，一致決定將這兩個文件提請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審議。」但是在談到總體設想時，卻說是「全會討論並原則同意《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決定將這個文件的主要內容寫入中央委員會向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這段話表明，全會對三個文件的處理上是有差別的：前面的十三大報告、黨章修正案是「討論並通過」；而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則是「討論並原則同意」。

為什麼會有這種區別？時過境遷20多年以後，筆者遇到了當時作為工作人員參加了十二屆七中全會正式會議的原中辦調研室的老熟人王士元。他告訴我，按照原來計劃，《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也是要和十三大報告稿一樣，提請十二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的。但是，由於對預備會議上對總體設想有不同意見的人較多，紫陽擔心正式表決時出岔子，又考慮到這個文件會後並不準備公開，實施進程也是由中央掌握，擇機出台，遂提出，不將這個文件付諸全會表決。所以公報中才用了「原則同意」的說法，而不是「原則通過」。

第八章

十三大報告與中共十三大

1987年10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中共歷史上以改革開放的大會而著稱。趙紫陽在會上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報告，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立論，提出了黨在這一歷史時期所必須堅持的基本路線，透徹地闡明了改革開放的總方針、總政策，特別是根據當時的情況和可能，向全黨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和設想，後來被譽為中共歷史上「最好的報告」。這個報告，是在趙紫陽親自主持下，由鮑彤作為起草組負責人組織起草的。本章力圖為讀者簡要地還原十三大報告的起草過程。

一、一個報告還是兩個報告

中共十三大報告的起草工作，是在十三大召開的一年之前，在胡耀邦的主持下開始的。此後隨著胡的被迫辭職，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後中央人事發生變化，到趙紫陽受命主持起草，以及確定報告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立論的主體思路，前後經歷了一個較大的變化過程。

吳稼祥作為十三大報告起草組的早期成員，對胡耀邦主持十三大報告起草工作的那段過程有過較為清晰的記錄。據他在《中南海日記》中記載，在1986年9月中旬，胡耀邦向鄧小平匯報中央對十二屆六中全會的準備情況時，鄧小平說，十三大的籌備班子仍然由胡耀邦主持。10月初組建了十三大報告起草組。當時起草組的負責人是鄭必堅、龔育之，成員有于光遠[238]、林子力、吳象[239]、王愈明[240]、郝懷明、

【238】于光遠（1915-）：上海市人。曾任國家科委副主任；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1987年反「自由化」時被列入黑名單，在中顧委生活會上受到「批評」。

【239】吳象，安徽休寧人。曾任萬里秘書。時任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240】王愈明，山西陽城人。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綜合組組長，室務委員。

陳進玉、賈春峰、羅建平、吳稼祥等。與此同時，由趙紫陽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工作也拉開了帷幕。

10 月 12 日，十三大報告起草小組開會討論了報告的框架，由鄭必堅主持。大體上確定總的結構分為六個部分，第一部分寫前五年的回顧和下一步的打算；第二部分寫改革；第三部分寫建設；第四部分寫外交，第五部分寫理論，第六部分寫黨。

11 月 11 日，胡耀邦與起草小組談十三大報告起草設想。吳稼祥回憶說，胡耀邦看了我們搞的那個提綱，認為不太理想，主要問題，一是龐雜，二是語言陳舊，三是行文沉悶。

胡耀邦主張報告不要分 6 個部分，分得過多，顯得龐雜，啟承轉合也有困難。他認為分三部分比較合適。第一個部分總結前 5 年的成績，指出堅冰已經打破，航道已經開通，方向已經指明。要從事實出發，夾敘夾議。我們原來都以為前 10 年翻不了一番，事情的進程超出我們的預料，87 年就可翻一番。除了經濟，還可以講政治上的安定，講整黨，講外交，講個七、八條。總的要求，要站在高處，用清新的語言進行高度概括。能不能講現在是建國以來最好的時期，把「之一」去掉？過於謙虛不是我們的品格。

胡耀邦說，第二部分寫我們今後幾年怎麼走，要解決什麼問題，有的作 5 年打算，有的要有長期考慮。華國鋒搞的抓綱治國八條，我還有點欣賞，那八條歸納得可以，給人一個好的概念，水平不低，語言的表達還是蠻生動的，要言不煩。缺點是沒有平反冤假錯案。講了我們所處的情況，今後的目標，抓什麼事，再講要有什麼條件，講國際和外交。

胡耀邦說，第三部分寫改善黨的領導，抓住三、四個環子。我們的事業還是要靠黨的領導，國家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黨的領導、黨的組織。我們有權力與全國人民一道回顧一下近百年來黨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的關係，沒有哪一個黨能像我們黨這樣把國家搞得這樣好。現在講黨的怪話太多了，我心裏很不舒暢，又不能壓服。要說服。改善黨的領導，一是不要包辦一切，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黨政分開；二是要堅決廢除終身制，要講一大批老革命家帶頭退下來的意義。十三大人家主要報道這個，報告裏沒有反映怎麼行？年輕人上來的意義要講充分，不然人家造謠。特別要把小平同志、陳雲同志帶頭

退下來的意義講夠，一、二百字講不清楚，不然，深圳青年報說，功勞是他的，他媽的！第三講黨內民主生活，黨組織要有造血功能，要有免疫力，要講新東西，每個黨組織每個細胞都要自我完善。現在大案要案都要上邊查，你不查，他不解決，他媽的！第四，要用馬克思主要觀點、立場和方法解決中國的問題，我們的毛病，現成的藥方找不到，要充分地講一篇話。

胡耀邦最後說，他要盡快找小平同志一次，把主要意思談談。十三大全世界都注意，老同志退下來了，年輕同志中不中用？政策會不會夭折，事業會不會停滯？這個問題要回答。報告要在選舉前 5 天發表，不然，有人造謠。在座的同志，還不知道我們中央人事變動盤子，一大批老同志一退到底，一大批年輕人上台。

應邀參加這次座談的除了有十三大報告起草組的成員，還有其他幾位黨內的筆桿子。會上，袁木、鮑彤、吳象、于光遠、溫家寶都發了言，表示贊同胡耀邦的思路。鮑彤在發言中談到了政治體制改革研討中對黨的領導的一些看法。他說，黨的領導要「一少三好」，威信才高。具體事情少管些，出的主意要好，模範作用要好，聯繫群眾要好。權力集中，責任集中，挨罵也集中。黨內民主，要有程序，要有表決制。我們各級組織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我們沒有及時由革命體制轉向建設體制。革命體制要求保證主要目標不錯，不惜付出代價。我們不惜拆了機器用零件，搞許多臨時機構，不注意發揮常設機構的正常職能。有人說，我們的社會是個龐大的單細胞社會，只有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西方不同，什麼事能辦，什麼事不能辦，都有明確規定，一個辦事員就辦了。辦事員認為不能辦的，你找總統也辦不了。【241】

1986 年 12 月，隨著學潮的興起，黨內的政治態勢發生了較大變化。也許正是這種變化，導致了鄧小平對十三大人事格局和十三報告的想法也隨之發生了變化。據吳稼祥記載，12 月初，鄧小平在聽取胡耀邦、趙紫陽匯報政治體制改革研討情況時，提出十三大報告分為兩個，一個政治報告，一個改革與建設報告，前者由胡耀邦做，後者由

【241】胡耀邦的談話、鮑彤的發言，均參見吳稼祥《中南海日記》第三部分，第十二節，「胡耀邦與鄧小平矛盾的根由」。

紫陽做。[242] 鮑彤後來也談到，中央原來的安排是，在十三大上，耀邦做總報告，紫陽做政治體制改革的報告，我們辦公室要為紫陽起草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

把十三大報告一分為二的這個決定，是鄧小平釋放出來的又一個明確的政治信號：胡耀邦將在十三大上從黨的總書記位置上退下來，而接替這個位置的，極有可能是趙紫陽。建設與改革，是十三大報告的核心內容。就在此前不久，鄧已經把本來應該由中共中央總書記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工作交給了趙紫陽，現在又把十三大報告主要部分交給趙來做，再次表明了在十三大人事格局上即將發生的重大變化。從這個政治信號中，還可以看出，雖然胡已經失去了鄧小平等老人的信任，但此時他們還是傾向於讓胡耀邦經過十三大實現「軟著陸」。

但是，計劃沒有變化快。形勢的發展，讓鄧小平很快就放棄了把十三大報告一分為二的想法。在「對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的指責下，1987 年 1 月中旬，胡耀邦被迫辭去了中央總書記的職務，趙紫陽被推到了代理中央總書記的位置上。在反「自由化」聲浪即將達到頂點的時候，「兩個報告」又變成了一個報告，而主持起草十三大報告的任務，也就歷史地落到了趙紫陽的肩上。

中共十三大要開成什麼樣的大會？是反「自由化」的大會，還是改革開放的大會？十三大的報告，以什麼為基調？是以「反自由化」為基調，還是以改革開放為基調？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一時間，似乎成了一個問題。

二、鄧小平說：「這個設計好」

根據吳稼祥的記載，趙紫陽在代理總書記，接手主持十三大報告起草工作之初，並沒有對報告起草組人事做大的調整，而是決定，續用胡耀邦組織的報告起草組成員。1 月 24 日，趙紫陽召集報告起草組談話，決定起草組仍然由胡耀邦的大秘書鄭必堅負責，成員有林澗青、龔育之、王愈明、陳進玉、吳稼祥等。起草組原來的成員于光遠因被列入「自由化」分子名單，而被排除在外。會上，趙紫陽要求起草組在 2 月中旬前盡快拿出一個初稿。

【242】吳稼祥：《中南海日記》第四部分，第十二節，「山雨欲來：學潮雲湧，耀邦失寵」。

2月28日、29日兩天上午，趙紫陽找中央政改辦、十三大報告起草組、七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起草組三個方面的負責人鮑彤、鄭必堅、袁木等人一起座談十三大報告起草問題。在這次會上，趙紫陽對報告的起草談了這樣幾點看法

一是十三大要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趙紫陽說，過去取消新民主主義階段，是不對的；社會主義改造搞得太快了。我們不必翻過去的老帳。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點像新民主主義，而新民主主義與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差不多：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取消新民主主義階段，經濟工作中發生「左」就是從這兒開始的。第三世界國家凡是搞社會主義，沒有一個搞好的。

二是要承認私營經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作用。趙紫陽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會有私營，有剝削，剝削就是剝削，有消極作用，乾脆承認了好。私營可以通過調節限制其消極作用。只要公有制佔優勢，比如70%，私營就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公有制也可以多種多樣，國營可以搞股份。西方講國家握有25%的股份就可以控制住經營。戈爾巴喬夫講，列寧所有制理論被簡單化了，到底怎樣簡單化了，要研究。

三是經濟改革要實現「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趙紫陽說，初級階段有一個計劃與市場的關係問題，歸根到底是一個物資體制問題、投資體制問題。有一個提法說，「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可以用。

四是社會主義高級階段也要有改革。趙紫陽強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更要改革，但不要給人一種印象，好像高級階段就不要改革，不要發展商品經濟。高級階段也不能搞單一所有制。【243】

這次會以後，趙紫陽開始對十三大報告起草組的人員進行加強和調整。調整的原因，大概是趙經過一個多月的考察，感覺報告起草組的組成還不理想，有必要進一步加強，他就要鮑彤加入這個起草組。但是他並沒有對起草組進行「大換血」。對此，鮑彤回憶說：「耀邦下台以後，紫陽代理總書記。在這樣的情況下，十三大的兩個報告要合成一個報告，紫陽就把耀邦原來的攤子接過來。當時，紫陽跟我說過一句話：『鮑彤同志，你得注意一件事：耀邦的人都得用，都得保留。』

【243】參見吳稼祥《中南海日記》第五部分，第二十三節，「政治軸心移向保守派陣營」。

紫陽對耀邦的部下非常關心。所以，起草小組中耀邦的全套人馬，統統都留下了，一個人也不動。」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趙紫陽調整報告起草組的原則就是，原胡耀邦挑選的起草組成員基本不動；適當加強領導力量，將負責中央政改辦的鮑彤、負責七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起草的袁木也調入起草組，和原有的十三大報告班子的鄭必堅作為共同負責人，由鮑彤負總責。

3月2日下午中央政改辦的會議上，陳一諮傳達了中央十三大籌備班子的調整情況。這個班子，後來又做過幾次調整，最後形成的格局大體如下：

領導小組：由中央五人小組趙紫陽，楊尚昆，薄一波，萬里，胡啟立，加上胡喬木共6人組成【244】；

報告起草組顧問組：陳俊生，房維中【245】，胡繩，劉國光【246】，安志文，馬洪【247】，林澗青等7人；

報告起草組負責人：共5人，鮑彤、袁木、鄭必堅，後來又加上了龔育之、桂世鏞；

報告起草組成員：王夢奎、魏禮群、鄭洪慶、武樹幟、沈柏年、李劍閣、王玨、戴園晨、何家成、陳進玉、吳稼祥、賈春峰、陳群林、吳國光、李元等15人【248】。

按照鮑彤原來的計劃，為了工作方便，十三大報告起草組也要進駐地安門西大街38號中辦廠橋招待所的，和我們中央政改辦一起辦公。這樣，一樓十三大，二樓反「自由化」，三樓是政治體制改革，「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全了，形成一道有趣的風景，兩軍對壘，旗幟鮮明。遺憾的是，他的這個設想沒有實現。因為一層房子不夠的原因，十三大報告起草組只好住進了京西玉泉山中央領導人休息的別墅。這樣，地理上就遠了許多，鮑彤要兼顧政改辦和起草組兩邊的工

【244】十三大籌備還另有一個人事安排小組。胡耀邦辭職前後，鄧小平對成員做了調整，由楊尚昆、薄一波、姚依林、王震、宋任窮、伍修權、高揚組成，薄一波主持，直接對鄧小平負責，稱為中央七人小組。

【245】房維中（1928-）：吉林東豐人。時任國家計委副主任。是中共十三屆中央委員。

【246】劉國光（1923-）：江蘇南京人，著名經濟學家。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247】馬洪（1920-2007）山西定襄人，著名經濟學家。時任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總幹事。

【248】關於十三大報告起草組成員的個人情況，請見附錄。這裏就不一一加注。

作，在安排上出現了許多不便，他就要我作為他與起草組之間的聯絡員，經常在廠橋與玉泉山之間跑一跑，也經常參加一些起草組的會議。

3 月 18 日上午，趙紫陽主持十三大籌備領導小組會議，聽取了起草組對報告大綱的匯報。會上，趙紫陽談了他對報告起草工作的意見。他說，報告起草有三個難點，第一個是初級階段，有些問題必須回答，不然一陣風刮來沒有個邊，要麼另一陣風又回到原地。為什麼搞個體私營，為什麼大的經濟單位劃小，歸根到底，條件不具備。所有制是多種的，經營方式也是多種的。我們第一是社會主義，第二是初級階段，這樣，就要既克服左，又克服右。總之，社會主義要消滅剝削，為什麼還要允許私人經濟，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初級階段理論要解決這個問題。第二個難點是要講請計劃與市場的關係。要得講通，又要絕大多數人能接受，這個問題分歧很大。第三個難點是黨風與社會風氣。這三點都是大家十分關心的問題，應該有突破和科學的回答。現在就全黨的接受程度看，最難的是政治體制改革。一是傳統習慣觀點的影響，二是反「自由化」中有錯誤的理解。這一部分要下功夫寫，變成一個能為黨代會接受的提綱。

按照吳稼祥的記載，就在這次會上，胡喬木代表保守陣營展開進攻。他不留情面地反駁趙紫陽、萬里和胡啟立。主要分歧在如下幾個問題上：

1，商品等價交換原則問題。紫陽講黨風受這個影響。喬木馬上說，這個口子不能開，說等價交換可以進入政治生活。侵入黨內是非法的。紫陽並沒有講等價交換原則可以侵入黨內，這顯然是有意找茬；

2，計劃經濟問題。提綱上寫了小平同志的意見，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既可以為資本主義所用，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所用。喬木則說，社會主義經濟主體不能不說是有計劃，不然就會放任自流。紫陽立即給予反駁，只有三種經濟：自然經濟、商品經濟和產品經濟。社會主義經濟應當明確是商品經濟。當然，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性比資本主義大一些，但不能把計劃只理解為指令性計劃。

3，解放思想問題。萬里講，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路線要堅持到底，這個線索要講清楚講鮮明，只有這樣才能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才能發展馬克思主義。胡

喬木馬上打斷萬里說，解放思想有一個方向問題，小平對這個問題有嚴格的界限，後來執行中完全變了。

4，對過去幾年的估計問題。胡喬木說，歷史轉變時期，小平就提出四項基本原則，但沒有跟上去，處於自流狀態。這個方面還沒有很好總結。這個問題不解決好，與小平說法合不攏。過了一會兒，啟立說，思想、政治上的成就要充分估計，不能說經濟上有成就，思想政治上是失敗，搞出了一個自由化來，這不大說得通。實際上是反駁了胡喬木。

5，對過去30年的估計問題。薄一波說，對過去正確性的估計要充分。有人說三中全會前是停滯，不能這麼說，也有的說很慢，也要斟酌。這實際上是批了鄧小平。因為小平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那本小冊子裏說，過去20多年（除掉1957年前）幾乎沒有什麼發展。

6，多元化問題。啟立說，有人說經濟上搞多元化，政治上勢必多元化。喬木馬上駁斥說，我們經濟上也不能搞多元化，如果經濟上搞多元化，政治上勢必搞多元化，這是無法反駁的。

7，三個產業問題。喬木遞給袁木一個條子，說提綱中三次產業的提法，從馬克思主義解釋不通，正式文件中不用為好。這是針對紫陽的。

總的來看，萬里、啟立積極支持紫陽的意見，尚昆一半支持，沒有表示反對。薄一波有反對，也有支持。胡喬木則處處對著幹。【249】

就在這次會上，鮑彤也發表了他對報告起草的意見。他說：「我認為，十三大報告要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立論的根據。提出初級階段，全黨容易接受。因為這個詞已經在黨中央的文件中出現過兩三次了，但是沒有展開。現在的問題，不是重提這幾個字，而是應該作為論證黨的政策和路線的出發點。要說清楚，我們是處在一個什麼樣的階段上。從這個階段出發，我們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政策上，應該實行什麼，不應該實行什麼；為什麼必須這樣做，而不能那樣做。只有把這個問題說清楚了，我們才能夠在總體上為改革開放找到立論的基礎，或者說，為黨奠定新的理論基礎。人家可以說，你這個東西不符合馬克思，那個東西不符合斯大林，但這能夠符合我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這樣做、不能那樣做的根據就在這裏，解釋我們政

【249】參見吳稼祥《中南海日記》第五部分，第二十四節，「鄧力群向趙紫陽挑釁」。

策路線之所以正確，以及判斷其它不同意見之所以錯誤，根據就在這個地方。」

散會以後，趙紫陽留下鮑彤，對他說：「你就把剛才你說的那些話，以我的名義寫一個報告，給小平同志。」3月21日，這篇題為《關於草擬十三大報告大綱的設想》的報告以趙紫陽的名義報送給鄧小平。據鮑彤回憶，報告的文字大體如下：

小平同志：

十三大報告正在草擬大綱。3月18日，我邀集一波、尚昆、萬里、喬木、啟立同志座談。大家都認為，這個文件，關係重大，一定要寫好，要把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路線寫清楚，寫出份量來。

初步考慮，報告主要寫7個部分。一、講三中全會以來，包括十二大以來，我國出現了哪些歷史性的變化。二、講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是從我國國情出發的馬克思主義的路線。著重指出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是我們所以必須採取現在這樣的方針政策而不能採取別的方針政策的基本根據。三、由此而來的經濟建設的發展戰略。四、由此而來的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任務，和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五、由此而來的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任務，和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原則。六、由此而來的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的任務，包括執政黨的領導體制、黨內民主和對黨的領導人的監督、黨的幹部、黨的風氣。七、由此而來的在理論和思想指導上避免『左』右兩種傾向的必要性，著重闡明三中全會以來路線的兩個基本點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搞活，指出在新的實踐中必須進行創造性的理論探索。

全篇擬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立論的根據。這裏所說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一般地泛指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的初級階段，而是特指由中國的歷史條件和社會條件所決定的、必須經歷而不能逾越的初級階段。中國進入社會主義，不是脫胎於資本主義，而是脫胎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由此產生了生產力、生產關係、上層建築的一系列特點。中國又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不僅與發達國家不同，而且與其它許多發展中國家不同。這就決定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不能照搬其它國家的模式，必須從自己的國情出發，走自己的路。確認中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是明確指出我們是社會主義，不能倒回去搞資本主義，全盤西化

是害國害民的；二是明確指出我們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只能循序漸進，不能急於求成，也不能「急於求純」，必須允許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份長期存在，必須允許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原則長期存在，必須致力於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促進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的形成和發育，正確處理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的關係。同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也必須在我們黨的領導下有秩序地逐步地開展。看來，以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立論，有可能把必須避免「左」右兩種傾向這個大問題說清楚，也有可能把我們改革的性質和根據說清楚。如能這樣，對統一黨內外認識很有好處，對國外理解我們政策的長期性穩定性也很有好處。

「初級階段」這個提法，在黨的文件中已三次出現（歷史問題決議、十二大報告、精神文明決議），但都沒有發揮。如您同意，報告的起草工作就準備循著這個思路加以展開，預計5月初可拿出一個粗線條的稿子來，推敲到7月，再在北戴河提請中央審議。

當否，請指示！

趙紫陽
1987年3月21日

3月25日，鄧小平在趙紫陽的報告上批示：「這個設計好。」

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新民主主義的代名詞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提法，並不是在起草十三大報告過程中的新發明。早在胡耀邦擔任中央總書記時期，黨的文件中已經有三次提到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第一次是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二次是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這兩個文件都是由胡喬木負責起草的。當時提出和使用這個概念的立意很清楚，就是講「儘管」我們還處在初級階段，「但是」，我們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這個基本事實不容否認。顯然，這樣講是為了批判右傾思想。第三次提到「初級階段」的，是1986年9月的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這個文件是由胡耀邦主持起草的，是承認我們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當時這樣寫，主要目的是為了說明「初級階段」不應再

提「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而對於「初級階段」本身並沒有展開論述。

十三大為什麼「要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立論」？這一主張的提出者鮑彤，在 20 幾年後對這個問題有明確說法。他說：「強調『初級階段』的目的在於，為我國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找到立論的根據。紫陽所看重的，也正在於此。不錯，按照一切正式文件，我們是社會主義；但是按照我國的實際情況，我們是初級階段。因此，凡是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的經典，我們不必觸動它，但是我們必須改變它。在這個地方，對傳統的社會主義投了一張否定票，我們只是初級階段而已，我們怎麼能夠照搬那些教條呢？其實，我學的是毛澤東的辦法。他認為，沒錯！中國共產黨是搞社會主義的，但是中國的情況是資本主義太少，因此目前還不能搞社會主義，而要搞新民主主義。我認為，我們應該頭腦清醒，不應該把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話照搬過來，即使他們說的是正確的。我們還得要走自己的路，看看自己的國家是個什麼狀況。中心的問題是，如何對待私有制？如何對待市場經濟？把我們以社會主義名義否定的、扔掉的東西統統撿回來。把「初級階段」跟我們所主張的路線聯成一體，賦予它實際的內容，賦予它生命，賦予它戰鬥力。這就是說，你離開了這個東西，就要犯錯誤，就不是名符其實的馬克思主義或者毛澤東思想。還是用那句話來說，這又是一次『跪著造反』！」

1987 年前後的中國，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已經過去了 6 年，此時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從農村進入了城市，政治體制改革正在醞釀之中。但是在中共的思想和政治路線上仍然存在著巨大而多方面的爭論。什麼是社會主義？怎麼搞社會主義？怎麼樣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什麼必須堅持改革開放？為什麼必須廢除人民公社？什麼要發展個體經濟？怎麼看待計劃與市場的關係？要不要和怎樣發展社會主義民主？……黨內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在這些問題上有著深刻的分歧，黨的中高級幹部、廣大黨員和群眾由於幾十年來的左的錯誤理論影響，對這些問題的認識也模糊不清。特別是當時的中共，還在進行著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必須回答民眾當中提出的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我們正在搞的社會主義到底有沒有優越性，怎麼才能發

揮它的優越性？要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要把十三大開成一個改革開放的大會，十三大報告就必須對這些問題作出老老實實地回答。

這些問題的答案，在共產黨的老祖宗馬克思、恩格斯那裏，在列寧、毛澤東那裏，都找不到現成的答案。按照鮑彤的說法，儘管中共的綱領上寫的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但是在實踐中，這些東西不僅說明不了現實，不僅無用，而且有害。中國的現實，如果非跟社會主義套近乎不可，充其量只能套個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當然不是社會主義，中國沒有資格搞社會主義，應該起碼拿出上百年時間來補資本主義不發達的課。

鮑彤後來在談到他提出這個問題時的想法還說：「我講『以初級階段作為立論的基礎』時，我腦子裏在想什麼？我腦子裏就是想寫一篇新的《新民主主義論》。當年，大家都認為共產黨必須搞社會主義，毛澤東說，我們中國共產黨不能搞社會主義，必須搞新民主主義。毛澤東以什麼為根據？以中國的社會性質為根據，他以此駁倒了共產黨只能搞社會主義的天經地義，使共產黨贏得了反對社會主義的人的擁護。其實，不僅 30、40 年代搞不得社會主義，80、90 年代同樣搞不得社會主義，再過一百年以後怎麼樣，讓後人去思考，去判斷，反正我們這一代，乃至我們的兒子代，孫子代，免談社會主義，只能搞搞初級階段。打開天窗說亮話，我就是這個意思，只是當時沒有明說，說了也是徒費口舌。」【250】

鮑彤之所以說是「徒費口舌」，是因為，毛澤東領導共產黨已經搞了 30 多年的「社會主義」，一旦被叫起真來，說現在搞的不是社會主義，非但鄧小平、陳雲、李先念這些黨的元老們難以接受，黨內高層難以接受，就連多數普通黨員、普通老百姓一時也難以接受，更何況這裏面還有一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和繼承性問題。所以，「當時如果用了『新民主主義』，一定是百分之百通不過。為了讓文件百分之百被通過，我不可能用『新民主主義』的概念，只能用中央文件中已經出現過的現成的概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鮑彤進一步說，「這次起草十三大文件，就抓住這個概念不放，把它的作用充分發揮出來，作為中國『至少上百年』不搞社會主義的立論基礎，

【250】《鮑彤文集——二十一世紀編》，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12 年 7 月版，第 488-489 頁。

作為中國現行的非社會主義政策的立論基礎。如果一定要說什麼『發明』，這倒可以算是一點『發明』。」[251]

既然鄧小平認為「這個設計好」，既然趙紫陽也主張十三大要為黨在現階段的改革開放政策找到充分的理論依據，那麼，十三大報告「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立論」，就順理成章了。

在報告的起草過程中，為了「立」好這個「論」，趙紫陽多次和報告起草組交換意見，談他對報告起草，特別是對寫好「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的看法。4 月 6 日，趙紫陽找 13 大報告起草組座談，先問了工作進度，然後又談了幾點他的意見。他說，應當從根本上說清楚到底什麼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只有兩條：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其他都是非階級性的，整個社會主義時期都要用。如果只從初級階段來說，可能給人一種印象，到了以後的階段，我們有些政策就不實行了。在談到社會主義本質特徵時，起草組中從國家計委來的桂世鏞補充說，還有計劃經濟。紫陽說，計劃經濟是不是與社會主義有必然聯繫，與資本主義就截然對立？列寧當時搞計劃經濟，是否與戰爭環境有關？從我國實際出發看，我們過去一是把計劃理想化了，二是脫離了實際。我們這樣的大國，基本上是小生產，交通不便，信息不靈，搞理想的計劃經濟行不行？再說，資本主義也要搞計劃嘛。趙紫陽說，要研究經濟現象、經濟範疇哪些姓社，哪些姓資，哪些既不姓社又不姓資。二次大戰時，希特勒也搞過統制經濟嘛。為什麼計劃經濟一定要與社會主義相聯繫？革命勝利恰恰都發生在落後國家，這些國家搞計劃經濟有什麼基礎？列寧對泰羅制也是先批判後吸收的嘛。他又說，光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不行，有些問題還講不通，究竟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這些恐怕都要好好研究。

中共十三大之後 1988 年的 7 月 16 日，趙紫陽找溫家寶、鮑彤、張岳琦[252]、龔育之、賈春峰等，談思想政治工作改造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研究問題。其中有一段話談到了他對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關係的看法，讓我們看到，他在當時在內心裏，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問題也是有保留的。會上龔育之匯報說，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251】《鮑彤文集——二十一世紀編》，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12 年 7 月版，第 487-488、491 頁。

【252】張岳琦（1938-）：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1987-1989 年任趙紫陽秘書。

問題，鄭必堅在深圳開了個小會，有人談到了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關係。趙紫陽講，過渡時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些理論是個大問題，搞不好要引起大震動、大混亂。我們到底處在什麼社會階段？必須要有向後的調整，這是事實。但是，大家現在不統一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說法上，就會有大的混亂。我們也不必去駁那種退回到到新民主主義的說法，新民主主義可以借鑒嘛。我們的口號不必變，社會主義搞了這麼多年，這麼大一攤子，再搞回去這不行。如果在 1952 年到 1953 年那個時候，我們能有現在這樣的經驗，可能就會有意識的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放長。

鮑彤認為，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問題，有必要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討。十三大後的 1987 年底前後，已經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的鮑彤給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中央常委、中央宣傳理論工作小組組長胡啟立寫了一份報告，建議成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研究聯絡小組」，協調和推動國內理論界的初級階段理論研究工作。這個報告很快得到了批准。1988 年初，這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研究聯絡小組」正式成立，辦公地點設在中南海東門中央警衛局大樓 5 層。小組召集人是鄭必堅、龔育之，成員有鮑彤、袁木、桂世鏞、沈一之【253】、賈春峰等。

這個「聯絡小組」自成立後，到 1989 年 5 月，曾經組織了多次各種形式的研究活動和內部探討，並將研究成果向趙紫陽和中央做了報告。就在 1989 年那場學潮的間隙裏，5 月 9 日、10 日，還召開了「初級階段理論研究座談會」，提出「社會主義改革要過兩關：『市場關』和『民主關』」的問題。這是後話，在本書後面還要談到。

四、鄧小平說：「只要能看出中國還要改革，報告就成功了」

5 月中旬，起草組拿出了十三大報告的第一稿，首先送交趙紫陽審閱。趙紫陽看了以後，認為總的結構還可以，對於闡述初級階段理論部分比較滿意，認為有新觀點；而對黨的部分不滿意，但認為不是寫作的問題；對於經濟改革部分也不滿意，認為沒有講清楚。

趙紫陽認為，發展戰略中，對科技講得不夠。對於經濟體制改革，他強調，要把改革的方向說清楚。他對鮑彤說，談改革要從生產

【253】沈一之，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秘書長。

力與生產關係入手，凡是有助於在現階段發展生產力的都要用，所有經濟政策措施等就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力。講商品經濟，離不開商品經濟的貨幣關係。因此，市場作用是覆蓋全社會的。一方面，不能把市場的作用理想化，要有計劃調節；另一方面，計劃的作用也不能理想化，要在符合市場的情況下面起作用，然後再談模式。即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

趙紫陽說，不要再爭論計劃和市場誰主誰輔了，二者都是覆蓋全社會的，是一體的、重疊的，不是板塊式的。前兩天討論房維中的稿子，其中講到哪些是市場調節，哪些是計劃調節，安志文不同意這種板塊說，我也反對這種講板塊。如果一定要講，那是三塊，純計劃的、純市場的、市場、計劃共同作用的。第三塊在不斷擴大，另外兩塊縮小。這第三塊就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既受計劃影響，也受市場影響，二者作用都會發揮得更好。計劃要建立在市場等價交換的基礎上。

趙紫陽看過十三大報告初稿以後，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說明了報告的起草情況，同時送上了這個稿子。鄧小平看了報告初稿後，5 月 27 日上午請趙紫陽到他家中談了一次話。對於報告的其他部分，鄧小平說沒有多少意見，要說有意見，是對政治體制改革部分【254】。最後，他對報告總體評價說，這個報告語言沉悶，包括初級階段部分。只要能從報告中看出中國還要改革，報告就成功了。最後他強調，左和右仍然以克服左為主，因為左的積習很深，很難改；右的一發現就去改，經常妨礙我們的是左，反左、糾左應該是我們的主要精神。

5 月 29 日，中央五人小組舉行會議，第一次討論了十三大報告的初稿。在討論中，萬里認為，這個報告寫得好，很重要。他還對三中全會總路線做了一個總結表述，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總方針是改革開放，思想路線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胡啟立也認為寫得好，尤其是二、五部分寫得好。薄一波則講了一段歷史，說，稿子是平心靜氣的分析了問題。1954 年以來，我們黨逐漸的左了起來，要求過急。

會上，趙紫陽認為，改革問題的立論有兩點：一個是初級階段，一個是在技術革命的條件下，怎麼樣加快發展。他還說，第七部分，

【254】參見本書第七章第二節，「鄧小平說，『你們是不是也搬了點三權分立？』」。

結尾部分要把小平最近的講話【255】寫進去。寫馬克思主義，要解決僵化的問題，講科學社會主義，把附加給社會主義的非本質的東西去掉。他強調，要破除僵化，破除教條主義，不能脫離實際，要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社會主義究竟應該怎樣做才能比資本主義更有吸引力？要查一查老祖宗怎麼講，去掉那些附加的，來一個思想大解放，破除一些框框。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主義並沒有多少藍圖，毛主席並不相信計劃經濟，而是相信平均主義，講五斗米道【256】，有吃有穿，思想工作做好了，讓老百姓做什麼他們就做什麼。現在看，社會主義國家都搞得不怎麼好。

在瞭解了鄧小平和中央五人小組關於報告第一稿的意見之後，鮑彤忙得不可開交。中央政改辦那邊在研究如何貫徹鄧小平的意見，抹去《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和十三大報告稿第五部分中的「三權分立」的「痕跡」；十三大報告起草組這邊也在緊張討論如何修改報告。他在這兩邊都是總負責人，兩邊都要忙。

中央政改辦這邊主要的討論修改報告的第五、六部分，即政治體制改革和黨的建設部分。同時也對報告的理論部分、經濟體制改革部分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見。特別是陳曉魯在討論中提出，報告中講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時，也應該概括出一條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陳曉魯說，「毛主席講基本路線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當然了他是講階級鬥爭。但是我們也應該有，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要有個基本路線。我主張在報告上一定要寫。」後來鮑彤和起草組接受了這個意見，把「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作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明確地寫進了報告。報告對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的完整概括是：「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鬥。」

【255】應該是指鄧小平 1987 年 5 月 27 日同趙紫陽談話時講到的「左和右，仍應以克服左為主」。

【256】五斗米道，是道教最早的一個派別。據史書載，在東漢順帝時期，由張道陵在蜀郡鶴鳴山（今四川成都市大邑縣北）創立。凡入道者須出五斗米，故得此名，因此又稱為「米巫」、「米賊」、「米道」。另外，也有人認為，這個名稱也可能和崇拜五方星斗（南斗、北斗等）有關，五斗米就是「五斗姆」。因其教徒尊張道陵為天師，又稱「天師道」，也有稱正一道。

6月初，報告起草組討論多次之後確定，修改後的大綱是，第一部分講十三大是改革的大會，從十二大到十三大就是搞改革；第二部分的題目定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黨的基本路線，從初級階段引申出改革開放；對於討論經濟發展的第三部分，趙紫陽曾經批評有關技術革命談得少，鮑彤說，中國還缺少技術革命的綱領，改革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則需要技術革命。當時認為中國的發展過程中，遇到五個主要矛盾，即產業結構轉變、技術發展、國際市場、積累與消費、社會與人口資源等等，這都是要在發展戰略中考慮的重大問題。關於第四部分，即經濟體制改革部分，出發點即經濟體制改革的立論根據就是白貓、黑貓理論，基本模式、基本理論就是商品經濟；第五部分即政治體制改革部分完全由政改辦設計；第六部分談改革與開放條件下的共產黨本身的建設。鮑彤提出，所謂新條件就是改革，而黨本身也要改革，黨要是一個改革的黨，要探索新的辦法，不靠政治運動，寓於建設與改革之中；第七部分中則強調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在於發展，要堅持就要發展，大量實際問題需要理論解決，左或右的根源主要是脫離實際，因此要面向實際。【257】

這個大框架確定下來之後，十三大報告起草組又開始了報告第二稿的緊張工作。報告各部分的起草和修改程序大體上有三步，第一步，先由各部分的執筆人起草或是修改出本部分的初稿，按照吳國光的記載，大體的分工是：起草經濟各部分（即報告的第三、四部分）的是王夢奎、魏禮群、鄭洪慶、武樹幟、沈柏年、李劍閣、王玨、戴圓晨、何家成；起草理論各部分（即報告的第一、二、七部分）的是陳進玉、吳稼祥、賈春峰；起草政治各部分（即報告的第五、六部分）的是陳群林、吳國光、李元。第二步，由經濟、理論這兩部分的幾位起草組負責人鄭必堅、龔育之、桂世鏞等進行本部分的統稿，和由袁木進行總的統稿（袁木也因此被起草組各位大筆桿子戲稱為「袁大總統」)。至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兩個部分，因為和中央政改辦的研討工作直接相關，要拿到政改辦進行討論和修改。第三步，由鮑彤這位中央政改辦和報告起草組的總負責人進行最後的調整、修改和潤色。當然，這個分工不是絕對的，在討論和修改時，起草組的成員們之間是

【257】參見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97年8月版，第428頁。

沒有也不可能把界限劃分得那麼清楚的，而且每一稿都是經過幾次反覆的討論修改才能完成。

第二稿的起草工作大體上用了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到 1987 年 6 月底，報告第二稿報送給中央十三大籌備小組（中央五人小組加胡喬木）審閱。

7 月 2 日上午，中央書記處舉行會議，討論省級班子的換屆問題。會議結束時，趙紫陽講到了他這次出訪東歐的情況，認為中國現在的對日貿易佔整個貿易的四分之一，這樣不行。中國的經濟戰略象外交戰略一樣要調整，不能過分依靠日本。要展開與蘇聯、東歐的貿易，可以進口中等技術，蘇聯強調集約化，講科技革命，節約原材料，科學管理，這是對的。十三大報告稿子中強調了這個問題，我看是對的。改革怎樣才能促進這一套，要好好研究。

會議開始之前，趙紫陽告訴鮑彤，十三大報告稿他正在看第二遍，準備下周召開五人小組會議討論一下，然後送中央政治局常委。趙紫陽並要求鮑彤下周找黨中央十個部長開會，袁木找國務院十個部長開會，討論一下報告的稿子。

趙紫陽還談了他對報告稿子的意見。他說，總的看，有些進步。第七部分不錯，贊成這些觀點，要推敲一下是否站得住，做點修改。不是要磨去鋒芒，而是要更加嚴密、鮮明。在經濟體制改革部分，現在講了四個問題，總模式，五個結論，還要加上對內開放、城鄉聯繫、企業互相參股，企業組織結構合理化，打破割據、打碎條條塊塊等問題。企業組織合理化是自下而上的，但是要自上而下的促進它。參股不放在所有制裏面講，要突出一下，匈牙利對企業間參股評價極高，認為是中國的創造。還有中心城市和城市作用的問題，也得要講一下。分配，現在與所有制放在一起講得窄了，要把分配問題、消費基金問題做一個大問題提出來。從東歐國家看，消費基金失控是很值得憂慮的問題，弄不好可能失控。這個問題一定要說。現在消費基金膨脹速度超過了效率增長與生產力的增長，要把這個問題寫進去。再講按勞分配、拉開檔次，又不能貧富懸殊，講保護合法權益，制裁非法收益。

7 月 7 日上午，鄧小平在家中會見了中央五人小組的成員：趙紫陽、楊尚昆、薄一波、萬里、胡啟立。除了討論其他問題之外，鄧小

平還針對政治體制改革和十三大報告問題，專門講了兩段話。鄧小平首先強調，中國封建主義的東西很多，過去李維漢專門對我講，要把這個問題講清楚。現在選拔幹部究竟是任人唯親，還是任人唯賢？選拔幹部還是要搞民主選舉，這個問題不是一次能解決的，但總要解決，逐漸解決，使有才能的人能夠出來，不至因官僚層層的壓制而埋沒了。要真正認清，中國的弊端在於封建主義、官僚主義。

談到十三大，鄧小平又說，十三大兩個基本點不能丟，主要的障礙是左，政治體制要改革，旗幟要非常鮮明，既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要堅持改革開放。總之就是堅持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這對中國的形象，對於我們在國際上的形象影響極大。

7月8日下午，中央五人小組再一次討論了十三大報告稿，趙紫陽、楊尚昆、薄一波、萬里、胡啟立等都在會上發表了意見。列席的人員中，杜潤生【258】、高揚也發了言。

趙紫陽主持了這次會議，他說，7月20日前，要改一稿出來，送中央常委、書記處。到北戴河以後，書記處要集中討論兩天，然後大改，再作較大範圍的徵求意見和討論，爭取8月間定稿。現在的第二部分主要是理論問題，第七部分是提法問題，是關鍵。第七部分要能體現出一個大趨勢，理論發展要從多年來的框框中跳出來，不僅是中國，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正在這樣。我們要認真思考問題，首先要跳出這個框框。

趙紫陽接著從東歐國家的情況談到了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他說，按道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經濟應該是最活躍的。資本主義國家科技變生產力的週期，比我們快的多，看來經濟發展不能光靠企業產值。有的國家越搞工業就越窮，羅馬尼亞就是如此，沒有效益。我們也有這個問題，工業沒有效益，要跳出這個框框，否則會出問題。如果出大的問題，要解決。像去年冬天一樣，但不能因此不看到大趨勢，實際上對於社會主義有再認識的問題。在保加利亞，日夫科夫說，現行經濟體制在工業化方面有些優越性，到集約化就不行了。到了捷克和斯洛伐克就看得更清楚，這套體制在捷克就不行，在斯洛伐克就行。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都遇到消費與生產的關係問題，這在改

【258】杜潤生（1913-）：山西太谷人。中共黨內有威望的農村改革家。中顧委委員。1983-1989年任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

革中要講透。改革前，消費壓的很緊，改革中就出來問題了，公平與效率、消費與生產的問題，社會主義國家都遇到了。這些問題在理論上怎麼寫，要研究，我們過去的認識不一定正確。經濟建設與經濟改革這兩部分都要寫好。

在發言中，趙紫陽強調，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都是手段，這是一層意思，需要跳出框框，看到它們都是手段。另一層意思是在改革中怎樣運用這些手段，處理好這兩者間的關係。商品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不僅僅是外殼，不僅僅是計算手段。過去有個框框，在戰時經濟、根據地的供給制等特殊條件下，被附加上去許多東西，都被當成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被等同於社會主義，一講社會主義就不能搞商品經濟。我們要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模式，應該是通過市場達到計劃，當然現在還要保留一些直接計劃，因為一時還做不到通過市場來達到計劃。杜潤生插話說，小康、溫飽等等，都是廣義的，不僅是生活水平。趙紫陽接著說，工業化就是工業產值超過了農業產值嗎？這樣分析問題不行，工業化要看在什麼水平上的工業化，我們的農業產值水平太低，超過農業產值就是工業化了？在杜潤生的發言講到了農業規模經營時，趙紫陽說，要有相當長的過渡時期，中國要一邊講發展規模經營，一邊講發展服務型產業。

趙紫陽強調，計委要好好研究一下科技革命，蘇聯東歐把改革與科技連在一起說。我們現在這個稿子，科技部分太空泛，資本主義為什麼科技進步快，社會主義為什麼科技進步這麼慢，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但是要回答。過去講資本主義的是垂死的，現在看資本主義發展和科技的力量，還很強大。老是讀資本論、共產黨宣言，回答不了這個問題。他還說，生物工程是個重大問題，也許將來一個人一分地就能吃飽，反正將來要靠科技就是了。杜潤生還講了城鄉結構問題，他認為包產到戶的優越性，與其說是責任制不如說是農業人口自由流動問題，糧食價格要逐步接近國際水平。光講產業結構，不講城鄉結構不行。要研究人均收入 800 美元的時候，是個什麼樣的城鄉結構，因為城鄉結構是個大問題。趙紫陽認為，專門講一段中國的農村很重要。小平對金日成說，中國經濟要出問題，就是農業出問題，這是中國的國情。十三大以前，農村問題要專門談一次，在北戴河可以談一下。

關於政治體制改革，趙紫陽說，政治體制改革部分，一定要寫好。現在有兩個問題，一個是缺乏行動感，到底怎麼搞；二是要注意統一思想，現在對政治體制改革有各種說法，要寫清楚，為什麼要這樣搞，不能那樣搞。現在的寫法，可能各方面都不那麼滿意。上次的稿子有新意，但是有三權分立的影子，你們改了。趙紫陽認為，不搞三權分立，但民主問題不能迴避，要回答社會主義民主究竟怎麼搞。小平同志講了兩大問題，一個是封建主義，一個是官僚主義，使我們不能很快現代化。現在我們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解決問題不能那麼快，但也正因是初級階段，才需要解決這些問題。實際上我們的政治體制確實有個現代化的問題。我們的問題，一個是封建傳統影響，一個是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有問題。基層一些單位中，黑暗的問題很多，許多問題要解決，一定要講人民監督、公民權利保障，選舉，這些都要解決。毛主席在井岡山還講連隊民主，毛主席是用了民主主義四個字的。過去雖然有些方法很落後，但是是民主的，比如擱豆豆搞選舉，現在一個人一到單位就受到壓抑，有人身依附關係，得罪不得，領導在大家沒意見，一調走大家就意見紛紛。我們現在搞民主，同時又搞法制。民主第一位的是保障人民權利，第二位是約束人民依法來行使權利。到底怎麼克服封建主義、官僚主義的問題，政治體制改革中都要有說法。楊尚昆插話說，要有實實在在的措施。

對於報告修改稿中黨的建設部分，趙紫陽說，有了些分析，好。現在要集中寫以權謀私的問題，看起來是寫嚴一點好，到底怎麼寫，要解決。總的講，在改革開放中，黨、黨員都要經受一次考驗，相當一批人經不起考驗。這個問題是提到我們面前來了，不能因為出了問題就不改革，改革就是考驗，黨從總體上經受得起考驗，也會有相當一批人經受不起。我們要執行紀律、實行監督，準備有一批黨員要離開黨的隊伍，黨內要嚴格，黨與政府都要嚴格。要說明，有人會經不起考驗，也會有人經得起考驗。要吸收一部分經得起考驗的人入黨。要立規矩，也要有政策，出了黨也還有工作做。要從嚴治黨，清除腐化分子，不是通過運動而是通過紀律、教育、監督，同時吸收一批優秀分子入黨。這種清除與吸收要作為各級組織的經常性工作，把腐化分子清除出去，有多少清除多少，這是長期的事情。

杜潤生在發言中說，黨的問題說不清，一方面是進步很大，一方面是腐敗，現在是幹什麼吃什麼。高揚說，不整黨更壞，就是整黨的成績。現在是黨不管黨，你要徵求意見，他都談不出來。黨委書記有幾個管黨的？是不是發個文件，說明黨現在病情嚴重，這個問題要引起重視和注意。

杜潤生認為，民主與三權分立不是一回事。趙紫陽說，對。趙紫陽還講到，一定要團結多數人。現在不外乎兩種人，一類搞改革，但有點過火；一類是有些保守，都不能說是自由化或是反對改革。同一個人也可能有些問題偏這，有些問題偏那。不要爭輸贏，壓而不倒，等待時機。

楊尚昆在發言中，對報告稿講了六點意見。一是認為大的框架可以；二是關於初級階段有些問題提出來了，但是還沒有說透；三，政治體制改革當前要解決哪些問題，現在寫的太少；四，黨的建設寫的還不夠。不過他也說，能寫到什麼程度，寫了能不能辦到，像黨內的十二條生活準則，講得不錯，但並不能完全做到。如果真能做到了，黨就會很不錯了；五，要成為大團結的報告，要有氣勢；六，內容有重複，還可以壓縮。他說，秘書給他唸了四個小時，長了一些。趙紫陽建議，不要超過三個鐘頭。

萬里發言認為，報告的整個架構可以，題目不動，內容不要大改，但是要充實。關於政治體制改革，萬里說，要寫不學西方，但是也不要去批評人家，你批不透，指出我們有自己的特點就行了。他建議，溫飽型經濟、小康型經濟等說法，都是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講的，最好不用「型」。農業問題要加上一段，科技要放到重要位置上來，工廠要講嚴格的科學管理，黨的地位要強調。

薄一波的發言也講了六點意見：第一，這個文件應該是團結大多數的文件，即使有些自由化、僵化，也不要說成是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改革開放，主要是個認識和教育的問題。第二，我們現在的問題，根本上說是技術、文化水平太低，管理水平落後，比蘇聯東歐要差。第三，發展戰略要看得遠一點，要從發展的高度寫，不要寫死了。第四，關於政治體制改革，鄧小平講了三條，活力、效益和積極性。活力的核心是年輕化，十三大後要有新格局。民主應該是有效率的民主，不要扯皮、牽制，但要有群眾監督，有不同聲音比鴉雀無聲

好。要用各種方式，使我們能聽到群眾的聲音，4,100 萬黨員的聲音。積極性是各行各業的積極性。要發揮大家的積極性。薄一波自問自答道，什麼叫高度民主、低度民主？說不清。社會主義民主的好處，是有共產黨的領導，這一點不要含糊。民主搞起來，無論如何不能沒有黨的領導，但是要明確，黨不要直接發號施令。第五，報告要寫出氣勢來，要說三中全會以來的成就，不要小看自己。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黨中央，開始了一個新階段。講成績，不要講滿，是不是先不講「歷史性的成就」，等以後實現小康再說。最後一點，黨的建設問題要繼續研究。黨員還是要吃苦在前。

接著，胡啟立對報告草稿也發表了六點意見。首先，他認為在這個報告中，第一要回答什麼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要根據過去五年和九年的經驗來回答，要把正確的東西肯定下來。草稿中有關兩個飛躍的論述，其中第二個飛躍還沒有講清楚。第二，在緒論中，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應該分兩段講。總的是不是講一下中國改革的發展過程，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到教育，到政治，要體現小平思想，論述改革的意義，對幾個決議也要概括一下。第三，基本路線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具體怎麼表述？胡啟立建議，是不是這麼說，團結各族人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搞活，以現代化建設為中心，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奮鬥。第四，是不是應該提出存在大量的不同利益、不同集團，要承認矛盾，加以協調，從這裏引出政治體制改革。第五，胡啟立批評黨的建設部分寫的太碎了，他建議加上一個總的說法，以新時期黨面臨著新挑戰為綱來貫穿這一部分。

最後，胡啟立建議，報告結尾要落實到全黨團結起來，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奮鬥。此外，胡啟立又特意強調，政治體制改革部分，不要給人一個印象，好像毛病就是黨管的太多了，還要提到應該肯定的東西。

7 月 13 日下午，趙紫陽把鮑彤找去，對他說，有兩個概念需要研究一下。一個是「開放」。蘇聯的「公開化」這個口號我們不提，但可不可以針對長期的政治上封閉，提出政治上開放的口號？經濟上開放、政治上也開放。這個口號提出來，有什麼好處，弊利何在？趙紫陽說，政治開放，相應的內容就是「重大情況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

杜潤生在發言中說，黨的問題說不清，一方面是進步很大，一方面是腐敗，現在是幹什麼吃什麼。高揚說，不整黨更壞，就是整黨的成績。現在是黨不管黨，你要徵求意見，他都談不出來。黨委書記有幾個管黨的？是不是發個文件，說明黨現在病情嚴重，這個問題要引起重視和注意。

杜潤生認為，民主與三權分立不是一回事。趙紫陽說，對。趙紫陽還講到，一定要團結多數人。現在不外乎兩種人，一類搞改革，但有點過火；一類是有些保守，都不能說是自由化或是反對改革。同一個人也可能有些問題偏這，有些問題偏那。不要爭輸贏，壓而不倒，等待時機。

楊尚昆在發言中，對報告稿講了六點意見。一是認為大的框架可以；二是關於初級階段有些問題提出來了，但是還沒有說透；三，政治體制改革當前要解決哪些問題，現在寫的太少；四，黨的建設寫的還不夠。不過他也說，能寫到什麼程度，寫了能不能辦到，像黨內的十二條生活準則，講得不錯，但並不能完全做到。如果真能做到了，黨就會很不錯了；五，要成為大團結的報告，要有氣勢；六，內容有重複，還可以壓縮。他說，秘書給他唸了四個小時，長了一些。趙紫陽建議，不要超過三個鐘頭。

萬里發言認為，報告的整個架構可以，題目不動，內容不要大改，但是要充實。關於政治體制改革，萬里說，要寫不學西方，但是也不要去批評人家，你批不透，指出我們有自己的特點就行了。他建議，溫飽型經濟、小康型經濟等說法，都是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講的，最好不用「型」。農業問題要加上一段，科技要放到重要位置上來，工廠要講嚴格的科學管理，黨的地位要強調。

薄一波的發言也講了六點意見：第一，這個文件應該是團結大多數的文件，即使有些自由化、僵化，也不要說成是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改革開放，主要是個認識和教育的問題。第二，我們現在的問題，根本上說是技術、文化水平太低，管理水平落後，比蘇聯東歐要差。第三，發展戰略要看得遠一點，要從發展的高度寫，不要寫死了。第四，關於政治體制改革，鄧小平講了三條，活力、效益和積極性。活力的核心是年輕化，十三大後要有新格局。民主應該是有效率的民主，不要扯皮、牽制，但要有群眾監督，有不同聲音比鴉雀無聲

好。要用各種方式，使我們能聽到群眾的聲音，4,100 萬黨員的聲音。積極性是各行各業的積極性。要發揮大家的積極性。薄一波自問自答道，什麼叫高度民主、低度民主？說不清。社會主義民主的好處，是有共產黨的領導，這一點不要含糊。民主搞起來，無論如何不能沒有黨的領導，但是要明確，黨不要直接發號施令。第五，報告要寫出氣勢來，要說三中全會以來的成就，不要小看自己。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黨中央，開始了一個新階段。講成績，不要講滿，是不是先不講「歷史性的成就」，等以後實現小康再說。最後一點，黨的建設問題要繼續研究。黨員還是要吃苦在前。

接著，胡啟立對報告草稿也發表了六點意見。首先，他認為在這個報告中，第一要回答什麼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要根據過去五年和九年的經驗來回答，要把正確的東西肯定下來。草稿中有關兩個飛躍的論述，其中第二個飛躍還沒有講清楚。第二，在緒論中，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應該分兩段講。總的是不是講一下中國改革的發展過程，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到教育，到政治，要體現小平思想，論述改革的意義，對幾個決議也要概括一下。第三，基本路線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具體怎麼表述？胡啟立建議，是不是這麼說，團結各族人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搞活，以現代化建設為中心，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奮鬥。第四，是不是應該提出存在大量的不同利益、不同集團，要承認矛盾，加以協調，從這裏引出政治體制改革。第五，胡啟立批評黨的建設部分寫的太碎了，他建議加上一個總的說法，以新時期黨面臨著新挑戰為綱來貫穿這一部分。

最後，胡啟立建議，報告結尾要落實到全黨團結起來，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奮鬥。此外，胡啟立又特意強調，政治體制改革部分，不要給人一個印象，好像毛病就是黨管的太多了，還要提到應該肯定的東西。

7 月 13 日下午，趙紫陽把鮑彤找去，對他說，有兩個概念需要研究一下。一個是「開放」。蘇聯的「公開化」這個口號我們不提，但可不可以針對長期的政治上封閉，提出政治上開放的口號？經濟上開放、政治上也開放。這個口號提出來，有什麼好處，弊利何在？趙紫陽說，政治開放，相應的內容就是「重大情況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

題要讓人民討論」，實質就在這裏。我們是不是應該通過立法，把它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內容提出來。

另外一個概念，趙紫陽提出，什麼是與社會主義人民民主相對應的反面的概念？他說，人民民主這個概念，還是要提。我們的重點不是搞形式，不是放在上層，而是要放在下面，扎扎實實搞人民民主，人民監督。這個問題要提出來。與之相應的反面東西是什麼呢？要改掉什麼東西？是不是「家長式的領導」？如果說開放針對的是封閉，那麼社會主義人民民主針對的是不是單位中家長式的領導？以此反對封建主義，可能會切實得多。他問鮑彤，提出這個概念是不是更明確、更有針對性？要權衡一下利弊，是不是科學的、有意義的？他要求鮑彤組織中央政改辦討論一下，可不可以作為政治體制改革和十三大報告的內容。

當晚，鮑彤召集政改辦研究人員會議，討論趙紫陽的上述想法。在大家都發表了意見之後，鮑彤做了小結。鮑彤說，提出開放的口號是對的，是針對過去政治上封閉提出來的。現代社會應該是一個開放的社會。我們現行體制中的許多弊端都產生於封閉，不實行開放是解決不了的。

但是，能不能現在就把「開放」作為原則，寫到十三大報告之中去？鮑彤認為，沒有把握。我們現在在政治上，大體上相當於孫中山講的訓政階段，要從這個階段的實際出發。提出這個口號，可以鼓舞人，同時也會起到煽動作用。對能正確把握的人是鼓舞，對那些不能正確理解的人就成了煽動，在實踐中有可能產生一些問題。比如，黨禁是否開放，結社是否開放，報刊是否開放，競選是否開放，遷徙是否開放，等等。這些將來都是應該做的，但在現在這個階段，只能是有限的，要一步一步的來。一些人希望明確提出政治開放的口號。我們的態度，不是主觀上喜不喜歡，而是道理上對不對，客觀上能不能做到。要考慮這幾個不同的問題，如果能夠做到這個概念包涵內容的80%，那提出來是可以的。但如果多數做不到，恐怕就先不能提，只能把能做到的說充分。

鮑彤接著說，明確地提出「政治開放」，也會有人說我們是「全盤西化」，引起責難和非議。從這個角度看，再考慮到今年以來的背景，十三大報告中，開放的口號還是不寫為好。他建議，就在報告中直接

寫上，重大情況讓人民瞭解，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明確的寫，但要嚴格限定個範圍，要寫清楚，說明白，要逐步發展。綜合報告中可以把這個問題考慮一下，講我們的民主生活之所以不完善，與政治生活封閉有關，最終要開放，逐步達到開放。這個口號是個方向，總有一天要提出來的。現在我們要從基層做起，從能做到的問題做起，讓這個口號逐步被社會接受、習慣。

至於家長制問題，會上意見比較統一。鮑彤認為，提出來在黨內不會引起爭議、振動。現在要搞基層民主，確實要解決家長制領導問題。我贊成說，家長制與封建等級制、人身依附關係相聯繫。它的對立面，應該是民主。要反對家長制，無政府主義，武器只有一個，民主集中制。但問題在於，我們通過政治體制改革。能提出哪些有效措施，才能有助於從制度上克服這個問題。

五、報告和總體設想進入徵求意見階段

1987 年 8 月 15 日下午，中共中央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在京中央委員、中顧委委員、黨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長會議，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胡啟立，中央政改辦和十三大報告起草組負責人鮑彤向與會人員介紹了十三大報告起草和政治體制改革研討的大體情況。這次會議是一個標誌。由此開始，十三大報告草稿和政治體制改革方案草稿，開始在有限範圍內，向黨內和社會徵求意見。

1987 年 8 月中旬，中央書記處討論了十三大報告第三稿，決定將報告印發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常委，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常委進行討論，並按照討論的意見修改出一個稿子，附上意見報中央。很快，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 10 號文件，傳達了中央書記處這一決定。

在這次書記處會上，趙紫陽又提出，要在全黨範圍內找 100 個人，坐下來修改這個文件。經過中央辦公廳、十三大報告起草組協商後，最終確定了 110 人的參會人員名單。

8 月 15 日，陳一諮召集中央政改辦人員開會，傳達了這個「百人座談會」各討論組的劃分和人員安排。第一組為黨群政法部門，由鮑彤、周傑和中宣部部長王忍之任召集人，十三大報告起草組和中央政改辦陳進玉、吳稼祥、陳群林、黃海、吳偉等參加工作；第二組是政府各部門組，由國務院副秘書長、十三大報告起草組負責人袁木、

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和國家經委副主任朱鎔基任召集人，十三大報告起草組王夢奎、戴園晨、何家誠、魏禮群等參加工作；第三組是新聞界，由十三大報告起草組負責人、胡耀邦前秘書鄭必堅、新華社社長穆青和人民日報社社長錢李仁任召集人，十三大報告起草組和政改辦賈春峰、鄭洪慶、陳小魯、吳國光、王珏等參加工作；第四組是地方組，由十三大報告起草組負責人桂世鏞，和兩位地方領導任召集人，十三大報告起草組和政改辦李元、張偉等參加工作。會議於 8 月 20 日開始，地方來京參會人員 18 日報到，會期大約 7 天。陳一諮說，9 月 10 日前，我們要根據會議討論情況對文件進行修改並報紫陽。9 月 20 日前後，中央政治局將開會討論這個稿子。10 月 15 日前後開七中全會，接著開十三大。

從 8 月 20 日開始，我和報告起草組、政改辦的幾位同事作為工作人員，參加了「百人座談會」第一組的討論。我們的工作，主要是聽發言、做記錄。會議由鮑彤主持，他首先傳達了 8 月 15 日下午，胡啟立在中央委員、中顧委委員、黨中央和國家機關部長會議上的講話。然後討論開始。在其後的幾天裏，幾十位參會人員陸續發言，對十三大報告提出了看法和修改意見。其中講得比較多，而又提出了比較有價值的修改意見的，有中聯部部長朱良、勞動人事部部長趙東宛、中央黨校副校長韓樹英、最高法院院長任建新、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高放、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等。在這幾天的會上，絕大多數與會人員的發言都認為，從總體上看報告寫得不錯。發言中談到最多的，就是政治體制改革部分。從總體上，大家對政治體制改革部分都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沒有人直截了當地反對或是提出基本否定意見，但在一些具體提法、表述或是具體措施上，有各種不同的表達。作為工作人員，我和同事們對本小組這些發言做了梳理，最後綜合討論中的各種意見，修改、整理出一個稿子，會後報送給了起草組。

與「百人座談會」進行的同時，中央政改辦其他人員分為七個小組，分別在北京和分赴全國部分省、市，聽取地方大員們對十三大報告和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的意見。其中一個小組參加中顧委的座談會，聽取意見，成員包括陳福今、趙豐田、顧雲昌和王紹賢；另外六個小組到地方，聽取部分省、市黨委的意見。記得當時的分工是周大力和沈榮華到北京市委；應松年和遲福林去廣東；梅興保與嚴書翰赴上海；

牛鐵航和張占斌到遼寧；徐沖與王春生去天津。這七個小組的任務，就是聽取各方意見，客觀反應情況、修改文件。鮑彤特別強調，下去的同志要十分注意謙虛謹慎，在正式會議上只帶耳朵、不帶嘴巴，既不代表組織發表意見，也不代表個人發表意見，特別是不能透露鄧小平、趙紫陽或其他中央領導是什麼意見，不能透露研討過程中的情況，以保證徵集上來的意見的客觀性。【259】

9月8日，中央政改辦和十三大報告組，搜集整理了這一個月所徵集到的意見，向中央書記處報送了《關於十三大報告（徵求意見稿）討論情況和進一步修改設想的報告》。報告說：「從八月中旬到八月底，在中央三個委員會成員、全體十三大代表、中央和地方黨、政、軍、群各方面黨內負責同志約五千人的範圍內，認真討論了十三大報告《徵求意見稿》。主持討論的各地、各單位黨委，均已報來關於討論情況的報告和修改本。現將討論中提出的主要意見，以及我們經過研究後的進一步修改設想，綜合報告如下」。報告從9個方面歸納了各方面提出的修改意見並提出了修改設想。9日，趙紫陽閱後在三處重要問題上提出了修改意見，並在報告上批示：「原則上可行。個別地方有批注。我所聽到的，較大的是地方上搞黨委工作的，對黨政分開有較大的顧慮和誤解。觸動多年來的習慣勢力，或既得利益，看來難度不小，此點要充分估計。原則當然要堅持，但寫法上要認真斟酌。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作用，從事黨的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的幹部的重要作用，都要充分肯定，從積極方面講，不要使這些人有灰溜溜的感覺。另外，論述的大好經濟形勢，如何同人們的目前的感受（如市場供應）吻合起來，也值得注意。」

9月14日下午，中央書記處再次開會，討論了十三大報告的修改。會上，趙紫陽提出幾個很重要的問題。他說，經濟改革在搞活時，也要講監督、檢查。現在的問題，是國營大企業、大團體帶頭不執行國家規定，搶購、囤積、抬價、積壓，從而引起市場不必要的波動。因此，改革開放中應該有一整套監督工作，要建立規章、加快立法、加強執法。

【259】參見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97年8月版，第448-449頁。

對這次報告徵求意見的情況，趙紫陽說，理論界覺得還不夠勁，做黨務工作的覺得不行，太過了。現在據我聽到的，最大的反應，是對黨政分開，情況比預想的要嚴重。看來黨政不分的習慣勢力相當大。更嚴重的，有人給黨提意見，說是有人反黨。相當多的省委書記反對黨政分開，有人直接說，不如不分，有人說改革改革最後拿黨來開刀。黨政分開，是要黨更好地發揮作用。50年代後一直在強化黨委制，形成一種很嚴重的習慣勢力，也涉及既得權力、利益的再分配問題。看來難度最大的是黨政分開，我們的弊端相當嚴重。工作要通過黨組織做，黨自己不通怎麼辦？從小平1980年的「8·18」講話到這次政治體制改革研討，證明黨政不分開，改革就無法進行。黨什麼都在第一線，自己上去了怎麼監督，自己監督自己？黨處的位置機動一點，站的高一點，就超脫一點，客觀一點，處在什麼位置看問題，就是什麼角度，現在一有意見就是對黨有意見，分開就是為了使黨更好地發揮領導作用。黨委習慣於批條子，讓他管政策，他就覺得兩手空空，黨委抓慣了，行政也很難，薄一波插話說，賈桂站慣了。趙紫陽說，對這個問題，我們原則上要堅定，寫法上要使人盡可能接受，少產生誤解。要講清楚，只有減少干預，才能加強自己，要下這個決心，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寫的時候還要注意，要使大家的想法和中央盡可能一致，使下面能夠接受。現在來看，我們的輿論準備還不夠。要針對一些弊端講清道理。十三大後，要注意抓好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看來輿論方面要做大量工作。

討論中，田紀雲有一段講改革的話很有道理，他說，我們是十億人口的大國，改革很複雜，不要想一蹴而就，不出問題也不可能，也不可能馬上就能立桿見影。想光受益，不受害，是辦不到的。改革不可能馬上使所有人普遍受益，而是有人受益，有人不受益，有人也可能要損益。要強調黨員應該正確對待，要強調保證國家長期受益。

楊尚昆認為，關於地方上的黨政分開，要寫幾條規定性的話。不要讓人感覺地方黨委沒事幹。胡啟立建議明確寫黨政分開為黨政職能分開。余秋里表示同意撤銷黨組，認為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黨委也可以撤銷。薄一波說，向小平同志匯報過，要在報告中加強對小平作用的論述，小平同意加強，但是說不要過分，還是要強調三中全會以來的集體作用。薄一波說，要加一個艱苦奮鬥的意思。不要說反僵化是

長期的任務，改成「一定時期」更好。另外，說「從人治轉向法治」，這樣提是否有利？

在時間進入 1987 年下半年以後，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工作已經進入尾聲的徵求意見階段。研討中遇到的問題大都已經基本確定下來。趙紫陽和中央研討小組認為，黨政分開、黨內民主等重大問題，都需要從黨做起，從中央做起。許多事情，大方向已定，不一定非要等到十三大通過以後再開始做，在條件已經基本具備的情況下，應該從現在就做起。黨的十三大即將召開，新老交替已經勢在必行。按照政治體制改革研討中形成的方案，新的一屆中央高層領導機構的結構和運行方式與十二屆中央相比，將作出重大調整。趙紫陽本人是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的負責人，代理中央總書記，又是已經明確的下一屆中央總書記，他有條件，有責任，也有必要從現在就開始對中央高層的運行方式逐步進行必要的調整，以為新一屆中央班子打下一個盡可能好的基礎。

「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的主張，是趙紫陽所主張和積極倡導的。1987 年初胡耀邦被迫辭職，趙主持中央工作以後，他按照自己對黨的領導的理解，首先在中央高層的工作方式上，進行了多方面的調整。過去相當一個時期，理論、文化中的一些重要問題，甚至一些影片、劇目能否上演都要中央高層審查拍板，一些重要司法案件也要由中央討論定案。趙紫陽擔任代理總書記後，這種狀況開始改變。1987 年夏天的北戴河會議期間，放映電影《芙蓉鎮》，請趙紫陽來看。看完電影以後，一位書記處書記問趙紫陽：「這個電影可以公演嗎？」趙紫陽回答說：「我們是來看電影的，不是來審查電影的，以後中央不審查電影。」還有一次，湖南學生跟駐軍發生衝突，軍人開槍打死了一個學生。結果，官司一直打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軍隊代表、高檢、高法的人都來了。常委開會，大家匯報完情況以後，政法委書記請示趙紫陽：「這個案子判還是不判？怎麼判？」趙明確表示，中央要求依法辦案，但不審查案件。「判不判，怎麼判，由你們政法部門依法辦事，我們這裏不討論。黨中央對你們的要求，就是要你們依法辦事。」趙紫陽這樣說，就表明了一種態度，中央要求公檢法依法辦事，獨立辦案，中央不干預具體司法案件。如果這種做法堅持下去，形成制度，

那麼慢慢的，司法獨立原則就會在中國確立起來，中國就會成為一個法治國家。

在這一段時間裏，政治環境非常寬鬆。至少在中央常委和中央書記處的層次上，沒有審查制度，不去管具體事務，不對具體問題發表意見。當時，趙紫陽所注重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共產黨要轉變執政方式，或者說共產黨要有新的領導方法。而這種轉變，要從中央開始。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大政方針的領導，這樣就把很多具體問題都甩開了。中國要搞民主政治，必須以共產黨的執政方式轉變為前提，不然的話，不僅其它方面的改革無法深入，而且有可能慢慢使執政黨喪失執政基礎。

六、改革開放的大會

1987 年 9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討論並原則通過了十三大報告第四稿，並決定將這個稿子提交給即將召開的十二屆七中全會。鄧小平看了報告的稿子後說，報告看了，沒意見，寫得好。

10 月 14 日，中共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舉行預備會議，為期 5 天，主要日程是分組討論十三大報告稿和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兩個文件。預備會議的分組為中委 7 個組，中顧委 10 個組，中紀委 6 個組。負責起草這兩個文件的十三大報告起草組和中央政改辦的部分人員作為會議工作人員參加了會議。

會議用三天時間，分組討論十三大報告稿。報告稿的討論過程比較熱烈，發言積極踴躍。與會的幾乎所有中委、候補中委、中顧委委員、中紀委委員對報告從總體上都是肯定的，認為寫得好。特別是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部分，得到了幾乎一致的好評。三天時間，報告稿共修改 158 處，其中修改最多的，是農業方面。政治體制改革部分，主要是加入了紫陽在七中全會上講話的一段；黨的建設部分，加入了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問題，修改了對整黨的評價，差額選舉的範圍和比例有所縮小。

從 18 日下午開始，會議轉入分組討論《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19 日，預備會議用最後一個下午討論了黨章修改問題。

20 日，中共十二屆七中全會正式舉行。會議公報說：「全會討論並通過了中央委員會向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討論並通過

了《中國共產黨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案》，一致決定將這兩個文件提請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審議。全會討論並原則同意《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決定將這個文件的主要內容寫入中央委員會向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

10 月 25 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鄧小平主持了開幕式，趙紫陽做了題為《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報告的第五部分，集中論述了政治體制改革。11 月 1 日，大會批准了趙紫陽的報告，並評價說：「趙紫陽同志代表十二屆中央委員會所作的報告是黨和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報告堅持毛澤東同志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建設和改革的具體實際緊密結合起來，論證了我國社會仍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個正確的論斷，對於防止和糾正『左』的和右的干擾，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不斷推向前進，具有重大的深遠的歷史意義。」

在這次大會和隨後舉行的十三屆一中全會上，趙紫陽正式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鮑彤也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此後不久，鮑彤又被任命為中央常委政治秘書。這是中央高層新設立的一個職務。後來鮑彤告訴我，這個職務是 5 年前十二大時鄧力群向中央建議的，鄧說他認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有必要設立這樣一個職務，他向中央自薦，認為自己是擔任這一職務的合適人選。但是，鄧小平、胡耀邦都沒有理他。十三大之後，中央常委正式設立這一職務，趙紫陽不避嫌，任命自己的秘書，對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和十三大報告起草作出重大貢獻的鮑彤擔任，表明趙紫陽在十三大後將把工作重心轉向政治體制改革。鮑彤擔任此職後，將有權參加中共中央召開的任何層次的會議，並在會上發表自己的意見。

十三大上，最有戲劇性的一幕，莫過於中央委員會實行差額選舉，差掉了鄧力群。實行差額選舉，是十三大最引人矚目的一項改革。由於是初次在全國黨代會上採用，差額的比例很小，要在 185 名候選人中選出 175 名中央委員，差額比例只有 5% 多一點。本書前面講到過，前幾個月，趙紫陽為了讓鄧力群不再主管意識形態，不得已做出妥協，同意鄧力群在十三大上進中央政治局。但是，鄧力群左的形象在黨內極不得人心。一旦黨代會的代表們在選舉中有機會自由表達

自己意志的時候，鄧力群被淘汰就成了必然的結果。內定當政治局委員，甚至有人希望他當總書記的鄧力群，竟然在差額比例很小的中央委員選舉中落選，這在高層引起了相當大的震撼。鄧小平得知這一情況後，表示應該尊重選舉結果。就這樣，鄧力群失去了進政治局的可能。在此情況下，是趙紫陽出面向十三大會議主席團建議，把鄧力群改作顧問委員會候選人，以使他能當中顧委常委。結果在 11 月 2 日中央顧問委員會選舉常委的差額選舉中，鄧力群再度落選。

十三大的召開，十三大報告的通過，和十二屆七中全會對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原則同意」，標誌著為期一年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工作即將落下帳幕。我們這些中央政改辦的工作人員，也都參加了十三大的開幕式和閉幕式。能夠在人民大會堂裏，親身感受到大會的那種改革開放的熱烈氣氛，感受到當時中共第一線的領導人趙紫陽等人那種銳意推進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的決心，當時心中對這個黨，對這個國家還是充滿著希望的。

11 月 1 日，中共十三大閉幕。晚上，天安門城樓和廣場燈火齊明，向十三大代表和工作人員開放。我陪鮑彤從西側登上城樓，一邊聊天，一邊欣賞著廣場上的夜景。身旁不時地有胸前佩戴著證件的代表們結伴走過，有一些與鮑彤相識的人還偶爾地與他打著招呼。看著東西長安街上的車來車往，和廣場上的人流如織，心中有一種卸去了巨大壓力的輕鬆感。不管怎麼說，一年來，我們盡力了。

七、秘密決議：最後決策人

1987 年 11 月 2 日，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趙紫陽主持了會議。會議除了選舉以趙紫陽為總書記、鄧小平為軍委主席的新的中央領導機構以外，還通過了一個「秘密決議」：鄧小平仍然是黨的最終決策人。

這個決議通過的過程大體是這樣的。一中全會開幕時，由趙紫陽致辭。在講到老一輩革命家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時，趙紫陽說，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等幾位老同志雖然退下來了，但是他們豐富的革命鬥爭經驗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今後，「重大問題仍然要請小平同志掌舵」，全場鼓掌。趙紫陽說：好，鼓掌就是大家贊成，就是全會的決議。大家又鼓掌。趙紫陽講這番話和大家兩次鼓掌，都出於對鄧

小平的尊敬。出席這次會除了有全體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外，中顧委、中紀委成員全體列席，鄧小平和幾位退下來的老人也出席了。這個決議是以全體鼓掌形式通過的，是正式、合法、有效的。但是，這個決議會後並沒有被公佈。

趙紫陽為什麼在他正式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時候，主持中央全會通過這樣一個決議？在事情過去10幾年以後，趙紫陽在他的回憶錄中談到了事情的來龍去脈。1987年3月，鄧小平在同趙紫陽一次談話，談到十三大幾位老同志的退休問題時說，他的意見是一個人全退，三個人半退，即彭真全退，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半退。就是說，鄧退出政治局常委，仍任軍委主席；陳雲改任顧問委員會主任；李先念改任政協主席。一個人保留實職，兩個人擔任虛職。對此，陳、李一直沒有表態。直到7月3日，陳雲同薄一波談話時才表了態，說他的工作服從組織安排。陳雲一表態，其他人也就好說了。接著，鄧小平同薄一波、楊尚昆還討論了這麼一個問題：即三位老人退出常委以後，他們還管不管事？重大問題的決策，他們還參加不參加？趙紫陽就此問題提出一個意見：今後常委最好只有一個婆婆，不能有幾個婆婆。這就是說，三位老人都退了，今後只有鄧可以起這種常委的「婆婆」的作用。這個說法很形象，今後鄧的決策地位不變，是常委之上的婆婆，其他人不能這樣。

1987年7月7日，鄧小平在家裏召開了中央五人小組會議，才把老人的去留正式定下來。趙紫陽回憶說：「就在這個會議上薄一波提出，建議我在十三屆一中全會上講幾句話，宣佈今後重大問題仍要向小平同志請教，由小平拍板。當薄一波講這番話時，鄧表示，國際上只要明確了他（即鄧小平）仍是決策者就放心了。因為國內外都把他退還是不退，看作是中國能否穩定的條件。所以後來在十三屆一中全會上，我講了那麼一段話，說重大事情還要向鄧請教，請他拍板，就是因為這個會上定的決定。十三大人事安排，既要仍然保持鄧原有的作用，又不參加常委，以便其他三位老人也退下來，這個最為困難的問題就是這樣解決的。」【260】

【260】參見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32-234頁。

十三屆一中全會上趙紫陽那篇關於鄧小平地位的講話，是鮑彤為他起草的。對此，鮑彤回憶說：

> 我清楚地記得，在全會開會的前一天，1987 年 11 月 1 日，紫陽找我，說：「小平同志退下來了，一中全會上應該有所表示。為了表達對小平的尊重和感謝，不宜即興措辭，需要有個底稿，屆時基本上採取宣讀形式，以示鄭重。」我就為他起草了這篇講話。

鮑彤認為，一中全會的這個決議，是鄧小平、薄一波等人的安排。「紫陽在當時的情況下，只能奉命而為。」

1987 年 11 月 2 日下午，在十三大新聞發言人朱穆之舉行的酒會上，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和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常委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會見了採訪十三大的中外記者。趙紫陽回答了記者的提問。

在有外國記者問到「十三大的結束意味著中國改革派和保守派鬥爭的結束」時，趙紫陽說：「國外一些朋友總認為中國有一個改革派，一個保守派，並以兩派勢力的消長來作為分析中國政治局勢的依據。我要說，持這種觀點來分析中國局勢，將會不斷犯錯誤。」對此，趙紫陽解釋說，「一個領導集體，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一些步驟問題上，具體政策上，當然不可能完全一致，我認為這是正常的。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政黨，誰也不能說意見是完全一致的。你們不是不贊成我們『輿論一律』嗎？為什麼又把我們意見有一點不一致當成是了不起的事情呢？我認為在領導集體中，甚至在我們 5 個人當中，如果有點不同意見，反而可能成為我們今後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少犯錯誤、不出大錯誤的重要保證。」

當南斯拉夫記者提問時，趙紫陽說：「我們在搞改革，你們國家也在搞改革。我們國家同許多國家社會歷史條件不同，這就需要拿出相當長的時間解決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已經解決了的問題，就是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我的報告是針對中國的情況講的。現在許多社會主義國家都在努力探索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本國實際相結合的最佳的方案，你們的最佳方案和我們的最佳方案不一定一樣。我們之間可以互相借鑒，互相交流，但是都不能照搬。祝你們國家的改革取得成功。」

有香港記者問趙紫陽，你曾說你更適合當總理，現在你當了黨的總書記，有什麼感想？趙紫陽回答：「就我個人來說，我現在還是認為我做總理更合適。但是大家一定要我做總書記，我只有努力把總書記的工作做好。沒有絕對的自由嘛！」

香港記者又問到，鄧小平退出中央委員會、中央顧問委員會後，決定重大事情你是否會和他商量？趙紫陽明確回答：「我會這樣做的。我會向他請教。我非常尊重小平同志。我認為現在的中國領導人中間，無論是在職的還是退下來的，政治經驗和智慧還沒有一個人能比得上小平同志的。小平同志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決策人的地位和作用是經歷了歷史的考驗的，是黨內外、國內外公認的。遇到重大問題向他請教，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何樂而不為呢？」

聯邦德國記者問：您認為中國今後的主要問題是什麼？趙紫陽明確地說：「是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改革的主題是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主題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兩者互為條件，都需要有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

有外國記者問，明年開人代會，誰將擔任總理的職務？趙紫陽回答說：「明年人大、政府都要換屆。國務院的人事，將由全國人大決定。過去，外國人不是批評我們把人大當成橡皮圖章嗎？我們今後要尊重人大的職權。屬於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範圍內的事，我不能隨便發言。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們一個消息，我不準備等到明年七屆人大，而在最近即將召開的人大常委會上，我就要提出辭職。我將提出一個代總理的人選。我的提名現在也不能告訴你們，但我可以對你們說，他比我年輕。」

1987 年 11 月 24 日，已經在十三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向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23 次會議提出了《辭去總理職務的請求和由國務院副總理李鵬任代總理的建議》，建議說：「我已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被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請接受我辭去國務院總理職務的請求。我建議，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決定國務院總理的人選以前，由國務院副總理李鵬任代總理，行使總理職權，領導國務院的工作。」同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趙紫陽的請求和建議，決定，由李鵬任國務院代總理。

12 月 1 日，紫陽卸任總理職務前，最後一次主持了國務院全體會議，與李鵬交接班。趙紫陽首先宣佈，人大常委會已經決定，由李鵬同志擔任國務院代總理，行使總理職權。今後，國務院的工作，就由李鵬同志全面領導。

在這篇交班講話中，趙紫陽特別強調，我認為國務院的工作儘管千頭萬緒，關鍵是一條：以改革來統攬全局，推動各方面的建設和工作。

他說，我們國家不改革過得去過不去呢？肯定過不去。以前我們常講，對於我們國家的發展來說，速度問題是個非常尖銳的問題。趙紫陽強調，沒有緊迫感，不真正下決心抓好，我們的國家就會越來越落後，即使國家的經濟發展能保持一定的速度，同工業發達國家的差距不僅不會越來越小，而且會更加擴大。幾十年以後，中國在世界上恐怕連現在的地位也保持不住，那就有可能像毛澤東同志所說的，要開除『球籍』了。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就在這裏。

趙紫陽說，要解決經濟效益和科技進步這兩個問題，傳統的路子走不通，非對現行體制進行全面改革不可。經濟發展戰略的實現，從根本上說要靠改革的加快和深化。只有著眼於改革，才能把握事物發展的本質，較為準確地判斷事情的輕重緩急；也只有使改革不斷取得實質性的進展，才能帶動各項工作更好地前進。因此，我認為，不能把改革和各項日常工作平擺起來，必須把握改革和各項工作的內在聯繫，緊緊抓住改革這個中心環節，才能高屋建瓴，在整個國務院的工作以至整個國家的建設中掌握主動權。

關於改革可能面臨的複雜局面，趙紫陽說，我們的改革不是盲目的，我們有正確的理論指導，改革的方向和目標是明確的，模式是什麼也是明確的，各個領域的改革怎麼進行，大的方針、政策也都有了。但是，改革確實面臨著非常複雜而又困難的情況。現在是新舊兩種體制並存。如何較為平穩地到達彼岸，過渡到以新體制為主，是一個必須處理好的最大難題。需要集中精力探索、尋找風險較小的過渡形式，需要把堅定性和靈活性結合起來。改革不可能沒有困難。經驗證明，每當我們考慮改革要前進一步、深入一步的時候，總會有各種各樣的困難情況，各種各樣的顧慮反映出來。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要求我們必須細心體察情況，根據各方面的實際承受能力，制訂改革

實施方案，不能操切從事，魯莽輕率；另一方面，也必須要有一種勇於開拓的精神。小平同志經常提醒我們，改革要有勇氣。要不怕承擔某種風險，及時作出決斷，不然就會久拖不決，貽誤時機。當然，在作出決定之前，要反覆論證，體察一切情況，力求搞得準確、周到一些，盡量減少失誤，減少震動。在實踐的過程中，有些已決定的改革措施即將出台時，或者在執行中發現情況發生變化，遇到意料以外的困難，原來的方案難以執行，在這種情勢下，應當根據新的情況，堅持改革的總方向，從實際出發，調整原來的方案和部署，某一些改革措施可以放緩，而某一些改革措施則要加快。有時甚至要採取一些迂迴的辦法，以便創造條件進行根本性的改革。但是，務必不要使改革停頓下來。

趙紫陽特別強調，改革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要遇難而進，不能停頓，停頓就會導致後退，退到老路上去。總之，在改革的措施、步驟上，必須審時度勢，從實際出發；在對待改革的態度上，必須堅韌不拔，鍥而不捨。希望國務院各部委的同志都能夠統一思想。企業制度的改革，物資、投資、財政、稅收、金融、外貿體制的改革，住房制度的改革，以至機構的改革，我希望都能本著這樣一種既要審時度勢又要遇難而進的精神，來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只要改革能夠一步一步地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各項工作就都有了希望，我們就有可能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邁出新的步伐，取得新的勝利。因為這是我在國務院工作中多次遇到的一個問題，也是自己的一點切身體會，所以今天多說幾句。

這篇講話，可以說是離任總理趙紫陽對新任國務院總理李鵬的贈言。其中包含著他對近一兩年來改革當中產生的一些問題，群眾的一些議論，所進行的一些反思。他希望，不要因為改革出現了一點新問題，有個風吹草動，就動搖了我們對改革的預期和步驟。鮑彤後來回憶說，「趙紫陽的這個講話，不是我們幫他起草的，完全是他自己的思考。」

第九章

中央政改研究室：要為政治體制改革破題

中共十三大通過了趙紫陽報告中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標誌著這場改革得到了全黨的授權。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政治體制改革在黨內就沒有了阻力，相反，改革的推進依然阻力重重。趙紫陽看到了改革中社會利益關係的變化，特別強調要通過協商對話解決社會矛盾。他要求十三大後新成立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在落實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中提出的各項舉措的同時，重點研究社會協商對話、廉政建設、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商品經濟新秩序等方面的問題，為發展民主，緩解可能出現的社會矛盾激化，防止發生社會的動盪和危機找到一條新路子。

一、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成立

由趙紫陽主持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的任務，就是向十二屆七中全會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七中全會也「原則同意」了這個設想，並將其主要內容寫入了十三大報告。十三大之後，研討小組的使命就結束了，設在其下面的辦公室也完成了自己的任務。這個被稱為「中央政改辦」的機構，從 1986 年 10 月初成立，到 1987 年 11 月的十三大後結束，前後只存在了一年多一點的時間。在這一年的時間裏，政改辦頂住了種種困難和壓力，很好的完成了研討小組交給的任務。雖然它只是個臨時機構，只存在了一年的時間，但它以自己出色的工作、良好的風氣、開放而又敢於冒政治風險的工作態度，受到了黨內許多瞭解內情的人的讚賞。它在中共歷史上，在中國政治改革史上，在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史上，都留下了鮮明的印記。

1987 年 11 月 7 日，是個晴朗的日子。下午，中央政改辦的全體工作人員在負責人鮑彤、周傑、嚴家其、賀光輝的帶領下，來到中南海紫光閣，在這裏等候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接見。同時來到紫光閣

的還有鮑彤領導的另一個文件起草班子——十三大報告起草組的全體成員。下午 3 時許，趙紫陽來到紫光閣，他先是同鮑彤等幾位負責人握手，然後又舉手向大家打招呼，說，好嘛，大多數同志都見過嘛。接著，他坐下來，分別與中央政改辦、十三大報告起草組的人員合影。趙紫陽離開後，鮑彤領導的這兩個工作班子的全體人員又在一起合影留念。

11 月 9 日晚，趙紫陽委託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代表他，在人民大會堂宴請中央政改辦的全體人員。溫家寶在餐前代表中央宣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已經完成了中央交給的歷史性任務。作為研討小組的辦公室，大家也很好地完成了為研討小組服務的任務。他代表中央，代表紫陽同志，對大家的工作表示感謝。他和大家一起舉杯，為黨的十三大順利召開乾杯。

11 月 10 日，中央政改辦舉行了最後一次全體會議，鮑彤、周傑、嚴家其、賀光輝等負責人全部到會。鮑彤在會上講了話，他說，作為研討小組辦公室，我們的任務是為研討小組服務。在研討小組領導下，我們工作了一年多一點的時間，為研討小組準備了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已經被黨十二屆七中全會所接受，主要內容也已經寫入了十三大報告，政治體制改革已經提上黨的日程。所有的同志都作出了自己的努力。當黨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時，能為此做一點工作很光榮。你們 30 幾位同志來自 20 幾個單位，大家共同努力，完成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第一個歷史性文件。隨著研討小組任務的完成，辦公室工作也要結束了。昨天紫陽委託溫家寶同志給大家以鼓勵，通過這段時間的工作，大家也都有所提高。我們這個集體是很好的集體，工作結束了，我代表周傑、光輝、家其同志向大家表示感謝。

談到政治體制改革的下一步工作，鮑彤傳達了趙紫陽的意見。他說，紫陽最近講，政治體制改革還沒有破題。上週五，紫陽說下一步怎麼展開，有一點想法，還要與中央同志商量。紫陽認為，有些問題要搞實施方案，有些就可以直接搞了。

鮑彤說，紫陽的傾向性看法有這麼幾點：

第一，黨政分開已經著手進行了，要研究一下新的政治局、常委、書記處如何工作，要制定工作規則，黨中央要從制度建設上帶頭。

第二，11月5號上午，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時，紫陽講，黨政
要抓緊，主要是抓一下思想政治工作。實際上黨內對這個問
想並不一致，一致了才會搞好，不一致就有可能出問題。重
放在企業，要理順企業的制度。6號下午紫陽講，他想親自抓
企業法。在兩權分離、黨政分開情況下，中國的企業制度應
個什麼樣子的？實行廠長負責制，但要對廠長有所制約，到
約到什麼程度？完全沒有制約不行。黨委保證監督，廠長與
、與黨委、與國家和政府是什麼關係？參股者與企業是什麼
？企業應該實行什麼樣的人事制度？等等。紫陽同志想親自
力量進行調研，拿出意見來，造成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
第三，是不是要考慮搞一個關於社會協商對話的若干規定。
問題應該協商，哪些方面在哪些層次上協商，包括新聞發佈
等等，要在調研的基礎上，形成一個中共中央關於開展社會
對話的建議。
第四，就是機構改革。現在國務院已經成立以李鵬同志為首
構改革小組，人事部、行政學院、公務員制度的研究，都要
走。
第五，明年各省市換屆。在這個時期，我們應該做點什麼，
點什麼，也要進行研究。

彤說，我們近期的工作，就是再組織兩個小組，分別研究一下
度和協商對話問題，要拿出一個初步的意見來。

在鮑彤講這番話的時候，中共中央的一個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
究機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已經在籌備之中了。

在十三大之前的7月底，研討小組辦公室在一份向中央研討小
的「彙報提綱」中，就曾經說到，十三大通過政治體制改革方
後續工作量將非常大，看來需要從總體上研究各項改革之間的
係，組織有關方面抓緊制定各項改革的實施方案。為此，是否
請中央設立專門的綜合研究和實施協調機構，建議研討小組考
三大結束後的一個多月內，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共召開了四次會
次都議到了成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問題。在第二次常
，決定撤銷研討小組辦公室，設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
了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確認。第四次常委會上，通過
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工作任務、人員編制和負責人。

1987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文件，成立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以下簡稱中央政改研究室），明確研究室的職責是「負責政治體制改革實施過程中的綜合研究和協調工作，同時承擔中央交辦的有關問題的研究和文件起草工作」。鮑彤說，這個機構的名字是研究室，無權「主管」政治體制改革；它的責任，是研究政治體制改革，就像國務院有一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一樣，中共中央確實需要有一個研究政治體制改革的機構，政治體制改革也需要有一個研究和協調機構。

根據這個中央文件，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為中共中央正部級機構，主任由中央委員、中央常委政治秘書鮑彤兼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周傑、國家體改委副主任賀光輝兼任副主任。研究室的局、副局、處、副處級研究員編制為20人。根據工作需要，原中央政改辦的30幾個研究人員中，大部分回到了原單位。正式調入政改研究室的有12人，他們是陳群林、孫方明、黃海、高山、顧雲昌、王紹賢、吳偉、徐沖、周大力、沈榮華、張偉、白慧敏。陳曉魯仍然以借調方式留下工作；吳國光作為特約研究員參加政改研究室工作；不久又根據需要，調入李元、何家成、唐欣、石肖巖。實有在編研究人員共為17人【261】，下設綜合局、黨的改革局、行政改革局、社會改革局、辦公廳等五個局級單位。原貴州省委副秘書長陳群林任研究室秘書長。

中央政改研究室的辦公地點，暫定在原中央政改辦的駐地，地安門西大街38號，中辦招待所。原定不久後遷入中南海鄧力群任主任的原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的房子，但由於當時任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長的宋平收留了書記處研究室的近半人馬搞了個「中組部黨建研究所」，佔了房子遲遲不肯讓出，所以直到1989年6月被撤銷時為止，中央政改研究室一直在中辦招待所辦公。

12月1日，鮑彤召開了中央政改研究室成立的籌備會議。參加會的有周傑、賀光輝兩位副主任，和原中央政改辦留下的10幾位同志。鮑彤在會上說，明天中央將下發文件，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正式成立。今天開會，我們醞釀一下機構設置、工作方式、課題安排等籌備工作。在我們這個機構的醞釀過程中，紫陽曾經出過三個題目，一是

【261】關於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研究人員的個人情況，請見附錄，這裏就不再分別加注。

制度。隨著黨政分開、政企分開，企業內部應該設哪些機構，應個什麼制度，結合企業法的制定，要在七屆人大一次會議上通過。紫陽抓了兩個班子，一個是袁寶華[262]等人，考慮企業法的修一個是呂東[263]等人研究國營企業的承包租賃。紫陽出的第二個是協商對話制度問題，要搞一個文件。第三個題目是把政治體制的問題要排排隊，由哪些部門來做，輕重緩急，這件事請李元牽研究一下，按照總體設想有哪些問題要提出來。

鮑彤說，除此以外，還有幾件事要研究，一是袁寶華建議，在人學基礎上成立行政學院，請幾個同志研究一下。第二是中紀委改意見，一是內容，二是方式，都要注意。內容限於十三大報告總想中的框子。第三，中直機關黨委、國家機關黨委，這兩個黨委作改革問題。將來這兩個黨委要改為工委，是中央的工作部門。海找幾個人議一下，提出意見。第四是中組部關於換屆問題的。薄老認為，省市機構太多，人員太多，是不是改變一下。紫陽，請宋平找人研究一下，換屆問題上可以做哪些改革。這個題目雲昌負責，看看我們能提出哪些意見。鮑彤說，他曾經和宋平講換屆時，省長、副省長、廳長、副廳長中是不是可以增加點非黨一個是要有，二是不湊數。與其讓民主黨派人員做人大政協的領不如實際一點，當個廳局長。

第五件事，明天上午書記處有一次會，研究工會、青年團代表大問題。據說工會有一個改革方案，步子邁的比較大。團中央也提改革意見，講黨群分開，共青團和共產黨的關係，與婦聯、工會的關係不一樣。怎麼處理，要研究。

鮑彤最後說，近幾次政治局常委開會，幾乎每次都與政治體制改調，很緊迫。改革在中央已經提上日程，已經在不斷的出台了。次常委會和政治局會上，就研究了工作規則。政治局開會後，發新聞。從這些情況看，我們的工作應該怎麼展開？要爭取主動。開會就是這個目的，大家腦子裏要有三個單子，一是中央已經擬的，代表大會、政治局會、常委會定了的有哪幾件事，要理清。

袁寶華（1916-）：河南南召人。時任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中共第十三屆中顧委委員。

呂東（1915-2002）：遼寧海城人。時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是中共第十三屆中顧委委員。

二是中央已經提出了的，我們還沒研究透的有哪幾件事，比如國家公務員制度，從哪裏開步走？三是政治體制改革在動態的實施過程中，有哪些工作已經開步走了，情況如何，多長時間能完成，實施中還有哪些問題需要考慮、提出建議。現在我們研究室同志文章寫了不少，還參加宣講，那麼現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工作到底應該搞些什麼？現在有哪些文章、觀點對我們有啟發，哪些講的還不夠、不透，哪些講得不全面、不適當，這些都要注意一下。

12 月 8 日，新成立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舉行第一次全體人員會議，鮑彤、周傑在會上講了話。鮑彤佈置了下一步工作的任務，他提出要研究一下明年工作，要列個計劃。他講到，第一企業問題要研究，要搞出一些原則性的東西，寫入二中全會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的報告。第二，社會協商對話，紫陽很關心，最後要有一個向中央建議性的東西。第三個是各省市的政治體制改革工作，原則上在各省市黨委領導下組織運行，上邊不授意。遇到省市決定幹的事，有什麼把握不定的問題來找我們，我們也要盡力提供幫助。因此要有意識的建立一些聯繫，跑一些地方調查研究。第四個，紫陽說，新聞改革第一要搞，第二不要出什麼問題。可否找三大報，新華社、新聞署座談一下，可以搞哪些改革，注意哪些原則，需要中央、國務院哪些支持。這個座談由中央宣傳小組秘書組組織，我們可以參與一下。

鮑彤說，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現在政治體制改革剛剛出台，四面八方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議論我們要掌握，一是報紙上的文章，二是收集一下下面群眾對政治改革的議論。要掌握宣傳工作的動態，和群眾較為模糊不清的問題。將來要有兩個刊物，一是向中央反映情況，二是互相通報情況。

二、二中全會：趙紫陽闡述社會協商對話制度

改革，從本質上說，是各種社會利益的再分配，是各種利益關係的再調整。中共的十三大以後，經濟體制改革在深化，政治體制改革開始進入實施階段，利益關係的調整致使一些舊有的社會矛盾趨於緩和，但又引發了新的矛盾。這些矛盾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緩和和解決，就有可能危害到改革和建設，給社會的發展和穩定帶來嚴重的後果。舊的矛盾的不斷解決和新的矛盾產生，雖然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常

態，但是解決矛盾的方法，卻是需要隨著改革的發展和深化而不斷出新。這個出新，在趙紫陽看來，就是要跳出毛澤東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老路，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礎上，創造出一套解決社會矛盾的新的方式方法來。這其中，用社會協商對話來解決黨、政府與民眾之間、社會各個階層之間、具有不同利益的各種社會群體之間的矛盾，就是趙紫陽本人親自提出的一個重大舉措。

鮑彤曾經回憶說，通過協商對話來解決社會矛盾，這是紫陽的一個深思熟慮的、一再堅持的主張。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常委在幾次研究社會矛盾、社會動亂問題的時候，紫陽都一再提出這個問題。十三大報告中寫入社會協商對話這個問題，中央其他人當時都沒有提到，我們這個做具體工作的辦公室、十三大報告起草小組也沒有提到，是紫陽一再提出來，要我們研究的。趙紫陽說，我們現在正在改革，人們的生活正在好轉。據國際上的普遍經驗，人均收入 1,000 至 4,000 美元這個階段，是社會矛盾的高發期。社會貧富差距拉大，利益階層分化，社會矛盾會激化，甚至會出現社會形勢惡化。這個情況我們應該要考慮到，要有準備。紫陽一再說，解決這個問題，我看就是一個辦法，就是要進行社會協商對話。

早在十三大之前，趙紫陽就曾經多次談到社會利益集團和社會協商對話問題。

1987 年初，鮑彤在中央政改辦的一次例會上說到，在中央書記處討論六屆人大五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時，紫陽講到一個很重要的思想，就是社會主義社會實際上存在各種利益集團。紫陽認為董輔礽【264】的文章【265】寫得不錯。紫陽去年的工作報告【266】，重點是在新舊體制問題上統一思想；這次他說，改革中涉及到利益關係與權力的變動。小平也講過，改革過程中，有人會得到一些利益，有人會失去一些利益，有人會得到這個而失去那個。要使廣大幹部群眾認識到這一點，能正確看待和接受利益的變動和衝突，領導要能正確處理。這是

【264】董輔礽（1927-2004）：浙江寧波人，著名經濟學家。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副院長。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265】指董輔礽的文章〈改革與經濟利益關係的變化及對策〉，載 1987 年 1 月 3 日《經濟日報》。

【266】指趙紫陽在六屆人大四次會議上代表國務院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

一篇很大的文章，可能會在十三大上提出，也可能在這次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注意研究這些問題。

鮑彤在發言中，發揮了趙紫陽的思想，他強調說，這不僅是經濟體制改革問題，也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過去歷來都是說全國人民利益一致，其實，既然講到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就要承認人民內部有矛盾，矛盾就是利益衝突。人民內部有不同集團，就有不同利益；改革中利益會發生變動，就會起衝突。改革中的阻力，都會發生在這個大背景下。要在這個背景下考慮改革的問題。鮑彤認為，現在比文革前多樣化，這就是利益集團的分化。《毛澤東選集》第一篇就是階級分析。那麼，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利益集團是怎麼形成的？改革中會向什麼方向變化？過去全是全民所有制，現在有各種形式所有制，也多樣化了。既然客觀上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團，我們的研究就要考慮這個問題。所有的利益都會反映到黨內來。如果只有一種聲音，就不符合社會主義有各種利益集團的分析。改革就是要找出一條滿足各種社會利益集團的路子。

1987 年 5 月 20 日，在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第六次會議上，趙紫陽在談到如何解決各種社會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時說，社會協商對話是個很好的辦法，很多重大問題可以與社會組織對話。我們除了政協，還應有更多的渠道進行協商。要有代表農民、工人、知識分子、科技人員同政府對話的渠道。對話雖然麻煩些，但是搞通了就能取得群眾的支持，平時麻煩一些不至於出了事不可收拾，不然就會有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形式出來。對話要有渠道、組織形式，要制度化、法律化、經常化。重大問題，要通過協商對話來解決。趙紫陽感慨地說，我們執政以後，什麼都變成官方的，行政化了，開大會，傳達文件，散會，僅靠這些不行。

5 月 28 日下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第七次會議上，趙紫陽再次提出社會協商對話問題。他說，社會民主主要是兩個問題，一個是基層民主，一個是社會協商對話。政協是個很重要的協商形式，但是只靠政協不行，工會是重要的渠道，但是工會本身有個改革過程。現在政府與工會對話，工人不承認。理順黨與工會關係，工會本身的改革都要有個過程。解決了這些，政治協商的問題是不是就解決了？不一定。我們必須與代表不同利益的人協商與對話，不然不行。

將來大型對話一年要搞幾次，可以由基層組織臨時選代表。一些與現有組織的對話，並不一定能解決問題。這是多年形成的。

中共十三大把趙紫陽提出的「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載入了大會報告。報告中說：「必須使社會協商對話形成制度，及時地、暢通地、準確地做到下情上達，上情下達，彼此溝通，互相理解。」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的基本原則，是「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當前首先要制定關於社會協商對話制度的若干規定，明確哪些問題必須由哪些單位、哪些團體通過協商對話解決。」按照報告的這一規定，十三大後，趙紫陽交給新成立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第一項任務，就是研究、起草一個題為「關於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的若干意見」的文件。

從 1987 年 12 月開始，鮑彤帶領政改研究室開始進行這項工作。還是政改辦時期的老辦法，內部研討加上召開座談會，一邊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一邊起草。

12 月下旬，政改研究室連續召開以社會協商對話為題的各界座談會。26 日上午，開了北京市的企業廠長經理座談會，北京東風市場、百貨大樓、東四人民市場、燃氣公司、公交公司、自來水公司的廠長經理，市環衛局、公用局的局長都參加了座談。26 日下午，是企業工會座談會，北京鐵路局、民航北京分局工會及下屬企業工會、部分工人代表參加了座談。27 日，是由團中央組織的，團中央書記李援朝、團中央學校部部長袁純清、北京團市委書記強衛，及上海、天津、遼寧、四川、河南、山西、黑龍江、甘肅等省市的團省、市委書記，中央國家機關團委書記都參加了座談。在座談中，參會者介紹了本地、本部門、本單位這一段時間來，開展社會協商對話的大體經過和經驗，對如何開展和規範社會協商對話提出了看法和希望。特別是團中央的這次座談會，總結了各地同學生、青年對話的特點和經驗，提出了許多很好的主張和建議。鮑彤參加了所有這幾次座談會，並不斷地向發言者提出問題，聽取大家意見，耐心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

在此前後，政改研究室也連續召開內部討論會，對社會協商對話問題進行專題研究，在筆者的記錄中，可查到的就有 5、6 次之多。鮑

彤在這幾次會上，每次都在大家發言的基礎上進行總結歸納，提出了許多很精闢的見解。

12 月 22 日下午，鮑彤在研究室內部研究討論協商對話問題時說，協商的目的用一句話概括，就是正確處理人民內容矛盾。從積極方面說，有利於領導正確決策和發揮人民積極性；從消極方面說，是化解矛盾，防止大的社會震動。協商對話有兩種，一是領導與被領導之間，要注意雙向的平等對話；另一個是橫向的地方部門，群眾之間的。前者作用是決策前，有利於決策，決策後讓群眾去理解。後者是群眾相互瞭解，表達自己的要求。現在的重點一是改革的出台，要提倡新聞發佈會。重大改革出台前，要對話，要交代背景和出發點，這樣的對話一年搞幾次就可以。二是重大社會問題，群眾十分關心，有關部門要出來講話，開懇談會，這是領導機關要抓的，呼籲各界人民配合政府工作。凡是市政工程、重大服務設施，提請公決，徵求意見和人大活動相結合。基層要經常搞，目前基層開展的還不平衡。要歸納一下，有幾種問題。對話討論要和基層管理秩序的建立相結合。

鮑彤強調說，協商對話要注意的問題，是不要趕浪頭，一哄而起，做什麼都搞對話，我們這個文件的題目叫開展社會協商對話的若干意見，上面要有限制，下面也要實實在在。對各級領導機關也要有個要求。要調查一下，瞭解一下各方面的期望值、要求和既得利益因素。

在 12 月 29 日上午的會上，鮑彤做了總結發言，他說，現在各地都在搞協商對話，發展的不平衡。要提高質量，探討規律，逐步形成制度。

關於中央一級的協商對話，鮑彤說，十三大報告提出，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的基本原則，是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根據這一原則，國務院所屬部門要結合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找有關方面共同磋商，決策後針對群眾中的疑點進行對話，求得支持。有關全國範圍安定團結的重大問題、突發事件，應向各界人士說明真相，準備採取的措施，求得理解和支持。要認真建立國務院發言人制度，國務院全體會議、常務會議都要公開，盡可能的公開發佈消息，回答記者的問題。中共中央應隨時與各方面民主黨派進行磋商。

關於地方和基層，鮑彤說，地方的對話要討論政府和群眾關心的問題，城市建設、市政設施建設之前要徵求群眾意見，決策後要有說明。基層單位的對話、本單位的大事可採取對話會的形式，也可以不採取，主要內容是群眾關心的實際問題。

對於群眾團體在協商對話當中的作用，他說，要經常性的研究群眾的思想傾向，向有關部門提出對話的建議。要有意識的樹立群眾團體的威信。群眾中有意見的問題，工會不提出，工會是失職；學生會不提出，學生會是失職。工會、學生會提出的問題，行政不解決，行政上是失職，要負責任。

在後來的幾次討論中，鮑彤還提到這樣幾個問題：

一是在地方上，遇到重大的建設項目，如果當地人代會認為有必要，應該試行市民公決。決策還是由人大、政府來做。協商對話不是決策性的，涉及的問題主要是大家都關心的，牽扯到大家利益的問題，牽扯社會穩定的問題。市政建設在增加論證的基礎上要告訴群眾。重大的規章制度、法律法規，立法機關認為應該由人民公決、全民討論的重大問題，由人大決定後交人民討論公決。

二是要注意加強社會團體的獨立性。通過社會協商對話，對社會群眾團體進行改革，使之逐步加強自主性、獨立性，能夠代表不同部分的社會利益，而不是僅僅作為共產黨和政府的傳聲筒。

三是社會協商對話不能代替現有的政治協商渠道。要加強黨派協商。要研究如何在文件中表達這個主題。

四是提出對話是要協調人民之間的矛盾，而不是要擴大或激化矛盾。協商對話原則是有利於解決矛盾，有利於安定團結，有利於維護正常工作秩序，有利於提高效率，不可搞成上街鬧協商對話。

五是從領導的角度來說，對話中要講實話，對話要辦實事，承諾一定要慎重，一定是能辦到的，否則是吊起了胃口而不能滿足，不利於緩解矛盾。為了使許諾都可以兌現，對話前都要做好準備。

鮑彤還認為，要提高互相諒解、理解、妥協的態度。如果能宣傳社會調和就對了。我們過去是搞階級鬥爭，靠打擊一部分人來滿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現在不能這樣。否則改革的基點就錯了，改革要使大家都得益，要強調平等、民主的原則，要通過對話使幹部和群眾受到正常的民主生活的教育，提高幹部的領導水平和群眾的主人翁意

識。要提倡互相理解、諒解的一種精神，來進行溝通。他還指出，對話不能代替政策，不能代替法律審判和法律的執行，不能影響正常的生活和生產秩序。

1988 年 1 月 8 日，協商對話的文件形成了第三稿。政改研究室再次開會進行了討論。在這次會上，對於社會協商對話形式問題，鮑彤再次進行了歸納，他說，社會協商對話有四個層次，中央層次的全國性對話、地方上的對話、基層的對話和橫向的對話。鮑彤認為，全國性的對話事關重大，問題不在數量，不在搞得熱鬧，而是應該搞的好，能夠起示範作用，不能離開最重要的主題搞，這個最重要的主題就是改革。全國性對話，應該服務於改革，凡是改革當中的重大措施，國務院有關部門都要組織對話。

鮑彤和中央政改研究室的這些討論，在經過歸納整理之後，都寫入了社會協商對話的文件。在這個文件形成過程中，趙紫陽一直十分關注，曾經多次催促過。到了 1 月上旬，文件也基本成形。但是，後來這個文件並沒有提交中央討論，也沒有成文下發。原因是在起草過程中，大家覺得，十三大報告提出社會協商之後，才只過了兩個月的時間，各地積累的經驗還不很豐富，過早地進行全面總結並且用文件的形式固定下來，不利於進一步進行探索。1 月 8 日研究室內部討論協商對話文件的第三稿時，有同志提出了這個問題。鮑彤也說，現在是否具備了條件，作出一個規定，要分析一下情況。十三大以後社會協商對話開展起來了，成為政治生活中的一種新的生活現象，對緩解人民內部矛盾、鞏固安定團結、推進改革、活躍民主生活有重大作用。但現在看來，作為制度還不成熟，目前還需要進一步開展，提高質量、摸索經驗、逐步形成必要規範，走上制度化。

正是基於這種考慮，在請示了趙紫陽之後，政改研究室起草的這個文件並沒有直接提請中央討論，更沒有作為中央決定下發，而是改換了一種形式。1988 年 2 月初，鮑彤受命主持起草十三屆二中全會報告。按照趙紫陽的意見，起草組將關於協商對話的文件經過濃縮之後，寫入了趙紫陽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十三屆二中全會的工作報告稿，成為報告的第六部分。3 月中旬舉行的中共十三屆二中全會通過了這個報告。報告說：

協商對話的總題目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內部仍然存在著不同利益集團的矛盾。正確的方針，不是激化矛盾，也不是迴避矛盾，而是及時地恰當地處理矛盾或緩解矛盾。許多社會矛盾可以通過改革得到解決；但在改革過程中也必然會產生新的利益調整和摩擦。因此，在當前和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社會協商對話要為保證各項改革措施的順利實施服務，為協調社會矛盾服務，為鞏固安定團結服務。

20多年後，鮑彤在和筆者的一次交談中，再次談到了趙紫陽提出社會協商對話問題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他說：

紫陽的社會協商思想非常重要，值得我們認真研究。紫陽認為，社會矛盾不應該是由凌駕於社會各個主體之上的一個超社會的組織負責解決，它沒有資格解決這個問題，要靠什麼？要靠社會各個階層、各種社會主體通過互相協商、互相爭論，互相妥協、互相合作，一起來解決這個問題。這是一個很精彩的思想。從紫陽提出這個思想之後，一直到1989年解決學潮問題，他都是堅持這樣一個思想。如果往前推呢，你可以看出來，農村改革的時候他講的什麼問題？尊重農民的自主權，農民是主體；城市改革的時候他講什麼？尊重企業的自主權；這就是說，不是由一個超社會的權力來決定，應該怎麼搞政治改革、經濟改革、農村改革、城市改革，不是的。紫陽認為，社會有各個階層，不同的利益群體，他們應該作為自己的主人，互相之間來進行討論，有合作、有鬥爭，通過這種方式來解決問題。

鮑彤說：

我認為紫陽這個思想很精彩。如果說當年能夠在這個問題上取得成果的話，中國的一切群體都將成為自己的主人，成為社會的主體。這就是社會多樣化，社會多元化，多元主體之間互相協商，解決社會面臨的各種矛盾，特別是最重要、最尖銳的矛盾。這個思想的精彩就在於，它否定了由一個超社會的權力來統籌兼顧，來解決、調整，來決定哪裏是重點，哪裏是非重點，來指揮一切。否定了這個東西，就會變成東部西部互相協商，南部北部互相協商，工農兵學商互相協商。

鮑彤進一步總結說：

社會利益的多元化，社會利益群體的多元化，必定導致社會組織的多元化，和政治協商渠道的多元化和規範化。現代政治體制本身必須以經濟多元化為前提，以政治多元化為基礎，在此之下，來建立一個適應於這種多元基礎的上層建築。

鮑彤說：

當時的情況，沒有讓我們把這個問題充分研究和展開，沒有機會。但是紫陽心裏的那些想法，從他尊重社會主體的自主權、到社會各界共同協商，一直到把這個問題歸結到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來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我們可以看到紫陽思想中的人本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東西。紫陽這個思想對我們有很大的啟蒙意義。如果以後我們再遇到類似的問題要研究的話，可以從這個裏面來做文章，可以得到很多的教訓。

三、鮑彤的信：「七所八所」是個大問題

1980 年代後期，公權力的腐敗尚沒有像 20 年後這樣嚴重，但是已露端倪。來自各方面的信息已經說明，腐敗有可能發展成為中國社會未來最大的不穩定因素。腐敗的總根源在於權力不受監督。當時，幹部「發財」主要鑽兩個空子：一是一些幹部利用在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當中的計劃價和市場價雙軌並存的機會，倒賣批文或計劃內物資，低價進，高價出，伺機牟利；二是在市場經濟開始向人們提供前所未有的獲利機會情況下，一些掌握資源的機關，特別是審批權的掌握者，趁機敲詐勒索，「沒有好處不辦事，得了好處亂辦事」。

中共十三大之後，中央開始把反腐倡廉作為自己工作的重點之一。趙紫陽在他的回憶錄中談到了這項工作的出發點，他說：

關於腐敗和反腐敗的問題，這是 1988 年形勢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如何看待和解決這個問題，如何把反腐敗、廉政建設的問題作為一個契機，把改革開放推向深入，而不是被反改革的人作為借口恢復舊體制，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1988 年春節我在廣州看到一些材料，在改革開放中發生了不少權錢交易這類事。不能說這是改革開放帶來的，但也應該承認，這同經濟轉型時的環境有關係，不能迴避這個問題。當時我提出「經濟要繁榮，政府要廉潔」。認為解決腐敗問題非常重要，不注意會給反對改革的人一種口實，人民群眾也不滿意，後果很嚴重。鑒於這是新形勢下產生

的，解決這個問題不能用老辦法。首先要研究清楚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才能有效解決問題。[267]

1988年下半年到1989年2月，中央書記處會議多次討論了反腐敗問題，認為，解決腐敗問題，最根本的是解決透明度，解決民主監督問題，包括新聞監督、輿論監督和司法獨立審判，關鍵還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因此，中央把研究這方面問題的任務交給了新成立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

怎麼解決透明度和民主監督的問題？1988年2、3月間，鮑彤看到一份介紹黑龍江哈爾濱市農業銀行搞了三年的農貸公開的經驗材料。當時的農業銀行貸款對像主要是農民，農業項目。給農民放貸款，難度最大，群眾意見最大，吃、拿、卡、要問題也最多。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們探索著搞公開。開始還只是公開農貸結果，貸給誰了，貸了多少，貸去幹什麼用。後來逐步發展，申請農貸要具備什麼條件，需經過哪些程序，貸款利率是多少，回收結果如何，統統公開。結果，全行連續三年貸款平衡，而且把積欠的兩億多貸款收回了。搞得最好的是肇東支行，三年貸出去9,000多萬，沒有發現一筆有營私舞弊的，沒有一起農民告狀的。這個材料啟發了鮑彤。政改研究室馬上組織了一部分力量，到地方、基層調研，開座談會。

4月，鮑彤帶領政改研究室的研究人員們分赴多個省市，開始了密集的調研和討論。研究室的孫方明、高山、吳偉、張偉等在鮑彤帶領下去了江蘇、浙江兩省的幾個城市，分別與省委領導、地方幹部、企業人員進行座談。在調研的基礎上，鮑彤給趙紫陽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紫陽同志：

我建議通過開放基層政府的辦事制度，來解決這些單位工作人員的弄權瀆職問題。

當前群眾強烈不滿的具體問題，很多發生在基層的稅務所、工商所、公安派出所、交通監管所、房管所、糧管所、供電所、計量所以至為群眾安裝電話的郵電所等所行使國家行政權力，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基層單位——浙江稱之為「七所八所」。找它辦事情，它就或明或暗地開出各種「條件」，勒索要挾，弄權瀆職，

【267】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175頁。

沒有好處就不為群眾辦事，得了好處又亂辦事。有的「好處」被中飽私囊，有的則作為本單位的「福利」或「收入」。這個問題，帶一定的普遍性，群眾中議論很多。有些性質很嚴重，情節惡劣，令人憤慨。這個問題，不同於我們通常所說的行業不正之風。因為，這些部門不是普通的行業，而是政權的組成部分；性質也越出了職業道德範圍，不是風氣正不正的問題，而是瀆職違法的問題。

這些基層單位，點散，線長，面廣，人雜，管理確實不易。他們處在第一線，直接處理社會事務。這些單位中的大多數同志都是好的，工作很辛苦。但只要有少數人弄權瀆職，就會直接損害政府和群眾的聯繫，敗壞政府的聲譽。

這類問題之所以屢屢出現，有很多方面原因，有幹部素質和教育問題，有紀律鬆弛和監督不嚴問題。我認為，當前要著重抓開放辦事制度這一條。二中全會已經提出，要「盡可能地開放政府各部門的辦事制度，便於群眾監督。」這件事，可以首先從上述基層單位做起，條件成熟後再向上級部門擴展。因為基層處理的問題比較單純，不像審批建設項目、物資供應、決定投資方面那樣複雜（需要在改革過程中逐漸形成規範）。上述「七所八所」承辦的事情，諸如轉戶口、收稅、發放或吊銷營業執照等等，實際上都已有了具體的規定。問題是群眾不知道，經辦者就有空子可鑽，任意胡來。可以考慮採取三條措施：(一) 把現行的法規彙集起來，開出單子，如能作些修改補充，更好。(二) 公諸於眾，承辦者一律依此辦事，群眾也有權依此監督。(三) 把辦事的結果出榜公佈，如能公佈受理的時間和處理的時間，更好。這三條並不複雜，如能辦到，將形成並強化新的監督機制，推動基層政權走上依法按章辦事的軌道。黑龍江省委辦公廳反映，肇東市去年發放 2800 萬元農貸，採取張榜公佈的辦法，至今尚未發現「以貸謀私」的問題。可見即使僅僅把現行法規或辦事結果公諸於眾，都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改進。這樣，有利於保持政府的廉潔公正，有利於訓練和考核幹部（最近抽調的五十多萬幹部中，將有一大批進入這類崗位，應當把辦事法規和辦事紀律作為崗位前訓練的實際內容），有利於提高政府辦事的效率和透明度，有利於加強群眾的監督，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不少發達國家已經這樣做了，有的發展中國家（如土耳其）近年來也在這樣做，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做得更好。

以上意見，我在四月二十一日向書記處彙報過。如大體可行，政改研究室擬配合監察部和其他有關部門研究一下，抓一兩個市，進行試點。當否，請指示。

鮑彤

1988年4月26日

趙紫陽閱後，將鮑彤的這封信批轉給了其他中央常委和書記處成員。

鮑彤在這封信中提到的三條措施，其實他在較早之前就已經提到過。筆者在筆記本的記錄中查到，1987年4月20日晚上，中央政改辦討論「群眾對政治體制改革有什麼要求」這個問題，鮑彤曾經談到土耳其反對官僚主義的三條經驗，就是首先要減少政府部門；其次可以規定，凡地方能解決的問題就不要拿到中央來，中央管的問題要減少到最低限度；第三是規定好辦事程序，把老百姓最關心的那些事情的辦事程序固定下來，並公開，由主管部門去辦。鮑彤認為，政治公開化，老百姓是蠻感興趣的。要實行制度化，增加黨與國家活動的透明度，讓老百姓能夠識別與監督自己的領導人。他強調，要不斷的擴大對話渠道、民主渠道、監督渠道，使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有更多的瞭解，使領導者瞭解被領導者的要求，使被領導者瞭解領導者的活動，這在社會主義社會，是不可或缺的。

鮑彤信中提到的三條措施，後來被中央政改研究室總結成「兩公開，一監督」，即在直接為群眾辦事的，包括工商所、稅務所、派出所等被稱為「七所八所」那些基層政府機構，實行公開辦事制度，公開辦事結果，依靠群眾監督，推進廉政建設。不久，經中央政治局討論同意，從1988年6月起，「兩公開，一監督」在北京、上海進行試點。試點的具體地方，都選在了最繁華的地區，北京是東城區的王府井、天安門、北京站，上海是黃浦區的外灘、南京路。實行一段時間後，進行了民意調查，群眾滿意度都達到70%到90%以上。試點單位都反應，一是廉潔了，二是辦事效率提高了。

1988年5月16日上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趙紫陽在談到廉政工作問題時說，要保證黨內機關的廉潔，要作為一件大事要抓紮實，不搞運動，不要全國統一部署，總口號是黨政機關要廉潔，但要和企業劃開不要搞在一起。在這個口號下不做統一部署，由各地各部門自

己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要求定措施，通過正常的機關、正常的渠道來做，公安、監察、檢查等形成正常的制度，不要提黨風，不要搞運動，要求要明確。在此之下，各地因地制宜，扎扎實實的去抓。

1988年10月10日，趙紫陽聽取了北京市東城區廉政工作的彙報，他充分肯定了東城區的做法。在談到廉政制度建設時，趙紫陽說：「你們的兩大措施，公開辦事制度和設立舉報站，都很重要。但要真正搞好，並不那麼簡單，必須有一系列配套的東西。有了辦事制度，是否真正執行，需要監督檢查。有了舉報站，是否真起作用，也要有人去查，總之，不能使這兩個新的東西變成形式。」

在我的記憶裏，那段時間還發生了另外一件有關反腐倡廉的事情，值得寫在這裏。

1988年4月間那次去浙江杭州進行廉政建設方面的調研，鮑彤帶領我們一下飛機，就被當時的浙江省委書記薛駒直接接到了省委常委擴大會的會場。剛剛坐下，薛駒就問：鮑彤同志，聽說上海市黨政機關都在利用各自的資源為本機關搞創收，我們浙江可不可以也這樣搞？鮑彤聽到這個情況後，考慮了一下，說，上海的情況我不是很清楚。對這件事情，我的看法是這樣的。第一，我們各級政府的幹部，是國家公務員，不是浙江公務員、江蘇公務員、上海公務員。第二，各級黨政機關掌握的權力和資源，是國家給予的，用來為人民服務的，不應該拿來為本部門服務。第三，我們現在應該考慮的，是怎樣為廣大群眾增加收入，而不應該先考慮如何利用手中資源為本部門幹部增加收入。第四，幹部的收入也應該增加，但應該由國家統一考慮和安排。在會上，鮑彤還根據大家的提問，就他的看法做了詳細的說明。

本來鮑彤和我們還計劃去上海調研，發生這件事情以後，上海就決定不去了。回到北京以後，4月24日，鮑彤在向趙紫陽作調研彙報時，談到了此事。過了兩天，老鮑告訴我，紫陽已經給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268】打了電話，要求上海市黨政機關搞創收這件事情馬上停止，不要再搞下去了。在此後的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趙紫陽再

【268】江澤民（1926-）：江蘇揚州人。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上海市委書記。1989年「六四」事件以後，受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王震等元老物色中選，接替趙紫陽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次重申了這個問題。4 月 29 日，江澤民在上海市人大常委會上，也就禁止黨政機關經商問題講了話，後來發表在人民日報上【269】。

這次出現的黨政機關經商辦企業之風，是當時改革大潮中出現的一個不和諧音符，確實給改革，給黨和政府的形象造成了不良影響，產生了比較嚴重的後果，幸好及時被中央所瞭解並果斷進行了制止，才沒有造成更大的影響和損失。2010 年，我曾經看到中央馬列編譯局一位姓高的先生寫的一篇文章，認為，趙紫陽「是全民經商的始作俑者和主要推動者，包括軍隊、武警、公安、檢察、司法、法院等權力部門經商。這種做法嚴重削弱了國家政權機構的執政能力。」看了這個說法，我不禁愕然，不知道這種說法從何而來，根據又是什麼？現在回過頭來總結黨政機關經商問題的經驗教訓是必要的。但是，說趙紫陽是國家機關經商的「始作俑者和主要推動者」，不僅沒有事實根據，而且嚴重地損害了趙紫陽的聲譽和形象，我對這種說法感到憤慨。

四、思想政治工作：是「改造」還是「改進」

「思想政治工作」或稱「政治工作」，是按照列寧斯大林建黨思想組建的共產黨組織的一大「發明」，後來又被中國共產黨推向了極致。按照中共傳統的解釋，它是指「以人為對象，解決人的思想、觀點、政治立場問題，提高人們思想覺悟的工作」；按照現代的帶有一些貶意的通俗說法，就是對「群眾」實行「洗腦」，「用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用黨的理論、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去教育群眾，爭取群眾」。自中共成立的近一個世紀以來，特別是確立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以後，思想政治工作逐漸成為黨的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即便是到了改革開放時期，中共仍然沒有放棄這項工作，仍然將其視為「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途徑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搞好經濟工作和其它一切工作的有力保證。」

中共十三大以後，趙紫陽作為中央總書記，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落實十三大報告各項內容，特別是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但是，他的政治對手們並沒有放棄對他的攻擊，其中一項，就是說他「不抓思想政治工作」。而在基層落實黨政分開，撤銷黨的專職機構、

【269】見 1988 年 5 月 2 日《人民日報》。

減少專職人員所遇到的阻力，也在很大程度上來自「黨委要抓思想政治工作」這個似是而非的說法。

面對這種批評，作為一個從戰爭年代走過來的老共產黨員，趙紫陽並沒有，也不可能直接否定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但是，他認為傳統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內容、方式，在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已經過時，所以，他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一個口號:「改造思想政治工作」。

1988 年 4 月 24 日，趙紫陽在和鮑彤談話時說，思想政治工作不是不要搞，當然要加強。但是這個加強，不能走老路，而是要走出一條新路來。毛主席當年不是提出要改造我們的學習嗎？我看思想政治工作也要改造。我們一方面講改革開放，另一方面也得講理想道德士氣。我們今天的時代精神不能渙散，而是要凝聚起來，要有個中心。現在提黨政分開有人說不抓思想政治工作了，這是誤解。我們現在處於撥亂反正當中，要糾正過去扭曲了的東西。現在物質的東西我們還不豐富，能給人民的不多，精神方面也沒有東西給群眾，這不行。但是，趙紫陽認為，過去的那種學文件、念報紙的一套思想政治工作已經不適應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思想變化，我們又要同過去相銜接。所以，只能在舊的方式基礎上進行改造。

趙紫陽說，任何國家都需要同心同德，不能離心離德。過去幾年搞撥亂反正批左的東西應該是破，但是我們還應該有新的凝聚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我們的民族遺產要研究。過去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要求太空、太高，做不到。要組織一個班子進行研究，總題目就是「加強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不能讓人感覺黨中央只抓物質不抓精神。要從調研摸清現狀做起，一是講必要性，二是抓什麼，三是怎麼走出一條新路子。這件事要搞，如果能搞好，可以作為三中全會的文件提出來。如果不行，能提出問題也好。

5 月 9 日晚，在趙紫陽的住處，鮑彤彙報工作的時，趙紫陽再次談到思想政治工作問題，他說，思想工作一定要圍繞著四化建設、企業發展等等來搞，精神和物質方面的努力要相結合。研究思想政治工作，要研究怎麼能讓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有點積極性。湖北有一個於治安【270】，他講廠長不做思想工作，廠長就當不好，應該去瞭解他們的經驗。如何使搞政工的同志積極性能夠調動起來，現在這一套辦法不

【270】時任武漢汽輪機廠廠長、黨委書記。

行，讓他們有點樂趣、精神支柱，籠統講不行，要統一到時代上來，要實現這個任務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強國，我們才有地位。要有緊迫感、危機感，為中華民族爭光，在這個大背景下再講如何處理個人與國家的關係，講獻身精神，全部思想政治工作都要按照這個調子來調整。

趙紫陽說，由此立論，道德標準、評價標準都要立標準了。這是具體的愛國主義，50年後的中國取決於這一代和下一代，這是關鍵。個人民主、自由離開了這一點不行，圍繞這個大前提就可以。要從祖國興衰的角度來打開眼界，現在有些人眼界很窄，這不好。過去籠統說這個那個渺茫也不行。老實地講，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不是現階段中國最需要的，中國最需要的是把全民凝聚起來，實現四化。我們和相當一部分人有分歧就在這裏，完全聽任個人主義和民主思潮氾濫就要出問題。你們看能不能這麼立論，把問題講清楚。

趙紫陽又說，過去我們講團結，到頭來物極必反，現在要反過來。我們民族確實有一盤散沙的劣根性，這樣下去是沒有希望的。我們的核心問題是能不能引導人民凝聚起來，我們的說法要有說服力，沒有說服力就沒人聽你的。每個中國人，只要你承認中國要振興，就要在這個大前提下努力，符合這個方向的就是真善美。你提倡的東西對四化沒有好處就不需要。

趙紫陽特別指出，我們現在確實有反封建的任務，但不是簡單的重複。當然也要提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過與過去所說的不同。我們反封建、反自由化是從不利於四化的角度立論的，這是靈魂。思想工作既不能走老路子的僵化，也不能走自由化。不否認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這些可以和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相結合。改造思想政治工作也要講恢復老傳統。過去思想政治工作幹部會關心人，後來搞成整人批判人；過去是對人民內部，後來思想政治工作是對人民的敵人，現在要恢復它團結和教育人民的作用。現在要把過去好的東西恢復起來。

探索出一條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由此成了十三屆二中全會之後中央高層工作議程中的一個重要議題。按照趙紫陽的要求，鮑彤領導中央政改研究室立即開始著手就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問題進行研究。當時中央政改研究室同時進行著三個方面專題的研究工作，由三位主

任分別負責。一是加強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專題，由鮑彤負責；二是建設與權力下放專題，由賀光輝負責；三是工會改革，由周傑負責。全室研究人員也由此分為三攤，稱為「專題組」。鮑彤負責的思想政治工作這個專題組，有陳群林、李元、孫方明、唐欣、周大力、吳國光、吳偉參加。到了 6 月份以後，中央確定十三屆三中全會要通過一個加強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文件，正式成立了文件起草組，又增加了中央其他機關的幾位筆桿子，龔育之、陳進玉、吳稼祥等。

4 月 26 日專題組的分工會，在傳達了趙紫陽關於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想法以後，鮑彤說，紫陽考慮，如果有可能把思想政治工作問題作為三中全會的議題，大體上用半年時間，看看能不能搞出個文件來，要像過去搞總體設想那樣經常向中央領導彙報。鮑彤說，思想政治工作是個很大的題目。我們提出黨要管黨、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兩手抓。思想政治工作，改造這兩個字很有新意。黨政分開以後，過去一些爭論不休的問題，重新以新的形式出現。如提高政工幹部的待遇、職稱、編製、機構等等。我們應該從改革開放的角度來研究新問題。這個方面的問題現在有用的材料不多，要走出去，搞些調查研究。

4 月初，政改研究室派出李元、周大力等幾個人赴廣東調研，鮑彤向他們提出的任務之一，就是全面瞭解深圳大學在學生自治自律、黨委的工作方式和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經驗和創新。他們回來後，4 月 30 日，在全室進行了專題彙報，讓人大開眼界。

深圳大學是 1983 年創立的一所新大學，短短幾年內，學校就在機構設置、學生管理、團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等許多方面走在了全國大專院校前面。這個學校的最大特點，是近 60% 的學生參加社會活動。學校設有學生自律委員會，學生自己解決學習生活中的矛盾和糾紛。學生自己有律師、審判員、銀行。深圳大學的新聞系，他們自己辦一個報紙，老師帶著學生一邊學習一邊實踐。學校的黨委辦公室、校長辦公室都是學生值班，連打掃衛生的都是學生，沒有專職人員。當時的教職工與學生比例是 1：8，而國內其他大學卻是 4：1。學校的學生導師，不是由學校進行分配，而是由學生自主選擇。這個大學的學生們有一句話，讓鮑彤和我們這些研究人員們印象深刻，學生們說，北京青年過著壓抑的生活，而我們這裏都是人。北京學生淨搞政

治，總想當總書記、當總理，我們想當的是基層店經理，並且把它當好。

鮑彤在聽了深圳大學思想政治工作彙報之後，連聲讚歎。他後來在一次對吳國光談話中說，這本身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格局的大變化。學校裏沒有人專門做別人的思想工作，黨委書記是選舉的，黨委委員是兼職的，黨員在學生中形象高大。人人自己教育自己，大家互相教育，這代表了我們思想政治工作中最寶貴的東西。像我們傳統的這種思想政治工作，總是你教訓我，你教育我，改造我，會形成嚴重的逆反心理。而他們那裏每個人都積極主動，學習怎麼做人，將來怎麼進入社會。鮑彤認為，這些試驗也不是沒有缺點，但從中可以看出新路子。過去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子就是設專職黨的幹部、專職政治輔導員，就政治論政治，空對空。鮑彤認為，加強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重點，是企業和學校，學校主要是大學。【271】

5月3日下午，專題組開會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的課題計劃。在會上，鮑彤談了他對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看法。他說，宣傳工作我們黨是有經驗的，但是現在幹部不滿，群眾也不滿意。過去抓的是群眾最關心的問題，現在提什麼口號能抓住人心？我覺得從深圳大學的經驗裏能得到啟發。我們應該到改革搞的最好的企業、學校去看看，看看那些地方是怎麼搞的。

鮑彤認為，思想政治工作要改造，不改造沒有出路，群眾失望，沒有吸引力和凝聚力。過去搞的再壞、水平再低是能抓住人心的。我們現在群眾要解決的沒有人抓，而群眾失望的東西我們無力管，群眾喜歡的東西我們卻在扭。要群眾這樣做那樣做，搞不好會產生逆反心理，反宣傳幫倒忙，好像一講思想工作就是講意識形態。現在一談到思想工作，相當一部分同志有灰溜溜的感覺，一些同志對思想政治工作有本能的反感，為什麼？是我們還沒有給它增加新的內容。思想工作者和對像之間有一種距離，主動的東西少，被動的東西多，支持群眾的主動精神少，空洞的、灌輸式的與群眾的願望背離的東西多，抽像的東西比具體的東西多。

【271】參見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97年8月第一版，第510-511頁。

鮑彤說，過去在社會鬥爭很簡單的情況下，我們一個口號可以把幾億群眾動員團結起來。現在社會出現複雜的多元化的情況下，思想工作就不是我們的長處了。深圳的經驗很好，它的整個思想工作都是社會業餘的，形成網絡式的綜合體系。而我們現在還是老辦法，從上到下灌的系統很強，老路子走不下去了。如果不把人的積極性、主動性發揮出來，人就始終處在壓抑狀態，這種情況在深圳大學生的發言中已經反映出來。現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把一切有用的方面都調動起來，彙集到我們的大目標中去，要研究，不是要思想工作的對象適應我們，而是我們要適應新的對象。

5 月 4 日，中央宣傳理論工作領導小組在中南海勤政殿小會議室開了一個小型的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問題座談會，團中央、全國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等方面的一些領導和幹部參加了座談。會上，鮑彤首先談了趙紫陽的一些看法。他說，紫陽最近提出了一個新題目叫做「加強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改造兩個字是紫陽說的。紫陽說我們是發展中國家，問題很多，如果引導人們都去爭個人利益就很難有凝聚力。現在這種情況在發展。我們的工作一方面要講政治路線，另一方面是不是也講講理想道德，在舊社會也講道德嘛。有人說，黨政分開以後不講思想政治工作，這是誤解。當然要講價值法則、按勞分配，但是也要講思想政治工作，在新形勢下如何做思想政治工作。黨的建設是個很大的問題，精神文明建設也是個很大的問題。現在專講思想政治工作的解決，一是講必要性，二是抓什麼，三是路子怎麼走。不僅要加強，而且要改造，不改造就沒有辦法加強。老一套的脫離實際沒人聽的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削弱，不能加強。

鮑彤說，中國人的精神力量、精神支柱到底是什麼？中國民族文化遺產有哪些要發揚？不能只講西方的個人主義，中國要發展奮鬥沒精神力量不行。但是，新時期要走新路子，靠說教、鬥爭都不行。這個問題很廣泛，是否著重研究一下工廠和學校。現在提出思想政治工作很有好處，如果形成一個文件不行，能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引起各級黨委注意也是好的。

鮑彤接著說，現在提出這個問題，如果按老路子，恐怕有很多人要搭這班車，隊伍、職稱、班子、專職人員等等。現在看，思想政治工作的隊伍本身就需要改造。有人提出重建思想政治工作隊伍，方向

是兼職化、社會化、群眾化，我看不錯。思想政治工作過去是我教育你，你是被教育對象，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是分離的。深圳大學改變了這種情況，沒有專職的政工幹部，每一個學生都是主人，處於能動地位，沒有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分。誰都是教育者，也都是被教育者，自我教育自我管理。我們多年來這種舊的思想工作方式造成一種逆反心理，思想政治工作你自己都沒有做好，你還來幫我？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劃分是過去在秘密鬥爭狀態下形成的。現在大眾傳媒很發達，一個精神很快就讓全國人們都知道了，再講先知後知的劃分顯然是不行了。

鮑彤認為，利益關係的變化也帶來觀念的多元化，思想教育、政治性的東西要和傳播知識趣味性的東西結合在一起，和經濟工作結合在一起。思想政治工作不能離開勞動，利益。過去用唯物主義標籤搞唯心主義的東西，要改造，把唯心主義的東西去掉。一個是勞動，一個是利益。尊重勞動，尊重利益，這是思想工作最有活力的一個因素。讓群眾有掌握自己命運的感覺，就是頭等的思想政治工作。思想工作的標準也應該貫徹生產力標準，要講質量，講勞動態度。

鮑彤指出，政工幹部現在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一個利益集團、政治集團，有自己的一套觀念，拿這個東西當飯吃，離開這一套就活不下去，別的東西他不會幹。這要改，就要首先解決這些人的問題。這部分人大概有上百萬，成為長期掌握著一定權力、有共同的思維方式的所謂思想政治工作隊伍，對這個隊伍要改造。

在 5 月 16 日、19 日兩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趙紫陽又多次談到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問題，他說，人的問題都有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做，思想工作不是簡單的加強問題，而且還有個改造的問題。毛主席講改造我們的學習，我們的思想政治工作也要改造，要走出一條新路子。思想政治工作，特別是基層黨政分開、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以後，如果不以廠長為中心搞是沒有前途的。有些黨的幹部就不懂得，思想政治工作離開生產能起作用嗎？有些同志在爭，他爭的不是思想政治工作，而是爭權爭地位，這一點要解決。

趙紫陽要鮑彤親自帶人去天津海河塑料廠去做一下調研，認為這個廠的「學問很大」。趙紫陽說，你到那裏去看一看，根本分不清哪件事是思想政治工作，哪件事是經濟工作。每個經濟工作中都有政治

工作，政治工作滲透到經濟工作中，人盡其才，多餘的人不開除，但也要下來，在工廠內安排，把工人擁有的地位和廠長權威相結合。經濟工作和政治工作結合生動活潑，分配、承包、個人積極性都調動起來，真正使工人當家作主，非常注意個人的志趣和積極性，好多都是由自由組合的。對這一點你們要進行調查，總結一下經驗。

5 月 30 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趙紫陽在會上正式提出，要搞一個加強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文件，並將其作為三中全會的主要議題之一。他說，我們要有一個精神支柱，實現四個現代化、振興中華要以此來維繫。在這個大目標下需要講個性、講民主、講自由，離開了這個目標再講個性、民主、自由都是有害的。改造思想政治工作，要繼承黨的民主主義傳統，反對假大空。黨的工作者要成為群眾的知心人，黨務、行政、業務工作者都要做思想政治工作，要形成一個專門的文件。

這次會後，鮑彤親自帶吳國光、周大力等人赴天津多家企業進行調研。同時，派吳偉等幾個人去武漢，到受到趙紫陽讚揚的武漢汽輪機廠同廠長兼黨委書記於治安座談。吳偉一行還去了武漢照相機廠、武漢汽車發動機廠、武漢鋼鐵公司、武漢毛巾廠，同這些企業的廠長經理、黨委負責人、普通工人代表、工會代表就思想政治工作問題進行了專題座談，並專門召開了一個全市的困難企業座談會，瞭解困難企業如何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情況。專題組通過這些調研和座談，瞭解了在企業實行黨政分開之後，如何開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大量第一手情況，同時也聽到了第一線政治工作者們的對當前思想政治工作的真實反應。

武漢調研歸來之後，6 月 14 日鮑彤召開了專題組會議，會上由吳偉介紹了武漢汽輪機廠和其他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開展情況，提出他們的主要經驗，就是思想政治工作要以生產經營為中心，變兩張皮為一股勁。生產經營的主體是人，人的精神對生產經營影響極大。要調整政工機構，減少專職人員，使黨務工作和政治工作業餘化、群眾化。會上，鮑彤評論說，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項大任務，就是調整人與人的關係，減少相互摩擦。這靠派人去做是不行的。在群眾自己的隊

伍中形成先進力量才能起作用。所以，不能搞專職。專職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員，用少奇[272]在七大上的話來講，是「階級游離分子」。

進入5月份以後，中央常委連續召開多次會議，開始討論物價闖關問題。趙紫陽提出，現在到了一個關鍵時期，各方面的工作必須為改革創造條件。新時期改造和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問題，要作為三中全會的重要議題，把保障價格改革的內容加進去。

6月初，北京大學發生了一起較小規模的學潮。起因是北大一研究生與社會青年打架，傷重致死。一部分學生借此為由發動遊行到公安部。遊行中有人提出了要共產黨下台，國民黨回來，認為中國現在到了最黑暗的時候，提出要算總帳，揚言繼續擴大遊行規模，並點了一些中央領導人的名字。在中央常委會上，趙紫陽在提出公開案情，講清事實，依法處理的同時，也提出要研究北大這類高校如何辦，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如何改造的問題。

6月13日下午，趙紫陽召集胡啟立、陳希同[273]、何東昌[274]、汪家道[275]、鮑彤等人開會，討論了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如何改造的問題。會上，趙紫陽說，思想政治工作要改造。過去一講加強，就是老一套，一是整人，二是訓人，沒有人願意聽，惡性循環，沒出路。北大學生自己寫了一份大字報，我看就很好，講了北大文化，有十條之多，很多人認為寫得不錯。許多話為什麼不能讓群眾自己講，偏偏要讓領導去講？為什麼不去武裝先進分子，爭取中間，孤立少數？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爭取中間，學生中的大多數不是反動的，而是存在糊塗觀念。壓一壓是必要的，但你老去壓它，就不行，一有問題就爆發。現在學生中有不滿情緒，要正確引導，讓學生找到自己的位置。

【272】劉少奇（1898-1969）：湖南寧鄉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前期的中共主要領導人之一，文革前是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劉少奇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力主擁戴毛澤東，而成為毛指定的接班人。五十年代他對毛澤東「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等運動持不同意見，毛澤東因此發動文化大革命，把他迫害致死。1980年後獲平反並恢復名譽。

【273】陳希同（1930-）：四川安岳人。時任國務委員、北京市市長。1989年「六四」事件中以中共北京市領導的身份，對促成武力鎮壓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六四」鎮壓之後，代表國務院發表了《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1992-1995年任北京市委書記。1998年因貪污罪被判有期徒刑16年。

【274】何東昌（1923-）：浙江諸暨人。1978年任清華大學副校長；時任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1989年「六四」事件中對促成武力鎮壓學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275】汪家遒，時任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分管高校工作。

要向學生說清楚，你們關心改革，搞過了也可能變成干擾改革。要告訴學生，分配問題，要增加透明度，方案要置於學生監督之下，機會均等。走後門找職業，不是改革，是倒退！要像深圳大學那樣，讓學生接觸社會，有機會參加改革，這才是扎扎實實的思想政治工作。最後，趙紫陽再次告訴鮑彤，思想政治工作是三中全會的主要議題或是主要議題之一，你們要抓緊工作。

在中央北戴河辦公期間的 7 月 16 日，趙紫陽找溫家寶、鮑彤、張岳琦、龔育之、賈春峰等，談思想政治工作改造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研究問題。趙紫陽說，現在從自然經濟到商品經濟轉變過程中，各種社會現象都是值得研究的。鮑彤彙報說，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問題，政工幹部和政治工作的對象，在「改造」的問題上有分歧。現在搞得好的企業中，廠長和思想工作幹部都了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們對改造思想工作是能接受的。高校當中改造思想工作的難度比較大。在企業中雖然有難度，但因為要服從於效益要求，還比較一致。改造舊傳統的問題，傳統有不好的，起因是林彪【276】的四個第一【277】。要實現轉變，一是思想政治工作地位作用的轉變，從高於一切到從屬於黨的任務，二是從過於空洞的概念，轉到群眾迫切要求的問題上。要改變兩張皮，解決經濟改革、政治改革中遇到的一些實際問題。三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過去比較簡單。要從壓制、訓斥的關係，轉變到互相關心、同心同德的關係，團結、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做到關心人、理解人、尊重人。第四是從封閉到開放條件下，思想政治工作也要隨之調整。第五是政治思想工作是群眾性的工作，人人是政治思想工作的主體，人人也都是對象。

趙紫陽說，什麼是思想工作的好傳統，什麼是不好的傳統，要概括一下。有人認為是好的東西，也有人認為是不好的東西。不好的東西要拋棄，比如，有人一講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就要擴大機構、增加

【276】林彪 (1907-1971)，軍事家，元帥。黃埔軍校四期生。解放後歷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防部長、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職。「文化大革命」前期被毛澤東確定為接班人。後與毛發生矛盾，縱容其子陰謀暗殺毛，敗露後於 1971 年 9 月 13 日夜與妻葉群、子林立果等從山海關機場強行乘飛機外逃，在蒙古國溫都爾汗機毀人亡。1973 年 8 月中共中央決定開除其黨籍。1981 年 1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其作出判決，被確認為「反革命集團案主犯」。

【277】林彪提出的政治工作四項原則：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人員編制，這不是什麼好傳統，是應該去掉的。林彪認為政治第一，毛主席認為思想政治工作更重要。我們過去有民主主義的傳統，而後來就變成了兩張皮。改造思想工作，就是要恢復好傳統，撥亂反正；另一方面是適應新情況，要有新發展。要單獨搞個文件，提請三中全會討論通過。鮑彤提出，還是先搞個改造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文件，趙紫陽說也可以考慮。

就這樣，鮑彤主持的思想政治工作專題組，在7月以後改組為思想政治工作文件起草組，所起草的這個文件，也初步定名為《中共中央關於改造和加強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之所以僅僅把文件的適用限制在企業範圍內，而沒有涉及到學校，是因為在討論中大家認為，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由於實行了黨政分開和廠長負責制，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了。而學校相對之下就要複雜得多，幾次學潮的發生，學校裏西方思想的影響，學生中相對不成熟的政治意識和情緒，都讓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們為難情緒增加。他們對於探索黨政分開條件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新路子的牴觸情緒也較大，而過去陳舊僵化的老一套思想工作方式方法在學校還有相當的市場。因此，學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改造問題，暫時還看不很清楚，也說不很清楚。與其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匆忙形成規範，不如允許繼續進行探索。鮑彤後來在談到這件事情時說，如果沒有1989年那些事情發生的話，我曾經想在深圳大學先進行試點，積累了經驗以後，在全國高校進行推廣。但是很遺憾，沒有了這個機會。

起草組在北戴河對這個「關於改造和加強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進行了反覆修改後，於8月下旬正式提交中央討論。1988年9月3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十三大以後的第十一次會議。會議除了討論了國務院提出的價格改革方案以外，還討論了這個思想政治工作文件。

與會的政治局委員們首先討論了概念問題，是用「思想政治工作」,「思想工作」，還是「政治工作」? 最後多數意見，還是用「思想政治工作」的提法更好些。接著，李瑞環【278】提出，是叫「改造」，還

【278】李瑞環（1934-）：1982-1989年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後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是叫「改善」？如果用「改造」，也應該把「加強」放在前面。喬石說，贊成這個意見，並主張用「加強和改進」。

趙紫陽接著發言，他說，我做點說明。一開始我就是想用「改造」。政工這個概念在文革中很壞，講政工很容易讓人和專案相聯繫。這不改造不得了。當然可以照顧一下政工幹部的情緒，但這個問題長期不解決對工作不利。所以原則上要講改造，毛主席講改造我們的學習，講學風，講改造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既然這樣講可以，我們為什麼不能講改造？我贊成把加強放在前面，但要加強就必須改造。我的這個觀點一直很明確。不是要改造政工幹部，而是要改造工作。光講加強，不講改造，加強不了。現在機關、學校一個禮拜學習一次，幹什麼？罵人，散佈小道消息，學校看小說，這種政治工作，不改造是極大的危機。完全靠政工幹部去堵，去管，政工機關越搞越大。瑞環同志多次講要照顧政工幹部的情緒，我一直不完全同意。相信經過一段時間，會走出一條路來。對趙紫陽的意見，薄一波表示支持，說文革那一套一定要改造。

李鵬接著發言說，還是用「思想政治工作」這個概念好。學校當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存在多方面不適應的問題，比如，是黨領導還是方勵之領導？民主自由是不是政治問題？「改造」非用不可。要講改造，有些方法過時無效，就要講改造。思想政治工作要成為一項專業，政工幹部應該成為這方面的專家，不然隊伍不穩定。

接著，楊尚昆、田紀雲、李錫銘[279]等也相繼發言，表示贊成「改造」。趙紫陽最後總結說，這個文件原則通過，基本上是好的，但有些地方還要改一改。

儘管「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提法在政治局通過了，但在後來1988年9月30日，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討論這個文件時，對於是「改造」還是「改進」的問題還是產生了很大爭論，許多中委或候補中委對「改造」這個提法接受不了。主管宣傳理論工作的中央常委胡啟立向趙紫陽建議，還是不用「改造」這詞為好。趙紫陽考慮，與其在這個字面上來討論不休，還不如就改成「改進」吧。這樣，這個文件的

【279】李錫銘（1926-）：河北東鹿人。時任中共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1989年「六四」事件中以北京市領導的身份，對促成武力鎮壓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93年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名字在改為《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之後，獲得全會「原則通過」。

五、趙紫陽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秩序」

1988年9月2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放慢價格改革出台腳步的同時，趙紫陽提出，下一步改革的重點，要轉到治理環境、整頓和建立商品經濟秩序，深化和展開價格改革所必須的配套改革上來。這裏，他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後來成為十三屆三中全會主題的一部分。這一思想，不是他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幾個月來他一直在考慮的問題。

早在1988年4月下旬，趙紫陽在和鮑彤的談話中，就首次談到了這個問題。他說，最近我在考慮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的問題。這是個重大問題，其中既涉及宏觀又涉及微觀問題。微觀上要有法規、監督與及時對政府和企業行為做出規範，宏觀上要規定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關係。要有制度規定什麼合法什麼不合法，規定上級不能侵犯哪些權利，下級不能侵犯哪些，比如地方大包干以後可能出現地區封鎖操作市場的問題。要有法規和制度條條，否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初期那些混亂現象不可避免。應該組織專家研究和考慮。

5月9日晚，鮑彤在趙紫陽的住處彙報工作的時候，趙再次講到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問題。他說這個事要請馬洪、安志文來負責組織研究一下，中央政研室也要研究這個題目。現在不要忙於談具體內容。要研究一下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秩序這個概念能否成立？如果可以成立，大體上有幾個方面的工作，恐怕會涉及建立新秩序、所有制關係、利益關係、法制的規範和保證作用等等。提出這個概念有沒有好處？請大家提出總的看法來論證一下。

在5月30日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上，趙紫陽在會議上講了與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有關的十個問題。他認為，這裏面既包括物價、工資、金融和流通體制、企業效益、廉政建設、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等問題，也涉及觀念、經濟和政治制度、經濟運行機制、經濟和行政法規等。他說，為什麼資本主義的經濟欣欣向榮，而社會主義的問

題這麼多？就是在對計劃經濟進行改革以後，商品經濟秩序還沒有建立起來。

從趙紫陽的這些談話中可以看出，他對於中國的改革有了進一步的思考。中共十三大以後，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開始向縱深發展，政治體制改革已經起步，文化、教育方面的體制改革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趙紫陽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這個思想，是試圖站在更高的層次上，對已經提出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教育等改革的方針政策進行整合和概括，提出一個總方針、總思路，以更主動、更全面地統領和指導改革全局。在他看來，中國的改革是一個全面系統的改革。商品經濟（或稱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是中國各方面改革的基礎和前提；而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則是商品經濟制度建立和完善的保證。以「建設商品經濟秩序」立論，不但可以推動商品經濟機制的形成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而且可以同時帶動政治、社會其他各個領域的改革。

從5月中旬開始，鮑彤就按照趙紫陽的要求，在中央政改研究室佈置專人就商品經濟秩序問題進行調研和收集資料。5月15日，他在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召開的全國政治體制改革座談會上，第一次系統談到了他對「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題目下的政治體制改革」這個題目的思考。鮑彤說，在中國，建立商品經濟秩序有兩個方面的工作，一個叫做經濟體制改革，一個叫做政治體制改革，我們要在這個大題目下考慮我們的一切工作。他認為，這個大題目包涵著十分豐富的內容，比如政府行為規範、企業行為規範、政企關係規範、中央和地方關係規範等等。在這些行為規範當中，有法律法規，有制度規定，也有人們自覺的行為準則；這些規範，有靠國家制定的，也有在經濟、社會運行中自發形成的；有靠國家的強制力約束的，有靠市場和社會規則約束的，也有靠人們自我約束遵守的。而這一切，都要從發展生產力的標準、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標準來考慮。這些規範，涉及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道德文明建設等等。而建立這些規範和嚴格按照這些規範運行，並實行強有力的監督，是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最根本的內容。

6月25日下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開會，按照趙紫陽的部署，討論了建設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問題。鮑彤根據他這段時間來的思考，首先談了看法。他說：

紫陽出的這個題目很大，幾乎可以覆蓋我們現在做的一切。它到底應該包涵哪些內容，應該怎麼著手去做，現在還看不太清楚。我們要抓緊進行研究，看看到北戴河會議前後，我們能搞到一個什麼程度。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各種社會關係發生了較大變動，毛主席分析了形勢，提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觀點，給透過現象看問題提供了一把鑰匙。我們現在要提出的商品經濟新秩序問題，與歷史上的這個情況類似。改革中的社會利益變動，引起人們對一些方面的期望值過高。現在改革中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分配不公問題。當時提出先富起來的口號，沒有想到現在出現這種現象，和我們原來想像的先富起來的情況不一樣。改革初期沒有思想準備，現在成了社會問題。

又比如政府廉潔問題。當初提出搞活經濟時，也沒有想到出現經濟生活中這麼多消極的東西，貪污、勒索、受賄，這些問題應該怎麼看？到底在商品經濟發展中，這種現象是必然發生的還是可以避免的？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我們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廉潔的，但現在為什麼會出現腐敗？它是在什麼社會條件下會出現的問題，是否商品經濟發展起來，某個階段不可避免的出現這種現象？

又如缺斤短兩問題。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的序言中，就講到過這種情況。在商品經濟發達的社會中，商業信譽是至高無上的。在我們這種商品經濟不發達的社會，卻是「無商不奸」。西班牙18世紀的情況，也是官商勾結的。台灣60年代，商人也很恨政府，說是「太黑暗」。現在我們剛剛開始搞稅法，但稅制還沒建立起來，稅務人員執法不公，商人幾乎百分之百偷稅。搞典型抽查，查誰不查誰全看關係。在「國家利益」名義下，在「嚴格法制」名義下，幹的恰恰是違反法制的事。而商人認為偷稅漏稅天經地義。在商人行為、政府行為都還沒有規範化之前，這些問題都會存在。

那麼下一步發展還會出現什麼問題，使群眾對我們不滿？現在看得到的，可能是勞動制度改革，工人失業，企業真正到了自

負盈虧那一步就得這麼幹。我們現在企業機制的改革還沒有到位。一旦到位，遇到的根本問題就是企業的承受能力問題。紫陽最近反覆講到這個問題，所謂改革的承受能力，歸根到底是企業的承受力。而要提高企業承受力，就要把企業拋到商品經濟的大海裏，到市場上去競爭。現在我們還沒有走到那一步。一旦走到那一步，勞動結構優化，出現工人待業以後，又會出現什麼問題呢？

這些問題，到底在發展商品經濟過程中是不可避免的，還是可以避免的？紫陽曾經講過，現實中各種讓人不滿的現象，大體有幾種情況，一種是根本不可避免的，一種是經過進一步改革可以解決的；有的本身就不合理，但是有其必然性；還有一種是合理的，但我們的觀點不適應，把它看成是不合理的；有的靠社會主義制度可以解決，有的靠社會主義制度是解決不了的。要具體進行分析。我們講的商品經濟新秩序，涉及廣泛，經濟基礎、上層建築都包括在內。但主要的是什麼問題？我看不僅包括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秩序，甚至觀念與現實的和諧，也是秩序的一部分，也要一起來考慮。

紫陽講過，我們正處在從自然經濟、產品經濟向商品經濟轉變，從指令性性計劃向經濟自主和間接管理方面轉變的過程中。產業結構也要調整。過去的計劃經濟秩序經過幾十年的完善，基本是穩定的。現在向商品經濟轉變過程中，給我們的感覺是經濟秩序還不穩定、不規範。比如人事問題，過去是黨和政府一手安排的，沒有活力，但感覺穩定。現在講活力，看到在舊的秩序下，在產品經濟秩序下，個人在僵化體制下感覺自己的才能受到限制，無法支配自己的命運，施展自己的身手。現在搞商品經濟，各種生產要素就要流動，搞活。搞活以後既有了機會，又帶來了風險。最明顯的表現是大學生分配製度的改革。前幾年要改革人事制度，不包分配，現在實行了，可有人又適應不了。現在是兩種體制並存，一部分人有鐵飯碗，另一部分人沒有。在幾十年的停滯之後，有了發展，有了改革，但也帶來了社會動盪，這是一些什麼樣的問題呢？

研究商品經濟新秩序，就是要研究這些問題。要把現在和今後可能出現的各種現象，放在歷史環境的背景下，結合改革的發展進程來加以研究，說明人們普遍關心的東西。

在討論中，大家又對鮑彤的發言進行了補充。有人提出，不僅有體制的轉變，產業結構、社會結構轉變，還有一個從小商品經濟向大規模、現代化商品經濟轉變。沒有這個轉變，從人治向法治轉變就不可能。資本主義的這個轉變，是在現代化商品經濟基礎上實現的。現在我們封建壟斷和大壟斷構成並存，國家要引導、調整的不是市場，而是地方政府行為，要真幹就要解決這個問題。這是攻堅，有幾種前途。第一是走上坦途，第二是混亂，甚至發生高通貨膨脹率，第三是流產。看來，前一種可能性較大，但需要有明確的認識和正確的決策。

7 月 28 日下午中央政改研究室例會，再次討論商品經濟秩序問題。討論中有人談到，計劃經濟的核心是權威，商品經濟的核心是信用。現在經濟生活中大量發生違約、毀約、破壞合同造成的磨擦，根子在哪裏？需要研究。接過這個話頭，鮑彤作了發言。他說：

從法律上、思想意識上上都有不適應的問題。過去的宣傳帶有理想色彩，好像社會主義建立了就什麼都好了，改革以後就什麼都好了。改革，可以解決很多問題，但是又會產生很多新問題。人們對搞活前存在的問題不滿，對改革後又產生了新的不滿。世界上十全十美的東西沒有，只有利益的比較，利益大的就幹，這是生產力標準。在這種情況下，關鍵要看是前進了還是退步了，是前進中的問題還是後退中的問題。誰都承認現在進步了，但是比較的參照系，都還是60年代外國的，參照系是混亂的。

在大變革中，每個人、每個組織都要找到自己的位置，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各就各位、各司其職，政治體制改革也是如此。現在是有的人和組織還沒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每一個矛盾都拿到最高層去解決。中辦、國辦、信訪每個月 20 幾萬封群眾來信，實際上邊是解決不了的。改革深入有更多的風險，更多的機會，大家都看機會，而閉眼睛不願意看風險。比如要是沒有充分的準備，下一步價格、工資改革就很難，風險很大。

承受能力關鍵在企業，企業有什麼樣的準備？過去紫陽作報告時說，改革對企業意味著什麼？當時沒打破大鍋飯，是在喊「狼來了」，現在要進行物價改革，狼真的來了。企業要改造，要真改造，把企業放到市場競爭中去。現在的企業還不適應，企業搞得不好，不去找本單位的問題到底在哪裏，都是怨政府，使人感到政府每天是坐在火山口上。要這樣提出問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

對企業意味著什麼？意味著更大的機會，更多的收穫和更多的風險。對此，要有準備、有認識。過去多少年來，低效率的計劃經濟給了人民穩定感，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失業，人人都有飯吃、有衣穿，大鍋飯，人人平等。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搞商品經濟，經濟發展快了，但是人們反倒不適應了。

但為什麼現在搞了法制，反而使人感到不公正了？表面上看過去貪污腐化沒有現在這麼嚴重，但人民公社下的問題還少嗎？超經濟的平調、侵佔現象很平常，只不過是在公有制的幌子下。出污泥而不染的情況很少。要有一種選擇，是準備摘這個果子，但摘下來還是有問題。現在是政府替老百姓選擇，產生的利益誰都不講，悶聲大發財，一量出了問題，誰都埋怨。現在是兩個問題共存，加強這方面，那方面又有問題；貪污而有效的政府或許還可以接受，貪污而無效的政府就讓人更難以容忍了。我們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也不能理想化。

從 1988 年 5 月中旬開始，中央的主要工作開始圍繞「物價闖關」進行，趙紫陽的注意力也轉移到物價問題上來。這一期間，他在講價格改革的同時，不斷強調價格改革的配套問題，強調必須通過配套改革為價格改革創造必要的條件。實際上，他講到的為價格改革配套的一系列問題，從另一個角度說，也都是建立商品經濟秩序的基本內容。直到 9 月初，中央決定放慢價格改革步伐之後，趙紫陽再次提出了治理環境、整頓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問題，並且成為十三屆三中全會的主題。

六、全國政治體制改革座談會

十三大後，各地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的工作，都逐步開展了起來。進展情況不盡相同，做法也不完全一致。為了總結交流十三大後半年多的政治體制改革的經驗，瞭解、研究政治體制改革在推進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探討解決問題的辦法，經中央批准，中央政改研究室於 1988 年 5 月中旬召開了全國政治體制改革座談會。

參加會的有各省、市委主管這項工作的副書記或常委，有各地政改辦或體改委的負責人，也有中央相關部委的負責人。大家交流了各地政治體制改革的進展情況和經驗，全國人大、中組部、人事部、監

察部介紹了正在考慮的問題，全國總工會也介紹了工會十一大的籌備情況和準備進行的改革。

會議對當時政治體制改革的形勢做了一個基本的估計：「政治體制改革已經開始起步，但不能估計過高。已經出台的工作，有一個適應、落實和提高的過程；沒有出台的工作更多，更複雜，大量的工作還在後頭，任重而道遠。當然也不應估計過低。十三大結束才半年，半年中出現了許多新事物、新觀念，使我們沿襲了三十多年的政治體制開始發生變化。今年的變化還是小的、初步的，不夠明顯，但這種變化對我國政治生活，對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對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所起的作用和影響將是深遠的。」對於下一步的政改工作，會議的意見是，不搞一刀切。「本地區如何辦，當然是請省委、市委、區黨委拿主意。這樣作出的判斷比較準確，比較符合當地的實際。政治體制改革應該學習經濟體制改革。農村經濟改革最成功的經驗，就是中央引而不發，允許探索，大膽實踐。花了五年時間，大家心情非常舒暢地統一了認識，而且效果非常好。現在各省市區的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機構，形式和名稱都不一樣，我們贊成百花齊放。我們不要求各省一定要成立或不成立專門機構，只要能把這項工作好好抓起來，採取什麼形式我們都贊成。」

第十章

十三大後政治體制改革還做了什麼？

中共十三大之後，政治體制改革正式進入了實施階段。在十三大報告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和十二屆七中全會「原則同意」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指導下，從中央到地方，從執政黨、國家政權機關，到各民主黨派、社會團體等，凡是中國政治體制中的每一個構件，每一個組成部分，都開始研究、制定自己的具體改革方案，並且大都先後投入了實施。從 1987 年 11 月到 1989 年 6 月，在這短短的一年半多的時間裏，政治體制改革在中央和地方、在各部門、各領域的進展有快有慢，深淺不同，發展並不均衡，在一些方面甚至可以說是阻力重重，但畢竟已經艱難起步，而且在某些方面，已經有成果初步顯現。遺憾的是，由於時間較短，有許多工作未及展開或深入。1989 年 6 月鎮壓之後，已經展開的工作大都停頓，甚至發生的大幅度的倒退和回潮，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可以說是「進一步，退兩步」。

本章從以下十個方面，對這一時期政治體制改革的進展情況作概括性介紹。

一、堅定推進選舉制度改革：七屆人大選舉的探索

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提到選舉，常常在前面冠以「民主」字樣，稱為「民主選舉」。但是，這種「民主選舉」卻看不到最基本的民主，選舉者沒有選擇權，候選人幾乎從來都是等額的，而且都是由中共的組織部門提名，並要向上級報批；被選舉人之間沒有競爭，既不能發表競選演說，也沒機會相互辯論。無論是黨內選舉，還是各級人大選舉，甚至各種「人民團體」的選舉，都是如此。這一「選舉」方式的發明者是毛澤東。自從 1945 年黨的七大設立中央主席的最高職位以後，就發明了這種「等額選舉」，即在 1 名主席候選人中「選舉」1 個主席，在 100 名委員候選人中「選舉」100 個中央委員。到了後來，

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普遍推廣到黨的基層組織，繼而又被普遍推廣到黨外，成為幾乎所有選舉的基本模式。此時如果有人要求在中國競選，肯定會將此人定義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或「反革命野心家」。這種選舉方式的結果是，凡事先經「領導批准」列入候選名單的人，照例個個當選，雖有得票多少之分，決無當選、落選之別。這種選舉根本無法體現選舉者意志，名為「民主」，實際上是「黨主」，上級領導作主。

胡耀邦擔任總書記時，有些地方黨委開始把「差額」引入某些基層選舉，即允許提出略多於當選人數的候選人。在這種有益嘗試的基礎上，《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把「差額選舉」的原則列入政改方案。這一原則，經十二屆七中全會通過，當即在十三屆中央委員的選舉中採用。因為此舉在全國黨代會選舉中尚屬首次，所以差額很小，只為5%，即在大約185名候選人中選出175名中央委員。這樣加了10名差額之後，立即出現一個戲劇性事件：本來中央安排鄧力群進入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另有元老指望他當總書記，卻因差額選舉，使其落在175名中委候選人之後，不僅在中委選舉中落選，更失去了成為政治局委員的資格。大會主席團轉而把他安排為中顧委常委候選人，但他再度落選。十三大上推行的差額選舉雖屬改革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制度的第一次嘗試，但作為一種體制上的程序上的重大變化，讓全黨看到了中央堅持政治體制改革和黨內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決心。

十三大以後，很快又迎來了地方各省市人大和政府換屆的高潮，選舉制度改革在地方選舉中開始全面推行。在各省市換屆中，大都採取了既不包辦，又要有領導的原則，普遍搞了候選人的民主推薦、徵求黨內外意見、省委討論、差額報批的辦法。選舉中出現了尊重選舉人意志，嚴格依法辦事的可喜局面。根據中組部統計的資料，到1988年2月中旬已經舉行了選舉的20個省市中，均出現了在已經報批的名單之外，依法由人大代表10人聯名提名候選人的情況，共提名190人，其中正式列入候選人名單的有54人，當選的有7人，其中有副省長3人；有中央提名的3個省人大主任、3個副省長、1個省檢查長、1個省法院院長落選；有6個省搞了人大主任差額選舉（原來中央只安排山西搞差額試點，就是說有5個省出現選舉人提名人大主任候選人的情況），差掉了3個由中央提名的人選，由代表提名的3位候選人當

選；有5個省搞了省長、5個省搞了省法院院長、6個省搞了省檢查長的差額選舉，落選的105人，佔候選人總數的23%；在選舉過程中，有4個省市搞了候選人和選舉人見面、對話。這種局面，在黨的中高級幹部中，有人叫好，有人叫糟。有些人憂心局面失控，擔心「黨的領導」無法體現。

5月21日，中央政改研究室開會聽取全國選舉情況的彙報。鮑彤在討論中談了他的意見，他說：在選舉問題上還是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又要差額又要保自己原來的框框是不行的。如果認為群眾推選的54個省級候選人都是不錯的，那麼各種看法就應該可以得到解決。即使有不正常，判斷的標準也應該是合法不合法，即使選錯了也應該由群眾自己的認識。我們自己的看法未必就比群眾高明多少，倪獻策不也是我們組織部門選出來的嗎？一個群眾自己提名的人可以選票過半數，這就說明黨委應該考慮自己提名合不合適，這就是一種機制，是在憲法的軌道裏運行的。這次差額選舉解決了很大問題，對幹部是個很大的教育。過去的等額選舉不利於提高領導機關的威信和群眾擁護，這樣搞了工作上的阻力也會小得多，群眾服氣得多。如果選上來的都是好的，那就不可怕。好中挑好的嘛，組織部門應該總結自己的經驗教訓，不是這樣選舉好不好，而是要考慮自己原來的方案對不對。現在可選擇的餘地還很小，將來差額不是應該縮小，而是應該擴大，讓群眾有更多的選擇餘地，選舉會更好。如果認為有問題搞收縮，對民主的發展不利。

鮑彤說，紫陽在常委會上講，這樣的選舉很好，不必擔心。這個判斷是正確的。黨委領導應該從工作考慮，不是對名單負責，組織部安排人有的時候還要換，這說明原來的考慮不合適。那麼為什麼不允許群眾選舉？說要「加強領導」，要搞清楚，一個是到底領導什麼，二是如何改善領導。出現組織提名的候選人落選，組織部應該反思自己的方案與群眾認識的差距。如果組織上提名的競爭不過群眾提名的，那就說明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嘛！要不要開黨員會統一思想？沒必要。你要統一什麼？一是黨委名單本身是差額的，你統一思想讓誰當選？二是這樣搞與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與民主原則不符合。如果從如何保證黨委名單當選的角度來總結經驗，那就不利於組織部門改進工作，也不利於民主發展。

討論中，鮑彤提出要注意研究在社會主義國家裏選舉怎麼算舞弊的問題。他認為，這種情況現在沒有，不能保證將來也沒有。在什麼情況下是非法的，要宣佈無效？這應該有個章程。阻攔提名是非法的。在這個問題上，只有合法和非法的界限，不能應該有其他的界限。

面對地方選舉中出現的這種可喜形勢，鮑彤說，現在還不能講民主趨勢不可逆轉。現在的主導方面應該是講更好的發展民主，包括在選舉問題上進一步解放思想、轉變觀念。而決不應該從如何保證黨委批准的候選人名單當選上總結經驗，而是應該從如何選出更多更好的人，如何去做好選舉工作的角度來總結經驗。

1988 年是全國人大和中央政府的換屆年。這是中共提出黨政分開、「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後的第一次中央政府換屆。在 3 月下旬即將召開的七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如何堅定推進選舉制度改革，如何既要體現選舉人的意志，又要保證由執政黨提名的國家主要領導人順利當選，這個問題實際地擺在了趙紫陽主持的中共中央面前。

3 月 3 日、4 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決定 3 月 15 日召開十三屆二中全會，最終決定向七屆人大提名的國家領導人選。為此，政治局首先討論了人事名單。對這個名單，沒有人提出不同意見。大家的意見主要集中在七屆人大如何舉行選舉、黨員代表如何發揮作用、如何評價和避免省級換屆中出現的情況上。

趙紫陽講話中說，現在這個人事安排，是十三大人事安排大格局的一部分。十三大的差額選舉搞得好，大家很高興。各省搞的也是差額選舉，也很好，大家也很高興。七屆人大要體現民主，這次選舉和各省市不一樣，關係到國家的主要領導人，關係到國家的穩定。十三大的選舉反應很好，比預料的要好。這次人大選舉要盡一切努力使十三大的人事安排格局得以實現，不能變，不能出笑話。這是安定團結連續性的標誌，是我們政策連續性的標誌和保證。二中全會的中心是人事問題，要有紀律，應高屋建瓴地對待這個問題。

楊尚昆插話說，這是大格局要保證。薄一波建議人大代表中的黨員要先開個會。趙紫陽在政治體制改革研討中就曾經多次提出「人大中的黨員代表如何投票」的問題，這次他再次提出這個問題。他說，黨員代表是根據黨的主張投票還是根據個人意見投票？這個問題政改研討中還沒有最後解決。在黨員代表佔人大代表多數的情況下，完全

按照黨的意見投票就沒有民主，完全按照個人意志投票黨的意志就沒有保證。現在投反對票的主要還是在黨內。

趙紫陽認為，恐怕還是要把問題分成兩類。一種是按黨的意志投票，一種按照個人意志投票。世界上各政黨的議員都按照黨的意志投票，我們在重大問題也必須按照黨的意志。討論一般問題可以自由發揮，但在重大問題上不行。這次要討論的是國家領導人的名單，是重大問題。二中全會也要講這個問題，二中全會決議以後應該要求黨員代表支持二中全會決議。這個問題怎麼說、說到什麼程度？我曾經問過匈牙利的卡達爾【280】，他們說他們也沒有規定。我們要求黨員維護的這個大格局不是指一般的部長，而是指國家主要領導人。

趙紫陽曾經聽到有些政治局委員對地方選舉的反應，認為搞亂了，是削弱了黨的領導，應該按照省委的意見投票，代表提名上來的副省長構成不合理，認為差額選舉後遺症相當大。李瑞環還提出了「以後怎麼辦」的問題。

趙紫陽在會上沒有點李瑞環的名字，但針對他提出的問題說，各省選舉的是地方領導人，這和全國選舉不一樣。現在憲法規定副省長是選舉的，這恐怕不行，以後要改，改由省長提名，人大決定，人大代表可以否決提名，但提名權在省長。由人大給省長配班子，這個方法不行。

趙紫陽說，差額選舉確有好處，其他的都可以實行差額選舉，這要有個鍛煉的過程。以後甚至可以考慮，省長將來也可以有兩個候選人嘛。這時，會上有人提出反對趙紫陽提出的省長也可以搞差額選舉的意見，趙紫陽沒有再糾纏這個問題，他接著說，總之要有個過程。這次會前人大黨組要把黨員人大代表找來開個會，各省臨時支部的負責人也要開個會。最近我見到小平，小平說我們的民主不是無政府主義，是民主集中制，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民主基礎上的集中。

為了不至於影響已經展開的差額選舉，趙紫陽在 3 月 15 日至 19 日召開的十三屆二中全會討論人事問題時講了一次話，他明確提出，所謂要人大中的黨員代表必須按照黨的意志投票的「重大人事問題」，是指國家主席、政府總理、人大委員長、國家軍委主席。至於其他，

【280】卡達爾·亞諾什（1912-1989）：匈牙利前社會主義工人黨主席、前總理。

如國務委員、各部部長等等，人大中的黨員代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投票。

1988年3月25日至4月13日，七屆人大一次會議舉行。人大中的黨員代表遵照這一原則投票，中共中央提名的「國家主要領導人」均順利當選。

二、健全民主制度，使黨的領導機構運行走向制度化、透明化

中共十三大報告認為，「以黨內民主來逐步推動人民民主，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條切實可行、易於見效的途徑。」發展黨內民主，首要的一條，就是從中央做起，要健全黨的領導制度。趙紫陽認為，要改革黨的領導體制，使之民主化和規範化，不僅黨代會要改革，而且黨的高層，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書記處更要率先垂范，進行改革，這就是要確定和建立黨中央的工作制度、會議制度、議事規則和新聞發佈辦法。要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會定期報告工作的制度；適當增加中央全會每年開會的次數，使中央委員會更好地發揮集體決策作用；建立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中央書記處的工作規則和生活會制度，使集體領導制度化，加強對黨的領導人，特別是最高領導人的監督和制約。

在毛澤東時期，中央開會毫無規矩，開會不開會，作什麼決議，公開不公開，一切取決於毛的個人意願。八大《黨章》規定，黨的最高領導機關——全國代表大會任期5年。因為毛澤東不想開九大，八大的任期被無端延長為13年。八大《黨章》規定，代表大會實行常任制，年年必須開例會；但毛澤東不喜歡，第二年就沒有開，第三年總算開了一次，接下去連續10年又沒有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尚且如此，八大《黨章》關於中央全會每年必須召開兩次的規定，同樣也是一句空話。從九大到十一大，為了使毛澤東的隨心所欲合法化，《黨章》對中央全會多長時間開一次會，不作任何規定。文革以後，鄧小平在黨內的地位逐步確立。由於鄧小平和陳雲的政見不完全一致，相互不願意見面，遂使政治局會議、政治局常委會議無法正常召開，導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總書記胡耀邦無所適從。十三大後，根據趙紫陽的建議，十三屆中央政治局的第一次會議就規定了中央的最低限度的例會制度：每年必須召開至少兩次中央全會，中央政治局要向全會

報告工作；每個月必須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每星期必須召開一次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會議對重大問題的結論必須經過表決形成。十三屆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還規定，中央全會和政治局會議的結論，必須分別通過公報或新聞向社會公佈。

趙紫陽作為中央總書記，名義上是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可他這位「最高」領導人在日常工作中，與以住的中共領導人相比，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他十分注重遵守規則和程序。他認為，在黨內高層，建立工作規則和制度是必要的，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但是，規矩是要由人來遵守的。作為黨的領導人，特別是最高領導人，如果不以身作則，帶頭去立規矩、守規矩，那這個規矩就會成為一張廢紙，黨內政治生活就必然會重新走上毛澤東時候的老路。所以，他在十三大當了總書記以後，十分注重帶頭按照規則和程序辦事，該由常委決定的就拿到常委會上，該由政治局確定的，就拿到政治局會上決策，該表決的就付諸表決，該由書記處落實的，就交由書記處辦，從不以個人意見，代替組織決定。

十三大修改後的黨章對中央書記處的性質、職能做了調整，書記處不再是決策機構，而是成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辦事機構。在十三大後的 12 月 5 日，中央書記處舉行第二次辦公會，對幾位書記的工作進行了分工。

會上，趙紫陽說，由啟立分管常務、思想宣傳、協調工作。對突發事件的協調，首先由國務院管，國務院認為需要黨政軍共同協調一致的，再提到書記處。該通過法律解決的由法律去解決，該通過企業和社會去解決的，由企事業或是社會去解決。群眾上街遊行的問題由治安部門去解決，法律問題不要政治解決。黨務方面的協調工作，也請啟立管。宣傳小組由啟立任組長、芮杏文任副組長，鮑彤、陳俊生、錢李仁、王忍之為成員。趙紫陽還講到，電影、小說等總的講要少管，中央同志不要去表態，不要那麼緊張，要相信觀眾、群眾有思考和分辨能力。宣傳小組要管大事、動向性問題。

趙紫陽說，喬石同志分管黨紀、中央組織工作領導小組的工作。七中全會上有人反映，紀檢工作以事實為準繩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這是個大問題。喬石在七屆人大召開以前，還要管政法工作。以後的政法工作，國務院設一位國務委員，管公安、民政、司法（指司法

部）。中央不再設政法委，成立一個政法小組，由喬石同志協調。喬石表示同意，並提出中央政法小組下邊可以不設專職辦事機構。安全部不應該放在政法小組，可以由一位常委直接抓。

趙紫陽還說到「黨風問題」，提出到底怎麼解決要研究。他認為，有些問題很奇怪，越是開放的地方對黨風的意見就越小，這要分析一下。芮杏文同志分工宣傳工作，要圍繞思想工作搞些調研，也會涉及一些經濟工作。閻明復同志主要管統戰工作，聯繫工、青、婦。家寶分管辦公廳，也要搞一些調研工作。書記處還要研究一下怎麼開展工作，研究一些綜合性的政策，比如知識分子問題。書記處要排一下，一年研究幾次綜合性問題，要有一個調研計劃，請啟立安排。

趙紫陽曾經說過，他這個中央總書記就是「大秘書長一個」。十三大後，在他的主持下，中央書記處按照中央政治局和常委的決策，做了大量的日常事務性工作，較好地實現了中央的意圖。

十三大後，中央要求，地方各級黨組織也要相應建立和完善有關的議事規則、表決制度和生活會制度。要改革和完善黨內選舉制度，明確規定黨內選舉的提名程序和差額選舉辦法。應當把差額選舉的範圍首先擴大到各級黨代會代表，基層黨組織委員、書記，地方各級黨委委員、常委和中央委員會委員。按照這一要求，在十三大後的一段時間裏，各地各級黨委都紛紛制定了議事規則、表決制度和生活會制度，地方各級黨的代表大會的換屆選舉基本上都仿照十三大，實行了差額選舉。雖然候選人的報批制度依然如舊，差額的比例和方式也不盡相同，但是在一些地方，確實出現了上級安排和批准的候選人落選的情況，對於約束一些幹部的行為，改善幹部與黨員、與群眾的關係，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關於差額選舉問題，還有一件事需要說一說。在十三大前和十三大後的黨內、人大選舉問題上，都有人反對直接差額選舉，主張搞差額預選、等額正式選舉，認為這樣做，既可以體現「民主」、又可以保證上級意圖實現。趙紫陽堅決反對這種做法，鮑彤和他的部下們對此也持反對態度。因為，差額預選，實際上給某些人留下了操弄選舉的空間。十三大前和後來歷次黨代會搞差額預選的事實表明，預選都是在各省代表團內進行，總的結果並不向全體代表公示。各個代表團的代表都只瞭解本團內部的預選情況，不瞭解其他團的情況，更不瞭解

總的預選情況。最後形成等額的正式候選人名單還是由中央高層領導人圈定,「大會主席團通過」只不過是走個過場而已。這種表面上「民主」,結果與過去的等額選舉幾乎完全相同,只是換湯不換藥。從本質上說,「差額預選」是欺騙全黨、欺騙公眾的「偽」差額選舉。2012 年這次中共十八大上進行的號稱「實現了廣泛民主」的選舉,實際上仍然如此。所以,當時趙紫陽、鮑彤們在差額選舉問題上,都堅決反對搞差額預選,主張直接進行正式差額選舉。他們認為,只有在有監督條件下進行有競爭的公開的差額選舉,才能真正體現選舉人意志,保持對當選人的壓力,使他們注意聯繫群眾,減少特權、濫權行為,防止腐敗發生。

在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中,還提出了將來要考慮實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常任制的問題。每屆代表一經選出,任期五年,在任期內如有必要,即可召開會議,審議中央委員會的報告,決定重大事宜。遺憾的是,這個設想更是沒有時間和機會實施。

三、黨政分開方面的幾項改革

實行黨政分開,是鄧小平那段時間反覆強調的,他認為,這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首要關鍵。一方面,他認為當時的權力過分集中於黨,黨的「各級領導機關,都管了很多不該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281】;另一方面,他認為政府的婆婆太多,事事都要由黨委討論,嚴重影響行政效率。實事求是地說,他強調黨政分開,這兩個方面的含義都有。在 80 年代前期,他更多強調的是前者。

1980 年 10 月 25 日,他在同胡喬木、鄧力群和談話時說:「要下決心改變黨員高於一切群眾、支書高於一切幹部、黨組織高於一切組織的狀況。黨委不能再包攬一切、干預一切。黨的領導要體現在制定和實現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上。黨的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領導人民當家作主。整個國家是這樣,各級黨的組織也是這樣。黨的組織、黨員,都要永遠站在人民一邊,同人民在一起,瞭解他們的要求,傾聽他們的呼聲,採取各種辦法保護和爭取他們的利益。黨的組織不是政府,不是國家權力機關。我們不能實行以黨治國的辦法。」「總之,現在愈來愈看得清楚,我們過去的那一套不適應今天和以後的任務,非

【281】《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 328 頁。

改不行。」這次談話，收入了《鄧小平年譜》[282]，但唯獨刪去了「我們不能實行以黨治國的辦法」這句話。從年譜的這種處理，我們可以看出鄧小平晚年思想的變化，因為到了1986年他重提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他講黨政分開的目的，已經更多地放在了提高政府效率方面。

1986年11月1日，鄧小平在會見意大利外賓時說：「我們官僚主義多，機構重疊、臃腫。這事還涉及到黨如何領導，黨政要適當分開。」9日，他會見日本外賓時又說：「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這涉及到我們的機構臃腫、人浮於事、拖拖拉拉。更大的是涉及我們的黨政不分，很多事情黨代替了政府工作，黨和政府很多機構重複。」

後來在起草十三大報告和《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過程中，趙紫陽和鮑彤出於「不能搞以黨治國」的考慮，在處理黨政分開的問題上，更多的側重和強調了前面一種含義。他們認為，黨政分開是指黨政職能分開。執政黨和國家政權機關的性質不同，職能不同，組織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應當劃清黨組織和國家政權的職能，理順它們之間的關係，並使之制度化。實際上，這裏面已經隱含了趙紫陽的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思想，包含了現代政黨制度的一些原則，雖然初步的，朦朧和不清晰的。

中共十三大後，在黨政分開方面，出台的措施最多，遇到的阻力也最大。

首先，調整中央與國家機關的工作關係。中央決定，實行黨政分開後，中共中央的財經小組、思想宣傳小組、外事小組、政法委（擬改稱中央政法協調小組）仍保留，職能是研究大政方針，不直接分管政府各部門的工作，政府及相應部門的負責人可參加有關小組的工作，議定事項由政府按法定程序去辦。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向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提出的有關議題，不再經由中央書記處審議，直接提請政治局或常委會決策。這種調整，在一定程度上劃清了執政黨與國家政權機關的職能，向保證國家機關能依法行使職權邁出了第一步。

1988年5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成立中央政法領導小組的通知》，撤銷中央政法委員會，成立中央政法領導小組，由喬石任組長。作為政策調研機構，中央政法領導小組不開政法工作會議，不發

【282】參見《鄧小平年譜》（上），第685頁。

文件，不干預具體案件，體現了黨政分開，公檢法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的原則。按照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市、縣以下地方各級黨委的政法委員會應該相繼撤銷。但是由於各方面因素的影響，這項工作並沒有來得及開始。

六四事件之後不久，1990 年 3 月 6 日，中共中央決定恢復中央政法委員會，之後這個體制就一直延續下來，時至今日，司法獨立仍然是一句空話。

其次，撤銷設在政府機關中的黨組。到底什麼情況下成立黨組，什麼情況下不成立黨組？在研討過程中，經過對世界各國，包括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料進行的分析研究，形成了一個結論：在有黨派政治鬥爭的組織內部，才需要成立黨組（或稱黨團）。黨組的作用，是團結領導本黨成員，在該組織內部貫徹本黨意圖。中國政府是共產黨一黨執政的政府，是共產黨一統天下，沒有必要成立黨組。況且，政府是行政組織，是依據行政首長的行政命令進行運作的組織，黨組的委員會制決策方式與行政首長負責制是根本矛盾的。

當時的情況是，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部門的行政首長都是黨提名的，都是共產黨員，但在這些部門中又都設有黨組。如果行政首長兼黨組書記還好，否則黨組起到的作用，就只能是與行政首長鬧磨擦；同時安置幹部，造成機構臃腫。正是由於這種體制，對於政府的效能產生很大影響，也不利於對錯誤決策的事後追責。

針對這種情況，中共十三大修改了黨章，規定：「在中央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人民團體和其他非黨組織的經選舉產生的領導機關中，可以成立黨組。」這就是說，不經選舉產生的領導機關，不成立黨組。政府各部門是行政機關，當然不必設立黨組。按照這個規定，十三大後各級政府部門逐步開始裁撤黨組。按照《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只有人大、政協、工會、婦聯保留黨組；共青團是共產黨直接領導的，所以不設黨組。國務院和各級政府、政府各部門都不設黨組。但實際上，撤銷黨組的過程在中央和地方、各個部門進展不同。

鮑彤後來回憶說，這個事情我跟當時的中組部長宋平談過，撤銷黨組的事情請組織部門負責，各部門不要來找我們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應該是由組織部來落實十三大的這項決議。各部門的黨組什麼時

候撤銷、怎麼撤銷，由各地各部門向組織部去打報告，確定時間，做出計劃。大概在 1989 年初的時候，有一次開會，宋平坐在我旁邊。我沒有主動問他，是宋平主動跟我說，現在黨組的情況大致是二分之一已經撤銷，二分之一準備撤銷。

1989 年 6 月，鄧小平曾經說，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不改。但是隨著政治體制改革的偃旗息鼓，五年以後的 1992 年，中共十四大再次修改了黨章，重新恢復了十二大黨章的提法，規定：「在中央和地方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經濟組織、文化組織和其他非黨組織的領導機關中，可以成立黨組。」由此，十三大後被撤銷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門中的黨組全部死灰復燃。

第三，調整地方黨的組織機構和人員設置。十三大後，中央開始進行地方各級組織機構和人員調整，調整的方向是：地方各級黨委不設不在政府任職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專職書記、常委；撤銷地方各級黨委辦事機構中與政府重疊對口的部門；根據黨政工作的不同特點，調整領導幹部的配備，並精簡各級黨委機構，減少專職黨務幹部。目的是通過這些措施，從機構和組織、人事安排上，減少黨委機關對政府工作的干擾，保證政府部門獨立開展工作，依法行使職權。

第四，改變基層黨組織的職能，推行廠長（經理）負責制。早在 1980 年 8 月《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鄧小平就已經提出了取消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問題。此後他又多次談到這個問題。1987 年初，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趙紫陽提出，要改革企業領導體制，工廠由廠長擔任第一把手，是法人代表，企業活動的中心。當時會上的爭論非常激烈，有很多人不贊成。但是，當趙紫陽和其他一些贊成的同志，把企業黨委負責制的弊端、實行廠長負責制的好處一擺，大家也就沒話說了，政治局會議通過，企業活動必須以廠長、經理為中心。中共十三大再次確認了這一原則。

實行廠長負責制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客觀要求，也是在基層貫徹黨政分開的一項重大改革。那個時候，全國有幾十萬家企業，絕大多數都是國營和集體企業，實行的都是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要廠長、經理真正成為企業的法人代表，成為企業事實上的一把手，要動幾十萬個黨委、支部書記的蛋糕，工作的艱難、工作量的巨大，可想而知。但是，中央在這個問題上，決心堅定，措施有力，宣傳到位，

各級黨委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全國的國營企業基本完成了向廠長經理負責制的過渡，而且沒有對企業的生產和經營造成大的影響。

與此同時，全國的事業單位，包括大專院校、科研院所、報刊媒體等都開始照此辦理，校長、院長、所長、社長負責制也開始紛紛確立起來。基層的黨政分開，因為得民心、順民意，所以推開以後，勢如破竹。

1989 年 6 月以後，「因為形勢和政治工作的需要」，許多地方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院長、所長負責制」開始回朝。8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討論並通過了《關於加強黨的建設的通知》，明確規定：「高等院校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試行校長負責制的範圍不再擴大。」至於廠長經理負責制，在一些大中型國有企業，也回復到「黨委領導下的廠長經理負責制」的狀態。

第五，推行黨的基層組織屬地化領導。在確立廠長經理負責制的同時，十三大還提出了一項原則，那就是黨的基層組織屬地化。企事業單位中的黨組織，原則上由所在地方黨委領導，逐步向少設或不設專職機構和盡量少配脫產幹部的方向過渡。這項改革的出發點，是割斷基層單位黨組織與政府行業管理部門的領導關係，一方面為基層黨政分開，實行企事業單位行政領導負責制提供組織上的條件和保障；另一方面，也為轉變政府職能，進行機構改革創造條件。但是，這項改革在進展過程中遇到了較大困難，始終沒有推開。其阻力不在中央高層，不在地方，而在中央政府的各部門。比如說，把鞍鋼黨委交給鞍山市委管理，由鞍山市委領導鞍鋼黨委，地方黨委的積極性很高，但中央的主管部門卻不同意，理由是，鞍鋼是中央企業，其黨組織也要歸本系統的黨組織領導。

黨的基層組織屬地化領導這項工作進展緩慢，後來甚至基本停止了。儘管如此，從大形勢上看，實行廠長負責制以後，這個問題已經不很重要。鮑彤認為，當確定了法人是企業活動的中心，那麼黨委在企業中的地位就已經基本解決。至於企業黨委是不是交到地方領導，要不要取消行政級別，就只是一個形式問題，可以交給時間去慢慢解決。

第六，黨紀政紀案件分別查處。按照當時中央的考慮，黨紀、政紀、法律是性質不同的約束規範，在黨政分開的條件下，應該由性質、職能不同的機關分別處理。中紀委應該主管黨紀案件查處，並集中力量抓好黨紀、黨風。各級紀委常駐各部門的紀檢組原則上可以撤銷。而法紀和政紀案件分別由國家司法部門和政府行政監察部門處理。對那些一時搞不清是應該由黨紀處理還是經由司法程序處理的案件，處理的順序，應該是先由司法部門處理。如果法院判決有罪，再由黨的紀檢部門和政府的行政監察部門根據罪名和量刑的情況，依據黨紀、政紀作出處理。此項改革，中央要求由中紀委提出改革方案。

但是，由於各種因素的限制，這項改革未及完成，就被中止了。1989 年以後，對違反黨紀、政紀、法律的案件查處非但沒有分開，黨的紀委、政府監察部門反而公然合二為一，還發明了「雙規」的辦案方式，開創了一個明顯違反黨章、憲法和法律的不良先例。而且在處理的順序上，恰恰反了過來，涉及黨員、公務人員的違法違紀案件，先是由黨紀檢部門立案和調查，根據情況先做黨紀、政紀處理，然後「移送」司法部門。實質上，這是在未經法院判定嫌疑人是否有罪的情況下，先由紀檢部門認定是否涉嫌犯罪。這種做法，是嚴重有違於法治原則的。

四、權力下放和機構改革

中共十三大報告指出，「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不僅表現為行政、經濟、文化組織和群眾團體的權力過分集中於黨委領導機關，還表現為基層的權力過分集中於上級領導機關。」應該說，這是中國政治體制的一個基本特徵。在這種體制下，掌握公權力的機關變成了全能機關，管了許多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陷於事務主義而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基層缺乏自主權，各方面的積極性難以充分調動。克服這一弊端的有效途徑，就是縱向分權、下放權力，將不應屬於執政黨、政府的那部分職能和權力，不屬於上面應該掌握的權力，交還給下面，交還給基層，交還給社會。

為適應商品經濟發展、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發展的多元化對政府提出的減政放權的客觀要求，十三大確立的權力下放的總原則是：在保證全國政令統一的前提下，凡是適於下邊管的事，都應由下邊去決

定和執行；適於地方管的事，交給地方去管；適於企事業單位管的事，交給企事業管；適於群眾組織和群眾自己管的事，由它們自己管。

在這一總原則之下，十三大後的執政黨中央和中央政府，即國務院開始了以減政放權為目標的權力結構調整。(1)在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上，在保證政令統一的前提下，逐步劃清中央和地方的職責，做到地方的事情地方管，中央的責任是提出大政方針和進行監督。(2)在政府同企事業單位的關係上，按照自主經營、自主管理的原則，將經營管理權下放到企事業單位，逐步做到各單位的事情由各單位自已管，政府的責任是按照法規政策為企業服務並進行監督。(3)在黨和政府同群眾組織的關係上，充分發揮群眾團體和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作用，逐步做到群眾的事情由群眾自己依法去辦。(4)以擴大中心城市和企事業單位的權力為重點，調整機構設置。中央強調，凡是規定下放到城市和企事業的權力，各中間層次一律不得截留。

下放權力的各項改革，因與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管理改革牽涉較大，與國務院和各級地方政府的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行政法規、規章制度的改革聯繫緊密，因此需要有一個過程。中央到地方許多部門都開始從調查研究入手，認真聽取基層的意見，在此基礎上制定方案，逐步進行規章制度的清理和調整，逐項做出具體規定。在十三大後的一年多時間裏，這項工作在中央和各個地方、各個政府部門進展不同，但總的說，大都已經起步。

由於多方面原因，中國的政府機構，是世界上最龐大的。到 1987 年，中央政府即國務院有常設機構 72 個，非常設機構 67 個，加上若干直屬事業單位，共計 5 萬餘人。建國以來，曾經進行過四次大的機構改革，但機構、人員越改越多。出現這種現象，除缺乏必要的法律、財政等剛性約束機制以外，人大對政府缺乏有效監督、領導人的主觀隨意性、計劃經濟的管理模式、全能主義的社會管理方式等等都是重要原因。中共十三大提出，要把政府機構改革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來抓，建議國務院立即著手制定中央政府機構的改革方案，提請即將於 1988 年 3 月召開的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審議批准後付諸實施。

為了避免重走過去「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老路，十三大強調，這次機構改革必須抓住政府轉變職能這個關鍵。要

按照經濟體制改革和政企分開的要求，按照「政府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思路，合併裁減政府的專業管理部門和綜合部門內部的專業機構，使政府對企業由直接管理為主轉變到間接管理為主。同時，適當加強決策咨詢和調節、監督、審計、信息部門，轉變綜合部門的工作方式，提高政府對宏觀經濟活動的調節控制能力。

為了鞏固機構改革的成果並使行政管理走上法制化的道路，十三大提出，必須加強行政立法，為行政活動提供基本的規範和程序。要完善行政機關組織法，制定行政機關編制法，用法律手段和預算手段約束和控制機構設置和人員編制；要制定行政訴訟法，加強對行政工作和行政人員的監察，追究一切行政人員的失職、瀆職和其他違法違紀行為。

在《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當中，對機構改革提出了更加具體的要求。設想中說，機構改革要做到工作能正常運轉，人員有妥善安排。從總體看，現有人員主要是結構和分佈不合理，業務素質不夠高；專業經濟管理部門的人員太多，綜合、監督、調節、信息、咨詢、法律等部門和某些企事業單位則需要增員。應抓緊轉移人員，合理調整分佈，同時抓緊做好人員轉移前的思想教育和業務培訓工作，以減緩改革過程中的困難，使現有人員各得其所。今後，各級政府應及時公佈準備增員的部門和單位名單，凡自願轉入這些部門和單位工作的人員，都有權前往這些部門應聘或應試，原單位不得留難。

早在十三大之前，按照政治體制改革研討中提出的這些原則，國務院有關部門已經開始了機構改革方案的調研和制訂工作。1988 年 4 月 9 日，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啟動了新一輪的機構改革。這次改革著重於大力推進政府職能的轉變。政府的經濟管理部門要從直接管理為主轉變為間接管理為主，強化宏觀管理職能，淡化微觀管理職能。其內容主要是合理配置職能，科學劃分職責分工，調整機構設置，改變工作方式，提高行政效率，完善運行機制，加速行政立法。改革的重點是那些與經濟體制改革關係密切的經濟管理部門。通過改革，國務院部委由原有的 45 個減為 41 個，直屬機構從 22 個減為 19 個，非常設機構從 75 個減到 44 個，部委內設司局機構減少 20%。在國務院 66 個部、委、局中，有 32 個部門共減少

一、5萬多人，有30個部門共增加5300人，增減相抵，機構改革後的國務院人員編制比原來減少了9,700人，接近20%。

1988年國務院這次機構改革，是一次弱化專業經濟部門分錢、分物、直接干預企業經營活動的職能，以達到增強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和轉向行業管理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其歷史性的貢獻是首次提出了「轉變政府職能是機構改革的關鍵」這一命題。改革採取了自上而下，先中央政府後地方政府，分步實施的方式進行。由於後來一系列複雜的政治經濟原因，這次改革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再加上後來經濟上治理、整頓工作的需要，原定於1989年開展的地方機構改革暫緩進行。

五、幹部人事制度改革與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

人事制度，是國家政治制度的重要基石。建國以後逐步形成的我國幹部人事制度存在一些重大缺陷，其中最根本的，是指導思想問題，是如何貫徹「黨管幹部」原則的問題。過去根據「黨的領導是政治、組織、思想的領導」的說法，把「黨管幹部」錯誤理解為黨的組織部門要集中掌握所有幹部的管理、任免權，後來形成了建國以來黨委組織部門以行政級別劃分的幹部管理任免的制度。

事實上，在中共歷史上，黨的領導人對「黨管幹部」前後提過3次，每一次的涵義都是說，黨應該嚴格地管理幹部，對幹部提出嚴格的要求，要防止幹部蛻化變質，根本沒有把所有幹部的任命權抓在黨的組織部門手裏的意思。據鮑彤在研討中回憶，第一次是1953年劉少奇提出來的。他說，要把幹部管好。在戰爭年代，當了共產黨人要掉腦袋，敵人幫我們把幹部管好了，我們的幹部不敢脫離群眾。現在掌權了，我們的幹部會學壞。人家要來抬轎子，共產黨員要保持清醒的頭腦。第二次是1954年毛澤東講了一次。毛澤東見安子文，說:「安子文啊，你現在要管黨了，你要管幹部了。」他講這個話，是敲打安子文的。第三次是1963年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劉少奇的發言。這三次提到的所謂「黨管幹部」，都是說要管好幹部，防止在幹部中產生官僚主義，而不是說要組織部門把幹部任命的權力都抓過來。

在研討中，大家比較一致的認為，正是由於指導思想的錯誤，導致了我國幹部人事制度存在許多重大缺陷，主要是:「國家幹部」這個

概念過於籠統，缺乏科學分類；管理權限過分集中於黨的組織部門，政府用人卻不管人，管人與管事脫節；管理方式陳舊單一，阻礙人才成長；管理制度不健全，用人缺乏法治。

十三大報告提出，既然「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那麼「黨管幹部」就應該是黨對幹部人事制度建設提出方針政策，形成法律和制度。黨的組織部門的主要職責，就不應該再是直接管理任命幹部。改革現行的幹部人事制度，就是要對「國家幹部」進行合理分解，貫徹黨政分開原則，改變由黨的組織部門集中統一管理的現狀，建立科學的分類管理體制；改變用黨政幹部的單一模式管理所有人員的現狀，形成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改變缺乏民主法治的現狀，實現幹部人事的依法管理和公開監督。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突破口，是首先把幹部隊伍中行使國家行政權力、執行國家公務的人員分離出來，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制定法律和規章，依法進行科學管理。

中共十三大對於國家公務員制度的基本設想是，「國家公務員分為政務和業務兩類。政務類公務員，必須嚴格依照憲法和組織法進行管理，實行任期制，並接受社會的公開監督。黨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依照法定程序向人大推薦各級政務類公務員的候選人，監督管理政務類公務員中的共產黨員。業務類公務員按照國家公務員法進行管理，實行常任制。」十三大報告認為，按照這一原則建立起來的國家公務員制度，「有利於加強和改善黨對人事工作的領導，有利於造就德才兼備的政務活動家和行政管理家，有利於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國家行政管理的穩定性。」為此，中央建議，設立國家人事部，主管起草國家公務員法規和提出各種配套措施，負責職位調查和分類，組織國家公務員考試，並直接管理一定層次的高級公務員。

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這是中共掌握政權以來對執掌公權力、行使國家社會管理職能的那一部分公職人員管理的一項重大改革。它包含了西方發達國家幾個世紀來形成的文官制度的幾乎全部基本要素（除了公務員中立原則以外），如果真的能按照十三大確定的這些原則走下去，那麼將為中國走上民主憲政之路奠定一塊重要的基石。當然，當時中共黨內絕大多數人不會意識到這個問題，包括參與政治體制改革研討的許多人也沒有從這個角度來看建立公務員制度的重大意義。

真正實施起來，按照十三大確定的原則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的實際工作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其中最大的阻力，是來自中共的組織部門。他們對於「黨管幹部」的理解，對於什麼是國家公務員的理解並沒有完全統一到十三大確立的原則上來。對於建立公務員制度，中央組織部的態度是，把這個題目接過去，形式上接受建立公務員制度，但在實際內容中仍然按照他們的意見辦，用組織部的傳統做法來規範公務員制度，仍然堅持組織部直接掌管負責幹部的管理和任命這一條。

另外，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比如，國家公務員要不要分成政務和業務兩類；正副總理、部長算不算公務員；執政黨和其他黨派的機關工作人員算不算公務員；中組部、國家人事部對公務員管理的權限如何劃分等問題，也有很多爭論。考慮到當時黨內的實際情況，趙紫陽的意見是，無論如何，我們先把國家公務員制度搞起來，爭論中的問題，靠時間、靠實踐來逐步解決。中組部、國家人事部等部門隨即開始了《國家公務員條例》起草的工作。但是，由於政治因素的影響，直到 1993 年，《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才由國務院通過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2006 年 1 月方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施行。但是，此時實行的「國家公務員制度」，已經與十三大時的設想，有了重大差別，國家公務員分成政務、業務兩類的設想已經不見了蹤影。至於後來，各種「比照國家公務員」管理制度的出台，就更與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初衷相去甚遠了。

至於企業人事制度的改革，中共十三大之後，中央組織部曾經提出了一個「企業人事制度改革的三年五項任務」。中組部提出，第一，要和企業法相配套，搞一個全民企業的人事管理條例；第二是同時要搞一個企業黨組織工作規範；第三是要對企業幹部分類後的待遇等問題提出一個意見；第四是企業民主管理制度，職工的主人翁地位，和廠長中心地位怎麼處理，什麼關係；第五，是人才流動的推進，社會上與這方面的改革怎麼相結合。趙紫陽原則同意上述設想，要求告訴有關部門，盡快開始工作。

實際工作從 1988 年初開始，4 月份以中組部、人事部名義下發了「引進競爭機制，改革企業人事制度的意見」。12 月，又起草了國有企業人事制度條例。時任總理的李鵬提出，國務院法制局要參與進行協調，最後由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再下發。1989 年初，中組部開始

組織起草企業黨組織工作條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沒有參與這些文件的起草工作，但就這些問題進行過內部討論，提出希望相關的幾個單位之間能夠多通通氣，文件起草中要遵循十三大報告確定的基本原則，不能為進一步改革設置障礙。

六、新聞改革：1988 年應該再前進一步

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的原則。要落實這一原則，一個重大問題，就是要對以往控制嚴密的新聞報道審查制度進行改革。

在傳統體制下，為了保證「黨對宣傳思想工作的領導」和「輿論一律」，中國所有的主要報紙、廣播、電視等媒體都由黨或政府主辦，被視為「黨和政府的喉舌」、「黨報黨刊」；幾乎所有媒體業務和主要負責人都由黨的宣傳部門統一管理，重要問題要「統一宣傳口徑」，執行嚴格的新聞審查制度；所有涉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重大問題」，媒體必須遵照統一口徑。社會突發事件、社會敏感問題、社會陰暗面的報道被嚴格控制。在這種體制下，媒體的新聞傳播功能、輿論監督功能和表達民眾意見的功能被閹割，成了單一的黨的宣傳和控制輿論的工具。

1985 年前後，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間，中宣部的工作由著名的「三寬部長」朱厚澤主持。在寬鬆的政治環境下，宣傳部門對媒體的嚴密控制有所鬆動。對於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各種討論能夠見諸各種報刊，社會的一些敏感問題也偶爾被允許討論。一些由社會團體或是表面是官辦實質是「掛靠」開辦的說不清其性質的大眾媒體也逐漸發展起來，如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北京的《經濟學週報》等。雖然這些媒體也要受宣傳部門的監控，但畢竟比所謂「黨報黨刊」寬鬆了許多，其活躍的辦報風格和各種支持改革開放的內容也開始越來越受到社會的重視。

1986 年底，發生了黨內保守派主導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央宣傳部門被鄧力群及王忍之等保守派掌控，一些媒體的所謂「自由化」傾向受到批判。在這種情況下，剛剛擔任代理總書記的趙紫陽和主持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工作的鮑彤仍然提出，要堅持新聞改革的方向。

12月26日中央政改辦在討論學潮問題時，鮑彤說，我們的新聞界嚴重的不適應，在這方面，共產黨不如國民黨，國民黨並不封鎖消息。在這個問題上，慎重是對的，但要想點新辦法，各大城市的黨委應該認真考慮這個問題，恐怕還是要報道，可以在本市報道，不一定全都由新華社通稿。到底是諱莫如深好，還是公開各種意見讓大家思考好？封鎖不住又不採取對策，這不高明。

在1987年趙紫陽著名的「5·13」中，他嚴肅批評了報刊宣傳中的「黨八股」，他說:「我們有的理論工作者，寫『大批判』文章比較順手，但不善於搞正面教育，不善於寫深入人腦的文章。黨八股，簡單生硬的說教，好比廣東人說的『水過鴨背不透毛』，不能深入到人們的頭腦裏去。」「所謂好和差，主要看效果。正同經濟工作必須講效益一樣，宣傳工作必須講效果。正面教育一定要做得生動活潑，豐富多彩，既有堅定的原則性，又有很強的說服力。形式和方法可以多種多樣。」

中共十三大以後，改革開放再次成為中國政治的大氣候。新聞界關於新聞改革的呼聲很高，許多新聞單位都組織了新聞改革的座談會，要求增加政治開放程度，給媒體以更多的報道自由。趙紫陽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把新聞改革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動作提出來。

1987年12月5日，在十三大後中央書記處第二次辦公會上，趙紫陽談到了社會輿論調查和民辦報刊問題。他說，宣傳工作要有點餘地。社會輿論調查要拿一個什麼樣的方針？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也在搞這件事，有的甚至提得很高。我們當然也應該搞，但是不要保持濃厚的官方色彩，鬆散一些，適當給點經費，黨和國家給一些支持，間接的管。趙紫陽說，民辦的可以搞，但也不要過多，可以考慮通過報刊來搞。可以作為瞭解人民脈搏的渠道，作為決策依據。一部分經過篩選後可以公佈。

1987年12月8日，在新成立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第一次會議上，鮑彤傳達了趙紫陽關於新聞改革的一些想法。他說，紫陽說新聞改革第一要搞，第二不要出什麼問題，可否找三大報，新華社、新聞署座談一下，可以搞哪些改革，注意哪些原則，需要中央、國務院哪些支持，試著搞一下。總的要求，一是增大信息量，更加開放；二是要求新聞界當好新聞渠道；三是加強輿論監督；四是講究宣傳效

果。鮑彤說，具體的方案研究工作由中央宣傳理論小組的秘書組組織，我們可以參與一下。這個時候，吳國光已經回到《人民日報》社，但仍然擔任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特約研究員。鮑彤要他重點參與和跟蹤這項工作。

從 1987 年 12 月起，鮑彤和周傑以中央宣傳理論工作領導小組和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名義，在中南海連續四次召開了首都各主要媒體負責人座談會。據吳國光記載，先後參加會議的主要人員有人民日報總編輯譚文瑞、新華社副社長郭超人、經濟日報總編輯范敬宜、副總編輯楊尚德、光明日報總編輯姚錫華、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廣播電視部部長艾知生、副部長馬慶雄、中宣傳部長王忍之、副部長李彥等。鮑彤、周傑、陳小魯、吳國光，和中央宣傳小組秘書組的李昌鑒等都參加了座談會。【283】

在上述座談會基礎上，1988 年 2 月，有關新聞改革的文件以首都大報負責人座談會紀要的形式形成，準備以中央宣傳理論工作領導小組文件的形式下發。這時鮑彤再次召集了各大新聞單位座談，聽取修改意見。

在座談中，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認為，還是應該有些框框，涉及外交的、涉及國家安全的、涉及敏感政策如民族、宗教和統戰問題的，涉及社會安定的都要有些框框，而這四點之外應該盡可能放開。

關於批評，他認為核心問題是審稿權問題，是發表批評稿件的決定權問題。他建議能否像解放初期中央關於批評的決定中的寫法，一般由編輯部總編輯決定，共同負責可改為事實部分主要由記者負責、政策部分主要由總編輯、編輯部負責。他主張被批評者的意見也應在大體相同的位置上發表。

新華社副社長郭超人提出，讀者現在對國際信息要求很高，要突破一點禁區。這涉及到宣傳與外交之間的關係，我們的報道有片面性，宣傳要為外交路線服務，但不等於外交，還要重申新聞報道的特點。

人民日報總編輯譚文瑞建議有關部門最好不要對報紙的指示太具體，如參加奧運會的消息不能登一版之類的。關於批評，他認為扯

【283】參見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97年8月版，第501頁。

皮較多的是社會效果問題，違法的倒不多，不能過高估計社會承受能力的問題。輿論現在脆弱的什麼都承受不了，其實主要是領導承受不了。人民日報理論版現在沉悶得很，不同的看法不敢講。他希望有關機關不要對報紙過多干涉，他發牢騷說報紙是公共汽車，各部都要求登這登那，廣播電視部部長艾知生接了一句話說，我們是無軌電車。

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李彥提出，不僅重大活動，還有突發事件是不是也可以增加開放程度。李彥還說媒體批評還有許多阻力，至於稿件送審，他認為徵求一下主管單位意見還是有益的。會中談到對於賣淫這類消極社會現象的報道，李彥認為硬性規定說不准報道也不好，不報外國人也知道。

最後鮑彤發言說，文件中有三件事很費斟酌。一是國際報道與外交表態有聯繫也有區別，但一時不好處理。先研究著，特別是請新華社和廣播電視部認真研究一下作為專題，這個文件先不涉及。二是現在這個文件沒有從程序上說，只是從責任上說，是否送審報社自己決定。報社應該會謹慎地使用批評的權利，這對加強法制觀念有好處。三是報紙應該議論風生，現在的主要問題是信息不多，議論不活躍，怎麼才能議論風生。報紙工作的心血就花在這兒，報紙應該有健全健康的輿論，這本身是最大的監督。

鮑彤還說，紀要中提出的東西不要求全國都去做，1,700 家報紙都去搞，我們實際上沒有這個控制能力。現在面上不要鋪寬，中央宣傳小組同意我們這幾家在這些方面有側重的進行探索，這就可以了。寧可起步慢一些，寧可要求是局部的、有限的，但是應當是扎扎實實的努力，將來我們的新聞事業到底應當是個什麼格局？報紙是否也應該分成兩大塊搞雙軌制？一部分報紙是黨報，一部分報紙只是接受法律和行政監督。在私下裏，鮑彤對吳國光說，沒有私人辦報不可能真正有新聞自由。

據吳國光記載，1988 年 1 月 5 日晚上，針對正在起草的有關新聞改革的文件，鮑彤對吳國光做了一次談話。鮑彤認為 1988 年的新聞改革，中央各主要新聞單位主要是做好四件事：第一是以更加開放的精神把幾個重大事件活動報道好，如二中全會、人大會議等等。要求在十三大報道的基礎上前進一步，更加開放。第二，建議把中央政治局會議和國務院會議的消息發佈的工作制度化，內容盡可能充實一些。

一些不宜詳報的事情也最好有個簡要報道，以提高政治的開放程度。建議有關部門健全新聞發言人制度，開質量較高的新聞發佈會，盡可能搞些記者招待會。建議國務院有關部門根據今年要出台的重大改革措施組織一些高質量，經過充分準備的對話，篩選後認真組織報道。報道對話的形式要多樣化，可以包括原始記錄、述評、記者感受和綜合新聞等等。第三，輿論監督。鮑彤強調報紙批評、輿論監督是民主政治的必要因素，首先應當積極開展批評，要揭露不健康現象。既包括領導作風上的問題，也包括社會上的不健康現象，兩方面並重，批評不在數量，不追求數量，重點是著眼於問題的普遍教育意義，著眼於批評的準確性。批評要講責任，被批評者有不同意見可以反批評。文件中應當要求各級黨委指導和支持新聞單位進行批評，善於利用輿論監督作為改進工作的渠道，發現不正確的要提出來，護短要制止。在談話中，鮑彤提出在很多方面要給報紙以自行處理的權利，報紙要以更多篇幅報道有實質性的內容，有新聞價值群眾關心的問題。要改進文風，反對黨八股，標題編排等等，各報要有自己的特色。

鮑彤說，第四件事是報紙內部的改革。鮑彤主張媒體機構內部的管理制度、人事制度都要改革，要打破大鍋飯，調動編輯和記者的積極性，加強教育，創造工作條件。他說幾家大的新聞單位有點新氣像是會有影響的，積極慎重的改革是會有影響的。鮑彤強調增加信息量很重要，要大量增加社會各側面、各角落的信息。現在總的來說上面來的信息多，來自生活的信息少，來自社會基層信息要增加。這要求記者深入生活。【284】

這個有關新聞改革的文件，後來在 1988 年 3、4 月間，以首都大報負責人座談會紀要的形式，作為中央宣傳思想工作小組的文件正式下發。鮑彤後來在談到這個文件時說，實際就是把新聞改革的要求向各個報紙提出來，各種媒體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你人民日報如打算怎麼做你就怎麼做，光明日報打算怎麼做就怎麼做，反正只要往前走一步都好。當時的新聞改革並不要求一二三齊步走，也沒有那個條件。實際上有點像農村改革一樣，一點點探路，能夠做到什麼程度各個報

【284】以上座談會和談話情況參見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1997 年 8 月版，第 504-510 頁。

紙自己做，希望大家改進，希望大家把改進新聞工作提到日程上來，做出自己的探索，沒有統一的東西。

1988 年 4 月 15 日上午，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剛剛召開的兩會上提出的問題。趙紫陽在談到教育、物價、社會分配不公和黨風問題以後，對七屆人大一次會議的社會輿論引導問題，提出了三方面的意見，他說，一是批評報道過於集中；二是過份渲染了一些問題；三是一些發言發表前沒有給本人看，當事人有意見。趙紫陽請胡啟立牽頭，給新聞單位打個招呼，對批評要有分析，如果對批評不加以正確引導，就會形成社會不安定因素，影響改革和建設。

趙紫陽還特別談到，新聞法還要搞，要準備它不完善，五年以後再修改。但有一個法總比沒有好。這個問題很敏感。

1989 年初，趙紫陽仍然在考慮新聞改革問題。他在 3 月 9 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最近我和錢李仁講，可否人民日報有那麼幾個版要控制，哪些版面可以適當放開一點，幾大報要有區別。都要有緊有鬆，有特色。廣播、電視要嚴，不能失控。總的講要改革，但改革不能失控。

趙紫陽還主動邀請胡績偉【285】到他那裏，談新聞法起草問題。胡績偉後來曾多次回憶到此事【286】。趙紫陽在回憶錄也談到了這件事，他說，他在談話中和胡探討了允許不允許獨立辦報的問題。「現在所有的新聞媒體都由黨和國家壟斷，這不是辦法。當然那時我也沒有想完全放開，但有領導地放開一些會有好處。黨和國家所控制的媒體不願發表的東西，總還有別的媒體可以發表，那也好呀。蔣介石時代還有民辦報紙嘛！雖然不能說開放報禁，但輿論要適當放開。」【287】

儘管趙紫陽為進行新聞改革，積極推進新聞立法做了大量工作，但這個時候的新聞法和出版法已經合併成一個法律，由胡喬木在主持起草，而胡對此項工作一直態度消極。這個法律草案遲遲難產。到了 1989 年 6 月以後，新聞出版法的起草就中止了。

【285】胡績偉（1916-）四川威遠人。中共黨內倡導新聞自由的代表人物。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時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1989 年「六四」事件中胡績偉反對武力鎮壓學生，被撤銷一切職務。

【286】參見胡績偉：《胡趙新政啟示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2 年 1 月版，第 284 頁。

【287】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295 頁。

進行新聞改革，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開放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這是趙紫陽、鮑彤們為政治體制改革確定的一個方向。但這也是十分敏感的一個問題，阻力極大。十三大後，中央常委和書記處在趙紫陽的主持下，曾經數次開會研究這個題目，確定了依法管理，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允許出現多種聲音，允許自由討論的原則。十三大後的一年多時間，成為建國以來政治氣氛、輿論環境最為寬鬆的一個歷史時期。

七、社會團體的改革：代表民眾的利益

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群眾團體是中國共產黨建立並直接領導的社團組織。傳統理論認為，這幾個社團組織是黨和政府聯繫群眾的橋樑和紐帶，在社會生活中要發揮團結、教育群眾的作用。但是，在長期左的指導思想影響下，黨與這些組織的關係、這些組織與廣大群眾關係上，產生了一系列體制的弊端：一是執政黨包攬和干預這些組織的工作，黨群不分、政群不分，不能起到黨、政府與群眾之間的橋樑、紐帶作用；二是這些組織「官辦」色彩濃厚，在實際上成為黨的從屬工作部門，不能代表其各自代表和聯繫的那部分群眾的利益，因而難以發揮其在調節社會矛盾中的作用；三是這些組織的官僚化、行政化傾向嚴重，已經嚴重地脫離了其各自所聯繫和代表的那部分群眾。

在政治體制改革研討過程中，趙紫陽主持的中央研討小組和鮑彤領導的中央政改辦把工、青、婦的改革和去行政化作為改革的一項重點提了出來，認為「這個非改不可」。在政治體制改革中，要理順黨和行政組織同群眾團體的關係，使各種群眾團體能夠按照各自的特點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能夠在維護全國人民總體利益的同時，更好地表達和維護各自所代表的群眾的具體利益。群眾團體也要改革組織制度，轉變活動方式，積極參與社會協商對話、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把工作重點放在基層，克服「官」氣和行政化傾向，贏得群眾特別是基層群眾的信任。

對於群眾團體的改革，趙紫陽的思想是一貫的、明確的。1987 年他在在會見波蘭工會代表時就明確表示，要實行黨政分開，工會要替工人說話。他說：「我們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劃分黨、政府和社會政治組織之間的職能。工會是社會主義國家中最重要

的社會政治團體，要改善黨同工會的關係，工會工作本身也要改革。就是說工會要代表工人利益，替工人說話，使工人承認工會是自己的組織。」

1987 年 2 月 14 日上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舉行了第三次會議，聽取黨政分開專題組的彙報。當溫家寶在彙報中提出，實行黨政分開要正確處理黨和群眾團體的關係時，趙紫陽說，特別是工會。他認為，理順群眾組織的關係問題有兩個方面，一是比如工會要代表工人的具體利益。說總體利益一致，但工人也有具體利益，是總體利益的一部分。只考慮總體利益，不一定具體利益都能夠協調處理得很好。城市裏邊大量的具體體制改革要靠工人，工會既要積極支持改革，又要積極維護工人的利益，包括其長遠利益及眼前利益。他強調，工會是辦工人事情的組織，工人的事情一定要由工會辦。再一個，工會有監督幹部的作用。不是說職代會、工會是權力機關，但是它可以監督廠長，提出批評意見，其不接受可以向上報告。他說，基層的毛病暴露一下也有好處。小膿包不出膿就要彙集起來，沒有小亂就會有大亂，要有安全閥分散一下。現在看起來是一個聲音，領導認為天下太平，其實壓制了許多矛盾。有人搞自由化一煽動就可以煽動起很多群眾。這當然要堅決反對。但另一方面，基層黑暗的勢力相當多，不講道理的事很多，群眾有話無處說，說了也解決不了問題。要解決根本還要靠基層監督，基層民主，包括剛才講的選舉。

趙紫陽進一步指出，我們搞黨政分開、理順關係，最終都是要搞民主化，總的目標是民主化。一方面四個堅持要旗幟鮮明，一方面要創造一種每個單位、每個人都有其尊嚴的環境，有氣也有地方去講，講不正確的也可以講。基層工會對廠長不能撤職，但是可以投不信任票，一個機關對領導全體投不信任票，那就非改組不可。出了不信任票的事情可能有三件是派性也會有七件不是，那也好。三件是派性的東西，一檢查也可以發現，可以進一步解決。

對於黨組織與工會的關係，趙紫陽明確地說，我們黨的領導太絕對化。全國是黨執政，這沒有問題。但每一個單位都是大大小小的黨委書記執政，是絕對權威，一個單位一個太上皇，書記專政。這種情況不行。趙紫陽又說，工會直屬本單位黨委領導這不行。工會有工會的系統，本單位工會不是絕對受廠黨委領導。如果那樣就工會就不可

能發表不同意見了。不是要搞工會黨，但既然工會是一個社會組織，既然它有它的上下聯繫，就不能受本單位黨組織的直接領導。其他組織當然也很重要，但特別是工會。工會的工作如果做不好，不把工人團結在自己周圍，一旦發生矛盾沒有第二個紐帶，就是波蘭的結果。趙紫陽堅決地說：這個非改不可。

十三大後，考慮到工會十一大即將召開，中央決定以此為契機，在群眾團體的改革方面，重點先抓好工會改革的工作。在 1988 年工會十一大召開前的那幾個月裏，中央政治局成員和常委在多次會議上，都議到了如何開好工會十一大的問題。

2 月 5 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專門討論了工會改革。趙紫陽說，工會改革應該是工會十一大的中心，改革怎麼搞，應解決到什麼程度，現在還沒個說法。要求十一大前人大通過工會法，具不具備條件？搞不好反而會限制了改革。中國的工會要比蘇聯走得好一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多種所有制形式，要搞兩權分離，在這個條件下工會的作用如何發揮，要座談一下，工會應該如何發揮作用，如何進行工作。企業裏總會有糾紛的，這種糾紛應該通過一定程序解決。要有界限、制度化，要支持廠長，支持企業改革。工會改革現在能不能提上來？這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大內容，我們要組織人醞釀一下，要開座談會。

趙紫陽進一步說，在基層民主中，工會、共青團起什麼作用，怎麼搞好應該有一個想法。工會法（草稿）要修改，我對工會改革很感興趣。尚昆同志講工會十一大的報告應該規劃出一個改革的前景。我看工會法不要太急，工會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提法太籠統，應該分析清楚。

1988 年 4 月 24 日，趙紫陽在和鮑彤談下一步工作安排時，再次談到了工會改革問題，他說，工會問題，實際是如何代表一個利益群體的問題，現在這個問題的有些方面很尖銳。有人認為讓工會代表工人利益多搞些獨立活動是個麻煩，現在怕麻煩，以後可能會有更大的麻煩。也有些同志提出意見，是否把工會搞成福利工會，維持工人的經濟利益就行了，弄那麼多政治家幹什麼。工會維護工人的經濟利益有一條界限，就是以不影響到企業生存為前提。如果工會改革的大格局上基本能定下來，對其他群眾團體改革也有好處。

中共十三大後，全國總工會的領導對工會的改革態度也很積極。全總的主席倪志福【288】親自到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同鮑彤及研究室同志探討工會改革和起草工會改革文件的問題。全總研究室的同志也幾次來研究室聽取意見。時任全總書記處書記的陳秉權提出，要借助經濟、政治改革大環境來改革工會。他說：「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展開，我們曾經指出，改革對工會來說是一場機遇……黨的十三大報告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原則和設想……為加強落實工會在社會主義民主政體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條件，為中國的工會運動開闢了更為廣闊的前景。」【289】

在中央指導下，全國總工會研究起草了《工會改革的基本設想》。這個設想認為，工會不是政府和行政的從屬機構，否則就成了「官辦」工會。工會當然要支持政府，但政府和工會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合作的夥伴關係，包括監督關係。工會對話的對象是政府和行政，代表職工參與國家和社會管理。因此，工會改革的目標是：把我國工會建設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獨立自主、充分民主、職工信賴的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社會政治團體。近期改革的主要內容：一是理順工會的外部關係，主要是理順工會與黨的關係，理順工會和政府與行政方面的關係，使工會依法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二是密切工會與群眾的聯繫，以增強基層工會活力為中心環節，深入進行工會的自身改革，明確工會的社會職能和工作方針，改革組織制度與活動方式，克服和防止行政化傾向，實現工會組織的群眾化、民主化。

這個《設想》雖然是全總提出的改革思路，但是也反映了十三大後趙紫陽主持的中央對工會改革的基本設想。1988 年 10 月，中國工會十一大舉行。趙紫陽在祝詞中鮮明地提出，工會改革要著重「克服行政化」，「實行群眾化、民主化」，「代表群眾的具體利益」，「按照會員的要求和願望組織自己的活動」。這些要求，得到代表們的熱烈歡迎和支持。

【288】倪志福（1933-）：上海市人，工人出身，勞模代表。時任全國總工會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黨組書記。1988、1993 年兩次當選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是中共十一、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289】陳秉權：《政治體制改革和工會》，載《工會改革文叢》，田明、徐建川編。

工會十一大通過了《工會改革的基本設想》。《設想》認為，工會要以群眾的要求和意願作為自己一切工作和活動的出發點。工會改革要以增強基層工會工作活力為中心環節。通過改革，使基層工會同廣大職工群眾建立密切的聯繫，成為群眾信賴的「職工之家」，能夠在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中，獨立地決定自己的工作，自主地開展各種活動，敢於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吸引和團結職工為推動本單位的改革和發展共同奮鬥。《設想》還強調：「基層工會要健全自身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實行會員群眾辦工會……建立會員評議工會工作和工會幹部的制度。凡涉及會員群眾利益的大事，要由會員群眾或代表大會討論決定」。值得一提的是，《設想》還提出：「在職工群眾的正當權益受到嚴重侵犯，通過基層的民主渠道不能得到解決時，工會有權領導群眾揭露、舉發以至進行其他各種形式的合法鬥爭，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設想》雖然沒有明確指出「其他各種形式的合法鬥爭」到底包括哪些鬥爭形式，但事實上《設想》的起草者當時是考慮到了實際存在的上訪和罷工等鬥爭形式的。

關於工會的組織制度改革，《設想》提出：「工會是職工群眾自願參加、自下而上地聯合起來的組織。上級工會應當是下級工會的代表者和聯合體。工會的組織制度要逐步向聯合制、代表制的方向過渡，即各級工會的領導機構由其所屬基層工會或下級工會的代表聯合組成，真正做到工會代表職工，上級代表下級，為基層、為職工服務。」工會幹部制度改革的重點，「是完善選舉制度，改變事實上存在的委派制。各級工會領導人都應經嚴格的民主程序選舉產生。選舉工作要民主化、公開化，充分體現選舉人的意圖。基層工會的民主選舉，可以自下而上地提名候選人，提倡候選人直接與會員見面。有條件的基層工會委員會可以逐步實行領導人由會員直接選舉產生。」

工會改革是當時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1989 年 6 月後，隨著政治體制改革的停止，設想中的上述工會改革也就基本偃旗息鼓了。1989 年 12 月，中共中央出台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善黨對工會、共青團、婦聯工作領導的通知》，「修正」了《工會改革的基本設想》中的某些「設想」，恢復了原來「工會以同級黨委領導為主」的說法。該文件說，「工會、共青團、婦聯要在黨的統一領導下，遵循黨的基本路線，圍繞黨在每個時期的中心任務進行工作……工會、

共青團、婦聯受同級黨委和它們上級組織的雙重領導，以同級黨委領導為主。各級地方黨委對同級工會、共青團、婦聯的領導……研究、決定本地區工會、共青團、婦聯工作的重大問題；協商、推薦同級工會、共青團、婦聯的主要負責人選……」

八、人大制度的改革：權力的回歸與民眾意願的表達

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依照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國家各級行政、審判、檢察機關都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但在事實上，由於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憲法規定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並沒有落到實處。長期以來，執政黨凌駕於人大之上，以黨代政，體制設計不合理等的問題尤為突出，違憲現象隨處可在，「橡皮圖章」的局面嚴重破壞了我國作為人民主權國家和共和國的形象。

因此，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這次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但是，在政治體制改革研討過程中，大家都感到人民代表大會問題是個難點。其原因，一是在共產黨一黨執政條件下，如何才能體現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的原則？二是在鄧小平劃出來的「不能搞三權分立」這個框框下，如何才能實現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三是如何改革選舉制度，以使人大代表能夠真正反映民意？四是在人大代表不能實現專職化、常任化，多數代表議政能力較差的情況下，如何保證人大的決策質量？五是在現行人大的規模和議事規則之下，如何才能保證人大代表能夠在沒有壓力和不受限制的情況下充分表達意見？這些都是人大改革的難點。

在探討到人大代表的規模和活動方式時，鮑彤和其他許多同事都曾經認為，人民代表大會這樣一個組織形式，應該是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一個載體，但是現在這種載體挑不動中國人行使國家權力這個擔子。按照憲法，它應該體現民主共和這樣一個原則，但是難度巨大。大在什麼地方？三千人開會能商量問題嗎？三千個人可以開兩種會，一種會叫做拍手會，大家歡呼萬歲萬歲萬萬歲。還有一種可以開成鬥爭會、聲討會。打倒劉少奇啊，叛徒內奸工賊，那個會議是可以開

的。這兩種會開起來過去都是得心應手，但要真正研究問題，怎麼討論？1949年開新政協的時候，代表就是六百人，第一次、第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也就是一千人多一點。到了1965年第三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就猛增到了三千人了。三千人怎麼開大會發言？只能開小組會，而小組會是地方利益集團會，小組是按照地域劃分的，這些代表們到了自己的小組裏面，屁都不敢放，因為省委書記坐在那，省長坐在那，你有意見敢說嗎？

鮑彤後來回憶說，「在研討中，大家都意識到要把代表人數減下來，那麼誰來做這個決定？只有在一種情況可以做這個決定，就是執政黨的代表大會自己先從兩千人縮到幾百人，比如縮到三、五百人，那麼人民代表大會會跟上，共產黨的模範帶頭作用嘛。但是，在1987年3月的時候還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且代表都已經選出來了，那個情況下面你十三大能做重大改革嗎？所以當時研討小組辦公室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只是說過幾千個人的代表大會不行的，三百、五百人還得要劃成若干個專業委員會，那才是比較合適的。這種話我是說過的，但是也只是空話，在當時情況下根本實現不了。這應該說是十三大的一個遺留的沒解決的問題，報告裏面根本沒有，一點痕跡都看不出來。這個想法不能寫進去，寫進去報告就可能通不過。」

鮑彤說，「當時我腦子裏想得很簡單，一切等到開十四大的時候再說。那時候爭取把黨代表大會代表減少到三、五百人，第八屆全國人大就有充分理由，把代表人數減下來。我記得研討小組聽彙報的時候，紫陽也說過，三千人全國人民大團結，做個形象是可以的，但實際上已起不了多大作用，關鍵是要把人大常委會做實，讓常委會發揮人大的作用。以後逐步實現人大的小型化、專業化、常任化。」

趙紫陽和鮑彤都認為，當時對人大制度的改革，有許多制約條件。十三大和七屆全國人大就是要有這些既有前提之下，做那些能提出來，也能做到的事情。

十三大報告提出了實行「黨政分開」，確立了「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的原則，這就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改革創造了一個基本的前提條件。十三大以後，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方面工作的重點，就是在黨政分開前提下，落實憲法規定的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各項職權，同時進一步完善人大的各項工作制度。考慮到1988年將面臨全國

人大和各省級人大換屆的實際情況，中央確定，先以全國人大和各省級人大常委會職權的落實和各項制度的完善為重點。

中共十三大後，在人大改革方面，主要做了以下方面的工作：

（1）理順人大與執政黨的關係。十三大確認，共產黨在國家中的執政地位必須保證，但黨不是國家權力機關，黨的政治主張和提出的大政方針必須通過人大的法定程序才能變成國家意志。黨領導人民制定的憲法和法律，黨也必須嚴格遵守。在這些基本原則的基礎上，1989 年 4 月，七屆全國人大會二次會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議事規則》。與此同時，全國人大開始研究如何調整立法程序，著手《立法法》的起草工作。經過 10 多年的努力，《立法法》於 2000 年 3 月九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通過實施。

（2）進一步發揮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作用。在逐步實現委員比較年輕化的同時，逐步實現委員的專職化。這一工作，從七屆人大起，就開始著手。

（3）制定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促進常委會民主決策的制度化、法律化。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全國人大的常設機關，人大常委會議依法承擔著部分立法和決定重大事項、人事任免的工作。因此，人大常委會工作的法律化、制度化，對於保障人大常委的法定權力，實現民主決策尤為重要。為此，全國人大常委會組織起草了《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並於 1987 年 11 月的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23 次會議上獲得通過。

（4）制定立法計劃。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需要，全國人大在中共十三大後進一步加快了相關法律的起草和立法工作。在經濟和對外經濟合作方面，有私營企業法、海商法、投資法、公司法、勞動法、鄉鎮企業法等，以固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在政治改革和行政管理方面，有行政訴訟法、國家公務員法、國家賠償法、國家機關編制法等，以為政治改革和行政活動提供基本的規範和程序，使行政管理逐步法制化。在落實和保障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促進民主政治建設方面，抓緊研究制定新聞、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等方面的法律，建立人民申訴制度，以使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和自由落到實處。這些法律多數後來通過了立法程序，但涉及保障憲法規

定的公民基本權利方面法律的起草和制定，於 1989 年 6 月以後基本中斷。

1988 年 11 月，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漢斌找鮑彤和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幾位研究人員談人大組織法、選舉法，以及涉及憲法的有關問題的修改。他說，人大黨組設想，到 1992 年的時候，要考慮對這些法律進行修改。1989 年人大會已經來不及。這個問題可以研究一下，需要做哪些工作。會後，鮑彤在研究室對這件工作進行了部署，但未及展開，就被六四所打斷。

（5）研究如何改進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監督工作。人大的監督工作，主要分為憲法監督、法律監督，工作監督。其中憲法監督，由於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沒有可能進行重大改革；而法律監督，主要是監督人大制定的各項法律的實施；工作監督則主要是對政府、法院、檢查院工作中的根本性重大問題，通過質詢、聽取工作報告、彙報、視察等形式進行。這三個方面應該如何改革，還需要進行探索。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要認真總結開展監督工作的經驗，建立監督工作的專門機構，研究制定監督工作條例，對監督的內容和範圍、監督的程序和方式作出更加明確的規定，使監督工作逐步適應民主政治發展的要求，實現制度化、規範化。而監督問題的根本解決，則有待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化。

此外，十三大後，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在適當增加非共產黨員在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中的比例、繼續依法堅持差額選舉制度、改進候選人的提名方式、完善候選人的介紹辦法、改進候選人的結構比例的硬性規定等方面也進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應該說，這些改革，雖然步子大小不一，而且只是初步的，但從總體上是符合憲政民主的方向和要求的。

九、發展多種形式的社會民主，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

發展社會民主、基層民主，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使民主政治制度化、法律化，是這次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基本任務。在研討過程中，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的設計者們面臨著一個兩難的選擇。大家心裏都很清楚，鄧小平強調的是效率，認為不能遷就民主化的要求。但是，民主是世界潮流，共產黨一貫標榜是「真民主」、「比資本主義高

一萬倍的民主」，政治體制改革在民主問題上總不能一點事情也不做。在研討小組會上，趙紫陽在批評所謂的「社會主義民主」時說，我們的真民主搞得很假，人家的假民主搞得很真。假民主搞得很民主，真民主搞得不民主。因此趙紫陽強調，人民中間，特別是有知識有文化的人越來越多，他們不是簡單的要求有飯吃就行，還要求當主人翁參與國家大事，對此應當能滿足的就要滿足。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感覺到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民主，這終究是一個我們要解決的問題，一百年也要回答。人類社會的民主應該是越來越發展，一些條件不具備我們可以說清楚，但絕不能讓人感覺到共產黨害怕民主，不敢講民主。

正是由這一主張出發，政治體制改革方案把「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長遠目標提了出來，並以此作為總要求，提出了加強民主政治建設的一系列措施。十三大後，各相關部門程度不同地抓了發展社會民主、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工作，在以下幾個方面有了相當的進展：

(1) 政治協商制度的改革和制度化。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具有廣泛代表性的統一戰線組織」，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曾經在建國初期發揮過重要作用。但是，隨著後來「黨的一元化領導」的發展，政協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日益被邊緣化。在政治體制改革研討中，有人曾經提出過實行兩院制，政協承擔國家上議院角色的問題，後被否定。但是，考慮到政協包容了各政黨、人民團體、少數民族和社會各方面的代表，他們都代表著各自所聯繫的一部分群眾的具體利益，執政黨和政府通過政協這個渠道，可以進行多層次的社會對話，協調社會各方面的利益，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對於推進民主政治建設是有重大作用的，應該得到充分重視和進一步完善。

政協工作方面的改革，重點在落實和完善其政治協商、民主監督的基本職能、範圍和內容，並使之制度化。十三大以後，全國政協在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先後制定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專門委員會組織通則》、《政協全國委員會關於政治協商、民主監督的暫行規定》、《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規則》、《政協全國委員會秘書長、副秘書長工作規則》、《全國

政協專門委員會調查報告的處理辦法》、《全國政協委員視察簡則》等一系列工作制度。通過這些制度，明確了政治協商和民主監督的範圍、內容和程序，推動了政協工作的落實和改善。

（2）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政黨政治，是政治體制改革中很敏感的題目。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也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組成部分。

中共十三大後，為了改革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根據趙紫陽的提議，將「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中的「下」字拿掉，改為「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以表達共產黨與其他參政各黨派「平等合作」之意；二是針對各民主黨派作為政黨，但普遍沒有政綱的情況，提出支持各民主黨派在社會主義總目標下和憲法的範圍內，制定各自獨立的政治綱領；三是加強在政府中的多黨合作，吸收民主黨派成員到中央和省級政府部門擔任領導職務；四是健全和完善執政黨向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進行通報協商的制度。協商的主要內容包括對中共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事先徵求各黨派意見，重大事件的通報，準備提交政協協商的問題等。

此外，趙紫陽主持的中共中央還曾經專門研究過民主黨派在人大中開展黨派活動的問題。十三大以後，按照黨政分開的要求，政府各部門開始取消黨組。1988 年春節後，正在籌備召開七屆全國人大、政協。中央書記處會議研究了在全國人大當中如何設置黨組的問題。趙紫陽的意見是，在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中，保留中共黨員組成的黨組，黨組書記是萬里；其它各民主黨派也應該允許分別成立自己的黨組。書記處同意了這個意見。對此，趙紫陽後來回憶說：「這件事不知怎麼傳到鄧那裏，他那裏傳話給我的秘書李勇說，鄧講發揮民主黨派的參政作用，只是講講而已，怎麼能當真？絕不能在人大中間搞黨派政治，鄧是反對的。」【290】這就造成了後來在人大代表和常委中，只有共產黨的黨組而無其他黨派黨組的情況，並且延續了下來。

（3）抓緊制定新聞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等法律，依法保障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和自由。

【290】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279 頁。

趙紫陽後來在回憶錄中說:「切實保障公民的權利,這非常重要。我在 88、89 年就有這個想法。我們的憲法是一部好的憲法,但在保障公民權利上沒有具體的實體法和程序法,所以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不能保障實現,落實不了。我和戈爾巴喬夫會談時也談到這一點。我說很多東西我們憲法上都有規定,但實現不了。所以必須要有具體保障其實現的法律。譬如說,結社、集會、遊行、請願、罷工都應該有具體的法律。」【291】在那段時間,趙紫陽確實為這項工作盡了很大努力。

要不要依照憲法規定,制定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相關法律,這在改革初期的中共黨內曾經有過不同的兩種思路。早在 1980 年,以胡耀邦為首的中央書記處就曾經提出要搞《結社法》、《出版法》,後來被陳雲、胡喬木等人否定。據鄧力群在他的回憶錄《十二個春秋》中記載,1980 年 9 月「以後,遇到了一個關於自發組織的問題。那時周揚已到中宣部當副部長。他主張要給這些自發組織以合法地位。據林默涵說,在文代會上周揚還提出:自發組織應成為文代會的團體會員。由於林默涵、劉白羽等反對,才沒有搞成。根據小平、陳雲同志的指示,胡喬木起草了一個維護社會安定、保障經濟調整暫行條例的稿子,其中包括取締非法組織和非法刊物。可是書記處討論時把它否定了,提出要搞『結社法』、『出版法』。喬木不同意書記處的意見,於 1981 年 1 月 24 日給鄧小平、陳雲、胡耀邦、彭真寫信說,如果採取制定『結社法』、『出版法』一類的辦法來對付非法組織、非法刊物,要求他們登記,很可能被這些反黨分子鑽了空子我們還不知道。陳雲見了這封信之後,把我和喬木找去,對我們講:無論如何不能讓所有的秘密的或半公開的組織和刊物登記,要讓它們處於非法地位,禁止它們活動。後來,才有了 1981 年 2 月 20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處理非法刊物非法組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292】該指示(即中發 [1981]9 號文件)明確規定:「決不允許其以任何方式活動,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發行,達到合法化、公開化;決不允許這些非法組織、非法刊物的成員在單位之間、部門之間、地區之間串連,在組織上、行動上實現任何形式的聯合。……對非法刊物、非法組織的處理,不要登報、廣播。」這就是說,在那段時間,鄧小平、陳雲與胡耀邦在制定《結社

【291】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295 頁。
【292】鄧力群:《十二個春秋》,大風出版社 2006 年 3 月版,第 179-180 頁。

法》、《出版法》問題上的意見相反，正是他們否定了胡耀邦、周揚等主張依法處理公民的出版、結社要求的意見。

鄧小平對於有關保障公民權利立法問題的態度，後來有過變化，曾經表示過贊成，要求抓緊。當然他的出發點，不是保障公民權利，而是以此保持穩定，限制和防止出現不穩定因素。1989 年 3 月 3 日上午，鄧小平同趙紫陽進行過一次談話。趙紫陽向鄧小平談到，有人說中國有言論罪，是不是劃一個界限：違法與不違法，包括結社出版等等。鄧小平說，要抓緊立法。我們不准總搞遊行，要是 360 天天天遊行，就不用幹別的了。要控制嚴一點，不會影響到外資，要讓國外明白，我們控制的嚴一些，是要保持穩定，穩定是改革開放的基本條件。

趙紫陽在這個問題上的出發點，與鄧小平有根本的不同。他的出發點，是要保障。他認為，憲法已經明確規定了公民的各項權利。現在的問題是缺少具體的制度和法規保證。他主持起草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提出，應抓緊制定若干有關保障公民權利和公民申訴的法規，爭取在七屆人大期間（1988 ～ 1993 年）陸續頒布實施。應該說，這種「依法保障」的主張符合憲法的基本要求，是中國法治的一大進步。

按照這一原則，十三大後，全國人大把制定新聞法、出版法、結社法、遊行集會法、行政訴訟法等有關法律列入了立法計劃，並開始協調相關部門，進入了研究起草階段。在要不要制定、如何制定這些法律問題上，當時爭論也很多，阻力很大。但在 1989 年 6 月之前，應該說，趙紫陽主持的中央對加快立法，以法律形式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態度是明確和堅決的。

1989 年 6 月以後，這些立法，除了以限制為目的的示威遊行法，及行政訴訟法之外，統統停擺。時光至今已經過去了 20 多年，新聞法、出版法、結社法這些作為憲政國家保障公民權利的基本法律，在這個號稱「建設社會主義民主」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國度裏，卻依然難產。

十、黨不干預司法，公、檢、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中國的司法體制，與西方的三權分立不同，也有別於前蘇聯時期的司法體制，它最大的「中國特色」，就是依照法律規定，在公安、檢

查院、法院之間相互制約的同時，名義上還要由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設機關進行監督，但實際上又在公、檢、法之上，從中央到地方都要設立一個執政黨的「政法委員會」，統一領導公、檢、法工作。這種名實不符、黨凌駕於司法之上的情況，造成執政黨對政法工作的直接干預過於具體，以黨代政現象十分嚴重，司法難以依法獨立。各級政法委以權代法，直接討論案件、違法干預案件審理的現象屢見不鮮。

《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在政法體制改革方面的設想是：(1) 在政法體制上也要實行黨政分開。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職權。要嚴格履行法定的辦案程序，不再採用黨委領導下的公、檢、法「聯合辦案」的形式。(2) 加強國家權力機關和行政機關對政法工作的領導。黨中央和省（市）委的政法委員會可考慮逐步由政法工作的領導機構轉變為調研機構，地、市、縣委的政法委逐步撤銷。(3) 明確規定各級法官、檢察官的任職資格要求，延長法官、檢察官的任期，規定在任期內無違法行為和重大過失不得免職或調離，從法律和制度上保證國家審判人員、檢察人員依法行使職權。這是加強法制所必須採取的一項具體措施。(4) 加快行政立法。在政治體制改革中，行政立法的工作量很大，須加強這方面的工作。與加強行政立法相適應，還要加強行政法庭的建設。(5) 改變國家包辦律師事務的現狀，制定律師活動的有關法律或條例，推動律師事務的開展，完善辯護制度。

如果這些措施都能得到嚴格貫徹和落實，應該說中國的司法體制將會向著司法獨立的方向大大前進一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將有可能變成現實。趙紫陽認為，政法工作方面的黨政分開，中央應該帶頭。他自擔任中央總書記以後，就開創了中央不討論具體案件，要求司法部門嚴格依法的先例。在十三大後的第二次書記處會議上，也正式提出了撤銷中央政法委，成立中央政法協調小組的問題，此後中央為此正式下發了文件。

遺憾的是，由於實施的時間短，阻力大等原因，在政法體制改革諸項措施的落實過程中，有許多後來並沒有實現。特別是改變中央和省級政法委的工作性質，逐步撤銷市、地以下地方黨委的政法委遇到的阻力很大，還沒有來得及開始；法官、檢察官在任期內無違法行為和重大過失不得免職或調離這一條也沒有落實；至於律師體制改革的成果，應該說在後來堅持下來了，但是在重視和充分發揮律師作用、

嚴格依法保障、支持律師行使辯護權利等方面，還遠未達到理想狀態。特別是時至2010年代，又出現了重慶在薄熙來主政下的所謂「大三長會議【293】」、枉法審判律師【294】、打黑黑打等嚴重違反和破壞法治原則的現象，無疑是中國法治的嚴重倒退。

在現代社會的政治關係中，一個國家的政黨、公權力組織、各種社會組織、公民個人都居於不同的地位，依照憲法和法律行使不同的權力、權利和職能。按照不同組織的性質和職能，理順黨、國家政權機關、各黨派、社會團體、基層單位、公民個人等方面的關係，並使之制度化、法律化，這可以說是80年代這次政治體制改革所要實現的基本目標。

中共十三大報告提出，要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形成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新規範，逐步做到：黨、政權組織同其他社會組織的關係制度化，國家政權組織內部活動制度化，中央、地方、基層之間的關係制度化，人員的培養、選拔、使用和淘汰制度化，基層民主生活制度化，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化。總之，應當通過改革，使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一步一步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實現了「理順關係，使之制度化、法律化」這一目標，就能使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基本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實現黨和國家領導體制從革命體制向建設體制的轉變。因此，作為一場體制內的自我改良，中共十三大前後的政治體制改革，選擇「理順關係，使之制度化、法律化」作為改革的近期目標，無疑是正確的。

【293】指重慶在薄熙來主政期間，由王立軍主持的公、檢、法主要負責人聯席會議。
【294】如李莊案。

第十一章

「物價闖關」和治理整頓

1988年下半年，趙紫陽主持的中共中央，在領導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決策上出現了一次較大失誤，這就是「物價闖關」。趙紫陽及時察覺到這項決策難以執行，果斷建議中央推遲價格改革計劃出台。但其後提出的「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雖然對穩定經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使改革受到了相當大的挫折。黨內一些反對改革的勢力利用這個機會，「在治理整頓的名義下，把已經下放的權力又收回來，把過去搞活的一些措施、政策又重新搞死。一切都向著與改革開放相反的方向扭轉，使已經改革了的經濟體制，又大大地倒退了一步。」【295】同時，趙紫陽的政敵們利用這個失誤，掀起了一股「倒趙風」。這件事情的發生，對當時中共高層的政治格局，和經濟、政治改革造成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本書雖然以政治體制改革為主題，但對這個問題卻不能不涉及，因為這個失誤的發生，是導致十三大後經濟、政治形勢由好變壞的一個轉折點，也是趙紫陽在中共高層的政治博弈中失去主動權的開始。根據筆者掌握的資料，本章對「物價闖關」的提出和決策過程，作一簡要的回顧和探討。

一、「物價闖關」的緣起

趙紫陽在他的回憶錄《改革歷程》中，對1988年初以後他在價格改革方面看法變化的過程曾經有過一段說明，他說：「本來1988年仍然要繼續貫徹前兩年的『軟著陸』方針，但是1988年春天，各方面對物價上漲反映比較強烈，加上實行價格雙軌制的負作用逐漸顯露出來，人們對權錢交易、『官倒』等現象非常不滿意。另一方面，當時也感到幾年來實行調整和放開相結合的物價改革方針，即調放結合的方針，物價雖然年年在上漲，但價格嚴重扭曲的狀況並沒有多少大的改

【295】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148頁。

變。再加上那個時期小平一再督促我們，要我們下決心闖過物價這一關，認為這一關遲早是要過的，『晚過不如早過』，『長痛不如短痛』。由於上述種種情況，便產生了一種想法，與其採取這樣小步前進的辦法，物價雖然上升，但並未改變價格不合理的狀況，不如乾脆有計劃地進行一次較大的物價調整。」「這個物價改革方案雖然後來由於出現了嚴重通貨膨脹，宣佈停止實行，實際上並沒有出台。但是設計這樣一個方案，提出用這種辦法進行物價改革，在指導思想上，在思路上是不正確的。」【296】

關於這件事的責任問題，趙紫陽說：「這件事如果講責任問題，責任不在他身上（指鄧小平），主要是我的責任。因為這些東西都是我提出的。一開始提出搞價格改革是我，中間改革方案的設計、國務院討論的東西也是我主持的，批准的。最後感到有困難，決定推遲、放緩，也是我提出經他同意的。」【297】

趙紫陽把失誤的責任歸結於自己，這樣講，並沒有錯。作為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總書記，出現決策失誤，他是有重大責任的。對此，在現在我們回頭總結經驗教訓的時候，無可諱言，也無須諱言。但是，實事求是地說，1988 年最先提出「價格闖關」的，不是趙紫陽，而是鄧小平。

筆者查閱了 1987 年下半年、1988 年上半年的工作筆記，發現中央原來確定的 1988 年的經濟工作，還是繼續執行「軟著陸」的方針，沒有出台大的價格改革的計劃。趙紫陽從年初開始，他在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工作方面的興奮點，一直主要有兩個，一是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的戰略問題；二是如何穩定物價。

1 月中旬，趙紫陽在給鄧小平的一封信中提出，「為了抓緊利用當前的機遇，沿海地區必須有一個與之相適應的發展戰略。總的來講，沿海地區一億多到兩億人口的地區，必須有領導、有計劃、有步驟地走向國際市場，進一步參加國際交換和國際競爭，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這要作為一個戰略問題來對待。」他認為，「推動沿海地區轉上外向型經濟軌道，加快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不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都是具有戰略意義的。」1 月 23 日，鄧小平批示：「完全贊成。特

【296】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144-145 頁。
【297】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251 頁。

別是放膽的幹，加速步伐，千萬不要貽誤時機。」為了研究和制訂沿海經濟發展戰略，趙紫陽主持中央常委、政治局及中央財經小組召開了多次會議。此後，又召開了全國省長會議，進行部署。

與此同時，趙紫陽也在考慮如何穩定物價的問題。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1985 年全國商品零售物價指數為 8.8%，1986 年為 6%，1987 年為 7.2%。到了 1988 年，物價上漲的勢頭更猛。據測算，如果考慮到正在醞釀採取的改革措施和調價項目等新因素，全年物價指數可能上升到 12% 左右，有些大城市可能接近 20%。為此，國家計委提出，穩定物價是經濟工作的當務之急。1 月 25 日、27 日，趙紫陽主持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國家計委綜合彙報了國務院辦公會議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分析。在聽取彙報後，趙紫陽提出，1987 年的價格上漲，主要是食品價格上漲。在農產品價格提高的情況下，要在抑制食品的價格上找到一個辦法。

此外，在這段時間的歷次中央常委和政治局會議上，還議到了廉政建設、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強和改造、企業法修改、工會改革、做好準備應付突發事件等許多方面的問題。但從未涉及到「物價闖關」。3 月 15 日至 19 日舉行的中共十三屆二中全會，在趙紫陽的工作報告和會議討論的問題中，也沒有涉及到「物價闖關」問題。

4 月初，國務院宣佈，豬肉、鮮蛋、食糖、大路菜 4 種副食品的價格補貼由暗補改為明補。過去，國家財政補貼給商業部門，以保持這 4 種副食品較低的價格。現在補給居民，同時把價格放開。很快，豬肉、鮮菜價格開始大幅度上漲。這個時候，趙紫陽多次談到要主動理順價格關係問題。2 日，他在生產資料價格改革座談會上說：國家每年強調穩定物價，怕亂漲價，不敢主動漲價，結果導致自發亂漲價，越亂國家越不敢漲價。工資也是如此，怕漲工資，就去控制消費基金，不敢提工資改革方案，實際上消費基金也上去了。導致這種後果的關鍵是缺少主動地去理順各方面的關係。輪番漲價要承認它，關鍵是如何駕馭它。如果物價漲了，工資也能提上去，經濟又發展了，我看就不可怕。我們是到了不進則退的時候了。物價改革如果不前進，而退回去，那將有許多矛盾不好解決。【298】趙紫陽的這個講話，說明他已

【298】參見房維中主編：《在風浪中前進——中國發展與改革編年紀事 1977-1989》），1988 年卷，第 118-119 頁。

經開始意識到，價格問題，已經成為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道路上的攔路虎，必須要加以面對了。但是，直到這個時候，趙紫陽的談話中仍然沒有涉及下決心搞「物價闖關」的問題。

直到 5 月 16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工資物價問題時，趙紫陽開始明確談到物價改革和「過關」問題，他說，今年的物價上漲幅度比較大，全年估計超過 15%，也可能達到 17% 到 18%。這是改革以來物價上漲幅度最大的一年，形勢是嚴峻的。現在我們決心搞好物價改革，看主要採取些什麼措施，集中力量過好這一關。過好了可以為下一步發展打下基礎。趙紫陽還說，在物價工資問題上必須要有一個長遠的打算，提出一個系統方案，納入改革計劃，分步實施。反正是要過關，是否在北戴河對物價工資問題好好研究一下。【299】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趙紫陽會在中央常委會上提出「現在我們決心搞好物價改革」「過好這一關」的問題？據鮑彤回憶，在此前的中央各種會議上，趙紫陽都沒有談到要對「過好這一關」下決心，那麼這個「決心」是誰幫趙紫陽下的？什麼時候下的？據現在掌握的資料看，是鄧小平發了話。

1988 年 5 月 5 日，李鵬到鄧小平那裏彙報工作。鄧小平問：七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代表們意見最大的是什麼事？」李鵬說：「是價格問題。」他認為，是雙軌價格造成的腐敗和經濟秩序混亂。鄧小平說：「要下決心闖過價格這一關。」事後，李鵬向政治局常委傳達了鄧小平關於加快價格闖關、長痛不如短痛的意見。【300】

【299】參見房維中主編：《在風浪中前進——中國發展與改革編年紀事 1977-1989》)，1988 年卷，第 145-146 頁。

【300】鄧小平與李鵬這次談話的具體日期，筆者係根據《鄧小平年譜》及《李鵬經濟日記（徵求意見稿)》的記載所確定。楊繼繩在《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一書中曾經談到鄧與李這次談話的情況（見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修訂版第 310 頁）。但該書說，談話的發生時間是 1988 年 3、4 月，全國人人大開會期間，筆者認為有誤。據《鄧小平年譜（下卷)》所記，鄧小平是「5 月 5 日在住地同李鵬談話」，但並未記載這次談話的內容，年譜在 1988 年上半年也沒有鄧與李鵬談話的其他記載。筆者找到了在坊間流傳的《李鵬經濟日記（徵求意見稿)》電子版，該稿上載了 1988 年 5 月 5 日日記簡單記述了鄧小平與李鵬的這次談話，鄧問「能不能用 3 年時間扭轉物價上漲局面」，但日記中並未有直接涉及「物價闖關」的記述。這段日記記載的內容，可證明李鵬在 1988 年上半年去鄧小平家裏談話僅此一次，鄧小平同李鵬談到「要下決心闖過價格這一關」，只能是在這次。《李鵬經濟日記》2007 年正式出版時，有關這次談話的內容被全部刪除。據現在能看到的各種資料和回憶來看，鄧在此前的歷次公開談話中從未直接涉及過「物價闖關」問題，只是到了 1988 年 5 月 18、19 日以後，他在

據筆者瞭解到，鄧小平在這個時候提出「要下決心闖過價格這一關」不是偶然的，很可能與他的兒子鄧樸方【301】有關。筆者 2012 年 5 月在與過去的同事，原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社會改革局副局長唐欣【302】聊天時，聽到他講到當時的一件與此有關的事情。1987 年底，曾任張勁夫【303】秘書，當時在光大集團工作的孔丹【304】、曾任宋任窮【305】秘書，後到中信公司的秦曉【306】、時任北京市物價局局長的馬凱【307】和其他幾位青年學者在議論當時經濟改革的形勢時，提出了一個「改革遭遇泥潭期」的理論，認為，價格雙軌制的弊端已經盡顯，實施完全的價格改革，向單一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價格體制過渡，是大勢所趨。但是，如果放開物價，物價勢必大幅度上漲，發生搶購、擠兌，有可能出現較大規模的社會混亂，甚至天下大亂的局面。這種情況，波蘭、南斯拉夫等東歐國家都有前車之鑒。要想比較平穩地度過這個「泥潭期」，必須加強中央控制，這需要有強有力的政府權威。所以他們提出一個觀點，認為應該趁著鄧小平、陳雲這些老人家健在的時候，盡早闖過這一關，把這最難過的一步邁過去。

此後不久，孔丹見到老同學唐欣，談到了他們的上述看法。1988 年 2 月，唐欣與鄧小平之子鄧樸方見了一面（他們是朋友），聊天中唐欣轉述了孔丹等人的「改革遭遇泥潭期」理論和上述對「價格闖關」

同外賓談話中才開始連續多次談到物價改革和「過關斬將」問題，這與中央政治局常委連續開會，提出要過物價關的問題，在時間上也大體是一致的。

【301】鄧樸方（1944-）：鄧小平長子，生於山西左權。1962 年考入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文革中受迫害致殘，高位截癱。1983 年創辦中國殘疾人事業，1984 年任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副理事長、理事長。1988 年 -2008 年起連任第一、二、三、四屆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主席。2008 年起任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名譽主席，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會長。

【302】唐欣是原冶金部部長唐克之子，時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社會改革局副局長。

【303】張勁夫（1914-）：安徽肥東人。1982-1988 年任國務委員兼國家經委主任。時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中顧委常委。

【304】孔丹是中共老資格的革命家、原對外經貿部副部長、國務院外辦主任孔原之子。其母許明，長期擔任周恩來總理的秘書，曾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孔丹 1981 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1982 至 1984 年在國務委員兼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辦公室工作。1984 年至 2000 年擔任中國光大集團高級管理職務。2000 年至 2006 年擔任中信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經理。現已退休。

【305】宋任窮，開國上將，時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

【306】秦曉是中共老幹部曾任西康省委副書記、中科院辦公廳主任、副秘書長的秦力生之子。後擔任招商局集團董事長和招商銀行董事長。

【307】馬凱，現任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

看法。唐欣回憶當時的經過時說，「在我和樸方談這個看法的過程中，樸方一言未發，但是聽得特別認真」。

唐欣在與筆者交談時認為，此後雖然他沒能再有機會與鄧樸方交流此事，但鄧樸方極有可能在回家後，將這種看法講給他的父親鄧小平聽，從而引發了鄧小平對「物價闖關」問題的思考。筆者同意唐欣的這個看法。

對於物價問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的地位，鄧小平早有認識。1984 年 11 月 9 日，他在會見意大利共產黨負責人時就說過：「城市經濟體制的改革有不少問題，首要的問題是物價問題。」【308】1985 年 7 月 11 日，鄧小平在聽取胡耀邦、趙紫陽等彙報當前經濟情況時也曾直接指出：「物價改革是個很大的難關，但這個關非過不可。不過這個關，就得不到持續發展的基礎。」【309】在這種思想基礎上，如果鄧樸方在與唐欣談過之後，向老爺子轉達了孔丹等人的「趁著老人家健在的時候，盡早闖過這一關」的看法，從而引起鄧小平的重視和思考，就幾乎是必然的。【310】

正因為如此，當 5 月 5 日李鵬向鄧小平彙報，談到「代表們意見最多的是物價問題」時，鄧才有可能提出「要下決心闖過價格這一關」，並要李鵬向中央政治局轉達他的意見。此後鄧小平就開始在同外賓談話時反覆講到這個問題。當然，從前面講到的 5 月 16 中央常委會和後來的多次中央常委會、政治局會上趙紫陽的講話中可以看到，趙本人的態度很明確，對鄧提出的「價格闖關」他是積極贊成、支持的。對此，也無須諱言。

但是，無論是趙紫陽在位的時候，還是後來被審查的時候，他都沒有透露過「物價闖關」是鄧小平提出來的，更沒有把「物價闖關」決策失誤的責任歸之於鄧小平。鮑彤後來回憶說：「闖關過後，我曾經問過紫陽，『價格闖關』是誰提出來的？紫陽沒有直接回答。他和我說的是：這個問題應該由我負責任，因為我是同意的，小平同志是支持我們改革。是我在財經小組上提出來搞一個價格改革方案，請依林同志來主持。整個思路我是同意的，當然我最後是把它制止了。」

【308】《鄧小平年譜》下冊，第 1014-1015 頁。

【309】《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 131 頁。

【310】當然，這裏談的只是唐欣與筆者的推斷，還須其他資料的佐證。

2012年7月，筆者為搞清當年「物價闖關」的問題，再次專門訪問了鮑彤，他向筆者說：「當年討論價格闖關的時候，我心裏曾經有過疑惑，隱約感覺到這件事應該是鄧小平提出來的，也曾為此問過紫陽，但他沒有告訴我。我出獄以後，這個疑惑仍然揮之不去。2000年前後，當時我自己和紫陽都在受到監視之中，我不方便去見紫陽，我就通過朋友拐了個彎去問紫陽。過了許久，紫陽才通過別人給了我一個回答，他說，確實是小平提出來的，但是不管怎麼樣，我那時是總書記，是財經小組組長，我應該負這個責任，不應該由小平來承擔這個責任。我覺得紫陽這個態度是前後非常一貫、非常堅定，從來沒有動搖過，從沒想過要把這個責任推到別人身上去。我覺得他是非常光明磊落的。」

但是，在1988年9、10月那段時間裏，瞭解「物價闖關」這個主意由來的一些知情者們卻是十分擔心趙紫陽承受不住壓力，或是不想承擔這個決策失誤的責任，在這個時候把鄧小平「供」出來。在《李鵬經濟日記（徵求意見稿，上》中，曾經有過這樣一段記載：中央政治局作出「物價闖關」暫緩進行的決策幾天後的1988年9月11日，「11時，我去薄老【311】處談了一個多小時。他講了一些小平同志講話內容。薄老又問我，是否聽到趙總書記說過物價改革是小平同志的主意。我說，沒有聽到他講過這樣的話。我想，總應實事求是。」【312】李鵬的這段記載，後來在該書正式出版時，被刪除了。但這種欲蓋彌彰，恰恰證明了這樣幾個問題：一是物價改革確實是「小平同志的主意」；二是老人們擔心，趙紫陽不願意背這個「黑鍋」，會把事實講出來；三是最瞭解事情來龍去脈的李鵬也不得不「實事求是」地證明，趙紫陽並沒有推卸自己在「物價闖關」失誤中的責任。也許正是通過這件事情，鄧小平認為趙紫陽經受住了考驗，對他是忠誠的，可以信賴的，當後來「倒趙風」刮起來的時候，他才力排眾議，支持了趙紫陽。

筆者為了寫作本書，查閱了多年來，官方陸續出版的可能涉及到當年「物價闖關」的有關領導人的著述、傳記和回憶，包括《鄧小平文選》第3卷、《鄧小平年譜》、《陳雲傳》、《李鵬經濟日記》等等。但

【311】薄老，即薄一波。

【312】《李鵬經濟日記（徵求意見稿，上》，1988年9月11日。

在這些書中，無一例外地抹去了「物價闖關」這項失誤決策的初始來歷，也許是要「為尊者諱」吧。在一些書中，反而若隱若現地把責任全歸結到趙紫陽頭上，批評趙紫陽，說他「不肯作自我批評」。

只是到了趙紫陽逝世幾年以後，他的錄音回憶錄出版，人們在其中才算看到了一點蛛絲馬跡。趙紫陽在講到「倒趙風」中，李鵬、姚依林以「物價闖關」失敗為由，向他「算賬」時說：「1989 年元旦前，政治局常委開生活會，李鵬、姚依林帶頭批評我。其實那時他們已把我架空，但他們在會上都說我過問太多，他這個總理很難當。同時對改革開放這一套東西，提出了許多奇奇怪怪的問題。姚依林更直截了當地說，攻價格關這是什麼意思？是怎麼出來的？他當時沒有弄清楚這話不是我先講的，而是鄧小平講的，他以為是我提出來的，以此對我攻擊，實際上要清算，來算賬。這次會議很明顯，矛頭指向我在經濟改革中的責任問題。」【313】看來，姚依林在這裏是把事情搞反了，他以為「物價闖關」是趙紫陽向鄧小平提出來的，並得到了鄧的支持，卻不知是鄧小平先提出來的，得到了趙的響應。他搞了個大「烏龍」，因為這一批就批到了鄧小平頭上。

二、陳雲反對「物價闖關」的意見為什麼沒有被採納？

1988 年 5 月 19 日上午，鄧小平會見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朝鮮人民武裝力量部部長吳振宇。在談話中，鄧小平直接談到了中國的物價改革問題。鄧小平說：「我們黨的十三大和全國人大七屆一次會議，精神都是進一步解放思想，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理順物價，改革才能加快步伐。最近我們決定放開肉、蛋、菜、糖四種副食品價格，先走一步。中國不是有一個『過五關斬六將』的關公的故事嗎？我們可能比關公還要過更多的『關』，斬更多的『將』。過一關很不容易，要擔很大風險。但是物價改革非搞不可，要迎著風險、迎著困難上。對經濟工作，趙紫陽同志比較熟，看來方針政策是對的。我總是告訴我的同志們不要怕冒風險，膽子要再大一些，如果前怕狼後怕虎，就走不了路。將來出了差錯主要責任是我的。」【314】這個談話的一部分後來收入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題為〈理順物價，加速改革〉。但其

【313】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260 頁。

【314】參見房維中：《在風浪中前進——中國發展與改革編年紀事 1977-1989》，1988 年卷，第 152-153 頁。

中「對經濟工作，趙紫陽同志比較熟，看來方針政策是對的……將來出了差錯主要責任是我的。」一段話在出版時被刪除。

顯然，鄧小平是積極主張「物價闖關」的，而且作為一個政治家，他不惜為此承擔責任。那麼，中共黨內的另一位元老，具有豐富的經濟工作經驗而又經常與鄧小平唱反調的陳雲，對這個問題又是什麼態度呢？

無論當年在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工作期間，還是後來相當長一段時間裏，筆者從未看到任何資料，或是聽任何人說起，陳雲在「物價闖關」問題上曾經表示過不同意見。只是到 2005 年，筆者方才看到《炎黃春秋》雜誌刊載了一篇名為〈一九八八年物價闖關前後〉的文章，署名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這種中共中央文獻研究部門正式發表署名文章的方式，以往十分罕見，可見很鄭重其事。

此文第一次公開談到了陳雲對「物價闖關」問題的態度，方讓人們知道，當年陳雲曾經對價格改革有過不同意見。文中說，1988 年「5 月 18 日，姚依林到陳雲處，通報趙紫陽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對價格、工資改革的意見。姚依林說：我們設想，從明年開始，每年價格上漲百分之十，連漲五年。每年人均收入增加百分之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算四筆賬。陳雲問：你看可以理順價格？姚依林答：我講初步理順，用五年時間。陳又問：物價連漲五年，情況會有什麼變化？姚答：價格總水平提高百分之六十到八十，工資增加百分之百。陳雲表示懷疑，說：『物價每年上漲百分之十，連漲五年，我打個很大問號。』姚依林說：這條路是否走得通，我也沒有把握。陳雲進一步點出：問題是，物價連續上漲百分之十，影響的面很大。如果把這個計劃公佈於眾，趙紫陽敢講不敢講？姚依林：那非講不可。陳雲又談到物價上漲後不拿工資的農民怎麼辦，並說：根本問題是農民從土地轉出來，拿工資，比當農民好得多。但這個事很不容易。我們有生之年，農業過不了關。1984 年糧食豐收，有些人頭腦發熱。我說，萬元戶沒有那麼多，無糧則亂。當時，有些人不相信。這次談的是一個牽動整個國計民生大局的問題，因此談了兩個多小時才結束。」

文章還講到了陳雲就此問題的另一次談話。「5 月 28 日，陳雲同李鵬談話，明確反對擬議中的價格、工資改革辦法。他斬釘截鐵地講了他的不同看法：『每年物價上漲百分之十，辦不到。我是算賬派，

腦子裏有數目字。理順價格在你們有生之年理不順，財政補貼取消不了。』」【315】

這篇文章在談到陳雲的談話之後，以十分遺憾的口吻說，價格改革方案後來在北戴河由趙紫陽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並原則通過。「8 月 19 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公報，報道了價格改革方案的基本內容。陳雲的提醒沒有被採納。」聯繫上下文的敘述過程來看，該文這裏明顯是在指責趙紫陽拒不「採納」陳雲的「提醒」。但從筆者掌握的中央決策過程資料來看，事實上，陳雲同姚依林、李鵬的這兩次談話，陳雲對「物價闖關」的意見，在當時中央常委、政治局、中央財經小組的會議上根本沒有被傳達，也許趙紫陽根本都不瞭解，如何談得上「採納」?

筆者曾就此專門訪問了鮑彤，鮑說，他從未看過或是聽說過這篇文章，更沒有聽聞過此事。作為政治局常委的政治秘書，他曾經列席了那段時間所有的中央常委會、政治局會和書記處會。他可以肯定的說，沒有聽到任何人傳達過陳雲對「物價闖關」的意見，也從沒有聽趙紫陽談起過陳雲對「物價闖關」有不同意見，更沒有直接或間接地聽到過向陳雲彙報的兩位當事人李鵬和姚依林在任何場合提起過陳雲的意見。

筆者後來為此又訪問了趙紫陽的另一位秘書李樹橋，他說那段時間他也從未聽說過陳雲對「物價闖關」表示過意見。只是在 2005 年以後，他看到了金冲及、陳群的《陳雲傳》【316】，方知有此事。李樹橋在 2008 年 10 月，還曾經就此事專門問了時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國家體改委常務副主任的安志文，「1988 年陳雲明確反對物價闖關，當時您聽到過傳達嗎？」安明確地回答：「沒有聽到過傳達！」【317】從這幾位親歷者所言的情況看，陳雲對「物價闖關」的意見，沒有任何人在

【315】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一九八八年物價闖關前後》，載《炎黃春秋》雜誌 2005 年第 10 期。2007 年出版的《李鵬經濟日記》上卷，1988 年 5 月 28 日簡要記載了李鵬與陳雲的談話，但沒有引述陳雲的原話。見新華出版社 2007 年 2 月版，第 534 頁。

【316】金冲及、陳群：《陳雲傳》，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5 年 5 月出版。前面所提到的《炎黃春秋》雜誌上那篇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署名的〈一九八八年物價闖關前後〉，據文後記說，是該書第 43 章的一部分。

【317】見《趙紫陽生平和思想研究》第 21 期，載《歷史研究集粹》第二集，第 160-161 頁。

當時的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乃至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會議上做過任何傳達。

筆者為此還查閱了趙紫陽的回憶錄《改革歷程》、宗鳳鳴【318】《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杜導正【319】日記《趙紫陽還說過什麼》，以及房維中主編的《在風浪中前進——中國發展與改革編年紀事》1988 年卷（其中載有 5 月 16、19 日中央常委會、30 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價格改革問題的記錄）等相關書籍資料，都未見任何有對陳云「物價闖關」意見的記述。在《李鵬經濟日記》1988 年 5 月 28 日的日記中倒是談到了「去陳雲同志處談話」，但是所記陳雲談話內容，只是說「物價不可能一下子理順」，並沒有說陳雲「斬釘截鐵地」「明確反對擬議中的價格、工資改革辦法」。在《李鵬經濟日記》關於 5 月 30 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記述中，也沒有關於他向會議傳達陳雲反對「物價闖關」意見的記載。【320】

陳雲當時的職務是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以其在黨內幾乎與鄧小平並駕齊驅的地位而論，特別是以其在經濟工作中的影響而論，他對價格改革的意見無論如何都應該在中央主要負責人中傳達的，可事實就是如此！那麼，李鵬、姚依林為什麼要對中央其他常委、對中央政治局隱瞞陳雲的意見？

鮑彤在看過署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這篇署名文章後，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姚依林去陳雲處彙報，是代表他個人，還是代表中央常委？文中說「5 月 18 日姚依林到陳雲處，通報趙紫陽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對價格、工資改革的意見」，從這段行文中，好像姚是代表趙紫陽和中央常委向陳「通報」。如果是如此，為什麼無論是在姚依林向陳雲「通報」的第二天，即 5 月 19 日的常委會上，還是在 5 月 30 日中央政治局會上，姚都沒有向趙紫陽和其他中央常委或是政治局委員提到此事？姚依林在代表常委「通報」回來後，難道不應該向常委或政治局傳達陳雲的意見嗎？二是作為中共黨內第一號「經濟專

【318】宗鳳鳴（1920-2010）：河南濮陽人。建國前曾長期與趙紫陽共事。1980 年代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黨委副書記、副院長。後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常務理事，1990 年離休。1997 年到 2004 年以氣功師名義探訪趙紫陽上百次，並對二人的談話做了幾十萬字的記錄，留下了珍貴的史料。

【319】杜導正（1923-），原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現任《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

【320】參見《李鵬經濟日記》上卷，新華出版社 2007 年 2 月版，第 534-535 頁。

家」，陳雲當時並沒有「全退」，而是任中顧委主任，李鵬當時則是中央常委、國務院總理。「5月28日，陳雲同李鵬談話，明確反對擬議中的價格、工資改革辦法」，而且口氣是「斬釘截鐵地」，那麼從組織原則上說，李鵬就有責任在這個重大決策關頭，向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傳達中顧委主任的這一重要意見，而他為什麼沒有在兩天後，即5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傳達？

鮑彤認為，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他們不敢傳達。鮑彤說，在1980年代的中共黨內，鄧小平和陳雲在許多問題上有不同意見，有時候因為他們互相不願見面，連中央常委會都開不起來。【321】特別是在經濟體制改革問題上，陳雲主張「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鄧小平則支持支持趙紫陽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主張。後來隨著鄧小平在黨內影響日重，陳雲就基本上不再講話了。十三屆一中全會上的那個決議，使鄧小平成了黨的「最終決策人」，中央常委只有了鄧小平這「一個婆婆」，黨內已經幾乎沒有任何人敢於挑戰鄧小平的權威。李鵬和姚依林都很清楚，「物價闖關」是鄧小平要李鵬向政治局傳達並極力主張的。在這個涉及到黨內重大決策的關鍵時候，如果讓鄧小平知道，他們沒事找事地去向陳雲彙報，並在中央常委和政治局會議上傳達陳雲的反對意見，那就等於他們明確站到了陳雲一邊，直接向鄧小平的權威挑戰。這對於李鵬和姚依林說來，是無論如何也不敢做的。或許他們對趙紫陽有不滿，或許他們認為「闖關」是趙紫陽向鄧小平建議的（下文還要談到這點），或許他們從內心裏對鄧小平、趙紫陽聯手推動經濟體制改革早有不同意見，但要他們挾陳雲之威，直接向鄧小平本人挑戰，那是打死也不敢的。

鮑彤還談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是中共掌握、研究、編撰黨的最高領導人講話、著述的最權威的部門。此文發表時，「物價闖關」已經過去了16年，他們不可能不知道，當年是鄧小平首先提出價格攻關的。所謂財經小組提出要攻關，常委決定要攻關，趙紫陽決定要攻關，其實是鄧小平要趙紫陽在常委、政治局、財經小組上提出來攻關；他們也不可能不知道李鵬、姚依林在見過陳雲後，根本沒有向中央常委、政治局、財經小組傳達陳雲的意見。李，姚二人既是中央常

【321】參見鮑彤〈我看胡趙關係〉，載《鮑彤文集——二十一世紀編》，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2年7月版，第407-409頁。

委、政治局委員，也是中央財經小組成員，又是陳雲談話的當事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文章不去批評鄧小平沒有採納陳雲的意見，不去批評李、姚在中央的重大決策關頭向中央常委和政治局隱瞞中顧委主任陳雲的意見，卻在文中若隱若現地指責不知陳雲有過「意見」的趙紫陽「沒有採納」陳雲的意見，導致了中央決策的失誤，這算是什麼邏輯？在趙紫陽剛剛離世，已經無法再為自己辯護之後不久【322】，該文作者就發表這樣的文章，不惜用嫁禍於人的方式向趙紫陽潑污水，落井下石，其政治道德何在？

鮑彤笑談說，這段歷史公案，連陳、李、姚等當事人本人都一直隱瞞，絕口不談，「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為了證明趙紫陽一意孤行，卻把陳雲與李鵬、姚依林的談話作為證據公之於眾，是有意為之，還是無意中幫了倒忙？

三、「物價闖關」的決策經過

1988 年 5 月 19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再次開會討論物價問題。在這次會議上，趙紫陽說，現在改革到了一個關鍵的時期。第一，要有個統一的認識，形成正確的指導思想，要搞個文件；第二，國務院要搞個方案；第三，必須為改革創造條件，要準備它出事，要排除干擾，保持穩定。趙紫陽提出，由國務院制定一個 5 年物價工資改革方案，提交北戴河會議討論。

到會的中央常委和列席常委會的楊尚昆、薄一波等也都了發言，贊成趙紫陽的意見。姚依林表示，五年內物價過關可以考慮；李鵬說改革應該有長遠考慮，物價問題沒有退路；宋平說贊成，用小震避免大震；安志文說拖不過去，跳不過去，難度也很大。趙紫陽說，物價越往後拖矛盾越大問題越多，如果全黨統一再加上其他措施，穩定地渡過這一關有沒有可能？薄一波說有可能。楊尚昆說，必須闖過這一關。薄一波說贊成，不要把難題往後拖。小平最近講亂子可能會有一點，要有個方案。喬石說，物價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不利，現在還有承受力，能四年就不要五年。

會後，國務院成立物價委員會，以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為主任。

【322】趙紫陽於 2005 年 1 月 17 日辭世；該文發表於同年 10 月。

5月30日，為了貫徹鄧小平5月19日關於「物價闖關」的談話，政治局召開有各省市委書記參加的擴大會議，討論物價改革問題。趙紫陽在會上圍繞物價改革，講了10個問題。他指出，看來，改革已到關健時刻。情況是：比較容易的改革做了不少，難度大的而又不可能繞開的問題主要是勞動、物價問題擺在我們面前。現在形勢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退是沒有出路的，前功盡棄，不可收拾。必須像小平同志講的，冒點風險，迎著風浪前進，闖過難關。這關闖過了，就可以出現新的局面。

趙紫陽說，財經小組認為，不要迴避矛盾，不要把難題都推到最後才解決。再緩兩年還可以，但那時難度更大。最終將會失去解決問題的條件，代價會越來越大，矛盾越來越多。物價工資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該解決的不解決，就會自發地盲目地膨脹。結果工資沒少發，物價沒少漲，什麼問題也沒有解決。因此，必須主動解決。我們現在好的條件是，生產不斷增長，收入不斷增加，改革有一定承受能力。東歐經驗證明，如錯過好時機，等速度下來了，再去改革，就必然被迫降低人民生活，引起更大的社會震盪，甚至出現政治危險。當前形勢很好，老革命家健在，必須抓緊時間把難的問題解決好，同心同德，共渡難關。」

此後，「價格闖關」成為當時黨中央和國務院的工作重心。從6月2日起，在姚依林的主持下，國務院物價委員會組織各有關部門，用1個多月的時間，研究討論了今後5年（1989-1993）和明年的價格、工資改革問題，提出了一個初步設想。7月11日，向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作了彙報，隨後對原來的設想進行了補充、修改。8月5日到9日，國務院第16次常務會議進行討論，原則同意物價委員會提出的設想，並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

1988年8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十三大以來的第十次會議，討論由姚依林主持制定的價格改革方案。趙紫陽首先講了話，他說，要討論的問題主要有兩個：第一是方案出台以後，怎麼能保證不出大問題；第二是各方面的改革怎麼配套，我們的改革要怎麼樣才能避免出現東歐的情況，即改來改去，反而出現了高水平的價格比價復歸。五年之後能不能達到價格改革的預期目的，關鍵問題

就在這裏。接著，他從如何做好配套的角度，談了對壓縮基本建設，壓縮國內緊俏商品出口、壓縮社會集團購買力等問題的看法。

在討論中，出席及列席會議的楊尚昆、薄一波、田紀雲、習仲勳、喬石、杜潤生、胡啟立、李瑞環、王任重【323】、吳學謙【324】、宋平、張勁夫等，都分別發表了意見，大都表示原則同意國務院的方案和趙紫陽的講話。只有李瑞環似乎有些不同意見，但也沒有明確說，只是說，對方案本身沒什麼意見，有些還看不準，建議在更大範圍內徵求意見。曾經列席這次會議的鮑彤後來回憶說：「在我的印象中，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這個方案，一些人是溜著邊講話，既不明確說贊成，也不直接說反對。因為大家心裏都清楚，『價格闖關』，風險很大。」

會議原則批准了國務院提出的價格改革方案。結束時，趙紫陽從10個方面，對會議做了總結，他說，物價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物價改革要以整個經濟體制改革配套為條件。現在中國改革進入了全面改革的攻堅階段，是以物價改革為主線的，全面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整個改革是以價格改革為關鍵的整個機制的轉換。趙紫陽強調，改革成功的關鍵，在於全黨統一認識。改革有極大的成功希望，也有失敗的可能，要看全黨能否統一認識，令行禁止，如果不成功，後果極為嚴重。

趙紫陽還提出了中央下一步的工作安排：九月中旬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專家和黨外人士要召開座談會，徵求意見。接著開三中全會。全會的工作報告、思想工作決議的起草工作要抓緊進行。會後，他要求中辦就會議討論的意見起草一個會議紀要。

8月19日上午，趙紫陽到鄧小平那裏談了政治局會議的意見。鄧表示完全同意。鄧還問到，你看還有什麼問題？紫陽回答信心不足。小平講了兩條，一是要講發揮優勢，講大局守紀律，各講各的就會影響大局，黨的領導、行動統一靠紀律。丟了優勢就會遇到困難，所以還要講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二是要相信群眾，中國群眾很好，關鍵是讓他們知道，政治局討論了，要告訴他們。爭論紛紛，最

【323】王任重（1917-1992）：河北景縣人。1978年後，歷任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農委主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財經委員會主任委員，第七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324】吳學謙（1921-2008）：上海嘉定人。1982-1988年任外交部長。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1993年任政協副主席。

壞的是不瞭解情況，瞭解了情況就會取得人民支持，最後要回到中央的方案上來。

四、趙紫陽果斷提出：價格改革推遲進行

8 月 19 日的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一條重要新聞：8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第十次全體會議，討論並原則通過了《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但是並沒有具體講從什麼時候開始改革，也沒有直接出台價格改革的任何一條措施。人們本來已經對一段時間來的物價上漲感到壓力，這段新聞更加劇了他們對漲價的心理預期。當天，各地就出現了搶購，搶購又帶來了消費品價格的大幅度上漲。與搶購同時發生的還有銀行的擠兌風潮。

此後的兩周內，搶購潮和擠兌風迅速漫延到全國。看那幾天的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幾乎滿眼皆是，觸目驚心。上半年，全國物價總指數在 1987 年已上漲 7.3% 的基礎上，又連月大幅度上漲，7 月份已達到 19.3%，8 月份更是達到 20% 以上。受搶購影響，8 月份居民提取儲蓄存款 389.4 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 1.3 倍，大大超出儲蓄存款增長 70.3% 的幅度。各地反映，部分商品庫存已經超出最低警戒線。

8 月下旬，中央結束北戴河辦公返回北京。看到各方面匯總來的情況，趙紫陽感到，這樣下去不行，有必要重新考慮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會議的決議。從 26 日以後的三天裏，他多次與中央常委、政治局、國務院、中央財經小組的有關同志溝通，提出自己的想法，得到了他們的支持，並徵得了鄧小平的同意，決定推遲價格改革方案的出台。本來，鄧小平對「價格闖關」是很想幹下去的，但是看到趙紫陽和姚依林都說有必要進行調整，也只好同意。

8 月 29 日上午，趙紫陽主持中央財經小組會議，確定了價格改革方案推遲出台。從現在起到明年，要集中力量治理環境，整頓和建立秩序，認為這是價格改革順利出台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條件。30 日，李鵬主持國務院第 20 次常務會議，通過了關於做好當前物價工作和穩定市場的決定。其中包括，向群眾解釋北戴河會議說的物價闖關不是馬上完成，而是 5 年或更長一點時間；下半年不再出台調價的決定，加強物價管理；開辦保值儲蓄，使 3 年以上的存款利息不低於以至略高於物價上漲幅度；堅決壓縮基本建設規模，控制貨幣發行，做好

糧、棉、油的收購工作，保證市場供應，整頓市場秩序等等。這些措施落實以後，搶購風潮終於逐漸平息。

9月2日，中央政治局舉行了第十一次會議。會議開始時，趙紫陽首先講了十條看法。他建議，現在五年的方案基本不變，不過步驟上要重新考慮。物價、工資改革不變的情況下，要放慢明年的速度，物價改革步子放小一點。最近出現了大的提款搶購風，貨幣發行量超過了政治局第十次會議的預計，至少多花了150億。今年農業欠收已成定局，減產不小，也增加了明年物價改革的難度。物價改革方案五年不變，不過步驟上要重新考慮。第一步即明年這一步，步子要小一些，具體說鋼材價格先不搞。

會上，趙紫陽提出，明年改革的重點，要轉到治理環境、整頓和建立商品經濟秩序，深化和展開價格改革所必須的配套改革上來。明年必須採取堅決措施，控制物價，使之明顯低於今年。這對於提高人民對改革的信心，緩解緊張心理，創造改革條件，意義重大。這是經濟任務，也是政治任務，要千方百計的達到這個目標。趙紫陽發言後，與會的其他政治局委員對推遲價格改革的出台都表示贊同。

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後半部分，討論的內容發生了變化，開成了一個「組織生活會」。起因是在姚依林發言之後，李鵬提出了一個問題：外電這幾天說我們的改革受阻，放慢了步驟，還說國務院與中央不一致，這個問題需要說明一下，國務院的決定是紫陽同志指示的。李鵬提出這個問題，當然是有所指。

前幾天，在中央高層醞釀對「物價闖關」決策調整，並經鄧小平同意以後，趙紫陽決定，在中央財經小組的下周例會上，也就是8月29日對這個問題進行討論。當時，趙紫陽仍擔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325】。據鮑彤回憶，就在中央財經小組還沒有開會，新的決策也還沒有得到中央政治局正式認可的時候，8月27日，李鵬搶先要國務院辦公廳給各省、直轄市政府打電話，說「價格改革方案停止執行」。這

【325】趙紫陽在他的回憶錄《改革歷程》中談到：「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是十三大籌備期間，鄧小平提出的一種組織形式。目的是在我不兼總理後仍然能指導經濟建設和改革。因為當時我不兼總理，李鵬當總理，許多人有顧慮，中國的經濟改革和建設多年來是我領導的，我比較熟悉。而李鵬對經濟改革的態度一直是不明朗的，對他也不放心。所以鄧小平專門確定一條，我不擔任總理後仍然要管經濟工作，因而專門成立財經領導小組。財經小組實際上是使我繼續領導經濟工作的一個組織形式。」（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57頁）。

讓各地方大員們感到莫名其妙。中央政治局說要改革，媒體也發了消息，現在國務院卻來電話通知說「不執行了」，這是怎麼一回事？下面議論紛紛。有人說：「財經小組犯錯誤了，價格改革是冒進。」好像是國務院「糾正」了中央財經小組的錯誤。緊接著，港台媒體上就出現了「中央與國務院不一致」的說法。對李鵬的這種做法，趙紫陽確實很不高興。

鮑彤這裏談到的8月27日李鵬要國務院辦公廳給各省市政府打電話的情況，筆者目前還未見有其它公開的直接資料可以佐證，但卻有一個間接的證明，這就是《李鵬經濟日記（徵求意見稿，上）》。在這個「徵求意見稿」的1988年8月30日記載中，一開始就講：「上午9時，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了國務院通知。經過熱烈討論，基本取得一致意見。下午，又把通知和新聞稿寫出來。總書記親自作了修改，取消了一些段落，把總書記和國務院主要負責同志看法是一致的話去掉了。他的意思是，說不清楚，不如不說。批語是『在目前有些話不講反而好些』。」【326】這裏說趙紫陽「把總書記和國務院主要負責同志看法是一致的話去掉了」，就表明當時外面已經有了「總書記和國務院主要負責同志的看法不一致」的說法。而趙紫陽的「說不清楚，不如不說」這個態度，也證明在此前確有「不一致」的說法發生。請注意，這篇日記時間是8月30日，李鵬主持作出「下半年不再新的調價措施」決定的國務院第20次常務會議上午剛剛開過，外面出現「中央和國務院看法不一致」說法顯然不是根據這次會。按時間推斷，趙紫陽提出改變「闖關」決策是8月26日，29號是中央財經小組會，那麼導致「不一致」說法產生的原因只能是發生在27、28號這兩天。鮑彤所說的李鵬未經中央討論決策，擅自要國辦給各省市政府打電話，說「價格改革方案停止執行」這件事，恰恰是發生在27日！【327】

這件事情，明明是李鵬違反組織原則，未經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或是中央常委、政治局討論，就於27日搶先發出電話通知，造成下邊思想混亂，以為「國務院和中央不一致」，可他卻在9月2日的政治局會上，來了個「惡人先告狀」，說是他這麼做是趙紫陽指示的。本文前面

【326】《李鵬經濟日記（徵求意見稿，上》，1988年8月30日。

【327】《李鵬經濟日記》2007年初正式出版時，這段「趙紫陽去掉『總書記與國務院負責人的看法是一致的』一段」記載被作者刪除。

講過，趙紫陽確實先找姚依林、後找了李鵬等人，商量過推遲價格闖關的問題，但這只是決策前的醞釀過程。「物價闖關」的決策，是上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的。在沒有徵得鄧小平同意之前，在中央財經小組、中央常委、政治局沒有開會改變決策之前，趙紫陽沒有，也不可能要國務院直接通知下面「停止執行」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決定。如果趙紫陽連這點決策程序都不懂，那他也枉為中央總書記了。

另外，李鵬此時說，「國務院的決定是紫陽同志指示的」，會讓人以為，29 日中央財經小組開會，決定放緩物價改革步子，30 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是根據財經小組會決定才召開的，完全符合組織程序。豈不知，李鵬在這裏玩了個瞞天過海的把戲，用 30 日國務院合法的常務會議，掩蓋了 27 日他違紀發通知的事實，把外界說「不一致」的責任推給了趙紫陽。

會上，為了維護高層團結，趙紫陽並沒有直接指責李鵬，而是對推遲「物價闖關」的決策過程作了一個說明。

趙紫陽說，當他對價格改革的步子該怎麼走，要不要延緩進行有了新的想法之後，他是先給姚依林打電話說，考慮到當前形勢，價格改革的方案是不是推遲出台，請姚考慮一下，先不和大家講，免得動搖決心。姚依林說是不是推到下半年搞。趙紫陽問推遲一年是不是可以？姚依林考慮了一天，同意推遲一年。然後趙紫陽找了安志文等幾個人商議，又找李鵬、姚依林、張勁夫三人談了一次。此後，趙紫陽找了楊尚昆、薄一波、萬里，談了他的想法，並請他們向小平彙報，商量的結果是大家都贊成，推遲鋼鐵價格的改革，整個價格改革的步子調小一些。趙紫陽還說到，前幾天（8 月 29 日），他約了王瑞林到辦公室，比較詳細地談了那些新的想法，請他向小平報告，並且請他安排面見小平，和小平面談這一重大決策的改變。鄧小平回覆說，同意這個部署，沒有不同意見，不再談了。這樣才開的政治局會。

趙紫陽還說，上次政治局會議之後，我向小平同志彙報了一次（指 8 月 19 日彙報），講了方案，又講了物價能否控制住，信心不足。小平講，不是講宏觀控制嘛，除了經濟手段外，還要有強有力的行政手段。要強調守紀律，不能各行其是，不能自由行動。發揮傳統優勢，中央一聲令下，全國統一行動。四項原則不能丟，丟了就失去凝聚力。趙紫陽的這話應該是說給李鵬聽的，意思是批評李鵬不守紀

律，不按程序辦事。李鵬也用小平的話來轉移話題，說他昨天婦女大會上見到小平，小平說，你們提的控制物價措施我贊成，喘一口氣有好處，但是改革的方向不能變。改革是一件偉大的事業，只能有領導、有步驟的進行。現在特別要強調紀律，還要強調強有力的行政手段，維護國家統一。光講紀律不行，還要講法律。像現在你哄過來，我哄過去，不聽號令各行其是，非把國家搞亂不行。

列席會議的鮑彤後來回憶說：「我記得，在這次會上，李鵬和姚依林兩個人講了很多話，但又沒有提出什麼明確意見。你坐在邊上，聽他們講，都搞不清楚他們講的是什麼意思。那天，討論了一個上午。其它人沒有講什麼，主要是他們 3 個人在講。當時，紫陽很不高興，怎麼能搞成這個樣子呢？本來是工作上的問題，這麼一搞，就變成人事關係問題了。」

在這次會上，其他政治局委員包括江澤民、李瑞環、李錫銘、丁關根【328】，及列席會議的王任重等發了言，委婉地對中央的決策提出了批評意見。趙紫陽說：「方案（即價格改革）是我提出來的，儘管具體方案是依林測算的，但這個事情造成的影響由我來負責。」他接著說：「政治局在北戴河通過的時候，我也是贊成的。現在，外面的議論很多。好像說常委、政治局內部有不同意見，有矛盾，有爭論。今天，請大家都在會上談一談。我在這個問題上有責任，考慮不夠周到。」

趙紫陽認為，不管是誰提出來的，「物價闖關」的方案是他安排姚依林組織人制訂的，決策是他主持政治局會議做出來的，他願意為此承擔責任。這是一個光明磊落的政治家應有的風範。但是，公正地說，這個責任，他有，鄧小平也有，當時的中央常委和政治局成員都有。特別是中央後來作出中止執行「物價闖關」這個決策，是趙提出來的，在糾正「闖關」的決策過程中他也是起了決定性作用的。趙紫陽在這個關鍵時候，冒著政治風險，特別是冒著觸怒鄧小平的風險，不顧個人的毀譽，在政治局已經通過了方案以後，能夠根據已經變化了的情況，果斷地、實事求是地提出修改決策的建議，並且能顧全大局，閉口不提鄧小平與此事的關係，勇於為此承擔責任，這是需要極大的政治勇氣的。

【328】丁關根（1929-）：江蘇無錫人。鄧小平的牌友，中共十三屆政治局候補委員。曾任鐵道部部長，因責任事故離職；改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1990-1992 年任中央統戰部部長。

鄧小平在1988年「物價闖關」問題上，也沒有諱言自己的責任。1989年3月23日，他在會見來訪的烏干達總統時說：「在發展的過程中，也出現了新的失誤。這些失誤同我們這些老人有關係。現在領導層中的趙紫陽總書記、李鵬總理當然也有份，但主要是老人，老人中主要是我。如果講失誤的責任在誰，李鵬總理在人大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已經作了自我批評，我作為一個老人也有份。我們的根本觀點是，這十年成就是主要的，……我們大錯誤沒有犯，但小錯誤不斷。因為我們沒有經驗，沒有經驗就要摔跟斗，今後也難以避免。」【329】

那麼，在20多年今天，對這場被中止了的「價格改革」究竟應該怎樣看？鮑彤在與筆者交談時認為，「價格闖關」無所謂失敗，因為它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改革。價格改革應該是依靠市場本身的力量，伴隨著市場的不斷成熟，由過去的指令性價格而產生的多種價格體系，逐步過渡到市場的價格體系，那麼這種改革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改革。

趙紫陽後來也對1988年「價格闖關」的經驗教訓作了深刻的總結，他說：「十二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在物價改革上採取的是調整和放開相結合的方針。有些物價是政府自上而下進行調整，另一些商品可以放開。同一種商品，計劃內的一部分由政府調價，另一部分也可以放開，即實行價格雙軌制。這就是說，總的是面向市場，走逐步放開價格由市場決定價格的道路。而這次提出的價格改革方案，就不是這樣逐步放開，由市場決定價格，而是由政府大幅度調整價格，達到理順價格的目的。這既反映了當時在價格改革上急於求成的思想，也反映企圖以政府的力量來改變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雙軌制，達到雙軌並軌，或者縮小計劃和市場價格之間的差價。這種思路根本上違背了價格改革的正確方向。因為它不是使價格逐步由市場決定，而是通過計劃調整來決定價格，實際上走的還是計劃決定價格的老路子。多年來教訓告訴我們，由政府自上而下地調整價格是不可能理順價格的，是不可能改變價格嚴重扭曲的狀況的。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沒有發生嚴重通貨膨脹，這一改革方案（即使）得以出台和實施，（也）是決不可能解決問題的，搞得不好，物價改革會有走回老路的危險。」【330】

【329】房維中：《在風浪中前進——中國發展與改革編年紀事1977-1989》）1989年卷，第50-51頁。

【330】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145-146頁。

趙紫陽還說：「在兩種體制並存的情況下，只能採取逐步過渡的辦法，逐步擴大市場調節這一部分；逐步縮小計劃經濟這一部分，而且是一部分一部分地縮小，一塊一塊、一批一批地縮小；用市場經濟逐步蔓延，計劃經濟逐步收縮的辦法。而不可能採取一種改革方案，一下從整體上把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現在看來不能採取這種辦法，改革思路要改變。另一個問題就是，當社會上出現了擠兌搶購風時，不要把這種情況看得過重，可以採取必要措施，不宜匆忙提出新的口號；而應該通過改革，穩定形勢。如果這樣做，那就不會出現 1988 年的搶購風，也不會出現後來幾年的徘徊、倒退。」【331】

在總結價格改革的時機選擇和策略時，趙紫陽又說：「價格改革選擇的時機和宣傳上出現了毛病。」「本來價格已是議論中心了，又要醞釀價格改革，而又選擇了一個不合適的時機，引起社會恐慌。特別是宣傳上很不恰當，吃虧很大。這是當時擠兌搶購的主要原因。人們不是為了需求，而是要保值而引起的。價格改革，從設計、討論到制定方案，報紙不斷地發，有小平講的，也有我講的，把這個問題突出起來。說過去改革容易的已經改了，現在要攻難點，要闖價格關，要知難而進。使人心恐慌，紛紛擠兌搶購。」「我們又未冷靜地加以分析，過急地提出治理整頓，結果給反對改革主張復舊的人提供了一個口實，造成幾年的經濟滑坡。」【332】

五、三中全會報告起草：「方案有變」

按照十三大修改過的黨章規定，中央全會每年開兩次。1988 年下半年，中央將召開十三屆三中全會。這次全會的主題，隨著中央決策的變化，也經歷了一個從「物價闖關」到「治理環境、整頓秩序」，從「建立商品經濟秩序」到「強化黨的領導，發揮政治優勢」的過程。隨之而來的，三中全會報告的起草思路，也是一波三折，幾經調整。

中央北戴河辦公開始以後，7 月 16 日，趙紫陽找溫家寶、鮑彤、張岳琦、龔育之、賈春峰等，談思想政治工作改造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研究問題。趙紫陽談了下一步中央工作的大體安排。價格改革方案基本確定之後，要開中央工作會議，回北京開。要為會議搞一個方案，搞一個說明，討論大家對價格改革提出的問題，由紫陽講一

【331】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248 頁。
【332】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249 頁。

講。三中全會可能在10月份開，要給趙紫陽起草一個工作報告稿，到北戴河開會搞細，回京之前要有一個東西。

這個會上，趙紫陽談了他對起草三中全會報告的想法。他說，物價改革本身三中全會可以不講，主要是講物價改革的條件。物價改革要深入，其他措施要跟上，其他跟不上，物價改革就不可能深入。關鍵是黨組織的保證作用，思想團結、步調一致、嚴格紀律，廉潔問題包括公開監督、公平分配。思想政治工作也要做一個題目。至於商品經濟新秩序這個問題可以提一下，但研究恐怕還不夠，進一步展開有困難，好些問題可以從這個角度講一下。配套改革要講必要性，關鍵在哪裏，承受能力有多大。

會上，趙紫陽在對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關係問題談了他的看法【333】之後，還針對有人說「現在改革關鍵是要解決所有制問題」講了一段話。他說，說改革關鍵是所有制，這並不確切。有些企業證明，關鍵在管理方式，比如鄉鎮企業和城市裏的二輕系統【334】就不同；國營企業如果搞成無上級企業也可以搞活。國外的國有企業，也不像我們這麼死板嘛，並不影響企業的活力。根本是個管理體制、管理方法問題，不一定非要弄到所有制這麼敏感的問題上去。

趙紫陽說，要好好研究瑞典，有很大的影響。瓦文薩的綱領，就是要搞美國式的經濟、日本的技術、瑞典的社會主義。鮑彤插話說，可以讓社科院某個所把紫陽同志提出的這個題目落實一下。趙紫陽接著說，既然是商品經濟，就與資本主義有共性，你們在研究商品經濟新秩序的大課題中，可以借鑒。

龔育之提到「法的社會性、階級性，哪一個為主」的問題。趙紫陽說，這兩種性質都有吧，國家鎮壓職能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是逐步削弱的，管理服務職能是逐漸擴大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有所相通。

趙紫陽說，現在從自然經濟到商品經濟轉變過程中，各種社會現象都是值得研究的。鮑彤談到對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看法，建議單獨

【333】見本書第八章《十三大報告與中共十三大》第3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新民主主義的代名詞」。

【334】指上世紀60年代由國家第二輕工業部管理的輕工業系統，主要是指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建立的手工業合作社及類似組織。後二輕部與第一輕工業部、紡織工業部合併為輕工業部，但地方的二輕局都沒有立即隨之撤銷和合併。80年代經濟改革後這種劃分逐漸消失。

起草一個加強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文件，提請三中全會審議，趙紫陽表示同意。

16 日這次談話回來以後，鮑彤列了一個三中全會報告起草組的初步名單。7 月 22 日上午，他召集部分起草組成員開了個會。這是起草組的第一次會議，雖然到會的人還不齊。

會上，首先由張岳琦傳達了趙紫陽這段時間來重點考慮的幾個問題：一是物價改革要配套，要提高企業承受能力，要有消化價格上漲的能力，不能在改革之後出現在更高的價格水平上復歸；二是要徹底實現政企分開，企業不能有行政權力，政府不能干預企業合法經營；三是要把市場建設好，打破地區壟斷，反對地區封鎖、完善交易規則，不能一般的反對，是要特別強調；四是綜合治理通貨膨脹。社會需求過大、基本建設規模過大不行。高物價、高通貨膨脹，高建設速度這種情況不可能持續。有人講放開物價，管住貨幣，這是對的，但是靠什麼管？行政手段不行。要改變低利率的問題。五是公務員制度各地都在自己搞，是否打個招呼，別把名聲搞壞了。

會上圍繞價格改革這個主題，對十三屆三中全會報告的起草做了分工，一是由吳稼祥、鄭洪慶、魏禮群、何家誠對經濟領域的配套問題進行研究；二是由陳進玉、黃海、吳偉、賈春峰從黨的工作角度研究配套問題。然後把兩方面合起來，確定要討論的題目。三是鮑彤、鄭必堅、龔育之參加非經濟組，袁木、張岳琦參加經濟組。鮑彤說，這個分工，在人員到齊之後再議一下。

7 月 29 日、7 月 30 日兩天，三中全會文件起草組舉行會議，討論報告的思路。鮑彤發言說，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就已經提出價格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紫陽在那個時候就提出形成合理的價格重要性，現在再次提出來。我們要從群眾能感覺到的角度來講，理論上要站得住，群眾要感覺到。第二點，對價格改革和其他方面改革之間的相互促進的關係要講清楚。因為我們面對的是幾十萬個在商品經濟海洋中游泳的企業。第三，對明年價格改革的選擇，不同的意見會更多。怎麼講這個選擇，為什麼會這樣選擇？要在說明中講清楚。報告中是否可以從探路的角度來講。

鮑彤在發言中還談到黨和政府、群眾的關係、政府的廉潔和精簡、思想政治工作、群眾團體的改革、差額選舉問題等問題。他強調

說，現在是改革的關鍵時刻，對全體共產黨員是一場考驗。中央希望掉隊的人少一點，但是肯定有掉隊的，企業有破產的，腐敗官員要被清除。官員中也有落後的和先進的。不能夠按歪門邪道去搞，搞商品經濟要按照商品經濟的要求去搞，形成平等的市場競爭機制。那些要陞官發財的人，搞歪門邪道的人，是走不通的，最後一定會被淘汰。在完善商品經濟、民主政治建設的過程中，觀念要實現轉變，民主要增強，要形成競爭。

8 月 18 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國務院提出的價格改革方案的第二天，趙紫陽、薄一波、楊尚昆碰了個頭，認為下一步要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很重要，要解決中央地方之間統一認識的問題。趙紫陽說，如果看準了，決定了，下面還是會執行的。下面不執行的，往往是上面一般的講講而已。利益多元化也是改革中出現的情況，不過只照顧地方利益還不行。他建議中央工作會議開得長一些，和地方好好對對話。現在看來，總的說對價格改革信心不足是主要問題，關鍵是定了以後，下邊能不能執行。楊尚昆和薄一波建議趙紫陽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趙紫陽同意了。

8 月 19 日下午，趙紫陽又找溫家寶、鮑彤、張岳琦幾個人開了個小會。趙紫陽在談到三中全會報告起草時，說到第十次政治局會議要有個紀要，要著重講經濟體制轉換過程中的宏觀調控問題。他強調，新體制下的宏觀控制，要靠經濟和法律手段。而舊體制靠的是行政命令和計劃手段。現在是新舊體制轉換時期，新手段還沒有完全形成，因此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很靈的東西，在我國不一定那麼靈，比如匯率和利率調整手段，所以傳統手段也不能完全放棄，不能過早的放棄行政和計劃手段。新手段要重視，要著手建立，但有些問題還必須用行政手段、計劃手段。但也不能夠濫用，單靠舊手段可能又回到舊的體制。不能走回頭路，用的時候也不要妨礙以後的改革。過渡時期要各種手段結合，不然會出亂子。

8 月 20 日，十三屆三中全會報告起草組再次舉行會議，參加的人員包括調整後的起草組 17 名成員，即鮑彤、袁木、鄭必堅、龔育之、張岳琦、陳進玉、賈春峰、魏禮群、陳群林、李元、孫方明、黃海、何家誠、吳稼祥、吳國光、吳偉。會議對整個報告的大綱再次進行了討論。當時設想，報告中要專門有一部分講改革攻堅的社會政治

環境。開始打算談五層意思，第一，創造一種安定民主活躍的政治局面，第二，強調廉潔，反對腐敗，第三加強黨的紀律，第四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第五突出多黨合作。

正當文件起草組圍繞價格攻堅，開始起草十三屆三中全會報告稿的時候，8 月 29 日，中央財經小組召開會議，決定向中央政治局建議，推遲出台已經決定的價格改革方案。

1988 年 8 月 30 日下午，三中全會文件起草組再次舉行全體會議。會上，鮑彤傳達了前一日中央財經小組會議的意見。他說：物價改革的方案有變，要推遲出台。明年出台什麼，要重新考慮。五年的總方案不變，主要是明年的方案有變化。由於發生搶購和擠兌，方案的出台時間要推遲。現在大中城市擠兌、搶購，紫陽講現在不穩定，要出安民告示。

鮑彤介紹了中央決策調整的醞釀經過，也談了他的看法。他說，物價改革要不要搞？肯定要搞。但是現在遇到複雜情況，一是擠兌，二是官倒，三是中間環節，四是地方政府。所以，才確定明年主要是整頓秩序，治理環境。

針對三中全會文件的起草，鮑彤說，攻堅的話還要說，講治理環境、整頓秩序，重點講一下宏觀控制。雙軌制要解決，恐怕要到某一產品基本佈局平衡才能放開，沒有條件，勉強解決很困難，我們要朝這個方向走，又不能不考慮條件。實際上，現在我們施行的各項措施，都是改革深入，也都是商品經濟秩序的建設過程。

鮑彤還談到了與政治體制改革相關的幾個問題。他說，政治上的問題，紫陽已經講了幾條，一是人大要依法行事，最高權力機關如何行使權力？應該是依法行事，不能沒有限制，要查查憲法是怎麼規定的。現有體制要有效率，絕不能變成扯皮體制。政治體制改革是個過程，現在有人理解，政改就是分權，讓他當家。在一些地方人大，有人一講自己的權利，就想當反對派。我看，共產黨還是共產黨，民主黨派還是民主黨派。

鮑彤說，政府問題不僅僅是個廉潔問題。要注意，有人在抓這個問題攻擊我們。最近社會上有些流言，很不負責任，攻擊領導同志。高幹子弟做生意，關鍵看犯法不犯法，不犯法的事你可以幹，他也可以幹。現在國際上刮民主風，我們中國還是要共產黨領導，三中全會

報告還是要強調黨的領導，黨的權威，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在於更好的發揮我們的潛力。對社會上的流言現在不能推波助瀾，也不能隨波逐流，要有個明確的態度。當然，對社會上的民主要求，要在制度內得到解決。

鮑彤的這段談話，明顯地與他以往的思想脈絡有了一定變化，重點強調了黨的領導，強調了嚴格紀律，也強調了政府的權威。我感覺，這不完全是鮑自己的想法，而是反映了趙紫陽在價格闖關受阻之後，面臨複雜的形勢，不得不在改革思路上所作的調整。這種調整，要反映在他在三中全會上的報告當中。

在 9 月 2 日的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會議上，趙紫陽明確提出，明年改革的重點，轉到治理環境、整頓和建立商品經濟秩序，深化和展開價格改革所必須的配套改革上來。在講了十條措施之後，趙紫陽說，以上十條能否實現，不是客觀上有無可能的問題，關鍵是主觀上能否做到，能否充分實現這些可能性。關鍵是要充分發揮政治優勢，統一思想，統一行動，嚴格紀律，充分發揮黨的領導和核心作用，力爭充分實現的問題。在這樣關鍵時期，更需要全黨同中央保持一致，更要維護黨中央和中央政府的權威。既然十三大選了我們這個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選了我們的政治局、常委會，人大又選舉了這個政府，那就必須使它有權威。不能講誰的年紀大，誰有鬍子，也不能講你過去幹了什麼，我過去幹過什麼，我可以不聽你的。說實在話，我們今天在中央崗位上的同志，沒有一個能比得上老一代革命家，但它是一個整體，一個集體。既然是這麼一個領導集體，他的權力就沒減少，黨中央和中央政府就是領導。這是革命、建設、改革的需要，是黨歷來的原則。四項原則首先是黨的領導、中央領導，黨紀、國法一定要令行禁止。我們黨歷來講民主集中制，講個人服從中央，這要重申；有些同志忘了，更要重申。以上這些都是全面改革階段要解決的重要問題，還有一些今天沒有講，政府廉潔、黨的建設、思想政治工作，將來還要講。有些本身就是深化改革，有的則是為改革創造條件。物價改革要進行，整個步驟沒有放慢，五年要搞下去，這是有利的，明年慢一點更有利。勉強搞反而不利。

六、治理整頓：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的主題

根據中央財經小組會議和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和趙紫陽幾次談話所提出的主要內容，從9月初開始，鮑彤帶領三中全會文件起草組，對原有的以「物價闖關」為中心的文件寫作思路進行了大幅度調整，把起草工作的重點，放在了治理經濟環境、整頓和建設商品經濟新秩序問題上。9月5日的下午和晚上，起草組的經濟組和政治組分別對已經形成的兩部分稿子進行了討論。在聽取討論意見之後，有關執筆人又開始了下一輪修改。

9月12日上午，鄧小平在他的住地聽取了關於調整後的價格和工資改革方案的彙報。參加彙報的有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萬里、薄一波。鄧小平在談到價格改革決策調整時說：「改革要成功，就必須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贊成邊改革、邊治理環境整頓秩序。要創造良好的環境，使改革能夠順利進行。但是，治理通貨膨脹、價格上漲，無論如何不能損害我們的改革開放政策，不能使經濟萎縮，要保持適當的發展速度。」「這一切，如果沒有中央的權威，就辦不到。我們要定一個方針，就是要在中央統一領導下深化改革。不僅是價格一個方面的改革，而且是多方面的、綜合的改革。宏觀管理要體現在中央說話能夠算數。」鄧小平還說：「真正建立秩序，不理順價格不行。價格沒有理順，就談不上經濟改革的真正成功。我們準備用若干年時間把價格初步理順，最終達到面向世界市場。」【335】

鄧小平這次談話的基本精神，迅速被傳達給了起草組的各位成員，融入了正在起草的三中全會報告稿。

1988年9月15日至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中共中央、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負責人、各省市的書記、省市長參加了會議。三中全會文件起草組的全體成員作為會議的工作人員，旁聽了這次會議和此後召開的十三屆三中全會，並分別參加了各組的討論。

會議伊始，由姚依林對調整後的價格改革方案作了說明。然後趙紫陽講了話，他指出：今後兩年，要把改革和建設的重點放到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上來。治理整頓，既是深化改革的必要條件，也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他從四個方面闡述了中央這一決策的內容和實現中央決策的保證條件。會議期間，田紀雲就糧食生產、整頓公

【335】《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77頁。

司問題，王丙乾【336】就限制和壓縮集團購買力問題講了話。在小組討論的基礎上，會議還舉行了大會發言，地方大員薛駒【337】、向守志【338】、顧秀蓮【339】、吳官正【340】等都在發言

中表示積極支持和堅決貫徹中央決策，並提出了若干建議。

9月18日、19日晚，三中全會文件起草組利用中央工作會議的間歇時間，兩次開會，傳達了趙紫陽在會議期間對修改三中全會報告的意見。趙紫陽說，要把工作會議上提到的幾個問題加進去，重點強調一下。一是要講改革深化的問題，把價格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結合起來講。二是環境要治理，但環境中出現的問題不是改革帶來的，而是轉軌過程中產生的，是舊體制的弊端在新形勢下的發作。治理整頓中要用到行政手段，是為了改革創造更好條件。改革的方向要堅持。三是除了講紀律外，黨的領導，黨組織的核心作用，黨支部的堡壘作用，黨員的模範先鋒作用都要寫充分。四是思想工作、政府廉潔、黨的作用、政治體制改革、民主政治等等都要考慮到改革的需要，有利於集中全黨意志，增強全社會的凝聚力。

起草組的成員們白天聽會，晚上按照趙紫陽的這些意見，加班加點修改報告的稿子。到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時，初稿基本完成。9月21日晚，起草組再次對形成的稿子進行了討論。在經過幾位負責人統稿之後，鮑彤又作了最後的修改。23日，稿子報送給趙紫陽。

9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第十二次全體會議，討論並通過了趙紫陽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上的工作報告稿。

9月26日至30日，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在北京京西賓館舉行。全會聽取並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代表中央政治局作的工作報告。會議公報說：「全會同意中央政治局對我國當前政治經濟形勢的分析，批准中央政治局向這次全會提出的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方針和政策、措施。全會確定，把明後兩

【336】王丙乾（1925-）：河北蠡縣人。時任國務委員、財政部部長。

【337】薛駒，時任浙江省委書記。

【338】向守志，時任解放軍南京軍區司令員。

【339】顧秀蓮，時任江蘇省省長。

【340】吳官正，時任江西省省長。後於2002年任中共第十六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年改革和建設的重點突出地放到治理經濟環境和整頓經濟秩序上來。」「全會原則通過了《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建議國務院在今後五年或較長一些時間內，根據嚴格控制物價上漲的要求，並考慮各方面的實際可能，逐步地、穩妥地組織實施。」

三中全會過後，文件起草組的成員們為了配合形勢宣傳，還分專題撰寫了問答式的文章，迅速編輯成一本以《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為題的小冊子，很快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國發行。

按照中央三中全會的決策，「治理經濟環境和整頓經濟秩序」迅速在全國貫徹了下去。但是，此後的形勢，並沒有完全按照趙紫陽的預想發展，反而在許多方面脫離了三中全會確定的軌道，甚至背離了鄧小平、趙紫陽一再強調的「改革的方向不能變」的主張。趙紫陽在他的回憶錄《改革歷程》中談到了後來發生的一些情況。他說：「治理整頓提出以後，有些情況變化是我原來沒有想到的。首先是國務院那邊，李鵬、姚依林他們藉著治理整頓的機會大肆復舊，使改革全面回潮。他們接二連三頒發了許多條例、法令、規定，除控制基本建設外，實際上把前幾年搞活企業的措施，絕大部分取消了，把分散到地方和企業的權力又收了回來。1989 年物價上漲指數不高於 1988 年，這本來是我提出的作為預期目標，是我們預計各項工作搞的結果。但他們把它變為行政指令層層分下去，變成了完全用行政手段來管理物價，以至把一些早已放開的物價又管死了。一個時期甚至把農村糧食在完成國家徵購後，留給地區和群眾讓他們在品種、有無、多少之間互相調劑的部分也取消了，一律納入國家計劃，由國家管起來。剛剛提出、佈置下去的沿海發展戰略，實際上統統作廢了。可以說，這是體制大的復舊，改革的大回潮。他們把許多權力集中到國務院和中央各部，如為控制信貸，甚至老百姓在銀行的存款都不能提。他們搞這種治理整頓，不久就出現了經濟滑坡，市場疲軟，生產停滯。如果不是因為前幾年改革出現的受市場經濟調節的個體經濟、合資企業、非國有經濟的存在，國家經濟將陷入非常困難的境地。」

在回憶錄中，趙紫陽對他在提出推遲出台價格改革的建議之後，又主導中央作出「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的決策，也曾經有過深刻的反思。他認為，當時「我們對經濟形勢的估計也過重了。認為中國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沒有對通貨膨脹進行深入的分析，就

提出了『治理整頓』的口號，提出從1989年開始把改革和建設的重點放在治理整頓上。當時的用意是穩定人心，但帶來了很大的負作用。現在看來不必如此，也不應當如此。而應當繼續穩定經濟，就是進一步控制基本建設規模，進一步控制貨幣投放，經濟就可以穩定下來，不必大的調整，大的收縮。深化改革，就是繼續縮小計劃經濟這一塊，發展市場調節這部分，情況就會順利發展。當時之所以提出治理整頓，還是想迅速創造一個條件，然後再來進行價格改革和工資改革，以便結束兩種體制並存的狀況。後來看來這種想法不切合實際。」【341】

趙紫陽用一句話總結說：「總之，1988年圍繞物價改革問題，可以說是一錯再錯，我在這方面的教訓是非常深刻的。」【342】這裏，他用了「一錯再錯」四個字，可見之痛心疾首。

【341】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55-256、247頁。
【342】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148頁。

第十二章
山雨欲來

1988年底到1989年初，黨內的保守勢力利用中央「物價闖關」決策受阻、不得不開始治理環境、整頓秩序之機，向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派開始了新的一輪進攻。他們藉著治理整頓的機會大肆復舊，致使經濟滑坡，改革倒退，並在政治上掀起了一股「倒趙風」，後被鄧小平所壓制。與此同時，廣大民眾，特別是知識分子對經濟改革的進退維谷甚至倒退回潮，雙軌制中發生的官倒、腐敗現象，和政治改革進展緩慢的不滿也在發酵。社會上各種政治力量愈加活躍起來，他們利用當時寬鬆的輿論和政治環境，通過各種形式提出了加快改革，進一步推進民主化的要求。國內的政治氣候已是「山雨欲來」，發生一定程度的社會震盪，似乎已不可避免。

在這種情況下，趙紫陽主持的中央一方面要頂住來自黨內保守的勢力的進攻，另方面也要在進一步堅持改革開放，有步驟地發展商品經濟和民主政治的同時，保持經濟發展和社會的基本穩定，其艱難可想而知。鮑彤帶領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為穩定政治形勢，進一步推進改革，開展了多方面的研究，力圖為中央提供符合實際情況的意見和對策。後來的形勢發展證明，這些意見和對策基本是正確的。

一、北京刮起「倒趙風」

自1988年9月，中央決定「價格闖關」剎車以後，李鵬、姚依林就不太聽趙紫陽的招呼了，好像是有理由不聽趙紫陽的話了。在經濟方面，中央財經小組討論決定的一些問題，國務院拖著不執行。在政治改革方面，由於各方面的阻力很大，十三大已經確定的一些措施也很難向前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中的許多「設想」都無法落實。

據鮑彤回憶說：「那段時間，紫陽在做重大決策時是很難的。中央的改革推不動，他也不能叫各地方都這樣改；如果叫各地方都這樣

改，各地馬上會有各種意見反映上來。這樣一來，連中央這一級的改革都保不住。所以，我感覺他有些為難了。比方說，他試圖用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秩序這個題目，把政治體制改革向前推進一步，推動新聞改革，改造思想工作，探索廉政建設，強調監督的制度化。但對於這些問題，即使是在常委、政治局、書記處的層次上，人們的認識也不一致，很難形成統一意見，再加上有人刻意阻撓，更很難推得動。因此，在這個時期，紫陽的心情很不好。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有許多方面他都想改，最後都沒改成。」

1988 年底，香港的一些媒體報道說，北京高層「掀起了一股倒趙風」，黨內保守勢力大肆活動，要搞趙紫陽下台。這一說法，並不是空穴來風。對此，趙紫陽在回憶錄中談到：「治理整頓一提出，給人一種印象，以為經濟改革出現了大問題，不然為什麼不再講深化改革、穩定經濟，而搞了治理整頓呢？這就給一些人一個口實，借此否定經濟改革，否定經濟建設的成績，刮起了倒趙風。有的老同志竟然興師問罪，要常委，實際上主要是我本人承擔責任作檢討。王任重在政治局會上不止一次提出要追查責任，說出現了這麼大的問題，領導要帶頭檢討。正是在這個時期，國內外到處流傳著一些流言，說我地位不穩，權力被削弱，甚至說我不當總書記了，說我將要去當軍委主席，當國家主席等等，無非是說我搞不下去了。在這個時期，我也從很多渠道聽說，有一批老人集體上書鄧小平講我壞話，要我下台。」【343】

這裏說的「有一批老人」，主要是指陳雲、李先念、王震等，當然在他們身後，還有胡喬木、鄧力群、王任重等一批保守勢力。這些政治老人們在中共十三大之後大都退了下來（只有陳雲仍擔任中顧委主任），但是在黨內仍然有著巨大的能量。他們對改革開放有著本能的抵觸和不滿，兩年前就是他們以「反自由化不力」為名搞掉了胡耀邦。但是，那場「鬥爭」並沒有達到他們的目的，把他們屬意的鄧力群推上總書記的位置，反而是趙紫陽接替了胡耀邦，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成功召開了黨的十三大，把改革開放繼續推向前進，這是讓他們心有不甘的。現在趙紫陽主持的「物價闖關」失敗，改革受挫，他們終於得到機會，又開始向堅持改革開放之路的趙紫陽下手。

【343】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259 頁。

趙紫陽在回憶錄中，對倒趙風的由來和經過做了分析，他認為，「當時黨內這股風刮得很大，造這麼大的輿論，除了黨內有一批長期受計劃經濟觀點影響的同志，對改革開放幾年後出現經濟上的一些問題，如搶購擠兌，認為改革開放搞糟了，不如搞計劃經濟，有這麼個土壤容易接受這樣的東西以外，主要的是 1987 年以來我同黨內的反改革的保守力量，同教條主義者，同有左傾思想的人，同這股勢力關係緊張、激化的結果。」特別是「免去鄧力群主管宣傳工作，解散書記處研究室，加上《紅旗》雜誌停刊，以及鄧力群在十三大落選，引起了一些老同志，包括陳雲、王震、李先念等對我的不滿。他們認為，胡耀邦那個時候想幹而沒有幹成的事，我卻幹了。胡耀邦時期沒有解決鄧力群的問題；沒有解決書記處研究室的問題，這個研究室不聽耀邦的。現在鄧力群下來了，研究室也解散了，耀邦沒幹成的事我幹了。於是就把反對的目標指向了我。當時我沒有感到這件事有這麼大的影響。以後到 1988 年物價出了些問題，出現搶購、擠兌、通貨膨脹等，在老人中就掀起一股對我的不滿，多方非難，甚至要換人。這與上面這些事情很有關係。」【344】

為了配合黨內政治老人們發動的這股「倒趙風」，他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代理人李鵬、姚依林也開始「行動」了。

早在十三大前，在確定趙紫陽擔任總書記以後，總理人選曾經讓鄧小平很傷腦筋，主要是擔心李鵬挑不起這個擔子，因為李是搞技術出身，對經濟接觸較少，特別是在經濟改革方面幾乎完全沒有接觸。但是陳雲、李先念都非常支持李。也有人建議，讓姚依林擔任總理，過渡兩年，但鄧小平沒接受。當時再找新人也困難，估計陳雲、李先念不會接受。議來議去，鄧小平只好同意讓李鵬擔任。由於李鵬對經濟工作、經濟改革不熟悉，所以鄧小平提出，趙紫陽當總書記後，仍負責抓經濟工作，並繼續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組長，而李鵬、姚依林只是財經小組成員。因此十三大後，中央仍然保持了經濟工作由財經小組決策，國務院負責執行的格局。這種做法雖然違背了中共十三大確定的黨政分開的原則，但為了保持經濟體制改革政策的連續性，在當時情況下，這種做法應該說還是有必要的。

【344】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261、222-223 頁。

1988 年 9 月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李鵬等人在保守派老人們的支持下，開始有恃無恐地抓權。他們「把整個治理整頓的權力全部集中到國務院手中」，試圖把趙紫陽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架空。此後，他們借治理整頓開始大搞復舊，開改革的倒車。雖然趙紫陽帶領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不斷研究經濟問題，提出對策，但李鵬、姚依林大都不予討論，更不執行。

李鵬、姚依林這種架空中央財經小組的做法，直接違反了中共的組織原則，違背了鄧小平的意志，但是卻得到了陳雲等黨內老人的支持。在《李鵬經濟日記（徵求意見稿）》中，記載了陳雲在 1988 年 9 月 5 日評價 8 月 30 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作出的 6 項決定時說的兩句話:「第一，內容很好；第二，改變了國務院不作決定的形象。」【345】

趙紫陽回憶說：當時「一些老人當中有一種議論，認為我現在是總書記，不做總理了，因此主要力量應抓黨的工作，抓政治思想工作，經濟工作由國務院來搞；而我仍然對政府工作，對經濟工作干涉太多。事實明明是國務院在架空我、在擺脫財經小組對經濟工作的決策，卻又散佈這麼一種輿論，其目的就是要迫使我少過問、不過問經濟工作。這是對國務院架空我、擺脫財經小組的一種支持和配合。這裏面是不是還有別的東西，有沒有什麼秘密交易，我就不清楚了。」【346】

1988 年 12 月 26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開了一次「生活會」。會上，李鵬、姚依林帶頭批評趙紫陽對國務院工作「過問太多」，李鵬說他這個總理很難當。同時，他們對趙紫陽提出的改革開放政策，提出了許多質疑。就在這次會上，姚依林直截了當地問，攻價格關這是什麼意思？是怎麼出來的？【347】趙紫陽沒有回答。也許是李鵬、姚依林當時沒有弄清楚，「價格闖關」這話是鄧小平先提出來的，而是以為是趙紫陽向鄧小平建議的，企圖以此追究和清算趙紫陽在經濟改革中的責任。趙紫陽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姚依林這個人過去講話從來不很明朗，也不領頭，這次講得非常明朗，非常尖銳，而且有恃無恐。看來

【345】李鵬：《李鵬經濟日記（徵求意見稿，上》，1988 年 9 月 5 日。這段話。在該書正式出版時，被刪除。

【346】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258 頁。

【347】參見李鵬：《李鵬經濟日記（徵求意見稿，上》，1988 年 12 月 26 日。這段話在本書正式出版時被作者刪除。

他和李鵬這兩個人的態度不是偶然的，代表了一種氣候，背後有人在支持他們。」【348】

這次會後，1989年元旦期間，趙紫陽把一段時間來的情況向鄧小平作了彙報，鄧小平很不高興，講了一大段堅持原有的大格局不變的談話。鄧小平強調說，改革開放，原來的方針、佈局、戰略都不動，動就亂。議論很多，無非就是通脹。我們沒犯大錯，雖然小錯不斷，這種情況以後還會有。有人講早了、遲了，應該說現在正是時候。經濟過熱，降下來就是了嘛。十三大提出的理論、政策，沿海發展戰略都不能變，不然會亂。現在已經有些亂了，要穩住陣腳。現在搞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在變。我們已經提前兩年翻了一番，不改革能做到嗎？十年來，我國經濟無論是外延，還是內涵，都上了一個新台階，怎麼能還去搞計劃經濟那一套？我們沒有理由改變十三大的路線和政策，沿海發展戰略不能變。現在機會很好，連台灣都有人提出要搞大中國經濟圈，一放鬆機會就沒有了，不能後退。兩頭在外有什麼不好？包括對阿拉伯市場，也包括蘇聯、東歐、中亞，外蒙，我們都要積極發展。總之從國內、國際局勢看，我們都沒有理由改變，否則就會亂，嚴重影響我國的國際聲譽。回到貧窮的社會主義，就要被開除球籍！我們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不變。調整中要保持一定的速度，7%到8%的速度還是必要的。【349】

這一時期，中共黨內的保守派老人集團掀起的倒趙風也好，李鵬、姚依林在國務院架空趙紫陽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也罷，從表面上看，他們是衝著趙紫陽去的，但實質上，他們更是對著鄧小平的，只不過，他們沒有那個膽量敢向鄧小平直接發難。這是因為，趙紫陽當時主持中央所作出的決策，或者是由鄧小平提出、趙紫陽執行的，或者是由趙紫陽提出，經鄧小平同意和支持的。批趙，實際上就是在批鄧。鄧小平也很清楚這一點，維護趙紫陽，就是維護他自己。趙紫陽回憶說：「『六四』以前，在這樣一股倒趙風面前，鄧小平是一直堅定地支持我的，沒有受他們的影響。這從一些事情可以看出來。譬如那一陣鄧在許多場合說，中央的人事格局不能變。顯然中央有人想變鄧才說不能變。鄧甚至直接向我，也向別的同志說，要我搞兩屆總書

【348】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60頁。
【349】鄧小平與趙紫陽的這次會見和談話，在《鄧小平年譜》中未見任何記載。

記。1989 年元旦以後，也就是李鵬在政治局生活會上向改革開放發難以後，鄧知道此事很不高興。李鵬為此去鄧那兒解釋、表白【350】，在這次談話中間，鄧向他講，趙要搞兩屆總書記，而且要他回去轉告其他政治局常委。當然李鵬也向我講了說是鄧講的。」「不少老人向他（指鄧小平）施加壓力，說我壞話，而鄧明確表示不受他們的影響，頂住了他們這些壓力。自 1987 年我擔任總書記之後，逐漸聚集起來的一批反對我的保守力量，雖然他們非常囂張地反對我，採用各種辦法反對我，但由於沒有得到鄧的同意，始終未能得逞。這種情況直到 1989 年發生那場政治風波後才改變。」【351】

二、「動亂問題研究」

中共十三大以後，中國進入了一個全面改革的階段。經濟、政治、教育、文化、科技等各領域的改革，都按照十三大的部署，開始實施。雖然改革在進行中遇到了多方面的阻力，但畢竟還是在艱難中前行，在一些領域中甚至取得了相當程度的進展。改革，是體制的調整，更是利益關係的調整。它每前進一步，都會引起社會結構、利益格局的變化。舊的矛盾解決了，又會出現新的矛盾。進入 1988 年以後，雖然經濟保持了較高的發展速度，但價格體制還沒有理順，物價上漲幅度仍然較高；價格雙軌制的漏洞、對公權力缺乏制度約束和輿論監督所孳生的腐敗，開始引起民眾強烈的不滿情緒；政治體制改革的進行為人們提供了較為寬鬆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但也讓一些人產生了對民主發展的急進要求。特別是 4、5 月份以後，隨著各方面改革的深入，加上後來「物價闖關」的信息流傳到社會上，各種社會矛盾更加尖銳起來。

1988 年 3 月 24 日下午，在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全體人員會議上，鮑彤在談到本室今年工作時，特別提到，社會改革局要研究社會發展與安定問題。特別要注意研究蘇聯東歐各國在改革過程中突發事件和社會動盪產生和發展情況，研究它們的規律；探討世界各國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 1,000 至 4,000 美元之間這個階段的社會結構、利益

【350】對李鵬去見鄧小平表白這件事，《鄧小平年譜（下）》有記載，但只有一句話：「1 月 10 日，在住地同李鵬談話。」見《鄧小平年譜（下）》，第 1262 頁。

【351】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265-266 頁。

關係、利益矛盾的變化，和不安定因素的情況。這要作為一個專門課題。另外，他還提出要做社會輿情調查。

1988 年 4 月 26、29 日兩天，中央政改研究室召開新聞界座談會，邀請人民日報、經濟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法制日報、北京日報等新聞媒體的有關領導和部門負責人到會，座談當前的社會輿情和社會動向問題。

與會者在發言中，介紹了他們瞭解到的各種社會動態，特別是對剛剛開過的兩會，對物價、收入、黨政機關經商辦企業、幹群關係等熱點問題的民間看法和意見。許多人認為，現在老百姓迫切需要有一個說話的地方，要有個社會排氣閥，現在的渠道不暢，很可能出現大問題。官倒腐敗問題、知識分子問題、物價問題等等長期得不到解決，已經使相當多的人失去信心。年復一年談這些問題，可總也解決不了，讓人們失望。潛在的信心問題，危機性更大。比如許多地方的農民通過基層幹部的所作所為，已經失去了對共產黨的信任感。學生鬧事，其實並沒有工人、農民鬧事影響大。知識分子鬧事，其中還可以提出一些建設性意見，工農鬧事，破壞性要更大。現在上面和下面對形勢的估計不一致，上面也許可以瞭解一些情況，但對下面情況的嚴重性估計不足。

發言中有人談到了要通過宣傳引導，在提高人民群眾對改革的承受力的同時，還要注意把握好一個「度」。現在老百姓，特別是知識分子對民主的期望值較高，而我們的宣傳又有意加溫，導致期望值超前。老百姓希望是越開放越好，越民主越好，但我們的決策部門對於報刊宣傳能講到什麼程度，我們的改革在一定時期內能做到什麼程度，應該有個把握。不能無限制地吊高胃口。

有人在發言中提出建議，政府應該多講改革中的困難，少講形勢一片大好。要把改革的目標和可能遇到的困難告訴老百姓和全社會，要不斷地講危機，講可能出現的問題，讓民眾理解改革的難處、政府的難處，這樣才能化解社會壓力，提高老百姓對改革的承受力。在討論中，還有人提到，必須改變我們在宣傳上的一些錯誤理念。我們總是把經濟問題、技術問題搞成政治問題，比如學生對學校有意見，應該把它看成是教育體制問題，讓學生去討論如何改革，可我們有些領導總是把這類問題搞成政治問題，上綱上線。外國政府的宣傳是善

於把政治問題變成技術問題，或引導到技術問題上，比如香港對搞核電站的討論。這裏的關鍵在於轉變黨對宣傳工作的觀念，在於如何引導。應該把新聞自由的口號，轉變成黨和政府如何利用新聞工具促進民主政治建設和改革。

這次座談，引發了鮑彤和政改研究室研究人員們對社會矛盾可能的發展和激化的思考。在討論中，鮑彤提出，針對當時的社會問題，以及可能發生的各種矛盾的激化應該進行研究，要有個預案。他在幾次與趙紫陽交流時，都談到了這個想法，趙紫陽表示贊同。

進入5月以後，「物價闖關」的問題在中央提上了日程。5月9日晚，趙紫陽與鮑彤的談話。趙紫陽說，最近有些同志反映社會矛盾很多，有的同志看得很重，要研究一下，要成立一個社會穩定問題的對策研究小組。人民的不滿現在還在發酵，容易出事。矛盾太多，一時解決不了，需要人民諒解。這個問題不解決不行。

在5月16日，也就是第一次提出「物價闖關」的那次政治局常委會上，趙紫陽在談到了形勢、物價、分配不公、廉政、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問題之後，特別談到了對可能發生的社會突發事件，應該有所準備的問題。他說，如果今後幾年真正下決心改革，而不是停步，那就要有保證社會穩定的措施。政法部門要研究，新聞單位要配合，尤其北京市的穩定特別重要。對付突發事件，我們還沒有本領。要麼操之過急，要麼放任，要麼處理失措導致事情擴大，這不行。看來，要有所準備，要研究這個問題。今後一年是一個關口，如何謹慎地度過，是擺在我們全黨面前的一個重大問題。要避免波蘭、南斯拉夫那樣的情況，要過好關，否則問題無法避免。全黨要有清醒、統一的認識，要有精神準備。

在5月30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趙紫陽再次談到這個問題。他說，應對突發事件，當然最根本的是要搞好基層民主建設和法制教育，克服官僚主義。現在許多突發事件是不關心群眾的官僚主義引發的。要有準備，有預案。是不是搞一個《緊急狀態法》做預備，這是在改革深入前提下的一個必要措施，與民主政治的方向並不矛盾。

5月18日，在中央政改研究室全體研究人員會議上，鮑彤傳達了政治局常委會上趙紫陽的意見，並談了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鮑彤認為，在當時的形勢下，發生較大規模的社會突發事件是可能的，確實

應該進行研究並有個預案。他說，社會突發事件，是社會矛盾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被某些具體的事情所引發。對這類事件，我們不能沿用過去的「敵對勢力破壞」這種思維來認識，也不能用解決敵我矛盾的方式來解決。我們預防和解決突發事件的基本方式，就是要採取各種社會階層的對話，共同協商的辦法，通過相互的理解、諒解、妥協和讓步來解決社會矛盾。會上確定，由社會改革局陳小魯、唐欣等人負責，行政局高山參加，組織幾個人成立個專題組，收集資料搞調研，並拿出一個初步意見。

會後，社會突發事件專題組的幾個負責人做了分工，大體上分成三塊，第一塊就是對近期國內的情況做一個預測，會不會發生動亂，動亂會以什麼形式出現，由唐欣負責；第二塊是從全世界各國看，在改革或者發展過程中，出現社會動亂的基本條件和規律，這部分由高山負責；第三部分就是如果一旦動亂出現，應該怎麼應對，採取什麼對策，由陳小魯負責。大家各自帶幾個人，從收集資料和調研開始。

唐欣後來回憶說，我負責對近期國內的情況做預測這部分。我就帶著閻軍【352】，我們倆大概工作了幾個月，去過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等許多單位座談。團中央就是跟李克強他們對話，瞭解情況。當時李克強是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然後還有中辦、國辦和全國人大信訪局。我曾經是人大信訪局副局長。我們到信訪局，目的是瞭解各地人民來信來訪情況。還到公安部，民政部，都做了一些調查。小魯、高山他們也都同時開展了工作。我們這個社會突發事件專題組內部後來還組織過多次內部討論，交流情況，研究和修改我們的提綱。

1988 年下半年，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思路變化很大，先是「物價闖關」，後來又提出了治理環境、整頓秩序。黨內國內的各種關係和矛盾也在不斷變化之中。中央政改研究室面臨的環境較為複雜，工作也較多，前後思路的調整也較大。社會突發事件專題組的這些成員同時還要參加其他方面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突發事件研究彙報就拖了下來。直到 1988 年的 12 月，小組的幾位負責人才向鮑彤作了一次彙報。

這次彙報以唐欣為主，根據他的回憶，大體內容如下：

【352】閻軍，時任《法制上報》記者。1987 年政治體制改革研討期間，借調參加研討小組辦公室工作。1988 年後，也曾短期借調到中央政改研究室參加課題研究。

專題組成立這段時間來，走訪了中央、國務院的許多部門，全總、共青團中央等社會團體，中國社會科學院等有關研究部門，收集了大量的有關資料。經過系統的分析研究，得出了以下看法：

分析中國以往發生的動亂，主要有五種形式：(1) 民族動亂；(2) 宗教動亂；(3) 工人運動；(4) 學潮；(5) 集體上訪。

從目前情況來看，只有學潮是最可憂慮的。因為：

第一，民族動亂在中國說來，只可能發生在西藏、新疆這樣的少數民族人口佔多數的民族聚居地區。而在這些地區，近年來出現的民族鬧事又各有其複雜的政治原因。西藏的鬧事，主要原因是前幾年採取了錯誤的民族政策，從西藏大量撤退漢族幹部，漢人大量離藏，減弱了漢藏之間的中間地帶，削弱了對藏區的控制力。而新疆阿克蘇近年鬧事，則主要是由於漢藏糾紛引起。所謂「東土爾其斯坦」那些人成不了大氣候，只要政府處理得當，不會出大問題。國內其他地區的少數民族鬧事，更無大憂。而且民族動亂不會危及中央政府。

第二，宗教引發的動亂，可能性更不大。「文化大革命」當中打爛了宗教，十年後再恢復，已有了一個斷層，老的宗教領袖和新上來的第二代宗教領袖之間的權力爭鬥，是現在宗教鬥爭主要的內容。而且中國信教人口比例不大，並從來沒有一個國教。只要政策對頭，處理得當，宗教鬧事的可能性不大。即使鬧起來也好對付。

第三，近年來的工潮，雖有發生，但主要發生在中小城鎮的中小企業，鬧事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解決本地區、本企業領導的官僚主義和經濟福利問題，而且有較為分散的特點。在一般情況下不會形成全行業或部分行業的較大規模工潮。

第四，這幾年的集體上訪仍大量存在，但無論是申訴冤假錯案，還是要求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或是控訴官僚主義，都是以相信政府，要求政府作主為前提的。因此，雖然集體上訪可能攪起一些風波，但刮不起大浪。

第五，剩下的只有學潮。從粉碎「四人幫」到 1988 年底，幾年來共發生過 3 次較大的學潮。從這些學潮來看，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是都集中在大城市，一旦發生，政治影響較大；二是發展迅速，政治性強。一般由學校管理不善造成的生活問題或其他偶然因素引發，但幾天之內即可發展到提出政治要求；三是在各大專院校之間、各大城

市之間極易此起彼伏，互相聲援；四是政治傾向上搖擺不定，可左可右，比如 1985 年 9・18 學潮表面上看是反對中央的對日政策，表現為學生強烈的排日要求，但實質上反映了一種抵制、排斥開放的極左傾向。而 1986 年底的學潮，則主要反映了政治上的自由化傾向，這當然是一種右的傾向。

如果僅僅是限於學生範圍之內的學潮，這當然並不可怕，難辦的是當它發展到提出政治要求之後，很可能會得到其他社會階層的支持。

在目前處於經濟、政治、文化中心的大中城市中的社會階層，主要有工人、幹部、知識分子、軍人等四個階層。在這四個社會階層中，由於改革所造成的他們的經濟、政治等方面地位的變化，使他們目前的政治態度有所不同。工人、幹部、軍人三個階層的利益受到影響，對政府有一定的不滿情緒，認為是改革帶來了社會不公，要求保障他們的利益。而知識分子階層則認為改革的進程太慢，要求加速改革。特別是近年來，知識分子當中的自由化、民主化的傾向越來越明顯，他們要求加速改革，加快經濟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的步伐。他們當中的確有一少部分人主張進行激進的向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但大部分人還不至如此程度。

如果說，在學生當中近期爆發學潮，而且以自由化的政治要求為主題的話，那麼首先能給他們以積極聲援和支持的，是知識分子階層。而且學生也最希望他們的師長對他們的行動給以支持。而其他三個階層一般不會參與，因為僅鼓吹自由化的口號，對他們的吸引力不大。如果事實只是如此，那麼事情雖然有些棘手，但也不是不能解決。最難辦的就是目前明顯存在著其他三個階層參與進來和學潮匯合在一起的危險性。

目前，存在著一個可以促使城市中的四個階層形成共識的因素，這就是反腐敗。腐敗問題現在我們的社會中確實已發展到相當嚴重的程度。如果在學潮中學生打出反腐敗這個大旗，那麼不但會得到知識分子的支持，而且也會點起工人、幹部、軍人的對現實不滿之火。他們如果參與進來，那麼事情就不僅僅會是學潮了，很可能釀成大規模城市騷亂和民暴。要是事情發展到這種程度，解決的辦法無非是軟的和硬的兩種。但無論是軟的還是硬的，事情都不會那麼輕易了結，後果可能直接危及到執政黨的地位、現領導人的地位和現政權的鞏固。

根據從各單位收集到的材料分析，目前的情況是：實施治理整頓和經濟緊縮以後，各地的企業，特別是一些中、小企業，經濟狀況普遍惡化；社會上的腐敗，特別是相當一部分官員的腐敗加劇，官倒、警倒、軍倒無一不倒，高幹子弟經商影響極壞，已經引起了社會各個階層的不滿；在一些學生和知識分子當中，在一部分學校當中，對現實政治的不滿情緒，和自由化、民主化的傾向已經發展到近乎公開化的程度。看來，動亂的發生，只是個時間的問題了，而且可能發展到相當嚴重的程度。要防止動亂的發生，幾乎是不可能的。對此，應該有足夠的思想準備。

據專題組根據種種跡象判斷，具體可能發生動亂的時間，是在1989年的五・四前後。

那麼，我們現在應當而且又能做些什麼？唐欣認為，只能去抓廉政問題。在我國，在目前條件下，共產黨抓廉政，我們室提出的「兩公開、一監督」，搞政府機關辦事公開化、制度化，是唯一正確的路子。它的關鍵，是從正面抓廉政，是在正常的規範化、法制化的秩序下抓廉政，而不是搞群眾運動，更不會誘發群眾的不滿情緒，而只能使群眾的不滿情緒降溫。在剩下的有限時間裏，我們只能通過廉政制度建設工作，盡可能地緩解群眾的對政府公務人員中腐敗現象的不滿，以減弱不久可能發生的動亂的能量，降低它的烈度。

至於動亂發生之後採取什麼樣的對策，目前不可能談得很具體，但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要通過社會協商對話，通過民主和法制的方式來解決。

唐欣後來回憶說：「當時對於什麼導火索能引發動亂，我的結論是不知道，肯定會是一個誰也說不清楚的偶然因素。如果騷亂一旦開始，只要口號不是反腐敗，就不會顛覆黨的政權。但如果這個口號有人一喊，那麼就可能動員起大量群眾參加。這是我的結論。」

1989年是五四運動70週年。唐欣回憶說，「2月份，中央宣傳理論工作領導小組開了一次關於研究如何紀念五四的討論會，是我代表中央政改研究室參加的。那次會由中央書記處書記芮杏文主持。團中央去的是劉延東，中宣部去的是籐騰。會上籐騰有個發言，說五四運動70週年了，應該組織學習毛主席〈青年運動的方向〉這篇文章，對青年學生加強和工農兵相結合的思想教育。劉延東他們也同意這個看

法。我在會上有個發言，我說我是中央政改研究室的副局長。我們室最近有這麼一個防止發生動亂的調查。我覺得當前主要問題，就是不能讓群眾和學生相結合。因為 1989 年初那段時間，物價上漲很厲害，分配不公已經有苗頭了，現在大學生基本上是同情『自由化』的。如果你要是組織學了這篇文章，讓學生到工農當中去，代表工農的利益，那麼他們就要去追問這個物價的問題，分配不公，學生和工人運動一結合再反腐敗，這事就鬧大了，可能就要導致一場騷亂。芮杏文說這個局長講的不錯，看起來咱這五四還是別促使知識分子和學生到工人農民群眾當中去，這不得了。於是就把籐騰的意見給否了。當時我覺得芮杏文的表情非常吃驚，中央政改研究室這麼看問題，說到點子上了。」

鮑彤後來回憶起這個「社會突發事件研究」時說：「我們那一時期就此問題給上面的所有報告集中到一點，就是要用社會協商對話來緩解社會矛盾。這個觀點，和十三大報告，和紫陽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在十三大報告中寫入『社會協商對話』，並把它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問題加以闡述，就是紫陽提出來的，而且也得到了全黨的認可。所以，當『六四』爆發出來，紫陽就堅持，要進行社會各方的協商對話。這是預案以內的事情，根本不像後來有些人說的什麼手足無措。紫陽要開展社會協商對話，書記處成員、常委沒有一個人反對。因為這句話已經不知道說了多少遍，碰到這些問題怎麼辦？紫陽說，過去，我們可以說共產黨領導一切，你必須聽我的話；現在，學生說：『為什麼共產黨的話就是天經地義？難道我們的意見就不能考慮考慮？』所以，我們現在必須改變工作方式，怎麼辦呢？就是通過各種社會力量協商對話，來達到一個平衡點，使大家能夠達成一種共識，用這個東西來化解社會矛盾。紫陽覺得，無論如何不能激化社會矛盾，只能通過協商對話來化解。在當時，這個意見已經成熟到不需要再研究的程度。但誰也沒有想到，由於李鵬等人的有意破壞、干擾和阻撓，紫陽通過協商對話解決分歧的想法落空了。最後調軍隊進來了。動用軍隊，倒是我們的預案中從未想到、從未研究過的問題。」

說來也好笑。在政改研究室內部的研究和交流中，為了方便和簡練，大家不約而同地把「社會突發事件研究」說成是「動亂研究」。後來，1989 年六四之後，「中央清查清理辦公室」派出工作組，帶著「抓

動亂黑手」的目的到政改研究室搞審查和「清查清理」。工作組聽說鮑彤組織研究室搞過「動亂研究」，以為是研究如何搞動亂，如獲至寶。他們對當初參加過的專題組的唐欣、陳小魯幾個人審查了個底掉，結果發現鮑彤主持研究室搞的不是「如何搞動亂」的研究，而是研究如何防止動亂，他們搞了個大烏龍。這個結果彙報上去以後，讓那些希望抓住條大魚的領導們很是失望。

需要補充的是，1989 年六四鎮壓以後，特別是近年來，由於當局執行了強力「維穩」的政治高壓政策，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抗爭大都很難再採取街頭的方式，大學生們也不再採用學潮的方式表達不滿情緒，國內突發事件的形式發生了重大變化。由暴力拆遷、公權力腐敗、濫用權力、官員不作為或是亂作為等官民矛盾引發的群體性抗爭事件已經成為社會突發事件的主要形式，工人、農民、市民則成為群體性事件的主體。而且其發生原因之複雜、矛盾之尖銳，已遠非當年鮑彤和他的部下們所能預料到的了。

三、全國廉政座談會

廉政工作，是中共十三大後，趙紫陽主持的中共中央提出並十分重視的一項工作，也是中央政改研究室成立以後所抓的一項重要課題。1988 年年中，中央政治局決定「兩公開一監督」在北京、上海試點。10 月 10 日，趙紫陽聽取了北京市東城區廉政試點工作的彙報，並充分肯定了東城區的做法，基層的廉政制度建設很快就在全國推廣開來。政改研究室為此專門設立了一個廉政專題組，集中力量研究反腐敗的制度建設問題。

那一時期，黨政軍機關辦企業問題、官倒和官員腐敗問題、幹部子女經商問題等，已經引起了社會上民眾越來越強烈的不滿情緒。社會上暗潮湧動。黨內許多人看到了這一點，但仍然沿用舊式的思維方式，把腐敗問題歸結為黨風問題，主張用加強思想教育和「黨風建設」的辦法來解決。在研究過程中，鮑彤強調，我們要從政治體制改革和制度建設的角度去研究探討反腐敗問題，重點要抓兩個措施，一是公開，二是制度建設。過去歷來是用搞政治運動的方式反腐敗，這樣做既容易發生偏差，效果也不能持續。現在我們不搞群眾運動，又要依靠群眾，就只有搞公開化，靠群眾監督來解決問題。

11月23日下午，中央政改研究室全體人員開會，研究1989年的工作，鮑彤在會上對這一段時間的各方面工作做了總結，並提出了明年一季度召開全國廉政工作座談會的想法。他說，到明年2月，紫陽同志提出黨政機關要廉潔這個問題已經一年了，我們應該總結一下。現在一些地方做得不錯，也應該交流一下。可否明年一季度開一次全國廉政工作座談會，請做得比較好的地方和單位來介紹下經驗，也請監察、檢察、紀檢，還有中組部的同志來給大家講一下全國情況。在會議中間，向中央領導同志彙報一次，請領導做些指示。

鮑彤說，現在抓反腐敗的部門很多，監察、檢察、紀檢、審計、工商、物資、稅務、公安，都在抓。我們的角度，是從政治體制改革的角度，從制度上使腐敗行為得到扼制，保證黨政機關廉潔。我們從這個角度來抓，和其他部門角度就不矛盾，劃得開。廉政問題，從制度建設上講是一項綜合性的研究。要研究在黨的建設、領導機關建設、政權建設、基層政權建設當中，如何建立起一套制度，以制度防腐敗。這是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所必須的。比如，我們在搞「兩公開一監督」，搞公開不能繁瑣，不能空洞，要很精煉，可以操作，可以檢查的。要規定，違反了哪些規定，由哪些機關受理，多長時間不處理應該怎麼辦。所以僅僅公開辦事制度一條，就有很多可以研究。

鮑彤說，紫陽同志在春節以後，在二中全會、政治局第九次會議和三中全會上都講到了個問題，認為廉潔是黨的生命，廉政問題和體制問題可以在一起考慮。這個問題對整頓關係很大，大家都講要反腐敗，老百姓很希望反腐敗，黨政機關幹部也不願意背這個黑鍋。當然阻力也是有的，但阻力是講不出口的，最多只能講點困難。紫陽同志提出這個問題已經快一年了，我們準備一下，總結一下，開個會很有必要。如果要開這個會，綜合局、行政局兩個局，力量恐怕不夠。全室都要組織力量參與。

11月30日下午，全室人員再次開會討論廉政問題。鮑彤首先說，紫陽同志最近找了家寶，說廉政問題很重要，要開書記處會研究一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正在準備開個全國性的廉政座談會，請家寶和各有關單位打個招呼，都要進行一些準備。

鮑彤談了他對召開廉政座談會的一些想法。他說，我們室現在正在準備的這個廉政座談會，要在書記處會上先提出來討論，然後請中央常委會確定。會議材料可以先拉出一個單子，我考慮可以準備這麼四個問題：一是廉政問題在整個黨的工作中應該擺在什麼位置，發展的預期和我們應該採取的方針。對整個形勢的估計，黨建座談會上已經談過，看來各方面有分歧，現在仍然會有分歧。二是政治體制改革能夠為廉政做點什麼工作。廉政工作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關係。三是黨建能為廉政做什麼工作，二者之間的關係。四是宣傳輿論工作怎麼操作，對廉政工作進行配合。

鮑彤說，廉政問題要放在重要地位。我們要在改革過程中建立起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秩序，企業、個人、政府行為都要進行規範，政府工作現在沒規矩。要有一個持久的努力，特別是不能放棄眼前的努力。廉政工作現在不能採取搞運動的辦法，運動無助於建立新秩序，反而會引起混亂。建立秩序，不能靠運動。搞群眾運動不對，但依靠群眾是對的。運動無助於秩序和制度的建立。反腐敗不是靠某些單項措施就能解決問題的，而是要靠政治體制改革的綜合作用。公開辦事辦法，公開辦事過程，公開辦事結果，政府規章制度的建設等等。合理的監督制度的建立，公開作為一個首要前提是清楚的，但不要提得太高，和戈爾巴喬夫要有區別，不然容易引起非議。制度化，實際上是行政管理工作的健全和改革的問題。一是要逐步走，二是有些宜於自上而下，有些宜於自下而上，這要看情況。制度建設只能由易到難，現在不是提倡，而是一定要做到。

12 月 30 日，在趙紫陽主持下，中央書記處召開專門會議，就黨和國家機關在新形勢下保持廉潔的問題進行了討論。中央書記處全體成員到會，組織、人事、監察、紀檢，高檢、中共中央機關工委和中央國家機關工委，以及政改研究室做了彙報。會議同意春節後由中央政治改革研究室召開全國廉政工作座談會。

趙紫陽提出，這次中央書記處會的討論要形成一個紀要，講八個方面的問題。他說，一是要分析一下情況，黨政機關幹部大部分是好的，當然嚴重性也要講，分析一下為什麼會出現腐敗的問題。第二，要把廉政建設放在重要位置。這是改革開放的保證，和治理整頓，建設商品經濟新秩序有密切關係。這是我們的方針。第三是要講綜合治

理，通過各種方面的努力，圍繞廉政工作，推動廉潔，防腐敗。第四，辦案機關要協同，按照各自職能進行工作。五是建立監督體系，監察、紀檢、檢查等等，要努力成為有威信的機構，黨內要協同動作。六，公開辦事制度，舉報中心怎麼搞，公開主要是幹群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根據各自的特點，實行民主監督、群眾監督，看來有可能走出一條路子來。第七講黨的建設。黨組織的戰鬥堡壘作用，黨的基層組織的作用。第八，輿論監督，人大、政協、新聞，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都要講。要講報紙監督作用，當然，也要講在黨委領導下。

在鮑彤彙報過程中，趙紫陽說，公開就是民主，就是和民主有關係。看來到機關辦事，一個是不公，一個是不便，他才要行賄。索賄比一般貪污的問題更大。要注意制度不要要求過高，要求過高做不到，反而沒有約束力了。制度就是要實事求是，符合實際。脫離實際的規定等於沒有，規定了的就一定要辦到。不僅要嚴格在規定上，更要嚴格在執行上。不同的問題要有不同的辦法，大量涉及群眾利益的問題，規定一系列的制度有好處。有些問題，比如四菜一湯，主要領導帶頭。機關裏牽扯幹部利益的問題也要公開。有些問題粥少僧多，更要公開。財產申報很複雜，要好好研究一下。

在各單位彙報過程中，中央書記們不斷插話討論。胡啟立說，一方面老體制在起作用，另一方面商品經濟初步發展，政企不分，又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非常態競爭，很容易發生腐敗。喬石說，公職人員的工資問題，也遲早是個要解決的問題。閻明復說，公開監督，要把人大、政協、民主黨派、群眾團體的工作動員起來，和民主人士對對話，歡迎檢舉，只要有線索我們一定查。

在會上，關於新聞報道的問題，也議了幾條。正面的要報，反面的，在大體有了眉目以後，也可以報，但不要講結論性意見。包括重大案件要留有餘地。會上確定，中央書記處過完年以後還要開一次會，要研究這個紀要。鮑彤在會上提出，辦事制度的建立是涉及各個部門的事，是不是由監察部抓一下，會議對此沒有結論。

1989 年 1 月中旬，《中央書記處討論廉政建設會議紀要》印發全黨。這個紀要，在趙紫陽會議講話所講八條的基礎上，增加了一條：發揮民主黨派和群眾團體的監督作用。

從 12 月初開始，中央政改研究室開始進入全國廉政座談會的籌備階段。全室 17 位研究人員全部投入到了會議的籌備之中，大家按照每個人所聯繫的省市，分赴各地各行業進行調研，瞭解情況。筆者與社會改革局副局長石肖巖負責聯繫福建省，12 月 11 日，我們來到福州。幾天時間裏，我們與省委書記陳光毅、省委秘書長趙學敏、省委研究室主任趙守箴等進行了多次交流，並聽取了工商、稅務、海關、交通等部門的廉政工作情況介紹。此後，又赴石獅、泉州、漳州、廈門等地進行調研。12 月 19 日，我們回到北京，將福建的廉政建設情況向鮑彤做了彙報。29 日，研究室舉行了調研情況彙報會，從各地回來的同志分別交流了情況，並對一年來廉政工作效果突出或是有特點的單位進行了初選，開始組織會議材料。1988 年 1 月下旬，筆者又用一周時間對所聯繫的另外一個省份——吉林省的廉政工作情況進行了調研。

春節過後，2 月 10 日，政改研究室全體研究人員再次開會，對會議的安排做了最後的落實。據研究室秘書長陳群林通報，這次參加全國廉政工作座談會的正式代表有 130 人，其中有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國家機關副部長 9 人，地方各省、市委副書記 12 人。其他各省、市也都是由黨委常委或是紀檢委書記帶隊。

2 月 13 日至 16 日，經中央書記處批准，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召開的全國廉政制度建設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政改研究室副主任賀光輝在會議開始時講了話，他說，這次「會議的主要任務，一是認真學習和貫徹中央書記處關於廉政問題的會議紀要；二是交流總結一年來廉政制度建設的經驗；三是研究如何進一步抓好廉政制度建設。」

接著，開始會議發言和介紹交流。幾天裏，有 12 個單位作了大會發言，其中有搞廉政制度建設最早的黑龍江農業銀行；農村是山東郯城、河北稿城、安徽阜陽；城市有南京、煙台、及北京東城區、上海黃浦區、成都西城區等。福建省以全省的名義也做了大會發言。

2 月 14 日，趙紫陽主持中央書記處在中南海懷仁堂聽取了鮑彤和與會代表的彙報。胡啟立、喬石、芮杏文、閻明復、溫家寶等中央書記處書記都參加了座談。趙紫陽在講話中，充分肯定了這段時間來抓廉政建設取得的成果，並說：「近一年來，中央多次講過，廉政問題要擺到各級黨委的重要議事日程上來。」「解決廉政問題，下邊創造的經驗很可貴。儘管是初步的，但代表一條解決問題的路子，就是『兩公

開、一監督』。至少已經證明它很適用於基層，我看對領導機關也是解決廉政問題的一個很重要的方法。真正有這一條，就有很大的制約力。解決廉政問題決不能靠搞運動，要靠制度建設。靠制度，這個制度就必須使人民都知道，就是公開，制度公開，辦事結果公開，還有監督。舉報就是一種重要的監督形式。公開本身也是監督，一公開就能起到監督作用。抓住公開辦事規則，依靠群眾監督，建設內部的、社會的制約機構來防止腐敗，我看是好路子。」他強調，「要按這個路子扎扎實實走下去，不斷完善、不斷豐富、不斷深入。通過廉政制度建設，可以推動商品經濟新秩序的建立，推動民主政治建設。要把廉政制度建設同整個商品經濟新秩序的建立、民主政治的建設很好地結合起來。」

2 月 16 日下午，鮑彤在會議結束時作了總結。他在講話中，對廉政制度建設的思路提出和形成作了介紹，說明了政治體制改革與廉政制度建設的關係，強調了廉政制度建設的重要意義。在回答「回去怎麼辦」的問題時，他說，「一句話，按中央書記處的要求辦，在省委的統一部署下辦。」他強調，「已有的點（指試點單位），第一要鞏固住，第二要配套，第三要不斷有所發展。已有的陣地不能丟，而且要繼續發展。」「面上的工作恐怕要以點上的工作為基礎。是不是可以這樣設想，沒有搞點的地方，先搞點。真正取得經驗後，再推廣，由小到大，滾雪球。」鮑彤強調：「大家都要注意，廉政制度建設最怕搞形式主義。制度建設的靈魂是建立制約機制，最怕丟掉了靈魂，光抓一些表面的東西。所以，第一是制度要有嚴肅性；第二，一定要有科學性，切合實際，辦得到；第三，要明確具體，可操作，可檢查，違反了可處罰。」

從 1988 年初到 1989 年初，僅僅一年時間，「兩公開、一監督」就在全國由點到面，大面積展開，並初見了成效。這是十三大後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成果。有人說，這算不上什麼政治體制改革，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僅需要宏觀的，也需要微觀的，在政府與群眾發生最直接聯繫的地方進行改革，並使之制度化，是廉政建設和預防腐敗的基礎性工作，也是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直到今天，當年提出的「兩公開，一監督」的一些具體做法，在一些地方基層單位仍然堅持下來了，比如一些地方在網絡上施行的廉

租房公開搖號、購車公開搖號制度、工商部門的辦事大廳等等，都仍然在發揮著保證公開、公平的作用，這是讓人感到欣慰的。

四、多黨合作問題要拿出個方案

現行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發源於上個世紀 30、40 年代，以抗日和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為目標而結成的由中共領導的「統一戰線」。隨著中共建國和一黨專政制度的確立，逐漸演變成為「有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在現代國家，政黨政治是國家政治制度的基礎。但是在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是國家政治制度的基礎，而「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卻從來就不是這個國家政權的基礎。從形式上看，中國除中共以外，還有多個政黨存在【353】，但這些政黨，卻不能有自己的政綱和執政目標，實際上已經淪為一黨專制的點綴、花瓶和政治工具。從這一角度說，中國離現代國家還有相當的距離。能否「開放黨禁」問題，是中國實現向政治民主化、現代化的社會轉型中最基本的一個問題，也是政治體制改革中最為敏感的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涉及四項基本原則最根本的一條：堅持黨的領導。當年曾經參加政治體制改革研討的人們都心知肚明，按照官方說法，這次政治體制改革，是由共產黨發動和主持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是鄧小平為政治體制改革設定的一條紅線，是不能碰的。碰了它，不但改革搞不成，而且會被扣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帽子。

但是，不能搞，並不等於這場改革的主持者趙紫陽對這個問題沒有認識，沒有過思考。1988 年在中央北戴河辦公期間的 7 月 16 日，趙紫陽找溫家寶、鮑彤、張岳琦、龔育之、賈春峰等，談思想政治工作改造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研究問題。當龔育之說到文化多元化，有人講是資產階級的。趙紫陽說，過去反右時把「雙百方針」當作策略，百家爭鳴，引蛇出洞。問題是只有馬克思主義一家，戰鬥力太差，別的東西一出來，你就要靠行政手段去壓了。龔育之問，雙百方針的基礎是什麼？過去說是階級分析，歸根到底是兩家。是不是歸根到底還

【353】中國除中國共產黨外，還有八個「民主黨派」，即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中國民主同盟（民盟）、中國民主建國會（民建）、中國民主促進會（民進）、中國農工民主黨（農工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台盟）。

是要從認識論上，歸結到有不同的利益集團問題上。王蒙說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多層次的精神需求，多層次的利益。對這個問題，趙紫陽說，民主黨派作用可以研究，是否起一點反對黨的作用，如果讓它亦步亦趨的跟著共產黨，那要共產黨一個黨就行了，要這麼多行政團體幹什麼，是否在某種程度、某種意義上要起點反對黨的作用。如果真的搞反對黨，那麼拆台行不行？是成立反對黨還是發揮群眾團體的作用？

這段話表明了趙紫陽在位時，對中國的政黨制度曾經有過的思考。但是在當時條件下，他沒有，也不可能提出開放黨禁這個問題，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這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趙紫陽很清楚，這次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是有限的，在政黨制度方面，只能是在大框架不變的前提下修修補補。所以，十三大後他一直在考慮，怎麼樣才能讓更好地發揮民主黨派對執政黨即共產黨的監督作用。

1988 年 9 月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之後，黨內的保守勢力利用治理整頓之機，開始大開改革的倒車；政治體制改革由於複雜的政治原因也進退維谷，停滯不前；黨內腐敗之風愈演愈烈，以權謀私、權錢交易逐漸盛行；黨內高層的政治鬥爭日趨激烈而又缺乏透明，海外港台各種流言四起，各種小道消息出口轉內銷，引發國內人心不穩。在此情況下，知識界一些人士認為，經濟改革陷入困境的原因是政治改革滯後，因此，社會上的民主化思潮空前活躍起來。民主黨派中的許多人也提出了改革多黨合作制度，爭取更多參政機會的政治要求。

1988 年底，中央統戰部的內部刊物《零訊》136、138、139 期，連續刊登了幾位民主黨派人士對於改善多黨合作制的意見。趙紫陽看到以後，選擇其中標題為《北京市部分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對「多黨合作」問題的看法和意見》的第 136 期，批送給了鄧小平，請他「便中一閱」。1989 年 1 月 2 日，鄧小平在這份材料上批示：「可組織一個專門小組（成員要有民主黨派的），專門擬定民主黨派成員參政和履行監督職責的方案，並在一年內完成，明年開始實行。【354】」趙紫陽遂於 1 月 3 日即作出批示：「小平同志批示印發常委同志。請明復同志負責抓總，組織一個專門小組（政改辦參加）研究提出方案。」

【354】《鄧小平年譜（下）》，第 1262 頁。

1月7日，鮑彤在中央政改研究室的全體研究人員會議上向大家傳達了鄧和趙的上述批示，和趙紫陽有有關意見。紫陽說，這是今年的一件大事，總要搞出一點成果出來，不能不了了之。這個問題和當前社會思潮有關。今年是五四的70週年，有人提出推進民主政治問題，多黨合作制，是個很好的題目。和廉政一樣，對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各方面工作，都會有推動。

鮑彤說，閻明復同志準備召集各民主黨派領導座談，我們研究室的陳群林，陳小魯負責，組織研討專題。社會改革局要全力以赴，這是我們室裏今年主要的工作之一。

鮑彤也談了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他說，十三大上提到，要堅持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進一步發揮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愛國人士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作用的問題。現在民主黨派這方面的要求很強烈，社會上的議論更多，甚至和議會政治、反對黨聯繫到一起。如果我們不認真地研究這個問題，提出共產黨的主張和措施，民主黨派的合理要求得不到滿足，那麼不正確的觀點，就會擴大市場。對此中央準備研究一下，到底採取什麼樣的方針，不是改變基本格局，而是使這個格局更加充實，有內容有形式，搞得更好一點。搞好了，對於發展民主政治有好處，也有利於縮小不正確觀點的市場。

鮑彤說，我們前面研討小組研討時有一個底子，在要求上，不一定比那時更高，但內容應該更加充實，更加具體。特別是操作的形式，要在十二屆七中全會方案【355】的基礎上，斟酌一下。最大的難題是如何掌握度。我的看法和一些同志認為會亂、會吊高胃口的意見不一樣，我認為這樣做有好處。如果適當的話，會推進我們的民主政治建設。政治體制改革老是拉鋸不行，承受力不夠一碰就退回來。要明確，我們的目標有限，但要內容充實，形式周密。鮑彤認為，十三大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方案，原則上都是能走得通的，是在具體問題上有時候不好辦。問題只有在前進中解決，經濟體制改革是如此，政治體制改革的共識可能更要單薄一些，但也只能如此。總之要有個說法，民主問題，公民權利要搞，但不是顛覆性改變基本格局，而是搞得更好。小平講，四項基本原則要堅持，但在這個格局下怎麼才能更好？

【355】指十二屆七中全會「討論並原則同意」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

要研究。小平要我們一年搞出方案來，形成一些共識，希望民主黨派能滿意。共產黨要和民主黨派搞好關係，領導方式要改變，黨要通過人大領導政府。

為了貫徹鄧小平的批示和趙紫陽的指示，1 月初，閻明復主持召開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和黨內「吹風會」，傳達了鄧小平和趙紫陽批示的精神，並在請示趙紫陽後，決定：第一，成立多黨合作研討小組，由各民主黨派、工商聯、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國務院、中央統戰部、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負責人參加，請趙紫陽任組長，閻明復任第一副組長，八個民主黨派中央主席任副組長；第二，成立一個小組辦公室負責具體工作和起草文件，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宋坤負責，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秘書長陳群林、社會改革局局長陳小魯參加；第三，黨內成立一個工作協調小組，由中組部、中宣部、國務院、中央政改研究室、中辦調研室、中央統戰部，全國人大黨組、全國政協黨組等派人參加，通過黨內進行協調。除了中共之外，各民主黨派內部也都組織了專門的班子，開展了自己的研究工作。

1 月 15 日上午，中央政改研究室全室研究人員開會，研究下一步的工作。會議由陳群林主持，交流各專題組的工作進展情況。陳小魯介紹了中央統戰部組織的多黨合作研究情況。他說，中央統戰部對這個工作比較積極，提出了許多想法。比如，是否可以設立多個國家副主席，由若干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擔任。今年人大會議以後，可否安排 20 到 30 個國務院部委的副職。對此，中央組織部回復說，因為年齡等原因，只能考慮安排幾個人。全國人大提出，做這樣的安排，是否考慮要修憲。

1989 年 2 月 16 日下午，利用全國廉政制度建設座談會開會的間隙，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召開了各省市負責政治體制改革部門的負責人會議。在這個會上，鮑彤通報了中央正在進行的多黨合作研討的情況。他說，最近黨中央和民主黨派在研究如何堅持、完善，充實、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問題。中央準備用一年的時間搞方案，和民主黨派取得一致意見以後再實施。許多問題需要中央和民主黨派商量。要在大方面等中央的精神。中央組織了一個小組，民主黨派要求紫陽參加，紫陽也參加了，還擔任小組組長。

2月21日下午，中央政改研究室研究人員全體會議，研究下一步工作，陳小魯再次通報了由中央統戰部負責組織的多黨合作研討情況。他說，多黨合作問題的研討小組已經成立，叫做「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研討小組」，下設了一個辦公室。研究的題目是多黨合作的理論、方式和立法問題。提出的具體措施有很多，比如由民主黨派成員擔任政府、高檢、高法兩院的職務問題，人大、政協如何加強黨派活動問題，國務院如何加強同黨派的聯繫，黨派辦報，實體編製、財政等等。這項工作，我們室準備全力以赴。鮑彤在這次會議結束時特別強調，這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我室的社會改革局下步工作的重點就是多黨合作問題，石肖巖調過去，加強力量。

據直接參加統戰部多黨合作研討的陳小魯的幾次通報，在多黨合作的研討中，各方面提出的主要是這樣一些問題：

第一，各民主黨派在現階段應該如何定位，它的社會基礎、政治地位和作用是什麼，是在野黨、參政黨還是執政黨？

第二，共產黨同民主黨派的關係應該如何確定。一些民主黨派人士要求突破過去的傳統框框，重新定位，有人甚至提出了實行多黨制的問題。

第三，民主黨派同國家政權各機關的關係，有民主黨派提出應該允許民主黨派在人大、政協設立黨團，開展有組織的活動。民盟已經決定，單獨以民盟的名義，在今年人大上提出議案，並準備作大會發言。

第四，在政協中應該開展黨派活動。

第五，民主黨派和政府的關係，民主黨派成員參加政府應該有制度保證。

第六，民主黨派對執政黨、對政府的監督作用怎麼體現，通過什麼渠道，如何發揮。

第七，多黨合作、互相監督要實現法律化。一是要修改憲法，把「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通過憲法的形式固定下來；二是搞結社法、政黨法；三是搞一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多邊宣言，通過這種形式，把多黨合作的主要內容制度化。據陳小魯說，閻明復還搞了一個多黨合作的「大憲章」，閻認為，要考慮到港澳台將來回歸的情況，這個「大憲章」，要讓港澳台、大陸的民主黨派都能接受。

第八，民主黨派應該有自己的宣傳陣地，應該允許其自行辦報。

第九，民主黨派的自身建設問題。特別是要允許民主黨派在全社會發展黨員，不應該受到僅能在某個領域發展的限制。

第十，增加各民主黨派機構的人員編制和經費開支問題。這其中的經費開支問題，極其敏感而又牽涉廣泛。中共建國之後，不但由國家財政包攬了中共的全部開支，而且也包攬了各民主黨派、社會團體的全部費用，這與政黨政治的原則是完全背離的。在政治體制改革研討中，曾經提到中共黨費自理的問題，但根本不可能實施。那麼民主黨派的增加經費、擴大編製應該如何和中共平衡處理，也是個難題。

從研討中涉及到的上述問題中可以看出，這次研討也遵循了兩年前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確定的原則，不設框框，不打棍子。在當時寬鬆的政治環境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參加這次研討的中央統戰部和民主黨派各方提出的意見，有很多確實打破了過去的框框，如果能得到確立，並形成法律和規範的話，有可能為未來在中國實行現代政黨政治奠定一個初步的基礎。

當年曾經參加過這個研討小組辦公室工作的原中央統戰部黨派局處長石光樹，後來曾經回憶說，在「六四」之前，研究小組和辦公室的工作，「主要是研討、設計文件框架。召開了各種層次、各個方面的座談會十多次，各民主黨派自己也研討，然後把問題集中報辦公室。辦公室一共編輯十幾期簡報，分報領導小組成員。當時思想非常活躍，討論十分熱烈，研討的問題也十分開放，涉及到多黨合作的重大原則、民主黨派的地位和作用，等等。」【356】

經過幾個月的研討和磨合，到 1989 年 4 月初，中共和各民主黨派在研討小組內部已經就一些問題初步達成了一致意見。按照黨內程序，下一步的工作，研討小組內中共方面的黨內協調小組應該形成一個報告，向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彙報，聽取中央對於整個多黨合作大格局和具體做法的意見，中央統戰部代擬的有關文件也在起草之中。當然，既然是政黨黨際之間的合作研討，各民主黨派參加研討的人員也

【356】石光樹：《石光樹研究文集》，學苑出版社 2007 年 6 月版，第 215 頁。

需要將研討的情況向本黨領導機構報告。但就在此時，1989 年 4 月中旬，一場突如其來的學潮中止了這一切。

當「風波」過去，政治形勢稍稍穩定下來之後，因為多黨合作的研討是按照鄧小平的批示組織進行的，所以還能得以進行下去。此時，政治高壓仍在，而原來主持這項工作的中央高層已是面目全非。趙紫陽因「支持動亂，分裂黨」的罪名被撤職；鮑彤因「洩露黨和國家機密、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名被逮捕；閻明復也由於他在「動亂」中的表現，而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被免去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但因其在各民主黨派中尚有相當大的影響，暫時仍被保留了中央統戰部部長的職務【357】。中央統戰部和中央其他部門一樣，開始在內部進行「清查清理」和黨員重新登記，從部長、副部長、各局局長到普通幹部幾乎人人自危。而各民主黨派在「動亂」中有大量支持學潮、支持民主運動的活動，雖然沒有被直接整肅，但也在政治高壓下噤若寒蟬，不敢稍有異動。在這種政治氣氛下繼續進行多黨合作的研討，其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研究重新開始以後，多黨合作小組辦公室起草的這個文件，定名為《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並又進行了幾次重要的修改，先後由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環、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主持座談會，徵求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及無黨派人士的意見。這時的民主黨派比起幾個月前來已經「乖」了許多，過去討論中曾經提到的各種「過格」的意見此時已不再提起，中共中央的「意見」順利通過。1989 年 12 月 30 日，這個《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以中發〔1989〕14 號文件發出，次年 2 月 8 日，《人民日報》全文公佈，成為此後若干年中，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的「指導性文件」。至於「六四」前研討中曾經提到的「大憲章」、多黨合作協議、結社法、政黨法等等，則不再被提起。

五、「小艦隊」的說法從何而來？

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在當時大概算得上是中共中央最為精幹的一個正部級機構，全部研究人員、行政人員，加上司機也不過 30

【357】閻明復後於 1990 年被免去中央統戰部長職務。

人。中共十三大以後，它在鮑彤的帶領下，除了要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中提出的各項措施的落實，瞭解和掌握全國政治改革的動態，並進一步研究改革實踐中提出的新問題以外，還承擔和參與了中央許多文件的起草工作，這其中包括了為總書記趙紫陽起草許多講話和幾次中央全會的報告。與此同時，它還要對中央各部門起草和準備下發的許多與政治體制改革相關的文件進行討論和提出修改意見。這樣多的工作，對於僅有不到20個研究人員的機構說來，壓力很大。

工作的壓力尚可承受，但是許多無形的政治壓力，也隨著治理整頓開始以後高層政治形勢的變化、「倒趙風」的刮起，開始向鮑彤和他的部下們壓來。這種情況，不能不說與鮑彤身上有強烈的趙紫陽色彩有關。

鮑彤從1980年趙紫陽調到中央工作開始，就一直擔任他的秘書，「總理辦公室負責人」。中國領導人的秘書，實際上就是領導的幕僚。在1989年6月以前的那些年裏，他為紫陽起草了大量的講話和文稿，特別是主持十三大報告的起草，讓他更是才名鵲起。十三大前，曾經有人向中央七人人事小組提名鮑彤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但是趙紫陽沒有同意。趙紫陽曾經對鮑彤說，一直讓你做秘書是個失誤。要是早點像張岳琦【358】那樣安排就好了。意思是說不應該讓鮑彤一直做他的秘書，讓鮑更多地帶有了趙紫陽的個人色彩。十三大後，鮑彤雖然不再是趙個人的秘書，但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這個職務，仍然把他與已經擔任了總書記的趙紫陽緊密聯繫在一起。在許多人眼裏，他就是趙紫陽的政治智囊。由鮑彤領銜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被趙紫陽的政治對手們劃到了趙的圈子裏，將其視作為趙紫陽出謀劃策的政治參謀班子，成為趙紫陽政敵們的眼中釘。

在1989年六四鎮壓之後的「清查清理」當中，工作組曾經聽到過一個說法，說年初的時候，鮑彤的部下自己就說中央政改研究室是趙紫陽的「小艦隊」【359】。那些戴著有色眼鏡來抓「動亂黑手」的人試圖以

【358】張岳琦，原任廣東省委常委、秘書長，十三大後的1987年11月調中央，在擔任趙紫陽秘書的同時，兼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

【359】文化大革命後期的政治術語，意即以反對黨的最高領導為目標的最危險的反革命組織。來源於林彪之子林立果當年組織的「以武裝奪取政權」為目標的小團體。據1971年11月中共中央下發的《關於印發反革命政變綱領「571工程」紀要的通知》及其附件的說法，林彪當年為搶班奪權，建立了兩套班子，一套是他的大艦隊「黃吳李邱」，一套是其子林立果組織的小艦隊。小艦隊由林彪和林

此來證明「壞人」鮑彤與趙紫陽不是正常的工作關係，中央政改研究室是趙支持和操縱動亂的一隻「黑手」。當然，後來查清的事實證明，這完全是無稽之談，趙紫陽既沒有支持動亂，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也不是什麼「黑手」，而是為中央做具體工作的中共中央正式機構，與「小艦隊」根本扯不上任何關係。

那麼，「小艦隊」這個說法是怎麼來的？在這個「傳說」的後面又有些什麼背景？筆者後來在與此事有關的唐欣、陳小魯的多次探究中，大致梳理出了它的來龍去脈。

1989 年下半年，「倒趙風」刮起來以後，開始有一些對鮑彤領導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負面的議論在中央機構內流傳，其中最惡毒的說法，莫過於說中央政改研究室是「趙紫陽的小艦隊」了。這說法最早起源於何處已不可考。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工作人員中，最早聽到這種說法的是社會改革局局長陳小魯。筆者曾經就此問過陳小魯這個說法的來源，陳小魯說：「『小艦隊』這個說法是從外邊傳過來的。記得當初是一個朋友和我談起的，是誰說的我不記得了。我聽到後，在室裏曾經和唐欣議論過。」

據唐欣回憶說，陳小魯在和他在議論這件事時，陳小魯還談到了政改研究室副主任周傑說過的一件事，有一次胡啟立要出差搞調研，其中涉及政治體制改革一些問題。啟立說要帶幾個人，周傑就向啟立建議說，是不是叫政研室調兩個同志陪你去。胡啟立馬上說，政研室的人我不帶。周傑跟小魯說，你看咱們這兒都成了人家不敢碰的地方了，老虎屁股摸不得，這很危險。

就在陳小魯和唐欣議論過「小艦隊」這個說法後不久，11 月 5 日，中央政改研究室準備做 1988 年的年終工作總結，開了一次全室人員的「民主生活會」。鮑彤因事不在，由秘書長陳群林主持。在這個會上，社會改革局局長陳小魯把「小艦隊」這個說法「捅」到了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桌面」上。

陳小魯後來回憶這次會時說：「領導要聽意見。秘書長就說，開個會，大家提提意見。當時我提了三條。第一條是說，我們是中央的一個政治機構，不能光為紫陽一個人工作。大致是這麼個意思，講得

立果的死黨及一批秘密據點、若干「分艦隊」組成，其目標是以武裝手段實施《五七一工程紀要》，謀害毛澤東，篡黨奪權。

比較委婉，沒那麼直白。因為當時政治局一位常委到東北調研，當時決定中辦派一個人，政改研究室再派一個人。可是，這位常委沒帶我們室的人，退回來了。當時我們就覺得，這是什麼意思啊？這是明擺著的事兒，就是認為你們是紫陽的人。你說這是個什麼問題？老鮑平常跟趙紫陽是單線聯繫。趙紫陽經常出題目嘛，這樣我們就好像成了一個直屬趙的機構，這就不太正常。第二條是講，我們是一個研究機構，不是一個寫作班子，不能光給領導寫講話，我們得研究點問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這麼大的課題，我們現在是流於應付。第三條就講，弄不好啊，我們就成了『小艦隊』了。我當時就用了『小艦隊』這個詞。因為當時確實已經有人說我們是『小艦隊』了，而且不是一般人，是黨內一些高層人士、一些權力部門說的這種話。這就是黨內矛盾的反映。」【360】

唐欣在這次會上也發了言。唐欣在六四過後的1989年10月27日，就此事寫給中央清查小組的回顧材料中，談到了他的這個發言。材料中說：這次會上「我和本室其他發言同志的意見，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對本室近一年的工作是肯定的。我個人對室領導的主要意見是，精力過分集中在起草文件之上，對研究工作協調抓得不夠，我因此提了幾條建議。」唐欣說他在發言中也提到了周傑說到的胡啟立出差不願意帶中央政改研究室的人這件事。唐欣在這個材料中還說：「小魯和我議論此傳聞時，共同感到我室對外給人造成是某個中央領導『私人班子』的形象甚值得憂慮。據此，我在會上講了必須注意對外形象，不要給人造成我們是某某人的『小艦隊』的印象。」在這個材料中，唐欣針對工作組調查的「研究室內部就有人說自己是趙紫陽的小艦隊」這個說法，澄清說：「我以上講話，本意並非認為我室就是『小艦隊』，而僅是擔心讓外人誤解罷了。我的這些意見，主要源於本室主要精力過於集中在起草文件、講話，給人形成似是『秘書班子』之形象。因此，我主張加強政改研究室的協調工作，並提了三、四條具體建議。」

那天鮑彤回來以後，秘書長陳群林向他彙報了會上大家的意見，特別是「小艦隊」這個說法。鮑彤感到事情有點嚴重。他專門找陳小魯、唐欣瞭解了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然後，他又組織大家開了一次

【360】陳小魯：〈回憶在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經歷〉，載米鶴都主編：《回憶與反思——紅衛兵時代風雲人物》第二冊，香港中國書局，2011年3月版。

會，聽取大家的意見。這次會，筆者由於出差沒有參加。據唐欣後來回憶，在這次會上，鮑彤並沒有把「小艦隊」的話點出來，只是說，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是要搞，但我們室就這麼大，就這麼多人，我們還擔負了其他部門的幾個課題，中央這些文件要起草，總書記那邊的事，還有其他一些事我們都要管，那麼你們看，我們其他的還能做些什麼呢？

在後來的一次會上，中辦副主任兼研究室副主任周傑也談了他對研究室工作安排的想法。他說，我們的任務應該排列一下。中央交辦的任務和本職工作，這都是要堅決完成的。研討小組那時候，那一年多當中的工作就是這麼搞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我們起草文件，5·13 講話，十三大報告，這是在全局上都起了重要作用的。今年我們又搞了兩次全會的報告，明年還有兩次全會，建國 40 週年還要有講話，這些都要放到第一位。政改工作是全局工作當中一部分，起草文件也是全局性工作。要把握好全局，把全局的事情搞好，政治體制改革也要協調好。

從前面的敘述中可以確認，「小艦隊」這個說法，是從外界人之口傳到中央政改研究室的；陳小魯、唐欣等人在室內會議上鄭重提出這個問題，意在解決室裏的研究和起草文件、講話的平衡協調，以改進政治體制改革的研究工作，防止供人口實，以此攻擊紫陽和老鮑。但是，當時中央政改研究室就那麼 10 幾個人，10 幾條槍，顧此失彼也在所難免，這也是讓研究室領導感到十分無奈的事。

1989 年初，又發生了一件與「小艦隊」的說法有關的事情。這次的說法，直接來源於曾經的中央意識形態方面的最高領導人，當時任中顧委常委的胡喬木。

據唐欣回憶說，1989 年初，胡喬木要到美國去做一次學術訪問【361】，美國人希望喬木講一講中國共產黨的決策機制。為了起草這個演講的講稿，他就想起了我。因為父一輩的關係，我和喬木一家都很熟，他的兒子胡石英、胡木英也都是我的朋友。喬木就叫木英給我打了個電話讓我去一趟。時間大概是 1989 年 1 月吧。我去以後，喬木對

【361】據丁曉平所著《中共中央第一支筆：胡喬木在毛澤東鄧小平身邊的日子》記載，胡喬木的此次出訪是由美籍華人物理學家李政道牽線，應美國加州理工學院邀請，以「客座教授」身份進行的，成行時間為 1989 年 3 月 24 日。參見該書中國青年出版社 2011 年 6 月版，第 513 頁。

我說，這次叫你來，是請你幫我起草一個到美國去的報告。我說，可以。您想怎麼講，和我說一說，我幫您整理一下。我就開始做記錄，他就從頭開始講他的想法，中央整個決策機制是怎麼回事，實事求是地講得非常詳細。我把他講的都記錄下來，回去後整理了一個大概十幾頁的講話稿。這件事我回來後曾經和我們局的局長陳小魯說了，小魯同意我幫喬木起草這個稿子。

唐欣說，稿子整理完了以後，就送給了喬木。過了幾天，胡木英打電話要我過去。那天我是約了陳小魯一起去的。我們一進屋，看到喬木那天不知道為什麼特別嚴肅。在他旁邊還坐著有林。有林曾經是我的上級，是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分管信訪局的，後來調到《求是》雜誌當總編。喬木見到我，劈頭就問，說小唐我讓你給我起草的東西，你寫的這是什麼？我十分驚詫，稿子明明是按照他講的記錄整理的，怎麼怪上了我？胡木英在旁邊捅我肩膀，意思是別說話，聽著。我就那兒一聲不吭地聽著。胡喬木說，你現在是不是在鮑彤那裏工作？我說是啊。他問，你現在是做什麼工作？我說我是社會改革局的副局長。他說，你不是搞政治體制改革嗎？你寫的這個，我到了美國能這麼講嗎？唐欣對筆者說，你說我當時能說什麼，他那麼大年紀，又是父輩，「德高望重」，我只好聽著。說著說著，這個老頭就把火發到了我的工作單位中央政改研究室頭上。胡喬木問我，你們研究室有多少人？我說，大概 20 來人吧。胡喬木說，你們是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就應該搞政治體制改革的工作。可是無論是我，還是其他人，都不知道你們室做了些什麼，也沒看到你們有什麼讓人看得見的成績。你們叫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這個名字，就是向全黨、全國人民的一種許諾，你們沒做出什麼成績，將來怎麼向全黨和全國人民交代？你回去告訴鮑彤，政治不是玩的！是很嚴肅的事情。搞不好，你們要變成「小艦隊」的，你知道嗎？說完，胡喬木還要我和陳小魯把他的話轉告鮑彤。

唐欣對筆者說，喬木的這句話讓小魯和我都十分震驚。小魯回來後，很快向老鮑做了彙報。唐欣回憶說，那天，胡木英隨我們從喬木那兒一起出來。我說，木英，我寫的東西明明都是他說的，現在，這老頭怎麼變了？木英說，人老了，不知道又搭錯了哪根筋，你別放在心上。我後來分析，胡喬木改了主意，並且說了這番「政治不是玩的」

和「小艦隊」話的原因，應該不會是空穴來風，更不會是他自己的發明。也許是他最近聽到了一些對鮑彤和政改研究室的議論。當著有林的面來否定我起草的稿子，又對我們講這些話，也是在表明他的政治態度。

本章前面曾經談到，1988 年 9 月「物價闖關」中止之後，趙紫陽開始承受越來越大的政治壓力，黨內保守勢力開始在高層掀起一股「倒趙風」，許多有關趙紫陽身邊這個參謀班子的說法在此時產生和流傳，並不令人感到奇怪。對這個由鮑彤率領的政治智囊班子，早在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和反「自由化」時期，保守派的大佬們就已經很是看不順眼，認為這些人給趙出了許多壞主意。十三大之後，這個班子成了中央的正式研究機構。他們認為，這個機構已經成了以政治體制改革的名義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策源地，對趙紫陽的政治立場和政治主張正在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實際上，這完全是在戴著「有色眼鏡」看問題。

無論是在 1987 年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期間，還是在十三大後，鮑彤領導中央政改辦以及後來的政改研究室所做的工作，都是按照趙紫陽和中央的部署進行的。鮑彤和他的部下們或許可能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提出過一些工作上的建議，但說到對趙的政治立場和主張有多大「影響」，那完全談不上。趙紫陽是一位有長期政治鬥爭經歷和豐富政治經驗的成熟政治家，他所提出或是認可的政治主張，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趙紫陽之所以會重用鮑彤，不是因為鮑彤能給他出主意，而是趙認為鮑彤的思想觀點與他本人有強烈的一致和共鳴，鮑彤和他的部下所做的工作能夠更充分地體現他的思想和主張。

鮑彤後來回憶，在紫陽擔任總理，主持經濟體制改革那段時間，有一次紫陽曾經和他說，我知道在一些政治觀點上我們並不完全一致，但在經濟改革上，我們完全可以合作嘛。後來紫陽當了代理總書記，主持政治體制改革研討，紫陽又對鮑彤說，以前我說過，咱們是可以在經濟改革上合作的。這回，咱們也可以在政治改革上進行合作了。「合作」這兩個字，確實可以概括趙紫陽與鮑彤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是光明正大的。那種以「陰謀論」的眼光去解釋趙與鮑的關係的看法，完全是持這種看法的人自己的陰暗心理在作祟。

但也正因為如此，黨內保守勢力此時要「倒趙」，他們首先必然要「倒鮑」，那麼，說「政治不是玩的」，以「小艦隊」的說法往鮑彤和他的部下們身上潑污水，也就順理成章了。而黨內高層中一些人聽到了這種說法，為了避嫌不想與政改研究室過多打交道，也是十分自然的。

鮑彤、周傑和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在聽到黨內和社會上流傳的這些說法之後，開始有意識地在工作方式上做了多方面的調整，以減少供人攻擊的口實。中國有句成語，叫做亡羊補牢。當時是「羊」雖未「亡」,「牢」也在「補」，但實際上都已經無濟於事。黨內的保守勢力已經打定了主意要搞趙紫陽下台，在他們看來,「鮑彤是壞人」，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小艦隊」的帽子無論如何是摘不掉的。趙紫陽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談到,「六四」以後，王震曾「說我是反革命，是小艦隊後台」【362】。這話表明,「小艦隊」這個說法在保守派當中已是流傳甚廣。無論你工作如何做調整，都已經不可能改變他們的看法和說法，因為,「說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

六、「動盪和混亂不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

從 1988 年底到 1989 年 4 月之前這段時間，趙紫陽的處境愈加艱難起來。作為主持中央工作的總書記，他不但要勉力推進阻力重重的政治體制改革，設法阻止李鵬一夥利用治理整頓之機開改革的倒車，而且還要應對來自兩個方面的政治壓力，一方面，他要承受來自黨內保守勢力的攻擊，頂住「倒趙風」的壓力；另一方面，他還面臨社會上廣大知識分子要求政治民主化、要求言論自由的壓力，他必須作出恰當的應對。黨內黨外這些壓力交織起來，像一張複雜的網，困住了趙紫陽，使他無論是向左走還是向右走，都會遇到不同方面的掣肘。

就其本意說，趙紫陽對政治體制改革推進緩慢也十分焦急，他認為政治民主是中國發展的大趨勢，中國不搞民主不行。但是，他也認為，中國需要政治穩定，社會穩定，穩定才會為中國創造一個改革和發展的大環境。而且，作為主持執政黨一線工作的總書記，他如果不能保持住穩定的局面，而發生大的社會動亂，黨內保守勢力很可能藉機捲土重來，並以此為由像當年搞胡耀邦那樣搞他下台。當然，他的政治地位會不會因此受到影響，這不是他要考慮的主要問題，但中國

【362】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284 頁。

的改革開放，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很可能就會一風吹了，這才是最讓他焦慮的問題。

1989 年 1 月 2 日，《人民日報》以〈完善民主安定秩序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堅定不移治理整頓在穩定中求得發展〉為題，發表了趙紫陽在新年茶話會上的講話，他強調說：「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抓緊經濟建設的同時，我們還要積極地、扎扎實實地推進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我們需要有不斷完善的民主，同時我們又需要有安定的秩序，以使經濟文化建設能夠順利進行，使我們的國家和民族盡快擺脫貧困落後的狀態。動盪和混亂不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這段話，集中地體現了趙紫陽那個時候的基本思想。

但是，形勢的發展，並沒有如趙紫陽所期望的那樣，逐漸穩定下來。進入 1989 年以後，國內各種政治勢力更加活躍，各種民主化的要求進一步發展，並逐步走向了高潮。

1 月 6 日，在兩年以前的反「自由化」高潮中被開除中共黨籍的方勵之向鄧小平發出公開信，要求值建國 40 週年和五四運動 70 週年之際，「在全國實行大赦，特別是釋放魏京生【363】以及所有類似的政治犯」。

2 月 13 日，由詩人北島發動北京文化學術界和知名人士，聯名公開致信全國人大和中共中央，響應方勵之的公開信，參加簽名的有吳祖光、冰心、張岱年、嚴文井、蕭乾、金觀濤、李澤厚、包遵信、蘇紹智、王若水等 33 人。

2 月 21 日，留美學者陳軍【364】致信全國人大常委會，呼籲將大赦魏京生等人的問題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議程。23 日，陳軍與北島舉行記者招待會，宣佈成立「1989 大赦工作小組」。

2 月 26 日，由胡績偉主持，在首鋼召開了中國民主問題研討會。會後，由許良英發起首都科教界人士致中共中央和國家領導人的公開信，參加簽名的以著名科學家為主，有錢熙照、王淦昌、施雅嵐、於浩成、李洪林、張顯揚等 42 人。信中提出 4 點要求，一是在堅持改革、開放的前提下，盡力使政治體制改革（即政治民主化）同經濟改

【363】魏京生（1950-）：中國著名持不同政見者。1978 年在西單民主牆貼出大字報《第五個現代化》批評鄧小平獨裁。1979 年被判有期徒刑 15 年；1997 年底「保外就醫」。現旅居美國。

【364】陳軍，留美學者，中國民聯成員。

革同步進行；二是切實保證憲法所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特別是保證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權利；三是釋放一切因思想問題而被判刑或勞動教養的青年，不再因思想定罪；四是盡可能增加教育經費和科研經費在國民經濟產值中的比重，提高知識分子的生活待遇。

3月14日，光明日報記者戴晴再次徵集43位知名人士簽名，發出致七屆人大二次會議的公開信，要求釋放魏京生等。

與此同時，受整個知識界民主氣氛高漲和師長們的影響，各高校的學生們也開始不穩定起來。「1989年3月底，共青團中央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報送了對北大、清華、人大、北師大等首都23所高校思想狀況的調查報告。報告指出，目前大學生群體呈現為一種帶有較強慣性的『亞穩定狀態』，在外部的強烈刺激與頻繁衝擊下，仍有發生大規模學潮的可能性；局部的、與實際利益相關的動盪很難完全避免。」【365】

現在看來，當時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提出的推進政治改革和民主政治的要求是合理的，他們對國家、對民族的責任感也是必須肯定的。而且他們的這些政治要求，除了「全盤西化」以外，其他的與趙紫陽，與鮑彤和他們部下的看法幾乎完全一致。如果時機得當，工作得當，這種民主化要求對高層形成的政治壓力，將會成為黨內改革派進一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強大助力。但是，從當時黨內高層的局勢看，時機恰恰並不「得當」。黨內保守勢力利用治理整頓使改革倒退，同時刮起「倒趙風」，已使趙紫陽逐步陷於被動。社會上民主大潮的興起，為保守勢力攻擊趙紫陽，反對政治體制改革又提供了新的口實和機會。他們緊緊盯住趙紫陽，試圖利用他對民主浪潮的應對失據，藉機發起致命的一擊。

而高層中這種複雜的局勢，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們是並不瞭解的。他們不瞭解中共高層複雜的政治格局變化，和當時所面臨的保守勢力捲土重來的危險，也不瞭解趙紫陽當時的處境，和他的苦心。他們不知道，有可能事與願違，在當時情況下，民主化的大潮越高漲，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越迫切，也就越使黨內高層的政治局勢向不利於改革派的方向發展，趙紫陽所面臨的局勢也就愈加複雜化。

【365】張良：《中國「六四」真相》，明鏡出版社2001年版，第97-98頁。

這種局勢，使趙紫陽、鮑彤和黨內的改革派們面臨著兩難的選擇。一方面，他們不願意反對和壓制當時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提出的推進政治改革和發展民主的要求；但另一方面，他們也知道，如果任由這場大潮發展，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社會的動盪，和引發黨內保守派的反噬。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將意味著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被中止甚至倒退，已經取得的改革成果將會毀於一旦，也意味著趙紫陽和他的部下們政治生命的終止。因此，趙紫陽、鮑彤們的選擇，只能是一方面強調「要扎扎實實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另一方面，又要大聲疾呼「中國需要穩定」，希望將民主化浪潮納入秩序的軌道。趙紫陽在新年茶話會上所說的「我們需要有不斷完善的民主，同時我們又需要有安定的秩序，動盪和混亂不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這段話，自然而然地成為趙紫陽、鮑彤們應對當時民主化浪潮的指導思想。

民主化浪潮的發展，同樣也刺激了鄧小平和老人集團。趙紫陽在回憶錄中說：「十三大以後，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處於停滯狀態。這就發生了一個問題，一方面人們要求民主，要求加快政治改革的呼聲越來越強烈；另方面十三大以後政治改革沒有什麼行動，這就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人民的要求，特別是知識界的要求同黨的想法差距很大，矛盾很大。宣揚引進西方議會制的言論也出來了。……校園也十分活躍，各種各樣的沙龍、論壇，也有過激的言論。一些思想偏激的知識分子紛紛到大專院校發表煽動性講話。方勵之在國外還直接點名對鄧小平進行人身攻擊。這些都給借反自由化來反對改革開放的人一個口實，拿這些事向老人們挑動，使鄧和老人們神經更加緊張，認為政治方面不能有絲毫鬆動。」【366】

3 月 3 日上午，鄧小平和趙紫陽進行了一次談話【367】。趙紫陽向鄧小平談到了當時國內各種政治傾向的問題，鄧小平說，不要在這些問題上花太多的時間和精力，也不要採取過分措施。鬧過頭了再採取措施。觸犯法律我們再採取措施，不然就是一種政見。在中國，壓倒一切的是穩定，我們搞四化，搞改革開放，關鍵是穩定。凡是妨礙穩定的就要對付，不能讓步，不能遷就。要給外國一個信號，在穩定的前

【366】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281-282 頁。

【367】這次談話的時間存疑。據《鄧小平年譜》下卷和《鄧小平文選》第 3 卷記載，是在3月4日。但據筆者的傳達記錄所記，是在3月3日。因為此後的4日上午，趙紫陽是在中南海勤政殿開會。

提下，中國才會改革。中國人的事中國自己辦，外國人要議論，讓他們議論去。中國不能亂，這個道理要反覆講，放開講。不講，反而好像輸了理。要放出一個信號：中國不允許亂。

趙紫陽向小平反映，現在有一個說法叫做新權威主義。鄧小平說，我就是這個主張，可以換個說法，把道理講出來。要看到中國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大多數學生是擁護改革的。告訴同志們，遇事要沉著。台灣集中攻擊我們四個堅持，恰恰證明四個堅持不能丟。沒有四個堅持，中國就亂了。文革的全面內亂就是教訓。民主黨派參政，他們自己也要穩一點。民主黨派成員參政，不是以黨派的身份，而是非黨人士的身份，不然就擺不平。對妨礙穩定問題不能放縱，不然會出亂子。在我國，會比東歐更嚴重。

趙紫陽說，有人說中國有言論罪，是不是劃一個界限，違法與不違法，包括結社、出版。鄧小平說，控制局勢要注意方法。特別要抓緊立法，包括集會、結社、遊行、示威、新聞、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規。違法的就要取締。中國不能允許隨便示威遊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遊行，什麼事也不要幹了，外國資金也不會進來了。我們在這方面控制得嚴一點，不會影響外商來華投資，恰恰相反，外商會更放心。我們要讓國內外明白，加強控制是為了穩定，是為了更好地改革開放，進行現代化建設。【368】

鄧小平與趙紫陽這次談話，很快在中央政治局成員當中進行了傳達。

3 月 4 日上午，在中南海勤政殿，趙紫陽召集胡啟立、芮杏文、閻明復、鮑彤等人，討論了最近的政治形勢和民主政治建設問題。在討論中趙紫陽表明了他的態度，他說，對待現在有人搞的所謂簽名問題，已經簽了的不要管，以後要打招呼。要沉住氣，對民主問題要有個堅定的態度，不能按他們要求的搞。中國就是不怕壓。這個制度是我們向中國人民去負責，而不是方勵之。報道上不要登，人不放（指魏京生）。現在要打招呼，42 人寫信給中央，要增加教育經費，要從正面高姿態的把民主講清楚，不能迎合他們，不能怕輿論嘩然。簽名不在於事情本身，而在於為什麼簽，不是善意。和美國打交道要注意這

【368】鄧小平這段談話，後來經過整理之後，收入《鄧小平文選》第 3 卷，題目為〈中國不允許亂〉。

一點，不要理他們，我們的著眼點還是工人、農民。我們要堅定看到這一點，否則後果不堪設想，這種簽名的事情不要登報，中國沒有這個慣例。赦不赦免要看表現，魏京生在獄中表現不好。不是不讓你簽名，而是要對他們打個招呼。人大政協要有準備，不搞大赦。中國要搞民主問題，但是要把民主、改革引入正途，而不是歧途。知識分子生活問題是個大問題，王大珩每月 300 元都生活不下去，要想辦法。

趙紫陽說，現在有人說新權威主義，有些觀點是可以的，我們不搞強人政治，但要批判政治改革超前理論。要推動這個討論。這個新權威主義提倡的強人政治，有些觀點符合小平的說法。要好好研究一下新權威主義的根據，可以把這個根據拿來，說明政治體制改革不能超前。小平的思想是不能亂。我們要搞民主，但是不能孤軍深入，政治改革要為經濟改革服務。民主的進程不能停頓，要在十三大的基礎上解決民主的理論，民主和四化的關係，民主和四項原則的關係。我們是一個東方大國，民主化進程不能導致個人主義，導致個人主義，對社會發展很不利。

那麼中國民主搞什麼？趙紫陽自問自答地說，一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完善；二是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三是人民參與、公開、監督，四是以法治國，保障人們的民主權利，但也要限制濫用權利。結社、新聞自由這些問題，我們的看法現在和知識分子有矛盾，我們不能讓。閻明復建議說，紫陽是否在五四講一講中國民主的方向，現在知識分子擔心的，一是人事的突然變化；二是改革受挫；三是知識分子跟著幹倒霉。對簽名事件要淡化，要培養忠於共產黨的不同聲音，民主的旗幟，不能讓方勵之拿走。趙紫陽接著說，是否搞些小組寫些東西，講講中國改革的各個方面。在四中全會上要講這個問題，同時要抓緊立法。可以看出來，目前的民主化是個大浪潮，因此一開始就要有個態度。要有對付混亂的辦法。經濟問題，有人想不用經濟方法去解決，想引到政治上面去。我們要堅定，實事求是，給社會一個說法。

七、起草四中全會報告：中國不能亂，民主一定要搞

當時，按照黨章關於中央全會每年兩次的規定，十三屆四中全會已經在籌備之中。中央初步確定，會議在 4 月 17 日到 21 日召開。

在中央政改研究室傳達趙紫陽3月4日講話的會上，鮑彤說，四中全會主題是教育改革問題。但在四中全會紫陽的報告中要講一講政治形勢，我們要準備這篇講話。我們研究室要有相當一部分人投入這項工作，加上初級階段研究小組【369】和中辦調研室的同志。研究這個問題，全室都要投入。這個講話，要有相當的理論高度，相當實感的操作性，給人感到是深思熟慮的考慮，中共中央的主張是正確的。

3月初，在鮑彤的主持下，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報告起草組成立，由15人組成。其中中央政改研究室參加8人，陳群林、陳小魯、孫方明、唐欣、吳偉、王紹賢、沈榮華、白惠敏。中辦調研室陳進玉、李英堂、羅建平3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小組鄭必堅、龔育之、賈春峰3人，再加上鮑彤。

3月6日上午，中央政改研究室內部研究了四中全會講話的起草問題，鮑彤在會上說，我們的文章在開頭，可能要有一段講十年改革開放，要感謝社會各界對黨和政府的支持，為保持社會穩定做出的貢獻。要肯定我們的社會基本是穩定的，繼續發展還需要繼續穩定。穩定是今後發展的最基本的條件。不能對形勢估計過於嚴重。還要講一下政治體制改革的近期目標和民主的長遠目標。我們寫這個東西，要把紫陽最近講話的精神寫進去，黨的建設，突發事件，廉政和法制兩手抓，多黨合作，都要放在一定的位置來講，這些是黨內形成共識的基礎。

6日下午，起草組舉行第一次會議。鮑彤在會上說，到底從什麼角度能把紫陽最近時期的講話精神串起來呢？上午我們議論了一下，能否從穩定的角度，小平最關心的是穩定問題。如果在一些大的政治原則上，能夠統一黨內高層的認識，形成基調，那麼五四大會上的稿子也就出來了。

3月10日上午，四中全會文件起草組再次開會，討論和擬定報告提綱。鮑彤在傳達了3月3日鄧小平與趙紫陽的談話之後說，在改革這場大變動中，我們的社會還是基本穩定的。報告要說明穩定與發展、改革的關係，把兩方面都講透。從改革開放的發展講穩定，說明有穩定的環境，發展可以快一點，環境不好就可能要放慢步伐。

【369】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研究聯絡小組」，成立於中共十三大後，由鄭必堅、龔育之任召集人。參見本書第八章第三節。

會上，大家也都發了言。陳進玉說，穩定同改革開放的關係，妨礙穩定的因素，社會治安問題，方勵之等人的公開合法活動和不同政見，知識分子、工人、農民工的不滿情緒，都需要做一些分析。立法問題，針對穩定，立哪些法，也要提出一些基本主張。鄭必堅說，總命題還是要講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這是根本的東西。孫方明說，一要講穩定是改革和發展最基本的條件；二要講堅定不移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第三是講黨的穩定是根本因素；四是講黨對民主的基本態度。

3 月 14 日下午，起草組討論已經初步擬出來的提綱。鮑彤在會上講了大體的進度要求，他說，這個稿子應該在 4 月 6 號的常委會上通過一下，然後可能要開政治局會議。在這次討論中，大家都從各自的角度，對於稿子提綱提出了自己看法。此後，3 月 15 日、16 日、25 日、27 日、4 月 3 日，10 日，起草組又多次開會，反覆討論修改已經形成的稿子。

在 4 月 3 日、10 日的起草組會上，鮑彤都各有一大段談話，對起草組關於四中全會報告稿的基本思路做了概括，同時也可以說是間接表明了趙紫陽對當時國內政治形勢的基本態度。鮑彤說：

我們要給出兩個方面的信號，一是不全盤引進西方的制度，二是中國民主化進程不能停頓，要扎扎實實有保障的推進。兩方面都要講明確。總題目是在社會穩定前提下，積極穩妥推進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

這段時間來，中央常委的討論可以概括為幾條方針。第一，中國當前壓倒一切是要穩定。第二，中國不能全盤西化，不能拿西方的尺子觀察中國問題。第三，一定要在穩定和秩序的前提下推進民主政治建設。第四，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當前要圍繞在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以及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兩個問題上。老百姓的要求，一條是憂國憂民，要求把改革建設搞得更好一些，一條是從自身出發，要求權利得到保障，生活得更舒暢一些。第五，黨在維護穩定和推進民主的時候，要走在前面。要講明，我們對目前民主狀況並不滿足，人民的要求也正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憲法反映了我們的主張，有了憲法，還要有各種具體的法律配套。決策民主化，也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對整個政治形勢的分析，這個不能缺。分析形勢，根本是對改革的看法，左右兩方面的錯誤認識都是從改革引出來的。一種

認為改革錯了，企圖否定三中全會以來的根本路線政策，另一種是懷疑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這兩種極端互相助長。如果不改革，看不到社會主義優越性，就會主張西化。搞西化，就會使主張倒退的人有借口。至於中間狀態的人，對於二者關係搞不清楚，本能的依附於一家。所以一開始，對改革的評價就要講清楚。

中國的改革在世界上也是搞得不錯的，當然許多有問題，原因，一個是在改革中出現問題不可避免；二是改革中情況複雜，來不及認識；三是也有些失誤。問題在偉大的變革中是第二位的，要求沒有問題，就沒有改革本身。推進改革的力量當中有各種意見、爭論，這是正常的，不是問題。值得注意是，前面講的兩種傾向，如果聽任發展，會使我們要解決的問題複雜化，搞不好，容易成為社會動亂的因素，動亂勢必使改革停頓。我們不願意陷入爭論，要抓緊改革，解決問題。要認識到，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確的，問題也是可以解決的。討論要有助於改革從困難中走出來。

社會的體制改革必須和兩個東西配套，一是和法律配套，二是和幹部配套。不然政治體制改革就是空的。至於我們的民主怎麼搞，不能缺乏群眾基礎，也不能對群眾沒吸引力。有兩個東西要提出來。一個是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各種議論提出來是好事，運用這種力量來推動改革，治理整頓和建設。有參加政治改革的積極性，是好現象。要用決策的民主化，把這方面積極性引導過來，要從制度上得到保證。二是在法制軌道上實現和保障公民的權利。這也有吸引力，特別是對政治上要求高的知識分子層。

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要和群眾路線掛起來。過去是作為作風，工作方法去強調，現在應該加強程序化，這牽涉到人大的組織方式、議事規則、群眾團體的作用等等，需要用法律的手段規定下來。民主是個好東西，但在爭取民主過程中，各國都有教訓，搞得好，會成為穩定的力量，搞不好會成為破壞穩定的力量。穩定是為改革建設提供有利條件，看起來緩慢一些，但可能更順利一些。以少的代價換取大的發展。用一天，一個月的尺度來看，不會有大的變化，但長時間看，是前進的。中央決心把重點放到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方面來，放到保護公民的權利方面來，行政訴訟法的意義很重大。十億人都是改革的擁護者，參加者和受益者。議論紛紛，是動力而不是阻力。

要保障公民權利，防止侵犯公民權利，也要防止有人濫用權利。這不僅僅是口號和意願，也不是個認識不認識、給不給的問題，而是要取決於社會條件和法制建設的進程。我們追求的是更充實、更有保證的民主。我們今天的民主要用在協調人民內部矛盾上，這是一個主題。過去革命是破壞，現在是建設的過程。過去在五四的民主自由口號下我們破壞了舊制度，現在是在這個口號下，協調整合人民之間的關係。民主和自由是加強協調的手段，要達成和諧的目的。過去突出的是對抗鬥爭，現在突出的是妥協諒解。要講讓步，講理解，用民主的手段達成協調。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們的事業主題變了，由革命轉變為建設；主題變了，民主觀念、功能都要更新。要使黨內外都懂得，民主本質上是建設的主題，不是破壞的主題。利益調整，不同聲音，要靠民主來調整。過去靠民主的武器奪取政權，現在要靠民主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民主處理得好，就會成為穩定的力量，處理不好，就會產生動亂。我們的辦法是秩序的民主，法制的民主，有過程的民主。我們黨還沒有學會在和平執政條件下，用法律武器進行合法鬥爭。行政訴訟法，改變開始不能告官的局面，要抓緊時間立法配套，準備刑訴法實施。另一點，我們永遠不可能做到全面，但我們注意了全面，就可以減少很多問題。

陳群林插話：現在一講穩定就是沒有不同意見，就是輿論一律。這不對。一定要講穩定，但這種穩定不是輿論一律、鴉雀無聲的穩定，而應該是活躍的，健康的，能協調各種利益的穩定。高山插話：要直截了當的闡明我們中共現階段的民主觀，民主是我們的理想，也是現實的歷史過程。支持民主進程的，是社會基礎的切實的變化，現在已經出現了，但沒有規範化，法律化，由此才強調保障公民權利。

要鮮明地表明一個態度，黨應該成為穩定的力量和推進民主的力量，不能把積極因素看成是消極因素。黨要在維護穩定，民主方面帶頭做表率，認真建設黨內民主。在這樣的形勢下，黨組織要在穩定大局中起作用，對黨組織提出更高的要求。黨的紀律要搞好，不能搞自由主義。黨自身穩定了，社會穩定就有了保證，黨的民主搞好了，社會民主就有了希望。黨應該成為生動的，活潑的，積極的，健康的力量。

共產黨在改革中袖手旁觀是不行的。要善於吸引群眾，在對待違法活動時，要學會用法制的武器，在不涉及法律時，要善於做耐心的群眾工作。要沉著，不能轉移注意力，一心一意搞好現代化建設。要學會民主，通過發展黨內民主來發展社會民主。

波蘭總理拉科夫斯基【370】說過，當前是社會主義時期，政治和意識形態、社會都受到挑戰和危機，提供了變革動力，可以消除弊病，恢復活力。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有風險，但是值得。不然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就會被淘汰，這才是最值得擔憂的。這段話，值得我們思考。

為趙紫陽起草的這個在四中全會上的報告，稿子是寫出來了，但中央常委和政治局未及討論，形勢就發生了重大變化。趙紫陽、鮑彤們試圖用這個講話，再做一次穩定局勢的最後努力，但還是落空了。在共和國遭受了那場血的劫難之後的 6 月 23 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召開【371】。會上代表政治局作報告的總書記已經是另外一個人，他講的也完全是另外一個調子。趙紫陽在這個會上被戴上了「支持動亂，分裂黨」的帽子，他所主持的這次以推進民主為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也由此被劃上了休止符。

【370】拉科夫斯基，波蘭領導人，1988 年 6 月當選波共中央書記，不久後出任政府總理。1989 年卸任。

【371】中共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於 1989 年 6 月 23 日 -24 日在北京召開。這是中共「六四」鎮壓以後，以鞏固政權、將鎮壓「合法化」為目的而舉行的一次中央全會。會上李鵬作了《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全會撤消了趙紫陽的總書記、政治局常委、委員、中央委員和軍委第一副主席的職務，決定對趙紫陽的問題「繼續審查」；免去了胡啟立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免去了芮杏文、閻明復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

第十三章

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平息學潮[372]

暴風雨終於來了。而且是提前來的。

1989 年 4 月 15 日晨 7 時 53 分，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引發了原來估計要五四前後才可能爆發的一場巨大的社會動盪。首都各高校的學生們悼念胡耀邦，要求重新評價胡耀邦，開始走上街頭。李鵬等人利用趙紫陽訪朝之機，借鄧小平之口給學潮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發表了「4·26」社論，引發了學生們更大規模的抗議浪潮。學潮像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操縱著，一波三折，不斷被引向極端。對學生們提出的反對腐敗、要求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承認學生運動的正當性和合法性等問題，趙紫陽提出了通過協商對話，「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鮑彤和他的部下們對接受學生的合理要求，以及平息學潮、穩定局勢也提出了多方面的措施和方案。但是由於當時黨內高層局勢的複雜和保守勢力的干擾，特別是李鵬等人的極力阻撓、拖延，甚至破壞，這些主張和意見沒有可能實現。

一、不僅僅是為了悼念胡耀邦

4 月 15 日上午，我到 316 值班室去拿文件，見到秘書處長貝際波和其他幾個人正在議論什麼，見到我來以後，老貝悄聲對我說，聽剛才中辦秘書局來送文件的交通員講，耀邦同志今天早上去世了。聽到這話，我心裏往下一沉，預感到要發生什麼事。胡在 4 月 8 日政治局會上心臟病突發住院[373]，這我是知道的，但沒想到他的去世會來的得這麼快。我拿起文件，心情沉重的回到我的辦公室。

【372】本章與下一章〈作一次最後的鬥爭〉，是在筆者 1990 年寫的一段追記的基礎上改寫的，一些地方還參考了 1989 年 5 月 28 日以後筆者在秦城被「審查」期間所寫的「交代材料」。

【373】胡耀邦發病的具體經過，可參見鮑彤：〈我所目擊的胡耀邦發病經過〉，載《炎黃春秋》，2012 年第 8 期。

過了一會兒，我拿了幾份老鮑要看的文件，送進他的房間，一邊很難過地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他，老鮑也沉痛地對我說：「我知道了。」看來已有人通過電話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他。

我回房間後，室內有幾個同志先後來我這裏，議論起耀邦逝世的事，都流露出沉痛和擔心。老鮑和我們室的同事們對胡耀邦都是十分敬重的。他是深得黨內外廣大群眾愛戴的領導人之一。雖然去年年初他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堅決」的罪名而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但他卻因此在黨內外的聲望更高了。很多人，包括黨內的一些高級幹部都為他鳴不平。大家都敬重他的為人，更同情他的遭遇。當然，這其中的大部分人也是因對所謂「反自由化」不滿，而對耀邦因此遭到處理表示出一種逆反心理。室裏同事們在議論中都擔心，在當前這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況下，耀邦的逝世，在黨內，在知識界特別是在青年學生當中，可能產生重大影響，甚至可能引起某種突發事件。後來事情的發展，果真是如此。

耀邦逝世的消息在當天上午就不徑而走。從下午起，北京的一些高校就開始出現悼念胡耀邦、要求對他作出公正評價的大小字報和輓聯。4 月 15 日晚，中共中央關於胡耀邦逝世的訃告在中央電視台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聯播節目中播出；次日的《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評價胡耀邦是「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我軍傑出的政治工作者，長期擔任黨的重要領導職務的卓越領導人」，他的逝世，「是我黨和我國人民的巨大損失」。而對他去年因「自由化」問題被迫辭職一事隻字未提。我想，這大概是「為逝者諱」或是不想再揭這塊瘡疤引起人們憤慨，引發「不安定因素」的緣故吧。但是，越是這樣，人們會越是會不平。

16 日，天津、上海、西安、長沙、南京、合肥等地高校也開始出現大量大字報、花圈和輓聯。北京天安門廣場開始出現人們自發送的花圈和輓聯。此後，各高校的大字報越來越多，天安門廣場的花圈、輓聯也越來越多。17 日，北京和各地出現學生遊行。18 日，北大學生提出「正確評價胡耀邦的是非功過，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運動、允許報刊新聞自由、釋放政治犯、反對以言定罪」等九條要求。天安門廣場出現學生靜坐請願上書。19 日凌晨，發生所謂「學生

衝擊新華門」[374]的情況。此後，遊行、請願、「衝擊」等情況不斷，北京和各地開始出現自發學生組織，一些知名學者、作家也參加進來，人們所提的口號和政治要求，也已遠超出悼念胡耀邦的範圍，形勢越來越複雜。

各種消息不斷傳來，室裏的一些同事和我，已經感到事態可能會越來越複雜，在我們所處的環境下，行為應特別謹慎。因此在這期間，我很少外出，只和秘書長陳群林等幾個同事去天安門廣場實地看過一次。

在耀邦追悼會前的幾天裏，老鮑沒有召集室裏同事開過會。為紫陽準備的中央四中全會報告稿的修改工作也停頓了下來。我曾問過老鮑，這個稿子怎麼辦，他說，現在形勢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這個稿子已經不能用了。即使事情過去以後開四中全會，報告也要重新搞。他要我盡快做一下起草組的收尾工作。

那幾天中央的會議通知很多，常委會、宣傳小組會什麼的。老鮑顯得很忙，他作為政治局常委的政治秘書，幾乎每天都要開會或去紫陽那裏，還要為紫陽準備訪朝的有關材料。但他對外面的形勢仍十分關心，每天的新華社動態清樣等簡報都必看。

對於上面在處理學生問題上的意見，老鮑一點也不向我們透露。但是，我們從一直沒有領導人出面處理學潮，而又遲遲沒有中央對於學潮處理對策傳達下來這些情況來判斷，感到上面肯定是有不同意見。但具體如何，尚不瞭解。室裏同事對形勢都十分關心，經常在一起議論和交換瞭解到的情況。當時，我們作為中央研究、參謀機構的成員，作為共產黨員，都希望事情能夠盡快平穩解決，而不希望鬧大，出現 1987 年初導致耀邦下台那樣的局面。如果事情發展到那一步，改革開放事業就會受大的影響，紫陽的地位也會有危險。

耀邦追悼會前幾天，廣場上的學生提出要參加追悼會，表達他們對耀邦的哀思。在這種情況下，中央在治喪安排上卻做了一件讓人感到很不解的事。

【374】趙紫陽在回憶錄中說：「我曾調公安部錄相來看。所謂學生衝擊新華門事件，實際上在前面的學生一直在喊：要守紀律，不要犯錯誤！主要是後面圍觀的人非常多。學生在前面提要求啊，要求見什麼人啊，後面的人往前湧，往前推，秩序有點亂。後來學生自己組織了糾察隊，把學生和圍觀的人隔開了。」可見「衝擊」的說法言過其實。參見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24 頁。

18日上午，高山作為機關黨委委員，到中直工委開了一個會，回來召集全室的黨員作了傳達，說是中央決定，在20、21兩日準備搞10萬人的弔唁活動，給我室20人的名額。另外，22日召開耀邦追悼會，給4個人的名額，並對哪幾個人去進行了落實。但是，第二天機關黨委馬上又召集了一個黨員會，說上面通知，前一天的部署作廢，所謂10萬人的弔唁活動並無其事，是「治喪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傳錯了話」。會議室裏，大家一時議論紛紛，覺得這麼大一件事，不可能是傳錯了話，肯定是原來作了決定，後來高層的什麼人（極可能是哪位政治老人）講了話，只好改變，但又不好明講，只好把事情推到工作人員身上。大家就此事問老鮑，老鮑只是向大家解釋，確實是工作人員傳錯話了，10萬人弔唁不符合慣例和應有的規格，中央不可能作出這種決定。我想，老鮑這種解釋不能令人信服，當然他要保密也可以理解。但是，不管怎樣，原來的那個決定已經傳達下去，現在又變了，這個情況如果傳到學生中間，可能會造成情緒激化，使事態擴大，事情可就更難處理了。

在追悼會前的這幾天，新華社、《人民日報》等新聞單位的內參大量的報道了各大專院校的學生動態，大部分是比較客觀的。但是，也有少數部門和新聞單位的內參，專門集中反映少數學生的極端口號和極端行為。其中《北京日報》、國家教委的內參最有代表性。這不能不讓人十分擔心。

應當說，當時參加學潮的學生和其他人中，大多數人只不過是心中有怨氣，想藉機發洩一下。他們還是真心希望黨和國家變得更好。真正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人不是沒有，但是極少數。我想這種估計還是不會錯的。但是，如果專門把這種極少數人的口號挑出來，以偏概全，把它當作事情的主流，反映在專門發送給為數極少的最高層領導人看的內參上，就會使一些領導人，特別是那些七老八十、觀念陳舊、平日很少瞭解外界的政治老人們產生一種片面的印象，以為事態已經極為嚴重，從而作出錯誤的政治判斷和決策。特別是在目前高層內部爭鬥十分複雜的情況下，這種片面反映當前形勢的內參，更會給那些保守的強硬派人物要求鎮壓和進攻改革派提供口實。以後事情的發展，證明我們的擔心是有道理的。

4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了前一天晚上「學生衝擊新華門事件」。據陳群林的記錄，下午下班前，鮑彤向中央政改研究室副局以上幹部傳達了趙紫陽對於學潮情況的分析。趙認為，多數人是真誠悼念耀邦同志逝世；部分人是對總的形勢不滿意；一些人是轉移主題；個別人在幕後活動。如果悼念中出現打砸搶燒沖，一定要堅決處理和打擊。

就在這次會上，李鵬提出了一個「學生悼念胡耀邦，中央怎麼辦」的問題，趙紫陽說：「中央治喪，學生悼念，我們不能不允許。不能說我們治喪，不讓學生悼念，這沒有道理。」【375】李鵬對事態表示了他的意見。他提出，少數學生是被壞人操縱的，他們的矛頭是對準黨和政府的，是對著老同志的。趙紫陽則表示不相信會有這麼多的學生被壞人操縱，認為在當前情況下，應當以疏導為主，通過對話解決問題，不能激化矛盾。

10多年後，李鵬拋出了一本《關鍵時刻——李鵬日記》【376】(以下簡稱《李鵬六四日記》)，他在書中對4月20日這次會上的討論作了如下說明：「趙在常委會上再次提出處理學生鬧事的方針是：『只要不高打砸搶，就不採取行動。』我針鋒相對地指出，學生悼念耀邦活動的性質正在發生變化，目前大多數學生尚處於中間狀態，但有可能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黨中央要旗幟鮮明地指出問題的真相，把學生、工農和廣大群眾爭取到黨的一面來。很遺憾，我的意見沒有為趙紫陽所重視和採納。這是我和趙紫陽在處理學潮的方針上第三次意見分歧，而且是在常委的正式會議上。」【377】這段話表明，李鵬對學潮上綱上線，意圖激化矛盾的態度，在耀邦追悼會之前就已經產生了。

正當外面學生要求公正評價胡耀邦是非功過的呼聲越來越高的時候，4月20日上午和21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兩次討論了胡耀邦的悼詞和生平。

【375】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5頁。

【376】據說此書先是少量印了一部分，在黨內高層徵求意見，並準備在2004年上半年出版，後因黨內高層有人堅決反對而作罷。2011年，香港新世紀出版社準備公開出版此書，但中共高層以未經作者授權為由，對出版社施加壓力，再次阻止了該書出版，但也反證該書作者確為李鵬本人。其時該書的電子版已在網上大量流傳。

【377】《李鵬六四日記》2004年徵求意見版，第16頁。

前幾天，胡耀邦逝世的訃告發表以後，黨內外許多人對評價中沒有說胡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極為不滿，要求在悼詞中加上。鮑彤後來回憶說，當時中央曾經專門開過一次座談會，徵求黨內對耀邦悼詞的意見。據說于光遠等人在會上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們還專門為此給趙紫陽和中央寫了一封信。

胡耀邦生前曾長期擔任黨的總書記職務，並在 1978 年他擔任中央黨校副校長期間，主持修改並在本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上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著名文章，從而發起了真理標準大討論，對黨在理論上和思想路線上的撥亂反正有重大貢獻。按黨內慣例，稱之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胡耀邦是當之無愧的。但在之前發佈的訃告和中央討論後的悼詞中恰恰沒有這句話，十分耐人尋味。

是誰不同意給胡耀邦以「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這樣的評價？李鵬後來在其日記中明確告訴人們，是鄧小平。《李鵬六四日記》對 4 月 21 日中央常委會的記載說：「中央的悼詞對耀邦同志的一生給予很高的評價，但是根據小平同志意見，沒有給予耀邦同志『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稱號。」【378】據說是 20 日上午中央常委討論耀邦悼詞後，悼詞稿送鄧小平審閱。鄧小平聽說有人要求在胡耀邦悼詞中加上這樣的評價，說了一句話：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誰都不夠格，我也不夠格！鄧小平的這句話，反映了兩年前主張搞掉胡耀邦的政治老人們一種共同的心理，他們不想對兩年前搞掉胡耀邦認錯，更不贊成或是反對為胡做出高度的評價，他們對胡在總書記任上時「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所作所為，至今仍在耿耿於懷。

當時主持一線工作的趙紫陽自然不可能直接違背鄧小平和政治老人們的意旨，特別是鄧小平還發了話。但是，面對黨內外要求給胡以「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評價的壓力，趙紫陽和常委們又不得不加以考慮。所以政治局常委會只好搞了個折衷，在定稿中仍然堅持悼詞原稿中那一段蓋棺論定的評語，但又在第二段的具體評價中，加上了「胡耀邦同志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他的一生是光輝的」這樣的評價。這種改動應當說是煞費苦心的，一方面想以此緩和黨內外的壓力，表示承認胡是馬克思主義者，另一方面，又不加「偉大的」這樣的副詞，以

【378】《李鵬六四日記》2004 年徵求意見版，第 18 頁。

不致引起鄧小平和黨內一些保守人物的直接反對。這種做法，或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持黨內共識。

作為總書記的趙紫陽，在處理這個問題上，應當說會感到很棘手的。就其內心說，他會同意給胡耀邦以「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這樣的評價，但是，如果他這樣正式表態，就會直接觸怒鄧小平，授人以柄，給那些企圖倒趙的人提供口實。這無論是對於他本人的地位，還是繼續取得鄧的支持，以處理當前的事態，都是不利的。所以，他大概只好拍板採取折衷的辦法。

但是，趙紫陽這樣做，肯定不會讓鄧小平高興。學生們為耀邦鳴不平，是因為他們對兩年前鄧小平和老人們搞掉耀邦不滿。趙紫陽允許學生悼念耀邦，再加上悼詞中加上了「馬克思主義者」這樣的評價，等於趙站到了學生們一邊，來反對鄧小平和老人們。雖然趙的理由合情合理，但卻不能不讓鄧惱怒。鮑彤後來說：鄧小平雖然在這個時候表面上還是支持趙紫陽的，但他已經對趙有很多不滿了。不滿的原因，一個是紫陽同意查康華公司的事情【379】，另一個，就是紫陽不顧鄧的反對，在耀邦的悼詞中加上了「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他的一生是光輝的」這句話。當然，「倒趙風」中李先念、王震等人在鄧耳邊說的那些話，也不能不對他產生影響。後來紫陽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特別是紫陽反對調軍隊戒嚴，使鄧下了拿下趙紫陽的最後決心。

關於悼詞的爭議，還有一段中央與耀邦家屬協商的過程值得引述在這裏。據歷史學家章立凡【380】記述：4 月「21 日的任務特別重（明天將舉行追悼大會），我一早便趕到胡家。9 時 10 分，中央派人來與家屬商量悼詞的最後修訂稿，子女們在飯廳內與中辦寫作班子裏的鄭必堅等人再三磋商，很長時間相持不下。我則迴避到其他房間，安排分送追悼會的請柬、車證，以及當晚移靈及次日追悼大會的攝影事宜。

【379】康華公司，是 1984 年 9 月成立的由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主辦的公司，目的是為殘疾人事業提供資金支持。鄧樸方任公司董事長，俞正聲任總經理。1988 年 3 月「大康華」即中國康華發展總公司由國務院批准設立，董事長唐克，總經理韓伯平。公司與基金會脫勾，每年只上繳部分利潤，以減輕國家對殘疾人事業的負擔。董事長唐克，總經理韓伯平。由於康華公司發展很快，經營和內部管理上出了一些問題，引起了社會上的許多不滿和傳言，攻其為「官倒」。1988 年 9 月，國務院宣佈對流動領域的公司進行清理整頓和審計。在懲治「官倒」的一片呼聲裏，中國康華發展總公司在當時著名的五大公司中首當其衝。對審查康華問題，趙紫陽事先徵求了鄧小平的意見，鄧表示同意。

【380】章立凡，歷史學家，我國著名民主人士章乃器之子，胡家的友人。

家屬與寫作班子的磋商一直拖到近中午，其間習仲勳還到胡家來了一次。最後家屬仍未讓步，只是表明態度，聽任中央決定。據我所知，徵求意見的修訂稿，與趙紫陽在追悼大會上念的悼詞，仍有一些差別。」【381】後來筆者瞭解到，耀邦的家屬不肯讓步的意見，主要是希望中央在悼詞中對 1989 年耀邦被迫辭職的問題給予公正的說法。這個希望在當時情況下，顯然是無法達到的。

4 月 22 日上午 10 時，有 4,000 多人參加的胡耀邦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追悼會由楊尚昆主持，趙紫陽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鄧小平出席了追悼會並向胡耀邦的夫人李昭表示深切慰問。中央其他高層領導幾乎全部出席。老鮑作為中央委員，當然也去參加。我們室也給了 4 個名額，陳曉魯、黃海等去參加了。

從前一天晚上起，北京 40 餘所高校的兩萬多名學生就已趕在軍警清場戒嚴之前，強行進駐了天安門廣場，要求參加耀邦追悼會和瞻仰遺容。迫於壓力，中央同意他們在追悼會開會時，在大會堂東門外廣場上收聽大會實況。

11 時，追悼會和向遺體告別結束後，佔據廣場的學生湧向大會堂東門，要求同李鵬對話，並有三名學生手舉「請願書」，長時間跪在東門台階下，求見李鵬。在場的許多人都為之而感動。在等候一個多小時，李鵬也沒有出面的情況下，13 時許，學生們帶著對李鵬、對政府的強烈不滿離去。回校後，一部分學生以「哭跪請願，政府不理」這件事為由，貼出大字報，要求進一步罷課。

政府發言人袁木後來曾解釋說，是有人製造了「李鵬要接見學生」的謠言。現在回過頭來看，即使真的有人造謠，如果當時李鵬能以大局為重，出來見一見學生，接過請願書的話，事情也可能是另一個樣子，至少不能給學生以大鬧的借口，在追悼會後事情還是可能有轉機的。但很可惜，李鵬沒有這樣做。

對他為什麼不出來見學生，《李鵬六四日記》中有兩個說法。在 4 月 23 日的日記中，他說是因為他此時已經回到中南海辦公室了。這個說法顯然是托詞，因為在 5 月 2 日的日記中他還有另一個說法：「我之所以不出來見學生，是因為我分析了當前形勢，認為出來見學生，弊大於利。想當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國家雖已大亂，但毛主席的威

【381】章立凡：《胡耀邦治喪手記》，《炎黃春秋》2012 年第 6 期，第 4 頁。

信真比天高，可謂一呼百應，周總理是代表毛主席向群眾講話，所以才有作用。如今中央內部意見就不一致，我講話，講什麼，代表誰。如今，趙紫陽是黨的總書記，一把手，對這樣重大的問題，理應由他出來見學生，代表中央說話。我已識破，學生拱我出來亮相，醉翁之意不在酒，實際上是想把我推到第一線，當靶子來打，從而在全國挑起更大的事端。」【382】這個說法倒是一不小心，暴露了他的真實想法：遇事不是從黨的利益出發，而是從對「我」是否有利出發。說中央內部意見不一致，你李鵬不是中央總書記，這都是事實。但縱然在工作上與趙紫陽有不同意見，你李鵬起碼還是中央常委，這個國家的總理！學生當時並不瞭解中央內部的分歧，要李鵬出來接見，根本不可能有要把他「當靶子來打」的意思，而恰恰就是因為他是總理。在這種關鍵時刻，堂堂國家總理卻打起了個人的小算盤，怕被「推到第一線，當靶子來打」，其黨性何在？責任心何在？

二、鄧小平為學潮定性

自 4 月 15 日耀邦逝世以後，老鮑出於他在政治風雲中的經驗和一慣的謹慎，多次向室裏的同志打招呼，說中央沒有交給我們室研究處理學潮問題的任務，請大家不要隨便對外發議論，更不要參與社會上的議論和活動。這是紀律。我們大家也都深知這其中的利害。特別是我這個位置，可能更會被外人所注意，一言一行都可能被人抓住把柄，從而給老鮑乃至紫陽帶來麻煩。因此，我十分謹慎。室裏的同志也都自覺的遵守紀律，絕少參予社會上的活動。

在私下裏議論起形勢時，我們都覺得需盡快平息事態，而且要盡可能採取和緩的方式，因為參加學潮的絕大多數學生和群眾的動機是好的，是想推動改革，決不能傷害他們的積極性。但目前的事態如果繼續擴大，很可能產生與他們的願望相違的結果，也許不但不能推動改革，反而會動搖黨內改革派的地位，造成改革形勢的逆轉。

別有用心的人到底有沒有？當然有。這種人在鬧學潮的人中有，在處理學潮的人中也不是沒有。學潮起來之後，在北京市委李錫銘、陳希同和國家教委何東昌等人的指使下，北京市委和國家教委的有關

【382】《李鵬六四日記》2004 年徵求意見版，第 54 頁。

部門就開始收集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和階級鬥爭激化」的材料，準備向中央彙報。

北京市委和國家教委採取這種態度並不奇怪。這其中的原因，除了由於他們一貫保守的政治傾向以外，還因為事情發生在北京，發生在高校，北京市委和國家教委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處理這個問題，他們又必須首當其衝。在他們摸不準中央到底是什麼態度的情況下，「左」總比右好。為了瞭解上面意圖，他們急於向中央彙報，以要求中央表態；為了推卸他們對事件發生和發展所負有的重大責任，他們又需要在彙報中把事態說得嚴重些，把事態的性質說得嚴重些，並將其上綱上線，說成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嚴重影響，說成是「有人要推翻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而不是他們的工作沒有作好的結果，他們沒有多大責任。在這種心理狀態支配下，耀邦追悼會之前，李錫銘、陳希同、何東昌等人就多次要求向中央彙報，因那時中央常委忙於籌備追悼會等，沒有聽取。

不立即聽取北京市委和國家教委的彙報，這大概也是趙紫陽有意的。因為紫陽會估計到，他們急於彙報，一方面是想摸中央的底（當然，作為下級，這也無可厚非），另方面是想推卸責任。他們的彙報，必然把事態及其性質說得很嚴重，逼趙和其他中央常委表態。這個態對趙紫陽說來，是很難表的，因為無論如何表態，將來都可能成為搞他下台的口實。當時在中央常委內部，雖然有分歧，但表現出來的並不是很大，但李鵬和其身後的幾位元老級人物是早已下了倒趙的決心的。聽取北京市委彙報彙報後，不管最後趙如何表態，總是有人要抓他的小辮子。如果趙主張持強硬態度，那麼出了問題責任全是你的，而且，事後你可能成為平息群眾怨氣的替罪羔羊；如果趙表態主張軟處理，那麼，這個表態就將成為趙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支持學潮的證據，有朝一日跟你算總帳。

也許正是估計到這樣一種結果，趙採取了避而不聽北京市委和國家教委彙報的態度。4 月 22 日耀邦追悼會後，北京市委和國家教委再次提出要求彙報，趙沒有接受。李鵬也要求中央開常委會，討論對學潮的方針，實際上也是逼趙對學潮性質問題表態。《李鵬六四日記》中記載說：

追悼會結束後，我從大會堂上車時，碰到趙紫陽同志。我對趙紫陽同志講，你很快就要出訪朝鮮了，應該再開一次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中央對學潮的方針。趙紫陽說，常委都議過了，不必再開會了。他又說，對學潮的方針，一條是追悼會後恢復社會正常秩序；一條是黨和政府與學生開展對話；一條是誰搞打砸搶，就依法處置。我針對當前學潮中已發生的幾個原則問題要求紫陽同志有個明確表態。我說有些學生要求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呢，他說這不能答應。我又說，對正在成立的非法學生組織呢，他說那也不能承認。我試圖再次說服他召開常委會，他已不願再聽我講什麼，匆匆上車離去。【383】

這時，高層曾有人建議趙推遲訪朝，趙沒有同意，理由是朝鮮之行是早已確定的，推遲成行會給國際上造成中國國內政局不穩定的印象，於我國際形象不利。胡耀邦追悼會後，中央政改研究室一次開會時，有幾位同事也談到了這個問題。陳小魯、孫方明都建議，在目前情況下，紫陽還是不要去朝鮮，認為國內這個時候比較關鍵。趙完全可以找一個理由，跟朝鮮那邊把情況講清楚。後來老鮑談了紫陽的意見，說總體來看，耀邦追悼會辦完以後，國內大的局面應該趨於平靜了，這個時候趙如果不去朝鮮，容易引起國際一些猜測，認為還是應該去。

紫陽在耀邦追悼會前的4月19日，曾經去見過一次鄧小平，和小平商量了的訪朝問題，不知道堅持去朝鮮是不是小平的意見。但在這個時候他一走，則是把處理事態的主動權交給了李鵬，使其有可能操縱中央常委會作出與趙的主張相左的決議，造成既成事實，使他回來後陷入被動。所以，這一著棋也許不是好棋。

4月23日下午，趙紫陽動身出訪朝鮮。這是他擔任總書記之後的首次出訪，也是他的最後一次出訪。李鵬、喬石、田紀雲等前往車站送行。在車站，李鵬再次問紫陽對當前學潮應如何處理，趙紫陽表示，此事已向小平作過彙報【384】，還是那三條意見。

【383】《李鵬六四日記》2004年徵求意見版，第20頁。

【384】趙紫陽回憶錄中說，「4月19日，我就訪朝的事情去過鄧那裏，也向鄧談了學潮的情況和如何處理的意見，鄧當時都表示支持。」參見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7頁。

趙紫陽在訪朝前和李鵬講的這三條意見，當時李鵬和各位中央常委都是接受的。《李鵬六四日記》中4月23日記述說：「我和喬石同志商量，以趙紫陽剛走時說的三條原則為內容，發一篇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並由中央向各地發一電報通知」【385】。這個通知，很快形成了文字4月24日即以中央電報形式通知了各地和各部門【386】。趙紫陽回憶錄中記述：「事後聽說，李鵬把這三條意見報告了鄧，鄧也同意。」【387】

由此看來，趙紫陽走後，代他主持工日常工作的李鵬是要拉開架式，認真貫徹趙紫陽的三條意見了。豈知，紫陽前腳剛走，主持大局之權到手的李鵬一夥就變了嘴臉，他們立刻把經全體常委都表示同意，並經鄧小平認可的趙紫陽三條意見拋到一邊，按照自己的打算行動起來。連趙紫陽後來都說，「事情奇怪的很」，在趙「離開北京的當天晚上，北京市委的李錫銘、陳希同就找萬里，要求召開中央常委會議聽取他們的彙報。萬里就上了他們的當」【388】。萬里不是中央常委，北京市的李、陳找萬里「要求召開中央常委會議」，事情確實很奇怪。萬里便把他們的要求轉告了李鵬。

次日，即24日下午4點，北京市委召開常委會分析形勢，認為目前學生鬧事的這種態勢，出現並不是偶然的，是長期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氾濫，地下組織、非法組織猖狂活動，黨內黨外、國內國外敵對勢力勾結髮展的結果。會議做出四條決定，要求中央必須旗幟鮮明的對當前事態表態；中央應授權北京市委、市政府放手發動群眾，組織反擊。

當晚8時，李鵬主持召開了「關鍵的一次」【389】政治局常委碰頭會，據《李鵬六四日記》記載，中央常委喬石、胡啟立、姚依林出席，不是政治局常委的楊尚昆、萬里，書記處書記芮杏文、閻明復、溫家寶，政治局委員田紀雲、李錫銘、宋平、丁關根等均列席參加。但是李鵬卻特意囑咐中辦，不讓通知按規定從來都列席常委會的中央常委

【385】《李鵬六四日記》2004年徵求意見版，第24頁。

【386】據吳國光引證的資料，此電報被稱為「中央、國務院4月24日特急電」，編號為「中發電（1989）4號」。參見吳國光為香港新世紀出版社未及出版的《李鵬六四日記》一書所寫的導言：〈政治權力、憲章制度與歷史悲劇〉。

【387】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6頁。

【388】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7頁。

【389】《李鵬六四日記》2004年徵求意見版，第26頁。

政治秘書鮑彤到會。會上，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作了一篇早已準備好的大講形勢如何嚴竣的彙報。這個彙報認為，學生已經被少數壞人操縱，矛頭是對著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是對著小平等老同志的。同時提出了北京市委的四條要求。

這個彙報對李鵬等人說來是正中下懷，而且趙紫陽又恰好不在，時機也好。在李鵬主持下，「會議同意」北京市、市政府對當前態勢的分析和四點建議，認為，「當前局勢嚴峻。首先在北京繼而波及到全國的學潮，實際上背後有人操縱，煽動鬧事，這是一場有組織有計劃的旨在打倒共產黨的政治鬥爭。中央必須旗幟鮮明地採取得力措施，加以制止。方針是首先穩住北京，進而穩住全國。」【390】會議決定成立由喬石、胡啟立、李鐵映【391】組成的「中央制止動亂小組」，同時授權北京市委、市政府放手發動群眾，力爭盡快平息動亂，穩定局勢。趙紫陽在回憶錄中認為，「24 日的常委會上把學潮定性為『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並形成了會議紀要。李鵬、李錫銘、陳希同是始作俑者。」【392】

25 日上午 10 時，李鵬、楊尚昆到鄧小平那裏，把昨天政治局常委會議的情況向鄧小平作了彙報。彙報中極力強調形勢的嚴重性，強調學潮的矛頭是對著老同志，特別是對著小平同志的，強調它的性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聽了彙報之後，鄧認為事情很嚴重，就立即表態「完全贊成和支持」昨晚中央常委碰頭會的決定，並發表了措辭嚴厲的講話，認為目前發生的不是一般的學潮，而是一場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動亂。「這場動亂，有後台，有黑手」，「是有計劃的陰謀活動」【393】。

趙紫陽後來曾經對鄧之所以發表 4·25 講話有過一番分析，他說：「有人利用學生的過激言論來激化矛盾，把黨和政府推到和學生尖銳對立的地位。經過改革開放，學生批評領導人本來算不了什麼事，發洩一下而已，並不意味著這些人要推翻我們的制度。但是把學生批評鄧的話集中起來說給鄧聽，對老人是極大的刺激。這些人還把學生中少

【390】《李鵬六四日記》2004 年徵求意見版，第 28 頁。

【391】李鐵映（1936-）：湖南長沙人。1987-1993 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1988-1993 年任國務委員兼國家教育委員會主任。

【392】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28 頁。

【393】參見《鄧小平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 年 7 月版，第 1272-1273 頁。

量的、零星的、分散的過激言論說成是學潮的主流，說鬥爭矛頭指向鄧。由於鄧多年形成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維方式，所以一聽到李鵬的彙報就發表了那樣的講話。這恐怕是主要原因。」【394】

鄧小平的講話，正是李鵬等人急於得到的盾牌。他們要借鄧的嘴，說出他們想說的話，一方面可以為自己撐腰，另一方面可以用來堵趙紫陽的嘴，讓他無話可說，還有一個用處，就是萬一追究起責任來，可以此作為自己的擋箭牌，可謂一箭三雕，機關算盡。

25 日上午向鄧彙報之後，下午 3 時，李鵬立即再次召開常委碰頭會，傳達鄧小平的講話。並決定，立即向下傳達鄧小平的講話。首先在三大系統，即中央、國務院和北京市副部級以上幹部中傳達，內容包括鄧小平當天談話的記錄稿和 4 月 24 日晚常委會紀要。

《李鵬六四日記》中，記載了他們在整理鄧小平講話過程中，刪去了一些「敏感問題」和講話傳達的情況。書中說：「傍晚，溫家寶同志給我來電話，請示鄧小平講話中有些敏感問題是否先不傳達。為了縮小打擊面，爭取一切可以團結的同志，我當即表示同意。我同時授權給溫家寶同志，中央辦公廳整理鄧的那篇談話稿時，你們認為哪些問題敏感，就先不往下傳達。由於避免了爭論，就爭取了時間，兩個傳達稿很快發出了。按照常委會的分工，中央系統是由喬石，國務院系統是由田紀雲，北京市系統是由李錫銘同志分別傳達的。三大系統的傳達都在 25 日晚間進行完畢。北京市因為身處第一線，在傳達時還主動擴大到區縣局級幹部。為了落實小平同志要給吳祖光、于光遠、蘇紹智、胡績偉這些人打個招呼的指示，則由閻明復同志去辦。這次常委碰頭會還寫了紀要，趙紫陽的秘書鮑彤也參加了今天的會議。由我簽發，把 24 日常委會紀要和小平同志講話記錄稿密傳到平壤，送給正在朝鮮訪問的趙紫陽同志。」【395】

趙紫陽是 25 日夜裏收到電報的。他對鄧小平講話的前因後果並不瞭解，由於條件限制也不好作其它表示，另外也出於對鄧的一慣尊重，即回電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對付當前動亂問題所作出的決策。」趙紫陽後來對他之所以這樣表態解釋說：「這些文件發給我，我就必須表態，也不能表示不同意見，因為我在國外不瞭解國內的情

【394】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30 頁。
【395】《李鵬六四日記》2004 年徵求意見版，第 32-33 頁。

況。但我沒有對常委紀要表態。看了鄧的講話，當時我腦子裏馬上的一個反應就是又一場反對自由化的運動要來了。我倒沒有想學潮平息不了，因為我並不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擔心的是十三大以來的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的勢頭受到損害，因為鄧認為，學潮的原因是長期反自由化不力。」【396】

但是，趙紫陽當時不知道的是，在發電給他的同時，鄧小平的講話已經在北京的三大系統傳達完畢，並已電傳給各地，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將鄧的講話傳逐級達到全體黨員，動作之迅速幾乎是創紀錄的。這一作法，用心十分險惡，這就等於告訴全黨，給動亂定性的，不是我李鵬，而是鄧小平。在後來 5 月 16 日，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作了那番關於鄧小平在中共黨內是最後決策人的講話以後，有人指責趙紫陽有意將動亂的矛頭引向鄧小平。現在看來，如果說有人有意將動亂的矛頭引向鄧小平的話，那麼第一個不是趙紫陽，而是李鵬。對此，鄧小平心知肚明，而且也是不滿的。後來 5 月 17 日在鄧家開的那次決定戒嚴的常委會上，鄧小平對李鵬說：這次不要像上次那樣搞了，不要把我決定戒嚴的事捅出去。李鵬連連說：不會！不會！

按照 4 月 25 日鄧的講話精神，李鵬等人立即組織起草了一篇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於 25 日晚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播出，並於次日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這就是所謂的 4•26 社論。社論認為，當前的這場學潮，「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當日，北京和上海分別召開黨員幹部萬人大會，號召全體黨員、幹部投入這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本書前面對 4 月 23 日趙紫陽赴朝之後到 4•26 社論發表的三天裏，中央高層發生的這一系列事情的敘述，所依據的是筆者當時所瞭解的情況和後來海外出版的趙紫陽回憶錄等材料，這是目前史學界較為一致的說法。但是，近來也有研究者對這段史實的真實性提出了明確質疑。

不久前，鮑彤曾經對筆者說：「前段時間我曾經看過《鄧小平年譜（下卷）》關於 1989 年 4 月 25 日鄧小平聽取李鵬、楊尚昆彙報後，給

【396】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30-31 頁。

學潮定性那段談話的記載，該頁下面的一條對『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的註釋引起了我的注意。註釋中說：4 月 24 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碰頭會，給學潮定性為『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並『決定成立中央制止動亂小組』，我覺得有點不太對勁。按照《李鵬六四日記》和官方的說法，鄧小平表態是在 4 月 25 日上午。而 4 月 24 日晚，這個時候鄧小平還沒有發話，李鵬怎麼會有這麼大的膽子，敢召開常委會議改變總書記前一天離京時留下的，並經常委和鄧小平同意的三條意見，直接給學潮定性？而且得到了與會者的一致支持？只有一個解釋才合乎邏輯：一定是有比趙紫陽更權威的人發了話。前不久，《李鵬六四日記》曝光之後，看到該書 4 月 23 日有一個記載：晚 8 時半，尚昆同志『鼓勵我去找小平。我要他同去，他同意』【397】。那麼當天晚上或第二天（24 日），李和楊到底去了沒有？書中沒有下文，更加重了我的疑惑：到底常委碰頭會定性在先，還是鄧小平定性在先？書中到底有沒有掩蓋什麼？這裏有重大疑點。後來我把我的想法對吳國光講了，說，這裏面有問題，需要研究一下。」

按照鮑彤的啟示，筆者的朋友，多年來一直從事政治學、中國現代史研究的吳國光教授仔細分析了《李鵬六四日記》提供的材料和疑點，並考證了新華社記者張萬舒的《歷史的大爆炸》、《人民日報》副總編輯陸超祺的《六四內部日記》中所作的記載，對於這段在 1989 年學潮中有關鍵意義的時間裏，中央高層所發生的事情，明確提出了一個令人震撼的觀點，他認為：「我們有理由懷疑，李鵬（以及所有官方敘述）在這裏隱瞞了一個重要事實」，那就是：鄧小平給學潮定性的表態不是發生在 4 月 25 日上午，而是在「1989 年 4 月 23 日晚上，鄧小平有密令直接或間接地傳遞給李鵬；正是這個密令，認定學生運動為『旨在推翻共產黨的反革命動亂』【398】，並確定了一系列的強硬應對方針。」他認為，正是因為如此，才有可能解釋在 4 月 25 日鄧小平表態之前被趙紫陽認為「事情奇怪得很」的幾個問題：第一，為什麼趙紫陽赴朝出發後本來準備貫徹趙的三點意見的李鵬，在不到一天的時間裏就轉變了態度；第二，為什麼原來支持趙紫陽處理學潮方針的態

【397】參見《李鵬六四日記》2004 年徵求意見版，第 22 頁。

【398】參見吳國光為香港新世紀出版社未及出版的《李鵬六四日記》一書所寫的導言：〈政治權力、憲章制度與歷史悲劇〉。

度萬里會「上當」,「主動表示願意找北京市領導同志做工作」[399]?第三，為什麼同樣支持趙的方針的胡啟立也很快轉變了立場，積極地主持起草 4·26 社論？第四，為什麼在 4 月 24 日晚「常委碰頭會」上，本來對於學潮問題與趙紫陽持有相同或相近觀點的芮杏文、閻明復、田紀雲等也改變了看法，並且所有與會者的「意見空前一致」[400]?第五，為什麼在 4 月 24 日夜裏和 25 日上午，鄧小平還沒有表態之前，傳達鄧小平談話精神的 4·26 社論就已經在起草，而且已經確定當晚發表、次日見報？[401]第六，如果不是 24 日晚「常委碰頭會」之前李鵬已經得到鄧小平的明確指示，他為什麼這麼有把握，鄧小平一定贊成政治局常委會的所有決定？為什麼李鵬不稍等幾個小時，在 25 日上午他見了鄧小平之後，再來發動所有這些行動？

吳國光認為,「把所有上述信息集合起來，可以得到一個結論：4 月 23 日晚上，而不是等到 4 月 25 日上午，已經有超乎李鵬的政治權威，針對學潮做成了重要決定，確認學潮為『反革命動亂』，並要求當時主持政治局常委工作的李鵬立即採取強硬方針。我認為，這一政治權威，只能來自鄧小平。」至於 4 月 25 日上午鄧小平「是不是還有一場談話，或者是官方記錄和李鵬回憶移花接木地把實際發生在 4 月 23 日晚上的事情說成發生在 4 月 25 日上午，我們目前沒有辦法知道。」那麼，為什麼鄧小平、李鵬等人，和官方要做這個手腳，隱瞞 4 月 23 日晚間他們的活動？吳國光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很簡單：這是為了掩蓋這次鎮壓學生運動的決策不合乎中共的合法程序這一真相。」[402]

為了搞清這段歷史的迷團，筆者在 2012 年 10 月本書寫作期間，訪問了當年列席中央常委會議的原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統戰部長閻明復先生，並當場查閱了他在那段時間的工作筆記。從當時閻先生親筆所作的會議記錄上看，4 月 24 日晚、25 日下午，確實在李鵬的主持下召開了兩次會議，而且會議的內容與目前官方披露的材料、趙紫陽的回憶、李鵬的日記中的記載是一致的，閻明復也均列席了這兩次會

【399】《李鵬六四日記》2004 年徵求意見版，第 27 頁。

【400】《李鵬六四日記》2004 年徵求意見版，第 26 頁。

【401】參見張萬舒：《歷史的大爆炸》，天地出版公司 2009 年 5 月版，第 57、58 頁；陸超祺：《六四內部日記》，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 年 1 月版，第 32 頁。

【402】吳國光：為香港新世紀出版社未及出版的《李鵬六四日記》一書所寫的導言：〈政治權力、憲章制度與歷史悲劇〉。

議。筆者認為，可以確認，閻明復先生的會議記錄是真實、可靠的；但鮑彤、吳國光的前述置疑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根據。在有關文件沒有公開的情況下，目前直接對此事作出最後結論為時尚早，還需有進一步的資料佐證。限於此，本書前面的敘述中沒有直接採用鮑彤、吳國光的觀點，只是在此作一簡要的介紹。

三、鮑彤主持起草「4・29社論」

4月25日下午5點左右，鮑彤即根據他下午參加中央常委會的記錄，向中央政改研究室全體研究人員傳達了上午鄧小平上午的談話精神【403】。次日上午，在聽取中直工委的傳達後，秘書長陳群林又向全室黨員傳達了24日晚「政治局常委碰頭會」紀要、中辦整理下發的「鄧小平同志重要講話」文字稿，和北京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李志堅對「動亂情況」的介紹，及胡啟立、溫家寶的有關講話。這兩次傳達，我都沒有參加。因為當時我不在北京。

紫陽訪朝後，我覺得老鮑這裏暫時事情不很多，除開會外，只是在組織一些同志修改胡繩等人起草的紫陽的紀念五四青年節講話，我正好藉機請假回老家長春處理一些私事。

25日晚，我正在59次列車上。20點，車上的廣播開始播送中央台的「新聞和各地報紙摘要」節目。當我聽到廣播員用聲討的語調廣播那篇「4・26社論」時，其措辭之嚴厲，和為動亂所定的嚴重性質，使我吃了一驚，這時我還不知道鄧已講了話，但我已意識到，事情恐怕不會那麼輕易了結了。追悼會後，一些學生原本就不想善罷干休，前面有5・4，還準備大鬧一場，現在社論又等於火上澆油，再一次激化矛盾，肯定會引起學生的強烈憤怒和反彈，從而致使行動升級，發生更大規模的抗議示威。我想，從目前情況來看，把社會上出現的事態稱之為「動亂」，從它對社會秩序造成的影響角度說，尚說得過去，但把它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恐怕是失之偏頗，說它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更是證據不足。退一萬步說，即使這樣講不錯，也可以作為內部掌握，內部傳達，完全沒有必要作為社論公開發

【403】縱觀本書，讀者可以看出，無論是在先前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還是在後來的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幾乎每一次中央常委會、政治局的會議情況，列席會議的鮑彤都要根據他的記錄向全體研究人員進行傳達，已經形成慣例。這是中央政改辦和研究室工作的需要。後來六四之後的清查清理時，上面曾有人說這是「洩密」，後來卻不了了之。

表。公開發表就等於要故意擴大事態。現在擴大事態，對誰有利呢？1986年底的學潮鬧掉了一個胡耀邦，現在是不是該輪到趙紫陽了？！

4月27日上午8時以後，北京38所高校的學生3萬餘人開始了組織嚴密的大規模遊行。當時我正在長春的吉林省委，是省委的同志告訴了我小平講話的情況。我當即往室裏打了一個長途電話，綜合局副局長何家成接的。他告訴我，北京的學生正在舉行遊行，規模很大。要我盡早回京。

這次遊行，學生的組織紀律性很強，並打出了更多的表示自己行動行質的口號，如「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憲法」、「擁護四項基本原則」、「消除腐敗，打倒官倒」、「堅持改革開放」、「真誠對話」、「反對動亂」等，以證明自己行為的目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更不是搞動亂。遊行隊伍沿著首都的主要街道行進，造成數十萬群眾圍觀，使北京的市內交通嚴重堵塞。北京市當局調派了大批武裝警察，沿途設卡，力圖堵截，都被學生衝破。

後來我瞭解到，在27日當天和次日，老鮑曾兩次召集室裏人員，議論學生遊行的情況。一些同事認為，發生在措辭嚴厲的4·26社論發表第二天的這次學生遊行，實際上也是對政府態度的一次試探。事前，很多學生都認為會受到當局的嚴厲鎮壓，甚至可能發生流血事件，一些學生甚至還寫下了遺書。但出乎意料的是，當軍警試圖堵截不成之後，便放棄了這種企圖，採取了克制態度，學生和軍警之間沒有發生衝突。北京市政府發言人說，這次遊行未經批准，違反了北京市關於遊行的十條規定。但室裏的一些同志認為，既然已經表示了4·26社論這樣強硬的態度，就應按照社論和遊行十條所說的那樣，對非法遊行給予堅決取締。像這樣一方面說遊行違法，另一方面又不堅決執法，只能讓那些想把事情鬧大的人認為政府不過是在嚇唬學生，不敢真來硬的，從而使法律和政府喪失它應有的權威，以致事態進一步擴大。

果然，次日，北京的一些高校裏就出現了許多「歡呼4·27遊行勝利」的大字報，認為是「衝破了禁令」，要求「同志仍須努力」，一些學校的學生在商討下一步的行動。

4月28日晚，我在長春從廣播裏收聽了《人民日報》將於次日發表的又一篇社論：〈維護大局，維護穩定〉。這篇社論措辭不像4·

26社論那樣嚴厲，而是通篇說理，強調穩定的重要性，指出無視穩定這個大局，「只能給民族和國家帶來災難」。我覺得這篇社論寫的還不錯，讓人能聽進去。

次日，我從長春返回北京，直接回到廠橋的辦公室。一進門，就有人告訴我，今天的《人民日報》社論是李鵬要我們室起草的。我當時感到很奇怪，李鵬從來沒有和我們中央政改研究室打過什麼交道，這回怎麼想起我們來了。後來經瞭解，才知道事情的經過。

26日下午，也許是聽到了學生的強烈反應和對次日可能發生大規模示威遊行的預期，李鵬要他的秘書打電話給鮑彤，說李鵬同志請鮑彤同志盡快組織人為《人民日報》寫一篇評論員文章，主題是要穩定不要動亂。當時老鮑找到秘書長陳群林，並找來了陳小魯、唐欣等人，向大家談了李鵬的意見，進行了討論。大家分析情況後認為，儘管我們不贊成4•26社論的提法，但在這個時候，不寫於大局不利。不過，得按我們的看法來寫。

接著，鮑彤對如何寫這篇文章，談了6點意見。據參加會的陳群林的記錄，鮑彤說，「動亂和民主是背道而馳的。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只能在法制的軌道上循序漸進。文革中大串連，大動亂，城市交通癱瘓，發生的後果是由全國人民承擔的。一切有理智、負責任的中國人，包括青年學生都應當認識到這一點。」

當晚該文就由陳群林執筆起草，次日老鮑又作了修改。文章以「維護大局，維護穩定」為題，從文革動亂十年的教訓中，引出穩定大局的必要性，意在疏導學生。27日下午，鮑彤將此文稿送給了李鵬。李看後將文稿批給了胡啟立，批示說：寫得不錯，可發《人民日報》社論。28日，李鵬再次主持召開中央常委會，這次會他通知了鮑彤參加。會上，李鵬當面對鮑彤說，老鮑，那個稿子寫得不錯。聽到這些情況，我想，李鵬身邊也有不少筆桿子，這個社論卻讓我們室來寫，大概是對我們室，特別是對老鮑的一次試探和考察。

同事們還告訴我，這幾天，老鮑已組織大家重新修改完紫陽的五四講話稿，現已打印送常委討論。當時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

研究室主任的蕭榕【404】還特地打過電話給老鮑，希望在這個講話中加上鄧小平愛護青年的內容。

據瞭解，趙紫陽得知鄧小平的4·25講話被傳達全黨全國，《人民日報》還發了社論的情況，已經是在4月29日他從朝鮮回北京的列車上了。據隨他訪朝的秘書李樹橋回憶說：「回程的列車到了丹東，全樹仁、李長春、劉精松【405】上了火車，和紫陽在那裏談話，我就在旁邊聽著。趙紫陽首先跟他們說，關於這次學潮小平同志有個談話。全樹仁說，我們都知道。紫陽很驚訝，問你們怎麼知道的？回答說是已經傳達，社論在大喇叭裏面都廣播了。紫陽問，廣播了以後什麼反映啊？回答說都在罵。紫陽問，都罵一些什麼話？哎呀，他說那可是很難聽了，什麼不該死了死了，該死的沒有死。那些話確實非常難聽。」這時，趙才感到很驚訝，感到社會反彈得很厲害。

四、陷阱

在我回到北京的當天，4月29日，還發生了另一件事情，就是李鵬派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北京市委秘書長袁立本等同首都高校學生的對話。

這是政府允諾同學生對話後，第一次付諸行動，可以說是經過精心準備和安排的。在對話的對象上，為了表示對「非法學生組織」一概不承認的態度，並沒有理睬各高校新產生的學生組織的對話要求，而是由官方學生組織全國學聯和北京市學聯組織，由北京16所高校學生會選派的代表，而且對話中提哪些問題都事先進行了安排。中央電視台實況轉播了這次對話。我估計，出於對時局的關心，北京市的大部分市民都收看了這次轉播，至於全國有多少人收看，那就更加難以計數了。

在這次影響如此廣泛的對話中，被精心安排了這樣一個戲劇性的場面。當談到黨內的腐敗現象時，北京建工學院的一個學生提出，「中央要求過幾年緊日子，領導幹部應與廣大群眾同甘共苦，但為什麼有的領導卻一個星期攜夫人打一次高爾夫球？」並說：「據說打一次高爾夫球要幾百美元。」接著，出現在電視畫面上的該學生拿出一本雜誌，

【404】即鄧小平的小女兒鄧榕，又名蕭榕，小名毛毛，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主任。

【405】此時這三人分別任遼寧省委書記、遼寧省省長、瀋陽軍區司令員。

攝像機用特寫映出了雜誌封二上的一張照片，內容是趙紫陽頭戴遮陽帽，手揮高爾夫球桿正在擊球。畫面使每個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它用形象的語言告訴電視機前的觀眾，趙是一個如此耗費民脂民膏的腐敗人物。對這樣一個涉及黨的主要領導人形象的關鍵性問題，作為黨中央和國務院對話代表的袁木，竟然沒有作絲毫的解釋工作，反而只是說：「我不知道這個情況。我可以轉達你的意見。」輕輕一帶而過，然後就轉入其它話題。這次對話的錄相，後來又數次重播。

對話剛播完，我們機關裏立即一片嘩然。大家對袁木及其背後所代表的那些人物，一致表示十分憤慨。大家根據各種跡象判斷，這件事出現在屏幕上，決非偶然，而是為了破壞趙紫陽形象，製造群眾對紫陽不滿的一次「有計劃有預謀」的行動。我立即到老鮑辦公室，把大家的看法向老鮑作了彙報。老鮑也剛剛看完電視，正在沉思。我對他講了我們大家的看法，他點了點頭，說，你們可以注意聽一下各方面的反映。

後來，老鮑曾向我們講過趙打高爾夫球的一些情況。事情是這樣的，北京郊區新建的高爾夫球場，是中外合資的企業。球場建成以後，經營者按照國際慣例，聘請包括趙在內的許多黨政領導和社會名流擔任其俱樂部的名譽會員。按照規定，名譽會員可以享受免費打球並免費供應飲料的待遇。趙近年來年紀大了，跑步鍛煉已很困難，就經常在中南海自己住的院子裏揮幾下高爾夫球桿，偶爾閒暇了，也去郊區球場打打球，但都是自備飲料，並且也不是每週一次。

上述情況，我想過去一向對趙紫陽跟得很緊的袁木也不會不瞭解，他在對話中卻採取迴避態度，這很可能是有意的。但是，策劃這一陰謀的，不會是袁本人，他還沒有這麼大的膽子，一定是來自更高層次的人物。其目的，是使趙紫陽成為群眾印象中的黨內最大的腐敗分子，降低他的影響，並為在不久的將來把趙搞下台製造輿論。這個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達到了。在此之前，鬧事的群眾對中央高層內部的分歧並不瞭解，許多人在提出反腐敗的時候，是對高層領導一塊罵的，反對的所謂黨內腐敗人物的順序是鄧、李、趙。但在此後，趙就成了黨內最大的腐敗人物，社會上「趙紫陽的兒子倒彩電」等傳言不徑而走，越傳越多，越傳越離譜。

4月30日上午，趙紫陽結束對朝鮮的訪問，乘專列回到北京。李鵬、喬石、田紀雲等到北京站迎接。後來我才聽說，趙一下車，李鵬就設計使他落入了一個圈套，陷入被動之中。

事情是這樣的，趙下車後，就問李，學潮情況怎麼樣，李即對他說，群眾意見很大，傳說你的兒子是最大的官倒，什麼倒彩電的事，傳言很多。趙聽到此話，很是氣憤，就說，那好麼，那就組織專門調查，查清楚。

當日下午4點，李鵬去向趙紫陽彙報。關於社會上對趙的兒子「倒彩電」的傳聞，趙紫陽表態說，「如果組織決定要他的孩子退出商業公司，他個人服從組織決定，但他沒法去說服自己的孩子。他請求中央派調查組對他的孩子的問題立案調查。」【406】

當晚，趙就給中央政治局寫了一封信，要求成立一個調查組，調查他兒子的問題，如果確有違法，依法處理，如無問題，也可澄清事實。他並要求把這封信印發至省、軍級。在次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趙紫陽正式將此信報常委和政治局，提出請政治局責成中紀委、監察部專門組織調查組，對所謂他的孩子「倒彩電」問題進行調查。

趙紫陽致常委和政治局的這封信，是鮑彤代趙紫陽起草的。當老鮑在一次小範圍的會上向我們談到此事，並傳達了信的內容時，有幾個同事隨即提出，這樣處理此事似有不妥。此類傳說，特別是關係到高層領導人子女特權問題的傳說，是一下子難以查得清的。在目前群眾對高層的腐敗問題情緒激憤的情況下，即使你查清沒有此事，也無處解釋，更無人相信。相反，只要你組織人查的情況一傳出去，不是真的也變成真的了。而且，現在高層幹部子弟中，經商者為數不少，屁股上乾淨的大概為數不多。趙提出查自己的兒子，那麼別人怎麼辦？查不查？這樣勢必引起高層中有子女經商者的不滿，甚至招至眾怒，給自己帶來被動。果然，李鵬在幾天後的一次中央常委會上議論這個問題時，就說趙紫陽這是在「向老同志示威」。

現在回想起來，趙從朝鮮回來時，只要採取措施得當，還是可以奪回主動權的，形勢對他並非特別不利。陳小魯、唐欣、李湘魯等瞭解內情的人後來提出這樣一種看法，即趙一回到北京，就應立即採取

【406】《李鵬六四日記》2004年徵求意見版，第48頁。

主動，先發制人，追究李鵬在小平講話和 4·26 社論發表之後，沒有堅決貫徹小平指示，對 4 月 27 日學生遊行沒有採取果斷行動，喪失制止事態擴大有利時機的責任，責問其：(1) 你們既然不想鎮壓，為什麼要向下傳達小平 4·25 講話和發 4·26 社論，以至造成激化矛盾，使事態升級，破壞小平同志威信的後果？ (2) 既然是你們先給學潮定的性，向小平彙報後老人家才講的話，那麼向下傳達時為什麼不先傳達你們自己的話，反而只傳達小平講話，使小平處在第一線，造成鬧事群眾對小平的強烈不滿情緒？在追究李的責任的同時，必須向小平彙報此事，並闡明自己對當前事態的處理意見，以取得小平的支持。這樣就會把李逼到主張軟處理方面去，並且陷於被動，至少令其輕易不敢再輕舉妄動，而紫陽則可以處於主動地位，在這時再提出軟處理，李將不得不支持。以後如果軟處理成功，是趙的成績；如不成功，首要的責任則是李鵬的。

但是很遺憾，事情的演變並非如此。趙紫陽從朝鮮回來之後，不但沒有去抓李的小辮子，反而落入了李的圈套，被李鵬等人將問題引到查自己兒子經商問題上。正是由此開始，趙紫陽逐步陷入被動之中。當然，現在來提這個問題，不過是「馬後炮」了。

在後來 5 月 16 日由中央政改研究室召開的法學家座談會上，有人談到了高層領導人中的腐敗現象問題，以及袁木在和學生對話時有人提到趙紫陽打高爾夫球的事。這時老鮑插了一段話，他說，現在的傳言甚多，什麼「鄧小平的兒子搞募捐，趙紫陽的兒子倒彩電」等等。我在這個範圍內把我所瞭解的情況介紹一下。

他說，鄧小平同志的兒子鄧樸方是個非常好的、品德高尚的同志。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株連迫害受傷，下肢完全癱瘓，只能坐輪椅。後來他立志從事殘疾人事業，搞了「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要求財政部給予資助，財政部有困難，國務院同意基金會發行彩票，但還不能完全解決資金問題，就又決定同意搞一個康華公司，每年向基金會交 500 萬元利潤，但並不受基金會領導。在經營方面由總經理負責，由每筆經營的負責人負責，和鄧樸方完全扯不上關係。不能說其中某一個環節、某一個人出了問題就是鄧樸方的責任。基金會和康華就是這麼個關係，樸方本人沒有在康華公司擔任什麼職務。這是個非常高尚的事業。現在社會上傳說什麼康華、基金會、鄧樸方之間有

不正常的關係，錢落在樸方個人腰包，這完全是謠傳。我可以對自己的話負完全責任。

至於「趙紫陽的兒子倒彩電」，鮑彤說，這也是子虛烏有。傳說中的綿陽顯像管廠、西安黃河電視機廠都沒有。說趙紫陽去陝西電視機廠為兒子搞彩電也是謠傳。我可以負責任地在這裏闢謠。實際上，趙對孩子要求很嚴格，對傳說中的問題，他已正式寫出報告，要求中央有關部門對他的兒子進行調查，如有違法、違紀問題，依法律、政紀處理。過去紫陽同志對社會上的傳言沒有在意，後來感到不是他個人的問題，而可能影響到黨的形象。對這件事的調查，有利於澄清事實。

對於「趙紫陽的兒子倒彩電」問題，我在 1989 年以後曾向許多知情人，包括趙紫陽的幾位秘書瞭解過情況，大家一致認為是有人故意在向趙紫陽身上潑污水。前幾年，我看到了《李鵬六四日記》關於此事的幾處記載，他在 1989 年 6 月 7 日、9 日的日記中說：「上午，呂培儉同志報告，經他親自核查，趙二軍在海南確實搞官倒，利用關係拿到批件，從南韓購買 1,600 多輛小汽車，從中謀取暴利。」「晚上，我聽取尉健行部長到廣東查案的彙報。已查明趙的長子和佛山無線電公司勾結，共同倒賣彩電獲利 1,600 萬元。批件是趙紫陽親自批的，再由進口辦辦理，發放了許可證的，尉健行還向我展示了趙紫陽的原批文。」【407】對這些說法，我認為均不可採信。從 1989 年到現在已經 20 多年，這些年裏，李鵬一夥為了搞垮搞臭趙紫陽不遺餘力。如果他們手中掌握了趙紫陽就是最大「官倒」的證據，恐怕早就迫不及待地公之於眾了。可時至今日，也未見有證據面世。六四以後由王任重主持的「趙紫陽專案組」向十三屆四中全會提出了趙紫陽的三十條罪狀，沒有一條涉及到其子女「搞腐敗」的問題。

為了搞清李鵬書中指控趙紫陽兩個兒子搞「官倒」的問題，2011 年，蔡文彬【408】先生也特地訪問了鮑彤、李樹橋、原光明日報記者李欲曉等知情人，及當事人趙二軍等。後來他在《趙紫陽的道路》一書

【407】《李鵬六四日記》2004 年徵求意見版，第 220-221、229 頁。

【408】蔡文彬，(1942-)，河南許昌人。1963 年考入成都電訊工程學院，1966 年參加文革，曾任四川省學生造反派組織「紅衛兵成都部隊」主要負責人。1968 年起任四川省革委會副主任，後兼任共青團四川省委書記。文革後經趙紫陽提議，任四川省革委會委員，邛崍縣委副書記。1984 年調任四川省體改委、省政府經濟研究中心任研究員。1989 年辭職，創辦民辦高校「四川天一學院」，和民營企業「成都天一集團」。2011 年主編出版《趙紫陽在四川》一書。

中，以《駁李鵬：關於趙大軍、趙二軍「倒彩電、倒汽車」真相》[409]為題，專文以確鑿的證據，對此事做了澄清。他的結論是：趙紫陽的兩個兒子，當時所在企業均為小型國企。這兩件事情，前者是捕風捉影，後者是張冠李戴，與趙的兩個兒子都沒有任何關係，他們也沒有從中拿一分錢。

鮑彤後來說：

> 當年尉健行、呂培儉及他們掌管的國家監察部、審計署派了幾十人下去，確實按照李鵬的指示進行了調查，據說連出差的車票都一張張查了，發現事出有因，趙紫陽曾經批過兩個文件。但詳細查下來，發現都是正常的工作批示，絲毫扯不上腐敗問題，與趙的子女也全無關係。後來聽說專案組對主持調查的兩個人都進行了調查，看他們與趙有沒有個人關係，是不是包庇。折騰了一年，什麼也沒查到，最後只好作罷。明明已有結論的事情，2003 年李鵬寫的《六四日記》仍然堅持「有證據」的說法，純屬混淆視聽，惡意陷害，挾嫌報復。

李鵬在他的《六四日記》4 月 30 日的記載中，還編造了一個故事，也有必要加以澄清。他說：

> 後來得知，趙紫陽從北京站回到家後，鮑彤立即就到他那裏，送上趙在「五・四」青年節的講話稿。鮑彤還按照趙臨行前的佈置，密切掌握學潮情況，還找一批所謂趙的「智囊」、「精英」研究形勢。他們對趙的政治前途有危機感，認為趙紫陽一是經濟上沒有搞好，二是政治上也不行，三是沒有自己的幹部，四是孩子搞「官倒」，形象也不好。因此，很可能成為這次學潮的「替罪羊」。他們建議趙紫陽要與鄧小平保持距離，爭取民心，才能保全自己，捨此別無選擇。以後紫陽的實際行動就是按這些「智囊」計策去做的。[410]

據我所知，這段話，前面說的鮑彤送五四講話稿的情況屬實，但後面講的事情則純屬捏造。那段時間我作為鮑彤的秘書，一直在他身邊工作，從來沒有參加或是聽說鮑彤找人如此研究形勢，說趙紫陽「經濟上沒有搞好，二是政治上也不行」，提出「趙紫陽要與鄧小平保

【409】〈駁李鵬：關於趙大軍、趙二軍「倒彩電、倒汽車」真相〉，作者：蔡文彬，載《趙紫陽的道路》一書，2011 年 6 月香港晨鐘書局第一版，第 143-150 頁。

【410】《李鵬六四日記》2004 年徵求意見版，第 48 頁。

持距離，爭取民心，才能保全自己，捨此別無選擇」這樣的建議。而且，在看到李鵬的這個說法以後，我也曾專門就此問過鮑彤，老鮑一笑置之，說，「純屬無稽之談。那段時間我都找誰談過什麼，咱們室都研究過什麼，是不是提出過這種意見，你還能不知道？」

五、「八字真言」

在趙紫陽訪朝歸來後，一回到中南海家中，就看到鮑彤已經等在那裏了。紫陽立即聽取了鮑彤關於當時形勢看法的彙報。鮑彤在後來秦城監獄所寫的「交代材料」中提到了這件事情，他說：

> 4月30日紫陽同志從朝鮮回北京。他剛到家，我就向他反映：27日學生上街，擋不住，市民圍觀的很多，機關幹部中也有同情的，事態有升級和擴大之勢，相當一部分中間學生群眾對26日社論有反感，認為是針對他們的。我講了我對社論的看法：社論的積極意義在於傳達小平同志關於中國一定要穩定，一定不能搞動亂的思想；但社論寫得太生硬，沒有充分說理，缺乏分析，沒有考慮到中間群眾的接受程度；既然這麼多的人都以為社論是針對他們的，可見社論沒有講清楚。紫陽同志當時沒有表態，過了若干天，他對我說，看來社論是有缺點。紫陽同志的觀點當然有他的形成過程，但最早向他反映的是我。【411】

在這段時間，我們室的研究人員們通過私下裏的議論和交換意見，對當前態勢形成了基本一致的看法，認為就目前形勢看，繼續採取強硬的方式恐怕只能使矛盾進一步激化，很難解決問題，除非你動用軍隊，但這樣的局面代價太大，是誰也不想看到的。我們當然更不會作此想。那麼就只有來軟的，因勢利導，把問題的解決引導到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去。老鮑是同意大家的意見的。

5月1日下午，趙紫陽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對當前學潮問題進行了討論，但爭議很大，沒有作出一致的決定。會上，他並沒有提出追究李鵬4·27沒有按已作出的決定對學生遊行採取措施的問題，相反，他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講話，同意24日政治局常委碰頭會議紀要，前一段對學潮的處理也是好的。趙紫陽的這個表態，後來被李鵬、陳希同等人用作攻擊趙紫陽「出爾反爾」的口實。現在看

【411】鮑彤：〈六四密件——在學潮和動亂期間言行的交代〉，載香港《信報》，2003年4月21日。

來，紫陽在此次會上表示擁護小平講話精神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對在他出國期間李鵬等人的工作表示肯定，似實在大可不必，而且應當抓住這個機會，立即提出追究李鵬責任的問題，以換取政治上的主動。遺憾的是，這個機會，紫陽沒有抓住。

趙紫陽在他的回憶錄中，對他在這次常委會上的態度有一個解釋，他說：「在 5 月 1 日的常委碰頭會上，雖然我一回國就聽到各方面對 4・26 社論的強烈反映，但因剛剛回國，畢竟情況瞭解不多，同時也避免彎子轉得太陡，因此我不能不一般地對我出國期間李鵬主持的工作表示了一些肯定。但我著重指出，關鍵是爭取大多數，一定要把大多數人和極少數人區分開，不要把大多數人放到對立面，不要使大多數人感到受壓抑。不管原因何在，必須冷靜地承認一個嚴峻的事實，那就是廣大人民，尤其是學生、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同我們的認識即 4・26 社論的調子，有很遠的距離。所以我指出要廣泛對話，既對學生，也對老師、工人聽取意見。對學生關心的定性問題，我當時強調要按照 4・29 社論的口徑作新的解釋。『反黨反社會主義』搞動亂的只是極少數人，我希望這樣實際上就把 4・26 社論的調子降下來。另外我還指出，要抓復課這個旗幟，因為這也是家長、教師、社會上多數人的要求。同時，只要復課了，情緒就冷靜了，局勢就穩定了，其他問題也就好解決了。」【412】

趙紫陽回來的第二天是五一勞動節，1、2 日兩天黨政各機關放假，但北京各高校的事態仍在發展。學生向全國人大、國務院、中共中央遞交了一份最後通牒式的「請願書」，要求同最高層對話。上海、西安、重慶等城市事態也在逐步擴大。

5 月 3 日上午，趙紫陽來到萬里家，就當前局勢問題，同萬里做了一次長談。這次談話，後來被萬里夫人邊濤【413】形容為「他們兩個人到北京以後最開誠佈公、最推心置腹的一次談話」。趙紫陽是這樣回憶這次談話的，他說：「在萬里出國前，我到萬里家和他長談了一次，談得比較好。我主要向他講了學生的事怎麼看。我說，現在開放搞了這麼多年了，外面什麼東西學生都有印象。學生們覺得什麼話都可以

【412】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35-36 頁。

【413】邊濤（1920-2003），萬里夫人，1939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83 年退休前任北京市郵政局黨委常委、副局長兼政治部主任。

說。老一代人的思維方式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學生說我們不好就認為是要顛覆我們。這樣，本來不是對抗性的就搞成對抗性了。有的人把學生的話收集起來，往這兒送，往那兒送。往鄧那裏送，說矛頭指向鄧了，把鄧激怒了。我說這事沒有什麼了不起。採取對話疏導的方式可以緩和下來。我說時代變了，思維方式也要變，不能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維方式來看待學生的言論。否則就不理解青年，把問題看得太嚴重。萬同意我的看法，說：『對呀，李瑞環給我打電話，說我們太軟了，主張中央要堅決一些。李瑞環不對呀！』他也認為，開放時代的青年思想變了，我們還是老思維方式不行。一聽到不同意見就說反黨，不是那麼回事。我們的看法比較一致。」【414】

李樹橋後來回憶說，趙、萬兩個人談話結束時，趙說了一句話：「今天聽了你說的這番話，我心裏算是托底了。」這句話表明，趙在這時已經完全想清楚了，也下了決心，必須把 4·26 社論的調子降下來，對學潮「軟處理」。趙紫陽認為：「問題的關鍵在鄧身上。當時我想，只要他能夠稍微鬆一下口，譬如說這麼一句話，『4 月 25 日聽李鵬彙報，看來當時把情況看得重了一些，遊行也沒有出什麼了不起的問題嘛！』他能有這麼一句話，我就可以把局勢轉變過來，也不會把責任搞到鄧的頭上。我和政治局常委可以把責任擔起來。如果鄧一點不改口，那我也就沒辦法讓李鵬、姚依林這兩個死硬派分子改變態度。而他們不改變態度，常委就難以貫徹疏導、對話的方針。」趙紫陽這樣想，無疑是有道理的，但他也許沒有想到，如果鄧小平改口，將置李鵬於何地？李鵬擔心趙紫陽「轉彎子」，更擔心的是鄧小平「轉彎子」！

5 月 3 日，趙紫陽在中南海住所與時任中共駐香港工委書記的許家屯【415】談了兩個多小時，全面地談了他「轉彎子」的想法，許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作了記載。應該說，這段記載較為全面地反映了趙紫陽當時的想法，現照錄如下：

五月三日，趙紫陽在中南海住宅內，與我談了近兩個小時。他一開始就問我對這次學生運動的看法。我講：「這是愛國的運

【414】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附錄：「三訪趙紫陽」，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修訂版，第 546 頁。

【415】許家屯（1916-）：江蘇如皋人。曾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1989 年「六四」事件後，不滿中共武力鎮壓，出走美國。

動，是支持共產黨改革的運動；有些人是期望改革能更進一步發展，有些人是擔心改革會停止，甚至倒退」。

我告訴趙紫陽，我五月二日到北京後，接觸了一些人，瞭解北京的情況，支持學生運動的人很廣泛，包括廣大的黨政機關幹部。社會上最積極支持學生的人有兩種，一是個體戶，一是企業經過改革後的主管人員，這些人在改革中獲得利益，擔心政策改變，走回頭路。

我講：「這次學生運動，可以看出有水平，口號相當策略，提擁護共產黨，擁護鄧小平，一方面表達出多數人確是如此之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有人在幫他們出主意，我估計可能是大學和研究機構的一些年輕教師、研究人員，不排除某些外國勢力，以及香港某些反共勢力的介入、參與，但運動的主導是好的」。

我表示，《人民日報》四月廿六日社論，稱學生運動為「動亂」，激化了矛盾，我認為這是極為不智的。我聽說北京市的廣大幹部和市民都很震驚，多數人表示不同意社論的看法，罵鄧小平；也有人講，等選擇又上了李鵬、陳希同、李錫銘的當。據說李錫銘、陳希同在中央政治局討論時報告說，學生要暴動。陳希同甚至講，給他五萬軍隊，可以馬上鎮壓下去。看來鄧小平聽信了他們。

我提出：「還是應該疏導、分化，不能鎮壓，應該爭取學生的絕大多數，把極少數反共、搞破壞的人孤立起來」。

我還提出：「我們（中國共產黨）不能再犯錯誤了。文化大革命，把毛澤東搞垮了，出現了『三信』危機。這幾年靠了小平同志。現在不能把小平同志又搞垮了」。

趙紫陽聽後，表示：「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他特別強調：「我們一定要維護小平同志的威信。我願意出面承擔責任。我們要向小平同志說明真相，改變對運動的定性」。

趙紫陽說：「事實上，《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我也有責任，我在平壤，中央將社論草稿發給了我，徵求我意見，我表示同意了的。我不要常委負責，我願意公開由個人承擔」。

他又說：「學生們要求廉政，反對貪污，懲治『官倒』，反對特權，這些都是我們黨提出的，現在學生和群眾支持，是好事嘛。我們要通過對話，對於群眾提的要求，接受合理的部分。我準備向常委建議，採取一些具體措施，來制止、杜絕這些弊端」。

趙紫陽講了一些他的具體考慮，如反特權，首先要從中央做起，從中央常委做起，先取消給中央常委的「特供」(指給予中央副總理以上幹部廉價食品和生活用品的制度)，歲數大的老人，可以考慮緩一步。改革常委外出的專機、專列（專用火車)、警衛制度，幾位老人可以保留，新的常委要考慮輕車簡從。

對高幹子弟搞特權的做法，趙講：「我準備寫一封信，向中央表示，先調查我的子女，如有問題，就接受國法處理；如有涉及我本人，一樣」。他還表示，要建議召開人大常委會來討論、制定反貪污、反官倒、反特權的措施。

我們還討論了其他一些問題，如：關於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的問題，我建議，長遠來說，要考慮金融改革，目前是否可以先提高銀行利息，提倡儲蓄，多吸收社會游資。

我們還議論到「學自聯」和「工自聯」的問題，即在傳統的工會、學生團體之外，現在有了學生、工人的自發組織，應如何看待？趙紫陽表示，我們不要怕這些自發組織，可以讓他們活動，參加選舉。只要我們的群眾組織能代表群眾利益，不要擔心有人競爭。

趙講，現在主要的問題，一是爭取小平同志能同意改變對學生運動的定性，二是要徵求常委們的意見，改變決議。趙紫陽說：「請你幫助一下，你和尚昆比較談得來，請你把我們今天談的意見，特別是把外界的反應和你的看法告訴他，徵求他的意見。如果他同意，再請他去小平同志那裏，爭取小平同志改變對運動的定性」。

趙紫陽表示，他準備自己找李鵬談。他估計在常委裏面，喬石、胡啟立會同意，主要問題在李鵬、姚依林。

我義不容辭，接受了趙紫陽的委託。[416]

趙紫陽知道，鄧小平歷來在學潮這樣問題上的態度比較強硬，加上聽了李鵬先入為主的彙報，要他改變是很難的。趙急於約鄧直接談一次，面陳他的想法。可鄧小平那裏傳來的話卻是：鄧最近身體很不好，現在什麼事都不要報給他，以免分心。趙又請閻明復、楊尚昆等把他的想法轉告鄧。趙紫陽回憶說：「5 月 3 日，我到了楊尚昆家裏。楊告訴我，他已向王瑞林及鄧的子女談過，他們認為現在修改 4・26

【416】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台北聯經出版社，1993 年 10 月版，第 370–373 頁。

社論有困難，可以淡化，不要再提它，慢慢轉這個彎子。他們還說，如果現在找鄧談，鄧再一次肯定，那就更難了。你們在前線，慢慢去轉這個彎子。尚昆當時還表示，他可以分頭做其他幾位常委的工作。就在這一天，閻明復到我家告訴我說：王瑞林和鄧的子女都表示，對學潮問題，由中央負責同志根據情況處理好了。如果現在找鄧，萬一鄧不同意，反而更難辦。在這以後的幾天內，也就是按照這個淡化、慢慢轉彎子的辦法行事。」【417】

許家屯也按照趙紫陽的委託，向楊尚昆轉達了趙紫陽的意見。《許家屯回憶錄》中記載:「楊尚昆對我講:『我去同老爺子（指鄧小平）講，老爺子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他可以聽進去，也可能聽不進。你告訴紫陽，讓他先這樣做，假如有責任，我是第一個』。我告訴楊尚昆:『外面傳說，這次不是趙倒，就是李下台』。楊尚昆斬釘截鐵地講:『一個也不下，趙、李都不下』」【418】。

趙紫陽提出的「轉彎子」的意見，在中央常委內部雖然有李鵬、姚依林反對，但得到了胡啟立、喬石的支持。而列席常委會的楊尚昆、萬里也表示完全贊成。這樣，在常委和「列席常委」中，同意趙紫陽意見的就佔據了多數。楊尚昆還告訴趙紫陽，他同彭真談過，彭完全支持趙的意見。彭還對楊說，如果將來小平怪罪下來，不能怪紫陽一個人，還有你我，你算一個，我也算一個。表示他是和趙紫陽站在一起的。

5月3日下午，北京召開了「首都青年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大會」，趙紫陽、楊尚昆、李鵬、萬里、鄧穎超【419】、喬石、胡啟立、姚依林等出席。會上，趙紫陽作了一個被認為是比較溫和的講話，講話中充分闡述了動亂的危害和穩定的必要，要求「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堅決維護得來不易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同時針對當時形勢指出，「穩定，漸進，理智，秩序，法制，這是建設和改革的要求，也是民主和科學的要求。」【420】

【417】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37-38 頁。
【418】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台北聯經出版社，1993 年 10 月版，第 373-374 頁。
【419】鄧穎超（1904-1992）：中共元老，周恩來的夫人。
【420】趙紫陽：《在建設和改革的新時代進一步發揚五四精神》，載《人民日報》1989 年 5 月 4 日第一版。

這個由中央政改研究室和鮑彤作了重大修改的講話，是經中央常委審閱同意的。討論這個講話時，李鵬、姚依林曾要求在報告中加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但趙紫陽表示，現在如果加上這樣的話，勢必起到激化矛盾的作用，因此，他不同意加。李鵬後來說，趙的這個態度，「是他要和中央的方針、和小平同志保持距離的表現」【421】。

5 月 4 日下午，趙紫陽在會見亞行各成員國代表團團長時，又發表了一篇講話。這篇講話，一改 4·26 社論那種階級鬥爭式的強硬語調，採用了和緩的態度。在列舉了學生遊行的基本口號，和指明遊行隊伍中的絕大多數學生對共產黨的基本態度是「又滿意，又不滿意」，以及表明了對「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的判斷之後，他針對當時形勢強調指出：「現在最需要的是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趙紫陽的這篇亞行講話，也是鮑彤為他起草的。5 月 4 日上午一上班，鮑彤接到紫陽辦公室電話，要他趕緊過去。趙紫陽告訴鮑彤，當天下午 1 時半他要會見亞行代表，要鮑彤為他準備講稿。就在去北京醫院探望李先念的車途中，趙紫陽向鮑彤談了他的想法。鮑彤後來說：這篇講話的「思想、內容、提法，以至許多重要的語言，都是紫陽親自口授的。我完全贊成這些觀點，因此也沒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見請他斟酌。我回辦公室後做的是文字整理工作，中午 12 時半交稿，紫陽又在稿子上親自作出了兩處修改。」

記得那天上午，老鮑是一邊寫，一邊要我送去打印的。我一邊校對，老鮑又一邊修改。這樣幾遍之後，時近中午，稿子完成。老鮑要我複印了兩份，匆匆去了海裏【422】。過了大約半個多小時，老鮑回來，顯得很興奮地說，稿子已經通過了。他要我把稿子複印幾份，並在其中兩份上批了「以講話為準」的字樣，告訴我，過一會兒新華社來人取。接著，老鮑又打了幾個電話。一是告訴新華社，發全文，不要刪節；二是告訴人民日報，用新華社稿，在顯著地位登出；三是告訴廣播電視部，用新華社稿當晚播出，並請他們安排重播。

【421】《李鵬六四日記》2004 年徵求意見版，第 60 頁。

【422】指中南海，「海裏」為中央機關內部工作人員常用的說法。下同。

中午過後，老鮑又要我打個電話給新華社，通知他們，紫陽在稿子上有兩處修改，一處，是在「有沒有人企圖利用並且正在利用學生的行動呢？中國這麼大，當然難免，總有人希望看到我們出現動亂，總有人會利用」之後，加上了「不利用是不可想像的」一句；另一處，原稿是「中國是不會發生動亂的」，紫陽說，不對，已經在動亂了，怎麼能說不會發生呢？應該改成「不會出現大的動亂」。

趙紫陽這篇態度溫和的講話當晚由中央電視台播出後，立即受到了廣大學生的歡迎，也得到了黨內高層多數人的好評。趙紫陽後來記述說：「5 月 5 日以後的幾天內，北京各大學陸續復了課。當時在北京的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給我寫了一個條子，說他 5 月 4 日見到了楊尚昆，楊對我的講話極為贊同。當時在廣泛的讚揚下，李鵬 4 日晚來我家，也不得不說我的講話很好，他隨後會見亞行會議代表講話時，也要呼應一下。但後來當我說到 4·26 社論有問題時，他表示反對。」【423】

許家屯在他的回憶錄中也談到了楊尚昆、喬石對趙紫陽這篇的反映：5 月 4 日下午，「我們在楊尚昆家裏見了面，我把與趙紫陽談話的主要內容和想法，向楊尚昆講了，楊尚昆很爽快地表示完全同意。楊還告訴我，他剛從人民大會堂回來，聽到了趙紫陽對亞銀年會代表團團長和亞銀高級官員的講話，認為講得很好。也碰到喬石，喬也很讚許。」【424】

趙的這個講話，體現了他對解決學潮問題的基本思想，當然，也體現了老鮑和我們室大多數同事們的想法，就是努力把問題的解決引上民主和法制的軌道，從而進一步推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趙紫陽提出的「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是在和平條件下，在中國現實社會歷史條件下，解決社會突發事件和衝突，防止其進一步走向激化和對抗，保持社會基本穩定的一條最好途徑。這條途徑，一反中共過去處理黨內、國內政治矛盾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和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反映了中共黨內以趙紫陽為代表的一部分堅持改革開放的領導人在執政方式上，要求以民主和法制治國的一種全新的政治思維和政治理念。

【423】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39 頁。
【424】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台北聯經出版社，1993 年 10 月版，第 373 頁。

六、「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些，風險不大」

這幾年，新聞改革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已經提了出來，趙紫陽擔任總書記之後，根據經濟、政治改革和形勢發展的要求，在新聞改革方面做了相當的努力。老鮑也按照紫陽的意見，在中央政改研究室組織專人研究過這方面的問題，中央宣傳理論工作領導小組也為此發過文件，改革有了一點進展，但由於問題過於敏感，阻力很大，且涉及到政治體制改革等多方面的配套，原有的新聞管理體制還沒有來得及做多大改變。

學潮發生之後，上面仍是嚴格控制有關學潮的報道。雖然允許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等主要新聞單位作少量報道，但都是「正面宣傳」，學生和許多新聞工作者對此都十分不滿。在學生提出的政治口號中，「新聞自由」早已位列其中。4月29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同學生對話，在回答學生的「取消新聞檢查制度」要求時，他說：「據我所知，國家沒有新聞檢查制度」。這個回答很「妙」。事實上，確實是沒制度，但有檢查。有檢查沒制度比有新聞檢查制度更糟，因為隨意性更大。

隨著事態的發展，學生們更加強烈地要求新聞媒體貫徹「新聞自由」的原責。5月4日，有200多名首都新聞工作者加入了遊行隊伍，打出的口號主要有：「嚴正抗議上海市委撤銷欽本立【425】職務」、「不要逼我們造謠」、「新聞要說實話」、「開放報禁」等。自5月5日起，對學潮的報道控制有所放鬆。人民日報第一版在刊登趙紫陽亞行講話的同時，刊登了首都學生5·4遊行的消息，並配發了照片。

5月5日中午，老鮑從海裏回來，告訴我，通知全室在家的研究人員，下午開個會。並通知一下已經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兼任副秘書長的周傑副主任。我立即作了通知。

下午的會，是在325小會議室開的。老周也來了。室裏有好幾天沒有開會了，大家都很高興，急於想聽一聽上邊的情況，都準時到會。老鮑先講了會的主題，他說，學生大都已經回校復課，學潮暫時告一段落。現在要考慮如何滿足學生要求中那些合理的部分，因為這

【425】欽本立（1918-1991）：浙江長興人。著名報人。曾任中共《文匯報》黨委書記，時任《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1989年4月因堅持在《導報》上發表紀念胡耀邦文章，被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整肅停職。「欽本立事件」成為江澤民政治生涯的轉折點。

些要求引起相當部分群眾共鳴。要研究一些措施，使之成為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契機。

接著，老周和其他許多同志紛紛發言，提出了許多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在後面一節中還要講到）。有幾個同志在發言中提到，現在鬧事的群眾中，要求「新聞自由」的呼聲很高。現在看，適當滿足這方面的要求，放寬新聞管制，不但和中央提出的「新聞改革」方向一致，而且也符合十三大提出的「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的精神。有的同志還提出了加快新聞立法的問題。老鮑十分贊同。他接著發言說，我也主張我們的新聞管理尺度要放寬。這不是個理論問題，而是群眾的要求。我們現在新聞管理方面，是無制度，但有檢查，管理起來沒有個規範，這比有新聞檢查制度更糟。管新聞只有依法去管。按照法律，你犯法，我就管；你不犯法，我就不管。如果是黨報，你違反了黨的方針，黨委可以撤你的總編；但其他媒體的總編如不違法，你就不能隨便換。

這次討論，在放寬新聞管理尺度，加快新聞立法方面，形成了基本一致的意見。第二天上午，室裏由群林主持繼續開會討論昨天大家提出的問題，但老鮑沒有參加，而是去了海裏。我猜想，老鮑可能是去把昨天室裏討論的情況向紫陽作了彙報。

5月6日，趙紫陽約見了當時中央宣傳小組的正、副組長胡啟立和芮杏文，同他們談了對當前形勢的新聞報道的意見。趙紫陽說，過去我們控制的太死，現在放開了一點，遊行作了報道。看來，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他簡要分析了當時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認為，現在面對國內人心所向，面對國際進步潮流，我們只能因勢利導。因此，他同意各新聞單位在對當前形勢報道上作適當放開。胡啟立表示贊成紫陽的意見，並認為新聞不改革不行。

趙紫陽的這個談話，我想可能同我們室昨天的討論有關。昨天的討論，題目大概就是紫陽出的，結論和他的意見也是一致的。

趙紫陽這次談話的基本精神，第二天就向首都新聞界作了傳達。在《李鵬六四日記》中，引述了一段胡啟立傳達的趙紫陽的話，雖不知準確與否，姑且引在這裏。趙紫陽說：「學潮以後，主要是推進改革，學生們擔心的是改革停頓，走回頭路，表層是反腐化。不僅是經

濟改革，而且是政治改革、民主化。要積極推進改革進程，包括透明度、公開化。『文革』前，不透明，只向好處想，現在只向壞處想，有些人把問題看得過於嚴重。不能把學潮說成是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一小撮人挑動，這樣總結不行。這次輿論主要要求改革，慢了不滿意，輿論要向改革這個方向引導。反自由化與四個堅持是同義語。關於民主、自由，不要一聽就是自由化。民主、自由、人權是世界潮流，新聞自由成為焦點。違背潮流不行。要保證新聞自由，不能違背人民的意願。」【426】

此後，首都各大報刊和新聞單位對於學潮的報道有所增加，內容也豐富了許多。從我聽到和看到的反映看，大多數新聞工作者和廣大群眾的反映是好的，最主要的，是他們能瞭解到真實情況了。過去，對國內的許多重要消息，特別是政治方面的消息，大都是「出口轉內銷」，國內的重要政治信息，廣大群眾都要從外國的報刊廣播中得到，這無形中為「美國之音」、英國「BBC」等過去被稱為「敵台」的外國廣播增加了大量聽眾。由於我們自己的廣播、電視、報紙過去對國內的重大政治事件報道少，假話、空話、套話又多，雖然外台廣播中很多都是小道消息，不準確的甚多，但很多人寧肯信外國廣播中的假話，也不信我們自己報刊的真話。事情已經到了這種程度，真是可悲可歎。

另一方面，在新聞報道管制放鬆以後，也確實產生了一些問題。由於長期以來，報刊和其它新聞傳播媒介都由黨的宣傳部門統一管理，是所謂「黨的喉舌」，代表黨的聲音，因此在放開之後，許多群眾把凡是報上登的，都仍然當成是「上邊精神」，以致產生一些思想上的混亂，對勢態的發展產生了一些影響，這確是當初始料不及的，也算是對過去「輿論一律」的一種懲罰吧。

七、「驢唇」不對「馬嘴」的對話

在六四鎮壓之後的 6 月 30 日，國務委員、北京市市長陳希同代表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了一個《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報告中認為，「趙紫陽同志『五四』講話是動亂升級的轉折點」，因為這個講話，「在廣大幹部、群眾中造成了嚴重的思想混

【426】《李鵬六四日記》2004 年徵求意見版，第 72 頁。

亂，給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撐了腰，壯了膽，打了氣」，「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卻從趙紫陽同志的談話中受到了鼓舞」。「在趙紫陽同志的鼓動和少數人的策劃下，北京大學和師範大學『自治會』的頭頭當晚就重新宣佈罷課，許多學校也相繼宣佈繼續罷課，……遊行示威的浪潮又重新掀起。」

《李鵬六四日記》中也說：趙紫陽的五四亞行講話「再次點燃了將熄滅之火，搞動亂的人看到黨的總書記在支持他們，重新在北京發動了更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並波及到全國各大城市，在天安門廣場還開始了大規模的絕食活動，向黨中央和國務院施加壓力。」【427】

事實果真是如此嗎？不是。趙紫陽的亞行講話以後，形勢開始時是向好的方向發展的。趙在他的回憶中說：「5 月 5 日以後的幾天內，北京各大學陸續復了課。當時在北京的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428】給我寫了一個條子，說他 5 月 4 日見到了楊尚昆，楊對我的講話極為贊同。當時在廣泛的讚揚下，李鵬 4 日晚來我家，也不得不說我的講話很好，他隨後會見亞行會議代表講話時，也要呼應一下。」事實上，李鵬也確實作了「呼應」【429】。

但是，趙紫陽「轉彎子」主張的初見成效，不能不讓李鵬一夥極為緊張。李鵬十分害怕 4・26 社論被否定，他曾向閻明復說過，如果趙回來不支持 4•26 社論，他只有下台。【430】現在趙紫陽要「轉彎子」，如果趙紫陽轉彎子沒有效果，那贏的是李鵬；但是轉彎子有效果，贏的就趙紫陽，李鵬一夥就要承擔激化矛盾的責任。顯然，此後幾天的事實表明，是趙紫陽要贏了。這讓李鵬一夥不能不急。他們的策略，就是極力阻止、破壞趙主張的與學生的對話，重點糾纏於對話學生組織的「合法性」問題。

請看事實。

5•4 以後，學潮並不是如六四後陳希同向人大的報告中說的那樣，立即開始升級的，而是經歷了一個過程。趙紫陽的亞行講話，說明趙紫陽決定轉 4・26 社論的彎子。這個態度得到了多數學生的好評，學

【427】《李鵬六四日記》2004 年徵求意見版，第 58 頁。

【428】許家屯（1916-）：江蘇如皋人。曾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1989 年「六四」事件後，不滿中共武力鎮壓，出走美國。

【429】見李鵬：在會見亞行年會客人時的講話，載《人民日報》1989 年 5 月 6 日第 1 版。

【430】參見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34-35 頁。

潮開始降溫。到 5 月 12 日之前，學潮出現了一個相對的穩定期，學生的活動主要是在校園中進行。那麼，為什麼此後學生又要絕食，使事態迅速升級呢？不是陳希同、李鵬說的，是「趙紫陽講話暴露了中央內部的分歧」,「搞動亂的人看到黨的總書記在支持他們」，而主要是學生對同黨和政府通過對話解決問題的希望破滅所致。

趙紫陽在 5·4 亞行講話提出要「廣泛地進行協商對話」以後，社會各界，特別是各大專院校的學生，都在翹首以待，希望盡快進行。5 月 6 日下午，幾名學生代表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遞送了「北京高校對話團請願書」。這份有北大、清華、人大、北師大、政法大等 23 所高校學生署名的請願書說：

> 最近，北京及全國各地高校學生通過遊行請願等方式，反覆表達了同黨和政府對話的要求，黨和政府領導人也多次以不同方式表示願意同學生對話，共同商討解決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
>
> 我們作為北京高校民主選舉產生的代表，本著廣泛幫助黨和政府改進工作，推進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進程的基本態度，急切請求盡快同黨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就當前學生的民主愛國運動、深化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改革的推進、民主法制建設等問題，進行真誠的建設性的對話。

請願書希望黨和政府的代表盡快同學生確定對話的時間、地點，就對話程序、事宜進行協商，並允許按「新聞自由」的原則進行公開報道。

我在這裏大段引用請願書的原文，只是想說明，學生在此時是急切地想同黨和政府對話的，他們當時還並不想把事情鬧到後來那樣不可收拾的地步，而且，絕大多數學生的本意也並不是想「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

5 月 8 日下午，學生代表又來到國務院信訪接待站，聽取對 6 日所送請願書的回音。人大信訪局、中辦國辦信訪局的兩位局長答覆說，為了搞好對話，請學聯收集如何搞好對話的意見。請注意，這裏是講的請學聯收集意見，言外之意，是不承認遞請願書的「北京高校對話團」是學生的合法代表，要對話，仍要由合法的學聯來組織。兩位局長還表示，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將廣泛地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學生、教師、黨外人士接觸並進行對話。

當局的上述態度，實在讓人感到缺乏誠意。第一，對話最直接的目的，是要研究解決學潮中學生提出的要求，那麼當然應當以這部分學生為對話對象。可當局一直堅持以「合法」的學生組織為對話對象，實在是「頭痛醫腳」，「驢唇」不對「馬嘴」，讓人啼笑皆非，覺得根本就是不想解決問題。第二，目前最直接的不安定因素，是鬧學潮的學生，那麼對話就應當直接地、盡快地同學生進行。當然，同其他社會各界對話也是必要的，但應有個輕重緩急。讓人不能理解的是，此後數日，趙紫陽、李鵬、胡啟立等中央常委紛紛同工人、新聞工作者座談對話，就是不到學生中去，和學生對話。只是到了5月15日，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三天，歡迎戈爾巴喬夫的儀式被迫易地舉行之後，才不得不派李鐵映、閻明復同學生對話，而且仍然堅持由「合法」的學聯來組織！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就是由於李鵬一夥糾纏於學生代表的「合法性」問題，中央常委會的意見達不成一致！5月8日上午，趙紫陽主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李鵬六四日記》中記載了這次會議的一些情況，談到了「趙紫陽變相承認非法產生的學生組織」問題，說趙紫陽「認為中央與學生對話也不一定都由學聯或青聯類官方式的學生團體參加，學校裏學生自己產生的組織也可以參加，學生自願結合也可以」。這段記載表明，趙紫陽在此時已經明確看到對話中存在的問題，提出要直接同參加學潮的學生進行對話。遺憾的是，李鵬與姚依林堅決反對「與非法產生的學生組織」對話，所以「與會同志不同意趙紫陽的意見，認為不能放棄學聯和青聯的領導權」【431】！

5月9日下午，約200名首都新聞工作者到全國記協，遞交了一份要求「與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負責同志進行一次對話」的聯名信，信上有首都30多家新聞單位的1013名記者和編輯的簽名。北大、北師大1500多名學生到場聲援。與此同時，在已知當局明顯無意同他們這些「非法」學生組織對話的情況下，中國人民大學學生「自治會」還是選出了同政府對話的8人籌備小組，制定了對話提綱【432】。從這個提綱中可以看出，學生們提出的所要對話的內容，除了要求政府正面評

【431】參見《李鵬六四日記》2004年徵求意見版，第74-75頁。

【432】內容參見張萬舒：《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1年1月第3版，第144-145頁。

價這次學運的性質外，其它的都是有關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問題，反映了學生們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思考，雖然有些不一定確切，但從中卻看不出有什麼要推翻黨的領導，推翻社會主義的目的來。

從當時情況看，雖然已失去了一些時機，但「亡羊補牢，猶未為晚」，只要近日內高層領導能出來和學生盡快實現對話，通過努力加以正確引導，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並針對目前學生和廣大群眾意見最大的一些問題，盡快提出一些有效的解決辦法，在社會各界的監督下切實實施，是有可能平息絕大部分人的不滿情緒，逐步緩解事態的。

從筆者前面敘述中可以看到，正是由於李鵬一夥的阻撓和破壞，使趙紫陽的一系列設想不能得到貫徹，與參與學潮學生的對話一直得不到實施。學生復課後過了幾天，看不到政府對社會問題有什麼要改革的實際行動，承諾的對話也沒有什麼行動，就認為政府說「對話」明顯是在應付他們，所以他們對趙的 5‧4 亞行講話發生了懷疑，學潮由此開始再次升級。趙紫陽後來說：學潮升級的

> 根本原因是我從朝鮮回國後確定的方針（疏導、對話，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從熱點問題做起搞政治體制改革），受到李鵬等人阻撓、抵制、破壞造成的。在戈爾巴喬夫來訪之前，李鵬有一天對我說：你不是主張用軟的辦法平息學潮嗎？已經這麼多天了，沒有什麼作用吧！他的這句話，完全暴露了他包藏的禍心。他之所以抵制、破壞，使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學潮問題遭到失效，其目的是為以暴力鎮壓學潮尋找借口。【433】

自五四亞行講話之後，趙紫陽就準備有步驟的開始和學生及社會各界對話，他還要鮑彤在政改研究室討論如何對話的問題。

5 月 12 日將近中午，老鮑急匆匆地從海裏趕回來，要我通知一下，下午研究人員開個會。

2 點半，會議開始。老鮑說，給大家出個題目，香港有家報紙，最近有篇文章提出，應當把學生的要求引導到理論、學術討論上來。這倒可以考慮。我看主要是個對話的問題。中央現在也提出要進行多層次對話。我們今天來討論一下，應當做哪些準備。第一，要有哪些單位出來對話；第二，如何組織，對話採取什麼態度。我想，要誠心、虛心，聽取意見。如果做不到這一點，談都不要談。對話和板門店談

【433】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42-43 頁。

判不一樣，對手談判是政治鬥爭。對話也不是演戲，表現口材。對手是誰決定了性質，性質決定了內容和基本方法。我看先縷一縷學生最關心的問題，涉及哪些單位，涉及我們的，我們接過來。要是我們出去對話，不排除對話中陳述、宣傳我們的基本觀點，不能排除高校已經選出的學生代表。政府和學生對話，不存在誰勝誰敗的問題，只有成不成功的問題。成功就是達成共識，誰也不是英雄。我們只是個意見箱。我們室是不是也可以參加對話，政治體制改革要研究些什麼問題，我們也可以在對話中瞭解一下，然後一個個研究。聽取他們的意見再研究，當然最後形成的東西，不全是我們的，有學生的，也有有關各方面的。

老鮑談了他的想法後，大家紛紛發表了意見。綜合起來有以下幾點：

（1）對話要盡快進行，特別是最高層領導應出來直接同學生對話；

（2）要同鬧事的學生代表直接對話，不應以高校自發學生組織沒有登記為由，繼續拒絕以他們為對話對象。現在我們並沒有頒布社團法，50 年代的社團登記條例近年來也並未強調執行，而且對學校校園內的學生社團從來也沒要求過登記，現在說高校自發學生組織非法缺少根據。如果繼續以此為由，不和他們對話，只能加劇事態，激化矛盾，有弊無利；

（3）我們室當然可以參加對話，但以什麼名義，參加對話的人以什麼身份，需要研究。如僅以本室的名義，或僅以個人名義，不會有什麼作用。如以中央名義，需中央授權。但既便中央授權，我們去和學生對話，效果也不會好。第一，學生要求的是同高層領導對話；第二，我們去後，學生提的必定都是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而且非常敏感，不好回答。有些事，不能放開講。有些事上面沒有定，我們無法表態。學生還可能提出一些按中央已定的原則我們不能接受的要求，我們在對話中又不能硬頂，就可能發生意外。這樣的對話，不如不對。

對是否參加對話的問題，第二天由群林和唐欣主持又討論了一次。經過大家的慎重研究，最後統一了意見：我們室不宜參加對話。老鮑接受了大家這個意見。但是，大家一致要求老鮑把前面的兩點意見也向上反映。

我們室的會也開過了，該反映的意見，老鮑也肯定向紫陽和中央常委反映了，但幾天過去了，仍遲遲不見有高層領導出來同學生對話的消息。

這段時間，倒是聽到另外一個消息。5 月 10 號前後，當時的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召集北京十大高校的黨委書記開了個座談會，何也講了話。會議的主要精神就是要查清各高校學生組織的幕後，要秋後算帳。會後，會議的主要精神由各高校官方廣播站在校園裏反覆播出。這種做法，又一次激起學生極大的強烈不滿和反抗情緒，他們要求澄清學潮的性質，認為學潮是愛國的，應該通過對話來解決性質問題，而不是要來揪黑手，秋後算帳。

5 月 12 日，學生們的抗議行動再次升級。北京各高校學生自發組織「高自聯」決定從 13 日開始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北大貼出署名「首都高校自願絕食者」的所謂《絕食宣言》，說他們的絕食原因是:「第一，抗議政府對北京學生罷課採取的麻木冷淡態度。第二，抗議政府拖延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的對話。第三，抗議政府一直對這次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冠以『動亂』的帽子，以及一系列歪曲的報道。」

同日上午，中辦、國辦信訪局負責人答覆 5 月 6 日送交「請願書」的學生說，15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和有關部門負責人將繼續同學生和各界人士對話。但雙方在參加對話人員的人數上發生爭執。

下午 5 點 40 分，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宣佈開始絕食，並表示：「不達目的絕不罷休」。

此後幾天，5 月 13 日，趙紫陽在人民大會堂同首都工人座談；胡啟立等同首都新聞界對話；14 日，李鵬到首鋼同工人座談；但領導人就是不出面和學生座談。

在學生開始絕食的壓力下，當局不得不同意將原定 15 日的對話提前，安排到 14 日下午，但僅是派了主管學生工作的李鐵映，和負責統戰工作的閻明復出面。由於學生絕食已經開始，當局在參加此次對話的學生代表問題上，不得不作出一定讓步。參加對話的學生，雖然在名義上仍是「全國學聯、北京市學聯邀請」，但已都是前次提出「請願書」的首都 30 多所高校的代表，廣場上絕食的學生代表也參加了。對話進行到晚 7 時多，未取得一致意見，遂宣佈休會。

學生的絕食仍在繼續進行。一些高校領導人紛紛到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返校。到 16 日，有些絕食學生開始支持不住，被送往醫院。由此，救護車的警笛聲開始日夜響徹京城的大街小巷。那幾天每天入夜，我躺在辦公室的床上，聽著窗外北大醫院門前徹夜響著的救護車的警笛聲，心裏不知是什麼滋味，久久難以入眠。

那些日子裏，室裏的同志們都十分焦急，每見到老鮑都和他提起這個問題。外單位的許多領導和朋友把電話一個個打到我的辦公室，要我轉告老鮑，希望老鮑上達中央，盡早採取果斷措施，平息事態。大家都擔心絕食的學生，萬一發生死亡或造成終生殘疾，事情將難以向民眾交待。

人民日報、科技日報等報紙每天都在報道社會各界的呼籲、請願、聲援的消息。到 16、17 日，首都幾十萬、成百萬的學生和群眾上街遊行。《人民日報》連日頭版的大標題是：「首都高校學生絕食進入第四天，數十萬各界人士昨天到天安門廣場聲援」，「首都各界百萬餘人遊行，聲援絕食請願的大學生，強烈要求立即對話救人救國」等等。

從我瞭解的情況來看，首都廣大市民在學生開始絕食的時候，基本是持不支持態度的，認為是胡鬧。但是，隨著學生絕食日復一日，遲遲不見政府高層有人出來同學生對話，而學生狀況日見危急，中央、北京市的機關、廠礦、事業單位的職工，和北京市民都著急起來。學生是他們的子弟，他們不能眼看這樣下去。在勸說學生無效之後，他們便轉向要求政府，盡快出面解決。政府越是久拖不決，同情學生的人越多。應當說，參加遊行聲援學生的人，對學生提出的口號並不完全贊成，他們的遊行並不是要反黨反社會主義，而是要求政府盡快同學生對話，緩解事態。從政府方面說，如果不是一誤再誤，高層領導人早些出面和學生對話，也不會那麼多的人上街遊行，事態也不致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那些天裏，儘管室裏的同事們都希望能親眼目睹一下那壯闊的場面，但很少有人上街去看，更不要說參與了。我更是足不出戶，老老實實坐在辦公室裏。我知道，北京城裏現在發生的事情，是一件必將載入史冊的大事，可能是百年難得一見的。但是為了大局，我只得這樣做，也必須這樣做。

八、應召開人大常委會議解決學潮提出的熱點問題

5月4日趙紫陽的亞行講話以後，學生宣佈復課，大部分參加學潮的學生回到了課堂，學潮進入了一個相對的平靜期。

趙紫陽知道，要解決學潮問題，不僅要治標，更要治本。因此，他在主張進行廣泛社會對話的同時，還主張對學生提出的社會關心的熱點問題，如廉政問題、透明度問題、民主與法制的問題以及輿論監督等等，要積極採取措施。他建議全國人大建立一個有權威的廉政委員會，獨立接受對高幹子女違法行為的舉報及調查，加強輿論監督，加強透明度，加快新聞法、遊行法的制定，採用世界多數國家通用的做法，通過具體立法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這些意見，不能不說是緩解當時社會矛盾和民眾不滿、保證社會基本穩定帶有根本性的措施。他還提出，專門召開一次人大常委會，聽取對幾大公司以及社會認為「官倒」嚴重的幾個大公司的審計情況，由人大進一步審查，或由人大直接組織審查。趙紫陽「當時總的想法，就是通過對一些社會上關心的熱點問題的改革，一方面來緩解社會上和學生中間的一些不滿，把學潮緩和下來，平息下去。並以此為契機啟動政治體制改革，通過這些問題使人大真正能發揮最高權力機構的作用，引導學生把注意力轉移到如何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來。」【434】

5月5日下午，鮑彤召集中央政改研究室的研究人員開了個會，專門研究了如何解決學生的合理要求問題。這個會，是紫陽那裏剛剛佈置的。這說明，在此時紫陽已經在考慮如何軟處理，怎樣在處理當前事件的同時進一步推進改革了。會上，許多同志發了言，提出了多方面的想法。大家都認為，盡快拿出幾條解決群眾不滿的過硬辦法，公之於眾，讓群眾看到我們解決問題的決心，會緩和群眾的情緒，也可以使想把事情鬧大的人失去鬧下去的理由，路子是對的，關鍵要快，要實。

在討論解決官倒問題的時候，老鮑談了一些很有啟發的意見。他說，官倒，應指那些利用手中權力，把計劃內物資倒成計劃外並從中漁利的官辦壟斷性公司，主要的不應是指四大公司（即中信、光大、康華、中農信等），而應是指國家計委、能源部、物資部、化工部等下屬的一些公司。要查，應以此為重點。四大公司是在改革開放中建立

【434】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40頁。

的幾個具有開放性的公司，以後還要發展。當然，有問題也要查。據說前一段已經審計了，結論是康華總公司沒有大問題，有些小問題也主要是在一些子公司、孫子公司。既已審計完畢，那就應考慮為康華澄清事實。可考慮近期召開人大常委會，請國務院專門就此作彙報，好處是透明度高。人大常委會應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調查處理官倒問題。我還主張，物資、能源等部和國家計委都應設立專門的監督委員會，由民主黨派、群團代表等組成。老鮑講到這裏，老周補充了一個情況，說在人大這次會（指 3 月剛剛開過的七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上海、湖南代表團已就公司問題要求成立專門調查委員會。

老鮑還對北京市的遊行十條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遊行十條，實際上是不准遊行。從它的實際作用看，是形同虛設。在根本上說，是個指導思想問題，體現什麼精神的問題。制定這種法規，主要方面應當是為了實現和保護憲法賦予公民的合法權利，另一方面才是維護社會秩序。現在是把這兩方面弄顛倒了。這樣做，對保持社會穩定並無好處。

大家在會上也提出了一些認為是目前可以講，而且又作得到的措施。老鮑在會議快結束時又作了歸納，總共有六、七條的樣子。老鮑還談到，從目前情況看，四中全會也可能還要我們起草有關文件。現在和大家先打個招呼。我當時想，四中全會在這次學潮稍有平息之後肯定要召開，但能否仍由我們室來起草會議文件，要看紫陽能不能過學潮這一關了。

次日（6 日）上班，老鮑對我說，今天上午，室內就昨天的問題繼續討論。你轉告群林，上午我有事，不能參加，請他主持。老鮑上午大概去了海裏，我想是向紫陽彙報昨天討論的情況。這天上午，室裏繼續昨天的議題進行了討論。

會後，由高山根據會上大家的意見和鮑彤的歸納，代趙紫陽起草了一份向政治局的建議稿，稿子全文如下：

政治局：

持續半月的學潮已暫告一個段落，但引發不穩定因素的社會條件並沒有改變。當前，除了認真搞好各個層次、各種形式的對話，以增進政府與學生的相互理解，同時也對學生進行教育外，我認為，中央和國務院還應當主動採取一些措施，使學生和人民

群眾都能感覺到黨和政府在反對腐敗、推進民主等方面的主張，同他們的合理要求是一致的，行動是堅決的。為此，我建議：

一、鑒於國務院已經宣佈對中信、光大、康華和中農信等四個公司的審計工作已近結束，為了增加透明度，建議國務院將審計報告提請6月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審議時邀請各界人士旁聽，審計結果通過新聞媒介予以公佈。如果人大常委會認為有必要，還可根據憲法規定成立調查委員會進一步調查此事。

二、分批公佈中央和國家機關現任正部級以上幹部的身世、經歷，以澄清社會上的各種傳言，並允許新聞界採訪報道以上人員的生活。

三、抓緊制訂並公開現職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生活待遇制度。

四、作為一種特例，在最近一段時間內，由國家監察部的人民舉報中心，直接受理涉及省、部級以上幹部親屬問題的舉報；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有關人士，對舉報中心的立案和銷案工作進行監督。

五、《新聞法》的起草工作應抓得更緊，爭取年內將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建議人大常委會將草案全文公佈，徵求意見。在《新聞法》通過公佈之前，黨和政府對新聞的管理尺度應適當放寬，保證新聞機構在憲法規定的原則下進行客觀報道的權力，更好地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

六、鑒於前一段對遊行、示威掌握的偏嚴，建議全國人大考慮制訂統一的《遊行集會法》。在此基礎上，各地可相應制訂或修改有關條例，使憲法規定的公民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得到保障，同時也使濫用自由的行為得到制裁。

七、學生提出的「校園民主」的口號，我們可以接過來，並將其納入法制和秩序的軌道。如果搞得好，這種「校園民主」將是廣大青年學生學習民主、實踐民主的有效形式。建議國家教委、各高等學校的黨團組織和行政領導，將這方面的工作擺到重要位置，研究並制訂具體的辦法。

總的說來，要根本消除社會不穩定因素，需要長期的努力，需要在民主和法制建設方面做大量的工作。當前做好上述幾件事，可能有助於事態逐步平息，並向積極的方面轉化。

5月8日下午，老鮑向室裏的局級幹部傳達了上午的政治局常委會情況。為緩解當前事態，趙紫陽在這次會上提出了滿足群眾迫切要

求的六點措施，其主要內容，就是前面講到的高山根據我們這兩天討論起草的那份代擬稿，只是刪除了有關「校園民主」一條。趙紫陽還補充了一點，取消副部長以上領導幹部的生活特殊供應，但 75 歲以上的老同志除外。趙紫陽建議，對這些意見，如果大家同意，就請新華社發個通稿，明天在《人民日報》發表。對趙紫陽提出的這些措施，萬里首先表示「完全同意」。接著，喬石表態說，我舉雙手擁護紫陽同志的意見；李鵬則表示，這只是紫陽的個人意見，政治局還沒有討論；姚依林一言不發；胡啟立則說，我擁護以上各位同志的意見。這樣，會議沒有形成一致意見。

9 日，萬里在人大常委會的黨內副委員長會議上，把趙紫陽的六點意見向大家作了介紹。黨內副委員長們一致贊成，表示中央、國務院如不發表這些意見，可用人大常委會的名義發表。李鵬得知這個情況後，急忙打電話給萬里，說政治局沒有討論這些意見，中央不同意發。他又專門給趙紫陽打電話，不同意把這些問題列入人大常委會議程。

10 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在討論了戈爾巴喬夫訪華問題之後，趙紫陽提出了處理當前局勢的四點意見。據《李鵬六四日記》記載，這四條意見是：一、非法學生組織雖不能承認，但學生會改選不可避免；二、新聞開放勢在必行；三、抓廉政措施：審計四大公司，並交人大審查；四、取消對領導同志的特殊供應，75 歲以上的老同志除外。李鵬在日記中說：「趙紫陽說這四條意見，是他個人意見。接著萬里同志說，人大要組成廉政委員會。在這種情況下，我不能不講話了。我說，趙紫陽講的這幾條意見常委都沒有討論過，紫陽講話不能代表常委。」在李鵬等人的明確反對情況下，這次會議仍然沒有對趙紫陽提出的四點達成一致意見。李鵬在日記中以「陰謀論」的觀點評論說：「紫陽講話要害是通過新聞開放進一步煽動動亂。把對動亂的處置權由黨中央轉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已顯露出要奪中央常委權的端倪，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在這裏，李鵬給趙紫陽的主張加上了一頂「奪權」的帽子，說趙的主張「要害是奪權」【435】，似乎作為中央常委和國務院總理的他不知道，趙紫陽才是合法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全國人大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高權力機關！「奪權」？誰奪誰的權？！

【435】參見《李鵬六四日記》2004 年徵求意見版，第 78-79 頁。

積極支持趙紫陽，同樣主張「在民主和法制軌道上解決學潮問題」的萬里，並沒有理會李鵬的那一套。就在中央政治局開會的 10 日當天下午，萬里主持召開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會議決定，6 月 20 號左右在北京召開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聽取國務院關於清理整頓公司的彙報、關於學生遊行示威和罷課問題的彙報，審議《遊行示威法》草案和《新聞法》起草情況的彙報。這個決定公佈後，得到了社會各界的支持。5 月 13 日的《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及時討論群眾關心的熱點問題實屬創舉；人大常委八次會議議程深得人心；把解決問題納入民主和法制的正確軌道」為題，報道了社會各界的反應。

與此同時，5 月 9 日、10 日，十三大後成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研究聯絡小組」在中南海召開了「初級階段理論研究座談會」，提出「社會主義改革要過兩關：『市場關』和『民主關』」的問題。趙紫陽、胡啟立、芮杏文會見了參加會議的代表，表達了他們的態度。鮑彤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強調：「通過改革，要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秩序和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新秩序。」「世界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認識世界大勢是不行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民主、自由、人權、群眾參與、權力制衡和廉政建設等許多問題都應當提到理論研究的重要位置上來。」【436】李鵬後來在他的六四日記中心理陰暗地評論說：「這是趙紫陽再次公開亮相，表示他支持學生搞西方式的民主」【437】。

九、法學家座談會

5 月 15 日中午，在中蘇隔絕了近 30 年之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對我國進行正式訪問到達北京。

此時，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的絕食請願仍在繼續。並且，從凌晨起，就有三萬餘學生和群眾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等待戈爾巴喬夫車隊的到來。由於預定的廣場清場工作無法進行，歡迎戈爾巴喬夫的正式儀式只得臨時改在機場舉行。中央電視台進行了實況轉播。從電視畫面上看，歡迎儀式準備得很倉促，從國賓下機到檢閱儀仗隊，整個過

【436】見《人民日報》，1889 年 5 月 12 日第一版。

【437】《李鵬六四日記》2004 年徵求意見版，第 84 頁。

程連紅地毯都沒有鋪。迎賓車隊也被迫繞行。連我們這些坐在電視機前的觀眾，都為我們這個泱泱大國、禮義之邦感到難堪。

看過電視之後，室裏同志們議論紛紛，都覺得實在太不像話。據我聽到的社會各方面的反映，幾乎都對廣場上的學生不滿，認為，即使你們對政府有多大的意見，也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事，不應在這個時候和這個場合鬧，這是在外國人面前丟中國人的臉。但從另一方面說，政府也應盡快採取措施，和學生對話，緩解事態。學生絕食已經幾天了，這樣拖下去總不是辦法。

這天上午，繼昨日和學生對話之後，李鐵映、閻明復等領導人再次和包括廣場上絕食的學生代表在內的 50 餘名學生代表對話，名義仍然是「全國學聯、北京市學聯邀請」。這表明，上面對所謂「非法」的學生自發組織仍堅持不承認的態度。但要解決問題，光靠原則又不行，必須以他們為對話對象，所以只好採取這種掩耳盜鈴的方式了。

在對話中，學生提出的要求主要是希望中央對這次學潮作出公正評價，實質上，就是要求否定4•26社論對「動亂」的定性。在對話中，李鐵映說：「黨和政府的領導人已在多次講話中肯定了廣大同學的愛國熱情和善良願望。但目前整個事態還在進一步發展，有些事情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他希望大家以自己冷靜、理智的行動，讓實踐和時間對這次學潮作出評價。閻明復則說：「我除了對學生在 4 月 27 日、5 月 4 日上街遊行未向政府申請並得到批准這一點表示遺憾外，對整個學生運動的主流是肯定的，但對這期間出現的一些問題也感到憂慮。現在一些學生正在天安門廣場上絕食，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們國家的形象。我希望同學們用自己的行動證明自己是有理智的。」

儘管李、閻兩位中央領導用這些模稜兩可的話，反覆勸說學生們停止絕食請願活動，但因不能滿足學生們的要求而未能奏效。看來，不解決這場學生運動和學生自發組織的性質問題，是很難解開這個結了。

當日午夜，老鮑找到我，要我去把秘書長陳群林找來。群林已經睡下了，我敲了半天門，才把他叫起來。

我們一起來到 325 小會議室。我的記錄本上記下的時間是：5 月 16 日凌晨 0 點 45 分。老鮑對我們說，我想明天下午開一個法學家座談會，你們看怎麼樣。明天找一部分在京知名的法學家，研究幾個問

題，一是非法組織問題，二是動亂問題。從法律的角度看，這是兩個什麼問題。從法理上講，什麼是非法組織，根據什麼法律來判定，現在的學生組織能否叫「非法組織」，不按學生會章程選出的學生組織，是否非法？在從法制不健全的社會向法治國家過渡過程中，怎麼看這些問題？黨沒批准的，是否就是非法？沒有法，沒經過一定的程序，如何判定非法？是否黨沒批准的都非法？這樣全國要有多少非法組織？即使有非法組織也要依法才能取締。第二，什麼叫動亂，動亂是否一般都帶有反黨反社會主義性質？這個界限怎麼劃？如何在這個問題上劃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動亂」是什麼用語？能否站得住腳？對這些問題，組織法學家座談一下，作出合情合理的回答。然後，形成個紀要，把幾種意見歸納一下。你們看是否可行？

群林表示同意，我當然也是贊成的。

我們又研究了一下明天上午請人，下午就開，時間是否來得及的問題。群林認為在時間上是可以辦到的。老鮑說，那就這樣定了，明早群林佈置一下。看看請哪些人，找一些同志分頭去請。然後又對我說，我記得前一段人大、政協開會時，有不少代表委員發言，講到不同意用「一小撮」這個詞。明天你去找一找，把有關的劃出來，送給我。

很明顯，老鮑明天開這個會，是要在法律上和理論上找到依據，影響高層領導人，堵上一些人的嘴，以便糾正4·26社論給動亂的定性。同時，也否定「非法組織」的提法，為同學生選出的對話團和學生組織代表對話，掃清障礙。現在學生絕食已經數日，做這件事實在刻不容緩。

16日上午一上班，陳群林立即找社會局的陳小魯等幾個人傳達了鮑彤的要求，確定了下午開會要邀請的人員名單。室內許多同志分頭行動，上門去請分散在北京市區各個單位的專家們。到中午，外出的同志們紛紛返回，彙報說要請的人大部分請到。而整個上午我則在查找和翻閱不同意提「一小撮」的人大、政協會議簡報，找到後送給了老鮑。

5月16日下午3點，法學家座談會正式開始，地點在中直招待所二樓會議室。到會的有著名法學家張友漁（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顧問）、楊景宇（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陳延慶（全國人大常

委會法工委國家法室副主任）、李文傑（全國政協法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律師協會副會長）、吳大英（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所長）、王叔文（中國法學會副會長）、陳光中（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楊敦先（北京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高銘暄（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教授），以及最高檢、最高法、公安部、民政部社團管理司等有關單位也都派了局級以上幹部到會。

會議一開始由研究室副主任周傑主持。老鮑因下午有事去了海裏，會議開始時沒有能到場。但他留下話，4點鐘他一定趕回來。會一開始，老周先講了幾句開場白，他說，中央最近一再提出，要在民主和法制軌道上解決當前的問題。今天請大家來，是想請大家共同從法律和法學理論的角度研究兩個問題，一是什麼叫非法組織，如何判定非法組織，要通過哪些程序；二是看待動亂的性質問題。接著他就請專家們發言。專家們的發言一開始比較拘謹，後來就慢慢放開了，很多人都談了自己的真實想法，許多話都非常有啟發。

下面把這次會的主要內容按照會後整理上報的會議紀要，和筆者的記錄概述如下：

一、關於這次學生事件的性質問題。

與會人員大多認為，這次事件是一次群眾性的政治行動，它的性質只能由歷史來確定。目前匆忙定性，反而容易被動。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後，激化了矛盾，客觀效果不好。

公安部辦公廳主任王景榮認為，對性質問題，要做具體分析。從有利於控制事態發展的角度看，用法律的標準分清是非，並盡快讓社會瞭解，是十分必要的。具體分析，可以把所謂的「性質問題」分解為不同的問題來回答：如果說大多數學生的愛國熱情是好的，就應該老老實實地承認；如果說各界人士的民主要求是合理的，就應該抓緊做出反映；如果說影響國事活動是錯誤的，就應該提出批評。不做具體的分析和及時的反應，不利於學生冷靜下來，也不利於將事態逐步納入民主和法制的軌道。

政法大學校長陳光中說，倉促定性不適當。但目前學生死咬住定性問題不放，也應考慮個解決的辦法。為使局勢早些穩定下來，能否公開地明確地更正「動亂」的提法。他建議中央從這個角度快些給個統一的說法，否則，一線工作的同志很被動。

全國政協法制委員會副主任李文傑說，目前就是滿足了學生關於「性質問題」的要求，事態也不見得就能平息，因為引發事件的深層原因並沒有觸及。根本的辦法還是採取更具體、更有效、更堅決的實際行動，解決那些導致群眾不滿的問題。

二、關於遊行的法律問題。

大家談到三點意見：

第一，不能把這次遊行請願簡單地歸結為「動亂」。

人民大學法律系教授高銘軒說，4·26社論從效果檢驗，效果不佳，定性過早，引起矛盾激化，事態擴大。閻明復近日同學生對話時說，可以讓時間、歷史來檢驗，現在不作結論。這樣說問題還是沒有解決。我看，不要講動亂，法律上沒有「動亂」的概念，是政治用語。法律上有「煽動暴亂」、「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等。和平遊行，談不上動亂。憲法規定了公民集會、遊行和示威的自由，它就成為我們判定這類事件的基本依據，其他相應法規要體現這個原則。不能說符合政府意願的是遊行，不符合的就是動亂。「動亂」不是法律概念，很難用法律來衡量，在目前情況下最好不用。

第二，北京市「十條」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目前存在兩方面的法律問題：一方面，事態已突破了一般遊行、集會的性質，僅法律上尋求說法無助於事。另一方面，「十條」本身也存在一些缺陷。

高銘軒說，北京的遊行十條，實質上是禁止遊行，使人感到，遊行自由沒有得到法律保障。從國際上看，遊行不破壞法律、秩序，一般是許可的，但應登記，按規定的路線走。我們不要按過去的老觀念辦，也應當允許游，不然人家就會說你的憲法不是真的。應更多的從保護人民的權利角度來考慮。當然，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要統一。

全國人大法工委國家法室副主任陳延慶說，「十條」中的禁止性規定，直接照搬憲法51條，過於抽像，而解釋權又下放到區、縣公安機關，對申請遊行的幾乎極少批准。這同憲法的原則是相牴觸的。今後在修改時，應對允許什麼、禁止什麼作出具體規定，並由人大負責解釋。

第三，鑒於各地有關遊行的法規普遍被突破，應抓緊制定全國統一的示威遊行法。總的原則應該是，依法保護公民遊行的自

由權利，依法制裁濫用自由的行為。這也是平息事態的一個有力措施。

三、關於學生非法組織的法律問題。

與會者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很接近。歸納起來主要有三條：

第一，我國憲法規定了公民結社自由的權利，但沒有相應的結社法，現在只能靠1950年政務院頒布的《社會團體登記暫行辦法》進行管理，情況比較混亂，事實上許多未經登記的社團都在照常活動。而且，由於《暫行辦法》沒有禁止未經登記的社團成立的規定，因此說「高自聯」為非法組織的法律依據不充分。用社論的形式宣佈本身就不合法，當然也不具備法律效力。

中國法學會副會長王叔文說，我們在民主和法制問題上要接受教訓。現在是口頭上講依法辦事，實際上沒依法辦事，邏輯是，不是合法就是非法，非法就要取締。對合法和非法都要作很好研究，從實體法、程序法兩方面來研究。實體法首先是憲法。宣佈非法，首先要有實體法依據。程序法方面，首先要有專門機關裁定，社論、市學聯都沒有權宣佈合法、非法。現在造成的後果很嚴重。

中國法學會常務理事張尚（上旅下鳥）說，談民主必須和法制結合，轉變「法是管人的」這個老觀念。你現在宣佈他非法，實際是宣佈非法的人非法。你根據什麼宣佈非法？有什麼權宣佈非法？遊行法規是北京市人大定的，結社登記是政務院規定的，由他們宣佈非法，才是合法的。

第二，《暫行辦法》規定，「機關、學校、團體、部隊內部經其負責人許可組織的團體」，「不在本辦法規定登記範圍之內」。因此，各高校在這次學生事件中成立的校內組織，不受《暫行辦法》的約束，也不存在申請登記的問題。

第三，學生會章程不是法律，違反學生會章程只是違反章程，不是違法。

高銘軒說，關於自發學生組織的性質，我想不要急於宣佈為非法組織，沒有多少根據。不按學生會章程產生，並不等於非法。學生會章程並不是法，我不同意你的章程自己搞，並不非法。現在的事實婚姻，法律並不保護，但不能宣佈他非法。同樣，學生組織沒有登記，也不要急於宣佈為非法組織，但也不要說是合法，都沒有法律依據。

第四，對「非法組織」的定性必須慎重。按照有關規定，凡非法組織就要取締，凡非法組織的成員就要受到法律追究和裁。這對學生的刺激較大，參加非法組織是要寫入檔案的，那就要背一輩子包袱。比較妥善的辦法，還是在推進校園民主的過程中，將其向積極的方面引導。

四、關於穩定事態的建議。

多數與會者都談到，目前穩定人心至關重要，至少要減少其他階層的進一步介入。許多人建議中央以必要的妥協換取控制事態的主動權，用新辦法解決新矛盾。

張友漁認為，最好把有待解決的問題區分一下：目前有條件解決的，抓緊制定有效措施，盡早宣告周知；需要澄清的謠傳，通過多種渠道、多種形式讓群眾都瞭解；一時解決不了的，也要把困難講清楚。他認為，民主和法制建設是個漸進過程，需要時間，但中央要抓緊表明態度。「見怪不怪，其怪也在」，拖不是辦法。

陳光中建議，處理當前事件，一定要分清五種界限。一是絕大多數人與個別壞人的界限；二是事件中個別錯誤作法與非法行為的界限；三是遊行、示威與動亂的界限；四是批評黨和國家領導人與反革命行為的界限；五是對黨和政府某些政策的不滿與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界限。他還說，絕不能把上述問題混淆，輕易宣佈學生運動是動亂。如果說這麼多人上街遊行是無理取鬧，那我們也太不相信群眾了。對學生當然也要有批評，方式，口號，時機都有錯誤，要恰如其分的批評。號召各階層人士要冷靜，不要擴大事態，越加油，學生越冷靜不下來。我們做工作，讓學生撤，政府也要給台階。至於什麼黑手，後台，以後慢慢再說。在黑手沒有抓住以前，先不要講，沒根據的話講出來，也被動。現在各階層搖旗吶喊，不行，不能再火上澆油。現在最要緊的是中央快一點研究，行動快一點。不能完全指責學生，政府自己也有缺點，有腐敗之風。即使馬上解決不了，也要有點措施，控制事態。事態的發展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對自己的缺點不能毫無自我批評精神。

高檢研究室負責人盧泰山說，害怕事後受到處理，是這次學生做出強烈反應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建議，中央能否正式宣佈，除有打、砸、搶行為的少數壞人必須依法制裁外，今後，其他學生一律不會因參加此次事件受追究。

五、關於過渡階段的法律問題。

會上有人提出，過去黨說了算，事情簡單；將來法制完備了，很多問題由法律裁定，事情也好辦。困難的是目前這種過渡階段新舊秩序交替，既要考慮前後銜接，又要考慮保持前進方向，情況就複雜。如何處理這一階段的法律問題，需要認真研究。

有的人認為，可考慮兩條原則，一是倣傚蘇聯，凡現行法規無明文禁止的，就不能視為非法。二是對現行法規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站得住腳的，要嚴格執行；對已站不住腳而又暫無新法代替的，最好睜只眼，閉只眼，不必過於嚴格。如果對正確的法規執行的稀稀拉拉，對將來極有可能修改的法規執行得卻雷厲風行，將來會很被動。

在會上發言的人當中，多數人的意見是比較一致或比較接近的。當然，發言中也有不同意見，但大多是在具體作法方面，根本相左的意見很少。

會議從下午進行到晚上。老鮑下午4點多從海裏回來之後，就直接來到會場。他坐下後，先要陳群林、張偉等幾個坐在他旁邊的同事給他把前面已有的發言概括一下。這幾個同志就寫了一張紙遞給了他。後來在六四過後的清查中，這也被當做一個重大問題加以追查。

老鮑到會後，仔細聽了有關同志的發言，並在一些同志的發言中作了一些插話，多是提一些問題，或是作一些補充。下午休會以後，他和老周陪與會的學者專家吃了晚飯。晚上7點，會議又繼續進行。到9點時，老鮑向與會者表示了歉意之後，又匆匆去了海裏，直到次日凌晨才回來。據我所知，他是去參加政治局常委為研究當前形勢而召開的緊急會議。這邊的法學家座談會一直開到晚上10點多才結束，我們把與會者送走後，已近11點。

開完會我回到房間，老鮑在海裏沒有回來。我有些精神興奮，睡不著，就坐在沙發上看書。近1點多的時候，白慧敏來到我的房間，說老鮑把起草座談會紀要的任務交給了資料室，她和高山各起草一部分，她的那塊已交給了高山，高正在統改。過了一會兒，高山也來到我的辦公室，拿來了統過了的稿子讓我看。我看過後，提了幾點修改意見，和高山商量改過，又聊了一會天，他們才離開。這時已近3點，我便休息了。

第二天（5 月 17 日）早上我起來後，見老鮑仍在休息。小白告訴我，老鮑是凌晨 5 點多回來的，他們搞的座談會紀要稿子，老鮑已閱改過，剛才已用《政改要報》特急件形式，向「中央政治局各同志、中央軍委主席、中顧委主任、全國政協主席、參加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各同志」發出。我知道，這是趙紫陽、鮑彤，也是我們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為用和平手段緩解當前事態，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學潮問題的又一次努力。我心裏期望著這個材料能對高層領導發生影響，盡快作出能緩解事態的決策。

但，我所不知道的是，這是老鮑，也是我們室在這場學潮中所能發出的最後的聲音。就在我們召開法學家座談會的 5 月 16 日這個晚上，這場學潮的命運，趙紫陽的命運，老鮑的命運，我們研究室的命運，已經危在旦夕了。

第十四章

作一次最後的鬥爭

1989 年春夏之交的這場學潮，成為李鵬一夥進行黨內權力鬥爭的籌碼，在他們的政敵趙紫陽沒有被打倒之前，他們根本不會讓衝突緩和下來。他們極力破壞趙紫陽「在民主和法制軌道上解決學潮問題」的努力，不斷激化矛盾，推動學潮一波又一波發展向極端。

就在這個時候，5 月 15 日，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訪華。次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與他的會晤中，按照慣例談到了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的問題。李鵬一夥和他們背後的政治老人們借口這是把「動亂的責任推到鄧小平同志身上」【438】，再次向趙紫陽發動了攻擊。此時，天安門廣場上學生的絕食也到了最後的關頭。鄧小平決定調動大批軍隊，在北京全城實行戒嚴。趙紫陽以不妥協的態度，堅決反對用暴力手段對學潮進行鎮壓，終於和鄧小平分道揚鑣。在歷史的關鍵時刻，趙紫陽、鮑彤們進行了一場「最後的鬥爭」，為中共黨的歷史留下了最精彩的一筆。中國的這次由執政黨內的開明派領導和推動的政治體制改革，也由此劃上了休止符。

一、趙紫陽 5·16 見戈爾巴喬夫談話的前因後果

進入 5 月上旬，中蘇最高級會晤已日益臨近。這是 30 多年來中蘇關係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央一方面忙於處理當時的事態，另一方面也在忙於這件事。老鮑這段時間也在給紫陽準備一些材料。

5 月 15 日一早，老鮑要我找群林等幾個局級幹部到 325 小會議室開個會。因為沒有要我參加，我把人找齊後就出去了。會後老鮑告訴我，是要在小範圍內組織幾個人為紫陽起草一篇對新聞界的講話稿。

【438】《李鵬六四日記》2004 年徵求意見版，第 58 頁。

後來我瞭解到，這篇講話的起因是這樣的。幾天前，蘇聯外交部副部長羅高壽找到我駐蘇大使，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你們說戈爾巴喬夫同志和鄧小平同志的會談是中蘇兩黨的最高級會唔？據我們所知，鄧小平同志在你們黨的中央委員會已沒有任何職務。現在擔任總書記的是趙紫陽同志。應當說，蘇方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完全清楚的。但他們既然有意問，我們就應當給予回答。所以當我大使將這個問題傳回國內後，紫陽認為需要就此問題作一說明，向全黨、全國，也向全世界說明小平同志在我們黨內的重大貢獻和歷史功績，公開黨的十三屆一中全會通過的重大問題仍要向小平同志請示的決議，使黨內和蘇共方面瞭解和理解這個問題。

就在此時，又發生了另外一件事。5 月 13 日，趙紫陽同首都工人代表座談，當場有工人代表向趙紫陽提出了「為什麼政治局常委要向不是常委的鄧小平彙報」這個問題。當時趙紫陽回答：「這是十三屆一中全會的決定。是全會決定重大事情要向鄧請教，這是為了整個黨的利益。因為鄧的政治智慧、政治經驗比我們常委任何人都豐富。」當時這樣講了以後，工人們反應很好。

14 日晚上，趙紫陽找來鮑彤，要鮑給他準備一篇講話稿。他跟鮑彤說：「群眾當中有些話說得很難聽，把小平同志說成是垂簾聽政。這種說法不對，只有我們能說清楚這件事，我們要愛護小平同志的形象。我準備這兩天開一個首都新聞界和宣傳口的會議，把十三屆一中全會上那個決議的情況通報一下。學生和群眾的說法，是不清楚、不瞭解實際情況。」紫陽說：「學生不知道這個事情，是我們請求小平同志在重大問題上出來掌舵的。小平同志是一貫支持我們的。在我的記憶當中，不論常委討論什麼事情，還沒有哪一件事情小平同志是否定的。只要我們提什麼，小平同志都贊成。包括 4 月 26 日的那篇社論，也是常委向他彙報的，是李鵬向他彙報的，小平不過是同意常委的意見而已。因此，這篇社論要由我們常委來負責。」他說：「要講清楚，在幾個歷史關頭，小平同志起了多少重要作用。同時也要講清楚，學生不是要民主嗎？不是要反腐敗嗎？小平就是要民主，就是要反腐敗的。要跟學生講清楚，小平同志是最支持學生、最愛護學生的。」

5 月 15 日上午的會上，老鮑向陳群林、何家成、高山、陳小魯等詳細講了紫陽的意圖和他自己的想法，把初稿的起草工作交給了他

們。領受任務後，這幾個人迅即開始了起草工作。到 16 日下午，群林已經把稿子統了出來，晚上老鮑親自改過，準備第二天報給紫陽。

20 多年後，陳群林向筆者提供了他保存的這個講話稿。稿子開宗明義，開始就說：「這一段時間，社會上和黨內，都有一些關於小平同志的議論。有些議論，涉及我們黨的領導格局，因而也關係到黨的前途。作為總書記，我有責任就此作出鄭重的說明。」接著，稿子講了十三屆一中全會決議的來龍去脈，並從幾個方面詳細說明了鄧小平在歷史上的貢獻，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改革開放中所起的無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說明小平同志已是全黨、全國人民公認的領袖。稿子指出，鄧小平一貫支持常委的工作，4·26 社論措辭不妥的責任應該由常委會承擔，首先是我（指趙紫陽本人）的責任，「因為我是總書記，而不能加到小平同志身上。」稿子中強調，鄧小平 4·25「講話的精神實質，是要穩定不要動亂。這七個字，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沒有錯。對待小平同志對我們工作的堅決支持，正確的負責任的態度，我認為應當是通過我們的工作，使小平同志所支持的希望和意圖盡快實現，而不應當有意無意把小平同志推到第一線。這是黨的利益對我們提出的要求，也是共產黨員應有的起碼道德準則。」稿子最後說：「我例舉這些大家都知道的事實，是想再一次強調，今後，我們還將一如既往地信賴和尊重小平同志，把他的支持看成全黨、中央委員會對政治局，對常委會的支持。一切誤解小平同志的議論要澄清，一切無中生有的傳聞要制止，而一切工作中的這樣那樣的問題，責任由我們來負，問題由我們來解決。」【439】

關於這個稿子，鮑彤後來回憶說：「我寫完以後，我沒有馬上送紫陽，而是和陳小魯說：『你幫我給鄧毛毛【440】打個電話。或者我去，或者她來，我有篇東西要請她看一看。』我是想把這篇東西先徵求鄧家的意見，看這樣講是不是合適，然後再送紫陽。陳小魯跟鄧毛毛從小就熟，他們倆的家，文革前在中南海一個住在三院，一個住在四院。後來，陳小魯跟我說：『我給毛毛打電話，毛毛說這兩天忙得很，就不看了。』我只得作罷。那幾天，形勢發展很快，事情也很多，紫陽一直

【439】該文稿全文，請見本書附錄 3。
【440】即鄧小平的小女兒鄧榕，又名蕭榕，小名毛毛。

沒有抽出空來開這個新聞單位負責人會議，寫好的這個稿子就沒有用上。」

從這個稿子的內容中可以看出，趙紫陽當時確實是如他所說，想為鄧小平辦一件好事，為保護他的形象，「盡到自己應盡的一份責任」【441】的。為了讓讀者能更清楚地瞭解這個問題，筆者將此稿收入本書作為附錄。

15日那天，趙紫陽又交給鮑彤一項任務，這就是為紫陽修改同戈爾巴喬夫會談的講話稿。這個稿子，最初是由中聯部朱良【442】那裏組織起草的，紫陽看了以後，覺得有些地方不很合適，就讓鮑彤為他修改。這樣，在老鮑手裏就有兩個正在起草和修改的稿子，兩個稿子在平行作業。老鮑考慮到，紫陽對新聞界這個講話，講的時間還沒有確定，近幾天大概是用不上。而明天，也就是5月16日下午，紫陽就要見戈爾巴喬夫。按照與外國黨的領導人會談時，都要通報十三屆一中全會關於鄧小平在中國黨內地位的慣例，這次與戈爾巴喬夫的會談也應當講到這個問題，所以老鮑就把另外一個稿子中關於鄧小平在中國黨內的地位與作用的內容平移到了趙紫陽與戈爾巴喬夫會談稿中。

鮑彤後來回憶他修改這份與戈爾巴喬夫會談稿的經過時曾說：「紫陽同志在向朱良同志和我交代起草講稿時沒有講這個意思。朱良同志送來的中聯部的原稿上也沒有這個內容，他們的原稿中只有一句話：兩黨領導人的會晤意味著兩黨關係的自然恢復。我認為，紫陽同志應講得具體一些，使戈理解這裏所說的兩黨領導人是專指小平同志和戈，而不是趙和戈，所以加了這一段話。(當時還有一個巧合：紫陽同志為了澄清當時社會上一部分人中關於小平同志的流言，準備召集首都各大新聞單位負責人開會專門講一講，其中內容之一就是十三屆一中全會一致認為重大問題上必須向小平同志請教，請小平同志掌舵。這根本不是什麼『違反組織原則』，相反，如果不這樣做才是真正違反了一中全會的決定。這兩個講稿，當時都在我手頭上平行作業，我就很自然地把這些內容移植到與戈會談稿中去了)。當時的情況和動機確實如此，後來引起的影響則完全是我始料不及的。」【443】

【441】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67頁。
【442】朱良，時任中共中央聯絡部部長。
【443】鮑彤：〈六四密件——在學潮和動亂期間言行的交代〉，載香港《信報》，2003年4月21日。請見本書附錄4。

15日那天，老鮑一白天都在勤政殿辦公室修改這個稿子。晚上6點多的時候，老鮑從海裏回來，把經過紫陽審閱同意的會見戈爾巴喬夫的談話提綱交給我，要我趕緊去複印幾份。老鮑在其中的幾份上批了幾行字，然後要我封好其中的兩份，一份送新華社，一份送人民日報社。人民日報那份，我坐老鮑的車，親自送到當時的人民日報社長錢李仁家裏。當我回到廠橋的辦公室時，已經是晚上9點多了。

我回到房間，坐下來仔細看了留下存檔的那份紫陽明日見戈爾巴喬夫的談話稿。稿子全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講的是鄧小平在我們黨內的地位和十三屆一中全會關於這個問題的決定；第二部分是對改革的看法和介紹我國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經驗教訓；第三部分是對當前國內事態的看法，其中的主要觀點，和紫陽的5•4亞行講話精神基本一致。全文大概有兩、三千字的樣子。

5月16日上午，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同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進行了兩個半小時的「結束過去，開闢未來」的會晤。下午5點，是趙紫陽總書記同戈爾巴喬夫總書記會談。

這個上午，我們室是在籌備法學家座談會的緊張中渡過的。下午這個會開始時，老鮑不在，去了海裏，我想大概是在紫陽見戈爾巴喬夫之前，就談話內容和紫陽再商量一下。4點多，老鮑從中南海回來，參加了座談會。

晚6點多，我接到了中聯部部長朱良給老鮑打來的一個電話，他要我轉告老鮑，由於時間的關係，剛才紫陽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講稿沒有講完，第三部分（即關於當前事態的看法部分）沒有講。經請示紫陽同志，第三部分就不公開發表了。我立即將此話轉告了老鮑，老鮑沒有說什麼。7點整，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播出了上午小平會見戈爾巴喬夫的新聞，和下午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的談話。

電台和電視台播出和次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基本是老鮑事先準備好的原稿，只是刪去了紫陽沒有講的第三部分。關於小平在黨內作用的一段，是這樣的。趙紫陽對戈爾巴喬夫說：「經過中蘇雙方的共同努力，今天上午實現了你同鄧小平同志的會談。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同志一直是國內外公認的我們黨的領袖。在前年召開的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根據鄧小平同志本人的意願，他從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常委的崗位上退下來了。但是，全黨同

志都認為，從黨的事業出發，我們黨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經驗，這對我們黨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作出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鄧小平同志也總是全力支持我們的工作，支持我們集體作出的決策。這次高級會晤，也就意味著中蘇兩黨關係的自然恢復。」【444】

就是這段話，在第二天和以後所引起的嚴重後果，無論是講話者本人，還是它的起草者，以及我們這些工作人員都沒有想到的。就在紫陽的講話播出之後，社會上對小平的不滿和針對小平的口號大量增加；而且高層馬上就有人到小平那裏，大進讒言，並立即發生了作用。趙紫陽在回憶錄中說：鄧小平「對我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恐怕不止是惱怒，而是真正傷了他的感情。『六四』後他在接見李政道【445】教授時說過，趙在學生動亂時把他搬了出來，實際上是講我把鄧拋了出來，社會上也有這種看法。我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談了有關鄧在我國我黨的地位。這番話完全是要維護鄧，結果引起大誤會，認為我是推卸責任，關鍵時把他拋出來。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446】

現在回過頭來看，在這個時機，這個場合來講這段話，確實是趙紫陽的一個重大失誤。第一，廣場上學生的絕食已進入關鍵階段，社會上群情激憤，各界聲援不斷。群眾對當局的不滿，對老人政治的不滿，特別是對小平的不滿，已經公開化。這時來講鄧小平在黨內的最後決策人的地位，馬上就會使人聯想到4·25小平給動亂定的性，從而在客觀上起到使群眾的不滿集中於鄧小平的作用。第二，常委會內紫陽的對手李鵬一夥們，當然也包括那些保守的政治老人們，早已對趙紫陽極為不滿，正在尋找機會和借口離間鄧小平與趙紫陽的關係，這個講話，和外界對講話的反映，恰好給他們提供了口實。

事情的發展正是如此。這段話，後來被李鵬一夥和他們背後的政治老人們抓住，說成是「趙紫陽有意把動亂的矛頭引向鄧小平同志」。一些境外報刊也就此評論說，這段話表明趙紫陽已與鄧小平決裂。其實，這些說法都屬無稽之談。如果說，這段話當時在客觀效果上，在

【444】見《人民日報》，1989年5月17日第一版。

【445】李政道（1926-）：Tsung-Dao Lee，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美籍華裔物理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446】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65頁。

一部分群眾當中，確實引起了誤解，這是事實。但說紫陽是「有意」把動亂矛頭引向鄧小平，或是與鄧小平「決裂」，則完不是趙紫陽及鮑彤的初衷。

第一，趙紫陽和老鮑當時準備講這段話的出發點，前面已講過，是為了向蘇方和我們黨內作一說明，回答蘇聯黨和國內黨員群眾中對鄧小平在黨內地位的誤解。就在 5 月下旬的那幾天，老鮑在和我聊天時，就這個問題曾經有個解釋，他說：「前幾天蘇方曾有人專門詢問過為什麼說戈爾巴喬夫同小平同志的會見是最高級會晤，我們國內黨內也有人在此問題上有疑問。再加上前些天小平的 4·25 講話傳達之後，黨內有人對小平出來給動亂定性有意見，認為要定性也應由中央政治局來定。所以紫陽決定要講一講小平在我們黨內的地位問題。這個意思本來準備在我們正在起草的紫陽對新聞界的講話中講，但是後來看不一定能安排時機講了，只好放在與戈爾巴喬夫的談話中來講。」

第二，向「兄弟黨」領導人通報十三屆一中全會關於鄧小平在中共黨內地位的那個決議，從十三大以來已經形成慣例。就在不久前趙紫陽訪朝，也曾經向金日成通報過，這次與戈爾巴喬夫會談自然也不例外。而且，向戈爾巴喬夫說明鄧小平在中共黨內的地位，這也是鄧小平本人的意思。趙紫陽在回憶錄中記載，「在我會見戈的前兩天，5 月 13 日我在鄧家裏談戈氏來訪的有關問題時，鄧說了一句話，說他和戈會晤後，兩黨的關係就恢復了。這和原來外交部的方案不同。我非常注意鄧的這句話。正因為上述這些考慮，在戈鄧會晤後，我同戈爾巴喬夫會見的一開頭就說，他與鄧的會見，兩黨的關係就恢復了。他同鄧的會見是他這次來訪的高潮。接著很自然地我就講了鄧在我黨的地位以及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的決定。」【447】

鮑彤後來說：「對趙紫陽為什麼要對戈爾巴喬夫講這麼一段話，李鵬、楊尚昆、薄一波都是清楚的，鄧小平更是清楚的，這是紫陽見兄弟黨領導人時的慣例，而這個慣例形成的始作俑者，十三屆一中全會那個決議的授意者，正是鄧小平自己【448】。後來當有人在鄧的面前說，趙紫陽這樣講，是把鄧小平拋了出來時，這些人，包括鄧小平自己，卻裝聾作啞，齊聲附合，如果不是記憶力不佳，那就一定是想以此作

【447】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67 頁。
【448】參見本書第八章《十三大報告與中共十三大》，第七節《秘密決議：最後決策人》。

為搞倒趙紫陽的欲加之罪！要說『拋出來』，那 4 月 25 日晚上，李鵬決定把小平關於動亂的談話立即傳達到全國，讓全黨全國都知道，給動亂定性的是鄧小平，這就不算『把小平拋出來』嗎？你李鵬又把小平置於何地？因此，這樣說，是根本不講邏輯、不講道理的！」

第三，從趙紫陽與戈爾巴喬夫會見當時的情況看，講這段話也有必要。鮑彤後來回憶說：「5 月 16 日中午，我特地打電話問中聯部的同志，上午小平同志與戈爾巴喬夫談話的時候，有沒有談到兩黨關係正常化的問題？對方說講了，我問怎麼講的，他說小平同志講，兩黨領導人的會見，就意味著中蘇兩黨關係的正常化。我感到，這個話可能引起戈爾巴喬夫的誤解。因為按照正常理解，下午趙紫陽要會見戈爾巴喬夫，從職務上說，兩個人分別是兩黨的總書記，兩個人見面，那麼就是關係正常化了。我想，這樣不行。一定要請紫陽講清楚，小平才是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十三大小平同志雖然下來了，但是他在黨內地位不變，因此你上午跟小平同志會見，才意味著兩黨關係正常化。講，是對小平的尊重，這話你總不能讓小平自己去講吧？這種話紫陽過去見其他兄弟黨領導人每次都講，外交部、中聯部的同志都清楚。如果這次見蘇聯黨領導人卻不講，這從小平的角度來看，就是個大問題了。所以，紫陽必須講，也不得不講。如果不講就是他趙紫陽失職，如果不講，有人將來翻起老帳來，那就會成為趙的一大罪狀。」

事實也證明鮑彤有先見之明。當日下午的紫陽見戈爾巴喬夫的會見一開始，戈就對紫陽說，我們兩黨總書記的會見，說明我們兩黨關係實現了正常化，這是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對戈爾巴喬夫這樣講，趙紫陽是不能不加以鄭重說明的，否則就有「僭越」之嫌。他立即回答，你今天上午同鄧小平同志的會晤，是最高級會晤，標誌著中蘇兩黨關係的恢復。接著，他用老鮑給他準備好的講稿講了下去。很明顯，戈爾巴喬夫在這裏是有意提出這個問題的。鄧小平在中共黨內的地位和作用，戈不是不知道，但他既然仍要這麼問，就說明他和整個蘇共黨內高層對這個問題是有想法的，紫陽完全有必要就這個問題向蘇方解釋清楚。

第四，從趙紫陽的處境看，他這時最需要的，是鄧小平的支持，根本不可能想把鄧小平「拋出來」，引起鄧小平的不滿，更別說與鄧小平「決裂」。5 月 16 日的時候，廣場上學生絕食的事態發展已經極為嚴

重，黨內兩種對學潮處理方式的鬥爭相持不下。趙紫陽在常委會內並沒有取得多數支持。他如果要繼續堅持自己對事態的處理意見，並維護自己的地位，就必須取得小平的支持。特別是這時趙紫陽已經下決心在常委會上提出修改4·26社論的問題，沒有鄧的支持就更難做到。這段時間來，他和老鮑，當然也包括我們，都在為爭取鄧的支持進行著努力。讀者如果能仔細讀一讀前面談到老鮑同時正在為紫陽起草的對新聞界的講話稿，可能會更加清楚地理解這一點。說趙紫陽「有意把動亂矛頭引向小平同志」，完全是誣陷。

鮑彤後來說：「一直到最後，從紫陽的主觀願望說，他是要維護鄧小平的，準備替鄧小平做一件好事。紫陽是這麼想的，我腦子裏也是這麼想的。後來有人說，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是把小平同志拋了出來，是要篡黨奪權，把小平推到了第一線。這絕不是紫陽的初衷，也是我始料未及的。用笨腦子都可以想得明白，趙紫陽當時在中央的工作，需要鄧小平的支持，而且也確實得到了鄧小平的支持。去朝鮮前，鄧小平已經明確講了，趙訪朝回來，就要把軍委主席的職務交給趙紫陽。在這種情況下，主動與鄧小平交惡，對趙紫陽個人，對趙所擔負的中央總書記的工作，對趙所主張的用民主和法制的辦法和平解決當時的複雜局面，有什麼好處？根本說不通的嘛。」

鮑彤還說：「說實話，我在紫陽講話稿上加上那段後來引起軒然大波的話時，當時並沒有想到會引來鄧家那麼大的反應，也並沒有想到，這件事後來會成為鄧、趙『交惡』的導火線。」現在回想起來，雖說當時向「兄弟黨」領導人通報十三屆一中全會關於鄧小平在中共黨內地位的那個決議已成慣例，這次向戈爾巴喬夫這樣講也有必要，問題是出在公開上，一是全文公開，二是公開時機不對。趙紫陽的本意是想以此貫徹中共十三大提出的「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的原則，在這種形勢下卻引出事與願違的結果，不能不說是一場歷史的「誤會」。當然，從當時情況看，鄧小平早已經對趙紫陽處理學潮的方針產生了不滿【449】，即便

【449】《李鵬六四日記》5月11日中記載:「上午，鄧小平同志的秘書王瑞林給我來電話，傳達小平同志的意見。小平同志說：沒有4月26日社論，就沒有今天形勢的緩和，要李鵬堅決頂住來自內外的壓力。王瑞林和先念同志的秘書徐桂寶、陳雲同志的秘書許永躍都列席了昨天政治局會議。黨內最有威望的小平、陳雲以及先念同志是瞭解昨天政治局會議情況的。喬石同志在昨天會上還說，趙紫陽曾經對他講過，趙去向小平同志匯報，趙講什麼意見，小平同志都支持。王瑞林

沒有趙會見戈爾巴喬夫講的這番話，鄧與趙在處理學潮問題上的原則分歧也遲早會暴露出來，攤牌是難免的，必然的。

二、歷史的「誤會」

5 月 16 日，是形勢越來越危急的一天。

廣場上學生的絕食已進入第四天，絕食者當中，已有 600 人次暈倒。凌晨 1 時許，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對廣場上的學生發表廣播講話，指出，當前，中蘇高級會晤已經開始。希望同學們以大局為重，不要做有損於國家尊嚴和利益的事情。講話勸學生們盡快返回學校。下午，首都新聞界、科技界、教育界、文藝界、醫務界、企業界及民盟等一些單位的人員遊行到廣場聲援學生。當天，參加遊行者已達 10 多萬人次。

傍晚 5 點 40 分，就在趙紫陽開始會見戈爾巴喬夫的時候，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統戰部長閻明復來到天安門廣場與學生「對話」，向絕食的學生發表了一篇極為感人的講話，這段話，後來成為閻明復因「在動亂中犯有嚴重錯誤」而被免職的主要證據之一。他對學生們說：「你們沒有權利這樣自我摧殘，未來是你們的，改革要你們進行下去，你們沒有權利這樣用自己的生命來換取你們要求的達到。」「你們要愛護自己，等待正義的裁判的這一天就要來到了。我請求你們，我可以和你們一起靜坐，請求你們能夠愛惜自己，要為國家保存我們這些力量，保存你們自己。不是為了你們自己，甚至不是為了你們的家長，而是為了我們的國家。你們的精神已經感動了全國，你們以自己英勇的行為證明了你們的決心。我相信，包括我們中共中央，包括人大常委會，一定會很快地對整個局勢作出全面、公正的判斷。希望同學們在這幾天內，不要用自己的生命作為代價。」在講話過程中，閻明復幾次哽咽，讓學生十分感動。

在本書寫作過程中，筆者訪問了已經 81 歲的閻明復老先生。在談到這次與學生對話的情況時，閻老告訴筆者，當時中辦在安排出面對話的時候，連續找了 5 位中央領導，包括負責「中央制止動亂小組」

今天的電話證明，趙講的並不準確，並非事事如此，小平同志是講原則的人，顯然對趙紫陽昨天講的四條意見有保留。趙紫陽想利用人大常委會把當前的『動亂』淡化為『學潮』，小平同志也是不同意的。」這段話表明，鄧小平在 5 月 11 日前後，就已經傳達出對趙紫陽「轉彎子」主張的不滿。見該書 2004 年徵求意見版，第 82 頁。

工作的喬石，也許是考慮到出面對話的政治風險，這幾位都不願意去。李鵬打電話給閻明復，說，你們統戰部離天安門廣場近，你去和學生對一下話吧。閻明復此時對學生絕食的情況十分焦急，就立即答應了下來。閻老對筆者說：「我知道去是有風險的，很可能我會因此而下台，但我別無選擇。到現在對這件事，我不後悔！」

當天晚上 10 點，政治局常委召開緊急會議，研究當前事態。按慣例，中央常委政治秘書鮑彤應該列席中央常委會，但不知道為什麼這次會議的名單上卻沒有他的名字。就在這次會議上，趙紫陽第一次正式提出修改 4・26 社論定性的問題。趙紫陽的回憶錄在談到這次會議時說：「學生絕食，最為強烈的要求是改變 4・26 社論對學潮的定性。我感覺這個問題已經到了沒辦法繞開的時候了。這個結子不解開，沒有辦法使學生停止絕食，開展對話。而如果學生絕食的情況拖延下去，將會發生極為嚴重甚至無法預計的後果。因此我第一次在政治局常委的會議上，正式提出了修改 4・26 社論定性的問題。李鵬當即表示反對，他說 4・26 社論的定性是按鄧的原話寫的，不能動。我反駁他說，4・26 社論是按 4 月 24 日常委會紀要的調子寫的，鄧只是支持了常委的意見。尚昆表示提出修改 4・26 社論將傷害小平。我說可以想辦法做到不傷害他，這件事應當由常委集體承擔。我還說，我去朝鮮時曾發電報同意鄧的決策，所以我對 4・26 社論要負責，必要時，也可以說是由我批准的。李鵬竟然說，你這不是政治家的態度。因而修改 4・26 社論沒有談得下去。」【450】

應當說，公開向學生承認，4・26 社論的對學潮的定性有錯誤，並為此承擔責任，這是趙紫陽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為挽救大局而提出的一個不是辦法的辦法，表現了他作為一個政治家的胸懷。但到這時，在常委會內部，由於李鵬、姚依林持堅決反對的立場，已根本難以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看來只有訴諸於最後仲裁人，請鄧小平來作最後的表態了。趙紫陽無奈，決定，明日向鄧小平彙報。

第二天（17 日）上午一上班，我辦公室的電話就響個不停，都是中央一些單位的領導以及我的朋友們打來的，和我說了不少社會上對紫陽昨日會見戈爾巴喬夫談話的反映，告訴我，現在「打倒鄧小平」「反對垂簾聽政」的口號滿大街，還有人說什麼「趙紫陽要和鄧小平劃

【450】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46-47 頁。

清界限」，等等，大家都在為此著急。我急於把這些信息反映給老鮑，可這時，老鮑早上6點剛剛休息，又不忍打擾他。熬到了中午，11點多時老鮑起來和我一起下樓吃飯，我才找到機會把情況告訴了他。老鮑聽到我的話，一楞，停在了樓梯口，過了一會，對我說：「如果情況是這樣，那這個事情應該由我負責！」

12點左右，我吃過午飯上樓來，看到老鮑正在和閻軍、陳小魯說話。後來閻軍告訴我，是老鮑要她和小魯給鄧小平的小女兒鄧榕打個電話，老鮑想和她談幾句話。我立即明白了老鮑的用意。閻軍原是法制日報的記者，和鄧榕很熟悉。一定是剛才小魯和閻軍把外面傳說的情況向老鮑作了彙報，老鮑很著急，是想通過鄧榕做一做她們家老爺子的工作，向小平把昨天紫陽見戈爾巴喬夫講話的本意解釋一下，以免發生誤解，造成嚴重的後果。

電話是在閻軍的房間打的。打通以後，肖榕正在家裏。閻軍和她打過招呼後說，老鮑想和她談幾句。肖榕回答說：「請你轉告鮑彤同志，現在已沒有必要再談什麼了。」並說，「我們家老頭子已經作好了第四次被打倒的準備。」她說這話時，語氣顯得十分激動，並放下了電話。顯然，她和她的全家，當然，特別是鄧小平本人對紫陽昨日的講話發生了嚴重的誤解，這樣，情況就十分嚴重了。

閻軍和小魯向老鮑彙報了這個情況，閻軍並說，剛才打電話時，老鮑當時在場就好了，可以直接同肖榕講幾句話。老鮑面色平靜的說，「既然是這樣，那就算了，謝謝你們。」

閻軍和小魯一塊來到我的房間（在老鮑隔壁），又議論了一會兒情況，覺得如果鄧榕能把老鮑的解釋帶給小平，也許會避免或減少小平的誤解。但是看來這條路是走不通了。我們幾個人都覺得情況十分嚴峻。估計在昨天晚上或今天上午，肯定有人到了小平那裏，把紫陽的講話向小平作了歪曲的彙報，並把群眾對小平的不滿情緒作了大肆渲染，使小平覺得紫陽在這種關鍵時刻把他推到了前面，甚至會認為是紫陽把他出賣了。這時，如果小平對常委內部的爭論表態的話，就會對紫陽很不利了。

很明顯，在中國政治的現實情況下，在這個時候，趙紫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小平的支持，我們正在準備的紫陽對新聞界的講話，和紫陽對戈爾巴喬夫的這個談話都是為了爭取和加強這種支持。

但是，時機選擇的失誤，和紫陽的政敵們對這一失誤的利用，很可能使這種支持已經失去了。

後來聽老鮑說，就在5月17日上午一上班，趙紫陽就接到鄧小平的女兒鄧楠的電話，鄧楠在電話中大罵，說趙紫陽你不講良心！我們家老頭子對你的工作從來都是很支持的，你怎麼能這樣做！說完就撂了電話。紫陽當時對外面的反應還並不十分瞭解，對鄧楠這個電話，並沒有看得很嚴重。但很快，形勢就急轉直下。

三、鮑彤的「告別演說」

5月17日凌晨，以「趙紫陽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義公開發表了一個書面談話。這個談話是當日凌晨剛結束的政治局常委緊急會議的一個結果。稿子是由中辦代擬的。講話的主旨是呼籲學生停止絕食。針對廣場上絕食學生否定4·26社論對學潮定性的要求，講話中說了一段似是而非的話，「同學們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對腐敗、推進改革的愛國熱情是非常可貴的，黨中央和國務院是肯定的」。表面上看，這裏講了「肯定」的話，但這裏肯定的，是學生的「愛國熱情」，而非學潮本身，說明當局的立場沒有任何改變。但是，講話仍再次重複了趙紫陽5·4亞行講話中提出的「八字真言」:「希望同學們能夠保持冷靜、理智、克制、秩序，顧全大局，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表示「中央對大家提出的合理意見和要求非常重視，我們將進一步研究同學們和社會各界的意見和要求，提出和採取加強民主和法制建設，反對腐敗，推進廉政建設，增加透明度等實際措施」，並且向學生們保證，「黨和政府絕不會『秋後算帳’」。

這個講話，因沒有實際回答絕食學生提出「改變對學潮的定性、立即與學生進行對話」的要求，因而沒有發生任何效果，學生的絕食沒有停止。

到17日，學生的絕食已經進入第五天。陸續加入絕食的學生已達2,000餘人。社會各界憂心如焚，對於政府高層領導仍不出面同學生對話，答覆學生提出的要求，產生了強烈的不滿情緒。繼昨日10餘萬人遊行之後，從17日上午起，首都再次爆發了有近百萬人參加的大規模各界群眾自發遊行，聲援學生。在聲援隊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央宣傳部、中央統戰部、中央組織部、中央黨校等單位的大旗，許多中

央機關的幹部，衝破了禁令，也組織了遊行隊伍。他們所到之處，都響起一片掌聲。由此可見北京市民的民心所向。遊行隊伍中，要求鄧小平辭職、結束老人政治方面的口號有明顯增加。

當日，嚴家其、包遵信等人聯名發表了一篇《5・17 宣言》，提出「老人政治必須結束，獨裁者必須辭職」；北京大學百名教師簽名發表《致鄧小平的公開信》，要求鄧小平「公開承認：4・25 講話以及 4・26 人民日報社論的重大失誤，以緩解當前的局勢」。

當天，全國除北京以外，還有 27 個城市的 170 多所高校、近 30 萬學生上街聲援北京學生。特別讓學生感到鼓舞的，是歷來和共產黨用一個聲音講話的民主黨派也有所行動。除有各黨派的許多工作人員上街遊行聲援以外，民盟主席費孝通、民主建國會主席孫起孟、民主促進會主席雷潔瓊、九三學社主席周培源等四位民主黨派的領導人致函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認為「學生的行動是愛國運動」，「建議中共中央、國務院的主要領導人盡快會見學生，進行對話。」次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他們的呼籲書，在各界引起了重大反響。

與此同時，共青團中央、全國青聯、全國學聯和全國婦聯等機關、團體、學校也發出呼籲。有的呼籲學生停止絕食，有的呼籲黨和政府主要負責人盡快與學生對話，也有的要求中央否定對「動亂」的定性。

就在這天下午 4 點，高層內部的鬥爭也到了最後時刻。

趙紫陽在回憶錄中記述說：「17 日，我就打電話要求見鄧。隨後，鄧辦就通知我下午到鄧處開會，常委和尚昆都到（當時萬里出國了，他每次列席常委會）。我本來是要求見鄧個別面談的，鄧決定到他家開常委會，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我在會上先講了我的意見。大意是：現在學潮在發展，形勢在惡化，十分嚴重。學生、教師、記者、科研人員、機關幹部都有不少人上了街，今天估計有三四十萬人，工人農民有不少人同情，所以如此，除了腐敗、透明度等熱點問題之外，主要是各界責備黨和政府對學生絕食為何麻木不仁，見死不救。而同學生對話主要卡在 4・26 社論定性上。4・26 社論引起這麼多人誤解，一直對立，總有說不清楚或不正確之處。現在唯一能夠立即見效的，就是必須對社論定性鬆一下口。這是關鍵，可以贏得社會同情。我們給學生脫了帽子，就比較主動了。如果絕食拖下去，死了人，勢

必火上加油。如果採取和群眾對立的措施，很可能有全局失控的現實危險。在我陳述我意見的過程中，鄧的表情很不耐煩，不以為然。我一講完，李鵬、姚依林立即站起來批我，把學潮升級的責任全部歸結為我5月4日在亞銀的講話。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們指責我在亞銀的講話。過去他們實質上反對，但是沒有這樣公開說過，其激烈程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從兩人對我毫無顧忌的攻擊，可以看出他們事先與鄧之間已經有了默契。胡啟立當時發言主張修改社論。喬石沒有明確表態。尚昆不贊成修改社論，並且在這個問題上起了不好的作用。他說廖漢生主張戒嚴，是不是可以考慮戒嚴？本來尚昆一直是反對戒嚴的，這時他轉述廖漢生【451】的主張，實際上他改變了主意。最後鄧拍板說：事態的發展更加證明4·26社論定性的正確。學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問題出在黨內，出在趙的「五四」亞銀講話上。現在不能再退了，否則不可收拾。決定調軍隊進京，實行戒嚴。並且指定由李鵬、楊尚昆、喬石組成三人小組，負責實施。鄧講完後，我就表示：有個決策當然比沒有決策好，但我非常擔心它將帶來嚴重後果。我作為總書記，組織執行這一決策很難得力。鄧說，如果這個決策錯了，由大家共同負責。李鵬在會上還提出，常委會議經常有人把內容洩漏出去，內部有壞人，鮑彤就是一個。我就反問他：你這樣講要負責任，你有什麼根據？他說：我有根據，以後告訴你。」【452】

就這樣，在這個「常委會」上，由不是常委的鄧小平拍板，總書記趙紫陽用民主和法制的手段和平解決學潮的主張被否決，而採取軍事手段進行戒嚴的主張成了「多數決議」。

這個下午，我們室裏也出現了頗為緊張的氣氛。知道一些內情的同志，心頭都籠罩著一層陰影，預感到有什麼重大的事情要發生。更多的同志則是為廣場上絕食的學生們，為高層領導遲遲不出來同學生們進行對話而憤慨、而焦急。

下午3點多鐘，老鮑還在休息（當天下午的這次非同尋常的政治局常委會也沒有按慣例通知擔任常委政治秘書的鮑彤參加）。我和室裏的許多同志聚集在秘書長陳群林的房間，七嘴八舌的議論著外面的形勢，議論著中央機關有多少個單位也上街遊行了。小白等幾個同志十

【451】廖漢生（1911-2006）：湖南桑植人。解放軍將領；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452】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47-48頁。

分激動，讓群林向老鮑反映，要求中央領導趕緊出來和學生對話。有人借開玩笑的口吻但實際上是認真地說，中央領導再不出來，我們也要上街遊行了。大家正在說著，老鮑拿著文件包從他的房間出來，路過群林房間門口，見大家都聚集在這裏，就走了進來。一些同志重複了剛才的意見，請老鮑轉達。老鮑這時很嚴肅地說，這種意見早已反映過了，而且紫陽也瞭解外面的情況，能採取措施的話早就採取了。現在紫陽的壓力很大，我們不能再給他增加負擔了。老鮑這一番話，說得大家默默無言。我們幾個稍稍瞭解一點內情同志，心頭更是沉重。

晚飯後，很多同志因外面的情況很緊張，自覺的沒有回家。大家聚 316 值班室，天南海北的議論著。老鮑也坐在那裏，和大家一起聊天。他講起了 40 年前他剛剛入黨，參加上海學運迎接解放時的情景，和他這幾十年的風風雨雨。現在回想起來，看來老鮑說這些話時，已經對形勢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的判斷：決定命運的時刻臨近了。

大約晚上 7 點鐘多鐘的時候，值班室的紅機子（保密電話機）響了，是紫陽秘書李樹橋找老鮑的。老鮑接過電話，聽了一會兒，說，我馬上就去。說完放下電話，看了看我，就急匆匆地走了。

過了有半個小時左右，我已回到房間，正在看什麼材料，當晚值班的王紹賢來找我，說老鮑給值班室打來電話，要我通知大家待命。因當晚也有一些同志回家了，我當即和紹賢說，今晚你值班，那就請你打電話給幾位已經回家的局長，請他們立即來室裏。過了不多久，一些接到電話的同志就趕來了。

約有 9 點鐘的樣子，老鮑從海裏回來了。他臉上十分嚴肅，見到迎在門口的我，沒有說什麼，匆匆進了他的辦公室，就關上了門。我還很納悶，不是要我們待命麼，怎麼什麼也沒有佈置呢？過了半個多小時，老鮑又匆匆地走了。

夜裏 10 點多鐘，老鮑再次回到了廠橋。一進門，他就要我立即把在機關的人員找到 325 小會議室。我馬上照辦了。大家陸續來到，老鮑也很快地來了。大家都圍坐在四周的沙發上。

老鮑沉默著，有一會兒沒有講話。見此情景，大家也都沒有說話，似乎都感覺到有什麼大事情發生了。

過了一會兒，老鮑開了口。他說，中國明朝有一位著名的愛國詩人和民族英雄，叫作于謙。他有一首詩，詩名《詠石灰》。接著，他便吟頌起這首詩來：

千錘萬鑿出深山，
烈火焚燒若等閒。
粉身碎骨渾不怕，
願留清白在人間。

這是一首我很小的時候就能背下來的詩，大家對它也很熟悉。它表現了詩人的寧折不彎的崢崢傲骨和崇高的民族氣節，成為幾百年來鼓舞無數仁人志士為理想而鬥爭的絕唱。現在，老鮑向我們吟頌這首詩，詩沒有吟完，大家似乎都已明白了老鮑的用意。

老鮑接著說，在我們國家的歷史上，不知道有多少民族的精英為國為民，滿腔熱血，赤膽忠心，但生前卻因遭人陷害，或被人誤解而含冤受屈。但是，歷史終究會對他們作出公正的評價。人民也不會忘記他們。

在說這些話時，老鮑的情緒十分激動。接下來，他說，從明天起，我就不再主持室裏的工作了。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和大家談話了。兩年多來和大家在一起工作，大家給了我許多支持，能和你們在一起工作，我感到很高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這是咱們國家非幹不可的一件大事。我為能夠和大家一起為這項事業做了點貢獻而高興。不管今後的情況如何，不管我還能不能和大家一起做這件工作，我都衷心地希望大家能克服一切困難，把這項事業進行下去。

老鮑說：有人說我是壞人，洩露了黨和國家的機密。你們大家可以證明，建室以來，我每次和大家傳達的各種會議精神，都是與我們的工作有關的和必需的。我沒有向任何無關的人洩露過任何機密。我傳達的，由我來負責，但你們傳出去的，要由你們來負責。我可以問心無愧地說，我不是壞人，我所從事的，是黨的工作。

聽了老鮑這一席話，我，我們大家都能想得到，紫陽的命運，老鮑的命運，也許還有我們這些人的命運將會是什麼。我忍不住熱淚盈眶。一方面，我是為我們這個黨、我們這個國家、我們的人民的前途而難過，為廣場上、大街上的學生和群眾安全而憂慮，也為最高決策

者在 20 世紀 80 年代的今天，在改革開放進行了 10 年之後，竟然會作出如此愚蠢的選擇而憤怒。

另一方面，我是為老鮑不平。從開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到現在這兩年多來，我始終在他的身邊工作，是這段時間的最好見證人。他沒日沒夜的工作，真可以說是廢寢忘食，嘔心瀝血，從許多中央重大會議文件的起草，到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的制定；從參加政治局、常委會的各種會議，到室裏日常工作的主持，老鮑為這個黨，為這個國家作了多少工作，付出了多少心血，我心裏有數，他應受到黨和國家的獎賞，而不該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對待，他是個非常好的人，根本不是什麼「壞人」!

老鮑講的情況，使在座的其他同志激動起來。儘管我們中的一些人已經預感到可能發生的事情，但是它一旦真的發生了，大家仍感到十分震驚，十分氣憤。一時間，大家七嘴八舌，議論紛紛。這時，有人問到一些具體情況，老鮑沉默著，對這些具體問題都沒有回答。

最後，老鮑又說，關於我的工作問題，中央會有正式通知的。現在我還是主任，你們還要聽我的。我希望同志們冷靜，守紀律，不要衝動，千萬不能惹事。給我惹事事小，給紫陽同志惹事事大。我和紫陽同志的關係，同志們都知道。我做事歷來最怕給紫陽同志添麻煩。王昌齡也有兩句詩:「曾為大粱客，不負信陵恩。」你們如果給紫陽同志惹出事來，我擔當不起。結束時，他向幾年來和他一起工作、戰鬥的同志們，向幾年來對他的工作給以大力支持的同志們表示深切的謝意，並和在場的同志一一握手，以示惜別之情。

鮑彤後來在秦城監獄中所寫的「交代」中是這樣談到他開這個會時的心情的:「當天晚上 (5 月 17 日)，我離開中南海後就回辦公室。一路上心情非常沉重。一是關於紫陽同志。他受了批評，辭職了，我非常惋惜，我認為他是一位很好的領導者。二是關於我自已。紫陽同志叫我寫辭職信時，叮囑我要注意保密，我說，我很注意。他說，有人對我說，你嘴巴不嚴，已經洩密了。我十分委屈，說，這準是李鵬同志說的，那是因為他對我的印象不好，其實我從來沒有洩過密。紫陽說，我問了李鵬同志了，有沒有根據，他說有根據，現在不說，以後再說。(我之所以說李鵬同志對我印象不好，也是出於我自已的猜測，因為最近已有 4 月 24 日晚和 5 月 16 日晚兩次常委會不讓我列席，

而第一次正是紫陽同志訪朝期間，由李鵬同志主持常委工作。）我當時的想法是：紫陽辭職我也辭職，這毫無問題；但如果說我洩密而對我處理，弄得不清不白，不乾不淨，是我無法接受的。我當時心情非常沉重，也非常激動，覺得心裏有話，不吐不快。」【453】這樣，才有了所謂「鮑彤發表告別演說」的一幕。

後來在六四之後的6月30日，國務委員、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了一個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暴亂的報告，把這件事作為趙紫陽、鮑彤「洩露機密、支持動亂」的一個「證據」。現把這段話引述如下：「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了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問題，極少數掌握黨的國家核心機密的人，出於反革命的政治需要，當天就洩露了戒嚴的機密。……17日晚，鮑彤召集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部分人員，在洩露了即將戒嚴的機密之後，發表了『告別演說』，警告與會者不得把會上密謀策劃的情況透露給別人，否則就是『叛徒』，就是『猶大』。」

在《李鵬六四日記》中，也提到了這次所謂鮑彤的「告別會議」。他在5月17、18日的日記中說：「趙紫陽在以後的檢查中，以及以後鮑彤在法庭的辯詞中，都矢口否認趙紫陽向鮑透露過『戒嚴』，而鮑彤也極力否認，說他不知道『戒嚴』的決策。其實，就在晚上的常委會進行之時，鮑彤也在政治改革辦公室召開了一個有13人參加的告別會議。曾經參加此次會議的顧雲昌講，此時鮑情緒低沉，會場氣氛緊張。鮑彤向大家透露了今天常委會的情況。鮑彤說『這可能是我同大家最後一次談話了』，鮑警告到會者不要當叛徒，做『猶大』。」「宋平同志反映，鮑彤手下的顧雲昌散佈『趙完了』，常委3比1。」【454】

作為5月17日晚上這次會議的當事人，我和當晚參加會議的其他同事，包括李鵬提到的顧雲昌，都可以證明，李鵬日記和陳希同報告的這些描述完全是望風撲影、違背事實、毫無根據的。第一，鮑彤並沒有洩露什麼「戒嚴機密」。在他這晚整個談話中，絲毫沒有涉及戒嚴問題；第二，在這次聚會的自始至終，老鮑的其他參加的同事都沒有

【453】鮑彤：〈六四密件——在學潮和動亂期間言行的交代〉，載香港《信報》，2003年4月21日。

【454】參見《李鵬六四日記》2004年徵求意見版，第107-109頁。

「密謀策劃」任何東西；第三，老鮑在談話中也沒有說過什麼誰洩露當晚情況，誰就是「叛徒」、「猶大」之類的話。

當晚的聚會中的確也提到過「猶大」，但情況完全不是像李鵬、陳希同說的那樣。當時在老鮑講到他被停職以後，在大家的議論中，有人講了一句似開玩笑似當真的話，說，看來我們今天可能是最後的晚餐了。另外的一個人說，不，不會的，猶大今天沒來。這句話說得大家都笑起來。有好事的人就查了一下會議室裏的人數，不多不少，恰好 12 個。說來也巧，這時白慧敏恰好從外面進來，有人就說，猶大來了。大家一笑了之。事情就是如此。

在李鵬 5 月 17 號日記的說明中，提到了「曾經參加此次會議的顧雲昌」。顧是由中組部調來中央政改辦的，時任中央政改研究室行政改革局副局長。筆者在寫作本書時，專門訪問了已經退休在家的老顧。老顧對筆者說：「那段時間，我只對中組部的幾個朋友談論過 5 月 17 號的事情。記得是 18 號那天，我到中組部辦事。當時外面的形勢已經很緊張，中直機關也開始出現一些關於研究室的流言。看到我來了，中組部幾個過去的老同事就向我打聽研究室的情況，我大概說了一下，其中涉及到了 17 號晚上鮑彤的告別談話。但是，我在這次交談中根本沒有說到什麼『鮑彤透露了常委會的情況』，什麼「3 比 1」，更沒有說鮑彤談到什麼戒嚴問題。哪知說者無意，聽者有心。後來有人告訴我，那天我走後，有人立刻就將我來的情況向上面彙報了，估計很快就傳到了中組部長宋平的耳朵裏。李鵬日記中的這段話，大概就是根據這個事望風撲影、添油加醋，再加上他們的想像編出來的。此事涉及到歷史，我必須說清楚，第一，鮑彤當時根本沒有『透露常委會的情況』；第二，我對中組部那幾個老同事也不可能說『鮑彤透露常委會的情況』；第三，我那時也根本不知道常委會有什麼『情況』，我怎麼可能會那樣講？！」

需要指出的是，《李鵬六四日記》一書成稿於 2004 年，此時對於中央政改研究室的清查已經過去了 15 年，對鮑彤的「審判」也過去了 12 年，這件事情的原委早已經查得一清二楚，當時對鮑彤所潑的污水早已經被證明是子虛烏有，對鮑彤的「審判」時也沒有敢將此事作為他「洩密」的證據，但李鵬在日記的說明中仍然要這樣寫，這只能證明李鵬人格之低下。

事實上，5 月 17 日政治局常委會後，立即洩露了中央即將發生重大人事變動機密的，確有其人，這個人就是李鵬！據趙紫陽的回憶錄記載，就在當天夜裏，中辦安排中央領導人去醫院看望絕食的學生，徵求李鵬的意見，李鵬表示說他不去。當 18 日凌晨去醫院的車子將開動時他卻又趕了來，原來他是聽說趙紫陽要去醫院才改變了主意。到醫院以後，李鵬就讓人給攝影記者打招呼，叫記者不要拍趙紫陽的鏡頭，「說以免人事變動後被動」【455】。請注意，李鵬說此話的對象是對新聞極其敏感的記者，而且可能不只一個！這不是在明確地告訴記者，「中央即將發生重大人事變動，而變動的人就是趙紫陽」嗎？這不是嚴重洩密又是什麼？至於得到這個信息以後，記者們是否將此消息擴散，如何擴散，因缺乏資料，筆者不敢妄加猜測，但是「洩露黨和國家重大機密」這頂帽子，李鵬卻是無論如何也賴不掉的！

四、「我們老了，無所謂了」

紫陽怎麼樣了？記得 17 日那天晚上我這樣問過老鮑，老鮑默然無語。我和室裏的同志們都還不知道，就在那個時候，紫陽已經發出了他的辭職信。這封辭職信就是老鮑在當晚第一次回來那半個多小時內為他起草的。老鮑起草這個文件的手稿我後來曾經見到過，大意如下：

常委並小平同志：

以我現在的精神狀態和政策水平，我認為，目前由我繼續主持常委會的工作，執行中央決策是不適宜的。因此，我請求辭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和軍委第一副主席的職務。

趙紫陽

1989 年 5 月 17 日

關於這個文件的起草經過，鮑彤後來也有一段回憶，他說：「5 月 17 日晚上 7 點左右，我正在廠橋辦公室，李樹橋打來電話，要我趕快過去。我匆匆趕到海裏，張岳琦告訴我，紫陽從小平家開會回來了。紫陽當時的心情很不好。他一上來就說：『今天下午，在小平同志家裏常委開會，打了一場官司，姚依林、李鵬贏了，我輸了。常委有個決策，什麼決策，我不能跟你們說。』紫陽說『你們』，是因為當時有兩個人在場，一個是我，一個是張岳琦。紫陽接著說：『他們（即姚依

【455】參見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51 頁。

林、李鵬）說，我的亞行講話有問題，暴露了黨內分歧。今天做了決策，我不能說跟你們說，要保密。但是我想，由我作為總書記來執行今天的決策，是不適合的。我的精神狀態，我的政策水平，都不宜於執行這個決策。我在會上就提出來了，我恐怕不能勝任。小平說：總書記還是你（即趙紫陽）。我回來想了一路，我還是應該提出辭職。你們給我寫一個辭職信。』張岳琦說：『老鮑，你寫。』我說：『你是秘書，當然應該你寫。』紫陽沒說話，望了我一下。我說：『好，我寫。』我只問了紫陽一句話：『辭職是辭總書記，還是總書記和軍委第一副主席都辭？』他說：『兩個都辭。』」

趙紫陽交代完以後，鮑彤立即回辦公室起草，並馬上又送給了趙紫陽。趙看了後，沒有作修改，說，可以，並簽上了自己的名字。鮑彤就把信稿送給趙的秘書李樹橋，請他發出。第二天，鮑彤去面見趙紫陽，趙說，信又收回了，因為尚昆同志批評他，如果學生以他辭職為藉口大鬧起來，將是什麼後果。趙說，尚昆同志的意見是對的，他自已當時沒有從後果上去考慮。這時，雖然趙紫陽在名義上還是總書記，但實際上已經被剝奪了主持中央工作的權力。

18 日凌晨，趙紫陽、李鵬、胡啟立、喬石到北京協和醫院、同仁醫院看望了因絕食而病倒的學生。這時被送進醫院的學生已達 3,504 人，32 人病情嚴重。這天學生絕食已經進入第 6 天。據天氣預報，當天將有雷震雨，市紅十字會和市工交總公司提供了幾十輛大客車給廣場上的學生避雨，避免了更多的學生病倒。

中午，李鵬等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他一直不願見但現在又不得不見的絕食學生代表。這段時間來，他就一直主張不能承認學生自發組織是合法組織，絕不與非法的學生組織代表對話。但是，形勢迫使他不得不和這些學生的代表王丹、吾爾開希等坐到一起來，進行對話。話雖然可以對，但是，李鵬頑固堅持原來立場的態度並沒有變。在對話中，學生再次重複了他們的兩條要求：第一，肯定這次學生運動是民主愛國運動，而不是動亂，並否定 4·26 社論；第二，中央高層「有決策力」的領導與學生選出的代表直接平等對話，並進行電視直播。王丹、吾爾開希等學生代表表示，如果政府能夠滿足這兩條要求，他們願盡最大努力，動員廣場上的學生結束絕食，返回校園。否則他們無能為力。李鵬等自然不會同意。

這大概是李鵬一夥在動手之前所作的最後一次「和平」姿態，以示他們的「仁至義盡」。當然，他們自然要繼續頑固堅持 4·26 社論對學潮的錯誤定性，那麼，其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18 日這一天，北京儘管下起了大雨，但仍然有幾十萬人上街遊行。善良的人們對這個黨，這個政府，這些領導人仍寄托著希望，希望他們能夠以國家為重，以未來為重，滿足學生們的要求，妥善地、和平地解決目前的危機。但是，他們哪裏知道，此刻的北京，已經大軍壓城，那些只顧維護他們眼前的權力和利益的人，就要動手了。

18 日一整天，室裏的同志們都是在焦急、悲憤交織的情緒中渡過。一些昨晚沒有在的同志也知道了昨天發生的事情，大家議論紛紛，都在憤慨地表達著自己的感情。老鮑在表面上看去仍然很平靜，但是我知道，在他的內心中一定會比我們更痛苦，更憤怒。外面想瞭解情況、要求反映情況、甚至責罵我們的電話仍然一個個的打來，我只有以好言好語但又打官腔的方式來回覆。這些，已經沒有必要再向老鮑報告了。即使和他講了，也只能徒增他的煩惱，又何必呢。也有一些已經從內部瞭解到內情，得知老鮑現在處境的人（當然都是相當一級的人物）打來電話探詢和問候，我只有向他們表示謝意，回覆說我們這裏尚一切正常。在電話裏我又能說些什麼呢？！

19 日凌晨，趙紫陽終於衝破阻力，來到了天安門廣場，來到了學生中間。在此之前的幾天，他曾數次試圖到廣場上去看望學生，但都被李鵬以沒有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任何領導人不能去廣場為由攔阻。在這即將戒嚴的最後一刻，紫陽知道，他如果現在不去，大概就永遠沒有機會去了，那將是他終身的遺憾。他毅然不顧禁令，在中辦主任溫家寶的陪同下驅車前往廣場。李鵬得到紫陽去廣場的報告，匆匆追來，見紫陽已到了學生當中，只得裝模作樣地看了幾個學生，快快而去。

紫陽登上了學生們休息的大客車，學生們立即把他簇擁起來，許多人請他簽名留念。他接過學生遞過來的話筒，作了他的最後的公開講話。他說：「同學們，我們來晚了，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了。」講到這裏，他哽噎了。平靜了一下，他又說，「你們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我這次來不是請你們原諒的。」接著，他要求學生們盡快結束絕食。他說，「我知道，你們絕食是希望黨和政府對你們所提

出的問題給以最滿意的答覆。」但是，「有些問題需要一個過程才能解決。比如你們提到的性質、責任問題，我覺得這些問題終究可以得到解決，終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在這裏，他實際已隱晦地表示了他的看法。

這是趙紫陽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在紫陽的這次講話中，他以極其懇切的口吻講述了他的心聲。他對學生們說，「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應該活著，健康地活著，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這段話，後來有很長時間一直使我激動。特別是那句河南口音的「無所謂了」，使我在後來身處逆境的日子中獲益非淺。

趙紫陽以這種方式謝幕，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個悲劇。但他也因此成為千百萬人心目中的英雄。

對未來，焉知這不是一齣喜劇？

五、5·19 之夜

5 月 19 日白天，北京市仍有幾十萬工人、學生、市民上街遊行，聲援學生。全國有 20 多個大城市的 5 萬多名來京學生也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靜坐活動。《人民日報》發表了 12 名人大常委會委員關於從速召開全國人大緊急會議的建議；發表了民革中央主席朱學范、全國工商聯主席榮毅仁、農工民主黨主席盧嘉錫、致公黨主席董寅初，以及團中央、台盟中央、中國作協和文藝界、新聞界、法學界、社會科學界、19 家海外新聞單位等的緊急呼籲，要求中央主要領導迅速與學生對話，緩解當前事態。

與此同時，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主持召開了有「三所一會」（即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所、中信國際問題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人員參加的會議。在這個會上，由陳一諮主持起草了一個《關於時局的 6 點聲明》。聲明認為：「事態演變到今天這樣的嚴重地步，完全是由於黨和政府在決策上的失誤和拖延所致。」「建國以來，黨和政府的高層領導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脫離人民，違背良知，與人民群眾的意願直接對立。其原因在於傳統政治體制不能按法制軌道運行，沒有政治公開性，形成了只關心上層權力鬥爭，不以民族利益和國家前途為重的局面。」「目前事態還在

惡化。堅持已有的失誤而繼續失誤，以致採取極端舉動（如軍管），將會導致真正的動亂，甚至造成民族分裂。這種黑暗的前景是經歷過十年文化革命的中國人民所無法接受的。」

聲明中提出的「立即召開全國人大緊急會議和中共特別代表大會」的呼籲，應當說在當時的情況下可能是使中國和平走出這場危機，穩定局勢，並把李鵬為代表的保守勢力趕下台的唯一的辦法了。在那幾天，有幾十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也聯名建議人大常委會，立即召開全國人大緊急會議。但是，過去一貫支持紫陽、支持改革的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卻遠在萬里之外的美國訪問，雖然他在國外多次發表認為學運是愛國民主運動的講話，卻一時不可能趕回來。而掌握中央權力的李鵬一夥很明白，人大緊急會議召開之日就是他們下台之時，他們是絕不會在這個關頭放棄自己的權力的。這個辦法在當時情況下看來很難辦到。

中央政改研究室的行政改革局副局長高山以北京青年經濟學會副秘書長的身份，也參加了「三所一會」的這次會議。在六四以後的大清查中，高山被捕，此事被當作一個重點問題加以追查。李鵬一夥認為這是趙紫陽、鮑彤和動亂有關的最直接的一個證據。陳希同在向人大的報告中說，是高山「趕到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向正在開會的人傳達了所謂『上邊』的指示。」這個「上邊」指的是誰，陳希同沒有明說，但顯然是指老鮑，甚至是趙紫陽，這當然是無根據的胡說。其實高山完全是以個人身份參加這個會的，老鮑在事前根本不知道，不然，一定不會同意他去。

鮑彤後來在秦城的「交代」中談到這件事時說：「5 月 22 日機關黨委開會。高山向黨委交代 19 日體改所的聲明，他參加了。黨委書記陳群林同志向我報告，我就找高山談話。我說，你怎麼到體改所惹事去了？他說，是啊，去了，錯了。我說，你不是給我找麻煩嗎！他說，是我自己去的，我一人做事一人當。我說，你去了，體改所知道了，你又向機關黨委報告了，這裏也知道了，鬧得風風雨雨的，人家會說，體改所的聲明政改研究室參加了，也就等於鮑彤參加了，最後

就給紫陽同志添麻煩了。」[456]六四以後，高山因此而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

三所一會的《6點聲明》當天下午即在天安門廣場學生的廣播站播出，並被廣為散發。晚上，即將戒嚴的消息即傳到了天安門場。

在這天下午，我們室機關黨委接到通知，晚上派4名黨委成員到總後禮堂參加中央召開的黨政軍幹部大會，但並沒有通知仍是中央委員的鮑彤出席。

下午下班後，我即坐室裏的班車回家吃飯。飯後6點多鐘，司機又來接我，他告訴我，萬壽路口有很多載滿了部隊的軍車，已經被許多裝水泥的重型卡車堵在那裏。這個情況使我一驚。在此前，我和室裏的同事們，包括老鮑在內，都根本不知道李鵬一夥要採取什麼樣的手段來解決當前的事態。聽到軍隊進城的消息，我終於明白了。

我隨即乘司機的車專門繞到萬壽路口，果真見到幾十輛要開往城裏的軍車停在那裏無法前行，約有上萬名群眾圍在那裏，和車上的軍人講話。群眾中罵的、吵的、耐心介紹情況的，什麼態度的都有，都是為了一個目的：阻止軍車進城。路口已經完全堵住，我們只得又繞回來，從另外的路回到廠橋。

我立即來到老鮑的辦公室，把所見到的情況向他作了彙報。這時室裏的許多同志也都得到了消息。白慧敏來到我的房間，說，她接到幾個熟人打來電話，從城東、南等幾個方向也有大量軍車進城，都被群眾堵住，圍車的群眾群情激憤，有可能釀成衝突。

這樣快就會有軍隊進城，看來他們是早有準備的。李鵬一夥通過政治局常委會的形式決定動硬的是在5月17日，到19日黨政軍幹部大會公開宣佈採取強硬措施，不過兩天的時間，就有如此之多的軍隊進了城，而且來得如此之快，著實讓人吃驚。我當過兵，知道兵貴神速，但是在兩天內要完成這麼多軍隊的動員、集結、部署和開進工作，從我國軍隊目前的裝備和素質來看，幾乎是不可能的。後來聽說，早在進入5月份之後，軍隊就已開始了以防不測的調兵遣將。被老百姓圍住的軍車上的許多軍人也說，他們是在一周多以前就離開營房上路的，上級並沒有告訴他們此行的目的，只說是拉練，不准看報

【456】鮑彤：〈六四密件——在學潮和動亂期間言行的交代〉，載香港《信報》，2003年4月21日。

紙、聽廣播。小平當時是否知道此事我不清楚，但據我所知，作為中央總書記、軍委第一副主席的趙紫陽是不知道的。這就是說，調動軍隊，向首都周圍集結，事前既未通過政治局討論，也未經中央軍委集體討論，更未向趙紫陽報告，這是完全非法的，也是早有預謀的。趙紫陽、老鮑和黨內高層中的一些人，許許多多善良的人們，包括我們這些書生們在內，都被蒙在鼓裏。只是到了大兵入城，方纔如夢初醒，但是已經遲了。這就是中國人治的政治，這就是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封建宮廷政治，這就是中國的透明度極差的老人政治。

議論中，室裏的同志們對有這樣多的群眾圍堵軍車，都有一種無可名狀的興奮、悲哀、憤怒、擔憂相混合的複雜心理。有一點大家的認識是統一的，就是都認為軍隊進城，會更加激怒群眾，這樣一來，局面恐怕更難以收拾了。

室裏的同志們都聚在一起，一邊議論著，一邊等待去開會的群林等幾個人回來。老鮑也和大家在一起聊著天。

夜裏近 10 點鐘的時候，電視裏播出了廣場上的學生宣佈停止絕食，改為靜坐的消息。看來學生們也在作應變的準備了。

夜裏 11 點多的樣子，群林和去開會的其他幾個同志回來了。在 325 小會議室，他們向大家傳達了會議的情況，並繪聲繪色地講述了他們坐的車被群眾當作進城的軍車攔截的經過（室裏的車掛的是中央警衛局的軍用牌照）。大家又好氣又好笑。

這天晚上召開的「宣佈進一步採取果斷措施制止動亂的決策」的黨政軍幹部大會，紫陽沒有出席。在 17 日開過政治局常委會後不久，紫陽就提出身體不適，請病假三天。據說會前，楊尚昆曾要求紫陽到會講話或主持大會，被紫陽拒絕，又要求他不講話也要出席大會，紫陽再次拒絕了。這是他在事實上被排除出決策圈之後，對鄧小平及李鵬一夥置黨、國家、民族的利益於不顧的錯誤決策所作出的強烈抗議和拒絕承擔責任的表示。

就在我們室裏傳達當晚會議情況的幾乎同時，中央電視台播出了李鵬在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上的講話，以及會場的一些情況。千百萬觀眾在電視屏幕上看到，趙紫陽沒有出席會議。大會的主持人喬石在會上宣佈說「趙紫陽同志因病請假」。當然，這種說法很多人都不會相信，將會在國內外引起廣泛的猜測，但在短期內很可能會蒙騙一些

人。這時，社會改革局副局長石肖巖來到我房間，我們議論說，應當在明天的《人民日報》上把紫陽今天早上到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的講話刊出，以便使紫陽在講話中透露出信息讓更多的人瞭解。從目前的局勢看，發出這個講話很有可能會受到李鵬一夥的阻撓甚至禁止，我們為此應當想點辦法。

正在我和肖巖議論這件事的時候，老鮑來到我的房間，我們把想法同他講了，老鮑表示同意。他說，紫陽的那些話是對學生講的，目的在於勸學生愛護身體，放棄絕食，離開廣場，他擔心學生和軍隊硬頂，發生衝突。這個講話應該通過報紙發出來，讓更多學生看到。

肖巖先和《人民日報》社的熟人聯繫了一下，回答是他們也想明日刊出，目前還沒有禁令。但是他們手頭沒有這篇稿子，問我們可否想想辦法。我立即想到，我上午在電視台播出講話時，曾錄了像，可以根據錄像整理出文字稿。便決定和肖巖立即坐車把錄相帶送去。這時，閻軍來到我房間，她說，她曾根據錄音整理了一個稿子，交給了她們報社（法制日報），但在目前情況下，法制日報不一定敢發，可以向法制日報要這篇稿子。

我和石肖巖立即驅車前往人民日報社。這時已經是夜裏 12 點多鐘。為了不給老鮑帶來麻煩，我不便和報社的人見面，便和司機等在外面，由肖巖一個人先上樓去看看情況。等了許久，也不見肖巖下來。我一邊聽著車上收音機裏播出的李鵬在黨政軍幹部大會上講話的錄音，一邊等他。過了近兩個小時，才見他出來。他告訴我，值班編輯已和法制日報聯繫，對方已經把閻軍整理的稿子用電傳傳了過來，明日見報估計不會有什麼問題了。

次日（5 月 20 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發了趙紫陽對學生的這篇講話。這是趙紫陽作為中央總書記，最後一次以正面身份出現在《人民日報》上。李鵬認為，趙紫陽的這個講話「公開了黨中央內部的分歧」【457】。

【457】《李鵬六四日記》2004 年徵求意見版，第 116-117 頁間插圖說明。

六、陳一諮來訪和「李鵬其人」

一覺醒來，已是上午9點。昨晚我和肖嚴2點多離開人民日報，又到東三環各個路口看了一下堵軍車的情況，直到早上近6點才回來。我匆匆洗了把臉，出了房門，立即就有人告訴我說剛才發佈了戒嚴令。我打開電視機，中央電視台正在一遍又一遍地播送著由李鵬簽署的關於「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國務院令，和陳希同簽署的在八個城區實行戒嚴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令。這是中國共產黨執政40年來破天荒的第一次動用軍隊來對付老百姓。它表明這個黨的高層決策集團的性質已經開始起變化，它在走向人民願望的反面，走向它一貫宣揚的主張的反面。

聽了一會兒，我又到值班室取來了當日發來的文件。雖然我知道老鮑已被停職，但是我這個秘書並沒有被停職，我仍然應當而且要更好的履行我的職責，為老鮑服務，直到我也被停止工作那一天。

他們雖然停止了老鮑的工作，但是還顧不上（也許是不敢）馬上正式發出免職的文件。可實際上，這幾天送給老鮑的文件已經少了許多，特別是過去每天都有的各種會議文件已經根本不見了，送來的只是一些參考簡報之類。對於老鮑說來，這些簡報所提供的關於當前事態的信息仍然是重要的。我一份份的瀏覽著，還是像往常一樣挑出最重要的，送給老鮑。

送文件時，我向他講了發佈戒嚴令的消息，看來他已經知道了。我又把我昨晚的所見所聞向他彙報了一下，我說，從昨晚的情況看，戒嚴令雖然發佈了，但在目前情況下恐怕也是一紙空文，很難實施。他靜靜地聽著，偶爾地提出問題，思索著。接著，他又拿起我送來的幾份反映事態的簡報看了起來。我不便打擾，便默默的退了出來。

大約上午10點鐘的時候，我聽見門外有人說話，就推開門看了看，只見黃海陪著拄著雙拐的陳一諮（他在4月1日京豐賓館開中青年改革十年研討會時把腿摔骨折了），還有他們所的副所長劉曉峰（新近從青海調來的，原任格爾木市市長）。我和他們打了句招呼，他們就進了老鮑的辦公室。我本想一塊進去幫老鮑招待一下，但見有黃海在，就沒再去。過了約有一個來小時的樣子，體改所的副所長李俊也來了，我把他送到老鮑房間，見老鮑正在和陳一諮談著什麼，我沒有打擾，就又回到了我的辦公室。

10 幾分鐘以後，我聽見老鮑送他們出來，就走出房門，代老鮑送客。我和他們幾個一邊聊天一邊走，有人和老陳開玩笑地說，你摔成這樣還不老實，當心有人說你是黑手！陳一諮也半開玩笑說，現在已經有人說我們是黑手了，不過，你們也跑不了，現在也有人說你們在指揮動亂。我氣憤地說，要真是我們指揮，就不會這麼笨，鬧成這麼個結果了。就這樣說著，下了樓。我送陳一諮上了車，提醒他已經戒嚴了，要盡可能小心些，看著他的車出了大門。沒想到，這就是我最後一次見到老陳，六四之後，他歷盡艱險逃到了美國。

老鮑和陳一諮這次見面，時間大約有一個多小時，他們談了些什麼，我因沒有參加不得而知。後來 8 月份我從秦城回來以後，聽黃海告訴了我一些情況。在老陳來之前，他已經知道紫陽不再主持工作和老鮑被停職的情況了。在老鮑和老陳的談話過程中，確實沒有搞什麼秘密策劃。陳一諮向老鮑談了他們搞的三所一會《六點聲明》的情況，老鮑嚴厲地批評了這種做法，說三所一會被認為是趙紫陽的智囊團，以這種名義在當前的情況下發表聲明，只會給紫陽帶來更多的麻煩，而於事無補。

老陳還介紹了外面群眾的情緒和反映，並問起紫陽和老鮑自己的情況。老鮑很謹慎，對中央的內幕情況沒有多說什麼。但是，對於李鵬毫無根據地說他是壞人，他十分氣憤，並談到李鵬 18 日和學生對話時，作賊心虛地表白什麼「我有三個孩子，沒有一個搞『官倒』的」，這根本不是事實。實際上，他的有個兒子原來在武警部隊辦公司，是有名的「警倒」，後來看群眾大反官倒，形勢不妙，就在前不久把兒子調到了國家機關避風；而他的老婆朱琳則是國務院直屬的大公司華能公司的一個有特殊地位的「處級」幹部，動亂後不久也調了出來。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都撈足了」。老鮑還談到在總後大院動用幾十萬元為李鵬修游泳池、李鵬帶夫人出國在國外賓館裏丟了一件不值錢的首飾，跟對方交涉，後來找到了，其實是贗品，搞得雞飛狗跳等等。

聽了老鮑談到的這些情況，陳一諮很氣憤，他當時提出回去以後立即搞一份「李鵬其人」的材料公佈出去，讓人們瞭解李鵬的真實嘴臉。對老陳的這一打算，老鮑當時沒有表示他的意見。對老鮑這個態度，我能理解。李鵬毫無根據地說老鮑是「壞人」，老鮑對他當然會很氣憤。但是，就在老陳走後大約半個多小時，老鮑忽然找到我，問我

可否立刻找到陳一諮。我把電話打到體改所，但沒有找到他。我又找到王紹賢，問他是否知道老陳的家，他說他可以立即去找。但老鮑想了一下，說算了，不用去了。我猜想，老鮑在陳一諮走後，想起了陳曾說要搞「李鵬其人」傳單的話，覺得這樣幹不妥，想找到老陳阻止他，但因一時找不到，也就算了。

陳一諮等人來室這件事，後來在六四以後的大清查中，也被當作我室的重點事件加以追查。在審查者們抓不到其它能證明紫陽和老鮑與學潮有關的證據以後，他們就力圖在這件事上做出點文章來。他們先是想把這天陳一諮來見老鮑上綱為「密謀策劃」。後來見找不到任何證據，又想把陳一諮和體改所在 5 月 20 日以後搞的「李鵬其人」傳單說成是「鮑彤授意」。儘管當時在場的證人黃海在他的證詞中指出這不是事實，對陳一諮要搞的傳單老鮑根本沒有表態，他們仍然在 1992 年對鮑彤的「審判」中，將這件事作為鮑彤「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的「罪證」。

七、到底誰是操縱學潮的「黑手」?

李鵬、姚依林等人是一夥徹頭徹尾的陰謀論者。從這場學潮伊始，在將學潮歸結為「一場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動亂」的同時，他們就在不斷地強調，「這一場動亂完全是有計劃的陰謀活動」，認為「鬧事學生背後一定有黑手，在操縱和指揮」【458】。在4·26 社論公開提出這個說法之後，他們的喉舌袁木更是在 4 月 29 日同官辦學生會對話中，大談有「黑手」，有「長鬍子的」在學生背後出主意。

為了嫁禍自己的政敵，他們從一開始就把污水潑向了趙紫陽。早在 5 月 4 日，《李鵬六四日記》的記載中就說：「我去見姚依林同志，商討當前的局勢和政府工作。依林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這場動亂是不是趙紫陽發動的，目的是打鄧倒李保趙。他還提出疑問，胡耀邦的悼念活動調子定得那樣高，是否也是趙紫陽發動的。姚依林是一位老同志，並且久在中央工作，鬥爭經驗豐富。他的兩點質疑，確實發人深省。」【459】

要把趙紫陽說成是動亂的發動者，李鵬一夥就必須找到證據。按照他們想到的邏輯，作為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肯定不可能直接去和學

【458】《李鵬六四日記》2004 年徵求意見版，第 30、41 頁。

【459】《李鵬六四日記》2004 年徵求意見版，第 64 頁。

生接觸，能為趙紫陽完成這個任務的，一定是他身邊的人。李鵬一夥就先入為主地把他們的目光盯到了鮑彤和他的部下們身上。

李鵬等人一開始是私下裏向鄧小平進讒言，幾次暗示趙紫陽身邊有「壞人」，到了 1989 年 5 月 17 日下午在鄧小平家開的那次關鍵的政治局常委會上，這種指責就公開化了。受到鄧小平支持的李鵬公然說「鮑彤是壞人，洩露機密」，意思是說趙紫陽重用「壞人」。當趙紫陽駁斥他「這樣講，沒有證據是要犯誣陷罪的」時，李鵬還表示說，我當然有證據，現在不說，以後再說。在這個時候已經失去對趙紫陽信任的鄧小平表示了贊同李鵬的說法，說：「你們常委辦公室裏有奸細。我倒要看看，這次是誰走漏消息。凡是走漏消息者，要以黨紀國法嚴加處理。」【460】

李鵬在 10 天以後的 5 月 27 號日記說明中，更加明確地說：「可以肯定廣大參加動亂的學生是受蒙蔽的，在他們背後有長鬍子的人，在背後操縱的人有國際背景也是可以肯定的。」他列舉了「四條線索」，其中第一條「重要的線索是以趙紫陽為總後台，他的秘書鮑彤所親自領導的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這是中國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總指揮部。受政改室領導的『三所一會』則是宣傳自由化、組織動亂的急先鋒。在『5・19』首都幹部大會以後，『三所一會』就拋出了《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從後台跳到前台，公開暴露他們指揮動亂的真面目。這『三所一會』是指國家體改委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國國際信託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等四個單位。他們所拋出的六點聲明，也成為後期煽動並指揮動亂的綱領性文件。他們明確地宣稱，這次動亂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反對採取『軍管』行動，立即召開全國人大『特別會議』，立即召開『共產黨特別大會』，對政治局工作進行審查。而這個綱領性文件是由陳一諮與鮑彤密謀後形成的，並且在 5 月 20 日上午 10 時，陳一諮前往中南海鮑彤辦公室談話近一個多小時，鮑彤表示同意。鮑彤還告訴陳一諮，以後你們已不可能從我這裏得到什麼信息了。從此，從趙紫陽到鮑彤，從鮑彤到陳一諮，再通過陳一諮到社會上搞自由化的『精英』，從『精英』到前台的學生領袖這一條線就斷了。」【461】

【460】參見《李鵬六四日記》2004 年徵求意見版，第 105-106 頁。
【461】《李鵬六四日記》2004 年徵求意見版，第 172-173 頁。

李鵬的這些話，似乎是「證據確鑿」。但我以一個親歷者的身份可以負責任地說，這些指控或是子虛烏有，或是移花接木，或是似是而非，全部都不是事實！

首先，說「以趙紫陽為總後台，他的秘書鮑彤所親自領導的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這是中國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總指揮部」，本書的全部內容可以證明這段話完全站不住腳。從當初的政改辦，到此時的中央政改研究室，鮑彤和他的部下都是主張「兩個基本點」的，都是按照鄧小平的理論在工作的。說到「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我們倒是想搞，可是一旦搞了，就跨越了鄧小平劃的紅線，我們這個機構就不可能生存。我們的目標是扎扎實實推進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至於10年20年之後，會不會搞，那也要看當時的情況。至於說到是「總指揮部」，好像李鵬一夥「高看」我們了，鮑彤和他的部下們好像還沒有那麼大的能量，能「指揮」得動這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其次，「三所一會」各自有自己的上級主管部門，和鮑彤領導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沒有任何組織上的領導與被領導關係，他們所「拋出的六點聲明」，也完全是他們自己的創造，鮑彤和中央政改研究室絕不敢掠人之美。說實話，我們室許多人後來看到這個「六點聲明」，對其內容是基本贊同的。但李鵬說這個「煽動並指揮動亂的綱領性文件」是「由陳一諮與鮑彤密謀後形成的，並且在5月20日上午10時，陳一諮前往中南海鮑彤辦公室談話近一個多小時，鮑彤表示同意」，完全是編造的。首先在時間上就不合乎邏輯。李鵬自己的日記中就載明，「三所一會」的這個《六點聲明》是5月19日就發表了的【462】，此處又說是5月20日「陳一諮與鮑彤密謀後形成的」，這豈不是李鵬自己打了自己一個嘴巴？

第三，李鵬說「鮑彤還告訴陳一諮，以後你們已不可能從我這裏得到什麼信息了」，這段話似乎是暗指鮑彤向陳一諮洩露過多少機密。實際上，無論是陳一諮，還是此時廣場上的學生們，他們此前得到的關於戒嚴的消息，與鮑彤，與中央政改研究室無關！李鵬和陳希同開始時指控是鮑彤指使政改研究室高山參加「三所一會」會議，洩露了戒嚴的機密，可後來在審判鮑彤時，卻改了口，說洩露的是「趙紫陽下台」的機密，這更是驢唇不對馬嘴。鮑彤後來反駁說，5月17日中

【462】見《李鵬六四日記》2004年徵求意見版，第124頁。

央並沒有接受趙紫陽辭職。到 19 日的時候，趙紫陽仍然是中央總書記，中央也沒有宣佈趙不再主持中央工作，「趙紫陽下台」的事情還沒有發生，談何「洩露機密」？再說，高山參加「三所一會」完全是個人行為，鮑彤在事前就根本不知道，所謂「從趙紫陽到鮑彤，從鮑彤到陳一諮，再通過陳一諮到社會上搞自由化的『精英』，從『精英』到前台的學生領袖這一條線」根本就是李鵬等人主觀臆造出來的！

第四，從本書前面各節的敘述中，可以看出，在 5 月 17 日李鵬說「鮑彤是壞人」這個話之前，鮑彤和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與當時的學潮、與廣場上的學生是沒有任何聯繫的。在當時中央各大機關，包括中組部、中宣部、中辦都有人上街參加遊行的情況下，中央政改研究室卻無一人上街。作為中央領導身邊的工作人員，特別是在趙紫陽身邊工作，鮑彤和他的部下們都知道輕重，不希望由於自己的不慎影響到紫陽的處境。我們所出的主意，無一不是希望平息學潮，而不是想把事情鬧大，只不過我們所堅持的，是要和平地在民主和法制軌道上解決學潮，並以此推動去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

李鵬一夥當時的說法，完全的他們主觀臆造出來的，是他們為搞倒趙紫陽而製造的欲加之罪。在後來他們拿出的那些算不上證據的「證據」，都是發生在 17 日之後的。這種先定罪名，然後再找證據的一套，只能證明，他們為了打倒自己的政敵，是不擇手段的，毫無政治道德可言。

那麼，李鵬等人所說的，操縱學潮，推動學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黑手」到底有沒有？當然有，就是李鵬一夥自己！筆者這樣講，當然是有根據的。

縱觀 1989 年春夏之交的這場學潮，近 50 天的時間，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相應的也出現了四次高潮：

第一個階段，是從 4 月 15 日胡耀邦逝世，到 4 月 23 日趙紫陽赴朝。學潮的這次高潮，到耀邦追悼會後結束，是以悼念胡耀邦，對當年政治老人們以非正常手段搞掉胡耀邦不滿，要求公正評價胡的功過為主線的。

4 月 24 日，當廣場上的學生收聽了耀邦追悼會實況之後，雖還有不同意見，但多數學生已經打算回校復課。趙紫陽後來說：「追悼會結束以後，學潮趨於緩和，而且學生內部也有不同意見，一部分主張

復課，這是很好的機會。只要我們進一步做好工作，學潮是可以平息的」[463]，因為學生已經失去了繼續罷課和遊行的理由。

第二個階段，是從 4 月 24 日開始，到趙紫陽 5・4 亞行講話之後的幾天。這個階段，李鵬一夥借鄧小平之口給學潮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並發表 4・26 社論，激起學生的強烈抗議和學潮的強烈反彈，發生 4 月 27 日北京學生大遊行。趙紫陽 5・4 亞行講話之後，學潮趨於緩和。

趙紫陽出訪後，主持中央工作的李鵬無視總書記趙紫陽走前提出並經常委一致同意、鄧小平贊成的三點意見，不去做學生工作，反而借主持中央工作之機，在 4 月 24 日召開「常委碰頭會」，聽取北京市委李錫銘、陳希同的彙報。在借鄧小平之口給學潮定性後，不但將鄧的講話迅速傳達到全國，並以《人民日報》4・26 社論的形式公之於眾。在給學潮定性為「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動亂」的壓力下，激起了學生的強烈憤慨和學潮的反彈，這才發生了 4・27 北京學生大遊行，原已低落下去的學潮再起，並轉到以反腐敗、反官倒，要求承認學潮的愛國性質為主線。李鵬一夥既然已經給學潮定了性，北京市也有遊行條例在，按照他們的邏輯，對 4・27 學生遊行就應該強力阻止，可他們卻不敢動手，讓學生看到了政府「軟弱」，堅定了繼續幹下去的信心。

趙紫陽訪朝歸來之後，看到學潮再起，覺得對學潮動硬的行不通，他認為應該通過民主和法制的手段來解決學潮問題。由此開始對 4・26 社論「轉彎子」。他的紀念五四講話、5 月 4 日亞行講話，體現了他對解決學潮問題的基本思想，就是努力把問題的解決引上民主和法制的軌道，從而進一步推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

在趙紫陽的亞行講話之後，大多數群眾和學生的反映相當好。他們認為，趙的講話符合實際，比較客觀，表現了政府想真正解決問題的誠意，提出的解決問題的辦法也是可以接受的。5 月 4 日下午 3 點，學生「高自聯」的頭頭在天安門廣場宣稱，明日各高校復課。當時的學生組織「北高聯」主席、北大研究生封從德後來在他的《六四日記》一書中談到，趙紫陽亞行講話以後，「政府作了許多實質性讓步」，「北大籌委會本來就致力於校園民主建設」，「五四後學運的三個重點是復

【463】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31 頁。

課對話、加緊自治組織的合法化進程、加強同社會各界的聯繫」。清華大學的學生領袖周鋒鎖也回憶說，「到絕食前，清華籌委會也與校方達成校園民主的共識：最根本的一個就是校學生會的完全直接選舉，另外一個就是校園裏的學生辦報的完全自治開放。」【464】這些情況說明，趙紫陽亞行講話之後，學生大多已經達成復課和致力於校園民主建設的共識。如果此時政府與學生的對話及其他方面措施跟上，學潮會就此緩和。

第三階段，是從趙紫陽5•4亞行講話以後，到5月19日宣佈戒嚴。這個階段，李鵬一夥竭力干擾、破壞趙紫陽在民主和法制軌道上處理學潮承諾的實施，致使趙的「轉彎子」和與學生對話主張難以實現，學生認為受到欺騙，開始以更加激烈的手段表達對政府的抗議。從而導致學潮出現第三個高潮，學生宣佈在廣場絕食和此後的北京百萬市民加入聲援。

趙紫陽「轉彎子」的態度引起了李鵬一夥的恐慌。在這個時候，李鵬、姚依林等這些4•26社論的始作俑者最為擔心的，就是趙紫陽從朝鮮回來瞭解情況之後，改變他們對學潮性質的結論，因為一旦趙紫陽推動中央做出這樣的決定，李、姚等人就必須承擔激化矛盾、導致鄧小平對學潮做出錯誤定性的責任，成為黨內外的眾矢之的。趙紫陽在回憶錄中說：「他們又十分害怕4•26社論被否定，特別是怕我回國後不支持他們這種做法。李鵬曾向閻明復說過（閻明復在我從朝鮮回來後告訴我），如果趙回來不支持4•26社論，他只有下台。李鵬和姚依林商定一定要我回國後表態支持。」【465】當趙紫陽的亞行講話明確表態，改變了4•26社論的調子，主張通過協商對話，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之後，為了避免「下台」和承擔激化矛盾的責任，李鵬一夥就必然想方設法證明自己沒有錯，就必然更加堅決站在趙的對立面，以各種手段干擾趙紫陽「軟處理」方針的實現。此後，他們又一次激化矛盾，推動學潮再次演出了一個高潮，以證明學潮確實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

五四過去幾天後，一些學校的學生又相繼宣佈罷課，學潮又開始漸次升級。《李鵬六四日記》和六四後陳希同向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報告

【464】參見封從德：《六四日記》，晨鐘書局2009年5月版，第234、273、248頁。
【465】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34-35頁。

說，趙紫陽的5‧4亞行講話是「動亂升級的轉折點」，如果沒有趙的講話，學潮很可能就此偃旗息鼓，逐步得到平息，是趙的講話「暴露了中央內部兩種不同的聲音」，「鼓動」了學生。這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

事實是李鵬、姚依林和北京市的李錫銘等人對趙紫陽提出的通過對話實現學生對政府的理解和諒解，並通過人大落實制止「官倒」、治理腐敗的幾項措施，極力進行了阻撓、抵制、破壞和拖延。一開始他們對趙的亞行講話還不敢公開反對，卻利用各種場合極力加以歪曲，說趙的這個講話同4‧26社論是一致的，是不同側面。但他們的反對態度很快就公開化了。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在幾個大學黨委書記會議上公開散佈說，趙的講話只代表個人意見，不能代表中央，還提出要追查自發學生組織背後的「黑手」。這個消息很快傳到學生中，引起了學生的強烈反彈，認為中央說話不算數，在欺騙學生，要「秋後算帳」。

引起學潮反彈的另外一個原因，是李鵬一夥對趙紫陽協商對話方針的曲解和破壞。「本來對話就是要同示威遊行的學生對話，但是他們不僅不讓學生在學潮中建立的組織選派代表，也不允許由學生自己選派代表，一定要由學生會作為代表來對話，根本不能代表遊行示威的學生。這樣的對話不是等於完全拒絕對話嗎？而且他們在對話時不是以誠懇的態度聽取意見，討論問題，而是想方設法應付學生，像記者招待會上對付外國記者那樣，爭取在鏡頭上出現有利於自己的形象，撈取資本，這使學生感到政府說要同他們對話，完全沒有誠意。」【466】趙紫陽對李鵬等人的這種做法一再批評，但他們一直置之不理。

面對政府遲遲不同參加學潮的學生對話，學生中開始出現越來越大的不滿情緒，開始醞釀以更加激烈的手段表達對政府的抗議。封從德在他5月11日的日記中說：「這時，同學們感到的『嚴峻形勢』和希望採取絕食等激烈手段，與一條線索的發展有關：即政府一再地拖延對話的時間，顯然是想趁學運走向低潮時拖垮學生組織，使對話不了了之。」5月13日上午在北大三角地貼出的由柴玲【467】起草的「絕食宣言」中談到的「絕食原因」也證明了這一點：「第一，抗議政府對北

【466】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42頁。
【467】柴玲，北大學生，天安門學生運動領袖之一。

京學生罷課採取麻木冷談態度；第二，抗議政府拖延與北京高校代表團對話；第三，抗議政府一直對這次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冠以『動亂』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的報道。」13 日下午，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開始，他們要求是：「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平行對話；第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生運動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468】

絕食，已經是學生所能採取的最激烈的抗議方式，它不但改變了學生孤軍奮戰的態勢，使首都百萬市民加入到抗議隊伍中來，也迫使當局不得不面對兩種剛性的選擇，或是改變 4·26 社論的定性，承認學生運動的愛國性質，或是武力鎮壓「制止動亂」，除此之外，已經沒有別的路可走。趙紫陽主張走前一條路，但他沒有走得通，卻因此而得到了永生；而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李鵬一夥走了後一條路，他們卻沒有了未來。

第四階段，是從 5 月 19 日晚學生宣佈停止絕食改為靜坐，部隊進城受阻到 6 月 4 日，戒嚴部隊使用武力強行開進，學生被迫撤出廣場。這一階段，由鄧小平拍板，李鵬等人主持的戒嚴，激起了學生和市民更加激烈的反抗，使這次學潮最終以全民性的流血抗爭謝幕。

趙紫陽在他的回憶中說：「19 日宣佈戒嚴後，又是一次興奮劑，又把群眾的勁鼓起來了。靜坐的人增加了，各界支持的人們成群結隊湧向街頭，特別是實行戒嚴調軍隊進京，大大傷害了北京市民的感情。奉命進京的部隊沿途到處受到市民的阻擾。成群結隊的老太太、兒童躺在街上，使軍隊被阻在北京郊區，無法進入市內。這種僵持狀態差不多有十多天。」【469】6 月 3 日夜裏和 4 日凌晨，事態演變為磚頭石塊與坦克的履帶和 AK47 的對決，至今仍然難以計數的學生和北京市民鮮血染紅長安街頭。學生們身上帶著血跡撤離了天安門廣場，結束了持續 50 天的學潮。

北京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英語廣播中說：「請記住 1989 年 6 月 3 日。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最悲慘的事件。幾千名民眾，其中大多數是無辜的市民，被全副武裝的士兵們在向市中心推進的過程中殺害。在被害的民眾中也有我們北京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的同事。士兵們駕駛著

【468】封從德：《六四日記》，晨鐘書局 2009 年 5 月版，第 270、279 頁。
【469】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52 頁。

裝甲車，用機關鎗來對付千萬名試圖阻擋他們向前推進的本地市民和學生們。當裝甲車強行通過之後，士兵們仍然肆無忌憚地向街上的民眾掃射。」歷史，永遠記錄下了這一刻，也把李鵬一夥永遠釘在了恥辱柱上。

回顧了這50天的學潮經過，誰是操縱、推動和利用學潮的「黑手」，答案不是已經昭然若揭了嗎？

八、「這是最後的鬥爭」

20日以後的幾天，大量學生仍然在天安門廣場靜座，廣場上樹起旗幟的北京和外地院校已達319所。全國許多大中城市繼續發生大規模的學生和市民遊行，反對戒嚴，要求李鵬下台。而奉命進城的戒嚴部隊繼續被北京的廣大市民攔阻而無法進入市內。每日入夜，就有大量市民自發地湧向通往市中心的主要路口，並徹夜守在那裏，隨時準備攔截可能進城的軍車。正像我們預料的那樣，戒嚴令雖然發佈了，但是實際上一時還無法執行。

但是，許多人都已經感受到一場大的危機正在迫近。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社會上的知名知識分子、黨政機關的一些幹部，甚至包括一些人大常委會委員和人大代表、政協常委和委員、黨內的老同志，都在積極活動，力圖化解這場危機。有人通過各種方式找到已經退休的中共元老聶榮臻【470】、鄧穎超等，試圖通過發揮他們的影響，解除戒嚴，防止部隊進城後發生流血衝突。聶、鄧等也都在報上表了態，說部隊進城是來維持首都秩序的，不會鎮壓學生。他們並沒有反對部隊進城，至少是沒有能公開反對。但是，也有一些部隊的老資格的將軍公開地站了出來，反對動用軍隊鎮壓學生。楊得志、葉飛、張愛萍、肖克、宋時輪、李聚奎、陳再道等7位部隊的老上將聯名寫信給中央，要求愛護人民軍隊，為了避免發生衝突，部隊不要進城。他們曾經試圖通過新聞媒介向社會公開發表自己的意見，但由於多方面原因沒有成功。

在20日以後的幾天裏，人們不約而同地想到了要求召開緊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問題，應當說，這是不奇怪的。在當時的形勢下，要想和平地解決當前的事態，防止可能發生的流血事件，並且能滿足人們

【470】聶榮臻（1899-1992）；四川江津人。元帥。曾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科委主任；長期掌管中國的國防科學工業。

要李鵬下台的要求，只有這個辦法。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提出這個要求，也反映了當時人們還是想在民主和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的善良願望。另外，人們提出這個要求，和當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本人在國外的數次表態也有一定的關係。

萬里是在 5 月 10 日主持了人大委員長會議，確定於 6 月 20 日召開人大常委會會議聽取整頓公司、學生遊行問題的彙報等議程之後，於 12 日離京，開始他計劃 21 天的北美之行的。此後，他在加拿大、美國多次發表了肯定學生良好願望的講話，給了國內學生和群眾以很大的鼓舞，也使人們對萬里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在趙紫陽已經失去權力的情況下，人家就把希望寄托在萬里身上，希望他能夠盡快回國，主持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罷免李鵬，解除戒嚴。

趙紫陽當時在名義上還是中共中央總書記，但實際上已經「靠邊站」。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冒著風險，為讓萬里早日回國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他後來回憶說：「我當時考慮，只有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由人大這個權力機關以民主與法制的形式，來扭轉這種局面。」「21 日下午，胡啟立到我家，說人大常委要求萬里提前回國的報告現在沒有人批覆，擱在那裏。我就讓胡啟立告訴彭沖，由人大黨組直接發電報給萬里，促他提前回國。胡啟立問可否說已經你同意，我說可以。隨後我又給吳學謙【471】打電話讓他設法把電報發出去。後來據說李鵬又給萬里發電報，不讓他提前回國，可能是請示了鄧，所以萬里未能及時回國。」【472】後來在審查中，這件事成為趙紫陽的一大罪狀。

在 20 日之後的幾天裏，已經失去權力的趙紫陽為召開緊急中央全會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還在準備作另外一件事情。

那是在 5 月 22 日上午，我正在 316 值班室，老鮑來找我，交給我一份材料，要我立即複印兩份。利用複印機預熱的時間，我看了一下材料的題目，是為紫陽起草的「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提綱」。看了前面一段，我明白了，紫陽是打算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在黨內高層的更大範圍內談談他的想法，特別是提出要盡快召開緊急中央全會和全

【471】吳學謙（1921-2008）：上海嘉定人。1982-1988 年任外交部長。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1993 年任政協副主席。

【472】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52-53 頁。

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的主張。這個材料就是老鮑為他準備的在這個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稿。講稿的大意是這樣的：

「目前，雖然中央決定我不再主持的工作，但我仍是中央常委和中央總書記，按黨章的規定有權召集這個會議。今天開會，我不講處理當前形勢的具體意見，只講一講召開有關會議的程序問題。」

「我認為，從目前的事態來看，我們的出路仍只有通過和平的方式，在黨章的基礎上，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來解決問題，這就是按照合法的程序，召開緊急中央全會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接著，他根據黨章和憲法的有關規定，談了召開中央全會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程序，應當由哪一個層次、哪一個人提出，哪一層次決定和召集，等等。文件不長，大約2、3頁的樣子。我一邊看著，心裏很不平靜。看來，這是紫陽在黨內，在他的那個位置上，為通過合法手段，和平解決當前事態的最後一搏了。而且，當時社會上的人們，黨內那些不肯違背自己良知的人們，也都把最後的希望寄托在盡快召開緊急中央全會和全國人大常委會上面。紫陽是瞭解這種心態的，他也一定知道，萬里此時正在國外，他自己是孤掌難鳴，即使提出這個問題，也可能是無濟於事，而且還可能給他自己帶來更多的麻煩。李鵬一夥是絕對不會同意、而且會千方百計地阻撓緊急中央全會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召開的，因為會議的召開可能就意味著他們的末日。但是，為了避免可能發生的流血，紫陽要作這最後的努力。他不會作別的選擇，也別無選擇。

我很快看完了稿子。這時老鮑問我，你學過法律，也學過黨建理論。你看一下，文中講到的程序的表述是否合適，是否符合黨章和法律的規定。我表示，稿子中的表述是恰當的。老鮑對我說，現在他們還沒有說免紫陽的職，紫陽辭職他們又不接受。那麼紫陽現在還是總書記，為什麼不能召集會議？！

老鮑和我一邊說著，我一邊開始複印了起來。當時房間裏可能還有其他人在，也聽見了老鮑和我的談話。

我印完了稿子，回到我自己的房間，把印好的材料裝訂好，又按習慣檢查了頁碼，就把它放在寫字檯上，想過一會兒送給老鮑。就在這時，室裏的一位局長來到我的房間，看到了桌子上的稿子，就問我是什麼材料。我估計剛才他也在316，但沒有聽全老鮑和我說的話，

現在想向我瞭解一下。那時大家對紫陽的境況都很關心，心情我是理解的。所以我就簡單的和他說了幾句情況，告訴他是給紫陽起草的講稿，又聊了幾句別的，他就走了。我當時沒有想到，就是我這短短的幾句話，給我在後來的秦城審查和清查清理中帶來了一個絕大的麻煩。

趙紫陽擬議中的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後來當然沒有開成，這個稿子當然也就沒有用上。【473】趙紫陽在他的回憶中談到了這件事情，他說：「我曾經找過中辦溫家寶，建議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當時溫家寶說，中辦實質上已被撇在一邊了，現在所有這些部署都沒有通過中辦，一切活動都是李鵬、楊尚昆另外安排的，並不通過中辦。如果我一定要開會，中辦也可以發通知，但他感到後果會很不好，希望我慎重考慮。」【474】在考慮到即使由中辦發通知，會議也很難開得成的情況下，趙紫陽放棄了這一努力。

老鮑給紫陽起草的講話稿，後來還有過一份，也是老鮑為紫陽起草的最後一份講稿。這份講稿的存在和內容，是在 23、4 號感到危險日益臨近，老鮑要我銷毀這份文字手稿時，我才知道的。它到底準備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用，老鮑沒有對我講，但我從文稿的內容上看，估計是準備在最後的關頭，在形勢稍安定之後，當李鵬一夥準備正式把紫陽搞下台時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用的。講話稿通篇是紫陽闡述自己從 4 月初以來在處理學潮問題上的主張、出發點和經過。這裏面講到了他對 4·26 社論的意見，講到了他作 5·4 亞行講話時的打算，講到了他 5·16 和戈爾巴喬夫談話講小平功績時的出發點，也講到了他對動用軍隊、實行戒嚴的堅決反對的態度。因為稿子文字較長（約有 4、5 千字的樣子），我又只是在急忙中匆匆瀏覽了一下，所以具體措辭已經記不清楚了。但是後來我看到了李鵬一夥給紫陽定下「支持動亂、分裂黨」罪名，把他們的奪權陰謀合法化之後，紫陽在四中全會之前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那篇著名的「自辯發言」。這個被他們稱之為「態度頑固、拒不承認錯誤」的發言，從其基本內容上看，和老鮑在 5 月 24、5 日那幾天裏為紫陽起草的那篇講話稿基本是一致的。

【473】後來，這件事情被人揭發出來，1991 年 6 月，被趙紫陽專案組列為《在 1989 年政治動亂中涉及到趙紫陽同志的有關問題》的 30 個問題之一：(27) 5 月 21 日，趙紫陽還對他的秘書李勇同志說，我想還是應該開一次政治局會議，並要鮑彤為他起草一個講話稿。（參見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88 頁。）

【474】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56 頁。

後來我曾經為此問過老鮑，他說，「不錯，紫陽在6月20號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那篇『自辯發言』，初稿是我寫的。我被捕以前大概3、4天吧，紫陽說，過些天要開政治局會議，會上我要作個發言，講講學潮以來的情況，你給我起草一個東西。我不知道這個會什麼時候開，也可能隨時都會開，所以我一個晚上就趕寫出來給他。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過紫陽。後來我出獄之後，有人把紫陽正式那個發言給我看了，其中有大段的修改，前邊的那個幾部分是我給他起草沒有大動，後邊他又加了很多東西，是紫陽自己加的。」

這篇講話，是老鮑，也是趙紫陽進行的一場「最後的鬥爭」。

九、「要作最壞的準備」

20日以後的幾天，北京市面上的秩序尚未十分混亂。雖然指揮交通的警察都不見了，但是學生和市民自發地組織起來，維護交通秩序。白天，街上依然是人來人往，拉著上街遊行群眾的大卡車不時的穿過城市的主要街道，車上的人們打著橫幅，呼喊著各種口號。有時，我走在街上，看著行人們的臉，甚至覺得好像是在過節。這當然是一種錯覺。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說，這也許就是在過節，是人民的節日，民主的節日。

戒嚴令發佈之後，從表面上看，人們依然是在我行我素，戒嚴令並沒有發生什麼效果。但實際上，那些發佈了戒嚴令的人對目前的狀態並沒有熟視無睹。從他們發佈了戒嚴令的那一天起，不，是早在趙紫陽還在主持中央工作的5月17日之前，他們已經開始向那些無辜的人們伸出魔爪了。

後來我瞭解到，早在趙紫陽被奪權、老鮑被停職以前的15、16日，我們機關所在地的廠橋就已受到公安部門和國家安全部門的監視了。這當然和李鵬在常委會上講的「鮑彤是壞人」的定性有關。他們特別是對老鮑，以及我和張竈輝的活動，進行了嚴密的監視。我們每次外出，都有人跟蹤。他們在我們住的中直招待所門口、後面的四中樓上，都安沒了監視點。老鮑被停職之後，監視的程度就更加嚴密了。那幾天，我們已經開始意識到這一點。每當我外出（無論是坐小車還是騎自行車）的時候，我總是在想，會不會有人跟蹤？當然，我心裏沒有鬼，也不怕這一套，但是，像老鮑這樣的忠心為這個黨工作的中

央核心要員，像我這樣身為共產黨中央核心部門的幹部，在這個共產黨當權的國家裏，出門竟然還要擔心有人跟蹤，真讓人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難過滋味。

5月22日，研究室召開了機關黨委擴大會，擴大到全機關所有的局級幹部。會上，大家討論了當時的形勢，認為，政府不會允許街頭的學生、群眾長期這樣與戒嚴部隊對峙下去，結果可能會導致流血。在發言中，陳曉魯指著窗外說，我們都是反對鎮壓的，現在外頭已經亂成這樣了，如果當局採取了強硬措施的話，恐怕改革所有的成果都要喪失殆盡，也許要天下大亂。我們都要有這種思想準備，一旦這個亂平下來，在坐的你我可能都要完了，我們會被作為犧牲品抹掉！那麼應該怎麼辦？陳曉魯說著手向上一指：「共和國的利益高於一切！我們這些個人算得了什麼！」這句話反映了研究室黨委擴大會的集體意見：第一反對動亂，第二反對武力鎮壓。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我們寧可下台！

在這個時候，室裏的同志們都已經意識到了我們所面臨的嚴峻形勢。李鵬那一夥對政治體制改革抱著嚴重敵意的死硬份子們，那些歷來仇視改革的老「左」們，那些對趙紫陽早已心懷不滿，力圖以自己的嫡系人物取而代之的政治老人們，對我們政治改革研究室「鮑彤的那些人」，過去一直是恨的眼裏要出血的。現在我們這些人的「後台」（趙紫陽）垮了，他們也必然要向我們動手了。況且，前些天就已有人向我們透露，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他們已經認定我們就是操縱這次動亂的「黑手」。現在，既然他們已經有了槍桿子撐腰，那麼，離他們向我們動手的日子就不會遠了。

我想，既然他們認為「鮑彤是壞人」，那麼要是對我們室動手的話，首當其衝的目標就是老鮑。而我和電輝這兩個在老鮑身邊工作的秘書，自然也是在劫難逃的。因此，我們應當而且必須作好應變的準備。

20日以後，從表面上看，老鮑是閒下來了。從1986年10月我認識他以來，他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閒過，沒有會議，也沒有起草什麼文件，每天或是看看我挑送給他的各種簡報，或是和大家聊天，很少出去。但是，我知道，他的內心並不平靜。他無時不刻地在思考著，在關注著形勢，關注著紫陽的安危。他也一定意識到了自己處境，意

識到了日益迫近的危險，但這時，他已經把自己的安危完全置之度外了。

為了讓他們在來抓老鮑時，有一個緩衝的時間，以作準備，我向老鮑提出，這幾天沒有什麼事情，是不是請他躲一躲。老鮑開始不太同意，他說，有什麼地方可以隱蔽呢？他們要來抓，躲是躲不過去的。我說，即使躲不過去，有一個緩衝時間也好。這樣，在我的建議下，23 日後的幾天，老鮑躲到了我們住的這個招待所二層的一個房間裏，這個房間是兩個月前為四中全會報告起草組租的，前些日子我已經把它退掉了，但鑰匙還沒有交給招待所服務台。老鮑的一日三餐和水，因我的目標太大，由社會局的一位同事每天按時送去。這件事，只有我和群林等少數幾個人知道，我們對內對外都說老鮑外出了。這時如果他們來對老鮑下手，即使是知道老鮑躲起來了，也絕不會想到他就躲在中直招待所的樓內。後來到了 26、7 日，老鮑看沒有什麼動靜，就放鬆了警惕，又搬回了他原來的辦公室。

自從 5 月 17 日李鵬一夥在政治局常委會上宣佈老鮑「是壞人」以後，停職或是撤銷他職務的正式文件卻一直沒有發下來。我想，他們也許是怕引起黨內和社會上的大的震動，也許是心虛，因為他們的手中並沒有所謂「鮑彤是壞人」的確鑿證據。但這件事，已經在中央機關內部，特別是中辦系統內部傳開了。我估計，他們是在中辦內部打了招呼。

5 月 22 號那天，老鮑要張電輝去首都醫院為他取藥。老鮑自從十三大當選為中央委員以後，他的醫療關係就從 305 醫院轉到了首都醫院。就在前幾天，老鮑還曾經在那裏看病和拿過藥。但是這天電輝去取藥時，該院的人卻說，鮑彤的醫療關係已經不在這裏了，他們拒絕給老鮑拿藥。電輝回來後立即向老鮑和我談了這件事。我們都十分氣憤。老鮑和我分析，看來是上面有人向醫院打了招呼，不然醫院是沒有這樣大膽子的。我立刻給中辦副主任、中央警衛局局長楊德中【475】的姚秘書打了電話（中央機關省部以上幹部的醫療保健工作，當時是由楊統管的）。我講了情況以後，問他，據我所知，中央並沒有下過文件說免老鮑的職，也沒有說降他的級，那麼是誰下的指示給首

【475】楊德中（1923-）：1980 年代長期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第一副主任、中央警衛局局長。1994 年晉陞上將軍銜，不久後退役。

都醫院，停止給老鮑看病？！這個姚秘書在那裏支唔了半天，說他不知道這件事，他立刻去查一查。我估計，就是他們這些勢力小人搞的鬼，但在我的質問下又無言以對，只好推脫。第二天，楊德中的秘書給我回電話，解釋說是北京醫院在裝修房子，暫時容納不了那麼多人看病，很多人的醫療關係都換了地方。這是很明顯的鬼話，我們總是知道了這些人趨炎附勢的一套嘴臉。老鮑當時也沒有再問他的醫療關係到底轉到了哪裏，後來就更沒有必要問了，因為他的「醫療關係」很快就被「轉」到了秦城監獄。

23、4 號以後，我感到氣氛越來越緊張。雖然外面表面上依然和前幾天一樣，沒見有什麼異常，但是我知道，離他們動手的日子越來越近了。我想到，在我和電輝這裏，存著許多老鮑的文件。這些文件中，雖然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東西，但其中有一些是許多地方、許多部門的同志向老鮑、向紫陽反映各方面問題、提出各種建議的信件、材料。如果這些東西落到別有用心的人手裏，就可能牽連更多無辜的好人。於是，我向老鮑建議，清理一下文件，把除了中央發來需要保存和上交的文件以外的材料，可銷毀的盡量銷毀。老鮑同意我的意見，他要我告訴電輝，對我們各自保存的文件進行清理，他自己存的由他自己清理。這樣，我和電輝很快對文件進行了清理。我清完自己的以後，又察看了一下電輝清出來的東西。看來要燒掉的東西還真不少，足有兩大紙箱。我又到老鮑那裏，他把要銷毀的東西放在一隻大抽屜裏，交給了我。在老鮑交給我的東西中，我看到了幾天前他給紫陽起草的辭職書草稿以及其它一些材料。我和電輝抬著紙箱來到院子後面的鍋爐房，把這些東西投到了熊熊的爐火之中。看著它們在火中化成了灰燼，我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這些東西，有許多在正常的情況下是不應銷毀的，其中的一些將來可能成為這一時期歷史的見證和證據。但是，為了盡可能減少一些麻煩，為了使那些無辜的人不被牽連，我們只能不得不如此了。

23、4 日的一天，老鮑來到我的房間，要我找一找黨章和黨內生活準則中有關「發揚黨內民主、保障黨員權利」方面的規定。我立刻明白了他的用意。現在，老鮑，以及我們這些人都面臨著被抓、被關的可能。在此之前掌握保護自己、同一切非法拘禁行為作合法鬥爭的武

器是十分必要的。這個武器就是黨章、黨內生活準則，就是憲法和法律。

我立刻找來了過去整黨時發的《黨員必讀》，從中找到了中央在總結「文革」經驗基礎上制訂和頒發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劃出了其中的有關段落，立刻送給了老鮑。老鮑要我把它們複印一下。我問他複印幾份，他沉吟了一下，說，印給每人一份。我知道，老鮑這是要室內每個人都做好發生萬一的準備。我很快就複印好了這些材料，把每個人的那份放在了316值班室向全室人員發材料的架子上，並把老鮑的那份送給了他。為了更好的說明老鮑和我們所做的思想準備，在這裏把老鮑要我複印的「準則」的有關內容抄幾段如下：

> 必須注意區別：反對某個同志的某個意見，不等於反對這個同志，反對某個領導機關的某個同志，不等於反對這個組織，不等於反領導，更不等於反黨。
>
> 對敢於堅持真理的同志妄加反革命的罪名，亂用專政手段，進行殘酷迫害，這是嚴重的違法行為，必須受到黨紀國法的嚴懲。
>
> 侵犯黨員權利的行為，是嚴重違反黨紀的。
>
> 有權在黨的會議上對黨的任何組織和個人提出批評。
>
> 黨員對黨組織關於他本人或其他人的處理，有權在黨的會議上、或向一級組織直至中央提出聲明、申訴、控告和辯護。黨組織對黨員的聲明、申訴、控告和辯護必須及時處理和轉遞，不得扣壓，承辦單位不得推諉。
>
> 必須嚴格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不可把工作中的一般錯誤或思想認識上的錯誤說成是政治錯誤，不可把一般的政治錯誤說成是路線錯誤，也不可把犯了路線錯誤、但仍屬於黨內鬥爭性質的問題，同屬於企圖顛覆黨、顛覆社會主義國家的反革命性質的問題混淆起來。
>
> 黨內不准用超越黨的紀律或違犯國家法律的手段對待黨員。要絕對禁止禁止採用林彪、「四人幫」的封建法西斯手段解決黨內問題。嚴禁所謂揪鬥，嚴禁人身侮辱和人身迫害，嚴禁誘供逼供。

就在我印了「準則」後的當天，室裏社會改革局的專門搞法律方面研究的處長徐沖也按老鮑的意見，複印並發給大家每人一份憲法和刑法中有關保護公民基本權利條文的複印件。後來發生的事實證明，

我們的這些準備是及時的。後來在秦城的那些日子裏，這些材料成了我保護自己的有力武器。老鮑被他們隔離審查後，也是靠著這些，同那些非法拘禁他的人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很自然，印發「準則」和憲法、刑法有關段落和條文這件事，後來也成為在「清查清理」中工作組追查的一個重要問題。

十、他們終於動手了

他們動手的這一天終於來了。

5 月 28 日，星期天。

這幾天，老鮑已經無事可做，周日就沒有去辦公室，在家休息。午飯後，接到了中辦副主任徐瑞新【476】的電話，說中央常委開會，要老鮑參加，中辦很快會派車來接。老鮑說，我有車。徐說，就用中辦的車吧。老鮑意識到，這也許是個借口，他們可能要動手了，應該讓辦公室的同志們知道一下。他估計電話已經有人在監聽，就打了個電話給自己的司機小張，要司機來接他，實際是想通過司機，向室裏的同志們傳遞個信息。

小張來到老鮑家，老鮑要他轉告研究室秘書長陳群林，中央領導現在要他去開會。並讓小張立即回廠橋。小張下樓開著車剛出木樨地 24 號院大門，中辦警衛局來「接」老鮑的車子就開了進來。他們迎面見到小張的車子出門，以為老鮑在車裏，連忙調頭追了出去，待趕上後發現車裏沒有人，又立即繞回 24 號樓。這時，在院子的大門口，已經有人守在那裏，監視出入的人，特別是監視老鮑的動靜。

來「接」老鮑的兩個人進了門以後，自我介紹說是中辦的，但老鮑以前並沒有見過他們。在剛才徐瑞新打來電話以後，老鮑已經和他的夫人蔣宗曹及家人作了交待，要她們有今天他回不來的思想準備。這時，老鮑問來人說，我要不要帶幾件換洗的衣服？來人連說不用。就這樣，老鮑從容地和家人告了別，下樓上了中辦派來的汽車。

據老鮑後來說，車子將他載到了中南海，在那裏，並沒有什麼「中央常委開會」，而是直接把老鮑送到了當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部長的宋平的辦公室。宋平先是問老鮑對形勢的看法，然後又裝模作樣地談到老鮑的「安全」，說，現在很亂，老鮑家裏和辦公室都不

【476】徐瑞新，原中辦秘書局局長，十三大後任中辦副主任。

太安全，還是換個地方好。老鮑連說，不用不用。宋平不顧老鮑的反對，讓秘書送老鮑到門口，在門口老鮑看到的，是一輛掛著「GA」牌照[477]的車子。車子將老鮑直接載到了國人聞名的中國專門關押高級政治犯的監獄——秦城監獄。由此，老鮑開始了他的與世隔絕和失去自由的鐵窗生活。在中國，在文革已經過了 12 年之後，鮑彤是第一個被關到秦城監獄的中共中央委員，代號「8901」。

就在他們對老鮑下手的幾乎同時，他們也對我和老鮑的生活秘書張電輝採取了行動。下午一點多鐘，中辦秘書局派人到家裏找到了張電輝（張家住的靈境胡同中辦秘書局宿舍，離秘書局所在的中南海西門僅一路之隔），說是秘書局領導找他談話。電輝和來人到秘書局，見到了剛提為秘書局副局長不久的李登柱。李要電輝立即通知我們室的司機，到我家把我也盡快接來，就說中辦領導要和我們談話。電輝就打了個電話給室裏的司機，要他把我快些接來。然後，他們就讓電輝等在那裏。

這一天，我一早就回到了家裏。那幾天，從戒嚴後的不正常的氣氛中，我已經感到他們要動手的日子正在臨近。所以在這個星期天，我提出晚飯吃中國人團聚時常常吃的傳統食品——餃子。餃子還沒有來得及包，下午 2 點多的時候，室裏的司機小蔡來到我家，說中辦領導要找我談話，讓我立即去一趟。我心裏已經估計到了是怎麼回事，立即和妻子作了交代。我告訴她，我這次去，有可能一時回不來。但是不用擔心，我沒有做什麼對不起良心的事，更沒有做什麼違法的事，他們不能把我怎麼樣。我如果今天不回來，明天一早讓她去室裏找秘書長陳群林。妻子默默地聽著。我此前已經和她談過，要她有思想準備，但這時事情真的來了，仍然感到突然、震驚和悲憤。我看她張了張嘴，想說些什麼，又什麼也沒說出來。我能理解她的心情，我這一去，不知要什麼時候才能回來。想說的話，也許有很多，但是此時又能說些什麼呢？

告別了妻兒，我上了來接我的汽車，車子一直開向中南海。

戒備森嚴的中南海西門一閃而過。往時我經常進出這個大門，但這次卻有一種異樣的感覺。我想到，這也許是我最後一次進這個大門

【477】即公安牌照。

了。但是我並不後悔。不是說青春無悔嗎？我們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而獻身，也無可後悔。

在中辦秘書局門口，我一下車，就看見已經有兩個人「恭候」在那裏。他們帶我上了樓，來到李登柱的辦公室。我見到電輝已經等在那裏。李登柱要我和電輝坐下，然後一本正經地代表「組織」開始了「談話」。

李首先說，中央辦公廳領導委託我和你們談話。中央已經決定，對鮑彤在動亂期間的活動進行審查。你們作為他的秘書，有責任配合組織，澄清事實，搞清問題。現在，請你們交出你們保管鮑彤文件的櫃子的鑰匙，交出鮑彤的全部文件，以便組織清查。

李講的前面那段話，雖早已在我的意料之中，但聽到他正式講出來，仍使我感到一種無可名狀的憤怒。他講的後面那段話，卻大出我的意料。我和電輝所保管的，大都是絕密級的中央政治局文件、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文件，以及其他一些密級很高的文件。按照保密規定和通常的做法，這些文件的清點和交接，必須有保管者本人在場和參與。不然，文件若有丟失或洩密，誰也說不清楚，也無法追究責任，保管者也可以不負責任。但是，今天他們卻要我們直接交出文件櫃的鑰匙，這不但是一反常態，簡直是利令智昏了。

自電輝接手老鮑的文件保管以來，存在我這裏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文件已經不很多了，但是我手裏還保存著老鮑的一些其他文件和材料。雖然前些日子已經進行了清理，並且我知道，我保存的文件中，並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陰謀證據，但我還是希望在清理剩下的這些文件時，我能在場，這樣即使我阻止不了他們拿走文件，心裏起碼可以有個底，知道被他們拿走的文件有些什麼。我打定主意爭取盡量不交出鑰匙，要求和他們一起回自己的辦公室，參加文件的清理。

但是，事情並沒有能如我所願。當聽到我說，根據保密規定，清理我們保管的文件，我們本人應該到場時，李沉吟了一下，也許是覺得我講的話難以駁倒，只好說，那好，我去請示一下。說著，他出去了一會。趁這功夫，我對電輝說，如果有什麼不測，我們總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他也很贊成。

李回到辦公室，對我們說，剛才我請示了徐瑞新同志。清理鮑彤的文件，你們不必參加了，把鑰匙交給我們，由我們來負責任。看

來，鑰匙不給他們是不行了。但是，醜話我要講在前面。我說，既然如此，組織的決定我們只有服從。鑰匙可以給你們，但是，話我們也要講明白。第一，不讓我們到場，如果發生失密或是文件丟失，我們概不負責；第二，在我們的房間和保險櫃裏，有一些我們個人的東西，你們也必須負責保管，如有丟失損壞，要負賠償責任。接著，電輝也表示了同樣的態度。看樣子，李是想早些結束這場談話，對我們的要求，他一口答應下來。

這個話題談完了。下一步，他們會對我們怎麼樣？我要試探一下。於是，我說，李局長，如果沒有其他事情，我們就回去了。他連忙說，不不，一會兒，中組部的同志還要和你們談一談。我和電輝對望了一下，心裏明白了八成。李登柱說著，就推開了辦公室的門，作出送客的樣子。

那些「中組部的人」已經等在走廊裏了。我和電輝一出門，就立刻有幾個人走上來，站在我們的兩側。其中的一個人說：「請和我們走吧。」我問：「去哪裏？」他們說：「等一會兒你們就知道了。」在他們的挾持下，我們從三樓李登柱的辦公室來到了秘書局門前，在那裏，有兩部小汽車在等著我們。有兩個人帶我上了前面的一輛。我上車以後，那兩個人也立刻上來坐在了我的兩側。我回過頭來看了看外面的電輝，他被人帶上了後面的一輛車。

汽車開動了。我看見，有許多衛兵嚴密警衛著的中南海西門一閃而過。車子向北拐上府右街，我看了一下表。

時間是 1989 年 5 月 28 日下午 3 時 40 分。

第十五章
被審查的日子

1989年6月4日，在長安街上和天安門前，當局用坦克的履帶和AK47的子彈，鎮壓了學潮，同時也中止了這場由趙紫陽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

在六四的槍聲尚未響起之前，鮑彤即已經陷身囹圄，開始了他長達7年的鐵窗生涯。我也被「住」進了秦城，據說是要「配合組織對鮑彤進行審查」。7月底，中央宣佈「撤銷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但其所有人員都要繼續參加「清查清理」。長達一年半的嚴格審查，結果讓「組織上」大失所望，事實證明，李鵬一夥加諸於趙紫陽、鮑彤所領導的這個工作班子身上的指控，都是造謠、污蔑、陷害和不實之詞。這個工作班子，既非「小艦隊」，也不是什麼鼓動學潮的「黑手」。在從1986年10月開始的兩年半多的時間裏，他們所做的工作，唯有一個：推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推動中共由革命黨向現代政黨轉型。儘管這個工作班子的成員們後來大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但是，歷史終將證明鮑彤無罪，歷史也將記住鮑彤和他的部下們對中國的政治和社會轉型所做出的開拓性貢獻。

一、鮑彤：「8901號」囚徒

在六四槍聲響起之前的1989年5月28日，身為中共中央委員、中央常委政治秘書、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的鮑彤，就已經被非法「隔離審查」，關進了北京北郊的秦城監獄。從此，這個1950年代由蘇聯顧問幫助設計的曾經專門關押戰犯和走資派等各種人民公敵的監獄裏，又增加了一個新的囚徒，代號是：「8901」。

鮑彤因何獲罪？又是誰下令抓捕鮑彤？據2001年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的署名張良的《中國「六四」真相》一書揭示，其始作俑者，又是李鵬。書中說：「5月27日，安全部向李鵬報送了一份關於趙紫陽

的前任秘書鮑彤與洩露北京戒嚴這一『最高機密』的密碼機要件。全文如下：據多方面瞭解證實，5 月 17 日晚，鮑彤召集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部分人員開會。會上，鮑彤向與會者透露說，『中央已決定即將在北京實行戒嚴，紫陽表示了反對意見，但是，戒嚴的決定已經作出，要改變很難，希望大家心中有數。現在形勢嚴峻，紫陽可能不保。』鮑彤在會上作了『告別演說』，並警告與會者『不要出賣自己的良心』，不要成為『叛徒』、『猶大』。可以斷定，洩露戒嚴的機密和趙紫陽將要下台的消息是從鮑彤這個渠道出去的。」這個「密碼機要件」中所講的 5 月 17 日鮑彤「告別演說」的說法，與後來陳希同在 6 月 30 日代表國務院向人大常委會所作的《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中的說法如出一轍，大概這就是那個報告的底本。「李鵬在審閱此件後，立即向鄧小平、李先念、陳雲作了報告。李鵬在安全部的傳真件上批示：『請小平、先念、陳雲同志閱。這份材料說明，鮑彤洩露了戒嚴的最高國家機密，蠱惑人心，建議立即予以法辦。』在當晚中共元老召開的會議上，中共元老同意了李鵬的建議。在李鵬得悉老人首肯的消息後，即親自下達了逮捕鮑彤的命令。」【478】

聽到鮑彤被「隔離審查」的消息，趙紫陽十分憤怒。6 月 2 日，王任重、丁關根來到趙家，說是受中央委託來和趙談話。談話中，趙紫陽態度激烈地向他們提出了鮑彤被非法拘禁的問題。趙紫陽在回憶中說：「鮑彤是 5 月 28 日被組織部叫去談話，一去就沒有回來。並同時在他的辦公室進行搜查。我當時就叫秘書給宋平打電話表示反對。這次我對王任重、丁關根說，如果認為鮑彤有什麼問題，組織上可以審查，但應按《黨章》和法律手續處理，黨組織沒有權力剝奪他的人身自由，組織部長更沒有這個權力。現在八十年代了，不能用過去搞運動的辦法了，要求他們向中央反映。」【479】

趙紫陽的話，在這個時候已經不會對李鵬主持工作的「中央」有什麼影響了，因為在這個時候，李鵬一夥最希望的，就是通過對鮑彤的審查，找到趙紫陽「支持動亂」的證據。鮑彤後來對筆者說：「實際上，對我進行審查，焦點很明確，專案組的工作人員說得也很明確：『主要是讓你回憶回憶趙紫陽同志的問題。什麼都可以談，不要有顧

【478】張良：《中國六四真相（下冊）》，香港明鏡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50-751 頁。
【479】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57-58 頁。

處，他現在不是總書記了。』我是這樣回答的：『趙紫陽同志有什麼問題？他不再是總書記，我感到非常可惜，主要不是為他個人可惜，而是為黨可惜。我認為，紫陽同志是一位難得的領導人。』大概因為我的回答也同樣明確，從此以後，專案組沒有再提這個主要問題。」

看到直接要鮑彤「交待」趙紫陽的問題不成，他們就想找到鮑彤犯罪的證據，以證明「鮑彤是壞人」，從而證明趙紫陽「重用壞人」。最初，剛剛把鮑彤抓到監獄裏的時候，事先就定了兩條罪名：一條是說 1989 年 5 月 17 日晚上，鮑彤在發表「告別演說」時洩露了北京即將戒嚴的機密。另一條是說5月20日，鮑彤讓陳一諮他們寫了那份「李鵬其人」的傳單，是「反革命宣傳煽動」。

對前一條「洩密」罪名所指的事情經過，本書在前一章中已經敘述過。鮑彤對這項指控的回應是，「當時我自己就根本不知道『即將戒嚴的機密』，因而根本無從『洩露』這一機密。會上也根本沒有什麼搞什麼『密謀策劃』，因而也根本沒有什麼所謂『不得透露』的『警告』。」當時也同在秦城受審查的我，以及參加了 5 月 17 日那個會的其他 11 位研究室的同事在此後的審查中，也都先後為鮑彤作證，所謂「鮑彤洩露戒嚴的機密」的指控純屬子虛烏有。老鮑在後來說：「現在回顧起來看，李鵬也實在太不爭氣。早在 5 月 17 日下午的常委會上，他就說我是「壞人」，並強調自己「有證據」。可後來拿出來的「證據」，卻是發生在當天晚上的事情，莫非他能未卜先知？還且不說他這個『證據』還是假的，整個是謊話連篇。正如我後來對採訪我的記者所說：『製造謊言的是個蠢人。如果他造謠說我向一兩個人洩密策劃警告等等，也許還能找到個把證人。現在造謠說我在會議上如此這般，肯定只能逼得全體參加者仗義執言。他們提供的證言，只能證明我無罪，而前國務院自己卻犯了誣陷罪和向人大常委作假報告罪。」

看到找不到所謂鮑彤「洩露戒嚴機密」的證據，後來專案組就只好不再提，而是改了個說法，說是鮑彤洩露了「趙紫陽同志即將下台」的機密，這個說法也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在 5 月 17 日下午鄧小平家開的那次中央常委會上，趙紫陽提出來，「我無法執行這個任務。」鄧小平說，「總書記還是你。」會後，趙紫陽也確實讓鮑彤幫他寫了辭職信，但是，趙紫陽要辭職，要看小平同不同意，也要經過一定的組織程序。這個規矩鮑彤還能不懂嗎？在這樣的事情上，不是趙紫陽說了

算，而是鄧小平說了算！鮑彤說：「從整個發展過程看，不存在『趙紫陽辭職』的客觀事實。因此，『鮑彤洩露趙紫陽即將下台』的秘密，在當時本身就是偽命題，當天晚上，紫陽還是總書記，我怎麼可能跟其他同志『洩露趙紫陽即將下台的機密』？如果硬要扣這個罪名，那不是我洩露機密，而是我造謠惑眾！在後來和司法部門交涉時，我說：『你們要把這一條改掉。』但是，他們不敢改。因為李鵬說過『鮑彤洩密』這句話，人家都知道。如果變成了『鮑彤造謠』，人家接受不了。那麼，李鵬說鮑彤洩密，根據何在？直到今天，李鵬也沒有說。他當時跟趙紫陽說這句話時，他到底掌握什麼證據？難道他在當天下午就已經知道，我在當天晚上要洩密了？這不是荒唐嘛！」但是，無論鮑彤如何辯駁，直到最後，官方起訴書上寫的仍然是，「鮑彤洩露了趙紫陽即將下台的機密」。

審查中對鮑彤的第二項指控是「反革命宣傳煽動」，所謂「事實」是指 1989 年 5 月 20 日上午陳一諮來看鮑彤，回去後搞了「李鵬其人」傳單的事情。對這件事，本書前一章中也談到了【480】。專案組認為，鮑彤與陳一起進行了「密謀策劃」，進行反對戒嚴的宣傳活動，也就是進行顛覆國家政權的宣傳鼓動。鮑彤說來回憶說：「實際上，陳一諮來，我根本沒跟他談大的事情。因為重要的事情中央已經定了，我跟他談就能解決問題了？叫中央收回成命，可能嗎？所以，一個字都沒提。不錯，我當時確實對李鵬非常不滿。所以，一提到李鵬，一觸即發，就說李鵬的家人沒有教養，講了李鵬家裏雞毛蒜皮的事情。揭李鵬的老底兒，表示我對李鵬不佩服。難道這就叫反對戒嚴？就是反革命宣傳鼓動？」專案組說：「體改所的傳單是你同意了寫的。」鮑彤說：「散發傳單、遊行示威本身就是無政府行為，用不著向上級請示報告，也用不著誰同意。同時，我們之間並不存在上下級關係，陳一諮沒有必要向我請示，我也沒有權力批准！」

儘管在審查和後來的預審過程中，鮑彤據理進行了申辯，各方面提供的證據都證明這兩項指控不能成立，但兩年後檢查院起訴時，仍然堅持這兩項指控。

1991 年 4 月 16 日，中紀委派了兩個局長和一個工作人員，到秦城來，向鮑彤宣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開除鮑彤黨籍的決定。決定全

【480】見本書第十四章第 6 節，「陳一諮來訪和『李鵬其人』」。

文只有 4 行字，說：「中共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委員鮑彤，在 1989 年動亂期間洩露國家機密，並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已嚴重觸犯刑律，完全喪失了共產黨員的資格。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撤消鮑彤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職務，開除其黨籍。」這就是說，從 1989 年 5 月 28 日到這個撤職決定中間的兩年零 8 個月的時間，鮑彤仍然是合法的中共中央委員，卻被不合法地關押在監獄裏！

鮑彤認為，這個決定有兩個致命點：一是不符合中國共產黨黨章，二是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有關法律。鮑彤為此致信給「中紀委常委各同志，中央政治局各同志，並送小平、陳雲同志」，信中說：第一，「黨章第 41 條規定，『黨組織對黨員作出處分決定，應當實事求是地查清事實，所要作出的處分決定和所依據的事實材料，必須同本人見面，聽取他說明情況和申辯。』但是，這次給我看的，不是『所要作出的』決定，而是二十天前『已經作出的』決定；也沒有給我看『事實材料』。因此，這不符合黨章規定。」第二，依照憲法，「只有人民法院才是有權判定是否『嚴重觸犯刑律』的唯一法定機關，才有權對此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結論。」「在人民法院尚未開庭審判的情況下，由政治局宣佈我『已嚴重觸犯刑律』，我認為，這樣做不符合憲法和法律的規定。政治局是中央委員會閉幕期間全黨最高領導機關，不宜代替地方法院的合議庭或審判委員會的工作。」

鮑彤後來說：「政治局之所以要趕在進入司法程序之前作出開除我黨籍的決定，是因為馬上就要開中共十四大了，在十四大上，對趙紫陽案和鮑彤案必須對全黨有個交代。他們另一個目的，是要趕在進入司法程序前，定下起訴和判決的基調。李鵬一夥早在 1989 年學潮初起時就宣稱，這場『動亂』，有後台，有黑手，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後來還一再重複這種話。可已經過去兩年了，不抓出個把『黑手』來，如何向全黨、全國交代？按照他們的本意，是想給趙紫陽戴上這頂帽子，可一來找不到任何事實，二來把總書記說成『黑手』，全黨、全國都很難接受，那麼就只有讓鮑彤來背這個黑鍋了。反正鮑彤是壞人，又和趙有直接關係，給鮑定了罪，趙就脫不了關係了。至於能不能找到鮑的犯罪事實，那就是檢查院和法院的事情了。政治局定了調子，檢查院和法院就得按這個調子辦。辦鮑彤案，可以不顧事實，不管法律，反正他就是有罪，就是洩密，就是反革命——這是政

治局這個決定的精髓，從文字，到內容，到選擇的時間，到採取的非法程序，都表達了這樣的信息。」

1992 年 7 月 21 日，在鮑彤已經被無辜關押了三年多之後，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終於以洩漏國家機密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的罪名，開庭審判鮑彤案。鮑彤和家人委託了張思之、楊敦先兩位知名律師作為他的辯護人。庭審以「涉及國家機密」為由，秘密進行。據鮑彤後來回憶說，「審判庭是一個可以容納三、五百人的大禮堂，台上只有 3 個法官，台下右邊是兩位檢察官，左邊坐著兩位辯護律師，加上被告鮑彤，後面的座位空無一人。有一位攝影師，拍攝了整個庭審過程。從開始到結束，一共延續了 3 個小時，只有 9 個人參與了這一過程。」

在庭審中，辯護人針對檢查院提出的鮑彤洩露了「趙紫陽即將辭職」的「國家機密」，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進行了無罪辯護。鮑彤也在發言中進行了辯駁。但是，法庭根本不予採信！鮑彤後來告訴筆者，整個審判過程都是事先編導好的。公訴人宣讀起訴書，法官問鮑彤有什麼意見，鮑彤提出意見，但是法官不理；辯護人作無罪辯護，發表意見，法官也不作任何回答。不管當事人和辯護人說什麼，他們都不予置理。顯然，他們是按照既定的「劇本」演戲。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既定的方針、既定的台詞和既定的程序。法官不斷地說：「請公訴人說」，不論律師如何抗議，法官還是說：「請公訴人說，繼續講」。鮑彤說：「當時，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自己像是處在一個荒蕪人跡的空曠沙漠裏，沒有人能聽到我的辯護詞和律師的抗議聲。從形式上看，也讓我和律師講話，但根本不予採信，整整過程 3 個小時，都是按照既定的套路走過場！」

在法庭上，鮑彤作了最後的陳述，他說：「對我進行了將近 3 年的審查，有關部門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向你們表示感謝。我向你們表示感謝，不是因為你們認定了鮑彤犯了什麼罪，這個東西本身也是站不住腳的。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它不再指控我犯了什麼罪。由此可證，過去國務院在向人大常委報告中對我的指控，都是捕風捉影，無中生有。」

就在庭審進行的時候，鮑彤的妻子蔣宗曹、女兒鮑簡和兩歲多的小外孫女等幾位親屬，在法院門口一直等著。直到法官要進行最後宣判時，才讓他們進去。法官開始宣讀判決書：「被告人鮑彤，犯洩露國

家重要機密罪，判處有期徒刑 4 年；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有期徒刑 5 年，剝奪政治權利 2 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 7 年，剝奪政治權利 2 年。」

那天，記得還下著濛濛小雨。我也騎著自行車，來到法院的大門前，看到戒備森嚴的門口正在苦苦等待的老鮑夫人、女兒和外孫女的身影，我知道，此刻，老鮑正在法庭裏面為自己，也為這個國家的自由不屈地進行著鬥爭，我的眼睛不由得濕潤了。

在宗鳳鳴《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一書中，記載了趙紫陽談到他所瞭解的鮑彤案的一些情況。趙說：在鮑彤案審理過程中，「大概是喬石表了個態度，由公安部、司法部、監察部共同打了個報告給中央，說明不夠起訴條件。對這個報告中央常委都已圈閱，並沒有提出不同意見來。後來，這個報告又轉到鄧小平那裏，據說對這個報告，鄧看也沒有看，就說：為什麼不可判刑呢？鮑彤是個壞人麼！就這樣，對鮑彤判了七年徒刑。」【481】

兩個月後的 8 月 27 日，針對兩次不符合法律規定的「審判」（上訴也被駁回），鮑彤寫了一份申訴書。在這份申訴書的最後，他表示：「我願一如既往，為國家的民主與法制，改革與開放，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做出應有的努力。至於個人的此番蒙冤受辱，既是發展過程中的一種歷史現象，又是一種無情的政治現實，自信能以理解。我決不懷疑，是非曲直終將澄清，公正解決之日終能到來！歷史是公正的，歷史的審判必然也是公正的。」【482】

二、「你們這樣做是違反黨章和憲法的！」

1989 年 5 月 28 日，車子出了北郊，還在一直向北。

「我們這是到哪裏去？」我問分坐在我的兩側，負責「保護」我的兩位。得到的回答是：「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這個回答使我意識到，眼下我已經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囚徒。

我不再講話，只是從車窗向外看著，希望能從車外一閃而過的建築物上找到我所要的答案。

【481】宗鳳鳴：《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開放出版社 2007 年 1 月版，第 70 頁。

【482】在鮑彤表示要提出申訴之後，有關部門答覆：如果要申訴，在複查期間不准家人探監。鮑問，複查期多長？答覆說，不一定，法律沒有規定。當時，每月和家人相見一小時，是鮑彤獄中生命中的唯一內容，為了不致再遭剝奪，鮑彤後決定放棄申訴。

車子已經走了近一個小時。我看見，遠處的山巒越來越近，前面是一個較大的城鎮。我注意看著路邊建築物的牌子，是昌平！車子開到了昌平鎮郊，七拐八拐，進了一個小院子，在一座小小的二層樓前停下了。

我被帶上了二樓，進了一間約有 14 平方米的房間。屋子裏有一張床，兩個單人沙發，還有一張桌子。我進屋後，有兩個人就在房間的沙發上坐了下來。我知道，這是監視我的。

天漸漸黑下來了。我的情緒也逐漸冷靜下來。這時，一個被這夥人稱作「老張」的人進來，開始用鐵絲擰這間屋子唯一的窗子上的開關和鐵銷，看來，這是怕我跑掉；又有人來切斷了牆上插座上的電源，這是怕我想不開自殺；就是連我要上廁所，也不能關門，有人跟著進來。我心裏又好氣又好笑。我知道自己面臨的日子將會是嚴峻的，但是我沒有做什麼虧心事，我相信我跟隨了兩年多的老鮑也沒幹什麼對不起這個國家、對不起人民的事，我還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將來再去為國家、為老百姓幹點事，豈有自殺之理！我諷刺他們說，你們太過慮了，我還不至於那麼想不開。

我本來以為，馬上就會有人來和我談話，但是直到晚上，也不見動靜。只見帶我來的那些人裏出外進地忙著安頓。我就對其中一個像是負責的人提出，你們不是要和我談麼？為什麼還不談？這個人以很生硬的口氣對我說，我們是負責「安排」你們的生活，「保護」你們安全的。另外有人和你們談。今天可能談不了，你先安心住下吧。過一會，你把你需要的生活用品寫一個單子，我們安排人去你家裏取一下。

我當即表示，請你們送我回去。如果要談什麼，我可以隨時再來。你們不能限制我的自由！那人說，這不是我們能決定的。我們只是按上邊的指示辦事。你如果有什麼意見，等來人和你談的時候，你和他們講。聽了這話，我十分憤慨，對他們說，你們這樣做是違反黨章、違反憲法的，我表示強烈抗議！

第二天早上，和我談話的人，來了。他們自稱是中組部的，一個姓賈，另一個說是姓劉【483】，要我「配合組織對鮑彤的審查」。我要求看他們的工作證，但他們不給看。在這種情況下，我拒絕了他們的要

【483】後來我搞清楚了，這兩位，一個是安全部的處長，另一位是公安部的，職務不知道。

求。我說：「我是機要人員。保密紀律要求我在不明你們身份的情況下，不能向你們談任何問題。」並再次對他們的非法拘禁表示抗議。看著他們一個個冷漠的面孔，我知道，抗議是沒有什麼用的。在中共的歷史上，在這個國家的歷史上，這種殘酷的黨內鬥爭，這種踐踏黨章、法律的現象難道還少嗎？在一些當權者看來，他們的意志就是法。但是，作為一個黨員，作為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此嚴重違法的行為，我不能不表示我的態度。

我要來紙筆，寫下了一封抗議信，題目是「我的意見書」，全文如下：

我是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研究人員，兼任鮑彤同志的秘書，一個有15年黨齡的共產黨員。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情況下，我的黨性要求我表示如下意見：

一、我作為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一個中國共產黨黨員，應當享有憲法、法律、黨章、黨內政治生活準則所賦予的一切權利。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未經檢查院批准，不受逮捕。國家依法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關於黨內若干政治生活準則》規定，黨內嚴禁用超越憲法和法律的手段對待黨員。十三大報告指出，任何一級黨組織都不得侵犯黨章所賦予黨員的權利。黨章也明確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根據以上規定，我認為，限制我人身自由的作法，是非法的，也是違反黨章和黨內政治生活準則的。

二、我是在文革中入黨的黨員，對文革中那種黨內民主生活受到嚴重踐踏、憲法和法律蕩然無存的現象仍然記憶猶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對我們黨總結了歷史經驗教訓，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走上民主和法制軌道感到欣喜和擁護，對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沒有民主、法制就沒有社會主義」的指示十分贊同和擁護。就在不久前，李鵬總理在見外賓時也曾講過，我們社會主義中國要堅定地維護民主、自由、法制和人權。對此，我也十分擁護。我曾認為在痛定思痛、總結教訓之後，踐踏黨內民主、侵犯公民權利的悲劇不會再重演，但是，我目前失去人身自由的事實，使我萬分遺憾和痛心。這種做法和文革中的一些做法似乎沒有什麼兩樣！如果傳出去，將會對我們黨、國家的形象造成多麼大的傷害！

我認為，如果說，我的行為觸犯了刑律，請向我出示由檢查院簽發的拘留證或逮捕證；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只能認為限制我人身自由的做法是違法和違反黨章的。這種做法已經觸犯了我國刑法，構成非法拘禁罪。我將保留向司法機關提起訴訟的權利。

三、來找我談話的同志向我解釋，這種對我實行拘禁的做法是組織決定的，並要求我服從。我認為，任何一級組織或個人都無權做出違反黨章和黨內政治生活準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決定。在黨章、憲法、法律和這種非法的「組織決定」面前，我的黨性要求我只能服從黨章、憲法和法律。我相信，這是和黨的根本利益、黨員的黨性原則，和民主、法制原則是一致的。我對黨、對人民問心無愧。

四、我作為共產黨員和秘書，在中央決定對鮑彤同志進行審查時，有義務配合組織搞清問題，對此，我沒有任何異議，我也準備這樣做。但是，在失去人身自由、受到非法拘禁的情況下，我無法心平氣和地思考問題。另外，找我談話的同志表示不能告訴我他們的姓名、身份。在這種情況下，我也無法和他們談。我是機要人員，黨內的保密紀律和國家保密法要求我，在不明談話人員身份的情況下，不能隨意洩露黨內機密。

由於上述原因，我強烈要求：

一、立即恢復我的人身自由；

二、保障我享有黨章、憲法、法律賦予我的一切權利；

三、立即將我的狀況告知我的家屬和我所在單位黨組織；

四、在我的人身自由得到保障，和向我公開談話人員身份的前提下，我將盡力配合組織，搞清問題。

共產黨員：吳偉

1989年5月29日上午8：25

在將抗議信交給他們的時候，我說：「我從現在開始絕食。除非你們恢復我的人身自由，並表明你們的身份。」他們慌了，反覆勸我不要絕食，說這樣做對我沒有什麼好處，也於事無補，表示他們會很快拿來有關文件，證明他們的身份。我知道，絕食只是說說而已，強硬地對抗下去，確實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我表示，我可以退一步，暫不絕食，希望你們能在三天內拿來能讓我信服的有關文件。

隔了一天，那兩位來了，自稱是鮑彤專案組的，帶來了一份蓋著「中共中央辦公廳」紅章的文件，上面的文字大意是：中央決定對鮑彤同志進行審查。請相關人員配合組織，搞清問題。我當即表示，我願意配合組織。但是，我認為，鮑彤同志和我們中央政改研究室在這段時間，從事的都是黨所交給的工作，都是在研究怎麼樣才能平息學潮，沒有做任何違反黨章、黨紀、國法的事情，我自信是經得起審查的。你們要問任何問題，只要是我知道的，我都可以告訴你們。但我特別要強調一點：必須實事求是。

三、「城裏開槍了」，我要實事求是

專案組要我先把自耀邦逝世以來，鮑彤的主要活動回憶一下，寫下來。我答應了。但是沒過幾天，剛剛開始動筆，6 月 4 日早晨，就感到了一種緊張氣氛。早飯沒有按時開，看守我的人解釋說是「沒有煤氣了」，要我收拾一下，換一個地方。我知道，煤氣只是借口，但我還想不出為什麼要換地方。就這樣，我又被帶上了車。車子出了昌平過一個鐵道路口時，我看到一塊路牌上寫著「秦城道口」。我知道，這回要進秦城監獄了。

車子連續經過了兩道有軍人站崗的大門，停在一座帶小院的三層樓前，樓後是一坐有百十米高的小山。進了樓，發現整個樓都是空的。我被帶到一樓的一個房間。下車時，我看到電輝在我後面被帶到了二樓。後來熟悉以後，看守我的人私下告訴我，這裏是公安部研究所的一個招待所，現在都騰出來給我們用。隔牆裏面的那個院子，就是秦城監獄了。

4 日下午，和我談話的人又來了，但我感覺，他們的情緒都很不對勁。在其中的一個去了廁所的時候，那位年紀大些的心情沉重地低聲告訴我：城裏開槍了！死了很多人！我腦子裏嗡的一下，呆住了。在來秦城之前的那幾天，我和室裏的同事們就曾議論到，李鵬一夥不會甘心事態這樣相持下去，他們早晚會有動手的一天，流血可能是難免的。但沒想到他們敢直接開槍殺人。雖然我在與外界隔絕的情況下，還不知道情況有多嚴重，但我從對方的表情中，知道事情不會是那麼簡單了。我的淚水流了下來，不知道廣場上的那些學生、我的那些同事們怎麼樣了？

專案組的兩位向我解釋，現在外面很亂，為了安全，轉移到秦城這個地方。我知道，可能老鮑就在大牆內的院子裏，他們帶我和電輝到這裏，一方面是擔心外面不安全，另一方面，大概也是為了工作方便。那幾天，也許是因為形勢變化太快，他們顧不上我吧，沒有人來催我。照舊是一日三餐，勉強還算過過得去的伙食；照舊是每天輪班有兩個人坐在我的房間裏，睡覺也不准關燈；照舊是上廁所也不准關門，洗澡也有人陪著；也照舊是每天一小時放風，可以在有人監視下在小院裏走走。

就在這段時間裏，我仔細考慮了我的處境和未來。說實話，在當時的處境下，要說一點思想壓力沒有，那是胡扯。但從5月下旬開始，特別是從被他們隔離後，我就有了坐牢的思想準備，我知道，在這個體制裏，我已經沒有了未來。我不後悔，現在國家都成了這個樣子，個人的未來又算得了什麼！乾脆不要去管他，隨便了！他們要我說什麼，只要能說的，我都可以說，但我相信老鮑，也相信我自己。違背良心、牽連別人、落井下石的事，我絕對不做。想通了這一點，我思想上的壓力就小了許多。

過了幾天，也許是城裏的事態已經被控制住了，他們又來找我談話，做筆錄，要我寫鮑彤在學潮期間的言行和幾件重點事情的經過。這個時候，是 6 月上旬，外面我們研究室的清查清理還沒有開始，他們希望首先從我和電輝這裏打開缺口。開始時他們重點查的是 5 月 17 號晚上「鮑彤告別演說」的事情、陳一諮 5 月 20 號來訪的事情，和老鮑每天的活動、來訪情況等。可能因為他們是戴著有色眼鏡來的，認為老鮑和研究室是學潮「黑手」，策劃了許多「不可告人的陰謀」，想從我嘴裏得到證實。可當發現我寫的材料裏沒有什麼他們想要的東西後，他們急了。

大約是6月10號左右，專案組的人帶來了一位60多歲的「領導」，他自稱姓李，是公安部的局長。一坐下，他就嚴厲地指責我「態度不老實，有許多東西沒有交待」。我回答說，我得實事求是，沒有的事情不能胡編亂造。他氣得拍了桌子，說：「告訴你吳偉，你的逮捕證就在我的口袋裏，如果你還是這個態度，我們隨時可以讓你搬到裏院【484】去！你會後悔一輩子！」看到他是這個態度，我也拍了一下桌子，氣

【484】指秦城監獄。

憤地說：「隨你便！來了這裏我就有這個思想準備！你公安部也得實事求是！你要逮捕就逮捕好了，沒有的事情，我不能胡說！」看到頂了牛，專案組的另外兩位就打起了「圓場」，要我消消氣，要好好想一下後果。

那些天，要說的東西就是那些，他們不斷地要我「想一想」，「再想一想」。我說，我實在想不起來還有什麼了，如果有什麼，你們可以提醒我一下。這樣僵持著過了些天，到了 7 月份，他們也不再催了。後來我知道，這時外面研究室裏的「清查清理」開始了。他們把從室裏得到的材料和在秦城鮑彤說的、我說的情況相對照，發現我們說的都是有許多人可以證明的事實，根本沒有他們想的什麼「陰謀策劃」，也找不到更多的其他證據，只得鬆了下來。

6 月下旬以後，在我的一再要求下，他們在我住屋子的屋門上面，安裝了一個小喇叭，每天晚上可以收聽半小時的中央台新聞和報紙摘要。大概是 6 月 30 日晚上，我忽然從廣播中聽到了陳希同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所作的《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報告》，報告中說，5 月「17 日晚，鮑彤召集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部分人員，在洩露了即將戒嚴的機密之後，發表了『告別演說』，警告與會者不得把會上密謀策劃的情況透露給別人，否則就是『叛徒』，就是『猶大』。」聽到這一段，我氣憤已極，當即又把我知道的那天「告別演說」的情況重新寫了一份，交給了專案組，向他們聲明，陳希同的報告是在造謠！專案組的人只好搪塞我說：「別急，慢慢會搞清楚的。」

到秦城的前一個多月，專案組幾乎天天來找我談話，後來就慢慢的少了。7 月 18 號下午，專案組的兩位又來找我，表情十分嚴肅，說「你對 5 月 20 號以後的事有問題沒有交待」。我說，「實在想不起來，請你們提示。」他們說：「5 月 20 幾號，鮑彤給趙紫陽起草過一個講話稿，徵求過你的意見，你回憶一下。」我當然記得 5 月 22 號左右，老鮑給紫陽起草的那份準備在政治局會議上講黨內組織程序的講話提綱，老鮑當時確實徵求過我的意見。這也是我一直想躲過去的一個問題。5 月下旬，紫陽在被停止工作以後，還並沒有被立刻罷免總書記職務。他想依照黨章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為改變鄧小平、李鵬等人對學潮動武的決策作一次最後的努力[485]。為此，老鮑起草了那份講稿。

【485】見本書第十四章第 8 節，「這是最後的鬥爭」。

我本不想說出這件事來，給紫陽，也給老鮑增加麻煩。但是，那天我複印時，除了老鮑，外面還有人在場並聽見了我們的談話，看來現在還是被人「揭發」了。面對專案組的質問，我只好裝做剛剛想起來的樣子，說了這件事情的經過。不知道為什麼，這次談話的詢問筆錄，在我手裏留下了底稿，現在成為我寫這件事情的依據。

秦城的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去，慢慢的和看守我的人混熟了。他們私下告訴我，他們是北京市公安局外勤隊的，只負責看守我和電輝，不管案子。案子由專案組管。他們 20 幾個人分兩班，隔兩天換班回城裏一次。我就讓他們在換班時幫我捎來些豆腐乳等食品來對付單調的伙食，又買些書，金庸小說什麼的來看，以打發時間。到 7 月下旬，專案組的人告訴我，張電輝已經「放出去了」，希望我端正態度，認真交待，爭取早日「解脫」。我說，我知道的，能想起來的已經都告訴你們了，如果有新的東西，你們可以提示我。到這時候，他們也知道大概從我這榨不出什麼新東西了。

大概是 8 月 10 幾號，專案組的賈、劉兩位又來找我，這回，他們臉上帶上了笑容，告訴我，「明天，你就可以回去參加你們單位的清查了。回去之前，再和你談一次。」談話中，我提出，你們關了我這兩個多月，外面都會知道吳偉被捕了。現在讓我回去，總得給我個說法吧？他們回答我：「你想要什麼說法呢？能讓你回去本身就已經說明問題了，難道你還要我們寫個什麼東西，裝到你的檔案裏？」我一想，這話也有道理，要個「說法」裝到檔案裏，不是畫蛇添足嗎？！也就不再堅持。談話結束時，他們問我，「在這裏幾個月有什麼想法」？我想了想，說，「看來，我們這個黨又『進步』了。」他們問我什麼意思，我說：「這要是在文革的時候，像我這樣的，還不得關個 10 年 8 年的。現在能讓我回去，不是說明黨又『進步了』嗎？」

那天下午，看守我的幾個小伙子和我說，臨走了，領導讓帶你出去上後山轉轉。他們帶我登上了樓後面的小山，坐在山頂的石頭上聊天。他們指著山下的院落告訴我，你們的鮑彤就關在那裏。我看著山下那一棟棟灰色小樓，心中感慨。我知道，這裏曾經關押過許多共和國的「罪犯」，他們中有許多是和老鮑一樣無辜的人。他們是無罪的，老鮑也是無罪的。歷史早晚會證明這一點。我在心裏向老鮑告別，希望老鮑也能早日獲得自由。

四、中央決定撤銷研究室，但要繼續清查清理

在秦城這兩個多月與外世隔絕，沒有自由的日子裏，我幾乎每天都在盼望著重新回到原來的環境中，與熟悉的朋友們在一起。在我的腦子裏，研究室還是我幾個月前離開時的那個研究室，那個同事之間氣氛融洽、相互信任、可以無話不談的研究室。但是，8 月 10 幾號那天一上班，我就知道，我錯了。

也許是心態變了，也許是環境變了。走在北京的街道上，似乎就能感覺到一種肅殺的氣氛。來到辦公室，雖然許多同事都過來看我，打招呼和表示慰問，但已經感覺不到過去那種融洽與親密無間，有些人很快就回了自己房間。幾位留下來的同事告訴我，室裏進駐了工作組，來了快兩個月了，清查清理早已經開始。有人問到我在秦城的情況，我大概說了一下，並隨嘴說了一句：「該說的都說了，不該說的，我一句也沒有說。」哪裏知道，這句話很快就傳到了工作組的耳朵裏。當天下午工作組領導找我談話，告訴我，回來以後要提高認識，端正態度，繼續參加室裏的清查清理，把自己瞭解的動亂期間的情況寫出來。然後，就問我：「聽說你說了，在秦城期間你不該說的，一句也沒有說？哪些是不該說的啊？」我一愣，剛剛說的話怎麼這麼快就到了工作組的耳朵裏？我連忙解釋，我的意思是說要實事求是，沒有的事情當然不該亂說。也許這樣解釋讓工作組半信半疑，但還是混過去了。我心中明白，現在的研究室已經發生了變化，說話要小心些了。

回來的第二天，研究室秘書長陳群林找我私下裏談了一次話。群林向我介紹了 5 月 28 日老鮑和我、電輝被帶走後，到目前室裏的大致情況。從他那裏我瞭解到：

5 月 28 日下午，中辦副主任徐瑞新電話通知陳群林，鮑彤、吳偉、張電輝被帶到另外一個地方「休息」，要陳做好家屬工作。

6 月 7 日，中辦副主任徐瑞新通知，研究室的工作，從明天開始由賀光輝主持。

9 日，賀光輝來研究室，召開機關黨委擴大會，找人進行個別談話，又多次召開全室大會，傳達鄧小平的幾次講話及有關文件，提出要「認真學習、清理思想、提高認識、同中央保持一致」的要求。

14 日，研究室機關黨委向中直工委報告：「4 月中旬學潮開始後，室領導提出，我室沒有處理學潮的任務，所有人員都不得參加與學潮

有關的各類活動。5月19日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之後，我們組織了認真學習，傳達貫徹了中直工委的兩次通知，並於5月22日召開機關黨委委員和局以上幹部聯席會，決定並要求全室人員顧全大局，堅守崗位，遵守紀律，不參與社會上的任何活動。5月28日後，鑒於室領導不在，機關黨委又於30日開會決定，並要求全室人員做到三條：(1)堅持正常上下班；(2)不要與外單位人員聯繫；(3)本室發生的一些特殊情況，不允許外傳。由於有上述多次要求，從學潮開始至今，我室幹部、職工沒有出現上街遊行、聲援等情況，未發現本室人員參與外單位組織的這類活動，也沒有人參與違反戒嚴令的各種活動。」

17日下午，中直工委派出4個人的工作組進駐中央政改研究室「瞭解情況，幫助機關黨委組織學習」。組長金石【486】，中辦的離休老幹部，為人還算正直。文革中間，他也受過很多冤枉，所以他後來在整個調查過程中，比較實事求是。他在幾次會上都強調，不管誰怎麼說，你們要本著實事求是這樣一個態度來對待審查。工作組其他成員來自中組部、中直工委等單位。由此，中央政改研究室的清查清理工作正式開始。

18日，研究室行政改革局副局長高山被捕。

30日，全室人員開會，賀光輝主持。中直工委常務副書記顧雲飛【487】講話。顧說：工委決定，正式向政改研究室派出工作組。還是以金石為組長的那4個人，全面領導學習、清理思想，揭發趙紫陽，揭發鮑彤的問題。蛛絲馬跡也要揭。賀光輝表示，完全同意顧雲飛的講話，歡迎金石為首的工作組全面領導我室的學習和揭發。

7月5日，顧雲飛親自找研究室秘書長陳群林談話，動員他「帶頭揭發」。顧說：「你要帶頭揭發，越徹底越好，越主動越好。我希望你們不要採取觀望的態度，早揭發比晚揭發好，揭發比不揭發好。不要聰明人辦糊塗事。你應該知道很多事情，現在還是這種態度，不應該。」

【486】金石，時任中央清查辦向政改研究室派出的工作組負責人，副部級，當時已離休。

【487】顧雲飛(1930-2000)，江蘇吳江市人，1952年8月入黨。後任鐵道部黨組成員、紀委書記兼直屬機關黨委書記，1988年3月起任中直工委常務副書記，1989年兼任中共中央直屬機關清查負責人。

14日，研究室機關黨委向中直工委作「我室最近學習、清理的情況報告」，報告中說：「7月8日、11日、12日上午，研究人員集中學習，認真回憶和核實了從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後至5月28日鮑彤同志被隔離審查期間集體性質的活動，共20次。……上述各次活動的脈絡已基本理清，情節已初步弄准。對鮑彤同志傳達的中央精神和他的若干次講話，正整理書面材料或補充材料。工作組的同志始終參加了學習，在啟迪思路，消除顧慮方面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學習中也反映出同志們還存在一定的顧慮，特別是參加了5月17日『告別漫談』的同志感到壓力很大。他們反映，陳希同同志在『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中對這一事件的敘述與事實有兩點出入，一是鮑彤確實未談到『即將戒嚴』，二是確實不存在『密謀策劃』。他們希望中央能進一步核實情況，準確定性。」

8月3日，「上邊」通知，吳偉也要回來。強調兩點：一是裏邊的情況，他不講大家也不要打聽。鮑彤的有關問題，已經搞清。二是「他回來後照常上班，參加學習，一視同仁。大家要像過去一樣，保持同志關係，不要太冷淡。」

8日，工作組召開全室工作人員會議，金石小結前段時間清查清理情況，對下步工作作了部署，提出要「把學習、清理同考察幹部結合起來進行」，「下一步任務仍然很重，有些問題要進一步揭發，有些問題要調查核實，分清是非，提高認識。」

談話中群林還告訴我，經過這段時間在政治高壓下的清查，現在室裏有些人的心態已經有了較大變化。他叮囑我，人心隔肚皮，說話一定要謹慎。

我回來上班後不久，8月16日，工作組長金石召集全室人員會議，傳達了中共中央7月28日的決定，撤銷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與此同時，中央還決定，撤銷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經金石與賀光輝商量後，決定了三條意見，一是由金石向政研室傳達中央撤銷研究室的通知；二是幹部和人員分配由中組部負責；三是原研究室成立一個留守組，負責處理善後事宜。留守組由賀光輝領導，陳小魯、周大力、貝際波參加。日常工作主要由陳小魯負責。這樣，陳群林這個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被「靠邊站」，不再負責室裏工作，而是要「配合工作組工作」。工作組要求所有原來研究室的人員一

律不動，都要留下來，集中學習文件，參加清查清理，回憶情況，揭發問題。對一些同志在動亂期間的情況「要做鑒定」。

五、一年半的審查：不是「黑手」是「模範單位」

後來我才知道，1989 年 6、7 月間，中共中央下發了一個專門介紹「趙紫陽分裂黨，支持動亂」情況的 19 號文件，發到省軍級，文件中點了我們中央政改研究室很多人和事。這個文件我當然是無緣看到，但據看過這個文件的陳小魯回憶說：「這個文件我看了，當然不是通過正式渠道看的。看完以後，這麼說吧，其中一半兒是不公正的，一半兒是假的。別的我不好說，就說其中多處提到政改研究室的事，都是捕風捉影、道聽途說來的東西。可能是有這個事情，有這麼點兒影子，事實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兒。」【488】

中央工作組負責人金石與工作組其他人就是帶著這個文件的框框下來的。當時，他們根據這些材料，確信鮑彤和政改研究室是發動學潮、指揮動亂的「幕後黑手」，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總指揮部」，趙紫陽就是這一切的「總後台」。工作組的目的就是找到與此相關的證據，來證明中央文件中的說法，證明李鵬的說法是正確的。在這種先入為主的思想指導下，他們許多次召開會議，組織研究室的人學習中央文件和領導講話，同時還找每個人個別談話動員，要大家提高和統一認識，「和中央保持一致」，揭發趙紫陽和鮑彤在學潮、動亂中的「錯誤言行」。我從秦城回來的時候，這項工作正在進行當中。

工作組要我把在秦城期間的「交待」材料再給他們寫一遍。我說，不是寫過了嗎？他們說，寫過的是給鮑彤專案組的，再寫是給工作組的，兩回事。我明白了，他們是兩個系統。好在我在秦城寫的東西都留下了底稿，我就又抄了一遍，交給了工作組。9 月下旬，工作組又來找我，要我仔細回憶 5 月 22 號前後，鮑彤給紫陽起草的那份準備在政治局會議上講黨內組織程序的講話提綱的情況。這件事在秦城時，我已經在專案組的「啟發」下，「交待」過了，我知道現在有人又重提了。我只好又寫了一份，交了上去。

那個時候，室裏的同事們都是這樣，一遍遍地在大會、小會或個別談話中被「啟發」，又一遍遍地寫「回憶材料」。在當時的政治高壓

【488】陳小魯：〈回憶在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經歷〉，載米鶴都主編《回憶與反思——紅衛兵時代風雲人物》第二冊，香港中國書局，2011 年 3 月版。

下，很快轉變政治態度，要「反戈一擊」揭發趙紫陽和鮑彤的人也不是沒有，但只是個別人，而且也拿不出什麼有力的材料與證據。在中共歷次政治運動中，都不缺少這種人。但絕大多數同事都做到了堅持實事求是。

看到通過組織渠道進行調查找不到什麼東西，上邊有人就打起了陳小魯、唐欣這些「紅二代」的主意，試圖眾他們身上「打開缺口」，或許他們認為只有「紅二代」才是可靠的，才是會和黨站到一起的。

據陳小魯後來回憶說：「在清查期間，楊尚昆、中直工委副書記顧雲飛、中組部副部長、中央清查小組辦公室的負責人劉澤鵬【489】都找我談過話。劉澤鵬找我談過兩次。劉和我過去都是老朋友，他通過一個朋友找我，是誰我不記得了，反正沒有通過組織，讓我去中南海靠南長街那邊有個樓，專門到那去談。劉和我說，我們都瞭解你的。你都記得有什麼情況啊，說一說。將來你和唐欣的工作我們會考慮的。其實他不太瞭解我，我還真是對將來的工作問題考慮的不太多。我和他就講了三件事。第一，我認為趙紫陽不支持動亂，他是想平息動亂，但是他想用另一種方式來平息。這種方式是不是合適，是不是有錯誤，可以討論。第二個，趙紫陽不反鄧，但是他處理動亂的方式跟鄧不一樣。第三，趙的做法是不是有錯誤，適不適當，可以研究，但你不能講趙紫陽分裂黨。認為他有錯誤，拿掉就是了，但你不能採取現在這個辦法。我們中央政改研究室，是黨中央的，是黨的一個機構，不是哪個個人的。你們可以查研究室的工作記錄，工作組查了這麼長時間了，沒有查到有什麼陰謀嘛。我們工作中會有錯誤，我們研討當中也可能有錯誤，這個我從來不否認，但你們不能全盤否定我們這個機構，否定我們的工作。劉澤鵬後來又找我談了一次，我都是這樣說，但沒有，也不可能有什麼太大作用。」陳小魯還說，「後來尚昆也通過總參二部找過我，我談的還是跟劉澤鵬談的一樣。據說，尚昆在我走後，給了一句話，說浪費了一個小時。當然，尚昆對我態度還很好，還是比較客氣的。」

陳小魯還回憶說：「清查的時候，進行防範動亂研究和所謂『小艦隊』這兩件事，都成為中央清查工作組重點調查的事情。他們一開

【489】劉澤鵬，時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中央清查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清查結束後調任國務院僑辦副主任、中國新聞社社長。

始都不相信這樣的情況會發生在我們研究室，不相信我們研究室這些人有這樣強的黨性和組織紀律性。他們下來時帶著個框框，覺得我們一定和策划動亂有關係。後來詳細調查以後，認為是我們說的屬實。我們提的意見這樣尖銳，而且對防止出現動亂進行了專門研究，那你就不是一個陰謀組織嘛，能講出這種話來怎麼會是陰謀？所以後來金石他們的工作組對我們室的評價是『基本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聽說清查工作組第一次給中央的報告，報告一上去上邊就氣翻了，說這個清查怎麼能搞成這個樣子啊，如果他們沒問題，那動亂是從哪裏來的？在他們的腦子裏，好像動亂就應該是我們研究室策劃出來的。後來工作組的一個同志（好像是中直機關黨委派來的）私下裏跟我講，他說你看看我們倒霉不倒霉吧，我們本來還要清查你們呢，可現在顧雲飛來了，要清查我們，好像我們包庇了你們似的。顧雲飛來了就找我談，我說這些事情呢，你可以去調查，我們這個機構，在這一年多時間就是這樣工作的。」

那段時間，顧雲飛還找過唐欣談話，唐欣後來回憶說，1989 年 10 月，顧雲飛找我談話，說，「聽說你早就對研究室有認識，去年冬天你就提出研究室是『小艦隊』，在那個時候就能認識到這一點，很不容易。」我連忙對他說：「顧書記，你搞錯了，我沒有說研究室是『小艦隊』，我是聽到外面有傳言，說我們是什麼『小艦隊』。後來在室裏的年終總結會上，我對工作方法上提出些意見，就借用了這個說法，我說的是不要給人造成一種我們是某某人『小艦隊』的印象。聽到我的這個回答，顧很失望，也很不滿意。兩天後，我給顧雲飛寫了一份文字材料，附上了複印的我當時工作筆記，證明我說的話。」

後來聽說楊尚昆有一個說法，說高幹子女出了兩個半叛徒，其中的「兩個」指的是李勇【490】和陳小魯，「半個」指的是唐欣，說對唐欣，看不出來這小子叛變沒叛變。

經過半年多的發動大家「揭發檢舉」和嚴密審查，工作組發現事與願違，在大家所寫的材料中幾乎沒有找到任何與他們的目標相關的證據，反而證明中央政改研究室是動亂中的一個「模範單位」。在整個學潮那段時間，研究室非但沒有搞過什麼「密謀策劃」、「指揮動亂」，

【490】李勇（1948-）：中共元老、文革前曾經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富春之孫，1985-1989 年任趙紫陽秘書；後任天津開發區管委會副主任、黨組書記。

反而絕大多數人都是守紀律的。當時中直機關其他部門都有人打著旗子上街遊行，支持學生，中組部中宣部的都有，只有政改研究室，由於鮑彤和機關黨委的約束，一個上街遊行的都沒有。鮑彤在「告別演說」中根本沒有洩露什麼「戒嚴機密」，也沒有在中央政改研究室搞什麼「陰謀策劃」；高山參加三所一會的會議也只是他個人行為，並沒有「受鮑彤指派」。他們找到的「問題」都只是些陳糠亂谷子的小事，根本拿不上檯面，也證明不了任何問題。最後工作組只能作出了一個「中央政改研究室基本上堅持了四項基本原則」的結論。據說，工作組給中央清查辦的報告，讓當時中央負責清查清理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丁關根氣得拍了桌子，由此也讓金石為首的工作組失去了上邊的信任。在進駐半年以後，派駐中央政改研究室的清查工作組被「加強」，顧雲飛親自出馬擔任工作組負責人。這樣又搞了大半年，不但調查我們研究室，據說還調查了前作工作組有沒有包庇行為，但仍然幾乎是一無所獲。

六、雞蛋裏挑骨頭也處分幾個人

到了 1990 年底，研究室的清查清理實在搞不出什麼新鮮東西，整黨進入了黨員重新登記的後期處理階段，研究室這些人分配工作也即將開始。工作組幾乎什麼有價值的問題也沒查到，覺得很為難。本來嘛，這麼大一個研究室，這麼多人，還據說趙紫陽是「總後台」，是「指揮動亂的黑手」，可除了在裏面關著的鮑彤、高山另行處理以外，其他人卻是乾乾淨淨，拿得出手的證據幾乎一點沒有。要是讓這些人輕鬆過著關，如何向上邊交待？讓李鵬一夥如何下台？這不能不讓工作組惱火。他們決定無論如何也要處分個把人。

找不到問題怎麼辦？雞蛋裏挑骨頭。白慧敏是研究室資料室的負責人，工作責任就是收集外面的各種資料。在學潮期間的一天，《世界經濟導報》記者張偉國到室裏來，見到了白慧敏。談話中說到上海世經導報為抗議欽本立被撤職，發了一份聲明。白說這份聲明研究室的資料室沒有，張說他那裏有一份。白慧敏就提出複印一下，張說，那就也代我複印一份。小白也沒有當回事，在為資料室複印了一份的同時，也代張偉國印了一份。因為這樣一件什麼問題也算不上的小事，工作組就上綱上線，提出給小白一個黨內警告處分。

另外一件他們能抓住的問題，就是陳群林的事情。鮑彤在臨被抓走前的一天，他交待給群林一件事情，說，我如果被帶走，請你想辦法轉告杜潤生杜老【491】，鮑彤被隔離了。就是這樣一句話，群林後來輾轉通過別人完成了老鮑的交代，也為自己找了個麻煩。工作組與群林談話時說：「明明知道鮑彤起碼是犯了錯誤，你陳群林還為他傳話，違背了組織原則。念此事未造成危害，考慮到當時的特殊情況，在清查期間你做了大量穩定研究室的工作，就不直接給處分了，但要給一個『免予黨內處分』的處分。」對這樣一個黨章裏找不到的「處分」，陳群林在處分決定與個人見面時，在上面寫道：「定性上綱上線，處理沒有依據，支部並未通過，個人保留意見。」

就憑這樣兩件事情要給處分，拿到了兩個人所在的支部討論，多數人都難以接受。工作組就要留守組負責人陳小魯去做工作。陳小魯後來回憶說：「工作組非要給我們室一些人處分，要我做大家工作，沒有用，可工作組堅持。要是不給群林一個處分，人家不甘心，你們政改研究室一個人沒處分的話，他們怎麼向上邊交差啊，那你們更是黑『小艦隊』了。後來勉強給了群林一個黨章裏沒有的處分，叫做『免予處分』；小白背了一個警告處分；黃海要做檢討的。我在黨員會上和大家講，有歷史責任我來負，並不是說我認為你們有錯誤，有問題，但是如果我們不處理下去的話，大家就都拖著不能分配工作。我們人待在這兩年了，還是要分配呀。要是有那麼一天，這個燒餅翻過來，你不要找別人，我做檢討。」

中央政改研究室的清查清理工作，在中直機關中是開始最早的，也是最晚結束的，前後進行了一年半多的時間。在後期的組織整頓和黨員重新登記當中，只有前面講到的兩位同事無辜受到輕微處分，所有的黨員登記全部正常通過。這個清查結果，不但使「中央 19 號文件」、陳希同報告、李鵬六四日記等官方文件中，加諸於鮑彤和他領導的中央政改研究室的種種罪名成為笑柄，而且從另外一方面證明了鮑彤和政改研究室的清白，證明了李鵬一夥的指控純屬是子虛烏有、造謠污蔑，證明了他們為了打倒自己的政敵而不擇手段的醜惡嘴臉。

【491】杜潤生（1913-）山西太谷人。有威望的農村改革家。曾任中顧委委員。1983-1989 年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

七、分配中的「貓膩兒」

1990年下半年，清查清理已經搞了一年多，看到實在查不出什麼新東西了，黨員登記也已經完成，原中央政改研究室的幹部分配和安置工作，才在中組部調配局的組織下開始。

撤銷前，中央政改研究室的幹部，總共不到30人。其中一部分行政人員來自中辦，他們可以回去。剩下需要由中組部分配的，滿打滿算不過20人左右。這其中，一半是局級幹部，其他大多是處級。應該說，這麼點幹部的分配，對中組部說來不過是小菜一碟，可就是這「一碟小菜」卻耗費了半年多的時間，直到1991年上半年才完成。

這裏面的難點，說複雜也不複雜，最根本的，就是這批人，已經入了「另冊」。

大概在全世界的各種政治制度下，都有一個用人方面的原則，叫做「一朝天子一朝臣」。不過，在西方現代政治制度中，這一規則是公開的，隨著政黨輪替，領導人的更迭、重新組閣，人事上也必然隨之變化。在中共的體制下，這卻是一種不成文的「潛規則」：換了領導人，表面上標榜要搞「五湖四海」，實際上卻都要重用「自己人」。特別是那些在黨內鬥爭中犯了「路線錯誤」下了台的領導人，他們原來的屬下必然不會再被政治鬥爭的勝利者所信任，除非你有「立功表現」。1989年六四之後的清查清理，雖然不致於像文革那樣，把我們這些「跟錯了人、站錯了隊」的幹部統統關進監獄，但「打入另冊」是不可避免的，儘管在清查清理中他們沒有查出什麼能拿到桌面上的問題。據說，「又進步了」的黨中央，給我們研究室的幹部分配工作定了三條原則：一是不能進中央黨政機關；二是不能進要害部門；三是沒有大的問題的幹部也只做同級安排。

我們這次被分配的20幾個人大都是局、處級，這樣的級別在中央機關算不上什麼，但要分配到下面單位去，大大小小都是個「領導」。為了不讓這些人掌握「要害部門」，必須選擇那些無關痛癢、處於體制邊緣的單位進行安排，這不能不讓中組部管分配的人在單位選擇上傷透了腦筋。

那時候，中組部的人被直接派來參加我們室工作組，記得是調配局一位康姓的處長。總的說，他對大家工作分配的態度還是滿好的，當然，是要在上邊確定的原則之下。他們可以為你出面聯繫安排工

作，甚至你也可以去自己聯繫單位，當然，批不批准你去，那就是他們的權力了。

本來，我只是個正處級的幹部，工作分配應該不難。但是由於我的鮑彤秘書的身份，在當時卻使我成了分配中的「老大難」。我聯繫了幾個單位，甚至工作組也幫助我聯繫，但卻幾乎沒有單位願意要。當時我的老家吉林省一位與我相熟的領導聽說我這種情況，要吉林省政府駐京辦事處主任找到我，說，吳偉在北京分配工作有困難，就讓他回來吧，咱們省裏給他安排工作。在這個時候能聽到這種話，讓我很感動，我也表示了感謝。但是一想，以我的情況，在這個時候回吉林省，不是給這位省長找麻煩嗎？再說，在北京與六四有關的人多了去了，我算不上什麼，可回到吉林省，我大概就成為重點人物，成了人家監控的主要對象了，還是不回去的好。

室裏的副局長唐欣與人民出版社當時的社長薛德震相熟，他把我的情況向薛介紹了，薛很感興趣。人民出版社政治理論編輯室原來的主任即將退休，薛社長願意要我去擔任這個職務。可這個事情報到中組部，很快就通知我，新聞出版署人事司回覆，擔任人民出版社政治理論編輯室主任這個職務，必須政治上可靠，而且要中宣部批准。像我這樣一個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當然不可能得到批准。在這種情況下，我就想另找個單位，哪知道中組部管分配的人說，既然你聯繫了新聞出版署，那你就去那裏吧，不然你就回吉林省，別的單位，不用想了。可過了幾個月，新聞出版署卻一直安排不下去。有人告訴我，出版署人事司聯繫了商務印書館、新聞出版報等幾個單位，人家都不要。後來，還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社長單基夫表示，實在沒人要，我們要了吧。就這樣，我成了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處理品」，在1991年初來到大百科出版社，擔任了《百科知識》雜誌編輯部副主任。後來聽說，大百科的社長單基夫原來是四川省委宣傳部部長，紫陽在四川任省委書記期間，單也曾是他的部下。

原來研究室綜合局副局長孫方明，是中國農村發展組的老資格，1984年到中央書記處辦公室工作，後來給中宣部長朱厚澤做秘書，是中央政改辦的第一批研究人員，起草《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主要執筆人。在1989年5月中旬學潮最緊張那幾天，因患肝炎在家休養的他回到了老家貴陽。到貴陽那天，幾個老朋友來看他，談起形勢，

他就說了些個人看法。後來被新華分社一個年輕記者搞了份內參上去，六四以後，被貴州省列為清查的一號大案。研究室清查時工作組要他就此事做了檢討。在分配工作時，他個人聯繫到建行總行，那邊同意接收，中組部開始也表示同意，不久不知為何卻變卦了，堅持要分配他回老家貴州。後來才聽知情人說，是「賀光輝同志受李鵬同志委託，給中組部打了個電話」。電話記錄中說，這個人觀點上傾向於趙，是鮑的主要骨幹，不能到要害部門，要堅決分配到外地。當時孫方明提出辭職，中組部的人說你是黨培養那麼多年幹部，怎麼能辭職呢，你還是去貴州吧。這樣孫就被分配到了貴州省政府經濟研究中心當副主任。

原研究室社會改革局副局長石肖巖的分配更是一波三折。石是全國青聯常委，來我們室之前曾任《中國政協報》副總編。這一年多清查也沒有查出他有什麼問題。開始時，他的分配還算順利，由於商業部長胡平的大力支持，分配到了商業部，準備安排他擔任《中國商報》社副社長。就在這個時候，1990 年 11 月底，作為北大荒老知青的他，和當年兵團的老戰友姜昆【492】、濮存昕【493】等一起，在位於天安門廣場的中國革命博物館，舉辦了《魂繫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顧展》，得到了北京知青們的熱烈響應。那幾天，特別是展覽的最後一天，已經沉寂了一年半多的天安門廣場有上萬知青集會，大家打出了兵團「師團營連」的旗幟和標識，聚集當年的戰友，呼喊口號。公安部門慌了神，還驚動了國家副主席。這事登了公安部的「社情通報」，引起了高層震動。很快組織者石肖巖的背景就查了出來，原來是鮑彤手下的殘渣餘孽，組織這種大規模群眾活動，是不是「別有用心」？據說此事上了中央常委會，有人提出這個人怎麼還在活動？怎麼還留在北京？還在廣場上鬧出那麼大動靜？得，這下子，石肖巖原來的分配泡湯了！經過「組織上」研究決定，將其發配到位於廊房的石油部管道局機修廠，任廠工會主席，副局級幹部擔任副處級職務，殺雞總算用了回牛刀，氣得肖巖老革命的母親生了病。當然，肖巖沒有去上任。他通過全國青聯寫了厚厚的申訴信。「大概由於肖巖是全國青聯常委的原因，

【492】姜昆（1950-），著名相聲表演藝術家，曾經插隊黑龍江建設兵團。現任中國曲藝家協會黨組書記、副主席。

【493】濮存昕（1953-），著名電影演員，曾經插隊黑龍江建設兵團。現任中國電影家協會副會長，中國表演家協會副會長，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副院長。

大概是言之有理也有據的原因，大概是我們黨的偉大之處在於勇於改正自己錯誤的原因，申訴最終起了作用」【494】，一年以後，他又重新被分回北京，分去了商業部。

唐欣是也是「紅二代」，應該算是「可靠的」了吧？但就是因為他是原研究室社會改革局副局長，清查清理中對「小艦隊」的事說了實話，引起了組織上的懷疑，說他是幹部子女中「兩個半叛徒」中的半個，遲遲不予分配。唐欣為了表示抗議，買來絨布，在家裏用縫紉機軋起了「神功元氣袋」，以示自己沒飯吃。看到這種情況，唐的好多朋友氣不過，埋怨時任中組部副部長、清查辦公室主任的劉澤鵬，連唐欣這樣根紅苗正的幹部子弟都不給碗飯吃。後來中組部只得把唐欣分配到輕工部，開始提出讓他到輕工出版社，他說沒搞過出版，就讓他到《中國輕工報》社當了副社長，以後又讓他去籌備輕工產品質量保證中心。

原研究室秘書長陳群林，在審查中被工作組組長金石評價為「兩好一不好」：人品好，水平好，態度不好。按照群林後來自己的說法，他曾經給4位中國的著名人物做過秘書長，朱厚澤、胡錦濤、鮑彤、閻明復。前兩位是他們在貴州省委書記任上時；鮑彤是在研究室；閻明復則是後來在中國社會福利有獎募捐委員會。儘管群林是個老資格，但在分配中組織上也仍然堅持了「原則」，當研究室的部下們差不多分配完畢的時候，群林被分到效益差、管理混亂的交通出版社任社長。後來閻明復到民政部當副部長，分管福利彩票發行，他把群林調來中國社會福利有獎募捐委員會，任秘書長。

當然，分配的時候，也並不是所有的中央國家機關部委都對中央政改研究室的這些幹部棄之如敝屣。比如商業部部長胡平、物資部長柳隨年都頂住了壓力，接收研究室的幹部和趙紫陽的部下。因為他們的努力，黃海、石肖巖到了商業部；何家成，和紫陽的秘書李樹橋、國家體改委的司長鄭洪慶到了物資部。當然，他們當時都不能進部機關，不能到「要害部門」，而是被分配到部屬研究所、報社或是公司。過了幾年政治氣氛有了一些緩和以後，他們中有的人才被調入了部機關，委以重任。其他的人，顧雲昌去了全國人大；王紹賢被分到文物出版社任發行部主任；張偉回了上海經商；徐沖當起了律師；白慧敏

【494】春明：《北大荒・後知青時代》，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137頁。

去了聯想，後來當了副總裁；張電輝去了中石化；李元去了國土資源部當司長，幾年後升任副部長；周大力則回了國家體改委，不久後當了副司長。

分配中，只有元帥之子陳小魯是個另類。本來工作組提出，讓他回部隊，職務也可以按照在研究室所任職務，調一級到正師。但是，陳小魯表示，經過研究室這一段，和 89 年六四，他對體制內已經心灰意冷，不想再幹了。他後來說：「經歷過政改研究室這一段，發現中國這個體制包羅萬象，你只要在體制內，你就是沒有自由的。政改研究室雖然寬鬆一點，結果出了事以後，你不還得那樣嗎？」因此，他回到總參二部就寫了個報告要求轉業。1992 年 1 月，小魯正式辦理了轉業手續，自稱「退休老幹部」，後來走上了經商之路，不過，和我一樣，他經商也沒有發財。

到 1991 年上半年，原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幹部方才分配完畢。這個曾經在中國政治風雲中叱吒一時的知名機構，至此煙消雲散。

八、「趙紫陽的政治遺囑」

1996 年 5 月 27 日，鮑彤刑滿。但是，當局並沒有真正讓他回家，而是以「休息」為名，把他又關到了北京的西山杏林山莊，對外叫「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西山管理處」的一處破爛的平房院子裏。此後的一年，鮑彤在這裏度過的，是比秦城監獄還要艱難的日子。

那年 8 月間，我曾經假借「司機」的名義，和老鮑夫人一起去看過他。破舊的三間平房，山石壘起的院牆，幾件陳舊的傢俱，環境並不比普通的農家院好上多少。這是我在時隔七年多之後，第一次見到老鮑。久別重逢，激動、傷感、憤怒，幾種感情一齊湧上心頭，一時不知道說什麼好。老鮑還是那份瀟脫，那樣樂觀。我向他轉達了老同事們關心和問候，也介紹了大家的情況。在聊天中，老鮑和我說了當局不讓他回家的真正原因：目的在於逼迫他搬出已經居住多年的木樨地 24 號部長樓！他們說，不搬家他就不能回家！為什麼會這樣？老鮑說：「後來，我終於想明白了，他們這是在以各種手段逼我搬家！我家原來住的木樨地 24 號樓是中央和國務院的部長樓，裏邊住的可都是部

長級的『大人物』，如果我回家後仍然住在那裏，讓他們如何佈控？如何『上技術手段』？如何盤查來往人員？」

1997 年 4 底，為了能與老鮑早日團聚，鮑家被迫搬出 24 號樓，老鮑終於能在「刑滿釋放」近一年之後，回家了。但是，他並沒有得到真正的自由。聽到他終於回家了，我去家裏看他，他憤怒地說：「我仍然真切地感到，我又進了一個籠子，儘管沒有秦城監獄那種名義，也沒有西山大院那種院門，但同樣具有籠子的基本屬性。」他把這個「籠子」稱為「家庭監視」。

鮑彤後來說：「我的住所內外上下前後左右，到底有多少監控點、監控室、監控者和監控裝置，這是國家機密，普通人不得而知，我當然也同樣。不過有一個事實對我本人是不保密的：有人在監控鮑彤，一年 365 天，一天 24 小時。」出門，有人、有車在後面跟著；電話經常打不通，有時說著說著就被掐斷；接觸了什麼人，要有記錄並調查清楚；來客，要拿出證件，不是親屬不能探望；他們認為不能去的地方，你就不能去，他們認為你不能見的人，你就不能見；每到開人大會議或六四紀念日，他們就會提前帶你到外地「公費旅遊」；每當海外媒體上發表了鮑彤的什麼議論，就會有人來和你「打招呼」，說是「涉及國家安全」，「影響不好」，甚至「嚴重警告」。鮑彤說：「我算過，他們用來監視我的費用，每年至少要三、四百萬。這可都是納稅人的血汗。雖然我少了許多自由，但好在至少增加了幾十個人的就業，我也算是『聊以自慰』了。」

對鮑彤非法的「家庭監視」，至今已經持續了 15 年。就是在這種環境下，鮑彤並沒有放下他的筆，閉上他的嘴。他衝破各種阻力，在境外媒體上發表談話，寫文章，不斷地談民主，講人權，總結歷史，評論現實，呼籲平反六四和推進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至今已經發表並結集出版的就有近百萬字。作為秘書和部下，鮑彤在趙紫陽身邊工作了近 10 年。這些年來，特別是自 2005 年 1 月紫陽逝世以後，他寫下了大量的追憶趙紫陽、總結、評論紫陽經濟、政治改革思想的文字。

1989 年之後，被軟禁中的趙紫陽同樣也沒有忘記鮑彤這位老部下。在他的錄音回憶錄《改革歷程》，以及在香港出版的宗鳳鳴《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杜導正《趙紫陽還說了什麼》等書中，都記載了許多趙紫陽談到鮑彤的談話。在鮑彤被無辜判刑之後，趙紫陽說：「鮑彤

有什麼事？查來查去什麼事也沒有。」「搞鮑彤是為了搞我的問題，以為我和學生私通，還通過鮑彤跟外國人私通，結果什麼也沒有。」「鮑彤的事，是先入為主。李鵬對鄧說過鮑彤是壞人，說我是受了鮑彤的影響。」趙氣憤地說：「對鮑彤這兩個罪名都不能成立，他們是應負歷史責任的。」【495】

2004 年，趙紫陽的老朋友宗鳳鳴來找鮑彤。這些年來紫陽被軟禁，宗以「氣功師」的身份，尚能出入富強胡同。幾年中，宗鳳鳴與趙深談了許多次，每必追記，已經匯成了一個集子。宗把這個集子送給紫陽，紫陽自己沒有過目，說，將來讓鮑彤去斟酌吧。宗這次來找鮑彤，希望鮑能對集子作些修改。但鮑彤沒有同意，他是怕以自己的「反革命」的身份，牽連紫陽。紫陽逝世後，鮑彤為這本書寫了序言，序言中說明了他當時「不能受命」的原因：「兩位老者之間的談話需要保持歷史原樣。何況鮑彤的身份早已變了，不再是鄧小平女兒為起草她父親講話而夤夜光顧的鮑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經議決鮑彤是反革命一個。倘若這個反革命居然和被視為頭號政敵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有甚麼『聯繫』，中共中央的新領導人會在何種心態支配下作出何種反應？紫陽將進一步蒙受何種傷害？當時我用了一句不是客套的話答覆這位長者（指宗鳳鳴）：『我不能修改。』這使宗老失望，但我沒有別的選擇。紫陽去年逝世，再也沒有人能加害於他。於是宗老準備出書，並輾轉提出要我寫序。這，我當然義不容辭。」【496】

2005 年 1 月 17 日晨 7 時 1 分，趙紫陽因病逝世。趙紫陽的女兒雁南【497】給鮑彤的女兒鮑簡發了手機短信：「紫陽今晨 7 時去世，他終於自由了」。知悉噩耗，鮑彤極為難過。他立即提出要和妻子、女兒去北京醫院，見紫陽最後一面。哪知一出門就被人堵在電梯口，不准他們出門。在與阻攔者爭執過程中，鮑夫人被阻攔者推倒在地不能動，送醫後發現胸椎第 12 椎骨折，鮑彤本人也發現右手小指骨折。儘管如此，鮑彤仍然堅持對阻攔他的人說：「不管開不開追悼會，開追悼會，我要參加；不開追悼會，我要跟紫陽告別。」

【495】宗鳳鳴：《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開放出版社 2007 年 1 月版，第 66-67 頁。
【496】宗鳳鳴：《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開放出版社 2007 年 1 月版，鮑彤序。
【497】王雁南，趙紫陽的女兒。

據杜導正《趙紫陽還說了什麼》一書中記載：「2005年1月17日：傳來北京中央內部批示：一、趙紫陽長期工作有貢獻；二、『六四』中有關趙錯誤的中央決定正確；三、由趙治喪小組處理治喪活動。任何地方不得另行悼念；四、防止國內外敵對勢力挑動。」中央「同意擴大遺體告別儀式與會名額，但十三個人除外，中有鮑彤。」【498】

紫陽去世那天上午，我收到了鮑彤女兒轉發來的短信。次日上午，我約了老同事孫方明、徐沖等一起去趙家弔唁，看到，在富強胡同口外就已經戒備森嚴，但一隊隊抬著花圈花籃，手捧挽帳輓聯的人依然絡繹不絕。他們中有紫陽的老友部下，有紫陽家鄉的鄉親父老，也有許多從不相識來自各地的民眾。大家不約而同地來到這裏，向他鞠上三個躬，表達自己的哀思。

1月23號下午，去金台飯店【499】領取遺體告別通知時，我見到了雁南，向她轉告了鮑彤一定要參加告別儀式的態度。後來雁南告訴我，他們家屬為此和中辦進行了數次交涉，說，「你們不讓鮑彤參加告別，那我們家人都不參加了。」可能正是由於趙家家人的強硬，促使官方的態度終於有所軟化。

1月28日晚10點左右，有人突然通知鮑彤：「現在上面指示，允許你跟趙紫陽最後見個面。明天早晨，你5點鐘起來。」鮑彤要女兒立即趕到趙家，告訴他們這個情況。次日晨5點30分，北京市公安局的幾位局長、處長用車接鮑彤到北京醫院，他們竟然給鮑彤一個人搞了個遺體告別儀式！

鮑彤後來回憶說：「紫陽的遺體擺放在房間中央的一張床上，遺體的左側站著幾個人，我仔細辨認了一下，他們是紫陽的子女，大軍夫婦，五軍夫婦，雁南夫婦等6個人。遺體的右側站著一大群穿便裝的人。我進去以後，先向紫陽遺體鞠了三個躬。接著，從右向左，圍繞紫陽的遺體走了一圈，走到家屬這邊，依次和大軍夫婦、五軍夫婦、雁南夫婦握手。」「在我和紫陽告別的時候，還發生了一件事情。本來，紫陽的子女們帶了一位攝像師，當告別結束要在紫陽遺體前合影時，發現攝像師不在了。沒辦法，雁南就跑出去，到自己的車裏找

【498】杜導正：《趙紫陽還說了什麼？——杜導正日記》，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0年1月版，第207頁。

【499】即地安門西大街38號，原址為中辦廠橋招待所，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中央政改研究室和鮑彤曾經辦公的地方。

了一個照相機。雁南回來時，那幫人抓住雁南，不准拍照。我火了，說：『你們究竟要幹什麼？！』後來，我們在爭執中強行了拍了3張照片：一張是我和紫陽在一起的，一張是我和紫陽子女在一起的，還有一張是我、紫陽的子女和紫陽在一起的。顯然，他們提前支走攝像師是有目的的，就是不願意我們拍照。當時，如果雁南車裏沒有照相機，就無法記錄這次歷史性的會面了。」

29日上午舉行紫陽的遺體告別儀式，我和幾個老同事一早趕到了八寶山。弔唁廳門外軍警林立，門前人如潮湧。後來我聽說，參加告別儀式的名單要由中辦審批，被允許參加遺體告別的有2,000多人。在哀樂聲中四人一排，進入弔唁大廳，正面懸掛著那張趙紫陽微笑著的遺照，照片上方掛著「沉痛悼念趙紫陽同志」的橫幅。我們含淚向紫陽行三鞠躬禮，又到近前瞻仰遺容。紫陽面容還是那麼安詳，卻是清瘦了許多。我在心中默默向這位景仰已久的偉人告別。在與紫陽家屬握手時，我對他們，也是對我自己說，他永遠活在我們心裏！

後來我知道，1992年以後，紫陽的幾位老部下杜導正、蕭洪達【500】、姚錫華【501】、杜星垣【502】等，協助他秘密錄下了30多個小時的錄音回憶。2009年5月，這批錄音帶經過整理，由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鮑彤為該書寫了導言。鮑彤說：「趙紫陽留下了一套錄音帶。這是他的遺言。趙紫陽的遺言屬於全體中國人。以文字形式公之於世是我的主張，事情由我主持，我對此負政治上的責任。趙紫陽錄音回憶的價值，供世人公論。它的內容關係到一段正在繼續影響著中國人現實命運的歷史。這段歷史的主題是改革。」【503】

就在這本以《改革歷程》為書名的回憶錄裏，趙紫陽披露了1989年六四前後那段歷史中許多不為人知的真相，回顧了80年代他在主持中國經濟、政治改革實踐中經過的艱難歷程，特別是留下了他經過1989年的大徹大悟，在15年幽禁生涯之中，對中國現行經濟、政治制

【500】蕭洪達（1918-2008），原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委、副書記，2008年逝世。

【501】姚錫華（1929-2009），江蘇南京人。曾任廣東省高教委員會黨委書記、國防科委政治部秘書長。1987-1989年任《光明日報》總編輯。中共十三大代表。2009年逝世。

【502】杜星垣（1914-2011），原國務院秘書長，2011年逝世。

【503】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7頁。

度和中國政治、社會的轉型前景所做的深刻反思。書的最後，趙紫陽對他的這些反思做了概括，他說：

1989年我下台以後，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我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有了一些新的認識。過去對西方發達國家所實行的議會民主制，認為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代表大會制度，才能體現人民當家作主；這是比西方議會制更高級的、更能體現民主的形式。事實上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於形式，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而是少數人、甚至是個人的統治。

縱觀二十世紀以來世界上曾經有過的各種各樣的政治制度。君主專制，德、意的法西斯獨裁，都已被歷史淘汰；還有一些軍人獨裁政權，也是曇花一現，或日益失去了市場。雖然現在很落後的國家還不斷發生這樣的事情，如南美國家也常常發生軍人政變，但它也慢慢變為這些國家逐步走向議會政治的短暫的插曲。二十世紀出現的，在幾十年時間裏與西方議會制度相對立的所謂新興的民主制度——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在大多數國家已經退出了歷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議會民主制顯示了它的生命力。看來這種制度是現在能夠找到的比較好的、能夠體現民主、符合現代要求而又比較成熟的制度。現在還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

當然，這種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它也存在很多問題。但比較來講，只有這種制度比較符合現代文明，比較符合民意，有利於體現民主，並且是比較穩定的一種形式。這種形式越來越顯示出它的生命力。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實行的都是這樣一種議會民主制。幾十年來發展比較快的新興國家，逐步地轉向議會民主制的趨向也越來越鮮明。我想這決不是偶然的。為什麼沒有一個發達國家實行另外一種制度呢？這說明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要實現現代的市場經濟，現代文明，它就必須實行政治體制上的議會民主制。【504】

鮑彤在導言中說：「這是趙紫陽的話。理性，務實，明快，懇切，發自肺腑，是趙紫陽留給同胞們最重要的話。」【505】他稱之為「趙紫陽的政治遺囑」。

【504】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96-297頁。
【505】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19頁。

第十六章

中國的民主政治，從這裏起步

縱觀本書，可以看到，1980年代中國的這場政治體制改革，它的發起者鄧小平，是試圖在不觸動原有政治體制基本框架的前提下，對它的行政體制進行一次改良。但是，這場改革的實際主持者趙紫陽，在改革的出發點、目標、具體措施等方面，與鄧小平有著重大差別。正是由於趙紫陽的主導，使得這場由鄧小平提出的以提高效率為目標的行政改革，演變成了使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向現代政黨轉型、中國高度集權的政治制度向現代憲政民主制度轉型的一次勇敢的償試。也正是由於這種雙重性質的存在，才使得原本支持趙主持和推進這場改革的鄧小平，後來轉變了態度，聯手黨內的保守勢力撲殺了這場改革。

這場政治體制改革雖然夭折了，但是它為中國的政治和社會轉型，留下了許多寶貴的可借鑒的東西。特別是在20多年以後，中國再次面臨政治和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重新回顧和研究80年代政治體制改革的這段歷史，總結它的經驗教訓，對於凝聚朝野的廣泛共識，明確當前中國政治和社會轉型的基本方式和約束條件，作出合乎中國現階段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實際狀況的路徑選擇，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一、趙紫陽與鄧小平的兩條「政治體制改革路線」

鮑彤先生在他為宗鳳鳴《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一書所寫的序言中寫到：「鄧小平跟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有雙重關係，既是提倡者，又是扼殺者。」【506】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對這場政治體制改革，鄧小平和趙紫陽的主張並不完全相同，從其後發展的過程看，甚至可以說是有兩條不同的「政治體制改革路線【507】」，即鄧小平主張的以提高效率為目

【506】宗鳳鳴：《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開放出版社2007年1月版，序。

【507】這裏的「改革路線」一詞，不是在中共以往的「兩條路線鬥爭」意義上使用的，或許更確切的說法，應該叫做「改革路徑」。

標的行政改革「路線」，和趙紫陽主張的以改變黨的執政方式、建設民主政治為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路線」。正是由於這「兩條路線」的存在，使 1980 年代的這場政治體制改革具有了雙重性質。

只有看清 80 年代這次政治體制改革的雙重性質，我們才能準確地為它定位，理解為什麼是這場政治體制改革的發動者鄧小平自己親手扼殺了這場改革；也才能更準確地理解和把握趙紫陽的政治體制改革思想的遺產，和更深刻地認識 80 年代這場政治體制改革的失敗原因及歷史教訓。

之所以說當時有兩條不同的政治體制改革「路線」，是因為：

首先，鄧小平和趙紫陽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出發點不同。

從 1986 年鄧小平主張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的一系列談話中可以看出，他更多地是從為經濟體制改革掃除障礙的角度，考慮和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1980 年，為了「解決華國鋒問題」，鄧小平發表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此後，他就沒有再過多的關注政治體制改革，而更多的是著眼於經濟改革方面，這段時間在他的講話和談話中，很少再涉及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鄧小平搞經濟改革的出發點是什麼？當然是為了救黨，救這個「社會主義制度」。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計劃經濟，到文革結束前，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不搞經濟改革，民眾生活不下去，黨就喪失了執政的合法性，「社會主義制度」就沒有了「優越性」。

1986 年，當經濟改革從農村進入城市，觸及到原有的計劃經濟的管理模式和政府管理體的時候，他發現改革遇到了障礙。原有的高度集權的經濟管理體制和黨政機構，特別是國家計委及其他主管國民經濟的各部門，很多情況下是體改委在那裏搞放權，他們在那裏就搞收權；表面上說的是簡政放權，實際上卻是陽奉陰違；各級黨政機構疊床架屋，政出多門，雙重決策，嚴重影響政府的行政效率。這種情況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視，他認為，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必須同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否則，經濟體制改革就難以為繼。【508】

在趙紫陽主持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的研討過程中，鄧小平也一再提示趙紫陽，要注重提高政府效率。1987 年 5 月，他看了十三大報告初稿，對政治體制改革部分提出了「說是不搞三權分立，你們是不是也

【508】參見本書第二章第 3 節：鄧小平坐不住了：「政治體制不改不行」。

搬了一點」的質疑，強調說：要使行政機構能夠有效地工作，不能過多干擾行政機構的工作。決定了就辦，這是我們的優勢，這個優勢不能丟。不能放棄專政，不能遷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緒。我們要搞一個什麼樣的體制？要搞一個增強行政效能的體制，機構要精簡。我過去講過三條，仍然是必要的。民主還是個手段，講民主必須要和法制聯繫起來講，把法制搞起來，才能有穩定的社會環境。我們的行政機構應該很有效能。這些話表明，鄧小平主張的政治體制改革，其出發點在於提高政府效能，而不是發展民主。

趙紫陽在談到鄧小平對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張時說：「我認為，鄧對現行政治體制的運行，他是有不滿意的地方，主張改革也是真實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並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現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種行政改革，屬於具體的工作制度、組織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風方面的改革。鄧主張的是在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為了進一步地鞏固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任何影響和削弱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改革，都是鄧堅決拒絕的。」【509】

實際主持這場政治改革的趙紫陽，對這場改革的認識也有一個變化過程。一開始，他與鄧小平的看法大體上相同。他在回憶中說：1985、1986 年，「我從經濟改革方面認識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那個時期我一直有個想法：在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超前不行，但是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於經濟體制改革太滯後也不行。因為經濟體制改革越深入，黨內守舊勢力的阻力就越大。沒有政治方面的改革，經濟改革很難深入下去。而且沒有政治方面的改革，支持改革的力量也很難充分發揮作用。改革中遇到的各種社會矛盾，沒有政治改革也很難得到妥善解決。」

正是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1986 年 9 月，趙紫陽被鄧小平點將，在擔任總理的同時，主持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的設計工作。1987 年初胡耀邦被迫辭職，趙紫陽代理黨的總書記以後，接觸政治領域的事情多了起來，他的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看法進一步發生了重大變化，從為經濟體制改革開路，發展到「盡量地容納和擴大其他各種力量的政治參與」。這個時候的趙紫陽，經歷文革十年的「大徹大悟」，已經對共產黨傳統的那套「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深惡痛絕，從而

【509】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271 頁。

轉變為一個民本主義者。他認為，政治改革必須解決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人與人對立的問題，必須解決執政黨與民眾對立問題，必須解決人民在這個制度沒有自由的問題。他說：這時候，「我深深感到黨和知識分子的緊張關係，必須從根本上設法解決。而離開知識界的政治參與，同知識分子的關係不可能從根本上改善。」他知道，在當時黨內保守勢力極為強大的條件下，改變共產黨一黨專制是不可能的，而只能另闢蹊徑，從改變共產黨的執政方式入手，通過民主和法治的途徑，限制黨的權力。他「當時總的想法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改變，但執政的方式必須改變。另外，人治的問題要改變，真正做到法治。社會主義國家也應該是一個法治的國家。」他說，「這兩個概念實際上也就是我那兩年形成的政治改革的總的觀點」【510】，即他設計和推進政治改革的出發點。

其次，鄧小平與趙紫陽在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上有重大差別。

推動這次政治體制改革，鄧小平的目的在於興利除弊，試圖在保證共產黨領導地位不變的前提下，革除體制中的官僚主義弊端，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以推動經濟體制改革。他為政治體制改革規定的目標有三條：第一是始終保持黨和國家的活力。這裏說的活力，主要指領導層幹部的年輕化；第二是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第三是調動基層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積極性。【511】

不錯，鄧小平在一些場合也談到過民主，特別是在80年代初期，他多次提到要擴大黨內和社會上的民主，廢除家長制，肅清蘇聯影響的問題。但如果要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就勢必要觸動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而「鄧的信條是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允許挑戰，高度集中的集權政治、專制制度是他特別欣賞和喜愛的。因而他講的民主，廢除領導人特權，肅清封建主義思想影響，都是不可能實現的，不過是空話而已。當他感到形勢逼人、專制體制受到威脅的時候，他連這方面的事也不會談了。」【512】

鄧小平從來沒有認真想過在中國搞什麼民主，相反，他認為，在中國，是穩定壓倒一切，沒有穩定，亂糟糟什麼事也辦不成。為了維

【510】參見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92-293頁。
【511】參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76-180頁。
【512】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76頁。

護穩定，要充分利用專政這個武器。「鄧非常欣賞和喜歡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那種集一切大權於個人或少數幾個人的集權統治的政治體制，厭惡和鄙視分權制衡的制度。」他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有一個最大的優勢，就能集中力量辦大事，凡事只要一下決心，就能夠不受牽制地立即執行，這是我們的優勢，要保持這個優勢。「鄧把不受牽制，不搞制衡，權力絕對集中，作為我們總的優勢。」【513】

正是基於這種看法，1987 年 5 月 22 日，鄧小平在會見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時，明確談到：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凡是影響穩定、正常秩序的東西都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口號應該是效率、穩定，而不是民主。

受命制定政治體制改革方案和主持這項改革的趙紫陽，其指導思想與鄧小平的看法，卻是有不同的，他認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只能是發展民主。據他的前秘書李湘魯【514】回憶，早在 1980 年 9 月，趙紫陽就明確談到「發展民主」的問題。他說：「社會主義還應該使人民享受充分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必須十分珍惜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成果，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成果對社會主義有更為重要的意義——資產階級民主是社會主義的起點，請注意這一點……」【515】。後來在 1987 年 2 月 14 日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會議上，他更明確地說：「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感覺到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民主，這終究是一個我們要解決的問題，一百年也要回答。人類社會的民主應該是越來越發展，一些條件不具備我們可以說清楚，但絕不能讓人感覺到共產黨害怕民主，不敢講民主。」

這個時候的趙紫陽，作為中共中央代理總書記，他不可能不考慮鄧小平這個「中國最大的實際」，不可能直接挑戰鄧小平的權威，違背鄧為政治體制改革劃出的框框，而只能在這個大的框架下，盡可能將改革的方向和路徑引導到改變黨的執政方式、限制黨的無限權力，擴大人民參與，為今後走向民主政治創造條件上來。他從研討的一開始，就接受了鮑彤和研討辦公室的提法，同意將「建設高度民主」作

【513】以上參見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274-276 頁。

【514】李湘魯，1980 年至 1987 年任趙紫陽秘書。此後赴美國留學。1989 的初回國任中信國際問題研究所負責人。現在國內經商。

【515】李湘魯：《微斯人，吾誰與歸？——追憶紫陽》，網文。

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長遠目標。他也贊成鮑彤和中央政改辦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涵義，是「實現從革命體制向建設體制轉變，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正是由於趙紫陽的主張和支持，這「兩個轉變」基本上成了政治體制改革研討的共識。為了讓鄧小平能夠接受，趙紫陽、鮑彤和政改辦在研討中，在政治體制改革目標上搞了個折衷，這就是後來在中共十三大報告中的表述：改革的「長遠目標，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備、富有效率、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近期目標，是建立有利於提高效率、增強活力和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的領導體制」。這樣，既體現了鄧小平要的效率，也體現了趙紫陽的主張，要搞民主。

趙紫陽在回憶錄中也總結了他那幾年對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張，並說：「這些想法有的已見諸文字或談話，更多地已經寫進十三大的政治報告，當然有些不能寫得那樣明確，有些當時還不能寫進去。這就是1986-1989 那幾年我對政治體制改革逐漸形成的概念，即執政的地位不變，執政的方式必須改變。也就是說，在共產黨領導的基本框架下，更多地允許各種社會力量的政治參與，同時逐步以法治代替人治，把憲法已經原則規定的許多好東西通過具體法律一一落實。」【516】

第三，趙紫陽主持實施的改革措施遠遠超出了鄧小平劃定的範圍。

在改革研討之初，1986 年 9 月，鄧小平就為這次政治體制改革劃定了內容，他說：「改革的內容，首先是黨政要分開，解決黨如何善於領導的問題。這是關鍵，要放在第一位。第二個內容是權力要下放，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同時地方各級也都有一個權力下放的問題。第三個內容是精簡機構，這和權力下放有關。」【517】此後，他又多次在不同的場合談到這幾個方面的內容。

從趙紫陽所作的十三大報告第五、六部分及《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為這次改革規定的內容中可以看到，政治體制改革措施的第一條，就是「黨政分開」。但報告對「黨政分開」的解釋是：「黨應當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重大決策的領導和向國家政權機關推薦重要幹部。」。趙紫陽對「黨政分開」的這一闡述，與鄧小平以解決多重領導、提高行政效率為目的的「黨政分開」的重大不同在於，強調黨的活動不能超越憲

【516】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296 頁。
【517】《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 177 頁。

法和法律；強調「黨的領導方式和活動方式的轉變」；強調黨不再「領導一切」，而是轉變為現代政黨政治通行的執政原則：實行政治領導，即「出主意、用幹部」，通過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來實現黨的主張。另外，在十三大報告中，還提出了在除人民代表大會之外的國家機關中取消黨組、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改革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選舉制度、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審判、依法保障公民各項基本權利；提出了「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的原則，和建立人民監督和社會協商對話制度；提出了「形成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新規範，逐步做到：黨、政權組織同其他社會組織的關係制度化，國家政權組織內部活動制度化，中央、地方、基層之間的關係制度化，人員的培養、選拔、使用和淘汰制度化，基層民主生活制度化，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化」【518】等一系列問題。在《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中，又對實現這些方面的改革一一提出了具體措施。中共十三大之後，趙紫陽在領導經濟、政治改革的過程中，又相繼提出了改造思想政治工作、開展廉政建設、在建設商品經濟新秩序的同時建設民主政治新秩序等問題。

從這個方案中可以看出，它已經完全超越了鄧小平主張的行政改革的範疇。這個方案雖然目標有限，內容有限，程度也有限，並且只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第一步，但從總的方向說，它符合世界民主潮流的大勢，符合中國廣大民眾對實現民主憲政的期盼和要求，也符合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需求。在那個短暫的時期內，它創造了一種寬鬆的政治環境：打破了共產黨領導一切的格局，強調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削弱黨的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取消黨對文化的審查制度，發揮新聞媒體的監督作用；開展社會協商對話，協調解決社會矛盾；取消黨對司法的直接干預；通過建立公務員制度來淡化黨管幹部；探索黨的執政方式的轉變，以及建立黨內民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規則等。從大的方面講，在趙紫陽主政的那幾年，中共的一黨專制在逐漸削弱，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也在逐漸弱化，而民主和法治建設逐步開始走上正軌，公民各項基本權利的實現與保障也有了相當進展，黨內政治生活開始走向民主化制度化，政治體制不適應經濟改革開放的情

【518】以上參見趙紫陽：《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在中共十三大上的報告》，1987年10月25日。

況也在逐漸改變。因而這場政治體制改革，對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在中國的發展是有益的，起到了重大推動作用的。

趙紫陽在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所做的這一切，六四之後大都被鄧小平和黨內的保守勢力所中止，甚至進一步退兩步。趙紫陽的大部分主張也被作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證據，全盤否定。之所以會如此，就是因為鄧小平和黨內保守勢力，看到了趙紫陽所推行的政治體制改革大大喚醒了民眾的公民意識與權利意識，發展下去有可能危脅到中共的一黨專制；看到了趙紫陽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已經大超越了他們所能許可、接受和容忍的範圍，任其發展下去，「黨將不黨，國將不國」。據《李鵬六四日記》記載，1989 年 5 月 19 日上午，鄧小平在他家中召開有陳雲、李先念、楊尚昆，及除趙紫陽外的其他中央常委、中央軍委負責人參加的會上說：「這次動亂，問題出在黨內。中央有兩個司令部，名義上看是李鵬和趙紫陽，實際上是我（指鄧小平）和趙紫陽。」「趙紫陽是說得多，做得少，歷來借我的名，搞自己的一套，借改革開放搞自己名堂。」【519】其中「說得多，做得少」這話不客觀，但後面那一段用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我認為，倒是並不算錯。

這一事實也可以從反方面證明，趙紫陽所主持操作的政治體制改革，已經不再是鄧小平所主張的那個「政治體制改革」。現在回過頭來看，如果趙紫陽真的中規中矩地按照鄧小平的那一套行政改革的路線，來搞「政治體制改革」，那麼這場「改革」很有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成功，至少不會導致後來改革被中止、他人被撤職的結局，但，那就不是趙紫陽了。

從方案設計開始，直到 1989 年的六四，政治體制改革被鎮壓的槍聲所終止，趙紫陽和他的部下們在發展民主政治、改變共產黨的執政方式方面，方向是明確的，態度是堅定的。就在最後的那場如何對待學潮的問題鬥爭中，趙紫陽也從沒有放棄通過民主和法制的方式，解決解決政府和民眾的衝突，並試圖通過和平解決這場學潮，推動中國的民主進程，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趙紫陽在五四亞行講話中提出的「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是在和平條件下，在中國現實社會歷史條件下，解決社會矛盾，應對社會突發事件和衝突，防止其進一步走向激化和對抗，保持社會

【519】《李鵬六四日記》2004 年徵求意見版，第 118-119 頁。

基本穩定的一條最好途徑。這條途徑，一反中共過去處理黨內、國內政治矛盾方式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和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反映了中共黨內以趙紫陽為代表的一部分堅持改革開放的領導人要求以民主立國和依法治國的一種全新的政治思維，全新的治國理念。這在中國共產黨執政史上，不能不說是一個創造。

1980 年代這場漸進式的政治體制改革，它的實際主持者是趙紫陽，而不是鄧小平；改革實踐中所施行和準備施行的一系列措施，也是按照趙紫陽、鮑彤們的主張進行的。有鑒於此，我為這場政治體制改革的定位是：它由中共黨內一批有遠見、有民主意識的開明領導人主持進行的使共產黨由革命黨向現代民主政黨轉變、由一黨獨裁的政治體制向憲政民主體制轉變的一次有益償試。它最後雖然失敗了，但它對中國的改革，對中國的政治和社會轉型留下的影響和意義卻不可低估。

那麼有人會在這裏提出一個問題：既然趙紫陽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張與鄧小平的看法相左，為什麼鄧在 1987 年中共十三大時，會表示「完全贊成」十三大報告和《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支持趙紫陽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我認為，這也很好理解：第一，趙紫陽主持制定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其中體現了鄧小平的「效率、活力、積極性」的主張；第二，趙紫陽提出的改革方案，大都有黨的傳統說法和鄧小平過去講過的話作為依據，特別是以鄧小平 1980 年的 8・18 講話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鄧小平在發展民主方面，80 年代初講過許多話。雖然這次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時他不再講這些話了，但趙紫陽、鮑彤們把鄧小平的這些「壓箱底」的東西翻出來，寫到方案裏，鄧小平也不好說錯，他總不能自己反對自己；第三，鄧小平同意改革方案中按趙的主張去寫，但不一定真的同意趙紫陽去做。本書前面談到過，當趙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同意民主黨派在人大設立黨組時，鄧就讓人給趙傳話說：「講發揮民主黨派的參政作用，只是講講而已，怎麼能當真？」【520】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鄧小平在改革之初，並沒有意識到趙紫陽發展民主的主張會有那麼大的動員力和影響力，它喚醒了民眾的民主意識和權利意識，導致了 1989 年的民主大潮，直接危及到了中共的一黨專制制度。

【520】參見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275 頁。

六四鎮壓的發生之後，鄧小平堅持「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不改」，說明他仍然不承認報告有錯；但是此後的政治體制改革卻偃旗息鼓，「一個字不提」，又說明鄧小平看到並且懼怕趙紫陽這套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張與措施可能發生的後果。此後，他雖然在1992年南巡講話中提出了「誰不搞改革誰下台」，但也僅僅指經濟體制改革而言，政治體制改革則隻字不提。這種「跛腳的改革」，直接導致了以後20年市場化過程中公權力的腐敗、權貴利益集團的產生、政府公信力不再，黨的執政合法性根基流失。這種情況的發生，從根本上說，是鄧小平消極接受六四的教訓，政治與經濟改革「一手軟、一手硬」的必然惡果。

二、由執政黨主導的政治體制改革為什麼會失敗?

這場政治體制改革，儘管它是由中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通過，表面上看也是由中共中央主持的，但也只進行了一年半的時間。1989年6月，政局的突然變化，打斷了這場中共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進程。許多已經開始的改革被迫中止，許多已經在擬議中準備出台的改革措施胎死腹中。在此後的幾年裏，已經實施的許多改革又重新回到起始點，甚至進一步，退兩步。這場政治改革的失敗，從根本上說，是當時中共黨內不同政治力量之間實力對比和相互博弈的結果，也是黨內保守力量力圖扭轉十三大改革開放方向的結果。

這場改革失敗，客觀原因當然是主要原因，總起來說，就是趙紫陽說過的一句話：改革的力量不夠。具體分析起來，大體上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鄧小平對政治體制改革態度的變化是關鍵因素。

本書前文曾經分析過，在80年代的中國搞政治體制改革，鄧小平是個關鍵因素，可以說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521]。

1970年代後期，再次復出的鄧小平逐漸在中共黨內樹立起了自己的權威。這種權威雖然遠不如毛澤東當年那樣一言九鼎，黨內還有陳雲、李先念等老資格的領導人與之分庭抗禮，但隨著鄧所推動的經濟

【521】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中國成語。蕭何，漢高祖劉邦（公元前256～前195）的丞相。韓信經蕭何舉薦被劉邦任為大將軍，為漢朝的建立立下很大功勞；劉邦擔心在自己百年之後，政權旁落，蕭何又設計，除去韓信。故宋代洪邁的《容齋續筆・蕭何給韓信》中說：「信之為大將軍，實蕭何所薦，今其死也，又出其謀，故俚語有『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之語。」比喻事情的成功和失敗都是由這一個人造成的。

改革的發展和深入，鄧小平的權威日重。在形式上他並沒有擔任中共的最高領導人，但他在黨內的話語權逐漸大大超越了其他元老，成為中共黨內第一人。當時，由於對改革開放的態度不同，中共黨內形成了以主持一線工作的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力量，及以陳雲、李先念等為代表的元老派兩支不同的政治勢力，被外界稱為黨內的「改革派」與「保守派」。而主張既要搞改革開放，又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鄧小平，就成為凌駕於兩派政治力量鬥爭之上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砝碼。在整個 80 年代的歷史當中，中共政治路線上的幾次大的搖擺，都與鄧小平態度的變化有關。【522】

鄧小平是 80 年代這場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張者和推動者，他為這場改革確定了目標和內容，也劃出了底線。而他選定來設計和操作這場改革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卻並沒有使這場改革局限於鄧所主張的行政改革範圍，而是把改革的重點放到了推動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上來。當 1989 年鄧小平看到趙紫陽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催發了民主大潮，趙有可能利用這場民主大潮，進一步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改革，甚至有可能危及到中共的一黨專制的時候，這就觸犯了鄧的底線。

作為改革開放推動者的鄧小平，與黨內元老陳雲、李先念等保守勢力，在對改革，特別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態度上有著很大差別，在個別時候甚至是對立的。但是，這並不妨礙和他們後來在對待六四學潮和扼殺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站到一個陣營裏。因為，在維護共產黨一黨專制這個問題上，他們的態度並沒有差別。這種結合，反映了黨內傳統的政治勢力不甘心放棄舊的統治方式，堅持維持極權統治的堅定態度。

所以，我認為，鄧小平與趙紫陽兩種政治體制改革「路線」之間的重大差別，是鄧小平出手中止這場改革的根本原因。雖然這場改革是鄧自己提出並發動的，但當他一旦發現它的主持者趙紫陽已經走得太遠，趙主張的民主和法治的「路線」可能危及到中共一黨獨裁體制的時候，他只有與黨內保守勢力聯手，將它扼殺掉。

第二，黨內高層保守勢力的強大。

中外歷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是在改革力量與反改革力量的博弈中進行的，都會遇到守舊勢力和既得利益集團的強烈反抗和阻撓，這

【522】參見本書第四章第二節：「鄧小平的『左右互博』」。

種情況已經被歷史所反覆證明。六四鎮壓決策的成因和政治體制改革的被扼殺的動因是複雜的。在這其中，除了鄧小平的因素以外，黨內高層的保守勢力伺機而動，推波助瀾，也是一個極為重要原因。

回顧 1980 年代整個改革歷史，可以看到，當時黨內高層中保守和反改革的力量是強大的，他們對趙紫陽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的阻撓也是不遺餘力的。從 1986 年 10 月研討和制定改革方案的時候起，高層的保守勢力對政治體制改革的阻撓和破壞就已經開始了。儘管有鄧小平的「尚方寶劍」，方案設計仍然不斷受到黨內強大的保守勢力的干擾和阻撓。先是 1986 年底胡耀邦被迫辭職和「反自由化」的風潮，就開始有人往趙紫陽和鮑彤及政改辦身上潑污水，說政改辦是在搞「自由化」；後來又是鄧小平看了「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初稿後，說「是不是也搞了點三權分立」；就是最後到了十二屆七中全會上，對《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爭論仍然很大，思想難於統一，趙紫陽不得不放棄了在全會上通過這個設想的想法，最後改為「原則同意」。趙紫陽後來回憶說：「要真正著手政治體制改革難度非常大，黨內那些老同志幾乎沒有人支持這種改革。所以十三大以後，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處於停滯狀態。」「首先，包括鄧小平和一些老人，他們雖然在經濟體制改革上有不同意見，但在政治體制上看法卻基本一致。都不主張改動原有的政治體制。生怕政治體制上的任何真正的改革，會向共產黨的權力挑戰，會削弱共產黨的權力，動搖共產黨的領導地位。」【523】

中共十三大換屆以後，在主持一線工作的五位政治局常委中，有了兩個極為頑固的保守勢力代理人李鵬和姚依林，這使黨內保守勢力有了直接插手，影響、干預趙紫陽主持的中央工作的可能，高層內部保守勢力與改革力量的鬥爭就開始更加表面化，尖銳化起來。趙紫陽是中國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線操作者和主持者，黨內保守勢力知道，要扭轉改革的方向，必須把趙搞下台。讀者想必記得，在胡耀邦被迫辭職以後，黨內保守的元老們就希望推出鄧力群當總書記，作為他們在一線的代理人。這個企圖因鄧小平選擇了趙紫陽而沒有實現。中共十三大之後，他們選擇的鄧力群被差額選舉差掉，他們認為是趙紫陽搞的鬼，心中更加怨恨。李鵬、姚依林進入中央常委會，使他們在中央一線班子中有了代理人。他們知道，只有搞掉趙紫

【523】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281、277 頁。

陽，他們的代理人才能掌控中央的領導權，扭轉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因此，他們從沒有放棄搞掉趙的努力。

1988 年底到 1989 年初，當鄧小平提出的「物價闖關」遇阻，趙紫陽被迫承擔責任之後，黨內保守派元老李先念、王震等人抓住機會，開始在鄧小平面前大進讒言，要求鄧撤換趙紫陽，刮起「倒趙風」。特別是 1989 年 4 月學潮起來之後，他們知道機會來了。李鵬，姚依林利用鄧小平害怕民主大潮、擔心危及黨的統治地位的心理，先是推動鄧給學潮定性，然後又一步步把學潮推向死胡同，導致鄧最後做出武力鎮壓的決定。他們站在與趙紫陽的「民主和法制」主張對立的立場上，以趙紫陽「支持動亂」為由，借助鄧小平的力量，搞掉了趙，製造了六四血案，也打斷了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終止了趙紫陽主導的這場使中共向民主政黨、現代政黨轉型的償試。

第三，黨內中高層普遍缺乏「從革命黨向現代政黨轉型」的思想基礎。

80 年代政治體制改革的失敗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條，是黨內的思想準備遠遠不足，全黨，特別是黨的中高層幹部普遍嚴重缺乏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實現「從革命黨向現代政黨轉型」的思想基礎，因而改革沒有得到全黨，特別是中高級幹部的理解和支持。

上個世紀 80 年代的中國，中共的極權體制與公權力的腐敗尚未發展到當今這種嚴重的程度，各種權貴利益集團也還沒有形成。當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在黨內中高層中所遇到的阻力，來自既得利益方面的還相對較小，大都還是來自於觀念層面。

趙紫陽說:「我深感政治體制必須相應地進行改革，當然不是完全照搬西方那一套，而是根據中國國情，逐步地實行民主的、有監督的共產黨執政制度。權力絕對不能壟斷，權力必須有監督，人民群眾有這樣的要求，形勢有這樣的需要，十三大也原則上提出了這樣的改革。」【524】但是，在當時能夠形成這種觀念的人在黨內中高層中少之又少。

當時黨內的中高層幹部，大都是在中共高度集中統一的體制下被培養和成長起來的。他們習慣於「階級鬥爭」，習慣於「黨的一元化領導」，習慣於「輿論一律」，習慣於依靠行政手段而不是法治手段去進

【524】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281 頁。

行國家和社會治理，習慣於原有的那套高度集權的一黨專制體制，習慣於同這種體制相適應的那一套理論、觀念。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還沒有也不可能認識到「領導」與「執政」、法治與人治、專制與憲政等理念方面的意義與區別。一句話，當時在黨的中高層幹部中，還基本上沒有現代政黨所應有的執政意識，遠沒有形成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所需要的思想基礎。

1987 年 6 月之後，政治體制改革開始在黨內下「毛毛雨」，重新發表了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工作也大大加強。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報告中，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進行了透徹的闡述，並要求全黨進行學習，統一認識。但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總共只進行了短短的幾個月。強大的歷史慣性、體制慣性和思想慣性不可能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裏得到扭轉。此外，受幾個月前還在進行的那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影響，政治體制改革剛剛還是政治禁區，「自由化」的帽子還在黨的意識形態主管部門和一些保守派領導人手裏拿著，準備隨時給人戴上，這就使得「寧左勿右」的思想在黨內仍然有巨大的市場。這些情況都導致黨內，特別是中高層幹部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思想準備嚴重不足。

十三大以後，政治體制改革在趙紫陽的主持下開始實施，但是雷聲大雨點小，因為受到黨內相當一部分中高層領導幹部的明拖暗抗，阻力重重。特別是在黨政分開、建立公務員制度、新聞改革、社會團體獨立化、人大中的黨派活動、以立法方式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等方面，不能不說是步履維艱，有的甚至被篡改或變形。一些改革措施首先黨中央各部門就不配合。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中組部在國家公務員制度的方案中，取消十三大報告中「將公務員分為政務、業務兩類」的劃分，牢牢抓住主要幹部的任命權不放。地方黨委的改革同樣如此。中央一層的政法委撤銷後，地方各級遲遲不動；基層黨組織屬地化幾乎被擱置。黨內的這些阻力，最根本的，是觀念和利益的問題。幾十年傳統的黨的一元化領導的觀念，強大的體制慣性，及權力集中於黨組織給黨的各級幹部帶來的利益，使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改革的阻力。

第四，趙紫陽主持中央工作的權力並不穩固，且有脆弱性。

從表面上看，這場政治體制改革的主持者趙紫陽，身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掌握著主持中央工作的大權，但實際上，在中央高層，他的力量是十分脆弱的。80 年代黨內高層的特殊情況和政治態勢，決定了以他為首的改革力量無法真正掌握中央的人事權、決策權和執行權。因為，趙紫陽要推行任何重大問題都要經過中央常委討論，必須得到鄧小平的支持，而且都要通過中央各個職能機構去執行。

80 年代初，是鄧小平親自點將，把趙紫陽從四川調來中央工作。在此後的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鄧與趙的配合基本是默契的，在鄧的支持下，趙紫陽的經濟改革操作也是成功的。此後，鄧小平再次點將，由趙紫陽主持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的設計工作，並接替胡耀邦擔任中央總書記。作為黨內最具權威的元老，鄧小平是凌駕於改革派和保守派之上的一個特殊的存在。趙雖然當了總書記，他要把政治體制改革進行下去，仍然需要鄧小平的支持。沒有鄧的支持，趙是什麼事情也幹不成的。當然，從實際情況看，在 1989 年初以前，鄧小平對趙也一直還是支持的。

但是，並不是有了鄧小平的支持，趙紫陽就可以放開手腳，沒有顧忌了。鄧小平的支持，有他的政治底線，這個底線，就是所謂的「四項基本原則」，就是不能危及黨的統治地位。由於鄧小平在「垂簾聽政」，趙紫陽在實施改革過程中，要時時顧忌到鄧小平的這個底線，防備保守勢力的明槍暗箭，這就使他不可能放開手腳。

從趙紫陽的回憶錄《改革歷程》，以及《李鵬六四日記》中可以看到，中共十三大後進入中央常委的李鵬、姚依林這兩個黨內保守勢力在中央常委中的代理人，時時在對趙紫陽虎視眈眈。在「物價闖關」失敗以後，他們就試圖以「決策失誤」為名嫁禍於趙紫陽；從學潮一開始，他們對趙紫陽的主張就是持懷疑和不合作的態度；他們通過各種小動作，以各種方式對鄧小平的決策施加影響，企圖借用鄧小平的力量搞垮趙紫陽。在這種情況下，趙紫陽的位置不可能是穩固的。他做任何事情，都首先要考慮到鄧小平的反應，考慮到會不會被保守勢力抓住把柄。他必須十分謹慎小心，甚至用「如履薄冰」來形容也不為過。

中央各主要部門負責人不得力，是趙紫陽推行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遇到的一個十分頭疼的問題。1987 年初胡耀邦被迫辭職以後，掀起

了大規模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黨內保守勢力藉機掌控了中央各要害部門。十三大前後，趙紫陽為了改變這種格局進行了巨大努力，比如借助鄧小平的力量，改變了長期由鄧力群掌管宣傳輿論大權的局面，撤銷了鄧主管的中央政策研究室等，但中央組織、宣傳等部門由保守勢力所掌控的情況並沒有得到根本改變。那時候，中央組織部長是宋平，宣傳部長是王忍之，都是保守勢力的主要幹將。趙紫陽沒有，也不能形成自己的改革派的核心班底。在保守勢力的壓力下，他既不可能大張旗鼓地安排自己矚意的改革派幹部擔任關鍵部門的重要職務，也沒有可能把那些佔據重要崗位但成為改革阻力的幹部撤換掉。1996 年在接受楊繼繩採訪時，趙紫陽說:「重要人事問題不是我這一層所能定的，耀邦時也是如此。有時連參與意見的機會也沒有。『六人小組』也沒有決定權。他們只能到幾個老人那裏聽取意見。小平、陳雲兩人達成一致意見以後就能定下來。鄧小平認為這個人不錯，就調上來，認為不行，就讓下去。毛主席當年也是這樣。『趙孟能使貴之，亦能賤之。』這是東方政治，也是中國政治的特點。這是無法改變的。我當總書記，組織部長我能動嗎？宣傳部長我能動嗎？不能。對宣傳部長王忍之我很不滿意，我還罵了他一次。我只能罵罵而已，我換不了他，因為有人支持他。」【525】

第五，以趙紫陽為首的黨內改革派沒有得到社會力量的響應和支持。

在當時特殊的歷史環境下，趙紫陽主持的搞政治體制改革，沒有，也不可能得到來自社會力量的真正理解和支持，形成有效的朝野互動。

由於在當時條件下搞政治體制改革的特殊敏感性，趙紫陽一方面要防備來自黨內各方面的明槍暗箭，同時也要防止由於政治體制改革「吊高社會上民主化的胃口」，影響社會的穩定。因為一旦「過分遷就民主化的情緒」，出現難以控制的局面，就會成為黨內保守派攻擊、甚至中止政治體制改革的口實，甚至影響到他個人的地位的穩定。他的個人地位問題當然不是他要考慮的主要因素，但他的地位變化將直接影響到他要推進的政治體制改革，這就讓他不能不重視這個問題了。

【525】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修訂版，第 547 頁。

正是因為考慮到這種情況，趙紫陽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操作不得不相對封閉，再加上保守勢力的虎視眈眈，又必須和鄧小平「保持一致」，這些因素致使趙紫陽、鮑彤等政治改革的主持者沒有，也不可能把有些改革措施的意圖對黨內、對全社會公開，說得那麼明確、那麼直白，致使社會上的改革力量對此缺乏瞭解，朝野嚴重缺乏互動。

從另一個角度說，由於中共高層政治生活的不透明，社會上的多數知識分子和民眾並不瞭解趙紫陽主持的執政黨中央內部圍繞改革產生的激烈鬥爭，不瞭解趙在政治體制改革中所面臨的艱難局面，和他所起到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反而對趙主持政改的推進緩慢有怨氣和不滿，在有些時候趙甚至和鄧小平、李鵬等一起成為民眾發洩不滿情緒的對象。這就使趙在推進改革過程中得不到社會上的廣泛響應和支持。1988 年底到 1989 年初，社會上的急進民主派發出一個又一個的上書，一個又一個的呼籲，使得主持政治體制改革的趙紫陽受到日益加大的兩方面的壓力，一方面他面臨「倒趙風」，在黨內保守勢力的壓力下，他不得不謹慎小心應對，政治體制改革步履維艱；另方面，他又要面對社會上日益高漲的民主要求的壓力。這種壓力，既是他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助力，但也是他作為執政黨的總書記，必須維持社會政治局面基本穩定的一道難題。這個時候的趙紫陽，用一句不敬的中國俗語來形容，真的是「風箱裏的老鼠，兩頭受氣」了。

特別是在 1989 年 5 月 17 日之前的那段時間，趙的亞行講話許諾與學生對話後，由於李鵬等人的掣肘，中央常委內部意見無法統一，對話無法兌現時，學生們發動了天安門廣場上的絕食。這種做法不但把主持中央工作的趙紫陽逼到了牆角，讓他的「在民主和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更難實現，使李鵬等人的強硬主張更顯得理直氣壯，而且成為鄧小平下決心拿下趙、實行戒嚴的理由。19 號以後，當學生們知道中央內部這種激烈鬥爭的情況時，已經遲了。

儘管政治體制改革是中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儘管後來鄧小平有「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不改」之說，儘管黨內的許多有識之士、黨外的廣大知識分子、各階層民眾多數支持執政黨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但是，由於關鍵時刻鄧小平政治態度的變化導致黨內改革與反改革力量對比變化、對學潮的武力鎮壓，以及此後形成的政治高壓等複雜的政治因素，再加上趙紫陽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無法充分的「接地

氣」，形成朝野的有效和及時的互動，在關鍵時刻得不到來自社會力量的有力支持，趙紫陽很快成為「孤家寡人」，他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很快被中止，中共黨內主張進行政治改革的力量在與強大的傳統政治勢力的博弈中敗下陣來，也就成為必然。

三、關於 80 年代政治體制改革失敗的主觀因素

總結一場對中國的政治和社會轉型有重大影響的政治改革的失敗原因和經驗教訓，僅僅從客觀方面進行還是不夠的。雖然說中國 80 年代政治體制改革的失敗，主要是由的黨內各派力量對比等客觀原因所致，但這場改革的失敗也還有其指導者主觀方面的因素。雖然這些因素不可能改變事情最後的結局，但起碼對改革進程和事態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是趙紫陽對鄧小平過於信賴，對鄧的態度轉變估計不足。

鄧小平是一個老辣、堅定、政治手段強硬的實用主義政治家，在政治上他有自己的底線，在用人上，他同樣極少受個人感情左右，而是一切以政治利益為先。胡耀邦曾經對他，對老人集團重返政治舞台有恩，但 1987 年初他對胡耀邦問題的處理並沒有顧忌這一點；楊尚昆是他的主張的忠實執行者和在軍隊的代理人，但後來 90 年代他對楊尚昆、楊白冰【526】問題的處理同樣出手果斷。這些都證明，在鄧小平那裏，政治問題是從不摻雜感情因素的。

作為黨的總書記，中央工作和政治體制改革的主持人，趙紫陽對鄧小平的這一政治性格，似有認識不足。上個世紀 70 年代到 80 年代，趙紫陽是依靠鄧小平的信任和支持，從四川到北京，從經濟改革到政治改革一路走過來的。長期的改革實踐中鄧小平對他的支持，似乎使他對鄧產生了一種過份的信賴。他自信自己是瞭解鄧小平的，鄧小平對他也是瞭解的。雖然他知道，鄧對他的支持是有底線的，他也自信自己能把握好這個底線。但從當時和後來披露出來的實際情況看，他

【526】楊白冰（1920-2013）：原名楊尚正，重慶潼南人，中國軍方高級將領，前中國國家主席、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的弟弟。1988 年被授上將軍銜。為中共第十三屆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第十四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曾主持中央軍委工作，擔任過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政治部主任等職。與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楊尚昆一起，在當時被稱為「楊家將」。1992 年初鄧小平南巡，楊白冰曾經提出「為改革保駕護航」。後被認為是欲架空當時的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後被鄧小平下令解除具體工作，保留軍委委員職務。1993 年，楊白冰正式退役，不久後退休。2013 年 1 月 15 月日去世。

還是過高地估計了鄧小平對他的信任，過高地估計了他主持下的中央對整個局勢的掌控力。實際上，以往鄧對他的支持，不是對他個人的支持，而是因為他能堅定地執行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主張。在政治體制改革中他會不會繼續得到鄧的支持，要看他主持的改革實踐會不會觸及鄧的政治底線。當 1989 年 5 月局勢的發展觸及到了鄧的底線，鄧就果斷出手，在鎮壓了那場學潮，中止政治體制改革的同時，趙紫陽也因抵制戒嚴，反對武力鎮壓，而被鄧小平廢黜。

即使到了最後的關頭，趙紫陽仍然希望鄧小平能改變動用軍隊的主張。在 1989 年 5 月 18 日，鄧小平作出戒嚴決定的第二天，他致信鄧小平，再次陳述自己修改 4·26 社論的的意見，希望鄧予以考慮【527】。當然，這一方面說明趙仍然想為學潮的和平解決作最後的努力，但從另一個角度說，也說明趙此時仍似乎還沒有最後看透鄧小平。直到被軟禁幾年以後的 1996 年，他在與楊繼繩談話時，依然認為「『六四』前鄧對我是信任的」，認為「小平和我分手沒有耀邦那麼長的過程，只是『六四』」，鄧小平說他是「自己暴露的」【528】。他在自己的回憶錄《改革歷程》談到他與戈爾巴喬夫談話時，仍然認為鄧是「誤會」【529】了他。

事實並不是如此。實際上，鄧小平對趙紫陽的態度變化並不僅僅、甚至主要不是因為他與戈爾巴喬夫談的那番話。鄧對他的信任在 1988 年下半年以後，已經開始發生變化。《李鵬六四日記》中透露了李與丁關根的一次談話，談到了鄧小平對趙紫陽態度轉變的過程，筆者認為這一記載是真實的。李鵬在 1989 年 5 月 28 日日記中說：「晚上，我和丁關根同志談話。他對小平同志的想法比較瞭解。丁關根對我說，去年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全國工會代表大會時，李先念同志找鄧小平同志，談了趙紫陽的一些問題。小平同志當時已看清楚，趙是搞自由化的人，遲早非下台不可，但由於影響太大，一時又找不到合適人選，所以下不了這個決心。今年一月份，小平同志同你談話，講了『格局不變』，就是還不要動趙紫陽的意思。耀邦逝世，學潮起來，4 月 25 日小平同志與你們談話，為動亂定性，態度明朗。但有人頗有怨言，鄧為此發了脾氣，說關鍵時刻我不能不出來講話。5 月 17 日上午，

【527】參見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49-50 頁。

【528】參見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修訂版，第 548 頁。

【529】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68 頁。

先念同志去小平同志處，與鄧談話，雖然已有讓趙下台的意思，但還沒有下最後的決心。下午開會時，聽了你們的發言，看你們態度堅定明朗，小平同志才作了戒嚴決定，批評了趙，但還沒有說格局要變，要趙下台。到 5 月 19 日，因趙主動辭職，要撂挑子，小平同志和陳雲、李先念、彭真等幾位老同志一起商量，才下了最後決心，讓趙紫陽下台，並建議由江澤民同志任總書記。」【530】這段記載表明，鄧小平對趙紫陽的信任變化經歷了兩個階段。早在 1988 年下半年，這種信任就已動搖，他就「已看清楚，趙是搞自由化的人，遲早非下台不可」。後來鄧幾次說「大格局不變」，並對趙說什麼要他「搞兩屆總書記」，什麼要「把軍委主席交給他」，都只不過是因為找不到合適的人替換，下不了最後決心的緩兵之計而已。後來耀邦逝世之後，學生要求為耀邦正名，趙紫陽認為「沒有理由不同意學生悼念」，這讓鄧小平「更加看清了趙紫陽這個人」。此後，趙紫陽不同意對學潮的定性，提出修改 4·26 社論，反對戒嚴，就促使鄧小平下了最後決心。

二是改革力量對圍繞改革進行的黨內外鬥爭複雜性和殘酷性仍顯認識不夠，準備不足。

這場改革是對原有政治體制進行的一場前所未有的帶有根本性的變革，改革在其發展過程中遇到的矛盾極其複雜。這其中，黨內各種力量對改革的承受能力與社會上對改革的迫切要求之間、黨內保守的元老集團及他們的代理人與改革力量之間、黨內改革力量與社會上的改革力量之間、黨內高層領導人之間、黨內各主要部門之間，乃至社會各種利益集團之間，無不充滿了各種分歧和矛盾，有些甚至是不可調和的。這些矛盾交織在一起，相互制約，盤根錯節，構成了改革的複雜性。在 20 多年後的今天回頭看，縱然主持改革的趙紫陽有豐富的政治經驗，能夠通過他的努力將許多矛盾衝突緩和乃致化為無形，但是他仍然對一些重大問題發生的可能性和複雜性估計不足，對一些偶發事件產生了現在看來是較為明顯的應對失誤。

趙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入黨的老幹部，經歷過戰爭時期，也經歷過建國歷次政治鬥爭和文革，他對黨內鬥爭的複雜性和殘酷性都會有相當的認識。但是，在擔任代理總書記和總書記之後的兩年多時間裏，也許是由於鄧小平對他一直支持，也許是由於他能夠對改革過程中遇

【530】《李鵬六四日記》2004 年徵求意見版，第 178 頁。

到的障礙較為輕鬆的化解，使他在應對黨內保守勢力的政治對手時有些過於自信和輕敵，在個別時候對形勢產生誤判。這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1989 年 4 月胡耀邦追悼會之後，許多人建議他不要去朝鮮訪問，但他堅持認為追悼會後學潮應該會慢慢平息，留下了處理形勢的三點意見後，仍然堅持赴朝【531】，結果讓李鵬等人抓住時機，向鄧小平彙報，導致 4・26 社論的發表，失去了平息學潮的最佳時機。

另外，對於中共十三大後國內政治局勢發展的複雜性和嚴重性，趙紫陽、鮑彤及中央政改研究室的研究人員們也同樣存在估計和準備不足的問題。十三大的召開，和各項改革方案的提出，一開始民心還是比較順的。但是隨著形勢的發展，價格改革遇阻，政治改革也困難重重。經濟雖然保持了較高的發展速度，但物價上漲幅度仍然較高；價格雙軌制的漏洞、對公權力缺乏制度約束和輿論監督所孳生的腐敗，引起民眾強烈的不滿情緒；政治體制改革的進行為人們提供了較為寬鬆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但也讓一些人產生了對民主發展的急進要求。各種社會矛盾也開始逐漸尖銳起來，社會不穩定因素在增加。

對這種情況，趙紫陽、鮑彤和他們的部下們看到了，並組織了社會突發事件問題研究，也預見到了發生社會動盪的可能性【532】。但現在回頭看，當年對這項工作似乎重視程度不足，沒有把它作為一項重中之重的課題抓緊抓好。而且，對策性研究也沒有開展，特別是沒有對可能出現的黨內矛盾激化做出預測，並把它與社會動盪的過程與後果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做出真正能對解決社會動盪、同時也避免黨內矛盾激化提供操作層面上的應對預案。

1988 年底之後，黨內保守的元老勢力刮起「倒趙風」，李鵬一夥也在政治局內部發動向趙紫陽的進攻。特別是後來圍繞處理學潮的兩種方式的對立，使黨內高層內部的政治鬥爭更加表面化、尖銳化起來，趙紫陽的地位受到空前的挑戰。這個時候，趙紫陽的地位問題已經不是他個人的問題，而關係到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能否進行下去的關鍵因素。如果當年能意識到這一點，在小範圍內組織力量，把黨內外局勢發展的各種可能性攤開來，進行研究，針鋒相對地提出一些

【531】鮑彤在後來與筆者交談時認為，趙紫陽在胡耀邦追悼會後去朝鮮的行程不變，有可能是 4 月 20 日趙紫陽向鄧匯報時，鄧的意見。目前尚無其他資料佐證，暫且存疑。

【532】參見本書第十二章第 2 節，「動亂問題研究」。

處理預案，對事態的發展也許會有相當的正面作用。雖然形勢的變化是複雜的，預案不可能做得那麼具體，而且也不一定能改變事情最後的結局，但起碼不一定會發生先是被社會上的急進民主派、後來是被李鵬一夥一路牽著鼻子走的情況。

當然，這些只能是後話。當時黨內高層錯綜複雜的政治局勢，和趙紫陽、鮑彤們面臨的政治環境，使他們不可能放手把黨內高層鬥爭擺到桌面上，在政改研究室這樣一個中央正式機構中進行研究。當時出現的「小艦隊」說法【533】，已經讓趙紫陽、鮑彤們警惕、避嫌。之前的「動亂問題研究」沒有展開和抓緊，沒有與黨內鬥爭相關聯，大概也與此有關。但是，現在回頭看，在學潮爆發以後，黨內高層內部保守勢力同改革力量圍繞處理學潮問題鬥爭的已經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李鵬一夥已經打定主意要搞趙紫陽下台，趙不下台他們就得下台。他們不顧客觀事實，戴著「陰謀論」的有色眼鏡，在胡耀邦追悼會後不久就置疑是「趙紫陽發動的學潮」,「目的是打鄧倒李保趙」【534】;後來又在毫無根據的情況下，直接把「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總指揮部」、「壞人」、「動亂黑手」、「陰謀策劃」的帽子戴到了鮑彤及其部下頭上。趙紫陽、鮑彤們謹慎也好，避嫌也罷，都改變不了他們的政治對手的決心和這場政治鬥爭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應不應該、可不可以放手一搏？

三是改革的指導者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應對失誤。

即使作為一個經驗豐富的成熟的政治家，在歷史關鍵時期，面對紛亂複雜的政治形勢，也未必就會應對的滴水不漏。回顧從政治體制改革開始實施，直到 1989 年六四前這段時間，趙紫陽在大的方面事情上處理游刃有餘，但在一些問題上處理也有失誤。比如在政治體制改革指導和推行方面，沒有按照十三大報告確定的原則堅持到底，推進的力度也嫌不夠。

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是中共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是在中共黨內具有最高約束力的文件。在其實施過程中，十三大報告應該成為趙紫陽、鮑彤們手中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最有力武器。他們應該有可能以此為依據，變軟約束為硬約束，加大力度，強力推行。但他們沒有這樣

【533】參見本書第十二章第 5 節，「小艦隊」的說法從何而來？
【534】參見《李鵬六四日記》2004 年徵求意見版，第 61、64 頁。

做，反而寄希望於各部門、各省市自覺貫徹。面對重重阻力，他們在一些問題上做了讓步。比如，沒有能頂住來自保守勢力方面的壓力，在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問題上，默認了中組部取消了公務員分為政務、業務兩類的劃分。這本來是十三大報告中規定的，以全國黨代會已經通過為由，應該是可以頂住的；又比如，中央政法委撤銷之後，應該比照中央的做法，要求地方各級全部撤銷政法委。

對 1989 年學潮一些問題的處理上也有失當之處。這其中，除了前面提到過的應該中止訪朝之外，還有從朝鮮回來之後，沒有立即追究李鵬等人對 4・27 大遊行處理不當之責，反而被李牽著鼻子，落入追查其子「倒彩電」的陷阱，失去了處理大局的主動權；在與同戈爾巴喬夫談話時，本想為鄧小平做一件好事，卻沒有料到這個談話公開之後的產生的負面效果，等等。這些問題處理上的失當，也許不能改變事情最後的結局，但起碼對改革進程和事態的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

四是在輿論宣傳指導方面發生失誤，一些關鍵時刻導致不良後果。

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的原則。這一原則從方向上說是正確的，有利於民主政治的發展。但是，在複雜的改革過程中，透明度、公開性又是一把雙刃劍，在某些情況下會造成相反的「給改革添亂」的結果。現在回過頭來看，在改革過程中，公開化也要有所選擇，有所為有而所不為。但遺憾的是，由於條件、環境、經驗的限制，改革的領導者趙紫陽和他的助手鮑彤，以及中央政改研究室的「高參」們，當時都對這種「雙刃劍」的作用認識不足，從而導致了在一些關鍵時刻上的輿論引導失誤。1988 年 8 月，政治局通過了「物價闖關」的決議，但沒有考慮到輿論宣傳後果，直接發佈了會議消息，結果導致全國性的搶購風潮，「闖關」不得不中止，為黨內保守勢力刮起「倒趙風」提供了口實；1989 年 5 月 16 日，趙紫陽與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引發嚴重後果，問題也是出在由中央電視台全文播出上，而且當時恰恰又是學潮的關鍵時刻。如果這個講話僅僅在會見時講一講，或在報紙新聞中提到幾句，也不至於引起那麼大的社會反響，以致鄧小平找到借口，說這是趙把他拋了出去，很快下決心拿下趙紫陽。

五是沒有及時向社會交底，引導社會上的改革力量與黨內改革派形成有效互動。

任何一場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都需要有一定的社會中下層基礎。中國 80 年代這場政治體制改革，是有相當群眾基礎的，這個基礎，就是黨內外廣大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1987 年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方案之後，得到了黨內外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熱烈支持和擁護。但是，能不能和如何利用社會上這些改革的力量支持、推動這場改革，在改革的指導者那裏卻成為一個複雜的問題。

一方面，鮑彤和他的部下們擔心過多地宣傳民主，會「吊高民主派的胃口」，引發社會動盪，從而採取了對社會力量不接觸的封閉政策，沒有看到封閉政策並不能解決「吊高胃口」的問題，反而使社會上的改革力量不能很好理解黨內改革派的目標與各項措施，及改革過程中的艱難，形成了黨內改革派與社會改革力量的「兩張皮」，互不理解，形不成有效的互動。另一方面，由於這種不交底的封閉政策，社會上的改革力量幾乎很少能瞭解和理解趙紫陽主導的黨內改革力量在推動改革過程中遇到的障礙和艱難，在急於求成的心理作用下，發動了社會運動，力圖以街頭抗爭廣場政治的方式推動政治改革，卻沒有料到，極端的不妥協的廣場運動，反到把黨內改革派逼到了牆角，也成為六四鎮壓和政治體制改革被中止的重要成因。

現在回頭看，如果從 1989 年初出現各種上書的時候開始，能夠及時主動採取一定的方式，如利用「三所一會」這類這些半官方的改革力量，或是動員社會上一些支持改革的知名人士做一些工作，向社會知識界交底，並曉以改革大局的利害，或許會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知識界的不滿，延緩甚至化解學潮的發生。在後來戒嚴前後，據說有人開始做朝野的溝通工作，但已經遲了，廣場上激憤的學生已經處於不可控狀態。當然，這都是馬後炮。現在談到這個問題，只不過是作為教訓總結，以利將來而已。

趙紫陽和他領導的部下們在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後來處理 1989 年學潮的過程中，出現這些失誤，也很正常。他畢竟是人，不是神。分析起來，這些失誤多與他的經歷和性格特點有關。紫陽是一位謹守政治道德底線的政治家。雖然在幾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對黨內權力鬥爭的尖銳、複雜與不擇手段有深刻認識，但他在進入權力核心之後，卻從不用「陰謀論」來看問題，不願意用政治權謀去解決高層中

的矛盾。從本書的敘述和已經問世的許多人的回憶中【535】，可以看到，他處理工作中的問題往往是對事不對人。他對自己的政治對手也總是寬容、大度，不願意將一些深層的問題擺到桌面上，使矛盾公開化、尖銳化。在當時複雜的高層人事關係和尖銳的政治鬥爭中，他往往因考慮到「避嫌」、「影響」而放棄主動進攻，經常迴避一些尖銳的矛盾與分歧。特別是對鄧小平、陳雲這兩位「老人家」，他從不願意傷害他們，即便是有不同意見，也往往採取策略的方式提出，爭取求得他們的支持。在與鄧、陳有分歧，而且已經證明趙的主張正確時，趙也從不利用這種機會，去加強和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從四川到中央，從經濟改革到政治改革，趙紫陽一直在鄧小平的支持下工作。在這種情況下，他似乎是產生了一種對鄧的政治依賴，即使在擔任中央總書記之後，他也仍然不想主動抓權，建立自己改革力量的班底，缺乏鞏固自己政治地位的自覺。

當然，在當時黨內保守勢力過於強大的情況下，也許趙紫陽當時的一些擔心和顧慮不無道理。1980 年代政治體制改革失敗，根本原因是出在黨內政治力量的對比上，改革力量不夠，這是毫無疑義的。但趙紫陽這種性格弱點對他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對後來學潮問題的處理，也應該說不無影響。鮑彤曾經對筆者說：「紫陽作為一個從政經驗豐富的政治家，他當總理、當總書記是游刃有餘的。但他在性格上也有一個弱點，就是缺乏主動進攻精神，缺乏在尖銳複雜的政治鬥爭中大刀闊斧、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而大膽爭取的精神。他很少利用各種機會，特別是在形勢對自己有利時，去加強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當然，在當時條件下，他能做的事情有限，但他在很多明明是可以進一步的時候，考慮的卻是『要避嫌』。這種性格上的弱點，對一個普通人來說，可以評價為『忠厚』，但對一個政治家說來，在關鍵時刻可能就是致命的。」

四、80 年代政治體制改革的「時機選擇」之辯

近年來，有人在總結 1980 年代政治體制改革的經驗教訓時說，導致這場改革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啟動政治體制改革時機「並

【535】參見蔡文彬主編：《趙紫陽在四川》，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11 年 4 月出版；張博樹主編：《趙紫陽的道路》，晨鐘書局 2011 年 6 月版，等。

不合適」[536]。筆者不能籠統地贊同這種觀點，因為這種說法，沒有看到這場政治體制改革的二重性。當時政治體制改革的時機選擇者和實際主持者，並不是同一個人。失敗了的，不是鄧小平要搞的那個政治體制改革，而是趙紫陽的政治體制改革，而它的扼殺者，也正是這場政治體制改革的發動者——鄧小平。

在 1986 年前後，中國的經濟改革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迫切需要改變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中央向地方和企業放權，從而也迫切需要對政府機構進行改革，提高效率。在這種情況下，進行一場行政改革是必要的。這也正是鄧小平在當時提出和推動者政治體制改革的出發點。正如鄧小平說：「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化的成功。因為事情要由人來做，你放權，他收權，你有什麼辦法？所以政治體制改革應該同經濟體制改革互相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是搞不通的。」[537]相信如果當時的政治體制改革僅限於鄧小平提出的幾方面內容，這場改革是有可能成功的。也正因為如此，鄧小平認為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時機不但是成熟的，而且是必要的，因為，他已經掌控了這個黨，這個國家。

但是，問題在於，鄧小平選擇來制定和執行他的政治體制改革主張的，是趙紫陽。

鄧小平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出發點，是為經濟改革開路。他的「兩個基本點」，在經濟上放開，政治上收緊的主張從來就沒有變過。市場經濟加獨裁政治，最後的結果必然是權力腐敗、權貴集團形成和社會分配不公。鄧小平沒有、也不會去想這一點，而他選擇執行他改革主張的趙紫陽卻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趙紫陽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最終是建立市場經濟制度，那麼與之相適應的，就必須在中國同步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不建立民主制度，權力不受監督，那麼中國就有發生大面積腐敗的可能，中共很可能就此失去執政的基礎和合法性。

在當時實行的價格雙軌制之下，這種可能已經開始變為現實。當時的趙紫陽雖然還沒有完全跳出共產黨傳統理論和觀念的圈子，沒有

【536】參見米鶴都：《中共十三大政治體制改革的經驗教訓》，載《炎黃春秋》2012 年第 6 期，第 28-31 頁。

【537】《鄧小平理論全書》，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8 年 2 月版，第 181 頁。

明確得出「不限制公權力，腐敗就是必然」的結論，但他在 1988 年初已經看到了發生腐敗的危險性，並且由此提出了「經濟要繁榮，政府要廉潔」的口號，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要抓廉政建設的問題，後來在他又提出「通過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秩序和民主政治新秩序」的問題。1989 年 5 月他又提出了領導幹部財產申報、取消特供、設立人大廉政委員會等，並把這些，都看做是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具體措施。

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是鄧小平，而主持和實際操作的卻是趙紫陽。他們在政治體制改革理念上的差異，導致了鄧小平與趙紫陽在政治體制改革目標和內容上的差異，也導致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實踐在趙紫陽的主持和操作下，遠遠超出了鄧小平設定的目標和內容，向改變黨的執政方式，限制黨權、公權，加強民主監督和輿論監督、保障民權的方向發展。

根據這一看法，筆者認為，不能籠統地講當時政治體制改革時機合適或不合適，這樣講混淆了鄧小平與趙紫陽兩種政治體制改革主張的差異，抹煞了趙紫陽是在鄧小平的選擇下不得不接受了這項任務的事實。在當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是鄧小平的選擇，而不是趙紫陽的選擇。而鄧小平要趙紫陽來主持這場改革，趙沒有選擇，也無可選擇。當趙紫陽倉促上馬，來主持這場改革的研討和實施的時候，如果他不是按照自己的理念，而是完全按照鄧小平的主張亦步亦趨，那他完全可能順利完成任務，繼續當他的總書記，但那就不是趙紫陽了。也正因為如此，當 1989 年學潮襲來的時候，鄧小平拒絕了趙紫陽「在民主和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和黨內的保守勢力一起，扼殺了這場民主運動，也終止了他親自提出和發動的這場政治體制改革。如果他不這樣做，那也就不是鄧小平了。因為，這已經不是他所要的和行政改革劃等號的「政治體制改革」，而是趙紫陽的以民主政治為方向的政治體制改革。

即便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在一黨專制條件下自上而下地進行一場政治改革，它的時機成熟與不成熟，也不可能是來自於某個領導人或主持者主觀的選擇，而是多種主客觀因素合力的結果。1980 年代中國這場政治體制改革之初，從鄧小平的角度看，時機是成熟的，但主持改革的卻是趙紫陽。從趙的角度看，時機就不一定成熟，因為他想

搞的改革，與鄧小平不完全一樣，但他卻不得不搞下去，因為政治體制改革是鄧小平的主張，也是當時全社會的呼聲，是中國發展的需要和大勢所趨，也中國的一個歷史性機會。趙紫陽明知「改革的力量不夠」，會遇到各種阻力，但他不會放棄這個機會。他要抓住這個機會，為中國，也為這個黨的未來搏一次。我想，這大概就是趙紫陽當時的心中所思所想。

前面提到的這篇文章中認為「這次改革的啟動時機並不合適」的一個重要根據，是認為「1987 年，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面臨『闖物價關』的前夕，整體經濟形勢不容樂觀。任何重大政治措施的出台，最佳時機顯然是經濟的上行期。但是這次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僅不是在一個穩定的上行期，而是在一個困難重重的門檻前提出的。……如果這次改革啟動於 1985 年，也許會是另外一番風景。」【538】我認為，這種說法也是似是而非。

本書前面的敘述中已經談到，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的時間始於 1986 年 10 月，啟動於 1987 年 10 月的十三大，而「物價闖關」啟動於 1988 年 5 月。從這個時間表中可以看到，政治體制改革啟動在先，而「物價闖關」在後，而且啟動「闖關」的主張同樣來自於鄧小平。趙紫陽作為總書記，無論他是贊成還是不贊成（當然，趙當時是贊成的），都必須貫徹鄧的這個提議。「物價闖關」失敗，成為後來發生社會動盪的一個基礎性因素；趙紫陽被迫為此承擔責任，也成為黨內保守勢力「倒趙」的一個口實，這種情況確實成為進一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重大不利條件。但在這個問題上，趙紫陽同樣沒有選擇，也無可選擇。

在人類歷史上，一些事件的產生確實有偶然因素，但任何重大社會運動的發生，無不有其歷史的必然性。所謂時機成熟，只不過是相對的，在更多時候改革的發生，都是被迫的，很少能由得改革勢力進行從容地選擇。現階段，政治體制改革的時機就成熟了嗎？這種成熟以什麼為標誌？改革，作為統治集團內部要求改變現狀的勢力，對舊有的政治體制和統治方式進行的一場自上而下的變革，也從來都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都要受到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和制約，有時候這種影響甚至會是決定性的。籠統地講時機成熟與不成熟，意義不大。

【538】米鶴都:〈中共十三大政治體制改革的經驗教訓〉，載《炎黃春秋》2012 年第 6 期，第 30 頁。

五、趙紫陽主導的政治體制改革與他的政治遺產

80 年代中國的這場政治體制改革，雖然存在鄧小平與趙紫陽兩條「政治體制改革路線」，但改革實際上是在趙紫陽的主持下進行的。中共十三大報告第五、六兩個部分、《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主要內容，以及十三大以後趙紫陽提出的加強廉政建設、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商品經濟新秩序和民主政治新秩序等思想，都體現了趙紫陽對當時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認知，構成了這次政治體制改革的豐富內涵。雖然在當時的改革實踐中，這些內容有些得到了貫徹，有些未來得及實施，有些被歪曲以至篡改，在 1989 年六四後又大多倒退回到原來的起點甚至更糟，但它作為一個較為完整的政治改革方案和內容體系，是趙紫陽留下的政治遺產的主要部分，對於今天中國啟動新的一輪政治體制改革，對中國的政治和社會轉型，仍然具有重大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

80 年代政治體制改革的內涵和趙紫陽留下的政治遺產是豐富的，其中有一條最基本的內容，叫做黨政分開。有人說黨政分開是以提高行政效率為目標的行政改革【539】，筆者認為，這種看法是的膚淺的，它只看到了鄧小平的主張，卻沒有看到趙紫陽的主張。趙主張的黨政分開，與鄧小平的「黨政分開」有本質的不同，它是以實現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為目的的，其基本涵義，是「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是「黨要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其實質上，是要解決共產黨凌駕於憲法、法律和國家政權之上的問題，解決實際上存在的共產黨中央決策和憲法名義上的全國人大和政府決策這樣兩個決策中心的問題，實現國家權力重歸人民代表大會。趙紫陽和他的主要助手鮑彤提出的撤銷黨委中與政府重迭的部門，撤銷各級行政、司法機關中的黨組，撤銷各級政法委，實現黨的組織屬地化，把國家公務員分成政務、業務兩類，中共組織部門不再掌握政府系統人事大權，改革人大選舉制度，逐級實現真正自由選舉等等，無一不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按照這個路子走下去，順理成章的就是在開放人大中實現黨派活動、黨派競選；權力重歸民意機關及其選舉出的行政、司法機關；共產黨作為執政黨，也要受到民意的制約，也有下台的可能，也要實現

【539】參見米鶴都：〈中共十三大政治體制改革的經驗教訓〉，載《炎黃春秋》2012 年第 6 期，第 29 頁。

黨內的民主化。只不過，後面這些內容，是趙紫陽、鮑彤們在當時的條件下無法說出來的東西而已。

在當年那場改革已經過去 20 多年今天，有人仍然不能正確地理解趙紫陽和鮑彤們當年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內涵，不能正視趙紫陽與鄧小平的政治分野，仍然硬是要把趙紫陽和鄧小平扯到一起，說鄧小平當年是「誤解」了趙紫陽，鄧和趙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或許持這種說法的人是出於好心，是「愛護」趙紫陽。但是我認為，以這樣理由為趙紫陽辯護，實際上是貶低了趙紫陽，沒有看到趙與鄧的本質差別，沒有看到，或是不願看到趙紫陽已經開始衝破共產黨的傳統體制、觀念，開始逐漸轉變為一個民主主義者這樣的事實。

趙紫陽與胡耀邦都是中共黨內改革力量的傑出代表，都認同普世價值，但他們也有不同。這個不同，最大的一點，就是趙紫陽在他主持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和實際操作的那幾年，已經開始逐步跳出了中共傳統體制和觀念的束縛，逐漸開始認同現代政治理論和觀念，認同憲政民主和現代議會制度。而胡耀邦卻缺乏認識這些問題的機會和歷史條件。筆者的這一判斷，是有根據的，根據就是趙紫陽和鮑彤當年提出的那一系列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張。研究當年政治體制改革留下的那些資料，可以看到其中大量的向憲政民主發展的政治指向。黨政分開、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在人大中開展黨派活動、改革選舉制度、發展基層民主、實現社會團體自主化、保障公民基本權利法律化、開展社會協商對話，實現和保障司法獨立等等，無一不是向現代憲政民主制度發展的第一步。鮑彤曾經說過：「十三大的方案不是一成不變的，只是改革的第一步。」只要走出了這第一步，後面的東西就呼之欲出了。

如果說向現代憲政民主制度過渡，或許當時還只是趙紫陽和鮑彤們腦子裏的一個影子，他們還沒有直接意識到，或許囿於當時的歷史條件與黨內複雜的政治環境，他們還無法明確、直接地表達出來的話，那麼在趙紫陽的晚年，他經過對自己一生，特別是對他主持政治體制改革的實踐，以後及此後 15 年的反思，就得出了明確的結論。

趙紫陽的一生，曾經經歷了兩次「大徹大悟」。第一次，是他經過十年文革，對中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進行反思之後，從忠實於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轉變為一個以人為本的民本主義為思想

特徵的改革者。這個時候的趙紫陽，還沒有完全跳出共產黨傳統意識形態的框框束縛；第二次，是他經過主持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設計和改革實踐，特別是經過 1989 年的那場巨變，使他從體制的改良派轉變為一個堅定的民主主義者。在他的晚年，離開了政治權力核心之後失去自由的 15 年中，他對自己的一生，對他所為之奮鬥了幾乎一輩子的這個黨和這個制度進行了徹底的反思，對其作出了否定性的結論。他說：「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於形式，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而是少數人、甚至是個人的統治。」「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在大多數國家已經退出了歷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議會民主制顯示了它的生命力。看來這種制度是現在能夠找到的比較好的、能夠體現民主、符合現代要求而又比較成熟的制度。現在還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要實現現代的市場經濟，現代文明，它就必須實行政治體制上的議會民主制。」【540】

但是，趙紫陽並不認為中國可以一步就可以跨越到這種「先進的政治制度」，而要經過「一個較長的過渡時期」。他認為，「根據中國的情況，在過渡期，為了能過渡得好，至少是在一定時期，保持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改變共產黨的執政方式，仍然是一種正確的選擇。」「這種選擇的出發點，一是有利於國家和社會的穩定，為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創造一個好的環境；二是有利於隨著社會經濟文化條件的變化，順利地過渡到比較成熟的文明的民主政治體制。也就是說，第一不可倉促，冒然地全部搬過來；第二必須朝著這個目標前進，絕對不可以反其道而行之，防止任何不利於甚至阻礙向這個目標前進的倒行逆施。」【541】趙紫陽還說：「我們現在不培植反對黨，一旦垮了，國內會大亂的，這是最危險的。現中央不考慮這一點，不願看到這一點。」【542】

關於如何實現向現代政治和議會民主轉型的問題，趙紫陽說，「關鍵是共產黨領導集團有這樣一種思想，這樣一種信念，然後再因勢利導，分別輕重緩急，逐步實行。但是也不能完全靠執政黨的自覺，必須有社會輿論各方面的推動；也不能一切都不動，完全等待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具備了條件，在哪一天來宣佈實行議會民主政治。這應該是

【540】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296、297 頁。
【541】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298 頁。
【542】杜導正：《杜導正日記——趙紫陽還說過什麼？》，天地出版社 2010 年 1 月版，第 178 頁。

一種漸進的逐步發展的過程。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在政治體制上不斷改良、改進，使之互相滲透、互相影響、互相推動。究竟如何過渡，我在前面講的改進共產黨執政方式所列舉的那些內容都是應該做的，尤其是在初期階段。」【543】這就是說，他認為他在中共十三大上所提出的「總體設想」在過渡的初期仍然是適用的。

趙紫陽主張的這種漸進式的改革方式，是他政治體制改革思想的一大特徵。這一點，在他當年主持改革研討時，態度就十分明確。研究當年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的七次會議記錄，特別是鮑彤領導的中央政改辦的討論記錄，可以看到，近年來我們在政治改革討論中經常提到的民主憲政、言論自由、公民權利、黨派政治等問題，在當時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研討過程中都討論到了。但是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在納入方案時，就要有取有捨。趙紫陽、鮑彤和政改辦的研究人員們在這個時候，對於鄧小平要的效率，與黨內外對發展民主的要求這個矛盾，已經看得很清楚，而且也確實面臨著兩難的選擇。

在這種兩難的選擇中，政改方案的研討者們不得不首先選擇服從於鄧小平這個「中國最大的實際」。當時的想法就是，這次改革，是在鄧小平的支持下，由中國共產黨主導的。因此，這個方案首先必須考慮到黨內高層的承受能力，特別是鄧小平等老人的意見。在這種情況下，也許十三大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只能使中國的民主政治向前走一小步，但只要這個步子邁出去了，這一小步就可能會成為中國向民主社會轉型的一大步，就有可能像經濟體制改革一樣，造成一種難以逆轉的趨勢。十三大這個方案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要隨著改革實踐的發展不斷有新的內容推出，不斷發展變化的。如果我們把現在要做的而且能做的提出來，鄧小平們現在不能接受的，或是將來才有條件做的先不去講，留到十年後再講再做。自然規律是任何人都難以抗拒的。黨內的這些老人們，總有一天要退出歷史舞台。現在走出這第一步，幾年後下次黨代會上再走下一步可能就會阻力小很多，而再下一步可能就更好走一些。應該說，對這種逐步漸進式的改革方式，趙紫陽、鮑彤和政改辦的大部分同事們在當時都是明確的。

當年趙紫陽和鮑彤在政治體制改革研討時期，就曾經設想過，經過三至四屆黨的代表大會，也就是二十年左右的時間，完成黨的執政

【543】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298-299 頁。

方式的轉變和整個國家體制向民主制度的轉變。趙紫陽後來在回憶錄中所談的想法與他在當年主持政治體制改革時的主張，應該說是一脈相承的。

綜上所述，如果對 80 年代那場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內涵和趙紫陽的政治遺產的主要內容進行一個概括，可不可以這樣說：就是以民本主義、民主主義為基本政治理念，通過和平轉型和逐步過渡的方式，完成中國從極權政治向憲政民主的轉變，從一黨獨裁向現代政黨政治的轉變。

六、再一次啟動政治體制改革，是實現當今中國轉型的必由之路

從 1980 年代的政治體制改革被中止至今，20 多年已經過去了。這期間，中共在許多場合，多次宣稱，要「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但是幾乎未見任何動作。

進入 21 世紀以後，中國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向極端化發展，對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絕對控制非但沒有改變，反而更加嚴重。雖然在發展經濟上取得了一定成績，但經濟上的市場化和政治上的高度集權化，權力不受制約和監督，出現了體制性的腐敗，導致了權力的市場化、資本化和私有化，權力腐敗加速，權貴利益集團的形成；貧富鴻溝擴大，權貴貪婪掠奪，官員腐化墮落，社會矛盾加劇，群體事件此起彼伏；民眾的維權意識、公民意識、民主意識日臻成熟，互聯網等新傳播手段越來越被民眾所廣泛利用，形成越來越巨大的輿論場；國內各種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完全掌控了國家的經濟命脈，並且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當局的經濟和政治決策；中共的執政基礎和政治合法性經過不斷流失已經所剩無幾，進入為了加強對社會的控制，中國開始進入「維穩壓倒一切」的「准緊急狀態」。與此相適應，黨和國家領導體制迅速向「黨國一體化」的「維穩體制」演變，集權程度更加趨向極端。當局中的一部分高層領導已經不再有原來老一代領導人曾經有過的政治權威，和那種改革的願望和激情，有的甚至喪失了一切信仰和責任感，寧願「抱著炸彈擊鼓傳花」。當局拒絕改革而實行的「維穩」政策，加劇了公權力與民眾的矛盾，這種矛盾在許多地方開始走向對抗。如果繼續拒絕進行政治改革，黨的執政基礎將進一步流失，

各種社會衝突將更加嚴重，一點點火星都可能引起一場大的社會動亂，甚至引發社會革命。

這些情況，趙紫陽生前都看到了，在他的回憶錄《改革歷程》，及宗鳳鳴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等書中也都有記錄。

趙紫陽認為，這種情況表明，現階段執政黨所堅持的「經濟上放活，政治上收緊」，以經濟發展代替政治改革的政策完全是一條死路。通過政治改革，實現中國社會向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民主政治轉型，是唯一的出路。趙紫陽的這些看法，不能不說是誅心之論。

向民主化社會轉型，已經成為中國發展的必然和迫切要求，但是這條路怎麼走，還要看形勢的發展和各派政治勢力能否形成基本的共識。為了減少國家、民族、民眾在轉型過程中由於社會動亂造成的痛苦和損失，避免由此產生的經濟上的滑坡和國力上的倒退，應該承認，80年代政治體制改革的一些做法，和趙紫陽所主張的由體制內主導的自上而下的漸進式政治改良，是實現向民主化轉型的一條社會成本最小的道路。

趙紫陽認為，能否實現向民主化的和平轉型，關鍵在執政黨。世界上許多國家進行民主轉型的經驗表明，由執政者主動進行政治改革，果斷放棄集權體制，是有可能得到民眾的支持，也有可能得到成功的。1980年代台灣、韓國等向民主社會成功轉型的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大陸1980年代那場由趙紫陽主導的政治體制改革，也證明了這一點，並且，也為執政黨主動改革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當然，頑固堅持極權統治，拒不進行民主改革的當政者也有許多，但其幾乎無一例外地被民眾和歷史所拋棄，這種結局，也是有目共睹。

目前，關於政治改革目標和路徑選擇問題，在國內的學者中間有不同的主張和激烈的爭論。特別在能不能指望執政黨在社會壓力下主動走上民主改革之路這個問題上，分歧很大。但無論分歧有多大，這其中除去主張通過革命推翻現政權的極端民粹派和主張全面倒退回到毛時代的極左派之外，進行漸進性的政治改革已經成為多數人的基本共識。進一步凝聚這種共識，保持和加大對執政當局的改革壓力，極為重要。

目前執政黨內的政治形勢，與20多年前趙紫陽主持那場政治體制改革時相比，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最主要的表現，一是黨內傳統的

保守力量由於自然規律的作用，明顯減弱。雖然仍然有已經退下來的「老同志」的影響，但相比鄧小平時代的強人政治，老人對執政一線的領導人影響力已經減弱；二是黨內一批受過高等教育、具有現代意識的新生代力量進入了高層領導核心；三是一大批出生於 20 世紀 50、60 年代、瞭解中國社會底層狀況、具有基層工作經驗的中青年幹部已經進入黨的各級領導層。這其中就包括一部分具有改革意識的所謂「太子黨」。這些情況，為重新啟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創造了一種可能性。能否變成現實，既取決於國內外的政治環境變化，社會矛盾尖銳化對當政者的壓力，也取決於中國新生代領導人有沒有對這個國家負責、對這個國家的十幾億民眾負責、對這個黨負責的魄力和責任心。

六四過後的 1989 年 6 月 23 日，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前那次政治局擴大會上的「自辯發言」中，對這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講了一段話，值得引在這裏。趙紫陽說：「一黨領導必須能夠解決民主的問題，能夠解決對黨和國家機關內部的消極的，不健康的，以致某些腐敗現象的有效監督等問題，一黨領導才能增強生命力。因此我想我們黨必須適應新時代和新情況，學會用民主和法制等等新辦法去解決新問題。例如，要加強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分發揮人大的作用，加強與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和政治協商制，完善並改進選舉制度，加強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監督，用具體法律來保證和規範言論自由，允許經過合法申請和批准的遊行，等等。總之，要使人民切身感受到，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能夠享受到真正而切實的民主和自由。這樣，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增強對人民吸引力、凝聚力，它的優越性才能更加顯示出來。因此，我們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就必須適應在民主和法制的條件下進行工作和生活。適應民主，意見紛紜，表面上是『亂』。但是，有了在民主和法制範圍內的正常的小『麻煩』，就可以避免大亂。國家才能長治久安。」「今後，黨的領導作用的重要方面，要表現在積極領導人民進行民主和法制建設上，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成為真正的法制國家。而且，民主的旗幟如果我們黨不去高舉，就會被別人奪去。我覺得，我們遲早要走上這一條路。我們與其被動地走，不如自覺地、主動地走，因為我看到，有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在社會矛盾相當尖銳，黨的地位已經大為削弱的時候去搞政治改革，局面很難控制。我想，我們應當在黨的領導地位

相對鞏固的時候，主動的去搞民主建設。這樣就可以在我們黨的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發展一種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當然既使這樣做，在民主和法制建設過程中，仍然會有一些痛苦、摩擦、甚至震盪，但這絕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發生危機，在我們黨經過一番自我調整、自我完善，更加適應新時代要求以後，將會以嶄新面貌，朝氣蓬勃地率領全國人民前進，我主觀上認為，這是真正為黨和國家的前途著想。」【544】這段真誠、平實、在理、發自肺腑、真正為共產黨著想的話，值得每個中共黨員，特別是中共新領導人認真讀一讀，想一想。

當然，在目前政治和社會環境下，趙紫陽當年主持制定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不可能完全照搬。即便當政者在形勢的壓力下有改的願望，改革的路徑和方案也需要在執政當局、社會各階層，左中右各派政治勢力取得基本共識的基礎上，根據變化了的情況進行調整和修正。但方向必須明確，這就是「最終要過渡到議會民主政治」【545】。

榮劍先生在他的〈改革和革命：中國何以選擇〉一文中談到了對執政黨說來，改與不改的五個約束條件，也就是中國政治改革的邊界條件：一是改革有可能動搖國本，動搖現有的執政格局，至少要對現有權力格局作出重大調整；二是改革有可能對現有的既得利益集團形成巨大衝擊，至少是對現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三是改革必將意味著對重大歷史遺留問題的清算，這些歷史遺留問題直接關係著原有統治體系的合法性問題；四是改革必將意味著傳統治理模式的重大調整，如何避免社會分裂、動盪、報復和失序，是對新的憲政體制的嚴峻挑戰；五是改革必將意味著傳統處理民族關係和民族矛盾的方式將迅速終結，如何避免民族分裂、繼續維護中國統一，是對中國制度和文化的根本考驗。【546】這些約束條件，是對執政黨新一代領導人的改革決心和對局勢的掌控能力的直接挑戰和考驗。

最近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上，習近平、李克強等新一屆領導人接掌執政黨和國家權力，並作出了進一步推進改革，包括政治體制改革

【544】趙紫陽：〈關於『六四』事件的自辯發言〉，載《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367-368 頁。

【545】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二版，第 299 頁。

【546】參見榮劍：《改革和革命：中國何以選擇——在 2012 清華法政哲學論壇上的演講》，見 2012 年 10 月 31 日《共識網》。

的表示。但在中共十八大報告報告中，又提到了「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的問題，已經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內容也大都是膚淺的，停留在口號宣示階段，沒有多少做得重視的具體措施，與十三大的改革措施相比照，有相當大的距離。會後，黨的領導人把能否解決腐敗問題，甚至提高到「亡黨亡國」的高度，但卻仍然沒有對社會上大聲疾呼的建立官員財產公示制度明確表明態度。對這種情況，知識界和國內民眾普遍感到失望。但是筆者認為，這種情況或許也可以理解，畢竟十八大報告是在上一屆領導人的主導下形成的，是黨內高層政治老人們的願望和對改革承受力的反應。只有當新一代領導人真正站穩腳跟，逐步擺脫傳統的老人干政問題之後，才能真正看出他們對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真正態度。習近平最近強調：「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要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失職要問責，違法要追究，保證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謀利益。」【547】這些話講得不錯。所以，不妨繼續謹慎觀察，不但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

通過漸進式改革，推動中國政治和社會轉型過程，這是中國知識界多數人的共識。但是，能不能走上這條路，不取決於人們的善良願望，而是取決於社會危機和爆發革命的可能性對執政黨形成的壓力。80 年代的政治體制改革，是中共的一個特殊的歷史機遇。在現階段，不能指望中共高層再出現一個趙紫陽。只有當革命成為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始終懸在執政黨頭上，才會逼迫他們走上改革之路。所以，改革一日不成，就不能輕言放棄革命。

現在國內學者中流傳一句話，叫做「五年看改，十年看埋」。這就是說，歷史留給這個黨的時間已經不多了。現在，中共政權已經面臨空前的合法性危機，處於生死存亡之際。如果執政黨的新一代領導人還想為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做點事情，如果不希望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葬送在這一代人手裏，如果不希望這個國家重新陷於動亂之中，那麼，就應該抓住歷史機遇，拿出實際行動，主動順應浩蕩的世界民主潮流，回應人民的、歷史的要求，對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進行民主化改革。必須真改，而不是假改。如果執政黨不能在十年，也就

【547】習近平：《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施行 30 週年大會上的講話》，2012 年 12 月 4 日新華網。

是兩屆黨代會期間內起步，堅決、認真而不是敷衍地推進政治改革，向民主政治轉型，任憑政治和社會局面繼續糜爛下去，那麼，中國發生社會革命的可能性極大。

附錄一

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
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
研究人員名錄

鮑彤：（1932-）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主要負責人；十三大後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浙江海寧人，趙紫陽在政治體制改革中的主要助手，中國著名政治活動家。1949 年春在上海加入中共，7 月調入中共中央華東局組織部任幹事。1965 年任中央組織部研究室副主任。文革中被定為「走資派」下放到「五七幹校」。1978 年任國家科委辦公廳副主任、兼研究室副主任。自 1980 年 5 月起，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秘書；1984 年兼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1986 年 10 月兼任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主要負責人，後又兼任主中共十三大報告起草組主要負責人。1987 年中共十三大當選為中央委員，並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中央宣傳小組成員、中央黨建小組成員。1989 年「六四」事件中，鮑彤反對鄧小平、李鵬等用軍隊鎮壓學生，被誣為「壞人」非法關入秦城監獄。1992 年被判處有期徒刑 7 年。1996 年出獄後長期從事獨立寫作至今。

周傑：（1929-2005）：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負責人之一，十三大後兼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江蘇阜寧人。1979 年調入中共中央辦公廳，1983 年起任中辦副主任，曾長期在胡耀邦身邊工作。1986 年 10 月作為四位負責人之一，參加鮑彤主持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工作。1988 年 9 月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2005 年因病逝世。

嚴家其：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之一。中國著名政治學學者。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所長。1986 年 10 月參加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工作，為四位負責人之一。1989 年六四後被迫流亡美國。

賀光輝：（1929-）：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之一，十三大後兼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陝西清澗人。早年曾任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秘書。1983 年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1993 年 5 月 -1995 年 1 月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黨組書記。1995 年 1 月 -2000 年 9 月任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監事會主任。曾任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第九屆全國政協常委、社會與法制委員會副主任。

（以下按姓氏筆畫為序）

牛鐵航：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研究人員。此前為《經濟日報》記者。1990 年後下海經商。

王春生：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研究人員。此前為中共中央組織部官員。1990 年後下海經商。

王紹賢：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研究人員；十三大後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社會改革局處長。此前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研究人員。1991 年後曾任中國福利彩票發行中心副主任。

白慧敏：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研究人員；十三大後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資料室主任。此前曾為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人員。1991 年後下海經商，曾任聯想集團副總裁。

石肖巖：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綜合局副局長。此前為《中國政協報》副主編。1991 年後被分配到中國商報社任副社長，後任社長，兼中國商業出版社社長。

何家成：中共十三大報告起草組成員；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綜合局副局長。此前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研究所比較經濟學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辦公廳調研室經濟組研究人員。1991 年後歷任國家物資部辦公廳副主任、中國物資經濟研究所所長、國內貿易部政策體製法規司司長、國內貿易局黨組成員、副局長、國務院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現任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

吳偉：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的最初研究人員之一，任綜合組成員，《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執筆人之一，1987 年初任鮑彤秘書；十三大後兼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綜合局處長。中共中央黨校碩士研究生畢業，此前曾在吉林省委宣傳部工作。1991 年被分配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不久後下海經商。

吳國光：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的最初研究人員之一，任綜合組成員，十三大報告起草組成員，《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執筆人之一；十三大後兼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特約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法學碩士、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人民日報評論部評論員。1989 年初赴美留學，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現任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系教授、歷史系教授。

呂長春：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的最初研究人員之一。不久後調至機構改革專題組。此前曾在國務院辦公廳工作。1991 年後下海經商。

李丹鋼：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的最初研究人員之一。此前為中共中央辦公廳調研室工作人員。1987 年 3 月離開，到中國社會科學院于光遠辦公室工作。1999 年進入民營企業。

李元：中共十三大報告起草組成員；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行政改革局局長。此前為中共中央辦公廳調研室工作人員。1991 年後被分配到國土資源部任司長，後任副部長。

李鐵林：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的研究人員。不久後離開，任中共北京市東城區委書記。後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沈榮華：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研究人員；十三大後兼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社會改革局副處長。此前為國務院辦公廳工作人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碩士。1991 年後下海經商。

周大力：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最初研究人員之一；十三大後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行政改革局處長。此前為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處長。1991 年分配回國家體改委任處長，後任副局長。現下海經商。

唐欣：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黨群改革局副局長；此前歷任北京日報記者、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任信訪局副局長。1991 年後被分配到中國輕工報社任副社長。

孫方明：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最初研究人員之一，任綜合組負責人，是起草《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主要執筆人；十三大後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綜合局副局長。此前為中國農村發展組早期成員，1984 年到中央書記處辦公室工作，後來任中宣部部長朱厚澤秘書。1991 年後被分配到貴州省政府經濟研究中心任副主任。不久後下海經商。

徐沖：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研究人員；十三大後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社會改革局處長。此前為鐵路高級法院審判員。1991 年後組建律師事務所，任合夥人。

高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研究人員；十三大後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綜合局副局長。此前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室主任。曾任北京青年經濟學會副秘書長。後因 1989 年六四期間參加「三所一會」會議，被判處有期徒刑 4 年。

張偉：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研究人員；十三大後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黨群局副處長。此前為中共上海委組織部幹部。1991 年後經商。

張占斌：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研究人員。吉林大學碩士，中央黨校博士。此前為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工作人員。2000 年後歷任國家行政學院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經濟學教研部主任。

梅興保：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研究人員。此後任湖南省張家界市副市長、湖南省經貿委副主任、中共中央辦公廳調研室科教組組長、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總裁，中央金融工委辦公廳主任。現為中國銀行外部監事，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陳一諮：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日常工作負責人。中國經濟、政治改革中的風雲人物。文革後期開始做中國農村問題調查。1980 年開始組建中國農村問題研究組。1984 年在鮑彤支持下組建隸屬於國家體改委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任所長，國家體改委委員。1989 年六四後，因組織「三所一會」支持趙紫陽的主張、反對武力鎮壓學潮而受到通緝，被迫流亡美國。

陳小平：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研究人員。中共中央黨校研究生畢業，此前為共青團南京市委工作人員。1991 年後經商。

陳小魯：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研究人員，任聯絡組負責人。十三大後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社會改革局局長。元帥陳毅之子。此前在解放軍總參二部工作，曾任中國駐英助理武官，上校軍銜。1991 年後轉業經商。

陳群林：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研究人員，任綜合組成員，十三大報告起草組成員，此前為中共貴州省委副秘書長；十三大後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參加過許多重要文件起草。1991 年後歷任交通出

版社社長、中國福利有獎募捐委員會秘書長兼中國福利彩票發行中心主任、民政部司長、中國殯葬協會會長、國際殯葬協會主席。

陳福今：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日常工作負責人。1986-1990 年任中央辦公廳調研室副主任。1986 年 10 月經胡啟立推薦，參加鮑彤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參與主持日常工作。1993 年任中辦副主任。1999 年任國家行政學院黨委書記、常務副院長。是中共第十六屆中央委員。

黃海：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研究人員；十三大後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黨群改革局副局長。此前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組副組長。中共中央黨校碩士研究生畢業。1991 年被分配到商業部研究所任副所長。後歷任國家商業總局總經濟師、商務部部長助理等。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趙豐田：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研究人員。此前為山東省某市體改委主任。1990 年後到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工作。

鄧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的研究人員。此前為國防大學教員，中共中央黨校碩士研究生畢業。現任中國保利集團上海公司總裁。

遲福林：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的最初研究人員之一，任聯絡組負責人。曾任國防大學教員。中共中央黨校碩士研究生畢業。1987 年 10 月，調任海南省體改辦副主任。現任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海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是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閻軍：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研究人員；後曾借調到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短期工作。此前後為《法制日報》記者。

應松年：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研究人員。中國著名法學家，現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全國人大法工委行政立法研究組副組長，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會長。

嚴書翰：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研究人員。中共中央黨校碩士研究生畢業。1988 年後歷任中央黨校教員、教授、博士生導師，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主任。

顧雲昌：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研究人員；十三大後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行政改革局副局長。此前為中共中央組織部處長。1991 年後被分配到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工作。

附錄二

中共十三大報告起草組成員名錄

鮑彤：（同附錄一）

袁木（1928-）：中共十三大報告起草組負責人之一。江蘇興化人。時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秘書長，1988 年任國務院研究室主任、國務院發言人，曾參加過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許多文件的起草。1989 年「六四」事件中，成為官方武力鎮壓的喉舌。

鄭必堅（1932-）：中共十三大報告起草組負責人之一。四川富順人，1982-1987 年任胡耀邦秘書，兼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室務委員。歷任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總幹事、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宣部副部長、中央黨校副校長等職。曾參加過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許多文件的起草。

龔育之（1929-2007）：中共十三大報告起草組負責人之一。湖南湘潭人。時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後歷任中宣部副部長、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央黨史研究室常務副主任。曾參加過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許多文件的起草。

桂世鏞（1935-2003）：中共十三大報告起草組負責人之一。時任國家計委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後調任《人民日報》總編輯，參加中共十三大報告起草工作，為五位負責人之一。此後歷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國務院研究室主任。

（以下按姓氏筆畫為序）

王珏 (1926-)：遼寧遼中人。著名經濟學家。中共中央黨校特級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會長。曾任中央黨校校委委員、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等。

王夢奎（1938-）河南溫縣人。時任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經濟組副組長。後歷任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兼黨組書記、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是第十屆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共第十五屆中央委員。長期從事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的研究，參加過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

何家成：（同附錄一）

吳國光：（同附錄一）

吳稼祥（1955-）：安徽銅陵人。知名學者。1982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調研室政治組副組長、研究員，參加過許多重要文件起草。1989 年六四後宣佈退出中共，被判處有期徒刑 4 年。出獄後赴美在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做訪問學者。2003 年回國成為獨立學者，長期從事經濟、政治、國際政治及中國傳統謀略思想研究。

李元：（同附錄一）

李劍閣：(1949-)，江蘇南通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學碩士。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此後歷任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政策法規司司長、國務院證券委員會辦公室主任、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2008 年 7 月，任中央匯金投資公司副董事長，兼任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董事長。

沈柏年（1946-)：浙江天台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經濟學碩士。時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處長。此後歷任國務院研究室處長、宏觀組副組長、財金組組長、廣州市市委常委、副市長、常務副市長、廣州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

武樹幟：時任國務院研究室處長。後任國務院研究室機關黨委書記、黨組成員、全國政策科學研究會會長、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副會長。

陳進玉（1946-)：浙江蒼南人。1969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調研室主任。此後歷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寧夏回族自治區副主席、國務院副秘書長等職。現任國務院參事室黨組書記、主任。第八屆、九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曾參加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

陳群林：(同附錄一)

賈春峰：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理論組副組長。時任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後任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企業文化研究會副理事長。

鄭洪慶（1947-)：1981 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碩士。時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委員、政策法規司司長，參加過許多重要文件起草。此後歷任中國集裝箱總公司總經理、物華置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香港中旅集團有限公司常務董事、副總經理。

戴園晨：(1926-)：浙江海寧人。經濟學家。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政治經濟學研究室主任、研究員。此後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財政學會、中國價格學會、中國稅務學會、中國成本研究會理事。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

魏禮群（1944-)：江蘇睢寧人。時任國家計委研究室副主任。後任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研究室主任、黨組書記，國家行政學院常務副院長（正部長級）。參加過許多重要文件起草。2012 年 2 月 28 日任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中共第十六屆、十七屆中央委員。

附錄三

為趙紫陽起草的在中央宣傳口負責人會議上談鄧小平歷史地位的講話要點[1]

1989年5月16日代擬稿

這一段時間，社會上和黨內，都有一些關於小平同志的議論。有些議論，涉及到我們黨的領導格局，因此也關係到黨的前途。作為總書記，我有責任就此作出鄭重的說明。

大家知道，十三大以前，小平同志自己曾多次向中央提出，為了黨的長遠利益，請求從領導崗位上完全退下來，不只是退出中央常委，而且要退出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員會，一退到底。小平同志的這個願望和請求，曾經在黨內反覆醞釀，大家一致的意見，恰恰是為了黨的長遠利益，小平同志不能退下來，更不能全退。十二屆七中全會上，十三大上，中央政治局和代表大會主席團反覆做工作，才使大家的意見統一起來，尊重小平同志的意願，只選舉他擔任了中央軍委主席。

十三大之後的一中全會上，新選出的政治局常委同志，曾經由我作代表，在講話中鄭重地提出了一個請求。為了使大家知道這件事，我不妨唸一下當時的記錄：「小平同志作為我們黨和國家重大問題決策人的地位和作用，是曾經過歷史考驗並為黨內黨外國內國外所公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儘管小平同志沒有擔任黨的主席或總書記，但實際上是小平同志在掌舵。今後小平同志雖然退出了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常委，但小平同志作為黨和國家重要問題決策人的地位和作用仍然沒有改變，我們仍然需要小平同志繼續在重大關頭掌舵。政治局常委認為：今後遇到重大問題的時候，常委仍然有必要向小平同志請教，小平同志仍然可以召集我們開會。我們懇切地向全會和小平同志提出這個請求，因為這是黨的事業的需要，我相信全會一定會同意我

【1】　趙紫陽原準備在1989年5月中、下旬召開一個「首都新聞界和宣傳口負責人會議」，講一講鄧小平在黨內的地位和歷史功績問題。此為鮑彤和中央政改研究室按照趙紫陽的思路，為趙在會上講話準備了此代擬稿。由於5月17日以後形勢的變化，這個會沒有開成，此稿自然就沒有使用，但其中談到十三屆一中全會那個決議的部分，被平移到了5月16日趙紫陽與戈爾巴喬夫的談話中。詳細經過見本書第十四章第1節「趙紫陽5・16見戈爾巴喬夫談話的前因後果」。

們的要求。（熱烈鼓掌）好！我們這個請求得到了全會的熱烈贊同，我們把它看成是對政治局常委的具有特殊意義的支持。」

這件事，過去沒有公開，現在公開出來，是想說明，在遇到重大問題時，政治局常委向小平同志通報情況，就教於小平同志，這決不只是對小平同志個人的信賴和尊重，而是在執行一中全會的正式決定。我們這樣做，不僅是合理的、正確的，而且從組織程序上說，也是合法的。恰恰相反，如果我們在重大問題上不向小平同志通報和彙報，那正是違背了或者說是沒有執行中央委員會的決定。

自從十三大以來，小平同志在每次聽取政治局常委的通報和彙報，發表他的看法時，始終堅持了一種嚴肅的負責任的態度：只要常委同志的意見一致，他就全力支持常委會的集體決定，並運用他的智慧和威信，幫助常委會做工作。他從來未曾用個人意見否定常委會的決定，更未曾將個人意志強加於常委會。相反，如果實踐證明我們常委會的意見和決定有庇漏，他總是主動站出來承擔責任。事實是，在個人與組織的關係上，小平同志儘管處在一種特殊的情況下，但他的言論和行動，始終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嚴格的組織觀念，也始終表明他模範地執行著一中全會的決定。為了說明這一點，我想舉兩件事為例。

第一件，去年物價闖關問題。在全面弄清楚情況的基礎上對物價改革作出通盤考慮，這個建議是我在政治局提出來的。我們常委的五個同志，意見是完全一致的。我們向小平同志彙報了，小平同志支持常委的初步考慮。後來由於具體工作上的失誤，這包括方案未確定前的公開宣傳，也包括物價小組綜合測算時對社會承受能力的估計不足等，導致群眾恐慌心理加劇，形成了七、八月份的群眾性擠兌、搶購。在這種情況下，我又提出了價格改革推遲，先搞治理、整頓。常委同志一致贊成這個主張，又向小平同志作了調整方針的彙報，小平同志又表示支持常委這種方針上的調整，並且為治理，整頓出了一些重要的主意。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簡單明確。如果說這中間有不當和失誤，責任首先在我，在政治局常委會，而決不在小平同志。

第二件，最近的學潮問題。這次學潮，直接起因是耀邦同志去世。儘管我們從一開始就不贊成採取遊行示威的方式，但青年學生、人民群眾悼念耀邦同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在整個治喪活動期間，我們採取了緩和矛盾、寬容處理的方針。四月二十三日我去朝鮮之前，我們常委會曾開會討論下一步方針，我提出三條:（一）治喪活動已經結束，整個秩序應當轉入正常，學生應當復課；（二）做學生的工作，要採取耐心教育和正面疏導的辦法，要開展多層次，多形式的對話;（三）如果發生打、砸、搶、燒等違法犯罪行為，必須堅決依法處理。常委同志一致贊成這三條，我向小平同志作了彙報，小平同志當即表示支持常委的意見。四月二十四日，北京市委和國家教委根據他們掌握的情況，認為事情的性質起了變化，希望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要求授權市委全權處理。在家的常委同志，支持了這種判斷和意見，並且將這種意見向小平同志作了彙報。小平同志又一次支持常委的意見，並且坦率

地表明了他的看法。當時我不在北京，如果在，我相信我也會持這種態度。當我在朝鮮看到有關電傳後，我也回電表示了贊成。以上這個過程，最清楚不過的，是小平同志所持的基本態度，仍然是他一貫地全力支持並幫助常委會做工作的態度。他的講話的精神實質，是要穩定不要亂動。這七個字，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沒有錯。對待小平同志對我們工作的堅持支持，正確的負責任的態度，我認為應當是通過我們的工作，使小平同志所支持的希望和意圖盡快實現，而不應當有意無意把小平同志推到第一線。這是黨的利益對我們提出的要求，也是共產黨員應有的起碼道德準則。現在有同志反映，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的措辭不妥。我認為，即便有不妥，那也是我們常委會的責任，首先是我的責任，因為我是總書記，而不能加到小平同志頭上。

十年來，小平同志的工作，他為我國改革和建設事業作出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沒有他，就不可能有兩個「凡是」的突破和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就不可能有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確立，就沒有知識分子的第二次解放；沒有他，就不可能有農村第一步的改革由星星之火最終發展為燎原之勢，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確立，就不可能有經濟特區和整個對外開放格局的形成；沒有他，就不可能有幹部四化，就不可能順利提出並實施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就不可能早在九年之前就提出並醞釀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也不可能在十三大時確定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藍圖；有了他，中美正式建交、「一國兩制」、外交策略調整、中蘇關係的改善等一系列重大的外交成就，才能夠如此順利地取得和如此帷幄自如；有了他，一九八七年初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才得以排除干擾，在正確的軌道上前進，而倖免於擴大化。

我列舉這些大家都知道的事實，是想再一次強調，今後，我們還將一如既往地信賴和尊重小平同志，把他的支持看成全黨、中央委員會對政治局，對常委會的支持。一切誤解小平同志的議論要澄清，一切無中生有的傳聞要制止，而一切工作中的這樣那樣的問題，責任由我們來負，問題由我們來解決。

附錄四

鮑彤在學潮和動亂期間言行的「交代」[2]

1989年9月25日於秦城監獄

4月15日耀邦同志逝世，學潮旋即開始，我很憂慮。小平同志4月25日講話指出，中國壓倒一切的是要穩定，我完全贊成。我也想要維護穩定，制止動亂。我的具體想法是盡力緩解矛盾，避免激化矛盾。4月26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我認為口氣生硬，分析和說理不充分，我有保留。5月19日和20日，中央宣佈軍隊進京，實行戒嚴，我內心認為是「走錯一步大棋」，怕騎虎難下，局勢益發不可收拾。中央常委集體批評趙紫陽同志，我感到不平。中央領導同志點名批評我洩密，我感到委曲。我的這些思想先後影響以至支配了我的言行，使我犯了在政治上與中央不保持一致的嚴重錯誤。5月28日，常委決定對我進行審查。按照時間順序，我向黨交待以下十六件事。

一、最早向紫陽同志反映26日社論激化中間學生群眾的對立情緒的是我。

4月30日紫陽同志從朝鮮回北京。他剛到家，我就向他反映：27日學生上街，擋不住，市民圍觀的很多，機關幹部中也有同情的，事態有升級和擴大之勢，相當一部分中間學生群眾對26日社論有反感，認為是針對他們的。我講了我對社論的看法：社論的積極意義在於傳達小平同志關於中國一定要穩定，一定不能搞動亂的思想；但社論寫得太生硬，沒有充分說理，缺乏分析，沒有考慮到中間群眾的接受程度；既然這麼多的人都以為社論是針對他們的，可見社論沒有講清楚。紫陽同志當時沒有表態，過了若干天，他對我說，看來社論是有缺點。紫陽同志的觀點當然有他的形成過程，但最早向他反映的是我。

二、在綜合中央領導同志對青年大會講稿的修改意見時，我沒有加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

這個稿子是紫陽同志4月30日批請各領導同志審閱修改的。李鵬，依林等同志都提出要加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我5月2日向紫陽同志彙報說，已經從正面講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道理了，再從反面來講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似乎講不出什麼新話來了。紫陽同志聽了我的彙報後表示可以不

【2】 本文原載2003年4月21日香港《信報》，原標題為〈鮑彤六四密件〉。收入本書前已經鮑彤確認並授權轉載。

加。事情是紫陽同志定的，但建議者是我。這篇講話在當天電視上播出後，我聽到黨內同志反映不錯，就打電話給艾知生2同志，請他考慮可否安排重播。艾知生同志說，今天節目已滿，明天可以考慮。我說，明天是5月4日，學生要出來遊行，後天可否再播。艾知生同志表示，連播三天不行。這個電話是我主動打的，紫陽同志並不知道。

三、亞行講話是我執筆的。

5月4日上午9時，紫陽同志在去北京醫院探望先念同志的車途中，要我為他起草當天下午1時半會見亞行代表的這篇講稿。思想、內容、提法，以至許多重要的語言，都是他口授的。這篇講話的基調和常委的集體決策不一致，但我當時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我完全贊成這些觀點，因此也沒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見請他在斟酌。我回辦公室後做的是文字整理工作，中午12時半交稿，紫陽同志又親自指出一些地方要我修改。（我記得我原稿的結尾處有一句話，「中國是不會發生動亂的」，紫陽同志說，不對，已經在動亂了，怎麼能說不會發生呢？應該改成不會發生「大的動亂」。）最後他說，稿子就這樣定了，你同新聞單位打一個招呼，要他們不要刪節。我回辦公室後，立即打了三個電話。一是告訴新華社，發全文，不要刪節；二是告訴人民日報，用新華社稿，在顯著地位登出；三是告訴廣播電視部，用新華社稿當晚播出，並請他們安排重播（因上一天晚上我提出重播青年大會講話時，艾知生同志告訴我當天計劃已滿，所以我想這次請他們在下午安排一下）。但是我沒有講要重播三天（那是把5-3講話和5-4講話弄混了）。

四、我曾向《國內動態清樣》推薦過一篇文章。

5月上旬，《零訊》登了社會科學院何新同志的一篇文章。題目我忘了；內容，我現在回憶（我自已的印象，決不是何新同志的原話）是講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一定要處理好青年知識份子的政治要求，這是一個帶普遍性長期性的問題，特別要慎重從事，壓是壓不下去的，而可能適得其反等等。紫陽同志問我對這篇文章有何看法，我說，這篇文章很有見解，提出了一些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我建議在新華社發到省軍級的內部刊物《國內動態清樣》上發表。他說，可以。我就把這篇文章送新華社總編室（文中有一節，專講不能動用軍隊，我在送新華社時把這一節全文刪去了）。但我不知道後來發表了沒有。我印象中，沒有在《國內動態清樣》上看到這篇文章，因此可能沒有發表。要是沒有發表，那是新華社負責同志不同意我的建議，但我當時確實提過這個建議。如果發表了，責任在我，我應負全責。

五、5月12日，我給人民日報送去一篇稿子。

5月12日晚10時後，政體改革局付局長高山同志向我反映，北師大黨委的同志告訴他，明天學生將開始絕食。我說，今天早上報紙已登了委員長會議的決定，人大常委即將開會討論學生關心的熱點問題，黨和國家已經重視到這樣程度了，還沒完沒了地鬧什麼！白慧敏同志說，今天報上這條消息登得不顯著，可能學生沒有注意到，可否在明天的報上採取什麼辦法補救一下？我就叫高山編一條消息，我還親自深夜送給錢李仁4同志。我對錢李仁

說，今天各報都沒有把委員長會議的決定登在顯著地位，包括人民日報。我的話對錢李仁同志顯然有壓力，第二天，我送去的這條消息就登在頭版頭條5。這條消息的結尾是呼籲學生冷靜理智，採取合作態度，同黨、政府、人大共同為開好人大常委會而努力，這也確實是我要高山寫這篇稿子的目的。問題是：一、在當時形勢下突出報導人大常委即將開會，實際上會沖淡中央常委制止動亂的決策；二、所謂教師、學生、幹部、工人的反映是編造的，違反了新聞報道的原則（錢李仁同志不知道這一點，他以為是我們收集的反映）。

六、我曾向胡啟立同志講過我對26日社論的看法。

大概是5月13日或14日，我在勤政殿經過啟立同志辦公室時，我也向他反映了我對26日社論的意見。我說，學生對26日社論的對立情緒大極了，這篇社論我看有缺點，沒有把道理講清楚。啟立同志說，他也有這個感覺，這篇社論是他主持起草的，責任在他。

七、我以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名義召開過一次法律專家座談會。

會是5月16日下午和晚上開的。內容是座談在協商對話中學生可能提出的法律問題。我記得座談中提出的意見主要是：一、北京遊行十條的法律效力不容置疑，今後應加快制定全國性的示威遊行法，使母法（全國性法律）和子法（地方性法規）配起套來；二、過去民政部的社團登記條例規定，各單位內部的社團不必登記，因此，在處理學校內部的社團問題上可能有麻煩；三、我國法律體系尚待健全，目前有青黃不接的現象，增加了問題的複雜性。最後綜合了一期《政改要報》送常委、政治局和書記處各位領導同志。我開這個會，事前沒有向紫陽同志講；但會後（17日上午）我跟他說了，也講了上述三點。他沒有說什麼意見。我所以組織這次座談，是想為協商對話作點準備，反映了我把很大希望寄托在協商對話上。

八、紫陽同志同戈巴契夫談話時關於小平同志的一段話是我在起草時主動加上去的。

紫陽同志在向朱良同志和我交代起草講稿時沒有講這個意思。朱良8同志送來的中聯部的原稿上也沒有這個內容，他們的原稿中只有一句話：兩黨領導人的會晤意味著兩黨關係的自然恢復。我認為，紫陽同志應講得具體一些，使戈理解這裏所說的兩黨領導人是專指小平同志和戈，而不是趙和戈，所以加了這一段話。（當時還有一個巧合：紫陽同志為了澄清當時社會上一部分人中關於小平同志的流言，準備召集首都各大新聞單位負責人開會專門講一講，其中內容之一就是十三屆一中全會一致認為重大問題上必須向小平同志請教，請小平同志掌舵，這根本不是什麼「違反組織原則」，相反，如果不這樣做才是真正違反了一中全會的決定。這兩個對新聞界的講稿，當時都在我手頭上平行作業，我就很自然地把這些內容移植到與弋會談稿中去了）。當時的情況和動機確實如此，後來引起的影響則完全是我始料不及的。

九、我沒有洩露過5月16日晚常委會的情況。

5月16日晚的常委會，我沒有列席。當天下午7時半，我從電視上看到直播了紫陽同志與戈會談的第一、第二部分，沒有播第三部分，就打電話問

李勇同志。李勇同志說，他不知此事，紫陽同志正在宴請戈巴契夫，尚未回來。他又說，你到勤政殿來吧，紫陽同志也要來，今天晚上要開常委會。但我到勤政殿後，李說，他問了會議處了，今晚名單上沒有你，你不列席。我當時十分尷尬。大約等到十點鐘，紫陽同志來了，我說不知道？什麼沒有播第三部分；他說，時間不夠，第三部分的內容在會談時就來不及講。這時李鵬同志來了，紫陽同志就進會議室開會。我留在他辦公室裏和李勇同志聊天。到凌晨二時，會散了，張岳琦同志從會議室出來，我問他討論什麼議題，他說討論常委致絕食學生書。我問怎麼開了這麼久，有分歧嗎？張說，不是什麼大問題，就是在用愛國動機還是用愛國行動這幾個字上統一不起來；紫陽同志今天不冷靜，大概是陪戈喝酒喝多了；今天要不是尚昆同志和喬石同志做工作，恐怕現在也結束不了。張岳琦同志講這些話時，李勇同志在場。我所知道的有關 16 日常委會的情況就是這幾句話。我也沒有對任何同志講過（而且第二天就見報了）。

十、紫陽同志的辭職信是我替他起草的。

5 月 17 日晚飯前後，紫陽同志要我到他家去，張岳琦同志也在。紫陽同志說，今天下午，在小平同志家裏，常委開會，作了決策；什麼決策，這是機密我不能告訴你；常委批評我，說我 5 月 4 日講話把事情鬧大了；我保留了意見；我再三考慮，以我現在的認識水平來執行常委決策，肯定是不得力的，肯定會影響到工作；我想我應該辭職。你幫我馬上起草一封辭職信。紫陽同志交代後，我立即回辦公室起草，並立即送紫陽同志。他看了，沒有作修改，說，可以。我就把信稿送李樹橋同志，請他發出。第二天，我去看紫陽同志，他說，信又收回了，因為尚昆同志批評他，如果學生以他辭職為藉口大鬧起來，將是什麼後果。他說，尚昆同志的意見對，他自已當時沒有從後果上去考慮。這封信是我起草的，我起草時也根本沒有從後果上來考慮。我只是很欽佩紫陽同志，覺得他光明磊落，不隱諱自已的觀點，不計較個人的得失。另外，我認為這封信本身就是紫陽同志送給常委的報告，所以我在起草前和起草後都沒有向常委報告。

十一、我的「告別演說」。

當天晚上 (5 月 17 日)，我離開中南海後就回辦公室。一路上心情非常沉重。一是關於紫陽同志。他受了批評，辭職了，我非常惋惜，我認為他是一位很好的領導者。二是關於我自已。紫陽同志叫我寫辭職信時，叮囑我要注意保密，我說，我很注意。他說，有人對我說，你嘴巴不嚴，已經洩密了。我十分委屈，說，這準是李鵬同志說的，那是因為他對我的印象不好，其實我從來沒有洩過密。紫陽說，我問了李鵬同志了，有沒有根據，他說有根據，現在不說，以後再說。（我之所以說李鵬同志對我印象不好，也是出於我自已的猜測，因為最近已有 4 月 24 日晚和 5 月 16 日晚兩次常委會不讓我列席，而第一次正是紫陽同志訪朝期間，由李鵬同志主持常委工作。）我當時的想法是：紫陽辭職我也辭職，這毫無問題；但如果說我洩密而對我處理，弄得不清

不白，不乾不淨，是我無法接受的。我當時心情非常沈重，也非常激動，覺得心裏有話，不吐不快。

我回到辦公室，室裏有13位同志正在加夜班。我就把大家找來，發表「告別演說」。話不多，大意是：今天也許是我最後一次同大家在一起開會。有人說我是黑手，壞人，插手學生鬧事（按：這是5月中旬以來我幾次聽到的社會傳聞），有人說我洩露黨和國家機密。于謙有兩句詩：「碎骨粉身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我捫心自問，沒有做過壞事，沒有違反過紀律。我是清清白白的，今天正好有13位同志在座。據說：「最後的晚餐」也是13個人。我當然不是耶穌，同志們也不是猶大。我只希望同志們冷靜，守紀律，不要衝動，千萬不能惹事。給我惹事事小，給紫陽同志惹事事大。我和紫陽同志的關係，同志們都知道。我做事歷來最怕給紫陽同志添麻煩。王昌齡也有兩句詩：「曾為大梁客，不負信陵恩。」你們如果給紫陽同志惹出事來，我擔當不起。以上，我回憶大慨就是我「告別演說」的全文。我說完，就宣佈散會。我沒頭沒腦講了這一通，所有的同志都愣了。我這些話，使研究室的同志在思想上陷於極大的混亂。散會後，有三幾個同志聚在一起議論，見了我就問，到底出了什麼大事？我說，沒有大事，是李鵬同志批評我洩露了機密；紫陽同志說，鮑彤不會的；李鵬同志說，他掌握材料，有根據，以後要拿出來；反正我以後要挨整了。

這裏需要說明：我沒有洩露即將戒嚴的機密。紫陽同志跟我說：「常委作決策，什麼決策我不能告訴你」時，張岳琦同志在場。我內心猜測，這個決策大慨是開展反自由化運動和抓黑手，根本沒有想到軍隊。軍隊進城我是19日晚看電視知道的；戒嚴令我是20日公佈後知道的。

十二、我5月20日和陳一諮同志的談話及其後果。

5月20日上午，陳一諮和其他兩三位同志到我辦公室來，大約談了半個到一個小時。不是我約他來的，我事先不知道。談話的全部內容我已記不清了。我現在根據當時的形勢估計，陳一諮很可能對我說，體改所上一天(19日)發表了一個聲明，但我不知道聲明的內容（我是從陳希同同志報告中才知道聲明內容的），所以在這個話題上不會展開。當時軍隊進城，陳很可能跟我談軍隊進城受阻的情況，我很可能講了騎虎難下之類的話，但我不會把我內心「走錯了一步大棋」的想法說出來。陳也很可能談到紫陽同志，或表示贊成亞行講話，我很可能講了紫陽同志好話，但我不會講亞行講話的好話，因為我知道常委批評了這個講話，我也決不會向他洩露紫陽的辭職信和尚昆同志對紫陽的批評（這件事無論在室內室外，我從來沒有向任何同志講過）。

我只記得我講了李鵬同志壞話。我說，現在一提官倒，就是公司，一提公司，就提小平同志和紫陽同志的孩子在公司裏工作，好像別的同志的孩子沒有在公司裏工作似的。我聽說李鵬同志的孩子也在公司工作，而且有一次喝醉了酒打人，被扣到派出所裏。我說，學生說紫陽打高爾夫球，李鵬同志也游泳呀！聽說總後為他修了休息室，很豪華，據說花了一百萬塊錢。我還說，別的同志，外事活動都不帶夫人，只有李鵬同志帶夫人，聽說有一次她

在國外賓館裏丟了一件不值錢的首飾，還跟對方交涉，後來找到了，其實是贗品，不是什麼貴重物品，缺乏氣度。我所講的這三條都是道聽途說的閒言碎語，但因我對李鵬同志有情緒，就衝口而出，洩露出來。陳一諮走後，我非常後悔，生怕陳把這些閒言碎語捅出去。我就要高山同志（他當時並不在場，我找他只是因為他知道體改所的地址），立即專程來找陳，告訴陳，千萬不能捅出去，一捅出去，不僅給我招麻煩，還可能給紫陽同志添麻煩（這事其實與紫陽同志毫無關係）我要高山傳這些話，不是從政治上的影響和後果出發，而是怕他給我惹事。現在組織上告訴我，他們已經寫了傳單捅到社會上去了，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儘管我事後曾叫他們不要捅出去，儘管傳單把我的話添油加醋誇大了不知多少倍，但引起他們寫傳單的直接責任者是我。

十三、我5月22日跟高山同志的談話。

5月22日機關黨委開會。高山向黨委交代19日體改所的聲明，他參加了。黨委書記陳群林同志向我報告，我就找高山談話。我說，你怎麼到體改所惹事去了？他說，是啊，去了，錯了。我說，你不是給我找麻煩嗎！他說，是我自己去的，我一人做事一人當。我說，你去了，體改所知道了，你又向機關黨委報告了，這裏也知道了，鬧得風風雨雨的，人家會說，體改所的聲明政改研究室參加了，也就等於鮑彤參加了，最後就給紫陽同志添麻煩了。我本來乾乾淨淨，現在給你弄得不清楚了！應該說，高山同志22日向黨委報告他19日的活動，這個態度是好的；而我的這次談話是喪失原則的，非常不嚴肅的。我不追問高山到體改所講了什麼話，不追問他「參加」到什麼程度，不追問這個聲明到底是什麼內容，會在社會上造成什麼影響。我所關心的，只是別給我惹事。這裏需要說明一下：我是到秦城後才從報上登載的陳希同同志的報告中看到體改所聲明的內容；當時，我只聽說體改所發表了一個聲明，我以為是很一般的東西，我把高山參加聲明看得同參加遊行一樣簡單，思想上並沒有把它當作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來對待。

十四、我替紫陽同志做的最後一件事是幫他起草發言稿。

5月24日上午，紫陽同志找張岳琦同志和我，說要起草一個發言稿。他說，不知道政治局什麼時候開會；如果開會，就會批評我，也會提出一些問題要我回答；你們幫我起草一個稿子，哪怕不成熟；如很快開會，就有個準備；如最近不開會，有個稿子也就可以擺在那裏慢慢修改。當時，紫陽同志敘述了從追悼活動到他提出辭職的一些想法和考慮（另有草稿材料）。我是當天起草，當天晚叫張岳琦同志轉紫陽同志的。這是我為紫陽同志作的最後一件事，此後，我沒有見過他。

這件事，在審查我的問題時，我沒有交代。我不知道是否準確的反映了他的原意，不知道他是否同意這些表達，最後用了這個稿子沒有。如果最後用了，組織上總會問我的。所以直到組織上問我22日以後是否替紫陽同志起草過什麼稿子，我才交代。

十五、我曾對一位同志說，如果我被隔離審查，請他告訴高山通知杜潤生同志一聲；但我和杜潤生同志決無非組織的聯繫或政治活動。

這是5月26日或27日的事，早在5月中旬，我就陸續聽到社會上一些流言，說我插手學生事件，當時我一笑置之，並不介意。17日，李鵬同志批評我洩密，我開始緊張。20日，北京醫院告訴我秘書，說鮑彤今後不再在這裏看病了，我感到了實際的壓力，認為我已經被撤職了。後來，我又聽北京在傳，有個趙紫陽、杜潤生、安志文、鮑彤四人集團；香港報紙上還提到有個鮑彤反革命集團。我就有一種即將被逮捕或隔離審查的預感。我就想，如果萬一真的發生這種情況，應該告訴杜老一聲(安志文同志不在北京)。室內工作人員中，認識杜老的只有高山。因此，我25日或26日就想找高山，沒有找到，碰上了另一位同志(我現在不記得是誰)，我就對他說，我現在有一種預感，好像我要出什麼事，萬一我真的出了什麼事，你叫高山告訴杜老一聲。當時我的思想很簡單：趙、杜、安、我，四個人都冤枉，同案相憐，惺惺相惜。儘管我跟杜老並不熟，一下子覺得在感情上親近起來了，我如出了什麼問題，得讓杜老知道一下。我對杜老原來很敬重，但過去與他從無私交。個人之間的來往，一輩子只有兩次：第一次是4月28日或29日晚上，學生27日上街，我十分焦急，紫陽同志又在朝鮮，我就打了個電話給杜老，說想上他家聊聊天。我說我去，他說他來(我們住得近，在相鄰的兩個樓)，結果是他來了。我向他講了我聽到的27日學生遊行的情況，表示很著急，我發現他也很憂慮。我向他請教有什麼具體辦法能把事態平息下來，他說，難呀，大難題一個。他在我家坐了大約半小時，我就送他回家，因這次是他來我家，我心中非常過意不去，所以5月2日我就專程上他家回訪，這就是第二次。這次只有幾分鐘，我問他節日好，坐了片刻，覺得盡了心意，就告辭了。我和杜老之間，決無任何非組織的活動和聯繫。

十六、最後聲明三點：

(1)耀邦同志追悼會前後的幾天內，我曾驅車到天安門廣場繞場一周看看形勢；其中有兩次下了車，司機同志陪我進入人群，但未遇到認識的人，更沒有進過什麼話。4月27日以後，我就沒有再到廣場去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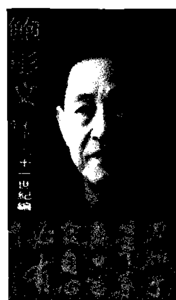
(2)我不認識任何非法組織的頭頭或成員，跟他們也沒有什麼任何形式的聯繫。我和嚴家其在十三大前共事過一年，但十三大後他就回原單位。今年我沒有同他見過面，或打過電話，或通過信，或托人捎過什麼話。

(3)今年4月15日以後，我沒有同任何外國人接觸過。外交部西歐司曾向我轉達西歐共同體各國大使的要求，說他們要共同請我吃頓飯，我婉拒了。5月26日或27日中午，有個自稱「美國ABC廣播公司駐京辦事機構中文秘書」的人，給我打電話(我不知道他怎麼找到我辦公室電話號碼的)，說要採訪我，我拒絕了，他又說要請我吃飯，我也拒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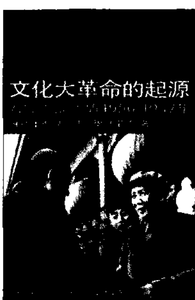
我以負責的態度向黨交代上述事實，請黨審查。

新世紀出版社
New Century Press
www.newcenturymc.com











































總經銷：田園書屋　　電話：852-2385-8031



作者簡介

吳偉，1952 年生，吉林長春人。中國現代史學者。早年下鄉插過隊，當過工人，也當過兵。1977 年考入東北師範大學，畢業後到中共吉林省委宣傳部工作。1983 年 7 月考取中共中央黨校研究生，在讀期間開始從事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1986 年獲法學碩士學位。

1986 年 10 月，調入鮑彤主持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參加了 80 年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的研討工作，是《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執筆人之一。1987 年 1 月至 1989 年 5 月兼任鮑彤秘書。1987 年 12 月任正式設立的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處長、研究員，參與了中共十三大後由趙紫陽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實施的全過程，並參加了十三屆二中、三中全會報告及其他重要文件的起草。自 1989 年 5 月底開始因「六四」事件被審查，先是在秦城，後回到本單位繼續接受「清查」。

1991 年初，任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百科知識》雜誌編輯部副主任。1993 年初經商。2010 年開始，重返學界，以獨立學者的身份從事中國現代史的研究和寫作。曾發表《跛腳的改革》、《中共十三大前後的政治體制改革》、《中共十三大前「反自由化」背後的博弈》等文。

封面設計：RENEE CHIANG

ON STAGE AND BACKSTAGE:
CHINA'S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1980s

内容簡介

1980年代，中共中央曾經推行過一次政治體制改革。這次改革方案的設計者和實踐的組織者，是時任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正是由於趙紫陽的主持，賦予了這場改革以與實際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設想全然不同的內涵，使這次原本以提高效率為目標的行政方面的改革，演變成了使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向現代政黨轉型的一次勇敢的嘗試。

這次政治改革在很多方面的深度是迄今無法企及的，並且超出了共產黨內保守勢力所能忍耐的限度，儘管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夭折，但是它為中國的政治轉型和社會轉型留下了寶貴的經驗。

本書作者參加了80年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的研討工作，是《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執筆人之一。本書是根據作者的筆記和親身經歷對這次政治改革所作的權威性記述；是繼吳國光先生《趙紫陽與政治改革》一書之後，關於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政治改革的又一部力作。作爲敘述重點，本書開創性地介紹了吳國光先生書中沒有過多涉及的，從中共十三大之後到「六四」事件期間，趙紫陽主持的政治改革實施過程。



ISBN 978-988-15571-1-7



新世紀出版社
New Century Press

HK$148